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

BY
CHARLES A. KUPCHAN

# 美国时代的终结

## 美国外交政策与21世纪的地缘政治

[美] 查尔斯·库普乾 著

潘忠岐 译

东方编译所译丛



译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OF SHANGHAI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时代的终结:美国外交政策与21世纪的地缘政治/(美)库普乾(Kupchan,C.A.)著;潘忠岐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东方编译所译丛)
书名原文: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
ISBN 7-208-05080-5

Ⅰ.美... Ⅱ.①库...②潘... Ⅲ.外交政策—研究
—美国 Ⅳ.D87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20068号

责任编辑 宋慧曾
封面装帧 王晓阳

·东方编译所译丛·
**美国时代的终结**
——美国外交政策与21世纪的地缘政治
[美]查尔斯·库普乾 著
潘忠岐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25 插页4 字数352,000
2004年6月第1版 200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
ISBN 7-208-05080-5/D·885
定价28.00元

# 序

王缉思

本书作者查尔斯·库普乾教授和译者潘忠岐博士，嘱我为《美国时代的终结》中文版写一篇前言。其实，作者在2003年英文版的前言里，已经清楚地交待了本书的政策含义，潘博士的译序又对全书作了详尽而精彩的评介。再就书论书，不免狗尾续貂。我仅想写几句“题外的话”，为译序做点小小的补充。

不同社会身份的人有不同的奋斗目标；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年龄段也有不同的生活追求。在号称主权平等的国际社会里，国情国力各异，各国战略目标的差别极大。“大战略”是大国的奢侈品，尼泊尔这样的国家是不会讨论大战略的。同样是大国，日本（就其经济实力和人口来说应属大国之列）在国家安全方面长期在美国的大伞下乘凉，很少听日本人提起本国的大战略。俄罗斯虽然脱胎于大战略曾经明确的苏联，但其国内经济政治制度还很年轻，形成大战略即使不是为时过早，也是力不从心。被库普乾看好的欧洲联盟，在形成统一的安全和外交政策方面，还处于幼年时期，只能借助于德国、英国、法国等强国的国家战略的合力，来寻找未来欧盟大战略的方向。印度是大国，但还不是公认的强国。印度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它对巴基斯坦等邻

国的心态，都表明它还没有具备构建一个放眼全球的大战略的需要和能力。

所以，现在对讨论大战略最感兴趣的，除了美国人以外，大概就要数中国人了。何谓大战略？库普乾的定义是："大战略是要确认地缘政治分裂带，弄清潜在的全球力量将在哪里和将以何种方式会相互产生矛盾，显示将可能最终引发主要战争的裂隙。挑战并不仅仅来自于确定这些分裂带在哪里，而且还在于厘清如何战胜它们——或者至少厘清如何减弱它们的毁灭性潜能。"换成通俗的中国式语言来说，大战略就是了解全球政治格局和力量分配，找到主要矛盾与战争的来源，并且提出战胜潜在对手和减轻战争威胁的行动方案。

近年来中国的有关政策研究机构和学者已经发表了一定数量的国际战略研究报告和学术著述，其中既有对美国等国家大战略的评述，又有关于中国国际战略的设想和建议。随着中国的崛起，我们的政府和社会各界对中国人自己的国际战略思维越来越重视。在探索中国大战略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从库普乾等学者的思想深度、广度、逻辑性、历史感、现实感和各个学科的相互交叉方面，借鉴不少有益的东西。

本书的内容十分丰富，从分析大战略的概念，到评述美国学者提出的大战略的各种不同思路，再到探讨美国大战略的国内政治背景和制约，最后提出作者本人的一套战略思维体系和建议，行文流畅，一气呵成。然而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不仅关心库普乾写了什么，还关心他没有写什么。换句话说，假设我们要构筑中国的大战略思路，有什么是我们必须确定而库普乾无须考虑的逻辑前提？

首先，库普乾提出的大战略没有涉及美国的国内政治稳定问题。他和其他美国人一样，在使用"国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

的概念时,主要还是指来自外部世界的安全威胁。虽然"9·11"之后美国成立了国土安全部,对外部世界的激进势力和恐怖主义组织渗入美国社会十分警惕,但美国人仍然没有对他们政治制度的牢固性产生疑虑。库普乾只是提到,在数字时代,美国要形成一个新的大战略,需要有"反应灵活的政治制度",更多的公众政治参与,凝聚一种更强的国家身份(identity)。但是,中国的大战略首先需要考虑如何维护国内政治稳定,防止外部敌对势力的渗透。中国"国家安全"的内涵同美国的 national security 有相当大的区别,前者包含着政权稳定、政治安全的含义,正像中国的"国家安全部"翻译为 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 所显示的那样。

其次,库普乾提出的大战略也没有明确地提到美国如何坚持其国家意识形态的问题。他反复强调的"自由国际主义"原则,其实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特别是美国民主党人长期坚守的一些思想原则。美国要将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推广到全球,是不言自明、无须重申的事情。同时,美国人在对外战略上尽管有许多争论和流派,但主要分歧是政策、策略和手段上的,而不是价值观上的。美国在国外追求的意识形态目标同它国内的意识形态是一致的,同它的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也是一致的。

相比之下,中国的大战略就必须考虑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必须讲明中国不欲将国内坚持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推广到国外,但又要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到资本主义。一个坚持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强大起来之后对世界意味着什么,也是库普乾等美国学者反复思考而没有明确答案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库普乾在本书中评论道:"在中国发展的现阶段,不可能预测它的意图将会如何变化,以及它同美国的关系是走盎格鲁—美利坚关系缓和的良

性道路，还是走盎格鲁—日耳曼对抗和战争的恶性轨迹。因此，美国还没有获取足够的信息来决定它应该为中国的雄心留出空间，还是果断地寻求封锁它的发展道路。对于华盛顿来说，以对欧洲让步的方式通融中国，将是天真的，北京的意图很可能需要制约。但是，认为中国已经是对手需要进行严厉遏制的假定，也是一样站不住脚的——而且可能变成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美国能够承受对中国采取等待和观望态度吗？尽管悲观主义者发出了最响亮的警告，但是中国并不具有成为美国主要竞争者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库普乾对中国和美国对华政策的这种观察，在美国政界是有代表性的，是当前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流思想，即在同中国交往中既合作又制约，继续观望，“两面下注”。因为中国在美国大战略里的地位同美国在中国大战略里的地位是很不相称的，所以两国相互战略定位里的这种不确定性，对中国人发展自己的大战略思路构成了更大的挑战。

第三，库普乾的大战略思路里，基本上不包括美国自身的国家发展战略。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而发展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样，中国的大战略就必须明确地将国家发展战略特别是经济发展战略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十六大报告里说到发展是第一要务，说到“始终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还说到“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协调关系，决定了中国大战略的出发点和逻辑前提。

除此之外，库普乾当然无须考虑美国的国土统一问题，而中国的大战略必须把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

因此，我认为尽管中国学者能从美国人的大战略研究中受

到启发，但是中国面临的"问题领域"(issue areas)、对国家利益的界定，以及国家战略目标，从形式到内容都跟美国十分不同。我也一直认为，在没有对上述若干有中国特色的问题研究透彻之前，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理论或国际关系理论的时机尚未成熟。

当然，对中国国际战略的研究来说，还有一个决策环境和舆论环境的问题。库普乾说："尽管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政府内部关于大战略的讨论极少，但是某些外界思想家却做得很好。在为数不多的仍对思考大战略问题感兴趣的分析家中，一个相对生动活泼的辩论已经慢慢形成。"库普乾和本书中提到的"某些外界思想家"，如弗朗西斯·福山、塞缪尔·亨廷顿、托马斯·弗里德曼、约翰·米尔斯海默、保罗·肯尼迪、罗伯特·卡普兰等人，大都曾有过从政经历，或同政府关系密切，所以在政府内外有关美国大战略和外交政策的辩论形成了一个网络，一种互动。在中国，过去学者和政府官员缺乏沟通的情况正在逐渐改变，出版界和媒体也比过去更为开放地探讨战略问题。在这种有利环境下，本书的出版应能对中国的大战略研究起一点小小的推动作用。

2004年立夏于北京

# 译序：另一种形式的罗马回归

潘忠岐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成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其经济规模和军事实力都达到了史无前例、无可匹敌的程度。“9·11”事件也未能削弱美国的实力，反而使其全球霸主地位更加稳固。[1] 因此，流行的观点认为，美国已经由“单极时刻”进入“单极时代”，[2] 美国霸权造就的单极世界不仅无法撼动[3]，而且美国时代正在回归鼎盛时期的罗马帝国。[4]

然而，与传统思维相反，美国乔治城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查尔斯·库普乾在新著《美国时代的终结》[5] 中指出，冷战丧钟宣告的并非美国的最终胜利，而是其全球主导地位走向衰亡的开始。“9·11”事件并没有改变国际体系的基本结构，但却从根本上动摇了美国的自由国际主义诉求，并由单边主义与孤立主义精神分裂式的结合取而代之。欧洲崛起使美欧之间形成新的地缘政治对抗，大西洋联盟的解体就像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个罗马一样正在加速美国时代的终结。美国时代不是正在回归鼎盛时期的罗马帝国，而是正在回归衰落时期的罗马分裂。

# 一、大战略的缺失

一个强国能否塑造并维持一个以自身实力和意图为主导的时代，关键并不仅仅在于它是否拥有超强实力，而且更在于它是否能够形成一个准确而清晰的理念地图，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能够平衡手段与目标的大战略。库普乾明确指出："罗马帝国、英国治下的和平、美国治下的和平，这些时代并不仅仅是罗马、大不列颠和美国的力量造就的，而且也是他们为管理和维持各自优越地位而设计的、极富创造性的、远见卓识的大战略成就的。"[6]

正是因为一个恰当的大战略对于一个大国的康宁和国际体系的总体稳定至关重要，因此库普乾认为："像美国这样的大国要想保卫自己，捍卫它通过艰苦努力建构的国际秩序，就必须有一个可靠有效的大战略。"[7] 美国享有压倒性的军事、经济、技术和文化主导地位。"可以说，今天的美国拥有比历史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强大的能力来塑造国际政治的未来。"[8] 然而，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却缺少维持美国时代长治久安的另外一个关键要素，即大战略。也正是因为大战略的缺失，美国时代的终结才变得难以避免。

冷战结束带来的地缘政治空间虽然为美国创建新的世界秩序、提出新的大战略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但是美国却荒废了这个历史时刻。在库普乾看来，从柏林墙倒塌到 2001 年"9·11"事件，"美国没有大战略，没有指导国家之船正确航向的设计方案"[9]。尽管自"9·11"以来，美国已经有了一个大战略——"以维持优势地位和先发制人原则为基础的大战略"，但是，它却是一个错误的大战略，"它的主要成功之处只在于疏远了大部分世

界,破坏了美国的关键伙伴关系”。[10]

冷战结束十多年来,美国之所以陷入战略盲目,与冷战不期而终有关。但是,库普乾认为,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美国一直没有形成一个准确的理念性世界地图。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成了一个茫然失措的大国”。作为全球秩序的维持者和国际体系的终极卫士,美国不仅看不到真正挑战者的崛起,而且逐渐丧失了对国际参与的兴趣。似乎美国政界没有对大战略的迫切需求,学界也没有关于大战略的有效供给。虽然为数不多的对思考大战略问题感兴趣的人的确提出了一些理念性世界地图,但没有一个是正确的。

库普乾写道:“要提出一个关于未来的大战略,就必须有一个特殊的世界地图。地图上事关紧要的不是地理特征——海洋、高山、河流,或者甚至国家疆界。相反,大战略是要确认地缘政治分裂带,弄清潜在的全球力量将在哪里和将以何种方式会相互产生矛盾,显示将可能最终引发主要战争的裂隙。挑战并不仅仅来自于确定这些分裂带在哪里,而且还在于厘清如何战胜它们——或者至少厘清如何减弱它们的毁灭性潜能。”[11]由此出发,库普乾对现有的五种地图范式一一进行了点评,并提出了自己的版本。

在库普乾看来,弗朗西斯·福山、约翰·米尔斯海默、塞缪尔·亨廷顿、保罗·肯尼迪和罗伯特·卡普兰、托马斯·弗里德曼分别提出了关于21世纪美国世界地图的竞争性洞见。每一种洞察都有自己的长处,但它们全部都是错误的。而且它们大部分因为同样的原因而错误,即错误地界定了新的地缘政治分裂带。这五种地图分别认为主要分裂带将出现在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之间[12],民族国家与国际体系之间[13],世界主要文明之间[14],繁荣的北方与动荡的南方之间[15],遵守全球化数字经济之规则的

国家与对抗这些规则的国家之间。[16]但是,库普乾认为,诸如此类的归纳全部都是错误的,因为今日的世界根本就不存在任何地缘政治分裂带。

根据库普乾的世界地图,“全球体系的惟一界定因素是实力的分配,不是民主、文化、全球化或者任何其他东西。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单极世界——一个只有一个权力之极的世界。而且,它是美国的单极世界。此时此刻,根本的、无法回避的地缘政治特征是美国的主导优势地位。”“如果地缘政治分裂带出现在权力之极之间,而今天只有一个这样的极,那么结论就是,分裂带并不存在。美国是拳击场上惟一的竞争者。它因对手缺席不战而胜。”[17]

由此,库普乾对“9·11”事件后布什政府提出的“以维持优势地位和先发制人原则为基础的大战略”进行了批评。“9·11”恐怖袭击是这个大战略的主要理念依托,但是,库普乾认为,恐怖袭击不会改变国际体系的内在结构,不论恐怖主义对世界惟一超级大国进行了何等程度的痛击,它都无法改变全球体系的单极性质,恐怖主义及其支持者与反恐怖主义国家之间的斗争无论如何都构不成界定未来国际体系的地缘政治分裂带。因此,美国现政府的大战略是建立在错误的理念地图基础之上的,它过分夸大了恐怖威胁对国际体系的塑造力,“通过把反恐斗争确认为指导性优先议程,并出台新的维持优势地位和先发制人的原则,华盛顿采纳的是一个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反对的大战略,并因而损伤了继续作为国际和平与繁荣基石存在的伙伴关系和国际制度。”[18]

美国在无功徒劳。因为“美国不知道要去哪里,所以也肯定不晓得如何达到那里。如果没有一套指导性原则,即大战略,那么即使善意的努力也将无所作为”[19]。虽然现在“美国时代存在

着，而且健在着”，但是理念地图的不当和大战略的缺失却在加速美国时代的终结。替代权力中心的崛起、美国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倾向的上升，将共同使美国的单极时刻成为昙花一现。

## 二、欧洲崛起与罗马再现

欧洲走向统合并作为一支新的地缘政治力量崛起是二战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政治格局的最大一次变貌。同样重要、几乎同时发生的另外一次变貌，即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只是更加凸显了这次变貌的历史意义。虽然很多人并不看好欧洲崛起为新的权力中心的能力，或者并不认为崛起后的欧洲会生发出与美国抗衡的战略意图，但是库普乾反驳了这种流行思维，认为今天的欧洲统合将像过去的德国统一一样，不仅能够集聚作为替代权力中心所需的实力，而且一定会在此基础上滋生新的地缘政治野心。欧洲崛起将不可避免地带来西方世界的一分为二，并像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个部分从而导致罗马时代迅速衰退那样，加速美国时代的终结。

1871年，俾斯麦将中欧地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彼此独立的大部分讲德语的土地统一为一个单一国家。之后，新德国获得了几十年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并很快带来了军事实力和政治野心的稳步提升。正像当时即将成为英国首相的迪斯累里所担心的[20]，德国人联合成一个单一国家无法挽回地打破了欧洲均势，永久性地破坏了英国大战略的基础，并使其全球主导地位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

库普乾对今日欧洲统合与过去德国统一进行了发人深省的历史类比。虽然与俾斯麦德国不同，欧盟还没有成为，而且不太可能成为一个单一国家，但是，欧盟的总体实力必须以各个国家

的经济、军事和地缘政治力量相加来进行评估。欧盟的年生产总值将近8万亿美元，相比而言，美国大约为10万亿美元。随着新一轮扩大的完成，欧盟的集体财富可能不久就会与美国持平。欧元作为世界上主要储备货币之一很快就会对美元的全球统治地位构成威胁。虽然欧盟并没有在军事实力和防御方面取得相应的进展，并因而给人留下了“经济巨人、政治矮子”的印象，但是这种情况很快就会改观。德国的统一也是贸易先行，但是政治联盟和统一国家的建立很快就随之而来了。美国的统一也是一样，军事和政治统合远远落后于经济统合。对于当时的观察家来说，美国也只是潜在的经济巨人，而不是主要的战略存在。然而，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美国的统一彻底改变了北美的地缘政治，并很快改变了世界的地缘政治。因此，库普乾坚信，欧盟一定会步德国和美国的后尘，它不仅会生发出对外野心，而且注定“在新的地缘政治世界地图上成长为一个可怕的实体”[21]。

之所以可怕，是因为库普乾预言，欧洲崛起会像罗马帝国末期的拜占庭一样成为独立的权力中心，与美国形成分庭抗礼之势，并从而导致西方世界的终结。为了有效管理过于庞大的帝国疆域，罗马皇帝戴克里先将帝国一分为二。起初，戴克里先的改革方案在加强帝国安全、使帝国东西部分有效消除外来威胁方面是相当成功的。但是，最终，这项出于善意的政策却因为将权威中心一分为二而使情况变得更糟，单极维持的和平很快便让位于两个权力中心之间为争夺优势地位而进行的对抗。

库普乾认为，今日世界美欧之间的分裂和对垒似乎正在重蹈罗马帝国分裂并衰亡的历史覆辙。因伊拉克危机而彰显的美欧分歧，一时间成了政界和学界争论不休的热门话题。对于美欧分裂的根源和大西洋联盟关系的前景，各种分析见仁见智。[22]

库普乾是最早意识到这种分裂的学者之一[23]，与罗伯特·卡根批评欧洲的软弱不同，库普乾认为欧洲将是美国未来要面对的真正强大的对手，他虽然并不确定华盛顿和布鲁塞尔是否将步罗马和拜占庭的后尘，走向地缘政治对抗，但是，他认为这方面的警示已经明确出现了。美欧之间暂时的竞争很有可能发展成为更严重的对抗。

尽管有人提出，共同历史和价值观会有效维持大西洋联盟纽带的韧性，欧盟和美国不可能分道扬镳[24]，但是，库普乾认为，同样的共同历史和价值观并没有能够阻止东西罗马走向对抗与分裂。而且，美国与欧洲之间的分歧并不仅仅表现在经济和贸易方面，在价值观方面也出现了彼此竞争的态势。“美国人认为欧盟对多边主义制度和国际法治的坚定承诺太过天真、自以为是，是军事软弱的结果；欧洲人则认为美国对使用武力的依赖太过简单主义、自私自利，是实力过剩的产物。”[25]

这种价值观方面的分歧跟利益方面的分歧一道，不仅严重侵蚀着大西洋联盟关系，而且给国际组织的有效性带来了严重打击。库普乾认为，美欧之间的有效协调是当前大多数多边主义国际制度能够达成共识和采取联合行动的重要保障。但是，当欧洲抵制而不是支持美国的领导地位时，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多边主义国际组织就会陷于瘫痪，难以正常运转。最明显的例证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前，美英曾试图寻求获得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对伊拉克使用武力，但是由于法国事先扬言要动用否决权，因此他们只好作罢。美英联军绕过联合国单方面发动伊拉克战争的行为，严重挑战和削弱了联合国的权威性与有效性。

当代西方世界与4世纪罗马帝国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的分裂是自发的，后者的分裂是自觉的，但是，结果都一样，分裂双

方最终都会走向对抗并加速各自时代的衰亡。虽然由于地理上的自然分割，美欧之间不大会像罗马与拜占庭之间那样不断爆发冲突甚至战争，但是，欧洲崛起不可避免的后果是，欧洲将成为挑战美国霸权地位的新的权力中心，欧洲与美国之间会逐渐形成新的地缘政治分裂带，取代因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而消失的东西方之间的地缘政治分裂带，由美国和欧洲有效联合构成的单一一极——西方——很快就会再现罗马帝国式的分裂。由于自冷战以来，大西洋联盟一直是国际体系的基石，因此随着“大西洋联盟的死亡”和“西方的终结”[26]，世界将不可避免地回归多个权力中心之间的对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库普乾认为，美国时代正在回归衰落时期而不是鼎盛时期的罗马帝国。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库普乾认为，美国时代面临的挑战既非来自伊斯兰世界，也非来自中国，而是来自统合中的欧洲。

## 三、美国时代终结的国内逻辑

正如美国时代是多重因素合力作用的产物，美国时代的终结也是多重因素共同促成的。在诸多国内外因素中，欧洲崛起和美欧分裂只是导致美国时代终结、世界回归多极的外因，其内因则在于美国自身的国内政治、美国对于承担全球霸权负担的矛盾心态、美国公众对美国国际主义支持程度的下降等等。虽然很多人并不认为，美国会从全球舞台上后撤，政治精英和国内大众对多边参与的支持程度会锐减。尤其在“9·11”事件后，许多人预期，美国管理世界事务的兴趣会持续勃兴，华盛顿将继续乐于担当领导者的职责。[27]但是，库普乾并不认同这种流行思维，而是坚持认为：“未来几年，美国的国际主义将迅速式微，并变得越来越单边主义。”[28]而且，美国的单边主义正在同孤立主

义形成一种精神分裂式的致命组合，它们将一并促使美国时代走向终结。

通过回顾美国的发展历程，库普乾认为，三方面国内辩论对于塑造美国国际主义以及由此而来的大战略至关重要。它们分别是："是现实主义还是理想主义应当指导国策的制定；在形成大战略时，如何协调美国国内不同地区间相互竞争的文化与利益；如何管理政党政治，并限制其对外交政策行为的影响。"[29]自建国以来，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争就一直贯穿于美国大战略的制定；美国不同地区千差万别且变动不居的经济利益和文化也对国家大战略产生着深刻的影响；由于美国非集权化的权力制衡体制限制了对外政策的稳定推行，因此美国的大战略极易受到政党政治的左右。一战后美国参加国际联盟的失败和二战后美国参加联合国的成功，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美国要制定行之有效的大战略，就必须在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寻找到一条中间道路，平衡美国各个地区之间的不同利益和文化，使外交战略摆脱党派冲突的羁绊。

过去，美国对全球事务的参与主要是由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严重威胁维持的，先是德国和日本，后是苏联。由于存在明确、紧迫的外部威胁，国内政治方面的制约因素难以发挥作用，这些制约因素长期以来一直压抑着美国的对外野心，并滋长着美国人对参与国际制度的反感。随着苏联的解体以及冷战期间形成的国内共识的解体，人们再也无法确信，对自由国际主义的支持是否会持之以恒。因此，库普乾认为，冷战结束以来，一直影响美国国际主义和大战略的三方面辩论继续决定着美国国内政治的基本生态，并再度成为制约美国国际参与的主导因素。

较年轻的、没有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或冷战期间决定性事件的美国人，现在正进入显要职位。经济相互依赖、信息革命

和国际恐怖主义可能使他们对孤立主义具有免疫力，但是，他们不会自动成为像年长美国人那样的国际主义者。美国南方和山区西部的人口与政治影响正在上升，这使支持单边主义外交政策的选民得到了加强，并潜移默化地导致了同沿海地区文化和政治差距的加大。建立跨地区和跨党派的国际主义联盟很可能变得更加困难。美国西班牙裔人口也在大幅度增加。特别是由于西班牙裔美国人倾向于集中居住在像得克萨斯、佛罗里达和加利福尼亚这样的重要选举州，因此美国中部和南方有可能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发挥更为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库普乾认为，布什政府执政后，美国外交所日益表现出来的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倾向并不是一种暂时现象，而是一种必然趋势。国内政治生态的这些变化正在促使美国国际主义重新变得更不确定和更为匮乏。[30]

虽然有人认为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会抑制国内政治对美国国际主义和大战略的消极制约[31]，但是，库普乾不以为然。他认为，恐怖主义不会使美国排除孤立主义或者单边主义的诱惑。追求国家远离国外麻烦，是美国一直可以追溯到国父的传统，这个传统完全有可能被全球参与成本的提高重新唤醒。美国人对多边主义制度具有一种长期累积的反感，因为美国人不愿意多边制度损害单边倡议的自由。美国人一向对自己的国内制度都心存疑虑，让他们对国际制度集结热情、托付意愿那就更是难上加难。相应地，当美国的确有所作为时，它会完全我行我素——就像在伊拉克战争中所表现的那样。因此，库普乾写道："长期内，恐怖主义可能会对美国国际主义产生截然相反的影响，它肯定会加强在2001年9月之前就已经成为潮流的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倾向。恐怖主义不会成为让美国回归中线的集体威胁，相反，恐怖主义可能会像一张通配符(wild card)一样发

挥作用，它时而激发美国一阵痛打，时而又会诱使美国退回到保护壁垒之后。恐怖威胁不会激励美国成为更稳定的伙伴，而会使之成为一个更顽固、更不可预测和更倔犟的行为体。”[32]

虽然表面上看，孤立主义与单边主义代表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诉求，孤立主义要求解脱和避免参与，单边主义则支持不受约束的参与。但是，库普乾认为，“实际上它们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33]。它们具有共同的意识形态来源，即美国惧怕因卷入而损害自由和主权，以及美国的例外主义观念。而且，孤立主义与单边主义两种倾向在美国正在形成某种精神分裂式的组合，共同威胁着二战以来一直维持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自由国际主义。因此，库普乾认为，外部严重威胁的缺乏将重新激活美国国内政治对美国国际主义和大战略的遏制。他说：“甚至美国单极时刻的终结可能是在美国国内造成的”[34]。单边主义与孤立主义的致命组合不仅使美国时代的终结难以避免，而且会加速全球地缘政治对抗的回归。

## 四、数字时代的新挑战

库普乾所指称的“美国时代的终结”具有两重涵义，他说：“美国时代的终结不仅仅是美国优势地位的终结和世界向多个权力中心的回归，它还是一个时代的终结，美国在塑造这个时代过程中起到了巨大作用——这个时代就是工业资本主义、共和国民主和民族国家的时代。”[35]导致美国时代在第一种意义上终结的，主要是欧洲崛起和美国自由国际主义的丧失，导致美国时代在第二种意义上终结的，则主要是历史发展本身所具有的进化和循环特性，以及即将来临的数字时代的全新挑战。

在达尔文进化论的基础上，库普乾提出了一种新的历史变

迁理论。该理论认为,历史进步的动力是主要生产方式的发展及其对治理制度和群体身份的影响。生产方式、治理制度和群体身份是界定一个时代的三个主要方面。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形成一种特殊的治理制度和一种特殊形式的群体身份。潜在生产方式的进步接着又会破坏同样这些政治和社会制度并使之丧失合法性,从而结束一个时代,开启下一个时代。即使经济转变一般以进步的方式发生,但是总体上的历史变迁既有进化性特征,也有循环性特征。库普乾认为,人类历史发展迄今已经经历了四个时代——游牧时代、早期农业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现在正在进入第五个时代——数字时代(digital era)。[36]

工业时代的核心特征是以工业资本主义为主要生产方式,以共和国民主为主要治理制度,以民族主义为主要群体身份。库普乾认为,由于美国在所有这些方面都达到了最高境界,它已经处于工业时代的最前沿,因此,美国时代乃是工业时代的代名词。而工业时代现在正逐步让位于数字时代,美国将最先感受到这种时代变迁的影响,来自数字时代的全新挑战将促使由工业时代界定的美国时代逐步走向终结。

由于工业时代向数字时代的变迁仍然处于初始阶段,除了在生产方式方面能够确定数字资本主义将取代工业资本主义之外,库普乾认为,现在还太早,无法确定数字时代具体会形成什么样的治理制度和群体身份。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根据历史变迁规律,数字时代必然会引起主要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根本变迁。美国是数字时代的首要奠基者,潜在生产方式的转换至少会在公民参与、国家治理、社会关系等方面给美国政治和社会制度带来不利影响。

与工业时代相伴随的强烈的公民参与精神在信息时代开始下滑。调查显示,美国公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兴趣、时间和质

量都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37]而公民参与的下降,不仅会影响美国的民主政治,而且还会直接影响国家的治理质量。公民参与的减少和治理的衰弱好像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由于美国人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对公共制度丧失了信任,因此怠慢的选民使当选官员对投票人更缺乏责任感。结果,治理质量遭到了削弱,并反过来进一步加强了公众的玩世不恭和拒绝参与。虽然美国的民主结构因为其他不同原因已经开始遭到削弱,但是,库普乾认为:"数字时代和信息革命是美国主要治理制度发生衰退的首要原因。"[38]

不仅如此,数字技术的出现和传播在影响治理制度的同时,也在影响群体身份。民族主义是工业社会的婢女,工业时代的结束可能因此削弱了民族国家的基础。数字时代的来临好像是以牺牲工业大熔炉为代价的,美国可能因此正在向更大的种族和社会隔离倒退。数字经济在推进社会团结一致和将移民融入多种族社会等方面都是缺乏有效性的。处于风险中的并不仅仅是种族和社会统合,数字经济可能还扩大了地区分裂。美国各个地区不同文化和经济利益方面的分歧正在随着数字时代的展开而加剧。

虽然有观察家表示,2001 年"9·11"事件会帮助改变这些令人担忧的政治和社会趋势,但是,库普乾认为,这只是一种转瞬即逝的暂时现象,"反恐战争并不适合于改变这些深深置根于潜在生产方式变迁及其对政治生活影响的社会趋势"[39]。当然,库普乾在这里所要强调的并不是数字时代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美国的政治分裂,而是数字时代的新挑战有可能破坏共和国民主和民族国家的基础。数字时代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将深刻地改变美国政治,以及美国在全球政治中发挥作用的范围和性质。

由于"要形成一个新的大战略,设计一个与之相适应的新的国际主义,就要有反应灵活的政治制度、关注和参与的公众,以

及足够强烈可以支持牺牲和共同目的感的国家身份”[40]，而数字时代的降临正是在这些方面给美国带来了强烈的负面影响，因此，在库普乾看来，历史的当代变迁只会使美国更难形成一个新式的自由国际主义，并在此基础上设计一个行之有效的大战略。美国时代两种不同意义上的终结，几乎发生在同一时期，并且是彼此联系、相互推动的。

## 五、美国治下的和平之后

美国时代的终结和多极世界的回归作为一种客观的必然趋势是无法阻挡的，但是，库普乾并不认为由此而来的地缘政治对抗是不可克服的。他虽然同米尔斯海默一样也以现实主义为原则描绘未来的理念性世界地图，并预言世界权力中心之间的地缘政治对抗会最终回归，然而，在如何应对新的地缘政治对抗问题上，却与后者看法相左。米尔斯海默认为多极世界的回归将充满危险，因此他主张美国应尽可能维持冷战的两极，若不能，则应鼓励核武器扩散。与此不同，库普乾对未来的态度比较乐观。他虽然承认多极之间的竞争与对抗可能是一种流行病，但是，他还同时认为，正确的大战略能够抵制多极体系的竞争本性。因此，他建议美国政府必须和余下世界现在就开始未雨绸缪，想象美国治下的和平之后的国际生活，为和平治理设计一个大战略，并从国内政治着手开创一个新的更强调区别对待的国际主义，同时还要为迎接工业时代向数字时代的变迁做好准备。

由于多极世界的回归必然意味着地缘政治分裂带的回归，因此，库普乾认为：“对于美国来说，首要的挑战是，寻找方法使地缘政治分裂带的战略影响最小化，建立跨越分裂带的桥梁，限制野心以便消除这些分裂带产生的竞争本性。”[41]历史上，美国

联邦、欧洲协调、欧洲联盟为成功克服多极体系下的地缘政治对抗提供了三种不同方法。它们全都涉及统合进程，尽管统合的紧密程度各不相同，但是它们在驯服多极体系的战争本性、和平治理权力中心之间关系方面都共同强调三个重要元素——实行战略克制、建立限制性制度、追求社会统合。[42]

既然历史已经证明战略克制、制度和社会统合是过去成功驯服多极体系的关键要素，[43]那么，要在美国治下的和平之后成功应对多极世界的回归，美国就应该以它们为中心构建新的大战略。库普乾指出："这三个观念应该成为新的自由国际主义的基础，并构成新的美国大战略的理念核心。"[44]为此，他建议，通过实行战略克制，美国应该有保留地使用权力，为新来者让位，展示良性意图。具体而言，就是支持欧洲统合，同欧洲建立更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欢迎亚洲推动自身的地区统合；容许中国逐渐崛起为主要大国，同时制止中国可能将意图向侵略性转变。通过建立制度，美国应该一方面致力于驯服国际体系，另一方面找到政治中间地带，以便建立新式的、强调区别对待的、持久的自由国际主义。通过社会统合，美国应该在主要大国之间寻求培养跨越政治和文化分裂带的共同目的感和共享身份感，将竞争性要求导向合作性方向。

为了有效应对多极世界回归之后的地缘政治对抗，为了确保新的大战略能够稳步推行，美国还必须从国内政治入手，开创一个新式的更强调区别对待的持久的自由国际主义。库普乾一直坚持认为，自由国际主义应该是美国大战略的基石。为此，美国需要"找到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适当结合，平衡相互竞争的地区利益和文化，让外交政策远离从美国早期开始就一直使之扭曲的政党斗争"[45]。

在库普乾看来，美国政府现在面临的挑战在于，必须在国外

参与程度与国内政治之间不断维持一种平衡。美国今天的领导人必须以罗斯福为榜样，在做得太多和做得太少之间寻找中间道路。犯两个极端中任何一个极端的错误都是同样危险的。一方面，没有制约的单边主义会把盟国变成反对者；另一方面，追求没有足够政治支持的国外参与也将是一种过度扩展，并有遭致反对和向孤立主义迅速回归的危险。库普乾指出："两者之间就是中间地带，就是新的更强调差别对待的自由国际主义，在此基础上可以长期建立并维持一个新的更强调选择性的大战略。"[46]因此，他建议，美国领导人应该像罗斯福成功创建联合国那样，宁要能够实现的最小值，也不要无法得到的最大值。

由于美国时代的终结既是美国优势地位的终结，又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个特殊的历史纪元——工业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和民族国家的历史纪元——的终结，因此，美国还必须积极迎接数字时代的各种挑战，为数字时代最终取代工业时代做好准备。多极世界的回归和数字时代的展开都是不可避免的，都是不可变更的历史进化和循环的产物。而且，工业时代向数字时代的历史变迁会在一定程度上破坏美国的治理制度和群体身份，会加剧伴随多极世界回归而来的动荡。因此，美国应该致力于重新激发公民参与，防止可能最终威胁美国民族国家完整性的种族、社会和地区分裂，为自由国际主义和与之相适应的大战略提供反应灵活的政治制度，以及足以支持牺牲和共同目的感的国家身份。美国如果不能及时解决国内制度的虚弱无力问题，就难以有效管理衰落中的优势地位，以及随之而来的更不确定的国际环境。

## 六、分析与评价

库普乾不仅从美国大战略、美欧关系、国内政治、历史变迁

等多重角度全面系统地分析了美国时代必然走向终结的历史命运，而且还据此为华盛顿迎接美国治下和平之后多极世界的回归提出了颇具战略性的应对之道。他的分析耐人寻味、发人深省，是研究美国战略与外交、美欧关系、21世纪地缘政治的必读之作。

《美国时代的终结》最精彩之处莫过于对“未来美国优越地位和全球稳定可能面临的核心挑战”进行了独到的分析[47]，作者大胆而雄辩地宣称，美国治下的和平时代即将结束，美欧分裂将重蹈罗马分裂的历史覆辙，国际体系将重归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对抗。得益于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从政经验[48]，库普乾从战略的高度、用历史的经验、以严谨的分析对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实力和外交政策进行了一次重要的、挑战性的重新评估，对认为美国优势地位会经久不衰、可以再现罗马帝国强盛时代的自鸣得意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对美国极大漠视甚至蔑视欧盟崛起之地缘政治意义的传统思维进行了猛烈的批评。这种重新评估、鞭挞和批评尽管并不新鲜[49]，也并不比其他相类“美国衰落论”分析[50]高超多少，但却恰逢其时，该书出版于2002年，却预先为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后凸显出来的美国单边主义倾向和美欧分歧提供了颇为精准的预测和颇有说服力的解释，就好像“在电影公映之前库普乾就已经对情节了如指掌了”[51]。该书的出版因此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并于2003年和2004年连续再版。很多观察家也都因此对库普乾其人其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52]

《美国时代的终结》独到之处还在于，从美国国内政治的角度探讨了美国单极时刻难以为继的基本逻辑，为读者更全面地解读美国外交和战略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思考维度与素材。库普乾从美国建国以来的发展历程，从美国国内现实主义与自由主

义之争、不同地区利益与文化分歧、两党政治斗争等方面，解释了为什么恐怖主义威胁既不能帮助美国避免回归单边主义与孤立主义的危险组合，也不能帮助美国形成恰当的大战略。对此，约翰·艾肯伯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库普乾最富洞察力的地方是说明了美国独特政治文化对大战略的影响。"[53]而这一点对于研究美国的中国学者来说尤其具有启发意义。正如王缉思所指出的："我们在对美国霸权的研究中，最薄弱的环节恰恰在于美国霸权主义的国内根源。"[54]对美国的霸权研究如此，对美国的外交和战略研究也是如此。

当然，库普乾的分析也并不是无懈可击的，《美国时代的终结》也是一部极富争议之作。最大的争议来自于他对欧洲崛起以及美欧对抗的分析。很多学者并不认为，欧盟是美国主导地位的潜在挑战者。《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表的书评指出，库普乾对欧盟军事力量的发展和政治野心的集结过于乐观了，经济上欧盟可以和美国平起平坐，但是军事上不会。[55]菲利普·戈登并不认为大西洋联盟关系会发展到无法挽救、不可调和的分裂程度。[56]罗伯特·杰维斯虽然肯定"《美国时代的终结》对认为美国优势地位、民主传播和经济全球化已经结束大国竞争的流行观点提出了振奋人心的挑战"[57]，但他也认为"欧洲不会在传统的均势意义上抗衡美国"。[58]理查德·罗斯克兰斯则指出："欧盟不会寻求成为另一个与美国竞争或威胁美国的军事超级大国。伊拉克的失败并不会导致美国时代的终结。"[59]在他看来，美欧关系不是火星人与金星人的关系，而是恺撒(Caesar)与克利萨斯(Croesus)的关系，前者拥有无限的军事和政治能力，后者则积聚了无限的财富，他们彼此需要，共生共栖。虽然罗斯克兰斯的批评直指卡根，但也适用于库普乾。库普乾和卡根都认定大西洋联盟关系今非昔比，尽管认定的根据截然不同，前者认为欧洲会

成为美国的强大对手，后者认为欧洲过于软弱，但是他们对美欧关系的判断都只是一家之言。

《美国时代的终结》给人带来的最大疑问在于，如果真如库普乾所言，欧洲将不可避免地崛起为一支重要的抗衡美国的地缘政治力量，那么他何以乐观地认为美国能够以恰当的大战略驯服未来的多极体系呢？库普乾对美欧对垒的解释是建立在两个不确定的假设基础之上的，一是美国不会有效调整自己的内政外交，并重建大西洋联盟；二是欧盟成功实现崛起之后必然继续以反美为外交指向。[60]而他给新的美国大战略开出的药方是实行战略克制，尤其对欧洲，建立和维护国际制度，并促进社会统合。倘若他对迷津的指点是可行的，那么美国就不仅可以调整自己的外交，与欧洲重修旧好，而且能够促使欧盟的外交指向由反美变为亲美。这样，他所预言的不可避免的美欧对抗就成了可以避免的了。

同样，库普乾把美国时代的终结归因于美国国际主义的式微也存在相似的逻辑悖论。既然美国已经厌倦了作为全球卫士的角色，恐怖主义威胁也无法改变美国对全球参与的反感，那么他何以乐观地认为，美国可以开创一个新式的更强调区别对待的持久的自由国际主义，从而有效管理以地缘政治对抗为主要特征的多极世界呢？诚如罗伯特·塔克在评论《美国时代的终结》时所指出的，在主要对手缺席的情况下，美国对承担霸权重负的反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种反感并不足以导致它放弃作为秩序供给者的荣耀”。[61]一旦占据了指挥者的地位，任何国家都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它，美国也决不例外。如果美国主动退避，那么它就难以重新塑造作为大战略基石的强调参与的自由国际主义；如果美国不会主动退避，那么，要么美国时代不会因此而快速走向终结，要么美国无法按照库普乾的设计积极克

服单边主义本性、有效管理美国时代终结之后的多极对抗。

库普乾似乎并没有意识到悖论的存在，但他却在有意无意中对此作了弥补。他虽然认为美欧会重蹈罗马分裂的覆辙，但是正如最终导致罗马帝国及其继任拜占庭帝国衰亡的乃是非欧洲权力的兴起，欧洲只是美国的近期对手，最终导致西方世界终结的可能也是非欧洲权力的兴起，亦即亚洲的崛起。[62]至于仍然处于传统地缘对抗中的东亚何以会成为已经远远走在时代前列的西方的掘墓人，则超出了库普乾的讨论视野。尽管库普乾一再批评他人并警告自己不能简单地用历史或现实推断未来，但是他对亚洲崛起并挑战西方的判断还是使他带上了鲜明的历史循环论特征，犯了自己最不想犯的错误。

《美国时代的终结》对未来地缘政治的分析也是不够严密的。虽然库普乾认为，美国时代的终结将引入一个不可预测和令人不快的传统大国之间竞争和冲突的世界，但是，他并没有说明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危险、多可怕，他既反对现实主义的预期，也不认同自由主义的判断。尽管他一概否定了米尔斯海默等人对未来地缘政治分裂带的分析，坚持认为这样的分裂带并不存在，但是，他又在其他地方，通过讨论美欧关系重新肯定了地缘政治分裂带的出现。库普乾还表示："美国时代的终结并不意味着回归到……传统的均势体系。相反，它预示着向一个新的未知的历史时代发展，这个新时代将以一套新的潜在力量和新的博弈规则为指导。"[63]然而，他并没有明确告诉我们这样的力量和规则将是什么。

## 注　释

1. Michael Cox, "American Power before and after 11 September: Dizzy with Succes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8, No. 2, April 2002, pp. 261—276.

2. Charles Krauthammer, "The Unipolar Moment Revisited",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70, Winter 2002/03, pp. 5—17.

3. Stephen Brooks and William Wohlforth, "American Primacy in Perspective", *Foreign Affairs*, Vol. 81, No. 4, July/August 2002, pp. 20—33.

4. 请参见 Andrew Bacevich, *American Empire: The Realities and Consequences of U. S. Diplomac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Sebastian Mallaby, "The Reluctant Imperialist: Terrorism, Failed States, and the Case for American Empire", *Foreign Affairs*, Vol. 81, No. 2, March/April 2002, pp. 2—7; Martin Walker, "America's Virtual Empire", *World Policy Journal*, Vol. 19, No. 2, Summer 2002, pp. 13—20。

5. Charles Kupchan,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 U. 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Geopolitic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Knopf, 2002.

6. 同上书,第 3 页。

7. 同上书,第 11 页。

8. 同上书,第 12 页。

9. 同上。

10. 同上。这是作者在 2003 年《美国时代的终结》再版时对原版所作的补充。关于"9·11"事件后的美国大战略,请参见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hington D.C.: The White House, September 2002。

11. 同上书,第 26 页。

12.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13. John 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5, No. 1, Summer 1990, pp. 5—56; John Mearsheimer, "Why We Will Soon Miss the Cold War," *Atlantic Monthly*, Vol. 266, No. 2, August 1990, pp. 35—50;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Norton, 2001.

14. Samuel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6.

15. Matthew Connelly and Paul Kennedy, "Must It Be the Rest Against the West?" *Atlantic Monthly*, Vol. 274, No. 6, December 1994, pp. 61—83; Robert Kaplan, *The Coming Anarchy: Shattering the Dreams of the Post Cold War*,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0.

16. Thomas Friedman, *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1999.

17. Charles Kupchan,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 p. 28.

18. 同上书,第 17 页,这是作者在 2003 年《美国时代的终结》再版时对原版所作的补充。

19. 同上。

20. 迪斯累里曾经警告说,德国统一"代表着德国革命,这是比上个世纪法国革命还要重大的政治事件。……欧洲真正发生了什么? 权力均势已经被彻底打破了"。Benjamin Disraeli, February 9, 1871, 引自 J. C. G. Rohl, *From Bismarck to Hitler: The Problem of Continuity in German History*, New York: Barnes & Noble, 1970, 第 23 页。

21. Charles Kupchan,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 p. 125.

22. 请参见 Robert Kagan, *Paradise and Power: America and Europe in the New World Order*, London: Atlantic Books, 2003; Ivo Daalder, "The End of Atlanticism," *Survival*, Vol. 45, No. 2, Summer 2003, pp. 147—166; Timothy Garton Ash, "Anti-Europeanism in America",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February 13, 2003, pp. 32—34; Christopher Layne, "America as European Hegemon",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72, Summer 2003, pp. 17—29; Jessica Mathews, "Estranged Partners", Foreign Policy, No. 127, November/December 2001, pp. 48—53.

23. 另一位受到广泛关注的学者是罗伯特·卡根,请参见 Robert Kagan, "Power and Weakness: Why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See the World Differently", *Policy Review*, No. 113, June & July 2002. 他后来将该文修改为一本小册子于 2003 年出版。Robert Kagan, *Paradise and Power*. 也请参见对该书的评论, Michael Cox, "Martians and Venutians in the New World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9, No. 3, May 2003, pp. 523—533。

24. 关于这种传统思维的简明概述,请参见 Antony Blinken, "The False Crisis over the Atlantic", *Foreign Affairs*, Vol. 80, No. 3, May/June 2001, pp. 35—48。

25. Charles Kupchan,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 p. 157.

26. Charles Kupchan, "The End of the West", *The Atlantic Monthly*, Vol. 290, No. 4, November 2002, pp. 42—44; Charles Kupchan, "Uneasy Alliances", *The Los Angeles Times*, February 17, 2003. 也请参见 Rajan Menon, "The End of Alliances", *World Policy Journal*, Vol. 20, No. 2, Summer 2003,

pp. 1—20。

27. 请参见 I. M. Destler and Steven Kull, *Misreading the Public: The Myth of a New Isolationism*,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9; Max Boot, "The Case for American Empire", *The Weekly Standard*, Vol. 7, No. 5, October 15, 2001, pp. 27—30; Paul Johnson, "The Answer to Terrorism? Colonialism," *Wall Street Journal*, October 9, 2001。

28. Charles Kupchan,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 p. 160.

29. 同上书,第 161 页。

30. 同上书,第 201—202 页。

31. 例如,《新共和》杂志前主编安德鲁·沙利文仅仅在袭击的几天之后就写道:"对于美国自身来说,这意味着一件重要事情,孤立主义已经死亡。"Andrew Sullivan, "American at War: America Wakes Up to a World of Fear", *Sunday Times* (London), September 16, 2001.

32. Charles Kupchan,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 p. 220.

33. 同上书,第 31 页。

34. 同上书,第 206 页。

35. 同上书,第 305 页。

36. 同上书,第 310—311 页。

37. 请参见 Robert Putnam,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0.

38. Charles Kupchan,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 p. 327.

39. 同上书,第 332 页。

40. 同上书,第 333 页。

41. 同上书,第 263 页。

42. 同上书,第 248 页。也请参见 G. John Ikenberry, *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43. Charles Kupchan, "After Pax Americana: Benign Power,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the Sources of a Stable Multipola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2, Fall 1998, pp. 40—79.

44. Charles Kupchan,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 p. 263.

45. 同上书,第 230—231 页。

46. 同上书,第 231 页。

47. 同上书,基辛格封面评语。

48. 库普乾曾在第一届克林顿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任欧洲事务主任。

49. 预言西方解体早就大有人在，请参见 Mary Kaldor, *The Disintegrating West*, New York: Hill & Wang, 1978; Owen Harries, "The Collapse of 'The West'", *Foreign Affairs*, Vol. 72, No. 4, September/October 1993, pp. 41—53。

50. 请参见 Emmanuel Todd, *After the Empire: The Breakdown of the American System*, translated by C. Jon Delegu,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Joseph Nye,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Eagle has Crash Landed", *Foreign Policy*, No. 131, July/August 2002, pp. 60—68; John Ikenberry, "America's Imperial Ambition", *Foreign Affairs*, Vol. 81, No. 5, September/October 2002。

51. The Modern Tribune book review, February 4, 2003, at http://themoderntribune.com/kupchan.htm.

52. 请参见 Charles Kupchan,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 封面和封底评语。

53. Book review by G. John Ikenberry, *Foreign Affairs*, Vol. 81, No. 6, November/December 2002, p. 182.

54. 王缉思："美国霸权的逻辑"，《美国研究》2003 年第 3 期。

55. Marius Hentea, "The End of American Primacy",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December 5, 2002.

56. Philip Gordon, "Bridging the Atlantic Divide", *Foreign Affairs*, Vol. 82, No. 1, January/February 2003, pp. 70—83. 也请参见 Andrew Moravcsik, "Striking a New Transatlantic Bargain", *Foreign Affairs*, Vol. 82, No. 4, July/August 2003, pp. 74—89; Ronald Asmus, "Rebuilding the Atlantic Alliance", *Foreign Affairs*, Vol. 82, No. 5, September/October 2003, pp. 20—31。

57. Charles Kupchan,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 杰维斯封底评语。

58. Robert Jervis, "The Compulsive Empire", *Foreign Policy*, No. 137, July/August 2003, pp. 83—87.

59. Richard Rosecrance, "Croesus and Caesar: The Essential Transatlantic Symbiosis",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72, Summer 2003, pp. 31—34.

60. Helle Dal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U.S. Empire?" *European Affairs*, Vol. 4, No. 1 Winter 2003.

61. Robert Tucker, "Europe Challenged",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72, Summer 2003, pp. 143—147.

62. Charles Kupchan,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 p. 158.

63. 同上书,第 34—35 页。

# 2004年版前言

美国成功推翻萨达姆·侯赛因的战争好像已经开启了一个新的美国世纪。美国军事实力无与伦比,仅用几周时间就废除了萨达姆政权,显示了令人震惊的有效性。华盛顿还清楚地说明,它已经准备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行事,尽管未能获得联合国安理会批准,美国还是发动了伊拉克战争。教训似乎非常明确。反对美国的国家,如法国、德国和俄罗斯,最好在他们再次反对世界惟一超级大国之前三思而后行。无赖国家也最好改变他们的方式——或者做好最坏准备。乔治·W·布什领导下的美国显然要成为新罗马。

然而,对于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长期后果,还有另外一种不同的看法,这种看法把美国优势地位的未来置于不同的背景之下。华盛顿远远没有开启一个新的美国世纪,它反而走上了一条加速美国时代终结的道路。美国的军事实力可能是不可超越的,其决心可能是不可动摇的。但是,通过与世界舆论法庭背道而驰,美国已经损害了其或许最珍贵的资产——国际合法性。在全世界的眼中,美国的仁慈霸权不再那样仁慈了。结果,各个国家更可能憎恨而不是尊重美国的实力,抵制而不是追随美国的领导地位。

这第二种看法是更精确的一种。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的外

交冲突是分裂美国与大部分欧洲——实际上大部分世界——的更大裂痕的征兆，而不是原因。美国单边主义因为“9·11”事件后暴露出来的脆弱性和愤怒而进一步得到加强，它已经破坏了国际社会的结构。甚至在联合国就伊拉克问题开始进行辩论之前，安理会很多成员国已经一致同意有必要对目中无人的美国加以限制。遏制美国权力是法国、德国和俄罗斯寻求阻止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尽管他们知道这样做会使大西洋联盟处于危险之中。甚至较小的安理会成员国——墨西哥、智利、几内亚和喀麦隆等——都已经准备好对美国说不了。所有道路都习惯于通过华盛顿。现在第二条道路正在开通，这条道路将主要通过欧洲。

美国与传统盟友之间关系越来越疏远的首要原因是华盛顿对待全球领导地位的方法。事实上，布什政府外交政策的三个指导原则已经将美国送上了与欧洲发生冲突的道路。第一，华盛顿的所作所为基于这样的假设，即美国越是强大，它的领导地位就越牢固，余下世界就越愿意追随。但是，结果却恰恰相反。布什的妄自尊大在国内可能表现为果断，但是在欧洲和余下世界则表现为傲慢。美国先发制人和维持优势地位(preemption and preeminence)的政策远没能赢得尊重，而是诱发了欧洲的怨恨和抵制。

第二，布什政府假定，像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家不需要国际制度来管理全球政治格局，国际制度只是弱者的工具，只会限制美国的运作空间。布什认为国际制度限制美国权力，这是正确的，但那恰恰是为什么国际制度对国际稳定如此不可或缺的原因所在。通过使华盛顿承担遵守共同规则的义务，这些制度使国际舞台变成公平的竞赛场所，并增加了对美国权力的意图和可预见性的信心。当华盛顿远离国际制度时，欧洲和余下世界则要急着寻找避难所了。

第三个已经破坏美国关键国际伙伴关系的假设是，布什过分高估了与军事优势地位相伴的自主权。布什政府轻视盟友，因为它感到美国不需要他们。但是，华盛顿应该反思一下。反恐战争需要广泛的国际合作。阿富汗正在由广泛的多国联盟维持着团结统一。虽然法国、德国和俄罗斯无法阻止针对伊拉克的战争，但是他们最终能够拒绝给华盛顿提供联合国支持的合法性，从而使战争变成了一场极其危险的赌博。土耳其拒绝允许美国地面部队使用其领土，使美国无法开辟北方战线。

尽管存在着这些障碍，但是美国的军事优势还是使联合部队能够顺利赢得伊拉克战争。然而，伊拉克却很快陷入了动乱，美国的军事优势在平息叛乱活动方面显得无能为力，叛乱者越来越经常性地袭击美国士兵。虽然占领伊拉克的人员和财政支出猛增，但是，鲜有美国的传统盟友准备为帮助稳定该国局势而大幅贡献军队或金钱。因此，这次冲突的遗产是一个深刻分裂的外交格局，而不是一个由占主导地位的美国实施领导，由余下世界顺从追随的外交格局。尤其是欧洲已经显示了对美国高压手段的不满。实际上，大西洋纽带是这场战争的主要代价之一，美国与欧洲大陆上的主要盟友在战争与和平的根本问题上分道扬镳。既然美国安全与欧洲安全不再是不可分割的，那么大西洋联盟即使在名义上得以存活，在精神上也已经分崩离析了。

可以肯定的是，伊拉克战争在欧洲内部和在大西洋两岸之间都证明是分裂性的。欧洲内部的分裂主要源自于对欧洲联盟未来的不同构想。一个阵营由法国和德国领导，坚决抵制战争，并使自己成为美国霸权的抗衡力量。另外一个阵营由支持华盛顿的较小国家组成，他们把美国看作对欧洲大国的限制和在该地区的持续的保护性存在。欧盟成员国远未走向统一并成为美国的平衡者，与此相反，他们未能找到共同基础。

然而,大西洋两岸的分裂肯定会比欧洲内部的分裂更持久、更难以驾御。在伊拉克问题上,欧盟内部的团结一致比我们见到的要多得多,欧洲各国政府可能意见不一,但是他们的选民几乎一致反对采取军事行动。欧盟还处于制度改革的过程之中,这场制度改革将加强欧盟的治理制度,包括负责制定共同外交政策的制度。

或许最重要的是,与华盛顿站在一起的那些欧洲国家很可能别无选择,不得不在未来岁月改变自己的路线。他们大多数支持布什政府是因为他们不想让伊拉克冲突毁坏了跨大西洋纽带,而不是因为他们真心实意地支持战争。但是,即使像波兰和意大利这样的国家在未来几年继续维持对跨大西洋联盟的承诺,他们也不可能在大西洋对岸找到一个热情的伙伴。由于欧洲富有、和平、并不再愿意追随华盛顿的领导,因此美国正在丧失继续做欧洲保护者的兴趣。同时,中东和东亚的紧迫威胁已经使美国的资源转向了这些地区。不论喜欢与否,欧洲人正在日益走向自力更生。

法国和德国已经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这是他们开始着手深化防御合作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有关伊拉克问题的分歧中英国继续坚持充当美国与欧洲之间桥梁的角色。但是到2003年底的时候,英国人已经向欧洲回转,加入到了法国和德国致力于打造欧洲共同防御的努力之中。英国人已经认识到,成为欧盟的主要成员比追随美国巨人哥利亚(Goliath)可以让英国发挥更大的影响力。波兰人尚未放弃对紧密大西洋联盟的希望,但是他们无视现实的时间仅此而已,华沙以及其他志同道合的首都都会很快认识到,他们的惟一选择就是满足于强大的欧盟。由于欧盟当前和未来成员国面临的事实是,美国正处于永远与欧洲分道扬镳的过程之中,因此他们会更乐于在更为有效的和集

体的联盟之后发挥自己的影响。

坦诚地说,欧洲致力于获得更大军事能力的努力进展缓慢。但是它却存在着明显的迹象——法国增加了20%的国防开支,德国很可能停止征兵以支持更能干的职业军队。在2003年4月的峰会上,法国、德国、比利时和卢森堡宣布了建立欧盟计划司令部的打算。英国很快给予了支持。甚至根据最乐观的情景,欧盟即使最终能够,也不会很快挑战美国的军事优势地位。但是,欧洲会在安全事务上更少依赖美国,并最终作为替代权力中心与美国并驾齐驱。

对宣告新美国世纪来临表示怀疑的最后一个理由,源自于伊拉克战争对美国外交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最初进攻行动的成功和萨达姆·侯赛因政权崩溃的速度一时加强了布什政府内部新保守派强硬人士的支配力。但是,新保守派胜利的代价是惨痛的,事实上,强硬分子的所有主张都很快证明是错误的。美国军队指望作为解放者受到致敬,但是在动乱迅速蔓延和秩序遭到破坏的过程中,很多伊拉克人很快便把美国人看作占领者。随着暴动的扩展,美国士兵、国际社会代表、普通伊拉克人民开始每天都有死亡。

华盛顿为战争辩护的首要理由完全成了无源之水。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无处可查。伊拉克与基地组织没有发现任何联系。而且,战争不仅远远没有对恐怖主义构成打击,反而使情况变得更糟,它使各色好战分子齐奔伊拉克,在那里袭击脆弱的美国目标。推翻萨达姆·侯赛因本应有利于进一步推进中东和平进程,但是情况再一次南辕北辙。“路线图”计划(road map)在2003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裹足不前,以色列在西岸着手建造安全隔离墙(security fence),巴勒斯坦当局在镇压好战分子方面也没有取得什么进展。虽然萨达姆·侯赛因的被俘使布什得以宣称至少一

个关键目标已经实现,但它却无法掩盖一个事实,即布什政府的战争根据是建立在错误的假定基础之上的。

这些严肃的现实,不应刺激华盛顿以武力改变别国政权的兴趣,而恰恰应相反——减少布什政府对获得全球主宰地位的热情。这种回缩的倾向部分来自布什政府内部。像副国防部长保罗·沃尔福维茨(Paul Wolfowitz)这样的新保守主义者,仍然把美国在伊拉克的根据地看作是在整个中东地区推动更广泛政治变迁的杠杆。但是,像副总统迪克·切尼(Dick Cheney)、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这样保守的实用主义者,对美国在该地区的目标持一种更有限的观点。他们对于保护狭义意义上的美国安全,比对于按照美国意象重塑世界更感兴趣。

伊拉克境内情况的发展还引起了公众情绪反弹。大多数美国人支持攻打伊拉克,但是随着占领过程变得残忍血腥、代价高昂、动荡无序,民众的支持热情开始逐步衰减。甚至在内陆中心地区——乔治·W·布什主要选民的居住地——人们对于在中东地区维持一个殖民前哨也丝毫没有兴趣。公众态度的这种改变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开始在国家安全事务上抨击布什提供了机会。自"9·11"事件以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一直避免批评布什对国家安全事务的处理,因为他们担心那样会被人扣上不爱国的帽子。到了夏末,布什的支持率直线下滑,这对于为争取连任而加紧选战的白宫来说,不是个好消息。

面对这些政治压力,布什在晚秋时候决定改变路线,批准加速重建计划,该计划的主要内容就是,向伊拉克人民移交权力、重建伊拉克军队、开始减少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存在(military presence)。华盛顿不想草草收场,但是布什明确认识到,他的最初目标,即依靠长期军事占领将伊拉克转变为稳定的民主国家,

过于雄心勃勃，而且远远超出了美国选民的意愿。

美国的孤立主义本性自“9·11”事件以来一直保持沉默，但是它决不是一去不复返了。的确，美国的孤立主义本性正在被美国目前在伊拉克陷入的困境所重新唤醒。不仅如此，公众对伊拉克境内事态发展的反应可能证明并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情形。事实上，自冷战以来，美国人已经接受了广泛的国际承诺，美国军队在全球很多地方的永久性驻地上驻扎。但是美国军队总体上只在受欢迎的地方停留。由于反美情绪在伊拉克变得越来越强烈，甚至在传统盟国如德国、日本和韩国也在高涨，因此，美国公民可能会开始怀疑，他们的国家是否应该继续发挥全球卫士的作用。美国人相信，他们的海外军队将给世界带来好处——如果所在国家不同意，主人会心生不快，最终有可能促使他们要求美国军队回家。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将来有可能一天展现出好战的单边主义，而第二天又展现出愤慨的孤立主义。

在此后的篇幅中，我描述了欧洲的崛起和美国单边主义与孤立主义的回归将如何和为何共同造成西方的分裂，使欧洲与美国彼此对立，并加速了向多权力中心世界的转变。当我在写作本书第一版时——伊拉克战争之前，我预期这些发展如果不用更长时间，也要用这个十年的大部分时间。布什政府并没有改变历史进程，但是它已经将其大大加速了。正如伊拉克战争清楚说明的，西方自身已经分裂了，这种分裂动摇了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国际体系一直依托的政治共同体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伊拉克战争的主要影响就是促进了强有力的地缘政治力量，这些力量已经在改变着我们现存的世界。由于历史如此飞速前进，全球政治格局进行着同步改变，因此美国、欧洲和更广泛的国际社会必须面对新的紧迫要求，为美国时代的终结和随之而来的新时代做好准备。

# 中文版前言

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将在决定新世纪如何发展方面发挥主导作用的国家。目前,美国的优势地位依旧毋庸置疑。但是,不会永远如此。随着这个十年时间的延续,一体化进程中的欧洲将逐渐成长为世界上第二个权力中心。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中国将注定成为世界领导国家之一,与美国和欧盟并驾齐驱。实际上,中国可能在地缘政治影响力方面超过欧盟,欧盟还只是一个松散的联邦,因而,中国会和美国一道位居国际等级体系的顶端。

历史清楚地说明,国际体系的这种变迁充满了危险。权力分配的变化和新兴力量的崛起会唤醒国家的竞争本性,并有可能导致全球范围内对地位和影响的争夺。自冷战结束以来,尤其自“9·11”事件以来,美国、欧盟成员国、俄罗斯、中国、日本等主要国家之间的关系总体上是合作性的。但是,随着国际体系进入深刻变迁时期,我们决不能想当然地以为持续合作是顺理成章的事。

如果要使即将来临的世界向多个权力中心的回归以和平方式发生,那么现在就是开始提出难题并为确保和平变迁而拟定政策规划的时候。作为新兴国际秩序的建筑师,美国人、欧洲人和中国人必须开始进行建设性的对话,以便确保当全球权力

变得越来越平均分配时能够彼此合作，而不是彼此对峙。

所有各方都面临着独特而且重要的挑战。美国是否准备好了为他国让出空间并与之分享权力？这对于一个已经习惯于发号施令的国家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中国将为何种目的使用它日益增长的权力？它会将自己的实力深置于一个更广泛的国际治理(international governance)的多边框架之内吗？如果是这样,那么中国可能会试图如何修正这个框架呢？欧盟会继续将精力主要集中在自己的内部事务上吗？或者,它会生长出发挥更大国际作用的意愿吗？如果美国为中国和欧洲崛起做好了准备,那么,所有三方可以采取什么步骤来预先阻止国际体系回归均势逻辑呢？

新日程必须处理的问题不仅包括美国、中国和欧盟之间的关系,而且还有国际环境不断变化的性质。2001年"9·11"事件是否标志着一个历史转折点,它使理解国际政治的新范式成为迫切之需？全球化的地缘政治影响是什么？贸易的扩展是否意味着日益加大的经济相互依赖将成为稳定的持久基础？一个不断扩大的民主区(zone of democracy)会导致一个不断扩大的和平区(zone of peace)吗？对于民主国家相互间永远不会开战的流行主张,我们究竟能够多大程度上认为它是可信的？在一个全球化将人们聚集到一起,但同时也威胁到他们传统生活方式的世界里,宗教和文化差别会如何影响地缘政治？

这些都是本书随后篇幅所要探讨的核心问题——而且也是中国作为塑造21世纪国际体系的一个关键国家兴起之后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中国正处于发展的关键阶段,今日的决策将影响未来几年的国内进程和外交关系。因此,中国领袖和国民处理当今的主要地缘政治问题,在他们内部以及与更广泛的国际社会之间进行辩论,是极端重要的。本书已经在美国和欧洲帮

助激发了此类辩论。如今我真诚期待它也能够在中国激发同样的辩论。

**查尔斯·库普乾**

**2003年12月26日**

**华盛顿特区**

# 致　谢

无数机构和个人为这本书作出了贡献，这令我受益匪浅。近十年来，乔治城大学和对外关系委员会一直是我的两个思想之家。它们共同为我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写作环境，使我得以写作这样一本著作来弥合学术和政策群体之间日益加大的分裂。对外关系委员会为这个项目提供了主要财政资助，并于2000—2002年聘请我为惠特尼·谢珀德森研究员。乔治城大学提供了额外的资助，并准许我带薪休假以便从事此书的研究和写作。我还要对美国和平研究所提供财政资助表示感谢。

两个人在鼓励我写作本书的过程中发挥了特殊作用，他们是詹姆斯·蔡斯和莱斯利·盖尔伯。我第一次遇见詹姆斯·蔡斯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在随后的十年中，我们成了忠实的朋友和亲密的思想伙伴，他引导我走向这个项目，并自始至终作我最信赖的向导。我深深地感谢他那优雅的兴致、不倦的精神和沉着的建议。

莱斯利·盖尔伯，作为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甚至早在我构思此书之前就开始给我很多激励。在中央公园的促膝长谈中，他反复劝诫我要宏观思考、追求深刻，并在吸着雪茄、吞云吐雾之际强调，这正是写作现时代“伟大外交政策小说”的时候。不论我是否成功地满足了他的预期，他的友谊和洞见都让我感激不尽。

当本书还是草稿时，我曾在对外关系委员会纽约和华盛顿办公室组织召开的一系列研讨会上对它进行了介绍。詹姆斯·蔡斯在纽约非常精彩地主持了很多讨论会。我还受惠于史蒂芬·沃尔特，他主持了华盛顿的会议，并引导讨论一直沿着正确的方向进行。参加这些讨论会的人有：罗伯特·阿特、沃伦·巴司、马科斯·布特、莱尔·布雷纳德、拉尔夫·布尔特简斯、弗雷泽·卡麦隆、库尔特·坎贝尔、史蒂文·克莱门斯、简-马克·科伊考德、伊沃·达尔德尔、特里·戴伯尔、I.M.德斯特勒尔、弗朗西斯·菲茨杰拉德、戴维·弗罗姆金、阿尔顿·弗赖、麦克·盖特勒、詹姆斯·戈德吉尔、保罗·格罗布、史蒂芬尼·格罗布、罗斯·戈特牟勒、约翰·艾肯伯利、罗伯特·杰维斯、劳伦斯·考尔伯、史蒂文·库尔、詹姆斯·林赛、罗伯特·曼宁、杰西卡·马修斯、查尔斯·威廉·迈恩斯、麦克·麦克法尔、卡尔·麦耶尔、亨利·诺、约翰·纽豪斯、苏珊纳·诺塞尔、约瑟夫·奈、诺瑞尔·鲁比尼、阿里森·希尔弗、杰克·辛德尔、弗里兹·施特恩、丹尼尔·塔鲁罗、辛希亚·廷德尔、理查德·乌尔曼、恩左·维斯库斯、约里斯·沃斯、马丁·沃克、雅各布·维斯博格、麦尔文·威廉。由雷纳·佩德森主持、在达拉斯召开的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一个国家项目会议，也提供了出色的反馈意见。我感谢参加这些讨论会的所有与会者，感谢他们付出了很多时间和努力。能够得益于如此才华出众的批评集团，是每一位作者的梦想。

我还要感谢下面各位对书稿进行的评论：卡罗琳·阿特金森、迪克·巴恩拜、乔纳森·戴维森、杰夫·勒格罗、约瑟夫·雷普古德、约翰·麦克内尔、戴维·佩恩特尔、尼古拉斯·里佐珀罗斯、霍华德·罗森、唐·罗森肖、德布拉·辛格、彼得·楚波维奇。此外，我很感激我在乔治城大学和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同事和学生，他们总是随时让我尝试刚刚形成的新观点。

我在外交关系委员会的研究助手戴维·史蒂文斯在这个项目中是一个真正的伙伴。他能够预期展开中的情节可能向何处发展,从而源源不断地为我提供新的材料,探究新的论点。当我遇到历史或概念障碍时,我第一个求助的就是戴维,而且他总是能够给我提出一个解决办法。他经常早上一到办公室就会愉快地发现我留给他的至少一打的电话留言,这些留言是我在前一天晚上在查证一个事实或者解决一个困惑徒然无果之后留下的。我感激戴维的协助和付出。反过来,他好像并没有经受过度忍耐,因为他现在已经去攻读国际关系博士学位了。我也要感谢以前乔治城大学的两个研究生贾森·戴维森和米拉·苏查洛夫、我在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前任助手香恩·史密斯、我在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新助手贾米·弗莱,他们都对我的研究给予了帮助。

同诺伯夫出版社编辑阿什·格林一起工作是我的荣幸。从我们最初碰面,到讨论出书计划,到最后对书稿的编辑,他的建议明智而且亲切。本书极大地受益于他的经验和技巧。诺伯夫出版社的乔纳森·法斯曼、艾伦·费尔德曼和鲁巴·奥斯塔谢夫斯基付出了非常出色的努力使书稿得以顺利完成出版过程。我还要感谢我的文字代理人苏珊纳·格鲁克、克瑞斯·达尔和利兹·法雷尔。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人。我的妈妈南希·库普乾·索尼斯、我的哥哥克利福德·库普乾、我的继父理查德·索尼斯一直陪伴着我,给我提供了无限的、无条件的支持与鼓励,这些支持和鼓励是一位作者在写作过程中遇到艰难时刻时最需要的。我的父亲莫里斯·库普乾尽管已经不与我们同在,但他一直在精神上伴我左右。

**查尔斯·库普乾**

**华盛顿**

**2002年7月**

# 导 论

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把劫持的飞机用作制导导弹，摧毁了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的双子塔和五角大楼的很大一部分。恐怖袭击使几千人丧生，巧妙地打击了美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主要象征。毁坏的凋零景象使美国人产生了新的、可能是难以磨灭的脆弱感，这种脆弱感将永久性地影响美国与余下世界互动的方式。

2001年的悲剧事件成了美国的叫醒电话。从冷战结束至恐怖分子袭击纽约和华盛顿的心脏，美国已经在逐步丧失对外交事务的兴趣。当选官员和公众一样，都已经转移了注意力，被美国优势地位和自以为是的本土不可侵犯性所欺骗，而陷入一种自鸣得意。媒体报道几乎停止覆盖国外新闻。国会很少找到时间讨论外交政策，今天的重要问题——控制核武器扩散、给巴尔干地区带来和平、保护环境——通常屈从于党派互斗而不是合理的审议。当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好像迷失了方向的时候，美国的盟友感到惊愕和沮丧。

"9·11"事件后情况发生了改变。防御本土和打击恐怖主义成为首要国家大事。报纸充满了关于国外的报道，很多电视频道昼夜不停地全时段报道美国的"新战争"。民主党和共和党紧密团结，达成一种自华盛顿总统以来长期缺乏的两党合作精神。

而且,美国同其他国家接触,非常明显地表现出美国抛弃了日益加剧的单边主义倾向,转而恢复受损的联盟、建立新的伙伴关系。一个接一个的评论员把珍珠港事件援引为恰如其分的相似事件。像1941年12月7日一样,2001年9月11日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它让美国人明白,他们生活在一个需要参与、警戒和牺牲的危险世界中。

然而,断定美国新的脆弱感已经使其外交政策回归正轨却是一种幻觉。相反,由于"9·11"事件以及随后的生物恐怖主义把美国的注意力和资源转移到了打击恐怖主义和防御本土上面,因此,它甚至使这种回归更不可能,亦即美国更不可能聚焦于更深层的、即便更遥远的、对美国福祉的威胁。加强本土防御当然是一种必需。尽管出现过无数警告,但是美国还是未能采取适当的步骤阻止针对美国领土的恐怖主义袭击——美国为自鸣得意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布什政府为寻求适当的补救良策一直努力工作。这不无道理,但是不应该让这份任务妨碍解决面临的核心的、更危险的挑战——世界主要权力中心之间对抗的回归。

美国缺乏对大国对抗的关心是可以理解的。21世纪的开启标志着民主理想的胜利,而美国就是建立在这种民主理想之上的,并为此付出了大量的鲜血。当今世界上大约200个国家中有120个左右是民主政府。共产主义,作为自由民主在20世纪的主要对手,它的信徒正在为维持对一些据点,如中国、朝鲜和古巴的控制而艰苦努力。美国自身则处于一种不可挑战的主导地位。美国的军事和国民经济世界一流、无与伦比。加之美国在技术革新和文化吸引方面似乎具有无限的能力,这些资源为美国提供了史无前例的全球优势。

在考察这个图景时,大多数美国战略家依旧确信,不仅美国

的优势会青春常驻，而且持久的大国和平时代终会来临。进行中的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的扩展，正导致“历史的终结”、大战的过时和新世界的来临，在这个新世界中，得到满足的国家将学会幸福地彼此共存。未受影响的个人以及他们归属的边缘集团，可能会继续致力于伤害美国及其伙伴。但是，假设这个世界的民主政体能够遏制恐怖主义，如果不是消灭它的话，那么，他们就将走向一个和平与繁荣的未来。

这种对美国时代万寿无疆的自信，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危险的。美国显然同以前其他大多数大国一样会犯相同的错误，即把通常在主要地缘政治分裂解决之后出现的暂时平静错误地理解为更加持久的和平。坦诚地说，冷战结束之后的十年，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恩赐和和平的十年。世界主要游戏者已经休息，正在考虑他们的下一个步骤。美国在当前的主导地位并不是一种幻觉，从任何指标来看，美国都出类拔萃、独一无二。

但是，国际体系是变幻无常的、脆弱的，能够以极快的速度解体。1910 年，欧洲人对经济互赖的和平效益和武装冲突的非理性很有信心。到了 1914 年夏末，欧洲的大国走向了战争。美国在 1920 年代的下半段享受了繁荣和乐观。1933 年，世界进入痛苦的萧条时期，希特勒控制了德国，这个世纪很快走向最黑暗的时刻。1945 年初，美国忙于与苏联建立战后伙伴关系，美国军事力量迅速遣散，美国人民指望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短短几年之内，冷战降临，美国和苏联用核毁灭相互威胁。

世界主要国家之间对抗和冲突的再现决不是命运注定。但是，没有更好的方式比美国把视线盯在恐怖主义身上并假定大国和平会青春常驻更能确保大国对抗和冲突的回归。相反，美国应该认识到，它的优势地位及其培育的稳定已经开始滑离。欧洲正处在政治和经济统合的革命性过程之中，统合在逐步消

除欧洲内部边界的重要性,并在布鲁塞尔逐渐集中权威。欧洲联盟(European Union,EU)的集体财富将很快与美国平起平坐。俄罗斯最终会重新回来,并可能在统合中的欧洲得到一席之地。亚洲并没有落后很远。中国已经是一种地区存在,它的经济在快速增长。日本,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最终会爬出衰退,并不断扩大其政治和军事影响。

正当美国主导地位的挑战者崛起之时,美国却对发挥全球终极卫士作用表现出了新的矛盾心态。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确曾经实施了引人注目的积极的外交政策,奔忙于阻止巴尔干地区的种族屠杀、围困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维护东亚的和平、努力解决恶化的中东和北爱尔兰冲突、并同时管理全球化的国际经济。但是美国国际主义可能并没有像它所表现的那样强健有力。

在上任之初的几个月,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总统极其明确地表示,他计划休止美国的责任,集中关注靠近本土的事务。他第一次国外旅行便是去拜访墨西哥总统维森特·福克斯(Vicente Fox),而且布什为福克斯举行了他的第一次国宴,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布什还展现了他的单边主义癖性,很早以来他就一直宣称,要脱离很多美国自身曾帮助建立用以维护国际秩序的制度和条约。此外,90年代的国际主义是由极其有力、持久的经济大发展维持的。较贫瘠时代的苦难经济意味着外交政策将丧失关注国外的积极主义。

对于很多人来说,2001年9月的恐怖袭击事件抑制了这种趋势,使布什政府和美国公众确信需要全球参与。《新共和》杂志前主编安德鲁·沙利文(Andrew Sullivan)仅仅在袭击的几天之后就写道:"我们已经得到通告,西方所有主要城市现在都是易受攻击的。"沙利文接着还写道:"对于美国自身来说,这意味着

一件重要事情。孤立主义已经死亡。"[1] 其他国家充满信心地认为，恐怖主义威胁将重新唤醒的不仅是美国的国际主义，而且是自由型的国际主义——承诺采取多边行动和倚赖国际制度的国际主义。恐怖主义构成的是一种集体威胁，因此，它应该引起一种集体回应。

然而，根本不清楚恐怖主义能否使美国排除或者孤立主义或者单边主义的诱惑。长期来看，美国领导人可能会发现，减少海外义务、增加防卫屏障比在阿富汗山区和巴格达小巷追剿恐怖分子更有利于这个国家的安全。美国具有一个可以一直追溯到国父的优良传统，即追求国家远离国外的麻烦，这个律动(impulse)完全有可能被全球参与成本的提高重新唤醒。毕竟，美国对"9·11"恐怖袭击事件的最初反应是，关闭了同墨西哥和加拿大接壤的边境，搁浅了全国的空中交通，用战舰和喷气战斗机巡逻国家海岸。美国人也对多边主义制度具有一种长期累积的反感，因为美国人不愿意多边制度损害单边倡议的自由。相应地，当美国的确有所作为时，它会完全我行我素——就像在伊拉克所表现的那样，疏远伙伴，尽管它可能需要这些伙伴的帮助以治理日益分裂的全球体系。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维持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自由国际主义(liberal internationalism)正在遭受孤立主义和单边主义两个极端的围攻。

美国时代存在着，而且健在着，但是，替代权力中心的崛起、新式而顽固的美国国际主义将使美国时代随着新世纪的发展而走向毁灭，并带来深远的地缘政治影响。源自美国主导地位的稳定和秩序将逐渐被新的争夺优势地位的竞争所取代。一旦华盛顿不再掌控，势不可挡的全球化火车头就会出轨。美国治下的和平注定要让位于更加不可预测和危险的全球环境。

尽管恐怖主义分子将继续构成严重威胁，但更大的危险却

是国际体系的瓦解和传统地缘政治对抗的回归。如果全球主要大国之间的合作被竞争所取代,那么世界上的所有挑战——不论打击基地组织(Al-Qaeda),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还是在发展中世界推进医疗和经济增长——都将更加难以应对。

紧急的是,美国需要未雨绸缪,开始让自己和余下世界为不确定的未来做好准备。等到美国主导地位丧失之后再做准备,无异于荒废优势地位给美国带来的巨大机遇。现在美国在它还有能这样做的奢华时,必须为这个世界向多个权力中心转变而设计一个大战略。这是《美国时代的终结》一书的核心挑战。

尽管这本书主要是讨论美国以及在其守卫下建立起来的全球体系向何处去的问题,但是本书很大部分却聚焦于过去。对于本书的每一个主要论点,我都通过首先探索最能够有助于理解当代困境的性质的历史时期予以展开。倚重过去对于一本关于未来的书似乎有些怪异。但是,当前时刻的不确定性并没有提供其他选择。除非放入历史的背景中,否则,现时代提供的只是一个世界快照,而这个世界正经历着深刻的变迁。除非依托过去,否则,对当前的分析可能会只具有短暂的相关性,并会危险地忽略变迁的动力源泉,因为它运动于表层之下,只有放在历史背景中才会显现出来。

坦诚地讲,把过去当作未来的指南本身就承担着分析的危险。民主的传播毋庸置疑地改变了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生活特点。数字技术及其对所有事物从武器到通讯到商业的影响,确实使对 14 世纪罗马帝国的辛劳和今日美国面临的挑战进行类比变得很难。因此,目标是筛选和权衡,有选择地使用过去,对那些可能误导而不是昭示的历史教训保持提防。此外,确实存在着某些关于世界事务的持久性真理,它们之所以持久,是因为置根于人性条件。正是这些真理发出了严肃的警告,告诫我

们需要警惕大国对抗的回归以及与此相伴的流血杀戮。但也正是这些真理为乐观主义提供了理由,使人乐观地相信我们能够学习历史、避免重蹈代价高昂的历史覆辙。

我认为,未来的核心挑战将同过去的一样,在于管理相互竞争的权力中心之间的关系。这个断言与流行的看法截然对立,后者把恐怖主义、发展中世界的过多人口和疾病、种族冲突、国际犯罪和环境退化确认为21世纪所谓的安全挑战。我虽然集中讨论更传统的威胁,但我决不想避而不谈这个新的安全议事日程或者将其淡化。相反,在随后的篇幅中,我对恐怖主义、崩溃国家和贫穷都投入了相当多的注意。然而,这些忧虑同再现的危险相比会变得苍白暗淡,如果美国抱着其优势地位会青春常驻、更传统的地缘政治挑战已经一去不复返的幻觉不放,那么传统的危险就会再现。

因此,本书的目的旨在帮助激发一次急需的关于正在形成的全球政治格局问题的国际辩论。如果美国不能根据变化的国际体系调整其外交政策,那么代价将会极其高昂。正确认识这个问题的收益同样至关重要。只有美国和余下世界现在就开始想象美国治下的和平之后的生活,他们才能有时间和远见对前面的狂暴年代进行和平治理。这样,美国或许能够将美国时代的最佳成果遗赠给下一个到来的世界。

## 注　释

1. Andrew Sullivan, "American at War: America Wakes Up to a World of Fear," *Sunday Times* (London), September 16, 2001.

# 目　录

# 第一章　大战略与美国实力的悖论

大国是国际生活的主角。它们在境外施展影响，谋求打造有利的全球环境。为了有效地做到这一点，大国需要一个理念(conceptual)的世界地图以及与此相关的大战略(grand strategy)，旨在维持其国际目标与可用手段之间的平衡。通过维持承诺与资源间的均衡，大国不仅能够保护自己的安全，而且还能同时推行与自身财富和军事力量相匹配的雄伟计划。

优越的实力本身对一个国家的伤害可能大于助益。在缺少制约的情况下，优越地位经常会树敌过多，并激发敌对联盟的形成。但是，当审慎地使用实力时，开明的主导地位会给拥有这种实力的国家带来很多回报，不仅使其康宁得到保障，而且通过国际体系使符合其意象的稳定秩序得以延续。罗马帝国(Roman Empire)、英国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这些时代并不仅仅是罗马、大不列颠和美国的力量造就的，而且也是他们为管理和维持各自优越地位而设计的、极富创造性的、远见卓识的大战略成就的。

看一看英国在20世纪初期如何应对德国的崛起，我们就会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一个恰当的大战略对于一个大国的康宁和国际体系的总体稳定是多么的重要。虽然几个世纪以来英国的

精英一直关注遥远的帝国领地，但是他们对于1898年德国决定建立主力战斗舰队还是作出了迅捷的反应。伦敦感到，崛起中的德国有颠覆欧洲均势的野心。于是，伦敦从帝国哨所召回皇家海军，并让英国陆军为欧洲大陆战争做好准备。这些举措为1914年英国、法国和俄国成功阻击德国的进攻，并最终挫败柏林主宰欧洲的企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简言之，英国判断准确并采取了明智之举。但在20世纪30年代，英国却选择了截然相反的路线。德国再一次着手雄心勃勃的军事建设，并再一次企图主宰欧洲。然而，这一次，英国却没能做好对德国开战的准备，而是选择了对希特勒绥靖，并集中精力防御自己的殖民领地。英国，还有欧洲与之一道，为自己的大战略如此悲哀地误入歧途而付出了惨痛代价。

## 过　去

1912年6月22日，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坚持认为，马耳他分舰队(the Malta Squadron)“在北海决战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前当然不会到地中海执行任务”。丘吉尔还说：“那时，而且直到那时，它才能开赴地中海。”[1] 这个决定标志着丘吉尔已经完成了把皇家海军从分散的海外驻地召回本岛的工作。为了缓和这种重大战略转移的影响，伦敦同巴黎达成了一项协议。该协议规定，法国舰队负责地中海的巡逻任务，作为回报，英国皇家海军负责保卫法国的大西洋海岸。然而，从地中海撤军的潜在后果可能是毁灭性的。它意味着英国实际上放弃了本岛与东方帝国之间生死攸关的纽带。不过，到了1912年夏天，丘吉尔已经别无选择。德国正在武装并宣称要求获得“太阳下的一席之地”，这种明确无误的威胁使英国没有精力继续集中关注海

外领地。

仅在此前一年，丘吉尔升任海军大臣一职。他如此强有力地明确陈述自己的见解，是因为他知道他面临的是一个信誓旦旦的对手。终于，丘吉尔通过争辩皇家海军应该从帝国前哨撤回到本岛水域而触及到了大战略的核心，这个大战略帮助英国达到了全球实力的巅峰。英国获得优势地位的原因，恰恰是它的大战略，即在避免卷入欧洲大陆事务的同时发展有利可图的海上帝国，——这个战略被人亲切地称作“光辉孤立”（splendid isolation）。

在丘吉尔时代，英国作为一个航海国家已经建立了完全行善的良好信誉。早在1511年，亨利八世的顾问就敦促他转向海权，谋求英格兰的富裕和安全。国王的幕僚谏言说：“让我们以上帝的名义忘记对欧洲大陆的企图，海岛的自然条件似乎不适于那种征服。英格兰本身是一个正义的帝国。或者，当我们想要发展壮大时，就让我们以我们能够的方式，那似乎是不朽神明早已昭示我们的，即通过海洋。”[2]

在16世纪下半叶，女王伊丽莎白一世（Queen Elizabeth I）使初现端倪的海军战略得以完善。虽然她认同英格兰的天职是在海洋，但她坚持主张，英国还要对欧洲大陆保持警惕，确保没有一个单一国家能够成功主宰整个欧洲大陆。伊丽莎白认为，一个欧洲巨兽最终会对英格兰构成威胁。英国在发展为一个海权国家，因此它必须把干预欧洲大陆事务作为一项必要手段以维持欧洲大陆上的稳定均势。正是因为遵循了这一简单但却高超的战略，大不列颠才在19世纪成为海洋的完全主宰，使欧洲大陆邻国彼此牵制，并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全球影响力。

在“光辉孤立”战略成功的鼓舞下，大多数英国人成了帝国和海洋主宰的狂热拥护者。因此，当海军部在1904—1905年以减弱

海外驻地舰队战斗力为代价，开始召回皇家海军到本岛水域时，遭到了顽强反对也就不足为奇了。外交部和殖民部对这种重新部署的反对意见尤为强烈。外交部对海军部抱怨说："海军将来已经不能为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提供支持，外交部认为有权指望，并且在过去曾经得到过这种支持。……现在和今后，英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政策和利益方面的紧迫需要正在作出牺牲。"[3] 作为结果，印度、新加坡、澳大利亚、埃及、以及英国在中东地区的其他领地，可能成为危险的易受攻击的地区。如果帝国撤防，那么英国将因此在经济和威望方面蒙受难以预料的打击。

海军部没有被动摇。在 20 世纪的头十年，欧洲均势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正如伊丽莎白女王明智警告的那样，英格兰在构建伟大的海洋帝国时不得不警惕欧洲大陆上的均势变化。

德国 1871 年才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在世纪之交，德国着手实施一个海军计划，旨在建立与英国海军分庭抗礼的战列舰队。这使伦敦除了给予德国梦寐以求的影响力之外别无选择。专横鲁莽的德国凯撒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自称是海军迷和英国皇家海军的热心研究者。他决定使德国加入世界大国的行列，获得与其经济实力相当的政治地位。德国凯撒指派因对私人和职业对手进行无情毁灭而著称的海军上将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Alfred von Tirpitz）起草计划，并说服国会为舰队提供财政。通过利用谷物关税来收买土地豪绅，利用民族主义情感压制政治反对派，凯撒和提尔皮茨轻松地达到了他们的目的。1898 年《第一海军法》规划建造 19 艘战列舰，1900 年《第二海军法》将海军力量提升到 38 艘。

对于德国的上手棋，英国并没有立即作出反应。在世纪之交，英国的"官方思维"仍聚焦于整个帝国的防御。1899 年布尔

战争在南非爆发，它使英国消耗了比预期多得多的资源。在军事上，其他大国不是对英国本岛，而是对其海外领地构成了威胁。正如1899年一位高级军官所说的，“现在让我害怕的有两个国家，而且只有两个，即美国和俄国。”[4]美国实力的上升威胁到加拿大和英国在西大西洋的海军优势。俄罗斯威胁着印度这块“皇冠上的宝石”。在内阁中的确存在着一种共识，即“军队存在的主要目的不是要防御那些本岛海岸，而是要保卫帝国的海外部分，尤其是印度。”[5]

然而，到了1906—1907年，英国的世界地图开始发生急剧变化。一个新的共识开始形成，即德国威胁必须优先处理，只有在这个首要危险得到适当解除之后才能顾及其他义务。外交部埃尔·克劳爵士（Sir Eyre Crown）的备忘录巩固了这个思考路线。克劳备忘录接受德国意图尚不明确的判断，但是它坚持认为，即便德国不走侵略道路，它对主导地位的攀升也将“对余下世界构成可怕的威胁，就像通过‘恶意预谋’蓄意攫取相似地位所带来的威胁一样”[6]。

为回应德国带来的威胁，英国、法国和俄国组成了一个非正式的联盟，即所谓的三国协约（Triple Entente）。伦敦也改变了对干涉欧洲事务的反感，开始组建远征军，准备派往英吉利海峡对岸，同英国的伙伴一道挫败德国的进攻。帝国防御委员会（Committee of Imperial Defence）强调，英国军队的主要使命是在欧洲，而不是在印度。海军大臣约翰·费希尔爵士（Sir John Fisher）开始忍痛割爱，把皇家海军从帝国水域撤回本岛。这项工作的顺利实施，得益于伦敦与美国成功达成了持久和解，英美和解使大不列颠减少在西太平洋的海军存在变得更为容易。接下来，丘吉尔继承了费希尔的事业，同巴黎展开海军谈判，并完成了把战列舰队召回本岛水域的任务。对于仍旧主张帝国防御而

不是本岛防御的批评者，丘吉尔予以了严厉反驳，“如果我们在决定性战区赢得大战，那么我们此后就可以(在其他战区)勇往直前”。丘吉尔还说：“因为守卫埃及而丧失英格兰，那将是极其愚蠢的。”[7]

当1912年丘吉尔命令马耳他分舰队返回北海时，他已经接近完成对英国大战略迅速而彻底的重新审定。由于英国曾经在经济和心理方面对帝国投入颇深，长达几个世纪的“光辉孤立”政策曾经使英国跃居世界之巅，因此，对于轻重缓急和帝国利益的这种重新思考，其意义格外深远。1914年8月，大战爆发。英国令人钦佩的准备工作并没有使它在这场冲突中避免巨大的牺牲。但是，英国由帝国回撤，以及它那阻止德国蹂躏欧洲的新的大战略，对于确保联盟的最终胜利却是至关重要的。

1920年6月9日，帝国总参谋长亨利·威尔逊爵士(Sir Henry Wilson)带着强烈的使命感，向内阁表达了他对于英国军事能力和战略承诺越来越不相称的巨大担忧。威尔逊恳求说：“我非常尊敬地敦促陛下政府对这个问题予以认真的关注，我们的政策和可用的军事力量之间应该存在某种联系。目前这种联系还不存在……我不能再强烈地向政府强调，陛下军队在全世界分散的危险性、极端危险性，这样的结果是哪里都不强大，到处都很虚弱，而且没有一支用于挽救危局或化险为夷的预备力量。”[8]

威尔逊的焦虑主要来自于经济拖沓对外交政策的严厉限制。在两次大战间的大部分时间里，经济考虑对于英国大战略的形成超过了所有其他因素的影响。尽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联盟取得了最终胜利，但是长时间的冲突使英国消耗了大量的人力和财政资源，并使之暴露了经济方面的潜在弱点。为了使国家重新崛起，补偿公众对艰苦生活的不满，英国必须把防御开

支维持在最低水平。1930年代初期,华尔街的崩溃和全球经济萧条,进一步加剧了对经济脆弱性的先天之忧。

由于英国面临着这些严峻情况,因此,不难理解,在两战间期的年代,财政大臣在塑造大战略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这样的结果不言自明。1920—1922年间,英国防御开支从8亿9千6百万英镑(pound)减少到1亿1千1百万英镑。"十年规则"(Ten-Year Rule)的启用证明缩小军队规模是正确的。"十年规则"是一个定期更新的计划设想,假设英国至少此后十年不必进行大规模战争。为了防止同其他国家展开海军竞赛,英国分别在1921—1922年于华盛顿和1930年于伦敦与大国达成协议,从而避免了为建造新战舰付出巨大开支。军队的规模一直维持在最低水平,借助在殖民地募集的新兵,军队的使命主要是负责帝国领地的防御。发展国际贸易、维持英镑稳定、恢复经济健康发展成了英国大战略的头等大事。

但问题是,德国的发展很快就对这种轻重缓急的安排提出了质疑。1933年希特勒成为总理之后,德国开始重新武装,并着手把为维持欧洲大陆稳定均势而设定的限制弃之一旁。凡尔赛和约(Versailles Treaty)规定,德国部队上限不能超过10万士兵。但希特勒违反了这一规定,开始重新组建国防军。到1935年,他募集了一支超过50万人的军队。希特勒很快就把他的军队投入使用。1936年,他单方面使莱茵兰地区重新军事化,开始实施领土扩张政策。纳粹德国于1938年占领奥地利,1939年春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席卷并攻陷波兰,1940年春向北方挺进,5月进攻法国,这些使希特勒的领土扩张政策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就在海因茨·古德里安(Heinz Guderian)将军的装甲部队横越法国色当的默兹一周之后,德国坦克已经到达了英吉利海峡对岸,有效地切断了法国同比利时联盟军队的联系。第三

共和国的陷落近在咫尺。

20世纪30年代危险德国的崛起,本应促使英国像在20世纪头十年所做的那样对大战略进行重新定向。然而,它却没有。当日本和德国在30年代早期开始表露出敌对意图的迹象时,要求英国重整军备的努力很快就被财政部给扼杀了。“事实是,在当前的情况下,我们在财政和经济方面比在军事方面更没有能力去参与一场大战。……财政部认为,目前财政危险比其他任何我们能够估计的危险都要大。”英国首相拉姆奇·麦克唐纳(Ramsey MacDonald)接受了这种看法。他说:“必须清楚地理解,开支方面不应该有任何大的增加,因为那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9]

1932年,帝国防御委员会确实因认识到大战可能不再遥远而取消了“十年规则”,但是内阁却仍然拒绝对重整军备批准资金。1935年,英国地中海舰队可以用于防空的弹药只能维持一周时间。1936年,英国国防开支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而在德国,这个比例却是13%。纳粹战争机器的优越性,以及其刚愎的民族主义的强烈性,正在日渐提高。

英国战舰和士兵的分布就像其自鸣得意的军事开支水平一样缺乏道理。不过,值得称赞的是,财政部尽管反对全面重整军备,但却忠告英国应该将有限的国防开支全部用于准备对德战争。1934年,财政大臣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坚持认为:“今后五年,我们的努力必须首要用于为防御本岛制定对策。”[10]

然而,张伯伦的声音却没能反映在大臣共识之中,这个大臣共识支持将英国防御努力几乎毫无保留地用于帝国前哨。海军部尤其不赞成从远东撤军和放弃新加坡的海军基地。海军部争辩说,它是“使帝国成为一个整体最重要的纽带。”[11]20世纪30年代末,即使在希特勒的部队占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时,皇

家海军仍在建造派往新加坡的主力舰，旨在同日本舰队较量，而不是建造小一些的航海器，以便在欧洲战场上用于防空和防潜艇作战。正如一位极有影响的关于海军事务的英国评论员拉塞尔·格伦费尔（Russell Grenfell）于1938年所观察到的，海军部的规划人员“在为一个遥远战区的雄伟军事行动作准备，而不是先为确保本岛基地的安全采取一些具体步骤，他们似乎注定要犯下大错误”。[12]

英国为在陆地上阻止德国所做的准备甚至更不够。虽然难以置信，但是确实是直到1939年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英国才开始组建能够在欧洲大陆进行干涉的陆军。在20年代，陆军部承认，原本计划在欧洲大陆使用的远征军“只是由我们海外军事机器的配件构成的”，其规模“无论如何与法德冲突的战略问题都是不相称的”[13]。1933年以来，德国一直四平八稳地重新武装，英国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威廉·埃德蒙·艾恩塞德（William Edmund Ironside）将军重新评估了关于英国在十年中期重整军备情况的一项研究，他评论道：“这个关于我们重整军备的文件……真是一个极其骇人听闻的读物。结果怎么会这样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没有一个外国会相信它是真的。”[14]1937年，总参谋部重申：“正规军的力量只维持在足以执行在海外领地驻守和管辖之任务的程度。”[15]甚至在德国占领奥地利，将10万奥地利部队并入德国国防军之后，内阁仍坚持认为，英国陆军在欧洲大陆没有职责，并指示陆军部继续为部队提供单单完成殖民地使命所需的装备和补给。

1939年3月捷克斯洛伐克陷落之后，内阁终于说服内维尔·张伯伦开始为派兵法国作全面准备，此时，他已经成为英国首相。但是为时已晚，英军力量如此年久失修，以至于英国已经无法阻止希特勒军队仅仅在1940年的几个月之内横扫西欧。

由于受到对英国经济健康发展先天之忧的限制，以及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喋血战壕之记忆的困扰，英国自欺欺人地认为他们能够避免同纳粹德国的对抗。英国尝试着在帝国内逃避，并通过反复满足希特勒侵略和恫吓的胃口来对其遏制。张伯伦在1938年9月生死攸关的慕尼黑会议上对纳粹领导人屈服让步可能是对的，但那仅仅是因为英国在军事上过于虚弱，直面抵抗德国的武力是没有希望的。正如总参谋部对内阁成员在考虑希特勒对苏台德区的要求时所警告的，对德国采取进攻性行动"将使我们陷于一种与虎谋皮者的处境，与虎谋皮者为了炫耀自己多么勇敢而去扭老虎的尾巴，但在他子弹上膛之前，老虎已经准备一跃而起了"。[16]英国的领袖们完全无愧于历史留给他们的耻辱，但这不是因为他们对希特勒的投降，而是因为他们设计并容忍了一个使他们别无选择的大战略。正如历史学家马丁·吉尔伯特(Martin Gilbert)所评论的，"慕尼黑不是绥靖的最佳时光，而是绥靖的最堕落表现。"[17]

英国可以相对容易地脱身。幸运的是，希特勒不愿入侵英伦诸岛，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最终决定拯救欧洲，才使英国只忍受了德国的炸弹，而不是德国的占领。其他国家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德国装甲师轻易地战胜了由法国高级指挥官设计的过时的防御体系。英国自欺欺人且机能不良的大战略，加上法国拙劣的领导才能，起了关键作用，它们使希特勒部队能够征服大部分欧洲，把整个欧洲大陆拖入战争，它们释放了将给历史发展留下难以磨灭阴影的纳粹死亡机器。

## 现　在

上述历史反思蕴含着一个被美国人冒险忽视的教训。那就

是，像美国这样的大国要想保卫自己，捍卫它通过艰苦努力建构的国际秩序，就必须有一个可靠有效的大战略。如果能够准确认识历史谜题的细节，那么任何重大威胁都可以阻挡。如果错误地认识了历史谜题的细节，或者更糟，如果根本没有认识到历史谜题的存在，那么同样这些重大威胁就会让大国屈服。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所享有的海军优势水平和经济主导地位可能使它觉得不可战胜、无懈可击。然而，英国对德国的崛起还是作出了迅捷的反应，并相应调整了大战略。在两次大战间，由于经济稳定高于一切的误导，由于对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死亡和经济毁灭心存余悸，英国固守僵化过时的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越来越脱离现实的大战略，并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

可以说，今天的美国拥有比历史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强大的能力来塑造国际政治的未来。美国享有压倒性的军事、经济、技术和文化主导地位。美国军事对所有潜在挑战者都具有毋庸置疑的优势。美元的实力和美国经济的规模使美国对贸易和金融事务拥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全球化使美国的多国公司(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事实上可以渗透到所有市场。信息革命在美国硅谷地区以及其他高技术中心孕育生长，使美国公司、媒体和文化得以在史无前例的范围内发挥影响。在全球的每一个角落，政府，还有普通市民，都倚赖于华盛顿作出的各种决策。

美国面前的机遇还源于冷战结束带来的地缘政治空间。战后时期往往是前景格外美好的时刻，并常常伴随着探索辩论和制度创新。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建立于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告终之际，联合国(United Nations)奠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都并不是偶然的。虽然这些制度没有一个能够终止战争，但它们却是人们为了创建新秩序，防止另一轮地缘政治对抗和残酷

杀戮而大胆创新、不懈努力的产物。

尽管机遇在握，但是美国却在荒废这个历史时刻。从柏林墙倒塌到2001年“9·11”事件，美国没有大战略，没有指导国家之船正确航向的设计方案。自“9·11”以来，美国已经有了一个大战略——以维持优势地位和先发制人原则为基础的大战略，但是它的主要成功之处却在于疏远了大部分世界，破坏了美国的关键伙伴关系。

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成了一个茫然失措的大国，它的古怪行为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90年代早期，五角大楼曾宣布不会容忍任何对美国优势地位的挑战，声称要“阻止新对手的再度出现”[18]。冷战结束了，但是美国仍旧是全球秩序的维持者。这个目标很快就证明知易行难。老布什政府在对巴尔干地区进行军事干涉的前景面前退避三舍，宁愿把烂摊子留给欧洲人。然而，缺少美国的帮助，欧洲人几乎无法阻止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sevic)对波斯尼亚进行活体解剖。作为总统候选人，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扬言要做点什么以终止种族屠杀。但是，一旦上任，他也是顾虑重重。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根本不想把美国军队派往巴尔干地区。流血冲突在1993年和1994年继续。克林顿总统被吵得不得安宁，但仍旧作壁上观而无动于衷。

鲍威尔退出舞台之后，更加自信的克林顿才最终出手解决，美国军队成功地给波斯尼亚和科索沃带来了和平。但是，由于克林顿强调干涉背后的人道动机，而非战略动机，因此，他给人们理解在什么情况下美国才会使用武力制造了迷惘和困惑。克林顿几乎接近于提出一个新的原则，他强调：“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原则，我希望这个原则将来能够得到坚持。——不仅美国应该坚持，也不仅北约应该坚持，而且世界主要国家都应该坚持，

并通过联合国得到坚持。这个原则就是，当世界上出现严重的种族和宗教冲突时，……如果世界社会有能力予以制止，那么我们就应该制止种族和宗教清洗。”[19]问题是，巴尔干地区成了一个明显的例外，因为美国没有对卢旺达——1994年至少50万图西族人在卢旺达被杀——东帝汶、苏丹、塞拉利昂以及其他很多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了种族和宗教冲突的地方进行干涉。国务卿马德莱娜·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似乎意识到了双重标准的存在，试图重新诠释克林顿的讲话，她提醒说：“有人希望，有人则害怕科索沃会成为一个在全球进行相似干涉的先例。我要警告，不要得出如此笼统的结论。”[20]

巴尔干战争进一步导致了美国政策的不一致。国会对欧洲依赖美国军事力量恢复地区和平愤愤不已，并明确表示希望欧盟成员国能够解决大西洋联盟内部的不平衡问题。在战斗结束、维和行动开始之后，国会山（Capitol Hill）发表意见，坚决要求美国将维和任务交给欧洲人，并从巴尔干地区撤军。欧洲人听到了这些信息，并且作为反应，开始着手组建能够在没有美国军队帮助的情况下独立作战的军事力量。华盛顿则以对抗回应，警告欧洲联盟不要过于自强、自立，以免破坏了大西洋纽带。美国要求欧洲承担更多的防御负担，但是当欧洲真的按照美国要求去这样做时，美国又会心生怨恨。

美国对俄罗斯的政策，作为表面上克林顿政府的头等大事之一，并不怎么顺利。克林顿一本正经地宣布他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鼓励民主的俄罗斯不断发展，使这个美国的前敌融入西方。但是，克林顿欧洲政策的核心却是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NATO）扩展到中欧，旨在让历史上最威严的军事联盟更靠近俄罗斯的边境。莫斯科有中风感是可以理解的，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总统发出警告，美国正冒险在欧

洲划一条新的分裂线。克林顿反复向俄罗斯许诺美国并无恶意。但是,如果俄罗斯同墨西哥和加拿大组成一个联盟,并开始在美国边界建立军事设施,那么美国肯定不会坐视不管。

政策的不连贯性也使克林顿对待中国的方法麻烦不断。美国时常宣称,中国是美国的战略伙伴,完全应该成为世界贸易组织以及更广泛的国际社会的成员。克林顿甚至在中国召开了一个城镇会议,在全国电视上直播,明确显示中国是我们中的一员。然而,美国也同样时常宣称,中国政府只是热心于践踏公民人权,并威胁攻打台湾。克林顿团队不是脚踏实地与北京稳步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而是时不时地转向对抗性措施,如向台湾地区派遣美国战舰,计划部署国家导弹防御体系,这个政策非常危险地逼迫中国扩大其有限的核武库。

原则同政策一样混乱不清。从言辞上看,克林顿政府要死心塌地地坚持自由国际主义,坚持通过多边制度领导世界,坚持以共识而不是命令塑造国际秩序。美国是“不可或缺的国家”,因为美国有能力组建意愿联盟、组织联合行动。

但是记录却与言辞不符。在常规情况下,美国就退出了多边努力。1997 年在京都,国际社会就保护环境的新举措问题达成了一项协议。华盛顿曾是谈判的一方,但是在实施方面却故意拖延。禁止地雷工作的全面胜利使约迪·威廉(Jody William)和她领导的组织——国际禁止地雷斗争(International Campaign to Ban Landmines)赢得了 1997 年诺贝尔和平奖。美国并没有签字承认国际禁止地雷公约。华盛顿喜欢按照自己的规则行事。多年来,克林顿一直拒绝支持国际刑事法庭,直到第二任期快结束时,他才开始改变主意。

这种单边主义倾向在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接替克林顿之后更是有增无减。他的助手一再向心存疑虑的盟友许

诺,美国是一个重视团队精神的队员,将按照“菜单式多边主义”行事。[21]但是,仅在上任六个月之内,布什就脱离了关于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明确表示要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Antiballistic Missile Treaty),声明反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omprehensive Test Ban Treaty)和准备建立国际刑事法庭的协定(二者都由克林顿签字但却没有得到参议院批准),放弃成立机构以便核验1972年的生物武器公约(Biological Weapons Convention),淡化联合国旨在控制小武器扩散的一项协议。不论朋友,还是敌人,他们都一样迅速地表达了他们的恼怒之情,发誓要采取行动抑制刚愎自用的美国。

除了单边主义,布什政府还展现了孤立主义天性。布什很早以来就承诺要减少美国的海外责任,集中关注西半球事务。他还降低了美国协调中东和北爱尔兰和平努力的作用。国务卿科林·鲍威尔也如影随形,把克林顿政府任命处理世界范围内动荡地区的55名特使中的三分之一多从国务院花名册上划掉。《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用大标题把这些举动概括为“布什由美国和平经纪人的角色倒退”。[22]

政策的不连贯和不一致也几乎成了家常便饭。鉴于曾经声称要把新重点放在拉丁美洲,布什第一次国外出访便选择了墨西哥,与维森特·福克斯(Vicente Fox)总统在他的牧场举行会晤。两位领导人同样身着牛仔靴,以展示一种新的伙伴关系,并表明美国将按照墨西哥的条件同其发展关系。但是仅在聚会之前,美国飞机对伊拉克进行了轰炸。墨西哥人目瞪口呆。袭击事件一下子引走了聚光灯,媒体的注意力全部聚焦于美国的单边主义,把福克斯晾在一边,使之陷入一种难堪而尴尬的境地。此次访问不但没能成为布什与墨西哥联络关系的机遇,反而为新仇旧恨火上浇油,使美国同其南面邻居的关系进一步倒退。

韩国是布什政府战略不连贯的下一个牺牲品。在2001年3月金大中(Kim Dae Jung)总统与布什会晤之前,鲍威尔曾经表示,美国计划继续坚持克林顿时期支持南北和解的政策,以换取朝鲜愿意不再出口导弹技术、停止生产和部署远程导弹。但布什却反其道而行之,告诉深感诧异的金大中,他将不再执行同朝鲜之间的导弹协议,因为"我们没有把握他们是否会继续遵守所有协议的所有条款"。会晤之后,白宫坦言,美国与朝鲜只达成过一个协议,即1994年协议。该协议规定,朝鲜关闭那些正在生产核武器材料的核能源工厂,实际上平壤一直都在遵守这个协议。当被问及布什在椭圆形办公室讲话的真正含义时,一个助手这样回答:"那就是总统说话的方式。"[23]2001年夏,布什政府却又一次改变了路线,宣布它最终将同朝鲜进行外交对话。

美国未能避免2001年9月的恐怖袭击,是其战略盲目的进一步证明。不论克林顿政府还是布什政府,都未能对有关美国必须更有所作为地抗击"非对称性"威胁的频繁警告作出有效的反应。如,哈特-鲁德曼委员会(Hart-Rudman Commission)早在1999年发表了一个报告。该报告警告:"美国对于针对本土的敌对袭击将变得越来越脆弱,而且我们的军事优势将不能为我们提供全面保护。"这个报告还接着预言,在21世纪初期,"美国人将可能丧生于美国本土,并且可能是大量地丧生。"[24]虽然其他团体也发出了类似的警告,但是美国领导人几乎没能改善几十个负责国内安全的机构之间的协调工作。他们也没能采取足够的切实措施去关闭在海外运行的恐怖网络。在放松警惕的情况下,受其简单性的蒙蔽,美国的弱点在恐怖袭击时暴露无遗。最先进的侦察卫星和窃听技术对付不了用匕首和开箱器武装起来的劫机犯。

"9·11"恐怖袭击成了布什政府的理念依托,布什政府开始

集中精力一心一意地向恐怖主义开战。虽然成功反击了恐怖主义集团及其在阿富汗的支持者，但是布什政府已经扩张过度了，它过分夸大了恐怖威胁界定新国际体系的程度。通过把反恐斗争确认为指导性优先议程，并出台新的维持优势地位和先发制人的原则，华盛顿已经接受了一个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反对的大战略，并因而损伤了继续作为国际和平与繁荣基石存在的伙伴关系和国际制度。

这个大战略还致使布什政府发动了考虑不周的伊拉克战争。再一次，华盛顿扩张过度了，它使美国负担上代价高昂的承诺，而这些承诺严重缺乏公众支持。布什宣称的为中东地区带来民主的积极热情或许可以帮助使战争合理化。但是，它决不真的预示着美国愿意对付整个地区的非自由政府。相反，伊拉克境内展现的动荡和美国士兵的持续伤亡对于布什及其幕僚来说是一个难堪的警示——这是他们在2003年底加速推行新计划将权力归还给伊拉克人民并降低美国军队等级的主要原因之一。伊拉克不大可能是美国在中东进行长系列征服的第一个。

可以肯定，美国为了维持国际稳定，确保国民安全与富庶，一直不懈努力。克林顿到国外的出访比任何一位美国总统都多，他的海外旅行次数几乎相当于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和老布什（George H. W. Bush）出访次数之和。他把美国军队连续派往伊拉克、海地、巴尔干地区去战斗，并总体上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布什如法炮制，集合了一个给人印象深刻的专家组，他们很快就开始一天24小时地为管理美国治下的和平而工作。但是，美国却在无功徒劳。美国不知道要去哪里，所以也肯定不晓得如何达到那里。如果没有一套指导性原则，即大战略，那么即使善意的努力也将无所作为。

甚至比美国政策不连贯更令人不安的是,似乎很少有人关心此事。华盛顿完全没有1815年、1919年和1945年那样的明智倡议和制度创新。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只是对现状进行了简单的修修补补。在冷战期间,北约当然出色地维护了欧洲的和平。而且它有足够的弹性在苏联这个当初促使其诞生的敌人消失之后继续健在。因此,美国继续维护北约并吸收了一些新成员。七国集团作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间得以协调政策的论坛发挥了相当好的作用。苏联崩溃之后,美国给俄罗斯提供了一席之地,并把它称作"八国集团"。美国在其实力达到巅峰之际,却一直靠冷战的激情维持运转。

由于政治阶层对美国与外界交往越来越不感兴趣,因此广大公众更是从根本上漠不关心。电视、报纸和杂志上有美国外事务的报道范围急剧减少。主要电视网分配给国际新闻的时间在1989年到2000年之间减少了65%以上。[25] 1985—1995年间,《时代周刊》(*Time*)和《新闻周刊》(*Newsweek*)用于国际报道的版面分别由24%减少到14%和由22%减少到12%。[26]

即使当比尔·克林顿试图让公众关注外交事务时,也没能成功。他设法挑起了一场关于北约扩展问题的全国性探索辩论。毕竟,让北约联盟吸收新成员的计划必须得到参议院三分之二以上的赞成票。包括克林顿本人在内的政府高官到全国各地四处奔走,征求支持。时任北约秘书长的雅维尔·索拉纳(Javier Solana)也远涉大西洋前来助阵。

但是,美国人很少关心此事。索拉纳只能郁闷地呆坐在各地的汽车旅馆里,因为他甚至连一个电台的访谈节目都预约不到。参议员们分别在各自的出身州内就北约扩展问题组织城镇集会,结果却只是发现,听众中他们的助手和工作人员占了大多数。议会内的辩论直到1998年3月底的一个下午才非常偶然

地开始。多数党领袖特伦特·洛特(Trent Lott)对当时讨论的话题感到非常厌倦,于是临时决定转改讨论北约问题。经过时断时续、浅尝辄止的辩论,法案在次月以80票对19票获得通过。尽管大势鼓吹,但是只有10%的美国老百姓能够说出三个国家(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中的一个。通过于1999年3月12日正式加入北约,这些新成员对美国给予了核保证。[27]

古巴难童埃连·冈萨雷斯(Elian Gonzalez)的故事曾经成为主导新闻长达数个星期。随着美国公众对此事细枝末节的关心远远超过对美国在世界事务中进行广泛参与的范围和性质等问题的兴趣,当选官员的漠不关心愈演愈烈,达到了完全不负责任的地步。国会对待外交政策议题通常难以超越政党政治的门户之见。科索沃之战就是一个明证。战争开始一个月之后美国没有一人伤亡,但是众议院却表达了严重焦虑,以249票对180票拒绝在没有国会批准的情况下为派遣地面部队到南斯拉夫提供资金。众议院甚至不能筹集必要的资金以通过一项支持轰炸作战的决议。这是一种再好不过的向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传递信息的方式,而且是在战争进行期间,告诉他其对手可能要分崩离析。

国会的下一个失策是,参议院抵制了旨在消灭核武器试验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当明确显示该条约难以获得通过所需的票数时,克林顿政府已经做好了准备,不再予以考虑,并避免这个已经由52个国家批准(而且随后很快又得到更多国家批准)的重要条约遭到彻底抵制。但是,参议院继续进行表决,以51票对48票扼杀了这个条约。共和党宁愿给克林顿一次巧妙的政治打击,也不愿维护美国在海外的信誉。美国的盟友大吃一惊。两位英国评论员在《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上指出,对此条约的抵制"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美国政治的根本改变和它对在这个世界上所担当角色的看法。对余下世界嗤之以鼻在

与共产主义斗争期间并不是美国的选择。”[28]这是一种悲哀，本意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提供指导的协商机构居然把外交政策当作了党派恩怨的人质。

2001年9月的恐怖袭击被广泛诠释为这些恼人趋势的解药。它们是的，至少在短期内是的。布什政府并没有单边独干，而是不仅有意征求了北约盟友的支持，还征求了俄罗斯、中国，以及温和的阿拉伯政权的支持。布什没有受制于美国的承诺，而是宣布了反恐战争，并让地面部队、航空器和战舰投入战斗。国会和美国人民也都一道全面参与，对于布什决定使用军事力量向基地网络及其支持者开战，参议院、众议院以及普通公众给予了压倒性的支持。[29]美国公众还同样强烈支持入侵伊拉克。

然而，从长期来看，反恐斗争不可能成为确保多边参与或持久型美国国际主义的坚实基础。尽管国外发表了很多支持性的声明，但是在针对阿富汗的轰炸开始时，伴随美军左右的只有英国军队。其他国家虽然提供了后勤和情报方面的支持，但是几乎所有的战斗任务都是美国人完成的。而那恰恰是美国及其很多盟国所希望的方式。

美国不愿放弃肯定会被广泛联盟削弱的自主权。其他国家也乐于让美国当头，藉此使他们同军事行动保持一定距离。有些在冲突战区之内的国家，沙特阿拉伯就是其中之一，对允许美军从他们的基地发动军事打击感到战战兢兢。由于他们可能因支持美国打击一个穆斯林邻国而在国内遭到强烈反对，因此，他们的恐惧不无道理。美国的北约盟友也因担心他们可能会面临来自激进伊斯兰世界的报复而发出克制警告。毕竟，尽管恐怖分子表现为一种集体威胁，但他们还是要精心挑选实际的攻击目标。这就是为什么表面上的团结一致不会根深蒂固。这就是为什么恐怖主义不可能让美国成为坦诚的多边主义者。

美国的自行其是倾向在伊拉克战争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确凿无疑的是，英国士兵从一开始就与他们的美国同胞并肩作战。但是，不像在阿富汗，美国发动针对伊拉克的战争并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不管联合国安理会的大多数成员国和全世界大多数人民如何反对，美国还是进行了战争。

也根本不清楚，恐怖主义会根除而不是加剧美国社会的孤立主义张力。美国意志坚决地对纽约和华盛顿遭受的恐怖袭击进行了反击。但是，与要求在全球反恐战中进行接触的呼声相伴的还有另外一个替代逻辑，这个逻辑可能随着时间的延续而被普遍接受。美国国父们的一个基本格言是，美国应该远离其他国家的事务，这样就可以让他们远离美国的事务。美国是一个可怕的对手，不会让任何针对自己的袭击逃脱惩罚。但是，一旦霸权的负担增加——就像在伊拉克发生的一切，美国人开始认为他们的海外义务对他们的本土安全造成了损害，那么他们就会正统地对全球参与的好处是不是得不偿失提出质疑。

国父们对卷入国外事务的警告作为一种潜在的诱惑，能够解释为什么，正如一位学者所写的，恐怖袭击"使以色列担心美国人现在可能会认为支持以色列代价太高"。[30]这个逻辑也能够解释为什么法国主要分析家之一佛朗索瓦·海斯伯（Francois Heisbourg）于恐怖袭击的第二天在《世界报》（*Le Monde*）上作如下评论："恐怕（曾经导致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远离世界的）同样诱惑，会在'9·11'恐怖袭击事件的野蛮人得到惩罚之后再一次塑造美国的行为。在这方面，2001 年的珍珠港事件可能会结束由 1941 年的珍珠港事件所开创的时代。"[31]

因此，2001 年 9 月恐怖袭击事件的长期后果可能是，美国会成为这样一个美国，它会把更多的关注和精力投入到本土安全，同时减少对解决远离边境问题的关心。诚然，布什政府已经

显示，它并不缺乏对发动反恐战争的热情。但是，在 2001 年 9 月恐怖袭击事件之前，布什及其幕僚的原初天性却是，收缩而不是加深美国对海外事务的介入。这些天性加上把本土防御列为新的关注焦点，旨在让美国远离国外危险的政治诉求、以及伊拉克战争带来的人员损失与政治反弹，与其说是震惊和恼怒下的举动，不如说是一种长期趋势的指示器。

同样令人怀疑的是，恐怖威胁能否长期确保国会更负责，美国公众更参与、更关注。两党恩怨的确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迅速消失了，美国公众也坚决支持军事报复。但是，那些只是灾难时刻引起的暂时现象，几个月之后，党派争论开始重归国会山，公众意识再一次开始迷茫。12 月 2 日一位记者评论道："后'9·11'国会现在几乎完全放弃了它曾经短暂采纳的两党合作、高风亮节的姿态。"[32]

关于伊拉克战争问题的政治辩论遵循了相似的模式。在国会山，布什遇到了极少的战争反对者。公众支持也很强烈。但是，当战后暴力活动一开始出现，占领代价一开始上升，布什的公众支持率就开始下跌了。民主党人也开始批判总统对外交事务的处理了。

重归一切照旧之所以相对迅速，部分原因在于美国开始着手的是一次长征，而不是战争。珍珠港事件之后，日本帝国和纳粹德国是危险和可以确认的敌人，美国领导人可以藉此对国家进行动员，并号召国民作出持续的牺牲。与此相似，苏联造成的威胁使美国在冷战的几十年内得以聚精会神、意志坚决，有力地支持了使美国长期维持全球参与的自由国际主义。相比而言，恐怖主义代表的是一种更不确定、难以捉摸的敌人。美国现在面临的不是拥有装甲纵队和航空母舰的有形对手，而是以游击战术训练集结的敌人。此类战争，就像越南战争那样，使美国武装力量和国

民的优势都无从发挥。美国很轻松地击败了在阿富汗的敌人,但是很多基地组织(Al-Quaeda)的成员却逃之夭夭,或者混入了乡村生活,或者逃到了巴基斯坦的部落领地。与此相似,伊拉克军队仅在几周之内就瓦解了,但是,那些表面上已经放下武器,回归平民生活的政权忠诚者很快便对美国士兵展开了游击战。在此类战争中,耐心和机智是比军事实力更有用的武器。

通过情报、侦察和秘密行动进行的反恐斗争大多静悄悄地发生在公众的视线之外,因此,这个新的挑战并不会带来有助于使整个国家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的感召性情景。恐怖主义对美国普通公民的主要影响,是迫使他们呆在家里,而不是驱使他们参军或上生产线以为战争作贡献。在纽约和华盛顿遭袭、以及随后的炭疽恐慌(anthrax scare)的余波中,布什总统要求美国人的,不是作出特别的牺牲,而是让他们重归正常生活,到商场购物,乘飞机旅行。即使当美国军人在阿富汗境内战斗和死亡时,美国广播公司(ABC)仍在试图引诱戴维·莱特尔曼(David Letterman)主持一个深夜档节目以取代"夜线"(*Nightline*)。后者是一个就国外新闻提供深度分析的网络节目。就像2001年9月之前一样,让美国公众持续参与国际事务必定是一个上坡苦战。

为什么对于冷战结束提供的历史性空间,到目前为止美国只作出了如此平淡仓促的反应呢?为什么当机遇如此明显、回报如此之高时,在其他方面表现精力充沛的美国却未能抓住时机、有所作为呢?

冷战结束的不期而至给出了部分答案。1989年11月9日晚上10点30分左右,柏林人开始爬越并拆毁将他们城市分割了几十年的柏林墙。让俄罗斯人、美国人,还有事实上介于他们之间的所有人大吃一惊的是,20世纪巨大的意识形态分裂开始

消失，而且是在只发生了极少的流血事件的情况下。在华沙条约和北约之间并没有发生战争。莫斯科心甘情愿地为附庸国放行，安排了苏联集团的解体，虽然伤感在所难免。苏联可能是历史上第一个没有经过流血战斗就退出舞台的帝国。苏维埃共产主义悄然死亡，这对于所有各方都是一件幸事。

苏联解体之不同寻常的方式，尽管在主要方面是件幸事，但是也的确有另外一面。没有唤醒的警钟，没有什么场景类似于充满血腥的索姆战壕或被夷为平地、化为灰烬的广岛，能够让人们明白，必须勇敢地做点什么以终止大国对抗和战争的周期循环。相反，西方的无血胜利对于其价值观和制度来说是一种有力的维护。因此，美国基本上没有对路线作任何改变而继续向前跋涉。乔治·布什（George Bush）（老布什）的外交政策被恰当地称作“强化的现状”（status quo plus）政策。比尔·克林顿曾经尝试留下独特的印记，但最后还是退守相同的基本逻辑。

剩下来的美国拥有只对自己有好处的过于强大的力量。苏联瓦解赋予美国居高临下的地位，它加剧了一种自命不凡的胜利主义倾向。苏联并不仅仅是放弃了战斗，而是彻底崩溃了。俄罗斯经济在1990—1998年间萎缩了50%以上。乌克兰经济经历了根本性的自我毁灭。1995年，公司甚至不能为员工支付工资。从基辅向南的高速公路沿线，贫困的工厂工人排成一排叫卖他们刚刚生产出来的鞋子和轮胎，那是他们硬通货的惟一来源。除了这个画面，还有日本的慢性衰退和席卷东南亚的金融危机，美国则拥有绝对的实力优势。其他主要国家没有能力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这本身造就了稳定，其他国家之所以追随美国是因为他们别无选择。美国凭借自己的主导地位能够不费吹灰之力创建秩序。

实力过剩也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巨大的犯错误的余地。美国

可以连续失策而不至于遭遇敌对后果。华盛顿在俄罗斯高声反对面前向东扩展了北约的边界。然而,莫斯科除了默认并巴结美国之外别无选择。如果俄罗斯想要贷款,并进入大西洋共同体的市场和机构,那么它就必然需要美国的恩泽。在北约对科索沃战争中,美国导弹意外轰炸了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但是,几个月的紧张之后,美国同中国的关系又重归正轨。北京知道,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其他目标的实现有赖于美国的批准。甚至,当美国不论有意还是无意,妨碍其他主要国家时,他们还是来向美国求助。

当然,美国也尝到了自命不凡的后果,恐怖分子对美国的领土发动了袭击。布什政府明智地作出了反应,一方面要在国外捣毁恐怖主义巢穴,另一方面要在国内采取措施加强安全。但是,美国把目标指向恐怖分子和无赖国家的新忧患很可能使大战略的其他事务得不到应有的关注。

下面来看一看国家导弹防御体系这个例子。2001 年 9 月 10 日,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主席约瑟夫·拜登(Joseph Biden)参议员发表了一个重要讲话,他概述了为什么相比来自无赖国家的核导弹美国应该更担心来自恐怖主义的低技术威胁。他还陈述了为什么退出反导条约和部署国家导弹防御体系将导致一场新的军备竞赛。拜登的目的至少部分在于,说明为什么民主党已经拒绝向布什政府提供它要求用于资助导弹防御体系的全部 83 亿美元。尽管“9·11”恐怖袭击事件完全证实了拜登的分析,恐怖分子能够极其容易地造成沉痛损害,但是关于导弹防御体系的政治辩论却突然中止了。9 月 21 日,民主党宣布,他们已经决定撤销反对意见,为布什提供全部所需资助。在本土防御成为主要政治焦点的过程中,这个问题的讨论变得不再可能。12 月,布什政府正式通告,美国将退

出反导条约。

美国人不仅基本没有思考大战略之广泛问题的需求，而且也基本没有这种供给。冷战一代继续辩论地缘政治问题，至少在学术期刊上。但是，辩论并不是以新崛起的战略家一代的方式进行的。美国研究群体的职业结构和制度结构对那种能够刺激重新思考大战略问题所需的广泛质疑怀有偏见。一方面，大学的国际关系学者倾向于出版高度抽象的作品，这些著作多半对政策群体的用处不大。这个领域充斥着数学模型，并且越来越远离现实世界。决策者们假使想要读的话(他们不想读)，甚至读不懂主要政治科学杂志上的文章，它们包含了太多的行话和数学等式。

另一方面，很多智库则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为了能够对变化迅速的政策辩论有所贡献，而这些辩论是受一天 24 小时新闻频道(美国有线新闻网，CNN；福克斯新闻，FOX News；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有线电视网，CNBC；美国广播有线电视，MSNBC；美国公共事务有线电视网，C-SPAN；等等，不一而足)信息爆炸驱使的，政策分析人士赶写各种专栏和简报。强有力的尖刻胜过强有力的分析。因此，大学产生与政策关系不大的学术，而智库则生产书架寿命以天或周计算的作品。结果是，一派贫瘠的学界图景、空洞无物的外交政策群体、以及对打造美国新的大战略所需的持续的深思熟虑的疏忽漠视。

网络革命(dot - com revolution)只是使事情变得更糟，美国最好、最聪明的人都被吸引去从事互联网创业、投机资本公司和商业咨询。美国最好的公共政策学校——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乔治城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指导毕业生成为外交家和公务员方面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强调。相反，他们倾向于培养在工作市场上能够同其商业学校同级毕业生相竞争的

技术专家治国论者。这些学生毕业时具有令人羡慕的微软公司Excel和PowerPoint技能。他们掌握了起草备忘录的技巧。但是他们大部分却非常缺乏成为美国新战略家所需的历史基础和跨学科训练。

粗略回顾一下谁在克林顿政府期间发号施令,就会凸现问题的紧迫性。在一定程度上,克林顿政府有一位给人印象深刻的战略家,他就是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鲁宾由世界卓越的投资银行之一高盛公司最高领导离任,执掌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大权。他只带领了这个国家屈指可数的几个优秀经济学家。鲁宾从担任刚成立的国家经济委员会(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领导开始起步,不声不响地使自己成为克林顿核心圈的依托。接着,他于1995年1月取代财政部长劳埃德·本特森(Lloyd Bentsen)。1999年夏,当鲁宾离职返回华尔街时,他把自己的位置交给了非常能干的副手,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经济方面不可能有谁比鲁宾做得更好。鲁宾将作为最杰出、最有才干的人物之一名垂史册,自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内阁主要成员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以来,他又一次为财政部带来了荣耀。

克林顿的外交和国防团队具有极高的智慧,但却因为国家以全球经济为头等大事而被遮掩了光芒。此外,团队中思考大战略事务的人不多。对克林顿八年执政路线最具影响力的人物是塞缪尔·伯杰(Samuel Berger),他在克林顿第一任期任副国家安全助理,第二任期任国家安全助理。伯杰得益于自己作为首都最好的贸易律师之一的职业经验,经常具有令人钦佩的判断和高超的政治直觉。但是,伯杰既没有训练,也没有偏好去为美国战略打造一个新的理念基础。

布什团队的问题有所不同。团队中很多成员都具有地缘政

治和大战略方面的可贵经验。但是从一开始,他们就未能就时代的根本问题发现共同基础。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明确表示,他强烈支持导弹防御计划,他认为欧盟自己组建军事力量的努力可能会破坏北约。同时,科林·鲍威尔希望在导弹防御问题上应该从长计议、谨慎从事,他相信更加强大的欧盟可能意味着更加强大的北约。副总统理查德·切尼(Richard Cheney)和布什的国家安全助理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表示,政府计划撤出巴尔干地区的美军。鲍威尔坚持指出,科索沃的美国士兵在最近任何时间不会去任何地方。副国防部长保罗·沃尔福维茨想要通过武装反对派推翻伊拉克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而鲍威尔支持放松经济制裁以便"减轻伊拉克人民的负担"。[33]2001 年 9 月恐怖袭击之后,沃尔福维茨希望,除了阿富汗,美国能够把伊拉克也作为打击目标,但是其他人倾向于更有限的作战。

不仅如此,在一定程度上,虽然布什的主要幕僚具有一个共同的理念地图,但它却是一个过时的理念地图。布什团队主要由前冷战斗士组成,他们的老练经验只适用于迎接过去的挑战,而不是现在和未来的挑战。他们在导弹防御问题、对华对抗思路、漠视如保护环境和管理全球化等新问题的浮现、单边拒绝无数有价值的国际协议等方面所表现出的强硬立场,让人联想起冷战的狂暴年代,结果是一并疏远了欧洲和亚洲国家。反恐战一开始所展现的国际团结掩饰了,而决不是消除了,存在于布什团队与其国外同行之间在外交政策思路方面的鸿沟。

## 未　来

拯救美国战略盲目的必要起点是,澄清大战略究竟是什么。

要提出一个关于未来的大战略,就必须有一个特殊的世界地图。地图上事关紧要的不是地理特征——海洋、高山、河流,或者甚至国家疆界。相反,大战略是要确认地缘政治分裂带,弄清潜在的全球力量将在哪里和将以何种方式会相互产生矛盾,显示将可能最终引发主要战争的裂隙。挑战并不仅仅来自于确定这些分裂带在哪里,而且还在于厘清如何战胜它们——或者至少厘清如何减弱它们的毁灭性潜能。

因此，设计大战略如同建筑设计一样。当建筑师起草建筑物蓝图时，他依赖工程学的规律，提出一种不仅满足功能需要，而且结构牢固的设计。一定的横梁将承担一定的重量。不同的材料具有不同的承受力。目标是确保分裂带能够经受得起风、建筑物所在地的沉降和震动，以及其他可能需要结构承担的力量。

制订大战略包含一个相似的计划,但却更为复杂。不像工程学,这里没有关于负荷和承受力的严格规律。通讯、武器和交通技术的变迁在不断地改变着博弈规则。例如,铁路的出现对地缘政治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几个世纪以来,控制海洋的国家拥有无可置疑的主导地位。但是,在铁路使军队和商品能够更快而且更便宜地横跨大陆之后,这种情况就不复存在了。陆权对海权的相对战略重要性,一直随着潜艇、飞机、核武器、卫星和纤维光学的问世而不断变换。塑造地缘政治的构造力量决不是一成不变的。

适合顺境的大战略可能不适合逆境,这使问题进一步复杂。一所房子如果建造得能够抵挡狂风和里氏六级地震,那么它在微风中和坚固的土地上肯定会存在得更好。但是,一个在增长时期为维持经济稳定而设计的大战略,到了衰退时期,可能它的坏处远远大于它的好处。虽然今天的国际经济是在美国的守护

下建立起来的，而且仍在受华盛顿支配，但是它却可能成为整个体系在压力之下走向萧条的传送带。

美国新的世界地图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正在浮现的地缘政治分裂带在哪里呢？尽管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政府内部关于大战略的讨论极少，但是某些外界思想家却做得很好。在为数不多的仍对思考大战略问题感兴趣的分析家中，一个相对生动活泼的辩论已经慢慢形成。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他的著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中提出，自由民主席卷世界，它使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的分野成为最后的全球分裂带。他的观点正确吗？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认为，文化分裂线现在正在界定地缘政治，犹太-基督徒、伊斯兰教、儒教文明之间的斗争即将来临。他的观点正确吗？或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在《凌志车与橄榄树》中写道，全球化已经永久性地改变了规则，使参加全球化大潮的国家与抵抗全球化大潮的国家之间形成了新的分裂带。他的观点正确吗？

这些分析以及其他相关分析构成了关于21世纪美国世界地图的竞争性洞察。每一种洞察都有自己的长处，但它们全部都是错误的。而且它们大部分因为同样的原因而错误。

他们所展现的世界地图是稍纵即逝的，只有当美国优势地位持续不变时，它们才能维持相关性。根据本书的世界地图，全球体系的惟一界定因素是实力的分配，不是民主、文化、全球化，或者任何其他东西。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单极世界——一个只有一个权力之极的世界。而且，它是美国的单极世界。此时此刻，根本的、无法回避的地缘政治特征是美国的主导优势地位。

今天全球范围的稳定直接源于它的单极结构。当一个国家

比其他所有国家拥有更多的财富和军事能力时，体系是单极的。当存在规模大致相当的两个国家时，世界是两极的。当存在三个或者更多的主要游戏者时，体系是多极的。在冷战的两极世界或20世纪30年代的多极世界中，大国之间的对抗是一个恒量。在只有一极的世界中，之所以没有大国之间的对抗，只是因为只存在一个大国。其他主要国家甚至不能想象同美国进行较量。这种显著的不对称的确意味着，中东或其他任何地区的极端主义者将对美国发泄愤怒，因为优越招致怨恨。但是，即便对世界惟一超级大国成功进行了痛击，他们还是无法改变全球体系的单极本质。

因此，分析家如此难以就今天的地缘政治分裂带取得一致意见，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它根本就不存在。如果地缘政治分裂带出现在权力之极之间，而今天只有一个这样的极，那么结论就是，分裂带并不存在。美国是拳击场上惟一的竞争者。它因对手缺席不战而胜。

但问题是，美国的单极时刻以及由此而来的全球稳定不会持久。欧洲现在拥有一个单一市场、单一货币，并且更频繁地以自信的单一声音发表意见。欧盟15个成员国的财富总和已经接近美国，新成员的即将加入，加上与美国相当的增长率，可能最终使平衡向有利于欧洲的方向倾斜。欧盟已经开始着手组建能够在没有美国参加的情况下独立作战的军事力量。这些步骤将使欧洲更加自主，更不愿服从美国的领导。与统合欧洲一道，俄国、日本、中国也将逐步作为美国力量的抗衡者出现。

美国优势的式微，并不仅仅是替代权力中心崛起的产物，而且也是新式美国国际主义的结果。美国正在退出各种多边主义制度，转而宠爱单边主义，单边主义不仅使美国冒险疏远替代权力中心，而且大大提高了因后者崛起而导致出现新的地缘政治

对抗时代的可能性。事实还在于,美国很可能会厌倦全球霸权的负担。面对捉摸不定的恐怖主义威胁、为伊拉克带来秩序的高昂代价、日益增长的遍布世界的反美仇恨,美国国民及其选出的领袖或许会对美国发挥全球卫士作用丧失兴趣。

其他力量的崛起、美国的式微,以及美国单边主义式的国际主义,将共同使美国的单极时刻成为昙花一现。在单极让位于多极之后,因存在无与争雄的霸权而自然实现的稳定就会被围绕身份、影响和地位而进行的全球竞争所代替。就像过去一样,世界的首要分裂带将出现在数个时代以来它们一直出现的地方,即世界的主要权力中心之间。随对抗而来的失序将很快取代由美国治下的和平提供的秩序。

不管美国人是不是想听这些,当面对可能终结美国主导优势地位的新危险和不确定性时,他们必须注意留心去听。美国经济与国际市场紧密相联。上一个十年的经济繁荣是由全球经济的更加开放推动的,全球经济的开放不仅促进了贸易相当大的增长,而且迫使美国变得更有竞争力。国际贸易现在占全球产量四分之一强。如果经济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重新抬头,那么美国人将遭受损害。

另外,可能更重要的是,基本生活质量的决定要素也处在危险边缘。四十多年来,美国人一直对冷战和核战的幽灵保持警觉。为了遏制朝鲜和越南的共产主义,将近10万美国公民在战斗中丧失生命。这是继打败德国、日本和意大利所需的征服努力之后的延续斗争,那场世界范围的战争夺取了多达5000万人的生命。

现在,政客和学者一样经常宣称,大战变得过时了,战争为永久和平让路。但是,这不是第一次证明此类宣言是错误的。如果历史是某种指南,那么美国优势的终结将带来一个更加不

可预测、更加令人厌恶的世界。现在，虽然美国主导地位仍能提供相对稳定的全球环境，但却已经是为应对多极世界回归而开始构筑大战略的时候了。

精心制作新式美国国际主义也存在一个相似的机遇之窗。激进主义式的美国国际主义（activist brand of internationalism）继续使雄心勃勃的外交政策成为可能，但它不应该被看作是未来的先例。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外交政策仍旧受带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深刻记忆的老一代的严重影响，他们本能地知晓美国领导地位的重要性。但柏林墙倒塌之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并不如此。这一代对稳定的国际参与的渴求程度还不得而知。如果参与的成本提高，那么内向转变就会尤其可能，美国公众对于占领伊拉克所表现出来的不满就已经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尽管美国在进行反恐战争，但是乔治·布什总统任期的大致轮廓证实了美国国际主义的下降趋势。执政以来，布什大体上按照自己的承诺实施了一种更“谦卑”的外交政策，在决定这个国家的战争对象时更有选择性。在刚刚上任的前几个月，布什减少了驻扎波斯尼亚美军的数量，尽管战斗扩展到了塞尔维亚和马其顿，但科索沃的美军还是得到了严格控制。布什减少了美国旨在调节地区冲突的外交介入。而且布什政府还远离一系列多边承诺，热衷于与单边创意相伴随的自主权。

“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布什改变了路线，把外交政策作为头等大事。他发誓要把战争打到阿富汗之外，并且特别盯上了伊拉克、伊朗和朝鲜。他重新参与中东和平进程，任命安东尼·吉尼（Anthony Zinni）将军为他的特使。然而，布什上任前几个月的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基调还不应该被看作是流逝的风格。它们反映的不仅是其外交政策团队的偏好，而且也是其政治基础的倾向。布什争取得到的支持来自南部和山地西部的选

民,这些地区的人在美国国内相比沿海城市地区,总体上更缺乏对自由国际主义的热情。布什的核心选民都是由这些地区的人组成的,因此他有清楚的动机实行在这些地区具有支配性影响的更民粹主义和单边色彩的国际主义。并且总统本人在入主白宫之前由于得到了这些选区的欢呼致敬,已经早就表现出了对外交事务缺乏兴趣。

坦诚地说,孤立主义和单边主义好像同时重整旗鼓却是个难解之谜。至少表面上看,它们代表了截然相反的诉求,孤立主义要求解脱和避免参与,单边主义则支持不受约束的全球领导地位。但是,实际上它们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它们具有共同的意识形态来源,即美国惧怕因卷入而损害自由和主权。美国应该尽其所能规避国际参与,但是如果的确参与了,那么它就应该以一种保持国家自主权的方式参与。它们的另外一个共同来源是美国例外主义观念,美国例外主义不仅为使这个国家远离国际体系提供了推动力,而且也为按照美国观念重新创建国际体系提供了推动力。纯粹由于孤立主义和单边主义在美国的政治文化中如此根深蒂固,它们才对自由国际主义构成了双重威胁,诱使美国从全球舞台上后退,甚至当美国寻求以自己的意象重建世界时也是如此。

不论好还是坏,这种政治文化和民主的美国风格对外交政策活动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外交不再是穿梭于雾谷(华盛顿)、华尔街(纽约)和外国首都之间国际主义常春藤精英们的专署领域。“华盛顿环城公路之内”发生的一切仍然重要,但是亚特兰大、达拉斯、西雅图、硅谷、洛杉矶的决定与态度也很重要,并且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它们中的每一个都有自己独特的利益和独特类型的国际主义。地区分裂很难像美国早期那样唤起强烈激情。但是,地区界线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差异却再

一次开始在塑造美国对外关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美国人口的统计构成也在变化,它使外交政策的国内政治变得越来越复杂。先祖以效忠欧洲为主的选区,正在被连续不断的来自拉丁美洲和亚洲的移民,以及这些社区的高出生率所改造。到21世纪的下半叶,欧洲背景的高加索人占美国人口的比例将不足50%。如果要在种族混杂、地区利益各异的情况下形成一个连贯的外交政策,那么美国领导人就必须进行教育和说服,以为美国新的大战略奠定政治基础。

美国对国际经济的参与和接触虽然深刻而且广泛,但是它并不足以为这个国家充当全球战略卫士提供政治支持。美国建立广泛的海外军事职责和国际机构网络,不是为了保护市场,而是为了遏制共产主义。虽然常常打着贸易旗帜,但是经济利益和战略使命往往不分伯仲。在殖民时代,英国和法国当然从他们的海外领地榨取财富,但是他们也同样花费时间和精力瓜分非洲——尽管这样做的经济收益前景并不乐观。当政治和战略考虑需要有所作为时,同印度、波斯湾和印度尼西亚等地有利可图的商业联系很难让殖民军队无动于衷。

像此前其他大国那样,美国不必为了追求全球经济利益而维持全面的全球战略义务。美国的海外存在在某些地区仍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美国军队在东亚的前沿部署的确有助于维护和平,因此有助于形成有利的商业环境。美国军队在确保石油通过海湾运输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是,随着富有的欧盟成员国彼此享有长久和平,美国军队在欧洲的常驻并不是保护大量贸易和资本横跨大西洋健康流动所必需的。这种流动是有助于增加双方利益的结果,而不是美国在欧洲具有战略前哨的产物。此外,美国能够经受得住在海外市场的偶发挫折。虽然很难说这并不重要,但是,2000年美

国只出口了国内产品的10%左右，而且这些出口中的大约30%流向了加拿大和墨西哥，使北美即便在全球化时代达到了适当程度的商业自足。[34]如果政治和战略考虑迫使一个国家减少国际主义、远离国际制度，那么经济利益不会成为障碍。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会发现自己在恢复一个与冷战前时代相似的战略，偶尔在国外使用军事力量保护贸易和投资，但是仍不情愿接受更长久性的海外义务和制度牵连。

减轻负担，至少放弃过去60年来繁重的国际责任中的一部分，对于美国来说最终是可以理解的，也可能是有益的。产生这些责任的世界已经不在了，因此美国需要对战略作相应的调整。但是，鉴于在美国历史上一直发挥核心作用的孤立主义和单边主义天性，今天的领导人需要营造一种新的政治平衡，形成一种新水平的能够得到公众支持的美国对世界事务的参与和接触，即便程度有所减少。

为此，美国需要重建自由国际主义，以便指导美国不仅走向参与和接触，而且通过国际制度走向多边参与和接触。自由国际主义强调的观念是，同他国分享管理国际体系的权利和义务，它提供了一条介于孤立主义和单边主义两个极端之间的稳定的中庸之道，为美国立即抵制退却要求，同新兴权力中心不是斗争而是合作准备了政治基础。在从世界事务急速回撤成为可能之前，在单干冲动疏远潜在伙伴之前，美国需要发现这个新式国际主义。[35]

美国人当然不应该被要求承担比维护国际秩序的合理负担份额还要多的部分，也不应当被要求去为每一个和所有国际机构征求支持。一个过度雄心勃勃的外交政策，会激发国内对过多牺牲的反对，因而可能甚至比缓慢滑向孤立主义更为危险。毕竟，参议院抵制美国加入国际联盟，是由于伍德罗·威尔逊

(Woodrow Wilson)总统的过度伸张,他在没有足够政治支持的情况下坚持美国以一定水平和形式作出承诺。布什或许在伊拉克做了同样的事情。同时,美国人民不能允许自己坠向孤立主义,20世纪的历史再清楚不过地证明,当美国缩回到保护壳内时,地缘政治和经济动乱就会接踵而至。因此,挑战在于如何精心制作一个大战略,使美国国外参与的范围与公众对国际主义的兴趣维持一种适宜的平衡。设计这种远见卓识的大战略,并建构能够使之变为现实的新式国际主义,应该成为美国国家计划安排的重中之重。

虽然未来有可能是一个多权力中心相互竞争的世界,但是即将来临的多极时代可能具有自己独特的特征,与历史上的先例或许只是远亲式地相像。不久以前发生的很多变化使人们乐观地认为,即将开启的新时代将不像刚刚结束的旧时代那样充满血腥。国家不再因相同的动机参与掠夺竞争。他们现在通过发展信息技术和扩大金融服务,而不是通过武力征服和兼并土地与劳动力,来积累财富。核武器也提高了战争的代价。民主国家相比独裁主义前身更不具有扩张性,民主国家之间好像不会相互开战。或许将来的权力之极,只要它们是民主的,就会舒适地相互共存。

在这个意义上,美国时代的终结并不意味着回归到,例如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那样的,传统的均势体系。相反,它预示着向一个新的未知的历史时代发展,这个新时代将以一套新的潜在力量和新的博弈规则为指导。因此,弗朗西斯·福山是对的,他断言苏联的崩溃和自由民主的胜利构成了一个历史的终结点。当今时代的结束将不仅标志着美国优势地位的终结,而且标志着一个特殊的历史纪元——工业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和

民族国家的历史纪元——的终结。在很多方面,美国都已经处在现时代这些界定特征的最前沿。而且美国已经令人钦佩地成功完成了这些宏大的历史性计划,或者至少使它们达到了各自的最高形式。

然而,福山却错误地断定历史本身走向了终结。终结的只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而不是历史更为漫长的征程。历史的一个循环在结束,新的循环在开始。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时代的终结不仅代表着一个纪元的结束,而且代表着另一个纪元的开始。这就是为什么一本关于美国时代终结的书还必须讨论历史的再生问题。

坦诚地说,前瞻下一个历史时代是一件危险的事,因为它的重要建筑基石仍不明确、尚未成型。但是,端倪趋势是可见的。工业资本主义已经开始让位于数字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仍然走强,但是公民不参与、不接触和社会不平等正在形成越来越大的挑战。民族国家自下经受着人口变迁和地区分裂的非难,自上则经受着全球化和跨国一体化的侵蚀。由这些基本的出发点开始,新时代的轮廓将伴随新一轮历史循环得以展现。

## 注 释

1. ADM 116/3099, June 22, 1912, memo by Winston Churchill, pp. 2—3.(本章中所有档案文件的引证皆来自存放在位于伦敦西郊国立植物园的英国公共记录办公室的各种文件。ADM,CAB 和 WO 分别代表海军部、内阁和陆军部。)

2. J. H. Rose, A. P. Newton, and E. A. Benian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 1 (Cambridge: The University Press, 1929), p. 95.

3. 英国外交部备忘录,引自 Paul M.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British Naval Mastery* (London: Macmillan, 1983), p. 219。

4. 英国印度办公室图书馆,Curzon Papers, vol. 144, Godley to Curzon,

November 10, 1899, 引自上书,p. 211。

5. CAB 38/8/14, February 24, 1905, "Our Present Minimum Military Requirement," p. 1.

6. 1907年1月1日克劳备忘录,引自 Henry Kissinger, *Diplomac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4), p. 193。

7. 引自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British Naval Mastery*, p. 224。

8. CAB 24/107, June 9, 1920, "British Military Liabilities", pp. 1—2.

9. CAB 4/21/1087B, March 11, 1932, "Imperial Defence Policy", p. 2; CAB 2/5, April 6, 1933, Minutes of the 258th Meeting of the Committee of Imperial Defence.

10. CAB 16/111/120, June 20, 1934, "Disarmament Conference 1932", p. 2.

11. CAB 16/111/125, June 18, 1934, "Naval Defence Requirements", p. 1.

12. Grenfell, 引自 Williamson Murray, *The Change in the European Balance of Power*, 1938—1939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75。

13. WO 33/1004, January 10, 1922, "The Interim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National Expenditure", Doc, VII, p. 51.

14. Ironside, 引自 William R. Rock, *British Appeasement in the* 1930*s*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7), p. 46。

15. CAB 21/700, February 22, 1937, "Review of Imperial Defence", p. 12.

16. CAB 53/13, J. P.315, September 23, 1938, "The Czechoslovak Crisis", 引自 Murray, *European Balance of Power*, p. 209.

17. Martin Gilbert, *The Roots of Appeasement*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66), p. 186.

18. "Excepts from Pentagon's Plan: 'Prevent the Re-Emergence of a New Rival'", *New York Times*, March 8, 1992.

19. "Interview of the President by Wolf Blitzer, CNN Late Edition", June 20, 1999. Available at: http://clinton6. nara. gov/1999/06/1999-06-20-late-night-edition-cnn-interview.html.

20. "After Kosovo: Building a Lasting Peace", remarks delivered at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New York, June 28, 1999. Available at: http://www.cfr.org/public/pubs/AlbrightRem.html.

21. Richard Haass, 引自 Thom Shanker, "White House Says the U.S. Is Not a Loner, Just Choosy", *New York Times*, July 31, 2001。

22. Alan Sipress, "Bush Retreats from U.S. Role as Peace Broker", *Washington Post*, March 17, 2001.

23. David E. Sanger, "Bush Tells Seoul Talks with North Won't Resume Now", *New York Times*, March 7, 2001.

24. The United States Commission on National Security/21st Century, "New World Coming: American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 Available at: http://www.nssg.gov/Reports/NWC.pdf.

25. Tyndall Report, 引自 David Shaw, "Foreign News Shrinks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 *Los Angeles Times*, September 27, 2001。

26. Hall's Magazine Editorial Reports, 引自 James F. Hoge, Jr., "Foreign News: Who Gives a Damn?"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vol. 36, no. 4 (November-December 1997), pp. 48—52。

27. Pew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Press, "Public and Opinion Leaders Favor Enlargement", October 7, 1997. Available at: http://208.240.91.18/natorel.htm.

28. Gerard Baker and David Buchan, "American Isolationism Put to the Test", *Financial Times*, October 15, 1999.

29. 2001年9月14日,参众两院就授权总统"使用一切必要和适当武力"回击恐怖袭击的决议进行了表决。决议在参议院以98票对0票通过,在众议院以420票对1票通过。在2001年9月20日至23日举行的民意调查中,92%的公众支持对任何对恐怖袭击负责的人采取军事行动。参见"Poll Finds Support for War and Fear on Economy",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5, 2001。

30. Shibley Telhami, "The Mideast Is Also Changed",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9, 2001.

31. Francois, Heisbourg, "De l'apres-guerre froide a l'hyperterrorisme", *Le Monde*, September 13, 2001.

32. Adam Clymer, "A House Divided. Senate, Too", *New York Times*, De-

cember 2, 2001.

33. Powell,引自 Lawrence F. Kaplan, "Drill Sergeant", *The New Republic*, March 26, 2001. Available at: http://www.tnr.com/032601/kaplan032601.html.

34. 总出口数据来自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U.S. International Trade in Goods and Services, January 1998 to December 2000." Available at: http://www.census.gov/foreign-trade/Press-Release/2000pr/Final-Revisions-2000/exh1.txt. 出口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数据来自表 10 和表 10a,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U.S. 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s Account Data." Available at: http://www.bea.doc.gov/bea/international/bp-web/list.cfm? anon = 127。

35. 关于敦促美国人重归更孤立姿态的当代分析,参见 Eric A. Nordlinger, *Isolationism Reconfigure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for a New Centu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和 Eugene Gholz, Daryl G. Press, and Harvey M. Sapolsky, "Come Home, America: The Strategy of Restraint in the Face of Tempta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1, no.4 (Spring 1997), pp. 5—48。

# 第二章　美国新的世界地图

如果美国要有一个新的大战略，它必须首先有一个新的世界地图。绘制这张地图的任务必须始于提出主要原则和确认基本的将塑造新兴全球体系的地缘政治力量。本书的世界地图以现实主义——关于实力政策(realpolitik)和权力均势的逻辑——为理念主根。国家相互竞争的倾向是人性条件所固有的。它来自于基本的人性动力——寻求安全、财富和尊严。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人类组成民族国家和其他类型的共同体，于是这些共同体在相互关系中便展现出同样的基本动力。

现实主义解释了为什么各极之间的竞争是国际生活中最持久、最普遍的特征。它澄清了为什么今天的单极体系是一个相对稳定的体系——美国没有能够挑战其优势地位的对手。它说明了为什么一个在性质上更集体化、经济和军事上更强大的欧洲将必然会滋生地缘政治野心。而且，现实主义为本书的如下主张提供了基本原理，即，一个多权力中心世界的回归将不可避免地在相互竞争的极之间制造新的分裂带。

历史的砝码为以现实主义为原则绘制新的世界地图提供了主要理由。古往今来，国家之间相互角逐，如此持久、如此激烈，显示了现实主义逻辑的无可辩驳。坦诚而言，当今时代形成的趋势为乐观主义至少提供了某种空间，民主化和全球化可能有

助于抵制地缘政治对抗。然而,人类已经一再为战争的恐怖而抛弃和平的舒适,这使人很难接受这样的看法:现实主义以及由现实主义逻辑导出的争夺优势地位的竞争已经最终走到了尽头。

不过,本书在关键方面的确背离了其现实主义根源。国际舞台上的竞争可能是一种流行病,但是正确的大战略能够抵制体系的竞争本性。国际舞台的缺省状态(the default position)是一种为寻求安全、财富和尊严而进行对抗的状态。但是,领导才能和计划可以认识体系走向冲突的趋势,确认分裂带并在其爆发之前寻求修复,从而缓和并在某些情况下推翻现实主义逻辑以及由此而来的对抗。倘若未来没有过去那么多的血腥,那么现实主义可以而且必须由相信理智、法律、价值观和制度有潜力驯服物质力量的理想主义来予以调和。

当代欧洲是一个合适的例子。通过稳定的政治和经济统合进程,欧盟正在清除欧洲民族国家之间的分裂带,使欧洲大陆有望消除战争。虽然欧洲这方面的成功在世界上是稀缺罕见的,并且需要巨大的努力和相配的领袖,但是,它的经验为未来给出了一条前进之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人看到了面前的挑战,设计了未来的地缘政治地图,并着手使设想变为现实。他们做到了这一点,因为他们综合了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不仅赋予欧洲主要国家与其财富和军事力量相适合的特权,而且以一种用合作和互惠逻辑取代对抗逻辑的方式将这些国家彼此联结在一起。我的主要议题与此相同——形成关于新兴世界的精确地图,设计一个通过综合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来克服地图上分裂带的大战略,规划为实现这个大战略并建立一个新的、和平的国际体系所必须采取的具体步骤。

在开始做这项工作、根据这个理念基石规划地缘政治地图

之前,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形成于冷战初始期间的上一张美国世界地图。1946年,苏联的不妥协逐渐打破了罗斯福把战争时代联盟变为和平时代伙伴的梦想。莫斯科在东欧安置傀儡政权,企图控制达达尼尔海峡,让北部伊朗的苏联军队停留时间超过达成一致的最后期限,即1946年3月2日——所有迹象都预示着即将来临的麻烦。

美国战略家形成了什么样的指导性设想来应对苏联的所作所为呢?如果世界大部分地区将被并入两个敌对的集团,那么全球的哪些部分将同苏联站在一起,哪些部分同西方站在一起呢?美国是依靠军事力量遏制共产主义,还是由西欧和日本的经济复苏、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以及共产主义阵营内部的分裂担当此任呢?简言之,美国的上一张世界地图是什么样的?上述问题的答案将有助于说明我们今天手头的任务。

## 过　去

1946年2月22日,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由莫斯科大使馆向华盛顿发回了第551号电报。这封所谓的长电报,加上凯南第二年以"X"笔名在《外交》(*Foreign Affairs*)上发表的文章,为新的美国大战略奠定了基础,这个新的大战略的首要目标就是遏制苏联。[1] 凯南很快就离开了莫斯科,成为国家军事学院(National War College)的一名讲师。接着,1947年,国务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任命他为国务院政策规划司(Policy Planning Staff)第一任司长。政策规划司的设立很明显是为了帮助制订长期指导政策的核心原则。

在塑造新模板的过程中,凯南发挥了主导作用,这个新模板在1947年逐渐成形。它包括以下原则:苏联构成的威胁在性质

上主要是政治威胁。因此美国遏制共产主义最有效的方法是，恢复世界主要权力中心——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健康和政治自信。凯南写道，要战胜苏联，最终将依赖于“西方世界能够集结的凝聚力、毅力和活力的程度”。

凯南并不主张忽视世界其他部分。相反，共产主义政府向中国和东亚其他国家的传播得到了抵制。他相信，美国应该避免军事干涉亚洲大陆和其他欠工业化地区，而应该确保能够使用起飞远程轰炸机，保护全球海上航线的小岛和其他战略要地，如菲律宾、达达尼尔海峡、苏伊士运河、直布罗陀海峡、霍尔木兹海峡。有时候需要用军事和经济援助来支持对苏联扩张主义的防御。但是，用优势军事能力包围苏联需要过多的开支，并会加剧“俄罗斯传统的、天生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是“克里姆林宫对世界事务之神经质看法”的根源所在。[2]

因此，凯南的世界地图是多面的。核心的分裂带存在于苏联集团和工业化民主国家之间。维持对战略要地的控制，通过经济增长和政治信心使西欧和日本远离共产主义，能够确保西方坚持到底。同时，还有其他更微妙的分裂带，共产主义将最后无果而终。苏联体系内部的矛盾、广泛的共产主义集团内部的分裂、自然的民族主义的抵制力量将最终使西方有能力取得优势。

美国的大战略直到1949年底才以凯南的世界地图为指南。1949年8月苏联的原子试验、10月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以及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这三件大事诱使杜鲁门政府转向新的更加警惕的战略判断和设想。保罗·尼兹(Paul Nitze)于1950年接替凯南成为政策规划司司长，他是这张新地图的首席建筑师。他指导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NSC-68)的起草，这份文件成为取代“长电报”的

计划书,是美国理念库中决定性的一份文件。

尼兹的世界地图黑白分明。只有自由世界和共产主义世界,并且只有一条分裂带居于二者之间。美国不应该一直等到共产主义集团自行完蛋,不应该为它从自身内部腐蚀争取时间,相反,美国必须采取主动,以优势军事力量包围苏联。美国政府除了为维持传统军备大幅增加而分配必要的资源以外别无选择。正如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68 号文件所讲的:"美国军事能力和自由世界的建立是保卫美国免遭灾难的……前提条件。"[3] 莫斯科和北京不是彼此对立,而是在相互联合。"亚洲的发展变化证实存在着一个综合性计划,苏联和中国共产主义者在一起合作,打算在当前阶段将全部西方影响驱除出亚洲大陆。"[4] 而且,民族主义并没有成为扩展共产主义影响的限制因素,南亚国家有可能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陷落。"这些国家中任何一个丢失给敌人都几乎必然导致所有其他国家的丢失。"[5]1953 年成为国务卿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大胆地指出:"它的影响将不仅限于亚洲,而是会扩展到西欧和英联邦。"[6]

缘起于尼兹世界地图的大战略将在冷战的大部分时间指导美国的外交政策。美国向苏联展示了斗志。美国积聚超量的核武器,同时提高传统的军事能力,在苏联周边沿线组建联盟,在全球各地建立附属国,在朝鲜和越南进行代价高昂的战争。在 70 年代,华盛顿暂时后退,与苏联实现十年缓和,坚持更像凯南时代的战略判断。1979 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总统改变了路线。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总统继续,并对"邪恶帝国"(evil empire)保持一定程度的外交和军事压力,这使冷战很快又回到了狂热高潮。直到柏林墙的倒塌,美国才开始思考关于国际秩序的替代设想。

在冷战的漫长岁月,美国连续各届政府都通过煽动反共仇

恨——有时过分了——来确保美国人民愿意作出必要的牺牲。但是,由于有一幅清晰的世界地图和苏联这个咄咄逼人的敌人,美国领导人在反共战中几乎没有让公众参与方面的障碍。

冷战的结束并没有为关于凯南和尼兹的世界地图哪个正确的争吵定论。一方面,源于尼兹判断的强硬战略可能因加剧双边紧张而延长了冷战。或许,凯南的战略会更快暴露苏联体系的裂缝。另一方面,严格应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68 号文件的教条可能在说服苏联放弃战斗方面起了帮助作用,这意味着凯南的方法不够强硬,难以胜任。

这里的关节点不在于凯南或者尼兹谁是正确的,而在于他们每人都提出了清晰的让人信服的地图,该地图不仅用于指导大战略,而且用于获得必须的国内支持以使大战略有所收获。有时候,美国可能过于顺从苏联。其他时候,可能又被反共所蒙蔽,错失了利用共产主义集团内部裂痕的良机。但是最终美国取胜了,因为它知道要向何处去,并为达到目的地制定计划,开始旅程。

## 新的分裂带

必须承认的是,冷战期间构筑大战略的任务比今天要容易得多。单纯苏联的存在占据了思维的核心。共产主义威胁的紧迫性使战略设想的提出成为当务之急。而且这个威胁对美国的世界地图进行了自然的界定。世界的首要分裂带存在于德国的疆界之内。大西洋民主国家在它的西方,敌人在它的东方。世界大部分地区自动属于两个集团中的一个。当时战略家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厘清哪部分边缘地区重要,并确认最终会渐渐破坏苏联帝国的地缘政治趋势。

今天，没有主要对手或者决定性威胁为美国新的世界地图提供一个现成的起点。美国人有理由继续担心恐怖主义。但是这个威胁是捉摸不定、无影无形的，因此它只会使战略格局变得更模糊，而不是更清晰。恐怖主义的实施者是犯罪团伙，而不是国家。法律强制是比军事力量更有效的武器。技术的全面革新和工业时代向数字时代(digital era)的转换也使人很难从理念上把握哪种地缘政治力量现在占主导地位。在冷战期间，东西方之间的权力均势主要依工业产出和传统武库与核武库的规模而变化。目前，计算机病毒可能是比 F-16 喷气式战斗机更具潜能的武器。

然而，使严谨的大战略如此难以建构的相同条件却又使美国必须克服障碍，在确认世界新的分裂带方面取得进展。冷战期间，美国在塑造世界方面并没有巨大的自由度和灵活性。苏联占领了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自由民主政体占据了北美、西欧和日本。除了在周边作一些瓦解工作，西方并没有太多的作为。现在，全球体系是流动和延展的。未来十年华盛顿作出的决策有可能为下一个世纪，如果不是更长远的话，指明路线。

旋风速度的技术和经济变迁也有同样的潜力。它们使世界地图难以制定。但是它们也给美国提供了史无前例的影响力和治理的新工具。无论通过领导北约进入新的战斗、在互联网上散布信息、管理资本的国际流动，还是通过控制利用世界主要国际制度，美国总体上都能发号施令。这种影响力既带来了极大机遇，也带来了重大职责。

我们将通过考察已经由其他学者提出的备选方案来开始建构新的世界地图的工作。虽然美国政府和公众都对此漠不关心，但是几位美国战略家却尝试着勾画新的全球环境。考察这些不同洞见并揭示其长处与弱点，为探索美国大战略和我们向

何处去提供了一个恰当的出发点。

迄今为止，美国知识分子已经提出了五种备选的世界地图。弗朗西斯·福山，现为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院教授，于1989年正当冷战走向终结之际开始了讨论。他在《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上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文，并随后出版了《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一书。[7] 福山宣称，苏联的衰亡和民主的胜利正在使历史走向终结。他认为，世界正在到达一种终结状态，志同道合、温文尔雅的民主国家将一同建构稳定、和平的全球秩序。与此同时，主要分裂带将出现在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之间。福山建议，美国外交政策应集中精力在世界范围内促进民主，同时避免发生在分裂带沿线的冲突。

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芝加哥大学教授，随后也提出了关于冷战之后新兴秩序的看法。他在1990年分别于《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和《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发表了两篇文章，"为什么我们会很快怀念冷战?"和"回归未来:冷战后欧洲的不稳定"。[8] 米尔斯海默提出了一个比福山更悲观的判断。他悲叹东西方冲突的消逝，认为东西方冲突形成的两极权力分配在维护几十年和平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苏联军队由东欧的撤出、华沙条约的解散、以及随后美国在欧洲战略作用的减少，将导致新的横跨欧洲大陆的对抗。随着多极的回归，欧洲的未来将类似于它那不幸的过去，分裂带将重新出现在民族国家之间。稳定的最佳希望在于，通过控制之下的核武器扩散加强对侵略的遏制。米尔斯海默对东亚的判断同样悲观。

哈佛大学塞缪尔·亨廷顿教授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此文备受关注，1993年发表在《外交》上——并随后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9] 亨廷顿宣称，未来的

主要分裂带将出现在世界主要文明的十字路口。不同的文化对于国内和国际秩序具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因此，它们注定要发生冲突。根据亨廷顿的世界地图，四大集团（犹太-基督教、东正教、伊斯兰教和儒教）将为主导地位而展开竞争。他建议，美国和欧洲一道为迎战其他文化做好准备。

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和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虽然分别工作，但却一同提出了关于未来关键分裂带的第四个论点。肯尼迪在"一定是余下世界对抗西方吗？"一文中最精炼地阐述了自己的看法，该文与马修·康内利（Matthew Connelly）合写，1994年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10]卡普兰也对这个问题发表了他的最初陈述。他1994年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即将来临的无政府状态"一文，后来又以同一标题扩展成一本书。[11]根据肯尼迪和卡普兰的世界地图，地球将沿着社会经济线区分。富裕、健康的工业化国家将组成一个集团，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将构成另外一个集团。主要的分裂带将出现在它们之间。繁荣的北方国家尽管尽其所能也不能使自己远离南方的动荡。难民、环境灾难、传染病的扩散、犯罪和腐败、以及衰败的国家，最终会对甚至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构成威胁。富裕国家必须及早努力阻止这场恶梦，否则他们就会被动荡所蹂躏。

《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报纸专栏和1999年出版的《凌志车与橄榄树》一书中，把全球化确认为新世纪的主导性地缘政治特征。[12]弗里德曼认为，全球商品、资本和生产市场的扩展已经改变了世界，迫使所有国家都必须按照相同的规则进行博弈。市场将回报那些实现经济自由化和民主化的国家。相比之下，市场将恶待那些试图对经济和政治生活维持集中控制的国家，惩罚其证券市场、货币和社会。依据弗里德曼的世界地图，未来的主要分裂带将出现在遵守全球化

数字经济之规则的国家与对抗这些规则的国家之间。每个家庭拥有个人计算机的数量，而不是国家武器库中坦克和飞机的数量，将决定国家在哪些方面适合新兴地缘政治体系。

下面让我们更仔细地考察一下这些彼此不同的世界地图。

根据弗朗西斯·福山的分析，历史一直在稳步向前发展。虽然历史发展也有退步的时候和偶尔的曲折或转向，但是，每一个新时代都倾向于建立在上一个时代的成就之上，使生活质量有所改善。科学和技术发现是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主要源泉。蒸汽机、青霉素、电脑芯片、互联网，这些发明都使人类物质康宁的重大改善成为可能。

然而，人类追求的并不仅仅是物质安乐，还有精神安乐。精神康宁的表现形式为尊严或者自尊的承认——自尊就是亚里士多德指称的"气魄"(thymos)。即使当科学进步带来更多的财富和安乐时，人类仍在继续为承认和尊严而斗争。在福山看来，这种追求"气魄"的驱动力是历史之血腥痕迹的主要原因。对威望和地位的探求已经一再使国家之间陷入可怕的争取优势的竞争之中。在国家内部，奴隶和农奴也为反抗剥夺其尊严和自主的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而斗争长达几个世纪之久。

对于福山来说，自由民主代表了政治的终结状态，因为在设计上自由民主赋予了个人从古至今一直在追求的自尊。投票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制化的自由，这些都是自由民主的特征，这些特征使自由民主成为"人类意识形态进化的终点"和"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13]人类不必再为尊严而斗争，因为相互承认是自由和民主秩序的核心。

福山在宣称苏联共产主义的崩溃和民主的胜利象征着历史的终结时，他援引了 19 世纪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黑格尔

(Friedrich Hegel)的著作。黑格尔从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中已经预见到了历史的终结。根据那两场姊妹革命及其形成的新的政治体系,“黑格尔断言,历史走到了尽头,因为驱动历史进步的渴望——为承认而斗争——现在已经在以普遍承认和相互承认为特征的社会中得到了满足。其他人类社会制度的安排都不能更好地满足这种渴望,因此进一步进步的历史变革是不可能的。”[14]如果美国和法国革命开始了历史的终结,那么当今时代则代表着这个终结过程的结束。

从历史的终结发展到美国新的世界地图,福山转而求助于另一位著名的德国智者——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康德认为,共和政府的兴起为在世界各国之间建立持久和平提供了美好前景。代议政府和对战争的普遍反对将对侵略行为形成遏制。康德还相信,民主国家就好像家庭成员,彼此间会形成自然的亲情。

当代学者,福山是其中之一,已经非常熟悉了民主国家之间很可能可以和平共存的观念。所谓的民主和平论的逻辑同历史终结的逻辑很相似。[15]正如一个自由民主国家能够自然而然地满足其国民对尊严的渴望,自由民主国家之间也能够自动彼此赋予作为持久和平基础的承认和相互尊敬。为威望和地位而进行的战争将会只出现在历史著作中。用福山的话讲,“自由民主使要求承认比别人更伟大的非理性欲望被要求承认平等的理想欲望所取代。于是,一个由自由民主国家组成的世界应该具有极少的战争动机,因为所有国家都相互承认彼此的合法性。”[16]

这样,福山就把世界划分为两个国家组合。一个组合由自由民主国家构成,这些国家已经实现了历史的终结,彼此之间不再参与战略竞争。在世界的这个后历史(posthistorical)部分,“国家之间互动的主轴将是经济,实力政策老规则的相关性将越来

越小……后历史世界虽然仍然区分为民族国家，但是其互不相干的民族主义将与自由主义和平共处，并将越来越仅仅表现在私人生活领域。”[17]在民主国家大家庭内部，对抗和竞争的传统地缘政治已经一去不复返。

地缘政治划分的另一个组合将是非民主国家。在他们彼此相处和与自由民主国家相处的过程中，这些国家将停留于过去，仍受制于对威望和地位的探求，他们将依旧卑劣、险恶、固守传统实力政治的规则。因此，福山认定，世界新的分裂带存在于后历史世界（民主世界）和历史世界（非民主世界）的交叉地带。尽管自由民主在发展、民主和平的区域在扩大，但是“这决非意味着国际冲突本身的终结。因为彼时世界将被分割为两个部分：历史部分和后历史部分。仍停留于历史中的国家之间，以及这些国家与处于历史终结的国家之间，依然可能发生冲突。”[18]

根据福山，美国大战略的头等大事应该是扩大民主，藉此消除世界惟一现存的分裂带，完成使历史走向终结的过程。扩展全球市场和用经济自由化推动政治民主化为完成这一任务提供了最佳前景。与此同时，美国及其民主弟兄即使在后历史时代享受生活的时候，也应该对来自仍停留于历史中的国家的潜在威胁保持警戒。

福山认为，有两种发展具有改变世界地图并使历史重新运转的潜能。自由民主国家的国民可能会最终发现历史的终结不仅是无聊的，而且是同质的，迫使他们去寻求新的挑战。对尊严和自尊的追求对于人类经验来说可能是无法满足的和最基本的。除了完成历史的满足感，没有斗争的生活可能只是使生活变得陈腐乏味。此外，科学的前进和改变基因密码的生物技术手段的发展可能改变人类，并改变塑造人类行为的驱动力。[19]如果科学改变了人类本性，那么所有的断言都将不再有效。福山

相信，除非发生了上述极为激进的变化，否则民主将会继续得到传播，历史的终结将会拉近，所有地缘政治的世界地图都将归入已被抛在身后的废墟之中。

米尔斯海默是一位铁杆现实主义者，矢志不移地坚称“军事实力的分配和特点是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根源”[20]。他认为，导源于冷战结束的实力分配将最终导致多极世界的回归。由于没有主要对手迫使美国进行全球参与，美国会最终由欧洲和亚洲撤出，并在这两个地区造成新的对抗。[21]德国将再一次作为主导国家在欧洲崛起，它在寻求填补俄罗斯退却后在东部留下的真空时将打破邻国的平静。关于边界和少数民族问题的争论将在中欧地区爆发，受影响的国家将向外寻求帮助，并因而具有“将主要国家拖入其地区冲突的强烈动机”。米尔斯海默断言，民族主义情结有可能被重新唤醒，加速使欧洲回归到“曾经在过去催生强烈的侵略动机的国家体系”[22]。他预见，相似的国家对抗的回归也会出现在东亚地区。

米尔斯海默之所以悲叹冷战的结束，是因为他认为东西方对峙形成的两极本质上比随后即将形成的多极世界更稳定。他提出三点主要理由支持对两极的偏爱。两个集团的世界只有一条分裂带，而多个集团的世界将有好几条分裂带。两极倾向于在固定的联盟之间形成大致的力量平衡，而多极却在变换不定的联盟之间造成力量的不平衡。而且，两极体系不像多极体系那样复杂和不可预测，有助于减少误算误判和意外冲突的可能性。

1945 年以前的国际体系内频繁爆发的战争，主要是“多极以及多极体系中经常出现的主要国家之间实力不平衡”的产物。[23]因此，从米尔斯海默的观点来看，东西方分裂的结束和多

极世界的回归并不是好消息，这解释了为什么他警告说“我们会很快怀念冷战”。他的未来地图更像前冷战时代的地图，分裂带出现在世界主要民族国家和变得更加倾向于冲突的国际体系之间。

米尔斯海默斥责福山以及其他“认为欧洲国家之间现在根本不可能爆发武装冲突”的人“对未来抱有毫无根据的乐观主义幻想”[24]。他认为，并不存在充足的历史证据支持民主国家不会彼此开战的断言。米尔斯海默还从理论基础上对所谓的代议政府与和平行为之间的联系提出了挑战。他说：“普通大众，无论是否来自民主国家，都可能变得具有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或宗教热情，这使他们倾向于支持侵略，并对代价问题漠不关心。”[25]

米尔斯海默认为，欧洲统合之所以可能，主要是由于苏联的威胁和美国对西欧的抚慰效应，有鉴于此，他对认为欧盟将维持欧洲主要民族国家之间协调的观点也进行了反驳。“如果没有共同的苏联威胁或美国守夜人，西欧国家将做他们在冷战开始前几个世纪所做的一切——带着永久的怀疑彼此观望。”[26]美国对欧洲兴趣日益淡化的结果，远不至于使欧洲国家走到一起，欧盟将会分裂，“德国、法国、英国，可能还有意大利，都将攫取主要国家地位。”[27]

面对这种并不愉悦的未来前景，米尔斯海默强烈要求美国寻求把维持冷战对抗——即便较低程度的敌对——作为延续两极的手段。由于意识到这样的建议很难说服决策者，于是他提倡，为了通过加强对侵略的遏制来稳定多极，应该实行控制之下的核武器扩散。米尔斯海默劝告说：“扩散应该理想地在德国逗留”，因为“德国毫无疑问会因没有核武器而感到不安全，而如果它感到不安全，那么它威严的传统力量就会给它提供极大的能力来扰乱欧洲的安宁。”[28]然而，如果不能限制扩散，那么美国和

其他核国家就应该为那些寻求发展安全核能力的国家提供技术援助。米尔斯海默还建议,美国和英国应该维持传统武力,以便在需要"积极有效地打击任何出现的侵略者"时随时准备干涉欧洲大陆。[29]

塞缪尔·亨廷顿虽然并没有预言传统民族国家之间对抗的回归,但是他却赞同米尔斯海默对未来的悲观主义。与福山一样,亨廷顿也是美国式自由民主的拥护者,并认为它会青春常驻。但是对于西方价值观和政治在其他地区的吸引力,他却与福山分道扬镳。亨廷顿并不把自由民主的魅力看作是普世的,而是认为非西方文化将开辟自己的道路,并渐渐憎恨美国根据自己意象重建世界的努力。这些国家不是加入走向自由民主的大潮,而是联合起来一起反对西方。文化分界线将会变成地缘政治分裂带。等在前面的是"文明的冲突",而不是"历史的终结"。

依据亨廷顿的观点,文明是"人类的最高文化归属,人类所需的文化认同的最宽泛层次,人类以此区别于其他物种"[30]。文明和文化都指人的总体生活方式。作为同一文明的组成部分,个体分享共同的价值观、规范和思维方式。尽管文明随着时间而改变,但是文明具有引人注目的活力,是"最持久的人类联合形式"。[31]今天,世界上的人属于八种主要文化组合:西方文化、儒家文化、日本文化、伊斯兰文化、印度文化、斯拉夫-东正教文化、拉丁美洲文化和非洲文化。亨廷顿警告说:"未来最重要的冲突将沿着使这些文明彼此区分开来的文化分裂带发生。"[32]

亨廷顿认为,由于以下两点原因,文明具有日益提高的地缘政治意义。第一,冷战的意识形态分歧已经完全消失了,更根本的、被世界划分为两大对抗集团所模糊的文化分歧开始显露出

来。用亨廷顿的话说,“文化的天鹅绒幕”正在取代“意识形态的铁幕”。[33]随着冷战的意识形态束缚成为过去,植根于文化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成为国家及其人民的指南。而他们的文化模板在不同文明之间具有极大的差异。被西方珍视的潜在价值观——自由、个人主义、宪法保护、人权——在世界上大多数其他文明中并不存在肥沃的土壤。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是截然不同的。

第二,全球发展趋势正在使文明彼此对立,而不是走向联合。经济现代化、互联网和全球市场可能在改善世界很多地区的生活水平。但是,全球化及其带来的变革步伐也在使人迷失方向、流离失所。随着世界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快,人们感受到了陌生环境的威胁。为了找到支撑,他们求助于靠近故乡的传统,从而导致了宗教复兴和落叶归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穆斯林世界的吸引力、东南亚国家对“亚洲之路”的发现、俄国对“欧亚”认同的扶植,这些都是文化与政治之间联系正在走向复兴的迹象。在未来岁月,全球化肯定会加剧这种向文化和宗教的回归,使“文明的冲突主导政治”成为不可避免。依据亨廷顿的世界地图,“文明之间的分裂带将是未来的战斗地带。”[34]

亨廷顿认为不同文明之间不仅注定发生冲突,而且尤其与西方文明发生冲突。这个判断加重了亨廷顿暗含的悲观主义。西方文明不仅是最强有力的文明,而且也是试图将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强加给所有他人的一种文明。“西方将其民主和自由主义价值观当作普遍价值观推销的努力、维持军事优势地位的努力、以及提高经济利益的努力,将引起其他文明的反击。”[35]亨廷顿尤其担心儒教社会和伊斯兰社会之间的联结。如果崛起的中国同伊斯兰世界反西方政权结成联盟,则可能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组合。亨廷顿警言:“在最近的将来,冲突的核心焦点将出

现在西方与几个伊斯兰—儒教国家之间。”[36]

根据亨廷顿的建议，美国发展大战略的宗旨应该是，保护西方，反对所有挑战者，同时寻求阻止发生在主要文明分裂带的冲突。“西方的生存取决于美国人重新确认他们的西方认同，西方人接受他们的文明是独特的而不是普遍的，并联合起来复兴西方使之免遭来自非西方社会的挑战。”[37]为了抗击新兴的儒教—伊斯兰联结，亨廷顿要求美国限制中国和伊斯兰国家的军事力量，抓住机遇对这两个文明之间的政治和文化分歧加以利用。同时，美国还应更多地理解其他文化，“每一种文化都必须学会与其他文化共存”。[38]文明毕竟是持久的和顽固的，文明之间的分裂带不会自行消失。尽管还很遥远，但是美国的最佳希望在于，它们能够相互容忍、和平共存。

保罗·肯尼迪和罗伯特·卡普兰是不大可能的同路人。作为著名的耶鲁大学学者，肯尼迪是世界上研究大英帝国外交和军事历史的专家之一。他写作过很多部学术专著，包括畅销书《大国的兴衰》。与肯尼迪令耶鲁高雅学院的会议室熠熠生辉不同，罗伯特·卡普兰则漫游于地球上最贫穷地区的肮脏棚户区。无论发自非洲、中东、欧洲，还是亚洲的报告，他都记录了无产者、病患者和绝望者的境况。卡普兰的著名游记，如《巴尔干幽灵》和《地球的终结》，一直得到广泛好评。[39]

尽管肯尼迪和卡普兰有很多不同，但是他们对于美国新的世界地图应该为何却提出了相似的看法。二人都把新的分裂带确认为北方富裕国家和南方贫穷国家之间的分野。根据肯尼迪（及其合作者马修·康内利），我们正在走进“两个‘阵营’的世界：北方和南方，它们相互隔离而且不平等”。分裂带的一侧是“相对数量较少、富裕、满足、人口发展停滞的社会”，另一侧则是“大

量、贫穷、资源枯竭、人口每25年或者更短就翻倍的国家……随着此类地区鸿沟或大陆鸿沟日渐加大，分别处在两侧的国家之间如何彼此相处……将使全球事务中的任何其他问题相形见绌”。[40]而且对于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肯尼迪决不乐观。他警告说：“发生在地球一部分地区的人口爆炸和发生在另一部分地区的技术爆炸，并不是维持稳定的国际秩序的灵验秘诀。”[41]

卡普兰也预见到了“北方和南方之间”的分裂带，以及“一个分裂的两个世界，一个是像我们这样的、提供余下世界所需商品和服务的社会，另一个是陷于各种形式动荡困境的社会。”[42]为了有助于描述其新的世界地图，卡普兰引用了政治学家托马斯·弗雷泽·霍默-迪克逊(Thomas Fraser Homer-Dixon)的论述：“想象一下一辆加长的豪华轿车行驶在纽约市无家可归乞讨者居住的坑坑洼洼的街道上。豪华轿车里面是北美、欧洲、新兴环太平洋、以及其他一些孤立地区的空调化后工业区域，他们拥有贸易峰会和计算机—信息高速公路。轿车外面则是余下的人类，他们在走向另外一个截然不同的方向。”[43]

虽然北方富裕国家可能会认为他们可以对南方的贫穷国家置之不理，但是肯尼迪和卡普兰却不以为然。在以下降螺旋滑进饥荒、疾病和犯罪直至最后崩溃的过程中，南方国家不仅不会从地缘政治地图上消失，反而会对工业化国家构成主要的战略威胁。关于现在仍为社会经济鸿沟的东西将如何很快演变成地缘政治分裂带，肯尼迪和卡普兰给出了几个论据。

肯尼迪，至少在他的第一个具体化阶段，在“一定是余下世界对抗西方吗？”一文中，表达了对大规模移民的极大担忧。人口会继续膨胀，并很快使当地资源难以承受，使环境急剧退化。随着很多非洲国家生活条件的恶化，居民将收拾行囊、背井离乡。他们会向北进发，因为那里有食物、水，而且至少就他们所

能讲出的而言，还有拥有汽车和房子的希望。不论通过救生筏、公交车、货舱，还是步行，他们都一样会来，而且成千上万地来。工业化国家将只有两个选择：或者被蹂躏，或者使用武力抗御移民浪潮。用肯尼迪的话讲就是："如果大规模移民不会使我们全部屈服，那么富人将不得不战斗，穷人将不得不死亡。"[44]

在肯尼迪的第二个具体化阶段，他以及合作者罗伯特·蔡斯(Robert Chase)和埃米利·希尔(Emily Hill)对于即将来临的成群结队的难民前景好像少了一些惊恐。肯尼迪转而集中关注伴随地区国家——即所谓的中枢国家(pivotal states)——崩溃而来的辐射性不稳定浪潮。中枢国家是指大而且地处中心地带的国家，如果它成了内部动乱的牺牲品，那么它就会成为"不仅决定本地区命运，而且影响国际稳定的热点。"[45]国内动乱的潜在根源是我们熟悉的那些——人口过剩、移民、环境退化、流行病和犯罪。有资格成为中枢国家的有墨西哥、巴西、阿尔及利亚、埃及、南非、土耳其、印度、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如果这些国家中的一个或多个崩溃了，那么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承担不起消极观望的代价，其战略后果将是极其重大的。因此，肯尼迪将南方—北方分野划定为未来的地缘政治分裂带。

卡普兰提出的即将来临的无政府状态也将以相似的方式来临——大规模移民和源自崩溃国家的辐射性不稳定。卡普兰把猖獗的犯罪活动和环境稀缺(水资源的短缺将尤其尖锐)指认为罪魁祸首。正如他指出的，"罪责难逃的无政府状态"在地平线上隐约可见，环境是"21世纪初期的惟一国家安全问题"[46]。与这两种因素混合体一道的，还有新的恶毒的宗教和种族极端主义分支，其结果不仅使第三世界陷入动荡不安，而且使其愤怒并寻求报复。因此，卡普兰式的无政府状态具有亨廷顿式的、反对西方的弦外之音——可能最好称其为"有倾向性的无政府

状态。”

至于政策药方，肯尼迪认为，如果美国及其主要伙伴紧急行动起来，他们很可能能够阻止南方陷入动荡的深渊。足够幸运的生活在北方的国民必须说服他们的领导人“认识我们全球问题的巨大的、彼此关联的性质，充分利用人类匠心、机智和活力的每一个要素减慢，如果可能的话阻止世界范围内人口和环境压力的累积”。[47]美国应该发挥领导作用制定一个新的北方—南方协定。该协定的主要成分应该包括扩大对南方的经济援助，对新能源和食品生产开展研究，改进整个第三世界的家庭计划和医疗保险的使用，使联合国成为更有效的预防和制止冲突的工具。

卡普兰对于经济援助的收益持更加怀疑的态度。他坚称：“发展援助很少能够显著改变历史。认为援助能够从根本上改变南撒哈拉非洲……相当于采取了一种在有限的知识精英之外很少有人能够接受的立场。”[48]不过，卡普兰的确认为，援助有时候能够有所改变，即使不能有所改变时，它也能够“帮助我们作为一个更加相互关联的世界里的一个国家进行自我再造”。[49]他还认为，美国应该付出更多努力在第三世界发展早期预警机制。处理危机的最佳时机是在危机开始之前。但是，当预防性措施失效时，对于直接卷入，美国应该非常谨慎。只有在极端情况下，当战略利益很高而且可能的代价很低时，美国才能准备进行军事干涉。卡普兰提出忠告说：“我们必须维持接触，但要在严格的界限内。”[50]

托马斯·弗里德曼已经成了全球化的美国先知。他利用《纽约时报》外交事务专栏作家的身份向读者传递了的一个主要信息是，数字时代伴随着市场的扩展正在改变国际体系。

像福山一样,弗里德曼基本上看好未来以及全球化促进繁荣、民主与和平的潜能。在《凌志车与橄榄树》一书中,他解释说:“冷战体系的象征是将所有人分割开来的一堵墙。全球化体系的象征则是一个将所有人联合起来的世界广域网(world wide web)。”通过迫使国家如果想要繁荣就必须按照同一规则行事,全球化塑造了“事实上所有国家的内政与外交。”市场开放、政治清廉的国家将会走向兴旺,而余下国家将被全球经济抛在后面。

根据弗里德曼,全球化是“市场、民族国家和技术的不可抗拒的统合,达到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程度”[51]。全球市场和作为基础结构的数字技术(比喻为凌志车)并不是塑造国际体系的惟一力量,人民和国家(比喻为橄榄树)之间的传统争论仍然发挥作用。但是,归根结底全球化将是个“重大因素”,是新时代的界定性特征。用弗里德曼的话讲:“全球化并不是影响今日世界事务的惟一因素,但是在存在一个北极星和世界性塑造力量的范围内,全球化就是这个体系。”[52]

国际金融专家和公司经营主管——弗里德曼所指称的“电子族”(electronic herd)——是主要施动者,通过他们,全球商品和资本市场正在改变国家及其彼此互动的方式。发挥作用的机制很简单。国家如果想实现繁荣,就需要吸引国际资本。在决定是否对一个具体国家投资方面,所有电子族真正关心的是,“你的国家在内部是如何进行有线联系的,能够运转的操作系统和软件处于何种水平,以及你的政府能否保护私有财产”。[53]如果一个国家通过了这个测试,那么电子族就会通过简单的击键为其提供发展所需的资本。如果一个国家没能通过这个测试,那么它最好小心提防。某一天,马来西亚备受新兴市场共同基金的宠爱。但是,第二天,当投资者争先恐后出逃时,其货币就会进入事实上的自由落体运动。电子族行动迅

速，而且残酷无情。

弗里德曼认为，全球化正在为所有国家穿上"金色紧身衣"(golden straitjacket)，鼓励他们遵守开放商业惯例、采取标准会计程序、打击腐败、走向自由民主。电子族对于那些穿上金色紧身衣并准备舒适合身的国家会露出仁慈的微笑，而对于那些抵制的国家则进行无情的惩罚。没有人能够逃脱不可抗拒的全球化逻辑以及随之而来的金色紧身衣。弗里德曼警告说："倘若你的国家还没有被穿上一件合适的，那么它很快就会的。"[54]

弗里德曼对于全球化问题的讨论同很多文献对于国际制度能够推动趋同和合作的讨论有很多相似之处。弗里德曼认为市场为统合提供了主要的推动力，制度主义者更多地聚焦于像北约、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这样的机构，诱使国家选择相容路径的能力。一些学者集中讨论制度锁定国际协议并惩罚那些未能履行承诺的国家的能力。[55]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对国际组织的共同参与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够形成共同的规范，并推动跨国联盟的发展。[56]还有一些人把制度看作是使用"软权力"——即扩展文化影响——的媒介。[57]这种关于合作与和平来源的看法，对制度全球化的强调多于对市场的强调。但是，正如在弗里德曼的世界地图上所显示的，其核心观念是，全球网络有能力涵盖国家，并对国家施加影响使之具有遵守共同规则的强烈动机。

全球化的影响并不限于有能力使所有国家在表象和行为方面或多或少相似。金色紧身衣还具有潜在的地缘政治意义。下面让我们进入弗里德曼"冲突预防的金色拱门理论"(golden arches theory of conflict prevention)。在电子族以其方式同一个国家打交道之后，那个国家将不再有兴趣同他国进行战争。弗里德曼写道："当一个国家达到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中产阶级大

到足以支持麦当劳网络，那么这个国家就会变成一个麦当劳国。麦当劳国内的人民再也不喜欢打仗了，他们宁愿排队等候汉堡包。”福山预见的是民主和平，而弗里德曼依赖的是资本主义和平。它的前提假设是，全球化“相比当代历史的任何以前时代都在很多方面增加了不再进行战争的动机，并提高了走向战争的成本”。[58]

弗里德曼认识到，并非所有国家都将按照这个博弈计划行事。尽管可能面临着被电子族惩罚的前景，但是仍有少数国家抵制全球化。某些国家发现全球化严重威胁着传统文化，于是坚决主张反对全球化。其他国家会拒绝实施必要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因为这些改革破坏了他们赖以维持统治的腐败官员和亲朋好友的权威。一个新的地缘政治分裂带将至少暂时地出现在利用全球市场优势的国家与通过拒绝自由化来抗击全球市场的国家之间。弗里德曼解释说：“今天，已经不再有第一世界、第二世界或第三世界。现在有的只是快世界和慢世界。快世界是指广阔开放的平原世界。慢世界是指那些或者跌入路旁，或者选择远离平原、生活在某种自己人为地用围墙与外界隔离开来的峡谷中的人的世界，因为他们发现快世界太快、太令人提心吊胆、太同质化、或者要求太高。”[59]

然而，弗里德曼自信地认为，这些娇生惯养的人将最终成为信息高速公路上的“劫路杀手”。“自由市场是剩下的惟一意识形态替代物。同一条道路，不同的速度。但只有这一条路。”[60]因此，全球化将最后产生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居住的只有高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的、精通互联网的、民主的国家，他们全都追求共同的利益。

弗里德曼还认识到，全球化能够在国家内部导致第二条分裂带。融入全球经济将造成胜利者和失败者，那些驾御互联网

的人将走向成功,而那些单纯观望的人则滋生更多的怨恨。结果可能是"在支持全球化者与反对全球化者之间爆发内战,在每个社会的全球主义者与每个社会的地方主义者之间爆发内战,在变革的受益者和新体系的受益者与那些感到被新体系抛弃的人之间爆发内战"。[61]此外,"获得超凡能力的愤怒者"很可能使用互联网传播毁灭性的电脑病毒,利用恰恰他所憎恨的体系将这个体系摧毁。2001 年 9 月的恐怖袭击证实了弗里德曼的最糟担忧:"获得超凡能力的愤怒人群……把我们最先进的民航飞机变成了人类指挥的精确制导巡航导弹——他们的狂热和我们的技术进行了恶魔般的结合。"[62]

但是,弗里德曼乐观地认为,好的政策能够治理这些威胁。通过在凌志车和橄榄树之间找到合适的平衡——创建社会安全网、使国家能够在融入全球经济时保留他们的文化、保护环境——国际社会应该能够获得全球化的成果,而不必承担其潜在代价。

## 美国单极时刻的终结与新的世界地图

福山、米尔斯海默、亨廷顿、肯尼迪、卡普兰和弗里德曼为了帮助美国在新的、不确定的时代确定方向,已经对今天的大问题进行了努力思索和刻苦斟酌。但是,他们的世界地图却是误导性的——或者至少是太过短命而不值得依赖的。虽然他们每一个都抓住了当前国际体系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他们在试图确认未来的关键分裂带时却都未能一语中的。米尔斯海默停留于过去,提出的设想忽略了全球政治正在发生的深刻变革。其他人则停留于现在,提出的设想只是对转瞬一刻的短暂一瞥,因为他们未能理解他们的地图只是今日世界之单一根本特征,即美

国实力优势的副产品。

根据本书的世界地图，美国的主导地位是当前地缘政治环境的核心特征。国际体系的特点是由权力的分配以及存在的相互碰撞的极数塑造的。大国在本性上为获得优势而竞争。美国力量的范围和领域意味着世界上现在只存在一极。因此，为获得优势的竞争并不存在。恰恰由于这个原因，单极比其他所有替代选择都更稳定、更不具有战争倾向。正如很多国家经常提醒美国的那样，单极并不利于一个特别的平等主义的世界，有时还充满暴力。但是它却能够预先阻止大国对抗，这对所有国家都是有益的。

毕竟，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战争发生于彼时大国沉迷在战场上争夺优势之时。单单上个世纪的血腥记录就足以说明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导源于德国要在多极欧洲实现霸权。第二次世界大战导源于同样的动力，例外只是日本的崛起意味着冲突还吞没了东亚。冷战是关于两个主要集团为地位而进行的明争暗斗。从古至今，没有任何东西比在决斗的权力中心之间维护和平的挑战更一以贯之地折磨着政治家了。

相比之下，单极时刻伴随的是历史上最和平的几个时期。罗马的优势地位给欧洲和地中海盆地带来了长达几个世纪的和平。当然，罗马军团在扩展帝国前线时进行了大量屠杀。但是当时罗马主宰的范围却预先制止了潜在竞争者。结果是，欧洲经济和文化生活获得发展。与 19 世纪英国霸权相伴的是相似的和平和繁荣时期。国际对抗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遏制，全球经济发展得更开放、更活跃，科学和工业也得以大力向前推进。

我们现在处于美国的单极时期。美国国防开支多于世界其他主要国家的总和，国防部门的研发开支多于余下世界的总和。美国经济规模超过第二大经济体(日本)的两倍。像微软和通用

电气(General Electric)这样的公司的市场价值比很多国家的国民经济总值还要高。好莱坞的支配地位使法国人被迫通过立法设置针对美国电视节目和电影的保护壁垒,以免美国的文化魅力摧毁了他们苦苦挣扎的娱乐业。诸如此类不对称的结果是,大国竞争处于最低水平,世界大部分地区享受着和平。虽然关于边界、宗教和种族的纠纷仍在继续,但是它们倾向于维持地方性。全球经济已经经历了一个显著的增长时期。生物技术和信息系统的主要突破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当前时代的相对稳定并非仅仅源自于由美国支配处理的资源,而且还源自于美国使用这些资源的意愿。美国已经一直在事实上全球的每个角落或者照料商店,或者扑灭大火。美国军队在东亚维持着艰难的和平,保卫韩国防御北方的政权、密切注视中国和日本之间的紧张、试图支持台湾的事实独立而不刺激北京。美国在欧洲仍维持着相当多的军事存在,以帮助确保欧洲大陆的稳定。当20世纪90年代巴尔干地区成为种族冲突的牺牲品时,恰恰是美国最终前来拯救。整个过去十年对伊拉克的遏制任务主要落在了美国的肩上。2001年,美国领导了针对恐怖主义网络及其阿富汗支持者的冲锋。在中东、北爱尔兰、塞浦路斯、厄立特里亚以及很多其他热点地区,华盛顿一直是探求和平的核心角色。

在不公开操纵的时候,美国也一直在发号施令,于幕后拟订交通规则。北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世界银行(World Bank)、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论坛和世界贸易组织都是具有很多成员和详细决策规则的复杂机构。但是美国对它们也在静悄悄地施加着主导性影响。克林顿政府认为北约应该扩展成员。几年之后,华盛顿就为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国主持了一个欢迎

仪式。中国最近在争取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身份，该机构包括一百多个国家，所有这些国家都假定有平等的发言权。但是中国加入的前景却严重取决于一个问题——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是否支持赋予中国永久贸易权利(两院在2000年都表决赞成)。当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扩展时，日本提议创建一个特别的亚洲银行以帮助建立货币稳定。华盛顿告诉东京说，对不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在其中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有最后决定权——将处理此事。

美国的优势还通过延续其他全球趋势的和平诱发效应(peace-causing effects)来促进稳定。单极是上层建筑，决定着塑造国际体系的主要力量。当这个建筑本身增加稳定、减少竞争时，次一级力量也会起同样作用。

看一个全球化。全球经济尽管起伏波动，但是自冷战结束以来却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使加入世界范围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很多国家提高了繁荣程度。融入全球市场反过来促进了经济和政治自由化。但是，全球化的这种积极效应与美国实力是不可分割的。美国设计、管理和支持国际经济同全球化的魅力直接相关。美元是主导性储备货币。世界上前一百家公司的一半以上是美国公司。[63]美国财政部对于很多国家国民经济的影响比它们本国的财政部还要大。事实上，所有能够参与由美国领导的全球经济的国家都是如此——这是城里惟一的游戏。所谓的全球化就是“美国化”。

民主的情况也是一样。民主治理确实比其他所有替代治理方法都更可取，它有着内在的吸引力。但是，民主之所以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繁荣昌盛，部分是因为全球惟一超级大国是民主国家——在民主方面还是一个狂热的劝诱他国改变信仰的国家。作为恩赐，美国为有志向的民主国家提供贷款和令人垂涎

的各种类型国际组织成员身份。马德莱娜·奥尔布赖特在任职国务卿期间，宣布民主是为她指明方向的"北极星"，并于2000年6月邀请世界上所有民主国家在华沙集会。[64]其间，不愿或不能向民主规则转型的国家面临的是制裁、孤立，在某些情况下，如在伊拉克、塞尔维亚和阿富汗，还有美国的炸弹。所谓民主化与"美国化"也是不可分割的。

单极效应积极扩溢的另外一个方面是人道主义干涉。美国及其伙伴已经错失了在遥远的土地上阻止屠杀和苦难的大量良机。1994年对卢旺达的种族灭绝行为无动于衷可能是最令人吃惊的。但是，很遗憾，一切照旧。除了北欧国家，他们已经将维和和人道主义救援当作一项国家事业，大多数政府只有当国家安全面临风险时才会让国民去冒生命危险。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过去十年的记录分外突出。在合理数量的例子中——索马里、海地、波斯尼亚、科索沃、东帝汶，国际社会的确为阻止冲突进行了干涉，并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虽然这些努力经常是迟缓的，达到的效果是复杂的，但是，至少它们是即将来临的。克林顿政府也尽其所能把解决非洲艾滋病危机排在了美国外交政策议事日程的前面。

这种慷慨大度是时代的征兆，是美国实力过剩以及由此而来的全球稳定的一种产物。世界主要国家并没有因他们通常的先天之忧——相互竞争——而分心。所以他们有关心其他事务的奢华。既然今天最紧迫的安全威胁来自朝鲜，而这个国家正蹒跚于崩溃的边缘，那么为什么不集中精力给东帝汶带来和平或者减慢艾滋病在非洲的传播速度呢？

针对纽约和华盛顿的恐怖袭击虽然昭示美国优势地位决不能确保它的无懈可击，但是袭击事件事实上却进一步证实了美国的普遍影响力。基地组织把愤怒的举动指向美国，完全是因

为美国的无所不在和财富使它成了任何降临于伊斯兰世界的痛苦的合乎逻辑的替罪羊。由于在沙特阿拉伯保留着军事存在,美国便成了践踏圣地的异端。恰恰是美国文化的堕落性传播使伊斯兰价值观和习俗难以取得更大的支配力。同样,美国还因巴勒斯坦人的境况和在大部分伊斯兰世界盛行的极度贫困而遭到指责。美国的单极时刻使它成了报复性意识形态的主要靶子,这种报复性意识形态源自于宗教狂热和社会不满的混合。它导致的恐怖袭击造成了毁灭和震惊。但是,恐怖袭击不会改变国际体系的内在结构。

因此,美国的单极时刻会继续界定全球格局。作为结果,当前的地缘政治世界地图上并不存在主要的分裂带。尽管恐怖主义袭击尝试被挫败、肇事者或者被杀、被捕、或者缺少行动所需的资源,但是恐怖主义仍旧是一种威胁。然而,大国竞争作为一种更为危险的威胁现在却处于中止状态。美国正在从这个世界上收获相当可观的利益,但是其他很多国家也在收获。这是一个好消息。不过也有坏消息。

单极是存在的,但它不会长久。数字具有欺骗性。美国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实力是无与伦比的。它的文化影响力是非凡的——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勇士与丽人》(*The Bold and the Beautiful*)同《护滩使者》(*Baywatch*)竞争成为世界上最流行的节目,迈克尔·乔丹(Michael Jordan)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排在毛泽东的前面。美国还肯定会继续领导高技术革命,因为它有源自投机资本与企业精神实现健康组合的发明创新。

但是对未来的分析一直在犯同样的作出预测的错误:太过严重地依赖现在。20 世纪 80 年代末,人们预测美国处于衰落。日本第一,它的中央集权经济正在把美国缺乏约束的消费主义

甩在后面。亚洲世纪即将开启。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模式并不是简单地被开罪，而是得到了美化。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自由放任市场已经战胜了其他一切。全球化已经淘汰了所有美国道路的替代道路。这个新的世纪，像旧世纪一样，将是一个美国的世纪。

但问题是，现在的快照对于未来并没有提供多少指南。更有用的是历史模式和长期趋势，它们显示经济的优势地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从一个地理中心转移到另一个地理中心。毫无疑问，全球经济在未来几年将经历无数的曲折旋转。某一天，美国看上去不可战胜，第二天，则盛世不再。但是，在这些起伏波动的过程中美国的经济主导地位将会渐渐滑离。

两个不可阻挡的趋势意味着美国的单极时刻不可能延续十年。第一个趋势是权力的扩散。没有任何一个主导国家曾经能够无限期地维持优势地位。随着时间的发展，其他国家会赶上来。今天，经济力量的扩散比大部分时期都发生得更快。美国的近期挑战不在于一个单一国家试图赶上来——这需要时间，而是欧洲联盟，它正处于将成员国已经拥有的令人注目的经济资源聚集起来的过程之中。如果我们一个一个地看，英国、法国或者德国很可能永远都赶不上美国，他们每一个都缺乏足够的人口和资源。但是将他们的集体财富积聚起来，再加上十几个其他欧洲国家的财富——可能还要包括不太久之后复兴的俄罗斯，那么一个经济巨兽就已经初现端倪了。

诚然，欧洲联盟并不是一个具有强大中央政府的联邦国家，而且可能永远都不会成为这样的国家。欧洲也不具有与其经济资源相匹配的军事能力。但是，经过50年经济和政治统合的艰难跋涉，欧洲正在全球舞台上就位。既然欧洲的单一市场已经有单一货币相伴随，那么欧洲在贸易和金融事务方面就具有了

同美国相当的集体影响力。欧元(euro)开始于一个相对虚弱的起点,与美元的对局处于失利地位。但是,它肯定会反弹并最终成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中的一种。另外,欧洲正在构筑共同防御政策,获取必要的军事资金以便独立实施军事行动。

随着欧盟资源的增长及其布鲁塞尔治理机构权威的扩大,大西洋两岸影响力的分配将变得更为平等。欧洲和美国可能具有共同的民主传统。但是,随着欧洲变得更加强大和更加统合,它会需要获得与其新地位相一致的发言权。不论美国是否喜欢,欧洲都在变成一个新的全球权力中心。美国的支配力将会相应缩水。

东亚国家距离进入给欧洲带来和平与繁荣的统合历史进程还有很多年。然而,这个地区却具有巨大的经济潜能。日本已经具有高度教育和熟练的劳动力、发达的工业和技术基础、以及发展良好的市场网络。一旦必要的改革到位,那么其拖长的经济衰减就会让位于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在过去十年中,中国一直受益于每年百分之十左右的经济增长率。世界银行估计,到2020年,"中国可能成为世界第二大出口国和进口国。其消费者可能具有比欧洲所有消费者都要高的购买力。中国作为资本的使用者和提供者对世界金融市场的参与程度将与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相匹敌。"[65]随着这个新世纪的发展,东亚将像欧洲一样兴起为美国的抗衡力量。

将使单极时刻更早而不是更晚终结的第二个趋势是美国国际主义的变化特点。单极依赖于这样一个政体的存在,它不仅具有优势地位,而且它发挥优势作用的方式使之能够赢得他国信任并因此维持一种共同认可的国际秩序。如果美国厌倦成为全球终极卫士,或者以一种挑衅反对联盟的方式挥舞自己的权力,那么即使美国的资源继续高于一切,单极也会化为乌有。

美国对全球参与——尤其是对多边主义形式全球参与的兴趣日益减少是变化中的国际环境的直接产物。在大部分历史中,美国一直避免直接卷入自己半球以外的对抗。美国领导人感到,美国能够满足扩展商业的需要而不必卷入遥远土地上的事务。关键的转折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和日本有可能成为具有全球支配力的侵略者,这使新式国际主义成为必不可少,并迫使美国直接卷入以塑造欧洲和东亚的权力均势。接下来,苏联威胁确保美国在20世纪的余下时间里维持广泛的海外承诺和制度牵连。

冷战现在结束了,两个敌对集团之间的分裂带也已经不复存在。在缺少主要对手的世界中,美国不再感到有压力去发挥全球卫士的作用。上帝恩赐给美国东西两面宽阔的海洋和南北两方友好的邻国,这些条件为美国提供了天然的保护屏障。在这些条件下,从18世纪建国一直到1941年珍珠港遭袭,制约美国国际参与兴趣的那些相同的战略和政治考虑,很多又重新走上前台。

美国内向转变的征兆只是慢慢才变得显著起来。两个主要政党的领袖都已经自称一切照旧,继续原来的路线,每方都试图在支持美国领导地位和国防开支方面超过对方。"9·11"恐怖袭击事件也延迟了美国从全球霸权的退却。然而,就在同时,政治的重心却在悄悄地但却稳步地转向更加有限的国际主义。

看一下美国在欧洲的战略存在,那是美国过去50年安全政策的核心。美国的确对波斯尼亚和科索沃进行了干涉,显示美国继续愿意留作欧洲的和平缔造者。但是,在表层的下面却正在形成着一个不同的画面。美国人及其当选代表开始认为,民主、富有、和平的欧洲应该能够自己照顾自己。那就是为什么美国参议院对科索沃战争的主要反应是,全票一致通过一项决议,

哀叹欧洲防御能力的“严重缺陷”,并敦促欧洲联盟校正大西洋联盟内部的“总体不平衡”。[66]那也就是为什么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虽然很难说他是一位孤立主义者,但却在科索沃轰炸战斗开始前争辩说:“根据对安全概念的传统理解,拟订在科索沃部署(美国军队)并不能解决美国安全面临的任何威胁……如果科索沃呈现为一个安全问题,那么它是对于欧洲而言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冲突可能产生难民。科索沃对美国的威胁并不比海地对欧洲的威胁更大。”[67]克林顿在科索沃战争中只使用空袭的决定和前后矛盾心态的表现、布什政府想从巴尔干地区撤回美军的表态都清楚地说明,美国作为欧洲首席保护者的日子很快就要结束了。

美国日益减少的国际主义并不是政治衰退的产物。它也并不标志黑暗的、幻觉式孤立主义的回归,这种孤立主义在过去曾经强烈误导过这个国家。它是时代、美国地理位置和战略环境的逻辑结果,在这个战略环境中,针对美国本土的恐怖袭击,而不是欧洲或亚洲的霸权战争,代表了对这个国家福祉的最直接威胁。这个国家的政治正处于向地缘政治现实看齐的过程之中。

与此同时,式微的国际主义的确有转变为危险的孤立主义的可能。特别是由于美国地理位置赋予的国家安全、通过撤回可能危害这种安全的义务来保护这种安全的诱惑性、自共和国成立以来一直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孤立主义倾向,这个国家全球作用的减少的确有可能走得太远。控制美国的海外义务是一回事,它是不可避免的,可以渐渐地、有充分准备地做到,以便将伴随的危险最小化。但美国从全球事务中撤出是完全另外一回事,正是因为全球稳定现在如此依赖于美国的实力和意图,因此它将带来可怕的后果。

同样令人担忧的是美国渐增的单边主义。美国不仅可能在未来岁月更少地参与管理国际秩序,而且在确实参与时,美国可能以一种单边的方式进行参与。看一下关于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和反弹道导弹条约的命运,就足以说明问题。刚上任的前几个月,乔治·布什在没有先同有关各方磋商的情况下,就宣布美国将从上述两个协定中退出。关于京都议定书的命运,布什甚至没有尝试掩盖他自行其是的逻辑。他说:“我们不会做任何有害于我国经济的事情,因为生活在美国的人民信奉要事优先。”[68]至于反导条约的命运,在撕毁该武器控制协议的意图尽人皆知之后,布什政府确实同很多国家进行了协商。但是布什接着就于2001年8月转而向世界宣布,“我们将按照我们的时间表,在美国方便的时候退出反导条约。”[69]12月,布什很好地兑现了他的承诺。

欧洲人对这些举动的反应夹杂着痛苦和不快,当美国总统2001年夏首次访问欧洲时他们毫不犹豫地向他表达了这种感情。正如一条标语上所写的:“布什去了外太空/导弹去了垃圾桶”。[70]当年夏末在法国、德国、意大利和大不列颠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人们强烈而普遍地反对布什的外交政策。大约85%的被访者不赞成布什决定退出京都议定书。超过70%的人反对布什有意废止反导条约和发展导弹防御体系。78%的人认为,布什作出决策“完全根据美国利益”而没有把欧洲放在眼里。[71]欧盟不仅在崛起为美国的抗衡力量,而且是一个对美国充满愤怒的力量。

像过去一样,美国的单边主义倾向源自于担心国际机构会侵蚀美国的国家主权和机动空间。这种倾向上升的部分原因是冷战的制约效应已经不复存在了。选举政治也在发挥一定作用,保守的共和党人,尤其是那些来自中心地带的布什的主要选

民，构成了单边主义政策的最强烈拥护者。此外，美国坠向单边主义还因为跟过去一样经常不能如愿以偿而遭受的挫折。当其他国家拒绝追随华盛顿的领导时——随着欧洲各国和其他国家力量与自信的增长，他们会更频繁地这样拒绝——习惯了发号施令的美国很可能一意孤行。

2001 年 9 月的恐怖袭击之后，美国的确好像重新发现了多边主义和国际主义。然而，反对恐怖主义的战斗并不是持久联盟的原料。美国粗制滥造地组成了一个威严的联盟，但事实上美国在针对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军事斗争中却是孤独的。军事行动开始几天之后，56 个伊斯兰国家在卡塔尔集会，发表公报指出："会议抵制以打击恐怖主义为借口把任何伊斯兰或阿拉伯国家当作打击目标。"[72]"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前让美国、欧洲、俄罗斯和中国产生分歧的问题并没有消失，它们只是被暂时的团结掩盖了。甚至当反恐长期斗争还在继续之时，无赖政权和恐怖主义巢穴构成的非对称威胁已诱使美国通过导弹防御、海岸巡逻、严格控制边境、加强国内安全等将自己与遥远的危险隔离开来。既然本土防御现在成了头等大事，那么美国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更加可能由其他使命后退、寻求减轻国外负担、指望他国有更多作为。

美国好像正在走向单边主义与孤立主义，二者的结合肯定是一个危险的结合。某一天，美国很可能因傲慢、自行其是的行为方式疏远了自己的伙伴。第二天，它可能舍弃陷于危难的伙伴，从它发现难以控制的国际体系中抽身。就在美国需要他人帮助以处理越来越多的挑战的那个时刻，它很可能发现这个世界是一个孤独的所在。

正是因为这个事态有变为现实的可能，因此美国必须未雨绸缪，使自己和余下世界为一个新的、特征更为显著的美国国际

主义做好准备。对于华盛顿来说,通过精心设计去塑造一个能够赢得美国人民支持的审慎、坚定的国际主义,比在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之间徘徊摇摆更为可取。以相似的方式,美国应该向盟友昭示美国对他们的指望更多,而不是尽可能长久地固守现状,只有那时才能以少许警告解除约束。如果美国要找到这个新式自由国际主义,在国内构筑必要的民众支持,巩固维护稳定所需的国际制度,并准备使自己和国外盟友建立更平等的伙伴关系,那么华盛顿就必须从现在开始奠定基础。

欧洲和亚洲的崛起加上美国日渐式微且敏感棘手的国际主义,非常清楚地说明美国的单极时刻在这个世界上不会长久。美国的主导地位及其对自由国际主义的政治兴趣都已经达到了顶峰,在未来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二者都将渐渐丧失。随着单极让位于多极,现在被美国优势地位暂时休止的战略竞争将重新出现——而且,如果美国单边主义律动占上风的话,那么战略竞争还会以一种复仇的心态回归。由于美国霸权的稳定作用不复存在,全球化和民主化进程将会蹒跚跋涉,现在依靠华盛顿领导地位有效发挥功能的国际机构也将面临同样的命运。地缘政治分裂带将重新出现在北美、欧洲和东亚的权力中心之间。美国大战略的核心挑战将是管理和克服源自于这些新的分裂带的危险。

后面几章建立于这个世界地图之上,说明为什么它是比其他替代地图更好的未来指南。然而,在着手说明之前可以通过将开始时讨论的替代地图中的三个排除在外来缩小讨论的范围,它们是亨廷顿、肯尼迪和卡普兰、米尔斯海默的世界地图。

亨廷顿的世界地图存在好几个弱点。首先,并没有充分的证据支持其他文化将同西方文化发生冲突的判断——尽管过去

十几年来形成反美帮(anti-American gangs)的条件已经变得不能再好了。随着美国实力达到巅峰状态,发达民主国家从全球化获得的好处远远多于大多数世界其他地区,对西方的憎恨应该在非西方文明之间加速催生对抗联盟。这种联盟并未形成的事实对于亨廷顿的判断而言是潜在的一击。

想象一下从东正教、儒教,或穆斯林的观点来看1999年是个什么样,就可以发现这一点。美国几乎在世界各地炫耀着自己的军事力量。在莫斯科尖锐反对的情况下美国扩大了北约,加剧了东正教俄罗斯的丧失帝国之痛。美国领导北约开展了对塞尔维亚的战争,那里是东正教斯拉夫的另一个前线。还有,北约的所作所为没有得到联合国的批准,即便没有违背法律的精神,也违背了法律的条款。在冲突中间,发自美国战舰的精确制导炸弹将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的一侧变成了瓦砾,加上华盛顿一直因为北京政权的高压方式及其对台湾的威胁而在惩罚北京。美国飞机经常性地绕过半个地球对伊拉克的目标进行打击,而且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在这样做。当本杰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的右翼以色列政府把巴以和平进程弄得一团糟时,华盛顿一直在背后支持着,虽然这种支持并未过于热心。这是名副其实的激起东正教、儒教和穆斯林人民集体忿怒的良方。

但是,这些遭受委屈的文明走到一起形成愤怒的反美联盟了吗?余下世界为准备同西方开战而摩拳擦掌了吗?根本没有此类情况。俄罗斯人几乎没有为他们的塞尔维亚兄弟出一指之力,反而最后在迫使米洛舍维奇从科索沃撤军方面还助了美国一臂之力。冲突结束的短短几个月之后,莫斯科和北京就都致力于使他们同华盛顿的关系重新走上正轨。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不仅没有组织反对美国的圣战,反而同萨达姆·侯赛因保持距

离，一点也没有为他们的巴勒斯坦兄弟提供帮助。

如果亨廷顿的世界地图是正确的，那么另外一个理由，即世界发展中地区不再是东西对抗的对象，应该说明现在是各个文化帮形成反美联盟的有利时机。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使地区国家彼此争斗。沙特阿拉伯与叙利亚相斗、伊拉克与伊朗相斗、朝鲜与韩国相斗、日本与中国相斗、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相斗。冷战经常使具有相似文化的邻国之间任何结合的机会付之东流。华盛顿和莫斯科都信奉同一条格言——分而治之。

随着苏联的消失，美国一直尽力斡旋解决地区争端，而不是使之加剧。尤其是在克林顿政府期间，美国外交官几乎在全球的每个角落进行着调节冲突的工作。然而，很多地区争端继续恶化，文化亲和的吸引力并没有展示多少安定效应（pacifying effect）或团结效应（unifying effect）。朝鲜半岛依旧分裂。政治对抗和种族紧张仍然折磨着非洲的大部分地区。伊斯兰世界并未出现更凝聚的征兆，中东地区国家彼此间仍频繁陷入矛盾。简言之，虽然冷战结束了，但是文明内部的麻烦却照样多于文明之间的麻烦。

针对纽约和华盛顿的恐怖袭击，虽然被很多人描述为西方与伊斯兰世界之间冲突上升的证据，但是恐怖袭击却只是证实了上述这个基本的解释。中东的大部分国家不是宽恕恐怖主义，而是很快对袭击进行了谴责——包括美国的坚定反对派，如伊朗和叙利亚。对报复性阿富汗战争的合法性提出质疑的同一次伊斯兰会议，的的确确谴责了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并坚称这些袭击违背了伊斯兰教义。一群穆斯林阿訇，包括一位甚至被好战分子敬仰的权威人士，发表了一份伊斯兰宗教令法特瓦（fatwa）———种宗教主张，对恐怖袭击进行了谴责，并表示帮助逮捕肇事者是穆斯林人的“责任”。[73]虽然实际上每一个伊斯兰

国家的政府在公开与美国进行合作时都面临着风险，但是中东和南亚地区的无数国家为美国提供了基地、军事设施和空域的使用权。此类支持有助于打消这样的观念，即在对袭击进行报复的过程中美国正在与伊斯兰文明为敌。美国军队在20世纪90年代三次投入战场保卫穆斯林人民——科威特、波斯尼亚和科索沃——也与这个迷思大相径庭。

不管奥沙马·本·拉登及其追随者的言辞如何，正在进行的美国与伊斯兰激进分子之间的斗争并不代表文明的冲突。相反，使恐怖主义在中东地区加速滋生的核心分裂出现在伊斯兰世界自身内部，而不是在美国与伊斯兰之间。统治政权的不合法性、宗族和派系对抗、巨大的收入不平等、普遍的贫穷、已经被历史抛弃的感觉，这些成了伊斯兰社会内部不满的根源。于是，极端主义团体和宗教狂热分子利用了这些不满，并将其转化为对美国和西方的仇恨。但是，离间的深层根源是土生土长的——政治和经济停滞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分裂。

反美仇恨并非伊斯兰世界独有也加强了这个解释的力度。对美国的仇恨在中东地区可能比在其他地区更深刻，但是反美抗议对于法国、俄罗斯、中国和拉丁美洲的很多国家来说并不陌生。问题的核心并不是美国的文化，而是美国的实力。正如从古至今所有霸权都曾经历的那样，优势招致愤怒。处于顶峰的国家经常是不满的流行靶子，尤其是在那些贫穷落后的国家或者霸权国一度使用过特别严重的高压手段的国家。然而，这种憎恨证明很少能够强大到足以抵消内部分裂的程度，内部分裂一贯使文明内部的冲突比文明之间的冲突更强烈。

文明内部显著缺乏和解精神和凝聚力的主要理由在于，关注权力和安全的分裂效应经常胜过文化和意识形态亲和的潜在团结效应。世界大部分争端倾向于发生在邻国之间。原因是，

邻国由于地理上的接近经常威胁到彼此的福祉，这种威胁严重压倒了共同文化或种族可能另外形成的亲近感。在一个国家如何确认敌人和选择盟友方面，威胁是比文化或意识形态更强有力的决定因素。[74]

具有文化共性的国家之间，潜在伙伴关系时常因安全竞争的暗礁而搁浅。泛阿拉伯志向引导叙利亚和埃及于 1958 年形成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United Arab Republic)。后来，叙利亚政府因对埃及总统加马尔·阿卜杜拉·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的影响越来越大感到不安而于 1961 年退出。同样，伊斯兰团结也与伊朗与伊拉克之间的战略对抗不符。亲近感未能阻止萨达姆·侯赛因掠夺科威特的财富。多年来巴基斯坦一直支持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但是当它面临与美国反恐战争结成联盟——并获得经济和战略利益——的前景时，几天之内它就改变了路线。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其他地区。日本和中国具有可以追溯几个世纪的文化纽带。但是，这些纽带现在却不能改善东亚两个主要国家之间的政治分野。与此相似，地缘政治考虑证明比文化亲和更强有力的倾向，恰恰说明了崛起中的欧洲与其后代美国为什么可能会进入战略对抗。亨廷顿认为竞争无所不在，这是对的，但是这种竞争将发生在权力集团之间，而不是文明之间。

肯尼迪和卡普兰的地图也存在严重缺陷。毫无疑问，世界发展中地区，尤其是非洲，正位于可怕危机的边缘。艾滋病、饥荒、环境退化和犯罪的确威胁着要将整个地区变成荒废之地。疯狂的麦克斯(the Mad Max)电影系列所展示的荒凉的无政府状态可能再真实不过了。

但问题是，北方的工业化国家几乎具有无限的能力将自己

与发展中世界的苦难和冲突隔离开来。美国在对外援助方面的支出少得可怜——大约只占国民生产总值一个百分点的十分之一。然而,每年要让这个令人鄙夷的预算在国会通过,俨然已经成了一项主要成就,需要经过无休止的争吵和精明的讨价还价。

对这个困境的解释是一目了然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只有极少的工业和财政资源。因此,他们的军事能力几乎都处于原始状态。正是因为他们几乎不具有经济和战略价值,因此美国以及其他工业化国家能够,而且经常的的确确忽略他们的境况。2000年,在15到49岁的博茨瓦纳国民中36%的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这实际上因毁坏主要劳动人口而等于宣判了该国的崩溃。尽管这是一场人道主义恶梦,但是毁灭的博茨瓦纳在经济和战略方面的重要性将只会比从前更小。博茨瓦纳与西方之间将不再有分裂带,因为这个国家很可能就要消失了。

有些走向崩溃的国家可能是大国,可能会造成地区范围的不稳定和灾难。然而,就像过去一样,工业化国家很有可能退避三舍。难民潮将向北方进发,但是富裕的国家会挡住他们的去路,并将他们送回家乡。北方和南方之间的隔墙只会越修越高。

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社会恶化可能使不满团体希望加害于北方的滋生土壤变得更加肥沃,这是千真万确的。恐怖主义者已经拥有了突破西方防护屏障的手法。潜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使未来袭击的前景变得更加严肃。甚至在消除此类威胁的最佳努力面前,恐怖主义者可能还时常会让人们感受到他们的存在。

因此,南方构成了北方不能忽视的战略威胁,但是,这个威胁只是来自一些孤立团体或无赖政权,而不是来自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中世界。结果,美国可能偶尔追剿恐怖主义团体以及为其提供庇护的国家,阿富汗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但是,这些将是针对边缘团体或极端主义政权的孤立袭击,而不是北方和南

方之间的冲突。即使从根源上消灭恐怖主义的斗争取得了一定成功,此类威胁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也将意味着北方和南方之间的隔阂会继续上升。更加严格控制的边境、更加严厉的移民政策、驱赶或击沉不明身份船只的海岸巡逻,这些都不是新的地缘政治分裂带的征兆,而只是北方为了使自己与来自南方的潜在危险隔离开来所做的加倍努力的征兆。

此外,如果北方与南方的互动主要由反恐斗争来界定,那么就会形成自拆台脚的矛盾。在反恐战中,美国倾向于与那些更乐于同西方建立联盟关系的保守政权结盟。但是,很多这样的政权——沙特阿拉伯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却在本地区发挥着关键性的抑制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作用。因此,美国根据反恐战争同南方接触的危险在于,它强化了非自由政府和经济不平等,非自由政府和经济不平等又会产生使恐怖主义得以形成的社会不满和极端主义。结合西方偶尔军事侵入发展中世界,将北方—南方分野确认为地缘政治分裂带会危险地变成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

防止边缘团体加害于美国应该成为一项国家大事,但是它不应被错误地当作新的大战略的基础或组织原则。这样做会给予恐怖主义者以有力的胜利。奥沙马·本·拉登想要把美国变成一个守备国家,使之损害自己的国内自由。他梦想挑起一场针对伊斯兰世界的军事报复,这样的军事报复事实上将成功地使一次犯罪行为演变成一条新的分裂带和文明的冲突。他指望挫败美国,使其退却,运用的手法是使美国遭遇一个敌人,要对付这个敌人美国的压倒性军事优势证明没有任何用武之地。但是,美国不应让恐怖主义者得手。反恐战争需要耐心和机警,而不是一个新的世界地图。

南方悬而未决的危机毋庸置疑证明西方投入关注和资源是

正确的。但是,南方作为一个整体对西方构成的是人道主义危局,而不是战略威胁。在引导西方参与这场战斗方面,最好以道德基础说明情况,而不是将其变成错误的地缘政治论断。北方当然应该寻求消灭任何地点、任何时间形成的恐怖主义巢穴。然而,只有当西方把北方—南方分野转变为地缘政治分裂带,把发展中国家看作是恐怖主义的滋生土壤,而不是遭受折磨、需要帮助的政体时,北方—南方分野才会真的成为一条地缘政治分裂带。相比因为绝望的无政府状态在美国海岸蔓延,或者具有超级能力的、愤怒的人群正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瞄准美国等捏造的情形,国会可能更会因为共鸣和内疚的复杂感情而批准对中东和非洲的援助。北方应该不可否认地尽其所能排除摆在面前的苦难。但是,如果这样,它应该出于人道主义原因,而不应该出于战略原因。

本书的世界地图和米尔斯海默的世界地图具有很多共同的分析基础。实际上,现实主义是二者共同的知识主根。这个根本共性说明了为什么两幅地图都预言世界权力中心之间的地缘政治对抗会最终回归。但是,米尔斯海默式的现实主义与指导本书此后各章观点的现实主义存在很大不同。因此,描述这些区别具有双重功效:概述米尔斯海默分析离题的所在、澄清本书的知识基础。

米尔斯海默的首要分析失误在于,他未能认识到政治选择具有即使不是克服也能够改善现实主义竞争逻辑的能力。塑造他的世界地图的惟一因素是军事实力的分配和特点。这个起点引导他得出对于回归多极的不利地缘政治后果的判断,以及由此而来的政策建议——即美国应该寻求维持冷战的两极,若不能,则鼓励核武器扩散。在米尔斯海默的刻板世界里,我们所能希望的最佳结果是世界主要国家退回到各自的堡垒之后,彼此

用核武器瞄准,依赖相互摧毁的威胁来遏制战争。

米尔斯海默的现实主义虽然在简单性方面是吸引人的,但是却过于贫乏,并因此使之对国际政治的说明很快就脱离了现实。为本书提供指导的更相关的现实主义把极之间的竞争当作是一种缺省状态,国际体系当自行其是时必然要走向这种平衡。但是历史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我们能够比让国际舞台走向这种缺省状态做得更好。远见卓识和领导才能有能力使国际体系向更良性的方向发展,并消除在米尔斯海默的世界里不可避免的战争诱发动力。

只需要几个例证就可以说明问题。根据米尔斯海默式的现实主义,美国的崛起应该导致它与正处于支配地位的霸权——大不列颠走向对抗和冲突。相反,美国和英国相互妥协,同意通过公断解决争端,形成了强有力的政治纽带。崛起挑战者与衰落霸权之间缺乏战争绝对与相互威慑没有关系。同样,米尔斯海默式的现实主义预言,欧盟到目前应该已经解散了,成为冷战结束之后降临于欧洲的地缘政治对抗的牺牲品。已经发生的情况恰恰相反。欧盟正在兴旺之中,即使在东扩时它的集体特点也进一步深化了。德国并没有回到自私自利的好战分子,而是在领导建设一个完全消除了主要国家之间对抗的欧洲。

米尔斯海默未能认识到此类地缘政治转变的实例,完全因为他的知识方法不允许他这样做。美国和大不列颠在20世纪转折时期约定的和解插曲,从根本上改变了双方对彼此的身份界定,使两者之间的战争事实上成为不可思议。欧盟之所以能够抵制现实主义逻辑,是因为欧洲国家的国内特点、统合和制度的缓和作用,以及共同欧洲认同的培养使然。这些力量都存在于米尔斯海默狭小的理念框架的视线之外。他的现实主义版本全无理想主义的一点痕迹,因此因过于刻板而不能抓住国际变

化的这些深刻根源。

米尔斯海默的分析失误致使他的政策建议忽略了近在咫尺的机遇。前面的挑战不是如何最好地去建造堡垒以便与新兴权力中心隔离开来，而是如何更好地去阻止滑向即将随单极消逝而开始的竞争。米尔斯海默认为多极世界的回归将充满危险，在这一点上他是对的。但是，他在刚开始的时候就举手投降并请求核武器支援却是错误的。与此相反，回归多极的前景应该成为呼唤理念武器的警钟，催发致力于制止新格局将要唤醒的竞争本性的紧急努力。现实主义逻辑是普遍存在的，但也是能够克服的。这个中心洞见既限制了米尔斯海默世界地图的相关性，也是本书的知识基础和写作意图。

福山和弗里德曼的论断更为复杂，他们关于民主和全球化的洞见对本书的核心主张构成了直接挑战，这个核心主张是，多极的开始将意味着地缘政治分裂带的重新出现和全球对抗的回归。福山说，没有必要为此担心。民主国家的世界，甚至民主国家的多极世界，将是一个亲切的、稳定的世界。归根结底，民主国家彼此之间并不参与地缘政治冲突。弗里德曼同意，在今天的全球化世界里，多极将不会像过去那样行动。大国将因过于相互依赖、过于相像、过于忙着在世界广域网上冲浪，而不会为地缘政治竞争伤神。

由于学者和决策者一同继续对民主和全球化的和平诱发效应充满信心，因此，如果本书的世界地图和由此而来的大战略想要取胜，就必须对这些颇有影响的观点进行认真考察。这是下一章的任务。

## 注 释

1. "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Foreign Affairs*, vol. 25, no. 4 (July

1947), pp. 566—582.

2. "Moscow Embassy Telegram # 511", February 22, 1946, in *Containment: Documents on American Policy and Strategy*, 1945—1950, ed. Thomas H. Etzold and John Lewis Gadd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55—63.

3. "United States Objectives and Programs for National Security", NSC - 68, April 14, 1950, 同上书,第 427 页。

4. 国务卿顾问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先生准备的文件,"Estimate of Situation", November 30, 1950, i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 6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0), p. 162。

5. "Final Report of the Joint MDAP Survey Mission to Southeast Asia", December 6, 1950, 同上书,第 166 页。

6. Dulles, "Estimate of Situation", p. 162.

7.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National Interest*, no. 16 (Summer 1989), pp. 3—18;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8. John J. 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5, no. 1 (Summer 1990), pp. 5—56; John J. Mearsheimer, "Why We Will Soon Miss the Cold War", *Atlantic Monthly*, vol. 266, no. 2 (August 1990), pp. 35—50.

9.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 72, no. 3 (Summer 1993), pp. 22—49;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6).

10. Matthew Connelly and Paul Kennedy, "Must It Be the Rest Against the West?" *Atlantic Monthly*, vol. 274, no. 6 (December 1994), pp. 61—83. 肯尼迪还在一本书中发表了关于新兴国际体系的观点。Paul M. Kennedy, *Preparing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3).

11. Robert D. Kaplan, "The Coming Anarchy", *Atlantic Monthly*, vol. 273, no. 2 (February 1994), pp. 44—76; Robert D. Kaplan, *The Coming Anarchy: Shattering the Dreams of the Post Cold War*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0).

12. Thomas L. Friedman, *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1999).

13.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p. 4.

14.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p. xviii.

15. 关于民主和平论的当代专著,参见 Michael W. Doyle, "Kant, Liberal Legacies, and Foreign Affairs."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vol. 12, nos. 3 and 4 (Summer and Fall 1983), pp. 205—235, pp. 323—353; Bruce M. Russett, *Grasping the Democratic Peace: Principles for a Post-Cold War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Debating the Democratic Peace*, ed. Michael E. Brown, Sean M. Lynn-Jones, and Steven E. Miller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6); 以及 *Paths to Peace: Is Democracy the Answer?* ed. Miriam Fendius Elma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7)。

16.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p. xx.

17. 同上书,第 276 页。

18.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p. 18.

19. Francis Fukuyama, "Second Thoughts: The Last Man in a Bottle", *National Interest*, no. 56 (Summer 1999), pp. 16—33.

20. 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 p. 142.

21. 尽管米尔斯海默在拼凑最初的后冷战世界地图时排他性地关注欧洲,但是他后来在一本书中将分析扩展到了东亚。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Norton, 2001). 他坚持了在早期文章中所表述的基本立场,预言美国军队将逐渐退出欧洲和东亚,大国对抗将重归这两个地区。其他现实主义者如肯尼斯·沃尔兹(Kenneth Waltz)也把日本和中国的经济崛起看作是该地区地缘政治对抗的先兆。沃尔兹警告说:"或迟或早,通常是早,国家的国际地位随物质资源而逐步上升。" Kenneth N. Waltz, "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no. 2 (Fall 1993), p. 66. 也请参见 Aaron L. Friedberg, "Ripe for Rivalry: Prospects for Peace in a Multipolar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no. 3 (Winter 1993—1994), pp. 5—33。

22. Mearsheimer, "Why We Will Soon Miss the Cold War", p. 36.

23. 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 p. 147.

24. Mearsheimer, “Why We Will Soon Miss the Cold War”, p. 35.

25. 同上,第 46 页。

26. 同上。

27. 同上,第 40 页。

28. 同上,第 42 页。

29. 同上,第 50 页。

30.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p. 24.

31.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pp. 41—43.

32.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p. 25.

33. 同上,第 31 页。

34. 同上,第 22 页。

35. 同上,第 29 页。

36. 同上,第 48 页。

37.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p. 20.

38.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p. 49.

39. Paul M.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Robert D. Kaplan, *Balkan Ghosts: A Journey Through History* (New York: St. Martin's, 1993); 以及 Robert D. Kaplan, *The Ends of the Earth: A Journey at the Dawn of the* 21 *st Centur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6).

40. Connelly and Kennedy, “Must It Be the Rest Against the West?” pp. 62, 69, 79.

41. Kennedy, *Preparing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 331.

42. Robert D. Kaplan, *The Coming Anarchy*, p. xiii.

43. 同上书,第 24 页。

44. Connelly and Kennedy, “Must It Be the Rest Against the West?” p. 62.

45. Robert S. Chace, Emily B. Hill, and Paul Kennedy, “Pivotal States and U.S. Strategy”, *Foreign Affairs*, vol. 75, no. 1 (January-February 1996), p. 63.

46. Kaplan, *The Coming Anarchy*, pp. 7, 19.

47. Connelly and Kennedy, "Must It Be the Rest Against the West?" p. 79.

48. Kaplan, *The Coming Anarchy*, p. 120.

49. 同上。

50. 同上书,第 125 页。

51. Friedman, *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 pp. 7—8.

52. 同上书,第 xviii 页。

53. 同上书,第 201 页。

54. 同上书,第 86 页。

55. 参见,例如 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56. 参见,例如 Thomas Risse-Kappen, *Cooperation Among Democracies: The European Influence on U. S.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57. Joseph S. Nye, Jr.,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0).

58. Friedman, *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 pp. 196—198.

59. 同上书,第 41 页。

60. 同上。

61. 同上书,第 212 页。

62. Thomas Friedman, "World War III,"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3, 2001.

63. 2002 年 3 月 28 日根据市场资本化程度排列。*Financial Times Global 500 Guide*, May 8, 2002. Available at: http://specials.ft.com/spdocs/FT3BNS7BWOD.pdf.

64. Jane Perlez, "With Time Short, Albright Stays Aloft", *New York Times*, July 3, 2000.

65. World Bank, *China 2020: Development Challenges in the New Century*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97), p. 103.

66. Senate Resolution 208, November 8, 1999.

67. Henry Kissinger, "U.S. Intervention in Kosovo Is a Mistake", *Boston Globe*, March 1, 1999.

68. 引自 Edmund Andrews, "Bush Angers Europe by Eroding Pact on

Warming", *New York Times*, April 1, 2001。

69. David Sanger, "Bush Flatly States U. S. Will Pull Out of Missile Treaty", *New York Times*, August 24, 2001.

70. Dana Milbank, "Bush Advocates a Wider NATO", *Washington Post*, June 16, 2001.

71. "Bush Unpopular in Europe, Seen as Unilateralit", August 15, 2001. Available at: http://people-press.org/reports/display.php3? ReportID = 5.《国际先驱论坛报》、对外关系委员会、皮尤人民与媒体研究中心所做的调查。也请参见 Adam Clymer, "Surveys Find European Public Critical of Bush Policies", *New York Times*, August 16, 2001。

72. John Kifner, "56 Islamic Nations Avoid Condemning U.S. Attacks, but Warn on Civilian Casualties",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1, 2001.

73. Laurie Goodstein, "Muslim Scholars Back Fight Against Terrorists",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2, 2001.

74. 参见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 第三章 全球化与民主的虚假承诺

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对于美国和世界来说都是一件具有界定性意义的事件。在美国,20世纪20年代的信心和慷慨变成了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永远不会发生在他们身上的缺乏自信和一定程度的节俭。全球经济很快将华尔街崩溃的冲击浪潮传到了欧洲和亚洲,经济衰退从一个国家传到另外一个国家。国际贸易大幅下降,货币猛跌。随后的社会混乱在助长德国和日本的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方面起到了突出的作用,日本和德国的侵略野心很快导致了一场世界范围的战争。

美国可能永远都不会再一次经历像1929年证券市场崩溃那样的事件。今天的全球经济比20世纪30年代更富有弹性,从而使之更能经受逆境。然而,回顾大萧条对于今天却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它昭示,90年代市场的非正常攀升与20年代的危险繁荣何其相似乃尔。它显示,经济变化能够多么迅速地带来无法预料的政治后果。它说明,全球化肯定不是万能的灵丹妙药,实际上全球化可能成为经济灾难迅速传播的危险工具。它还不仅揭示了民主的脆弱性,而且揭示了当民主和民族主义一道出错时伴随而来的危险。

# 过　去

“在纵览国情方面，美国国会的所有集会从来都没有遇到比现在所表现出的更令人欢欣鼓舞的前景。国内宁静而满足……达到了繁荣岁月的最高记录。国际和平而充满源自于相互理解的善意。”[1] 虽然这种振奋人心的乐观主义非常适合于比尔·克林顿总统八次国情咨文中的任何一次，但是它们却不是克林顿的言辞。它们于 1928 年 12 月 4 日出自加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总统之口。柯立芝在发表国情咨文的时候一点也不知晓，就在仅仅几个月之后，证券市场的崩溃将美国和世界带入了大萧条。国内的繁荣和满足很快就让位给了贫穷和绝望。国际的相互理解与和平成了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牺牲品。

然而，就在 1928 年，美国的国内外情况均处于良好状态，柯立芝的乐观概述是完全站得住脚的。美国经济已经连续繁荣两年多，农业和工业生产都达到了新高。公司赢利稳步上升，受其刺激，证券市场投资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水平。股价在 1927 年和 1928 年大幅度上升。顺境一直延续到 1929 年。1929 年夏天的三个月对于美国主要公司的股票来说尤其仁慈亲切。维斯汀豪斯电器公司（Westinghouse）的股票从 151 美元爬升到 286 美元，通用电气公司（General Electric）的股票从 268 美元爬升到 391 美元，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的股票从 209 美元爬升到 303 美元。

欣欣向荣的市场既得益于边际买入（buying on margin）*，也

---

* 边际买入是指那些本身没有很多资金的人，因为相信可以在股市的某一点买入而赚一大笔钱所进行的买入活动。他们常常用借贷来的钱购买股票，认为所买股票的价格会上升到足够的点数，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偿还贷款之后再赚一笔。——译者注

最大限度地助长了边际买入。受不可思议的获利前景的诱惑，投资者大量借贷以便支持他们的投机癖好。1929年夏天，经纪人的贷款每月大约增长4亿美元，到了秋天贷款总额则达到了70亿美元，相比20年代早期几乎增长了7倍。对金钱的需要抬高了利率，并将大量国际资本吸引到了纽约，以致其他地区的信贷市场开始吃紧。贷款开始在其他贷款的上面叠加。纽约的银行以5%的利率向联邦储备银行借钱，以便能够以高达12%的利率转借给证券购买者。[2]

随着证券价格飞涨超过了其潜在价值以及边际买入与其同步发展，联邦储备委员会开始非常有道理地感到不安。甚至在夏天的高涨出现之前，联邦储备委员会就已经发出警告，商业银行不能“以制造投机贷款为目的，或者以维持投机贷款为目的”利用联邦储备信贷。[3]1929年春天，市场增长战战兢兢，并在向上爬升的过程中出现了暂停。但是，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沉默加上银行拥有经纪人随时恭候的贷款，很快就终止了这个反射性的暂停。甚至学术专家也没有提出惯常的警告。著名的耶鲁经济学家欧文·费希尔(Irving Fisher)在1929年秋天宣称：“证券价格已经达到了类似永久性大高原的高度。”[4] 哈佛经济协会(Harvard Economic Society)，作为一个由哈佛经济学教授组成的俱乐部，向投资者担保，“像1920—1921年那样的严重萧条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我们并未面临拖延的清算问题。”[5]

10月，投机泡沫破裂了。仅仅几天时间，无拘无束的信心就变成了无法控制的恐慌。市场在10月19日星期六和10月21日星期一的交易期间开始严重萎缩。下滑导源于国外资金的撤出、信贷市场的紧缩和经纪人开始回收贷款，以及华尔街上关于股价有可能急转直下的传闻。接下来在当周的余下时间，市场暂时出现了稳定，部分原因在于纽约主要银行为恢复信心

通过购买证券做出了协调性努力。

失控的抛售在10月28日星期一上午重新开始。这一次，银行家决定不再干预。抛售加速进入了第二天。很多证券无论以什么价格都找不到卖主,它们的股值猛跌到不足1美元。抛售的数量和速度如此之高,以致股票行市自动收录机(ticker)落后了几个小时,投资者只能猜测他们的证券已经下跌到了何种程度。甚至像维斯汀豪斯电器公司这样的强者也未能幸免,它的股价9月曾以286美元交易,当天收盘时却只有126美元了。高盛贸易公司(Goldman Sachs Trading Corporation)是一个类似于今天共同基金(mutual fund)的投资信托公司,它的股价在崩溃之前曾经达到220美元,关门时却只有35美元了。一度助长了投机繁荣的各级贷款开始要求回收。市场就像一叠牌一样倒下了。

虽然相对而言很少美国人在1929年拥有证券(可能1亿2千万人口中的150万人拥有)[6],但是市场崩溃的后果却很快传遍了整个国家。甚至在10月的黑暗日子之前,美国经济就已经在遭受生产能力过剩和生产过剩的折磨,工资和价格并未与供给保持同步。在这种情况下,华尔街暴跌的通货紧缩效应很快便扩散到了现实的经济。信贷吃紧,对于很多人来说,信贷变成了一种不存在。仅仅1930年,就有1352家银行倒闭。各行各业都在削减生产、开支和库存,并成千上万地解雇工人。到了1932年,大约四分之一的人口没有固定收入。[7]那些足够幸运拥有工作的人也发现工资在减少。美国经济在稳步萎缩,国民生产总值在1929年和1933年之间下跌了三分之一。直到1941年,国民生产才重新回到20年代达到的产值水平。

这样,华尔街的崩溃使美国加速跌入了大萧条。美国把余下世界也一同带了进去。欧洲的信贷市场得到缓解,但是银行

和投资者仍旧因纽约的损失而蹒跚跋涉，鉴于糟糕的商业环境，它们面临着巨大压力去寻找有价值的借贷者。甚至在纽约证券市场跳水之前，下跌的农业价格、发展中国家资本的不足、欧洲的缓慢增长就已经使国际经济在重重压力之下苦苦挣扎了。除此之外，还有美国的大收缩和国际贸易的暴跌，在 1929 年和 1932 年之间，国际贸易下跌了 60% 以上。[8] 全球经济陷入了一个稳步的下降螺旋。

当时各国首都盛行的自行其是的态度使事情变得更糟。各个国家不是相互合作阻止下跌，而是分别试图使自己远离国际市场，这反而进一步深化了集体危机。美国首先开始了这样的举措。国会于 1930 年通过了斯慕特-霍利关税法案(Smoot-Hawley tariffs)，结果导致国外出现了一轮报复性关税浪潮。随着 30 年代的展开，国际经济被划分成了几个保护性的和对抗性的贸易集团。保护壁垒可能为政客、国内生产者和联盟提供暂时的舒缓，但是它们对于已经肢解的国际经济却具有毁灭性的影响。

美国首先破坏了全球贸易体系，英国则率先扰乱了货币体系。1931 年 9 月，英国退出金本位制(gold standard)，宣称它将只离开金本位制几个月——时间长度足以实现英镑的适度贬值，使之有助于推动贸易、刺激经济增长。然而，英镑却持续下跌了 30%，对全球金融体系造成了严重破坏。接着那年底，日本退出金本位制，日元很快贬值 40%。美元的随后增值及其对美国收支平衡的负面影响促使华盛顿也如法炮制，1933 年美国放弃金本位制。随着三个世界主要经济体离开了金本位制，国际经济实际上没有了管家。世界各国迫切需要一次世界经济会议以规划新的货币体系轮廓，并制定出新的兑换率，但是美国却拒绝接受这个共识，再一次以国际经济的稳定为代价寻求自我保护。

这种使国际经济四分五裂的四散溃逃精神很快就扩溢到了

政治领域。在当时艰难的时局中，安全事务方面的考虑同经济领域一样，短视的国家优先考虑胜过了长期的集体安宁。正如当时一位历史学家所指出的，保护壁垒就是“政治孤立主义的经济对应物”[9]。由于大萧条对各国——尤其是德国和日本的国内政治敲响了可怕的警钟，因此各个国家都纷纷自顾家门证明是极其危险的。

德国经济恰恰在1929年的崩溃之前陷入了悲惨的困境。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破坏和凡尔赛和平会议上施加给战败德国的赔偿使德国经济绝对不可能快速恢复。20年代初期通货膨胀在德国肆虐。譬如，1923年1月和11月之间，马克由大约1万8千元兑换1美元上涨到超过4万亿元兑换1美元。银行职员开始通过称银票堆的重量而不是点数钞票来确保支付有序。阿道夫·希特勒，当时还是一个无名的民族主义政客，预见性地对普通店主的境况作这样的评论：“她的生意破产了，她的生计绝对毁灭了。她可以去乞讨。然而同样的绝望却存在于全部人民中间。我们正面临着一场革命。”[10]

德国的病态经济使它在面对华尔街的崩溃以及随后的国际贸易萎缩时变得尤其脆弱。失业开始上升，并很快超过了国家失业保险基金的财力。随后的危机迫使总理海因里希·勃鲁宁(Heinrich Bruning)要求1930年9月举行大选。国家社会党(National Socialist Party)赢得的支持随同失业稳步攀升。纳粹党人原来在国会只拥有12个席位，经过选举获得了107个席位，一下子崛起。勃鲁宁在纳粹党实力上升的压力之下只得实施更为民族主义的路线，而这个举动由于引起外国人撤离投资更进一步加剧了失业。随着德国银行开始大规模破产，国际社会考虑共同筹集一笔集体贷款以稳定德国经济。但是，这个计划由于英国和美国的反对而落空。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总统

没有时间或心思考虑德国经济,因为美国的预算赤字爬到了新高。

鉴于德国民族主义崛起浪潮从未如此可怕,英国和法国在1932年夏天实际上取消了柏林欠他们的更多的战争赔偿。但是这太晚了。德国的工业生产自1929年以来已经下跌了超过40%,大约三分之一的劳动力失业。纳粹在继续利用不断加剧的经济重压。通过大众意志(在1932年11月的大选中纳粹党人赢得了196个国会席位)与幕后操纵相结合,希特勒于1933年1月成为总理。

希特勒很快便开始重新武装。《凡尔赛和约》规定德国军队的限额为7个步兵师10万兵力。1935年初,希特勒要求拥有36个师55万兵力。德国日益增长的野心和能力与其不断上升的反犹太主义狂热相互促进。柏林,作为世界上最国际化的城市之一和将近20万犹太人的家乡,变成了欧洲犹太民族系统毁灭的原爆点(ground zero)。

不管警戒征兆多么确凿无误,法国、英国和美国都急着躲避。世界主要民主国家由于被经济丧失活力弄得脆弱难支、自顾不暇,因此只能被动地看着希特勒重新武装起来,使莱茵兰地区重新军事化,侵略并兼并奥地利,征服捷克斯洛伐克,获得该国大量的战争物资和军备。直到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英国和法国才开始面对他们可能成为下一个对象的现实——而且他们除了宣战别无选择。甚至那时,美国还是避免了直接卷入冲突长达两年之久,直到自己的战舰在珍珠港事件中被击沉为止。

在东亚,事件的发生顺序惊人地相似。相互依赖的全球经济将大萧条传到了日本。这个国家的庞大农业部门遭受到了农产品价格急剧下跌的沉重打击。到1930年,稻米农场主的平均

收入已经下跌了将近三分之一。世界贸易的衰退加上保护主义壁垒的出现——斯慕特-霍利关税法案使日本商品进入美国的关税平均增加了23%——迫使很多小企业走向破产。失业率在城市地区飙升,并最终导致劳动力动荡。就像在德国一样,经济重压对这个国家羽翼未丰的民主制度造成了迅速的、严重的影响,使政党体制、统治精英,以及主导经济的大卡特尔财阀名誉扫地。明治宪法中所体现的自由原则成了要求回归传统价值观、社会秩序和国家力量的牺牲品。

军队自动成了这场国家复兴运动的先锋。军官团,作为强调荣誉和自我牺牲精神的传统价值观的忠实信徒,志在领导日本走出因不称职的政客、腐败的商人、自私自利的官僚造成的混乱状态。日本大众加入新的民族主义俱乐部和组织以便献身于民族复兴事业。在指导国家新使命的幌子下,军队开始破坏议会制政府并从政党手中夺取了对国家的控制。一个陆军正规军小组于1932年5月暗杀了首相犬养毅(Tsuyoshi Inukai),为海军上将斋藤实(Saito Makoto)取而代之统治日本铺平了道路。自那以后,军官团实际上控制了日本国。

在军队的领导下,日本的外交政策在基调和实质方面都变得越来越具有挑衅性。陆军于1931年占领了满洲,并随后对其进行了事实上的兼并,这成了日本致力于确立对大部分东亚地区主宰地位的第一步。军队领导人已经在他们自己的权威下行事了。虽然陆军大臣南次郎(Jiro Minami)的确向政府通报了满洲的局势,但是他还向文职(civilian)领导人明确表示,陆军可以在“不咨询内阁”的情况下采取行动,“他争取获得内阁的支持只是走走过场”。[11]海军也同样排除了文职控制,同时,海军还在拟订一个很大的建设计划,为“南进”和可能与美国太平洋舰队发生冲突做准备。

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就像在德国向更坏转变之后对待德国的那样，被动地看着日本军队接管国家、昭示其掠夺野心。国际联盟确实开会考虑对日本占领满洲一事采取一次集体回应。但是，在30年代初期的艰难时局下，这样的会议除了腕力角斗和对日本的行为进行一番言辞谴责之外，不会产生更多的实际效果。日本对遭受谴责的回应是退出国际联盟，将自己的注意力迅速转回到对亚洲大陆的进一步征服。国际联盟及其体现的集体安全精神遭到了致命伤害。日本的侵略实际上没有受到任何抑制，直到1941年的下半年，日本向印度支那挺进并对珍珠港发动了先发制人的袭击，才使美国及其盟国别无选择、只有回击。

这样，大萧条就从两头点燃了导火线。它带动了德国和日本的连锁事件，将羽翼未丰的民主国家变成了残酷无情的侵略者。与此同时，它把世界上稳定的民主国家变成了消极被动、瞻前顾后的旁观者，每一个都试图把责任推卸给另一个，全都不愿携手阻止隐约可见的灾难。经济动荡变成了政治堕落，不仅滋生了侵略国家，而且为他们作恶犯罪扫清了道路。

这段历史给人们提供了严肃的教训。它强调，金融市场下跌比上涨来得更快。它说明，全球化经济传播贫困能够像传播繁荣那样容易。它明确无误地昭示，经济重压能够对国内和国际政治的特性产生寒心沮丧的效应。历史很可能不会重演。但是，重温两位美国最杰出的经济历史学家查尔斯·金德尔博格(Charles Kindleberger)和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是如何结束他们关于大萧条的经典著作的，却非常值得。

金德尔博格在1973年写道，他确认出好几个可能的情形使他对未来极度担心。他的首要忧虑在于，“美国和欧洲经济共同

体为世界经济领导地位竞争"将会破坏全球经济的稳定。[12]既然欧洲经济共同体已经变成了欧洲联盟,享用着单一市场和单一货币,并且正处于获得地缘政治雄心的过程之中,那么我们只能猜测,金德尔博格决不会对未来国际经济的稳定感到放心。

加尔布雷斯的主要担心是美国自身以及这个国家再次成为繁荣与破产恶性循环牺牲品的可能性。他警告说,核心挑战在于,记住过去,避免过分自信和过度乐观,因为它们是投机繁荣的根源。正如加尔布雷斯在1954年所写的,"投机爆发具有较大或者较小的免疫效应。随后的崩溃自动破坏了投机所需的那种气氛。结果,一次投机爆发提供了合理可信的担保,保证下一次爆发不会马上发生。随着时间的延续和记忆的淡漠,免疫力开始逐渐减弱。循环再现成为可能。1935年,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诱使美国人在证券市场上进行投机冒险活动。到了1955年,可能性就大得多了。"[13]

恰如加尔布雷斯所预言的,美国的记忆的确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淡漠。在90年代,投资者将证券市场的价格哄抬到了自1929年以来从未见过的危险高度。最近一次的投机繁荣已经结束了。虽然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发现他们的存款减少了,但幸运的是,这次着陆比20年代繁荣之后的着陆要软得多。

但是,最近美国经济所发生的一切可能还会发生在作为一个整体的国际体系内。美国人如此容易背对经济历史的教训,说明他们很可能在地缘政治事务方面也一样背对历史的教训。这一点在当今时代尤其确凿无误,因为当今时代全球化模糊了经济学与地缘政治学的区别,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经济相互依赖,这种相互依赖据传永久性地消除了分裂带。然而,值得牢记的是,90年代证券市场的繁荣完全与20年代证券市场的繁荣一样非理性、一样危险,相比将大萧条扩展到世界每个角落的全球

经济而言，今日全球化经济的速度和广度可能使之更容易传递震荡。

## 全球化：灵丹妙药还是险象环生？

在《凌志车与橄榄树》第一章，托马斯·弗里德曼告诉我们，他是一个“有倾向性的旅行家”。他是一位旅行家，因为他到处旅行并报道他所看到的一切。他有倾向性，因为他总是通过一个特别的透镜——全球化的透镜来看待一切事物。他花费了90年代后半段时间横贯全球，从公司董事会会议室到偏僻的山村（大部分前者），弗里德曼最后得出结论：全球化是“塑造实际上每个国家内政与外交的全面支配性（overarching）国际体系”[14]。

在具体分析他的全球化主张时，弗里德曼指责说，那些寻求制定新的全球体系的人已经被“过多依赖过去而且单纯依赖过去预测未来”的尝试所误导。然而，弗里德曼却恰恰犯了截然相反的错误。他尝试着过多依赖现在而且单纯依赖现在预测未来。因此，他提供的只是一张转瞬一刻的快照，而不是一块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模板。

弗里德曼的正确之处在于，他认为全球化有很多新鲜的地方，这种新奇值得人们对它的地缘政治意义进行探索性评估。贸易和资本的国际流动已经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全球经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互依赖。在1985年至世纪末这段时间，在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增加了500%以上。美国商品和服务的出口在过去20年中增长了200%以上。

全球化在质量意义上也带来了变革。贸易和金融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拥有全球市场。现在，生产本身已经走向全球。丰田汽车公司在美国造车、福特汽车公司在墨西哥造车、大众汽车公

司在巴西造车。当美国软件开发人在西雅图良宵安歇时，他们在印度班加罗尔的同事接着他们的工作继续研发，只需在工作日开始时通过电子邮件将正在成型的项目及时传回西雅图。生产场所和智力资本的全球化提高了相互依赖的风险。几十亿美元的养老基金投资到印度尼西亚，一夜之间就会败露。一家在印度尼西亚拥有两个制造工厂、一个研发实验室、成千上万名雇员的美国公司更多地关系到这个国家的长期福祉。

互联网和信息革命也改变了全球化的特性，使之变得更具侵入性。全球市场的操作通常主要是将已经变成国家金融和贸易中心的各个人关点联结起来。银行家、发货商和公司经理在纽约、伦敦、法兰克福、东京和香港这样的地方被融入了一个全球网络。但是，他们的大多数同胞不在这些商业和金融主渠道工作，因此他们与国外市场或地方代表没有直接联系。

在美国有线新闻网、移动电话和互联网的时代，情况就不同了。正如弗里德曼非常贴切地指出的，新技术使"个人、公司和民族国家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更远、更快、更深、更便宜的方式到达世界各地。"[15]现在普通国民，而不仅仅是公司主管，能够在全球市场上运作。信息技术革命甚至能够渗透到那些对其进行抵制的社会。上海到处充斥着移动电话、互联网广告和广播大厦。它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一部未来主义电影，而不是一个至少名义上在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城市。米洛舍维奇的倒台，在很大意义上是 2000 年 9 月大选前反对派使用移动电话与互联网组织和动员的结果。不管如何尝试，米洛舍维奇都不能垄断所有信息渠道。他的政权被观念的自由流动解除了武装，并很快就崩溃了。

新技术增加的不仅是流入国家的信息，而且还有流出国家的信息。丑闻几乎每天都在一个国家或者另外一个国家曝光，

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媒体和众多私人公司不断进行仔细调查,发表时事通讯,这几乎使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保守秘密。现在国际金融流动的规模和速度使大多数国家都暴露在市场分析人士的严密监视之下,从而使国家必须按照规则行事——否则,就会发现他们的债券贬值、利率下挫。弗里德曼"金色紧身衣"的思想对于全球化迫使国家接受开放商业惯例和实行良政方面的能力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比喻。

因此,他的关键错误并不在于对全球化的精彩描述,而在于他假定他所描述的"全面支配性国际体系"就是未来的新世界——而不仅仅是走向某种其他的尚不明确的替代世界的一个暂时性、过渡性阶段。弗里德曼是一位报纸记者,因此有理由写下他所看到和听到的一切。但是,如果我们超越他的报道平面看得更远一些,把他对全球化的良性判断放在更大的历史形势中去看,那么他的世界地图就开始分崩离析了。

弗里德曼几乎不是第一个把暂时繁荣及其安定效应错误地当作了更持久的和平。1792 年,评论家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写道:"如果商业得到允许在它所能达到的普遍范围内发挥作用,那么它将根除战争体系。"[16]1848 年,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大胆地指出:"国际贸易的广大范围和快速增长……是世界和平的主要保障。"[17]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可能是最臭名昭著的乐观主义者,这只是因为他所选择的时间。1910 年,安吉尔出版《大幻觉》一书,他提出,大国之间的战争已经变得彻底非理性了,因为"征服完全没有经济利益可图"。安吉尔声称,起作用的是"达到了史无前例的伟大程度"的经济相互依赖,这个条件的出现得益于"快速邮政、金融和商业信息通过电报手段的即时性散发,以及总体上通讯速度难以置信的提高"[18]。然而,到了 1914 年夏天,欧洲进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

剧痛之中。

历史的砝码并不是惟一的理由让我们怀疑弗里德曼的乐观主义将被证明同潘恩、穆勒和安吉尔的乐观主义一样是一种错觉。大量的证据已经说明,全球经济并不像它看起来的那样稳定。美国证券市场在90年代当然显示了令人注目的强劲力量。即使面临着2000年底开始的滑坡,过去十年来市场的表现也是史无前例的。但是,这种上涨与其说是经济健康、决策者和投资群体具有超凡能力与良好判断的象征,不如说是不平衡和无节制的征兆。尽管确凿的证据说明股价已经大大超过了它们的潜在价值,金钱还是继续向市场倾泻。尽管有1929年的教训,边际买入(margin buying)还是再次得到允许去满足投机过剩。

感谢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阿兰·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以及美国经济的潜在力量,危险的高度变成了稳步的冷却而不是惊慌失措的出逃。甚至2001年9月恐怖袭击事件引起的大甩卖也是以一种有序的方式进行的。然而,20世纪90年代令人兴奋的日子,不管当时多么乐观,都使美国经济陷入了一种显著的脆弱境地,再次使其经受证券市场崩溃的危险。另外,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具有世界范围的影响力,这一点也清楚地说明,全球化虽然有时候是共同繁荣的源泉,但是全球化也能够成为经济震荡的传送带。以国际经济为渠道,一场开始于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这三个国家相对而言是较小的经济体,远在世界主要市场数千英里之外——的货币危机向全球各地蔓延,几乎毁掉了国际金融体系。

即使美国能够避免一场拖长的衰退,国际经济的有效管理职能能够阻止断断续续袭击一个国家或另外一个国家的金融震荡的传播,全球化也很难说是一副灵丹妙药。全球化培育的相互依赖不仅不是和平与繁荣的保障,而且它还可能成为脆弱性

和战略对抗的根源。毕竟，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着手攫取地区霸权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获得自给自足，并结束对进口外国钢铁和石油的依赖。此外，虽然全球化能够给很多地区带来新发现的财富，但是它也在扩大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这种扩溢效应助长了反美仇恨，并刺激极端主义团体对美国公民及其领土实施暴力行为。欧洲崛起为一个新的经济力量中心也可能极大地改变全球化的特性。美国继续以它认为合适的方式设计和管理全球经济。但是，随着华盛顿的决策者渐渐发现他们的影响力开始丧失，转移到了他们在欧洲和最终亚洲的同仁手中，单一船长掌舵带来的稳定性就可能让位于全球经济发展的严重偏离航线。

因此，对全球化的现实主义评估必须面对两种可能的情形，任何一种情形都使弗里德曼的世界地图变得陈旧过时。第一种情形是，严重衰退袭击全球经济，从一个国家转到另外一个国家，通过的渠道与90年代使世界经济变得如此强劲的因素完全一样，即纤维光学、卫星和贸易平台。第二种情形是，全球市场最终表现出弹性，并以令人羡慕的方式运作，但是随之而来的增长及其政治后果却破坏了赋予全球化良性效应（benign effects）的特有条件。

## 投机过剩的危险

可以理解，对美国经济健康性的评估受到了美国经济表现的影响。气氛很重要。在衰退过程中，分析人士好像到处挑毛病。在繁荣过程中，好消息总是接二连三。例如，80年代的停滞岁月使人们对美国难以驾御的经济苦难忧心忡忡，而90年代的显著增长却又使人们对美国经济充满了几乎难以抑制的信心。预言道琼斯指数（Dow）将持续向新高攀升的著作时有出

现。分析人士宣称，数字时代终于消灭了商业周期的上下波动。

这种乐观主义加上年复一年的显著经济增长，助长了美国证券市场的大幅度上涨。1989 年 12 月 29 日，道琼斯指数以 2753 点收盘，纳斯达克指数（Nasdaq）以 454 点收盘。到了 1999 年 12 月 31 日，道指已经上升了 300％多，达到 11497 点，纳指更是上升了将近 800％，达到 4069 点。受可观赢利前景——也是现实——的诱惑，投资证券的美国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截至上一个十年底，大约一半的美国家庭拥有证券，占平均家庭资产的 40％以上。联邦储备局估计，1999 年底美国人拥有 13 万 3 千亿美元证券，比上一年增长了 26％。[19] 80 年代初期，大约有 600 万个共同基金账户。到了 1998 年，大约有 1 亿 2 千万个共同基金账户，差不多每个美国家庭拥有 2 个。[20] 401k 养老金计划*的推广，以及很多雇员决定将所得资金投资购买证券，而不是当作固定收入的手段，促进了市场的繁荣。这样，自我永动的循环已经安排妥当。投资者购买证券，从而驱使价格上扬，反过来又鼓舞投资者对市场充满更大信心和投入更多金钱。

然而，在兴旺期间，90 年代末的市场开始与 20 年代末的市场非常相像。证券价格的健康增长毫无疑问是由上一个十年稳定的经济发展带来的。公司收入、利润和生产力一直在上升，它们证明股价的上涨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市场上涨得远远快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很多公司的股价爬升大大快过了公司

---

* 由于美国人没有储蓄的习惯，政府为了全面解决养老问题，鼓励职工个人和企业为职工的养老金进行储蓄。美国《国内收入法典》在 1978 年增加了“第 401k 条款”，对养老金存款给予特定的税收优惠。因此，养老金计划在美国又称“401k 计划”。按照该计划，职工可为养老设立专门的“401k”账户，由雇主和雇员共同向该账户存款，职工在领取工资时自动将一部分工资存入账户，由雇主向职工提供相应的配套资金，即按照职工存款比例由公司拿出一定资金存入职工“401k”账户。——译者注

的收益。根据历史标准，本益比(price-earnings ratio)非常危险地失去了平衡，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在以高于潜在价值的水平购买公司股票。

一些声音试图发出警报。耶鲁经济学家罗伯特·希勒尔(Robert Shiller)在《非理性的兴旺》一书中警告说："当前的证券市场展示了投机泡沫的典型特征。投机泡沫是指暂时性高价主要由投资者的热情而非由投资者对实际价值的一致判断维持的一种情况。"[21]希勒尔的主张是建立在惊人的数据基础之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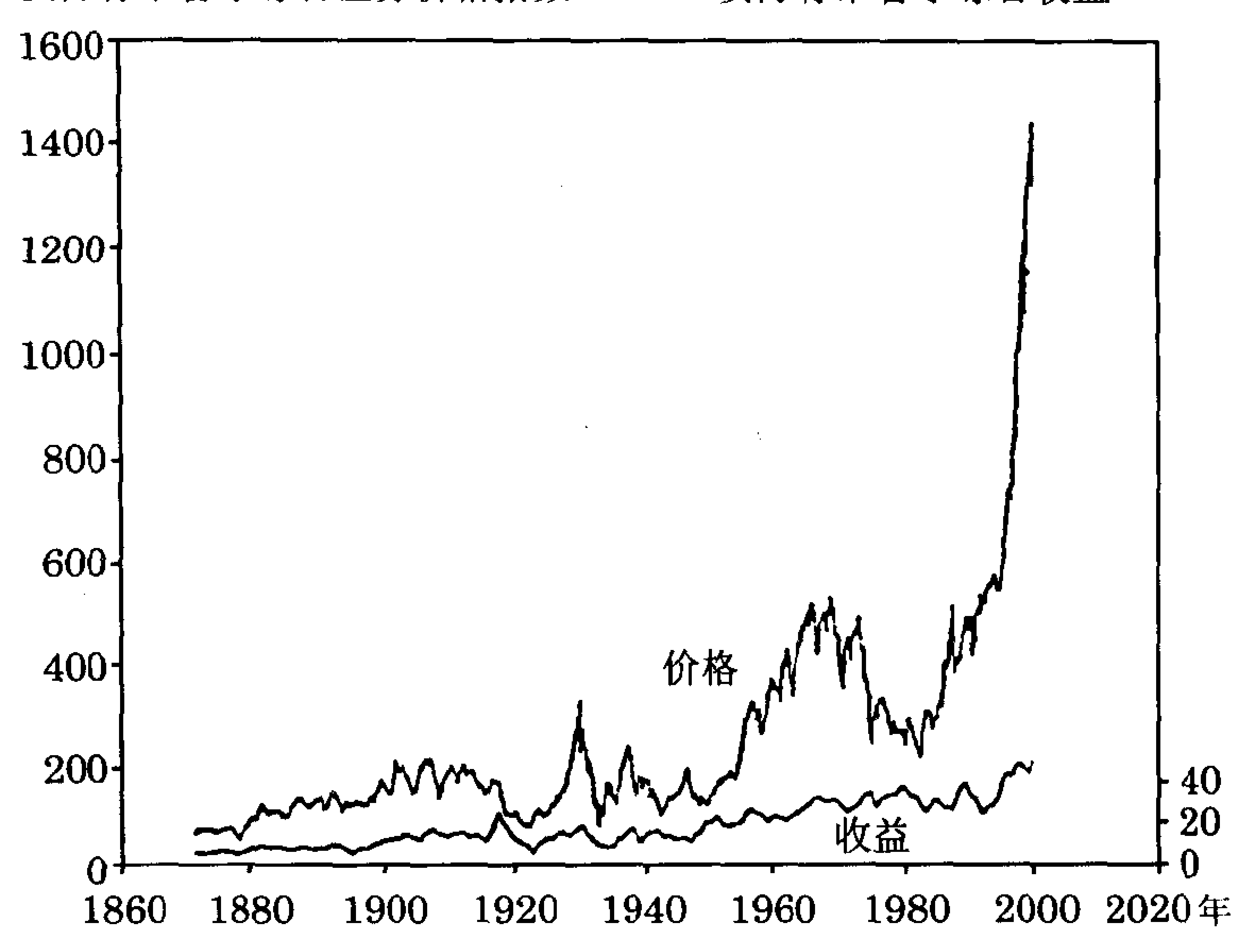



**图 1　证券价格与收益:1871—2000 年**

注：上曲线为 1871 年 1 月到 2000 年 1 月，每月实际(去除通货膨胀因素)标准普尔综合证券价格指数;下曲线为 1871 年 1 月到 1999 年 9 月实际标准普尔综合收益。

资料来源：Robert J. Shiller, *Irrational Exubera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6.

这些数据准确揭示了高涨的证券价格是如何与收益相互关联的。图 1 显示,股价成本在 90 年代突然出现尖峰向上飙升,上涨幅度大大快于收益。图 2 跟踪了本益比的发展情况,再一次揭示了根据历史标准,股价成本是何等的异乎寻常。只有在 20 年代末的时候,股价成本与收益差距才如此尖锐,1929 年 9 月本益比达到 32.6(意味着标准普尔综合指数〈S&P Composite Index〉上的公司股价成本平均以 32.6 倍于每股收益的水平在进行交易)。接下来的三年中,标准普尔综合指数的实际价值开始下跌 80%。2000 年 1 月,平均本益比达到 44.3。[22]根据上次所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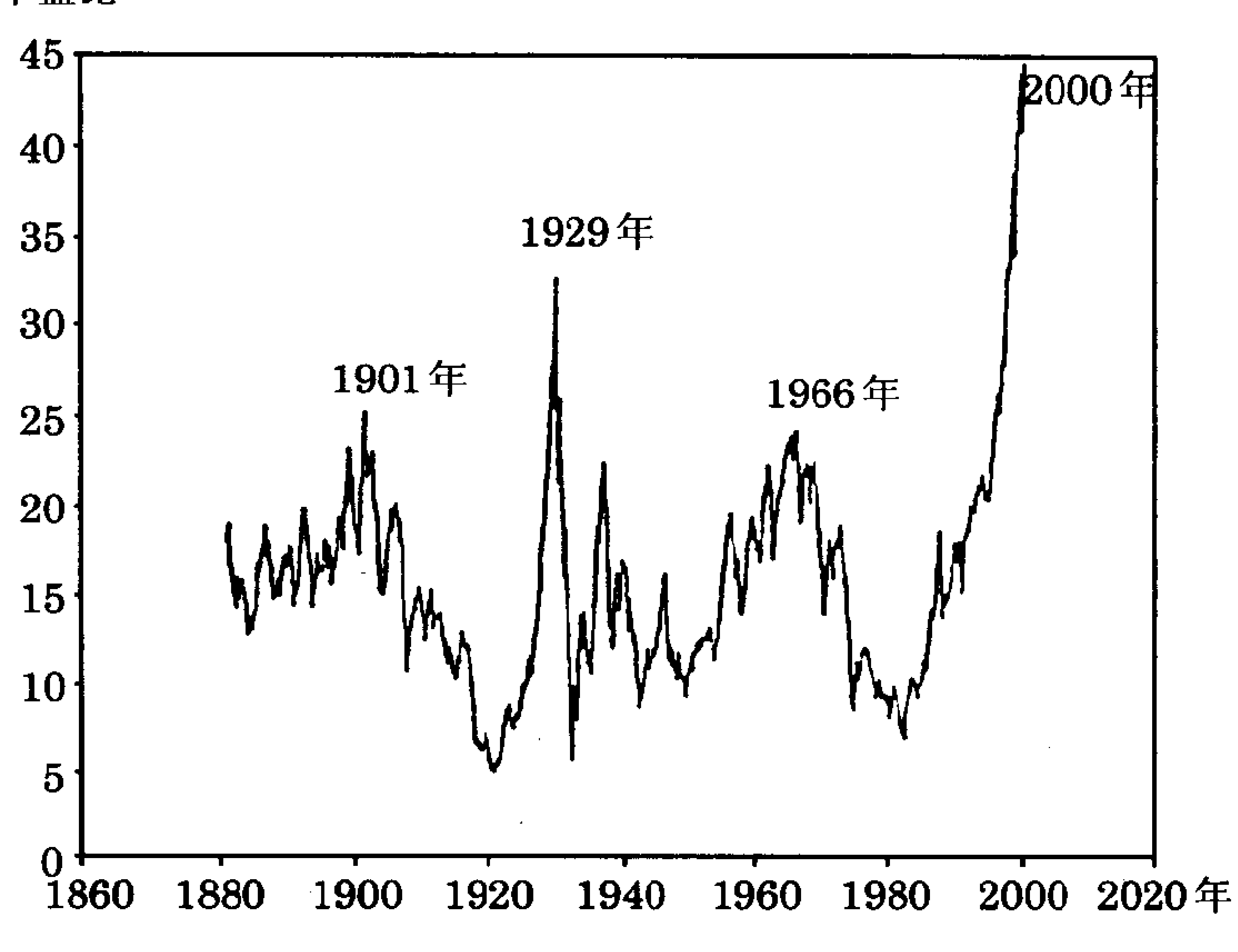




**图 2　本益比:1881—2000 年**

注:上图曲线为 1881 年 1 月到 2000 年 1 月的每月本益比。分子:1 月实际(去除通货膨胀因素)标准普尔综合证券价格指数。分母:前十年实际标准普尔综合收益的变动均值。高峰年份已在图中注明。

资料来源:Robert J. Shiller, *Irrational Exubera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8.

生的一切,市场已经清晰地达到了危险高度。

证券价格与其潜在价值之间的分离可以由各个公司的奇异命运来加以说明。某些市场的宠儿实际上无论怎样都没有获得任何收益。亚马逊网络公司(Amazon.com),作为在线书店和音乐店,一直未取得利润。然而,它的市场价值却从1997年5月上市时的大约4亿3千万美元猛增到1999年底的350亿美元以上。如此膨胀的价格意味着对业绩数字过分夸张的敏感性。无力的收益报告相当于炸弹。苹果电脑公司在2000年9月28日市场关闭之后宣布,其第四季度的收益比预期估计大约要减少10%。苹果电脑公司股票的财政年度收益大约为每股1.71美元,而不是预计的每股1.87美元。如果价格运动与本益比步调一致,那么苹果电脑公司证券价格应该下跌10%。然而,9月29日,苹果电脑公司的股价从大约53美元急剧下跌到26美元,丧失了其价值的50%,当天收市的水平相当于90年代初期交易时的一般水平。这是再好不过的证据证明市场随着希望与恐惧而兴衰,而不是依据有力的经济分析而波动。

在其他令人担心的方面,90年代的繁荣与20年代的牛市也惊人地相似。正如在20年代期间,道琼斯指数的向上爬升助长了边际买入的急剧增加。在90年代期间,受利润高于借贷成本这种美好前景的诱惑,投资者严重依赖贷款来购买证券。欠纽约证券交易所(New York Stock Exchange)成员公司的债务从1998年12月到1999年12月增加了62%,达到将近2300万美元。到了2000年9月,边际债务又额外攀升了10%(从1998年底算起,增加了78%)。2000年3月,边际贷款占全部消费者借贷的16%,与1995年的7%形成鲜明对比。估计显示,在在线经纪公司中,边际债务占市场价值的百分比从1995年到2000年上升了459%。[23]2000年3月21日,纽约参议员查尔斯·舒梅

尔(Charles Schumer)告诉众议院银行金融服务委员会(Banking and Financial Services Committee)说:"今天的边际债务在全部市场资本化中所占的份额比大萧条以来的任何时刻都要高。"[24]

市场再一次被借来的金钱所驱动,如果债权人感到战战兢兢,那么它就有崩溃的危险。科技股在2000年春天曾经猛跌,到了当年晚些时候再度猛跌,这部分是由于需要清算财产以便偿还贷款的投资者出售证券引起的。随着边际追求者的介入,纳斯达克指数才最终稳定下来,但是这种稳定并未出现在几乎下跌了40%之前。科技公司尤其遭受了沉重打击,在4月初到5月底之间,高通公司(Qualcomm)猛跌了55%;思科公司(Cisco)下降了35%;美国在线(American Online)损失了21%。当年晚些时候,下滑再度出现,贷款的回收又一次促进了股票直线下跌。第二年4月纳斯达克指数已经从最高点上下跌了将近70%——由大约5100点降到1640点。甲骨文公司(Oracle)股票曾经很好地经受住了春天的下滑,但是在2000年9月到2001年4月间则猛跌了65%以上。亚马逊网络公司的市场价值4月时大约为50亿美元,从1999年底算起,差不多减少了300亿美元。

再有一点与20年代相似的是,美国繁荣的证券市场和增长经济刺激了对资本的需求,从而导致外国资本的流入。美国经济对全球金融的影响实际上变成了一种海绵效应。90年代初期,在往来账户存在盈余的国家(商品和服务出口多于进口的国家)的全部资本中,大约20%进入了美国资本市场。到了90年代末期,这个数字几乎上升到了70%。在1995年到2000年间,国外对美国公司债券的购买增加了3倍,对美国证券的购买几乎增加了10倍。截至90年代底,外国人在美国拥有的财产差不多达到了6万5千亿美元,相当于国库券市场的35%和公司债券市场的20%。[25]外国投资者发现美国经济如此引人入胜,当

然支撑了令人兴奋的时光和证券市场的繁荣。

然而,全球向美国投资的热潮并不是没有代价的。日益增长的国际不平衡,尽管被美国市场的显要表现所遮掩,但是它却一直在增加着全球经济对严重震荡的脆弱性。大多数流入美国的资本来自欧洲,造成欧元价值在1999—2000年间下降了25%。低沉的欧元使欧洲出口变得廉价,从而严重增加了美国的贸易赤字,而作为东亚金融危机和该地区货币贬值的结果,美国的贸易赤字早已激增。美国的贸易逆差从1998年的1670亿美元,增加到1999年的2620亿美元,再到2000年的3760亿美元。

美国依赖国外资本补偿贸易赤字反过来引起美元的增值,这只是使问题进一步恶化了并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欧元下跌了,欧洲人到美国投资以避免欧元可能进一步贬值,这加强了美元的力量。美国的贸易逆差在增加,结果刺激了对国外资本的进一步需求,引起欧元进一步下跌。这个循环,加上美国经济对国外投资者的吸引力,说明了为什么美国变得如此依赖获得国外资本,以及外国人如何能够在美国拥有6万5千亿美元的财政债权——这个数字超过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0%。拥有这样一大笔国外债务短期内支撑了美国经济,改善了日常生活的质量。但是,这个国家并没有按照收入过日子,而是在积累一定水平的债务,这个债务将持续吞食未来的繁荣。

繁荣的市场还有另外一个讨厌的效应。美国每年的个人储蓄率减缩到了战后最低点。2000年只有1%,达到193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人减少财富节省的部分原因在于,这个时代鼓励他们生活铺张。低储蓄对经济增长的限制效应被公司投资和国外资本的流入掩盖了。但是,随着美国经济放缓、公司减少投资、外国资本流向其他地方,美国就开始感受到了人民喜欢消

费、憎恨储蓄的影响。

美国经济虽然在整个90年代作为模范在世界兜售，但是仅仅在表层的下面，它却面临着严重的危险。美国的证券市场被极其危险地高估了。尽管它已经从令人头晕目眩的高度走了下来，而且只出现了孤立的为数不多的疯狂甩卖，但是，过去几年的记录已经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投机繁荣和破裂的潜在可能。同时，外债上升，这既受助于也助长了大规模的贸易赤字和对美元的高估。更糟的是，这两条经济分裂带是相互交叉的。证券市场被过分高估，部分因为外国人一方面直接投资于证券市场，另一方面又为其他人也能够这样做在信贷市场上提供必要的清算。美元被过分高估，部分因为证券市场的实力和投资美国证券、国库券和债券的欲望使然。如果证券市场和美元一并跌落，那么一方的下跌将会加强另一方的下跌，从而有可能导致二者成瀑布状狂跌。

## 逆境的传递

鉴于90年代集结起来的过剩，证券市场和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以可喜的平静冷却了下来。到了2001年春天，标准普尔指数上的平均本益比已经安定在危险性较小的区域。但是，正如过去再清楚不过地昭示的，任何数量的未能预见到的发展变化都可能将相对良性的环境转变成一个经济大漩涡。苦难中的美国经济带来的影响肯定会波及到整个全球经济。弗里德曼发现如此令人着迷的全球化的某些特征——它的速度、深度、广度和低成本——使人确凿无疑地断定，美国的逆境将会以惊人的效率传递给余下世界。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全球化本身是一种自然现象，全球经济扩展基础结构——管道设备——使之变为可能。顺境时，

基础结构快速传递繁荣和稳定。但是,逆境时,基础结构同样快速地传递贫困和不稳定。全球化的效应完全取决于它快速而宽大的输送管道内传送的东西究竟是什么。

东南亚金融危机让我们很好地感受到了麻烦是如何快速而无情地通过全球经济进行传播的。这个麻烦于1997年中期由泰国开始,当时,对泰国经济的高估和过热的恐惧导致了资本的外逃。泰铢(baht)的价值迅速下跌了大约20%。菲律宾比索(peso)是排列队伍中的下一个。短短几周之内,马来西亚林吉特(ringgit)和印度尼西亚卢比(盾)(rupiah)也开始下滑。卢比在两个月时间里价值损失了30%。到秋天的时候,危机扩展到了东北亚。10月,中国台湾地区将其货币贬值,之后针对港币的投机活动马上接踵而至。大量的货币储备和有效的经营管理能够使财政当局维持货币的价值。但是,这样做需要将银行之间的借贷利率猛升到300%,这个利率帮助把香港证券市场推向暴跌,四天之内跌了大约25%。韩国韩元(won)是下一个受害者,到11月中旬,由850韩元兑换1美元下跌到超过1000韩元兑换1美元。

虽然学者对于危机的初始原因意见不一,但是在一个问题上他们却是完全一致的,即危机扩展得如此快速和广泛恰恰因为它是通过全球经济的有效输送管道进行传递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教授、亚洲经济问题主要专家史蒂芬·哈加德(Stephen Haggard)是这样描述危机蔓延的:“更深刻的金融一体化的进程成了危机发生的一个必要条件……一旦这样的危机由一个国家(地区)开始,那么存在多种多样的渠道可以将危机传播到其他国家(地区),包括对争先恐后贬值的恐惧或各种各样的金融联系……泰国传给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台币的贬值引起10月底香港的市场瘫痪;香港的市场瘫痪传给韩国,韩国

反过来于 1997 年底将共振反馈回东南亚市场。”[26]

麻烦很快就超越了东南亚。第二年 5 月，全球投资者已经开始撤离俄罗斯，致使这个国家的证券和债券市场急剧下跌。中央银行将利率提升到 15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了紧急贷款，使卢布(ruble)和市场得以支撑。但是，这只是暂时的。到了 8 月，俄罗斯的证券市场再一次下跌，而且这一次还拖着卢布一起下跌。8 月 17 日，克里姆林宫宣布卢布贬值，暂停偿还外债。俄罗斯拖欠债务的消息使全球证券市场步履维艰。普通俄罗斯人日常生活受到的影响是毁灭性的。卢布由差不多 6 元兑换 1 美元降到 18 元兑换 1 美元。俄罗斯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比例在 1997 年到 1999 年间几乎翻了一番。依赖固定收入生活的领取养老金的人尤其遭受了沉重打击，他们很多渴望着回到共产主义时代的相对繁荣。

俄罗斯拖欠债务加剧了人们对世界范围新兴市场可能崩溃的恐惧，诱使投资者开始从拉丁美洲撤离。1998 年 9 月巴西中央银行将利率提升到 50% 以阻止资本外逃，但是投资者还是继续撤回他们的资金。国际一揽子急救计划使市场平静了下来，但又一次只是暂时性的。巴西市场的溃败持续到 12 月，致使政府于 1999 年 1 月决定浮动巴西货币雷亚尔(real)。在随后的一个月中，巴西货币由 1.25 雷亚尔兑换 1 美元下降到 2.15 雷亚尔兑换 1 美元。

甚至连美国也未能幸免于这场危机。1997 年 10 月底，当情况变得明朗起来，东南亚的麻烦并不仅仅是“路上小故障”(克林顿总统最初时曾这样称呼)，道-琼斯平均指数(Dow Jones Average)下跌了 554 点，创造了一个最高的日点数损失新纪录。第二年 8 月，作为对俄罗斯厄运的反应，美国证券市场又发生了直线下跌。巴西的苦难加深了华尔街的担忧，再次使道指急剧下

滑。美国最大的套期保值基金(hedge fund)之一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濒临破产的消息也使市场沸沸扬扬。直到联邦储备局纽约分部推动一些主要美国银行和投资公司为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提供了35亿美元的紧急解困资金之后,平静才得以恢复。联邦储备委员会当局和私人公司一致认为,由于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对世界主要银行欠下的债务,它的崩溃可能会危害到国际银行体系。现在美国官员承认,1998年9月底全球金融体系距离清算危机和瘫痪只差几天时间了,如果不是几个小时的话。

这是一个令人惊恐的故事,它暴露了与一体化世界市场相伴随的相互的、无法回避的脆弱性。东南亚的一场小危机通过全球经济向外发展,将亚洲奇迹变成了亚洲恶梦,破坏了俄罗斯和巴西的货币,接着几乎让美国俯首屈服。这场危机发生在顺境时期使故事变得更加令人忧心忡忡。

既然甚至在全球增长时期国际经济对于震荡都如此脆弱,那么可以设想在逆境时期将会发生什么。例如,设想一下,如果一场危机由作为全球经济核心的美国开始,而不是由作为全球经济边缘的泰国开始,那么传播的可能是什么。开始下滑的将是美元和华尔街,而不是泰铢和曼谷交易所。随着投资者寻求遏制损失和倾销以美元命名的财产,甩卖将会加速进行。我们已经知道这会对外国证券市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由于美国证券市场占全球证券市场的大约40%,因此国外交易主要是从华尔街获取线索的。当道琼斯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猛跌时,伦敦、法兰克福、东京、新加坡,以及任何其他地方的市场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在纽约交易人经过华尔街受伤的一天之后回到家时,甩卖已经在东京开始了。当东京的投资者还在评估所受损失时,欧洲的市场也已经走上了下滑之路。

由核心开始的金融危机还会更难控制。全球经济在90年代获得显著稳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的管理作用。华盛顿或多或少制定着规则,有效地经营着监视和执行这些规则的制度,并应对着随时出现的紧急情况。当1994年墨西哥经济开始失足时,是美国干涉稳定了比索(peso)。当亚洲危机开始扩展时,是美国政府承担重任,刻意打消了日本从东京立场管理事务的计划。当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以及全球资本市场濒临崩溃时,是联邦储备局纽约分部为其组织了紧急解困资金。像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和劳伦斯·萨默斯这样的人的良好判断,加上美国繁荣带来的充足资源,一起逆转了全球经济的潜在威胁。

但是鲁宾和萨默斯已经不在了,幸运的时代也不在了。乔治·W.布什选择的财政部长保罗·奥尼尔(Paul O'Neill)早就明确宣称,他喜欢以一种非常不同的方式管理国际经济——让市场放任自流的撒手不管战略。根据奥尼尔的观点,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的失败没有任何关系。它与资本主义的缺席有关。"指望一揽子急救计划和其他类型的国际干预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问题的解决方案,因为它会通过减少危险鼓励那些不负责任的行为。奥尼尔上任之后很快就质问道:"为什么我们必须进行干预? 尤其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在面临危机时进行干预?"[27] 2001年,他的确放下了这些保留看法,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土耳其、巴西和阿根廷提供援助。但是,倘若1998年奥尼尔掌权,那么东亚的危机很可能会发展得更广泛、更深刻。

处于经济衰退过程中的美国也会显著改变管理国际经济的政治学,而不仅仅是管理国际经济的哲学。既然财政部掌握在激进主义分子的手中,那么这些人信奉的将是一种不同于90年代的政治学。由于缺少繁荣的证券市场和史无前例的预算盈余,因此国会将更加不会倾向于安排资源以帮助比索摆脱困境

或稳定泰铢。事实上，1997 年由于国内的政治反对，美国最初拒绝帮助亚洲解困。美国的政策直到危机的严重性变得明朗之后才改变了路线。

如果这样的吝啬在经济繁荣时期主宰了政策，那么看一下在比较歉收的情况下华盛顿会作如何反应。正像在前一次经济危机期间所做的那样，美国很可能转向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和自行其是的货币政策以使自己与国际经济隔离开来。美国已经大大受益于全球化，并因此已经成为全球化的主要支持者和管理者。但是，它对全球市场的公开支持直接取决于它所收获的利益。当经济和就业双双稳定增长时，因工厂迁往墨西哥而裁减下来的美国工人没有任何麻烦就可以找到新工作——而且工资更高。然而，如果美国经济萎靡不振，失业工人不能发现新的薪水更高的工作，那么这个国家对全球化的热情就可能衰减。当不太走运的情况盛行时，当全球化被看作失业和廉价进口的源泉而不是工作和经济增长的动力时，美国很可能是第一批选择退出的国家之一。扩大的经济衰退加上四散溃逃的精神可能马上使全球经济陷入动荡不安。这恰恰就是 30 年代所发生的一切。

乐观主义者认为这种情形是过于牵强的。他们争论说，我们现在已经对全球经济有了足够的了解，并且建立了足够的安保措施可以防止重蹈 30 年代的覆辙——上一次美国成了全球萧条的原爆点。金融市场与以往相比的确得到了更好的管理。1940 年的投资公司法案（Investment Company Act）使今天的共同基金比 20 年代的投资信托更安全。在特别不稳定时期介入的断路开关（circuit-breakers）和自动制约（automatic curbs）的确有助于限制市场的涨落。联邦储备局和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至少引入了一些举措限制边际买入，尽

管这些举措还嫌不够。[28]

虽然这些发明创新肯定帮忙不少，但是它们很难使市场免除已知的过剩，或者未知的可能导致事情向讨厌方向转化的弱点。在市场令人兴奋的日子，甚至联邦储备局主席格林斯潘和财政部长鲁宾都承认，他们害怕证券爬升到危险的高度。1996年12月，格林斯潘审慎地问道："我们怎么知道非理性的兴旺什么时候已经过度地加速了价值的增长，过度增长的价值于是非常容易地演变成意外的、拖长的紧缩，就像上一个十年在日本发生的那样？"[29]鲁宾在任期间更为细心和谨慎，但是离开财政部之后他很快就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在2000年6月的一次访谈中，鲁宾谨慎地告诉查利·罗斯(Charlie Rose)："据我所知，我们的证券市场可能被低估了。但是根据传统标准的惯例，它看上去确实很高。"他接着指出，美国市场的实力可能是"一系列过剩相互支持"的产物，"真正的和严重的危险……在大多数人思考金融决定时被过分低估了。"[30]证券交易委员会对每日交易商人的管理和制约可能会减轻最糟糕的不稳定和最异常的投机过剩。但是，它们却不能驯服认识不到维持股价与其潜在价值同步发展之重要性的市场。

数字革命及其导致的金融流动的速度和广度也使市场的管理更加困难。互联网和"新经济"确实有助于全球化及其带来的相互依赖。但是，全球化的新奇及其迅速变换的特性甚至使最好的经济模型和管理技术在开始实施时就变得过时了。毕竟，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是由两位知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和米隆·斯科莱斯(Myron Scholes)使用某些现有最先进的分析技术进行操作的。这个国家的最佳头脑制造了使其公司濒临崩溃的模型。

经济学家和决策者一样对于基本的政策问题束手无策。对

于东亚金融危机的原因，没有共识存在。某些分析人士认为，问题的核心是经济管理不当，尤其是在兑换率方面。其他人认为，投机和蔓延启动了下降螺旋。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干预减轻了危机还是仅仅使之变得更糟，也没有一致意见。某些人断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限制性货币和财政政策稳定了局势；其他人则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反应加重了下滑。[31]对于为什么俄罗斯的经济改革误入歧途，经济失去控制的分析，也是混淆不清。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俄罗斯在私有化和自由化方面的动作太快了，其他人则认为俄罗斯的动作还不够快。诸如此类的根本意见分歧是常态，而非例外。

由于对这些基本问题缺乏明晰判断，因此美国及其主要伙伴在改革全球金融结构方面进展不大也就不足为奇了。公务员、经济学家和投资群体都一致认为，全球经济充满了脆弱性，并具有充当传播不稳定渠道的可能。但是，没有人确信应该对此做些什么。格林斯潘再次坦率地表达了他对现存金融结构缺陷的担忧。2000 年 7 月，他悲叹道："全球金融的加速扩展……显然需要更新形式和层次的金融调解"，并因此提出了"这个新体系的内在稳定性问题"。在倡导建立新的金融机制以预防未来不稳定的过程中，格林斯潘要求的是"能够适应无法预见的下一次危机需要的灵活制度，而不是竭力预防前一次不会重复的危机可能再度来临的金融马其诺防线（financial Maginot Lines）"[32]。但是他并没有提出具体的设想。

2000 年秋天，来自世界各地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海牙集会，决心在危机管理和预防方面取得一定进展。但是，经过几整天的争论，他们都空手而归。一位美国官员承认，"可能现在我们能够说的最好的事情是，我们已经提升了沟通渠道。"至于代表们是否就创建管理未来经济危机的机制取得了进展，

伯克利大学教授巴里·艾兴格林(Barry Eichengreen)评论说:“甚至很难给他们及格。”[33]美国国际经济主要分析家之一、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也认为:“创建治理国际资本流动和金融事务的有效管理规则的努力,即使有进展,进展也是微乎其微的。”[34]

当然可能永远不需要一个不断更新的、反应灵活的全球金融结构。但是,这是不太可能的。虽然没人知道如何为此做准备,但是很少有人怀疑下一次经济震荡就在远处。美国的确挺身而出,在遏制90年代主要金融危机方面作出了令人称赞的努力。但是,如果一个严重不稳定的插曲出现在美国不愿或不能成为全球市场卫士的时候,那么结果可能就完全不同了。在今日全球化的经济中,灾难以缺乏警示的方式来临,并以惊人的速度传播。

倘若全球化脱离了轨道,那么其地缘政治影响可能与20世纪30年代的情况不会有什么大不同。俄罗斯和中国的脆弱政权,在经济震荡的重压之下,很可能演变成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政权。这两个国家与在大萧条打击之后成为法西斯主义牺牲品的羽翼未丰的民主国家存在某些相似之处。世界的其他主要国家——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都已经拥有了几十年的稳定民主,这很可能使他们能够避免向更加本土主义的和更加危险的政策堕落。然而,他们每一个都完全有能力在麻烦面前寻求躲避,就像大西洋民主国家在30年代遭遇德国和日本时所做的那样。

## 相互依赖和信息革命的不确定效应

即使自我管理的全球市场维持了稳定,前面关于经济分裂带的讨论证明无非是杞人忧天,我们也应该反对关于全球化为

和平与繁荣提供了确信路径这样的主张。理由是，弗里德曼严重高估了全球化的安定潜能。全球化的支持者认为，全球化最有力的和平诱发效应在于全球化推动的经济相互依赖。它的基本逻辑简单明了。随着两个国家之间贸易和投资的增长，他们维护和平关系的相互利益会变得更大。因此，全球化既提高了和平的利益，也提高了战争的代价。在相互依赖的世界经济中，国家有比拿起武器彼此对抗更好的办法。

虽然这个逻辑表面上似乎无懈可击，但是，一旦地缘政治进入情景，那么这个论断就变得没那么有说服力了。经济相互依赖的确提升了共同利益，但是它也创造了共同脆弱性。究竟彼此相依赖诱使国家以一致的步伐行动，还是反而助长了恐惧和要求更加自主，取决于这种相互依赖所处的政治环境。当同可信的伙伴进行贸易时，较深的经济联系是自我加强的；各方以最小的危险获得了共同收益，这进而鼓励他们继续贸易以获得更多。然而，当同潜在的对手进行贸易时，更多的相互依赖经常转化成更少的安全。在敌对环境中，共同利益为剥削利用而不是为相互收益提供了机遇。

恰恰是这样的算计驱使日本在30年代要求获得经济自给自足，并最终对珍珠港发动了袭击。日本人把他们对美国进口的依赖看作是一种脆弱性，而不是看作对美友好关系的源泉。假设其他情况全都一样，国家之间相互依赖更多比更少要好。但是，其他情况很少完全一样。最终，地缘政治紧迫性经常胜过经济机遇。否则的话，潘恩、穆勒和安吉尔将证明是正确的，战争很早以前就已经变得过时了。

历史记录也清楚地说明，即使当国家彼此关系足够融洽使高水平经济相互依赖得以出现时，它所导致的联系也不是长久和睦的保障。由一体化经济联结起来的国际社会能够以惊人的

速度瓦解。看一下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十年的欧洲，就足以说明问题。欧洲内部的贸易和投资，相对于国民经济的规模而言，一百年前比今天还要多。德国是英国的第二大最重要贸易伙伴(在美国之后)，英国是德国出口的首要市场。伦敦劳埃德保险社(Lloyds)是德国舰只的主要保险公司，而如果两个国家发现他们处于战争状态，那么皇家海军将寻求击沉这些舰只。[35]1900年代初期，边境是可以渗透的。欧洲人自由地由一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不用护照，也不用非得去打扰边境控制人员。

然而，如此强烈的相互依赖程度并未使欧洲避免快速滑向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对优势地位的要求和随后的地缘政治竞争不费吹灰之力就压倒了源自经济统合的相互利益。如果经济相互依赖没能在1914年使欧洲免于战争，那么就没有让人信服的理由自信地认为全球化能够在今天在维护稳定的和平方面做得更好。历史说明，现在横跨大西洋流动的大量商品和资本不是避免美国与崛起欧洲之间地缘政治竞争的保障。

最近多种族社会的分裂提供了进一步证据证明政治热情有能力胜过经济便利。纵观整个90年代，经济相互依赖在觉醒的民族主义渴望面前意义卑微。斯洛伐克人想要脱离捷克斯洛伐克，尽管这样肯定会使他们面临经济苦难。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科索沃和马其顿都寻求正式脱离南斯拉夫，尽管经济混乱将随之而来。自从波斯尼亚战争结束以来，这个国家的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都规避重建彼此之间的经济联系。他们宁愿贫穷也不与自己的敌人进行贸易。很多前苏联共和国由于与俄罗斯经济保持距离而面临着严重的困难。然而，他们却已经开始着手探求更多的自治。究竟相互依赖培养信任还是浇铸仇恨完全取决于经济统合所发生的政治环境。

过度高估信息革命的政治后果已经导致了对全球化和平诱

发效应的进一步夸张。数字技术已经毋庸置疑地使国家封锁社会避免同外界观念接触、抵制全球市场的渗透变得更加困难。传真机、移动电话、互联网、卫星电视和收音机、高分辨率侦察仪器——这些发明创新一同用信息对国家进行了攻击，使外部世界能够考察这些国家的内部事务。

其影响已经非常深刻。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在不小的程度上源于共产党丧失了对信息流动的控制，最终暴露了克里姆林宫的政治腐朽和意识形态破产。米洛舍维奇也相似地被因信息自由流动而成为可能的海啸般的人民反对赶下了台。肯定还有很多坏蛋没有反扑，因为在他们能够进行更大的破坏之前，观念的自由流动已经将他们边缘化了。像俄罗斯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Vladimir Zhirinovsky）和匈牙利伊斯特万·祖卡（Istvan Csurka）这样危险的意识形态狂，在过去十年中竭尽全力通过散播民族主义神话来延续他们的政治命运。然而，他们却被观念的市场阻隔了，观念的市场使他们丧失了对于比较无知的政治直觉的吸引力。

尽管存在这些幸运的传奇，但是假定信息革命正在产生一个由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组成的世界将是一个错误。新信息技术可能帮助打倒了米洛舍维奇，但是它们也助长了伴随南斯拉夫解体的流血杀戮。米洛舍维奇和克罗地亚总统弗兰吉奥·图季曼（Franjo Tudjman）都残酷无情地利用媒体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对于 9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来说，媒体都是种族清洗的工具，而不是暴行的制止者。[36]

新的电讯技术也没能给中东带来和平。移动电话的使用在阿拉伯半岛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是普遍现象，但是民主很难成为受益者。以色列很早以前就变成了世界高技术中心之一，但是以巴争端仍像以前一样根深蒂固。巴勒斯坦当局可能利用最

新的桌面发表程序准备新教科书。但是,如果这些教科书对中东冲突进行了偏颇的历史陈述,那么它们只会确保又一代巴勒斯坦人疏远不和、充满怨恨。

这里的要点不是说数字革命总的来说推动了不稳定,而是说信息的自由流动在某些情况下坏处多于好处——并且肯定不是宽容和民主治理的保障。新信息技术为不负责任的领导人提供了宣传恶毒意识形态的能力。并不仅仅是那些非常不幸地被米洛舍维奇之流统治的国家可能成为过量民众动员的牺牲品。如果美国和中国有一天发现他们正处于敌对的境地,那么我们就能非常容易地想象媒体煽动公众情绪的情形。2001 年 4 月,发生撞机事件和一架美国间谍飞机在中国紧急着陆之后,美国和中国政府都低调处理此事,完全意识到了媒体有可能帮助将一次事件转变成一场国际危机。毕竟,当亨利·杜鲁门(Henry Truman)在 1947 年 3 月 12 日——在大多数美国人看电视之前——一次讲话中公开杜鲁门主义时,他一点也不知道他正在为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及其过分的反共产主义帮忙奠定基础。信息革命的国际影响,就像经济相互依赖的国际影响一样,取决于这些技术得以展开的更广泛的政治环境。

## 不平等的愤怒

世界人口实际上只有一小部分能够使用现代通讯技术,这进一步削弱了关于信息革命有益地缘政治后果的论调。数字时代很可能已经造就了一个地球村。但是,它却是一个小村庄,构成的人口只是那些足够幸运地生活在与国际市场相联的国家的人。目前,世界居民只有大约 6% 能够使用因特网,他们大部分居住在北美和西欧。富人与穷人之间的距离日益加大。生活在最富国家的五分之一世界人口与生活在最穷国家的五分之一世

界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从 1960 年的 30:1 增加到 1997 年的 74:1。全球人口的五分之四生活在只能赚得世界收入五分之一的国家里。

世界上比较富裕的国家全都没有准备好坦然面对现在存在于北方和南方之间的总体不平等。全球大部分地区已经被排除在数字革命之外,这一点不会让美国、欧洲或者日本的什么人感到烦恼。与此同时,这场革命正在发挥着重要的扩溢效应,预示着要提高不平等不断加剧的危险性。技术向发展中世界的逐渐扩散使之具有了新的损害发达世界的能力。对全球大部分石油供给的控制过去曾经是南方制衡北方的主要杠杆。但是,知识将最终证明是比物质资源更有力的武器。

因特网和日益扩展的信息可利用性使那些想要获得的人能够更容易地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技术规格及其运载系统。因特网本身也能够被用来攻击发明和建设它的国家。通过打进五角大楼的网络、窃取微软公司的最新软件程序,或者散布严重破坏全球信息基础结构的电子信箱病毒(所有这些最近都曾发生过),一个孤单的、不满的电脑黑客能够对美国造成极大的损害。2000 年 5 月,两位菲律宾程序员散布了“爱虫”(love bug)病毒,24 小时之内在世界范围内感染了 1000 万台电脑,毁坏了价值 100 亿美元的数据。穷人将能够比过去做得更多来表达他们对被抛在后面的怨恨。

跟国家间不平等至少一样令人担忧的还有日益扩大的国家内部不平等。很多国家现在包含两个分离的经济——一个是存在于一些较好地区的、快速的、突飞猛进的经济,一个是存在于余下地区的、缓慢的、无精打采的经济。上海可能到处都是移动电话和互联网广告,但是中国人口的相当一部分却生活在这个国家的内陆地区,那里的村民可能连基本的服务都得不到。作

为莫斯科主要大街之一,特维尔斯卡亚大街(Tverskaya Street)上林立着很多世界级的高档商店,但是它们迎合的只是外国人和莫斯科的超级富豪。该市大部分人口则在为维持生计而苦苦挣扎。

甚至像以色列这样就人均收入而言相对富裕的国家,也面临着日益加大的社会分裂。特拉维夫北部郊区海尔兹利亚正在成为一个迷你硅谷。一部分以色列人在这个高技术行业工作,他们全面接触互联网并从中受益良多。但是,该地区的大部分人口却被排除在以色列这部分经济之外。大多数超正统犹太人避免参与全球化以及经常与之相伴随的世俗化。来自北部非洲国家的犹太移民经常缺乏进入高技术行业所必需的教育机会。巴勒斯坦人即使在幸运的一天被允许作为低工资劳动力进入以色列,他们除了以嫉妒和愤怒的复杂心态一旁观望也做不了什么。

这样的不平等具有滋生一系列问题的潜能。中国已经面临着沿海城市与农业内陆之间的危险分裂。二者之间的公路和铁路联系贫乏,社会和文化分歧在加大。如果内地继续维持在生计水平,而沿海却在爆炸增长,那么这个国家的完整性就可能处于危险状态。维持中国完整的顾虑已经使北京增大了对政治制度自由化的不情愿性,这反过来在更国际化的城市人口中有激发怨恨的危险。

在俄罗斯,不仅生活水平自共产主义崩溃以来已经下降了,而且大众已经目睹了新精英卷走很大一部分国家财富潜逃。金钱并不是离开俄罗斯的惟一财产。很多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才向那些更需要他们技术的国家移民。因此,全球化的劳动力市场使俄罗斯难以发展它所急切需要的作为政治稳定基础的中产阶级。在以色列,不断发展的经济不平衡经常沿着种族界线出

现，使德裔犹太人（Ashkenazim）（欧洲犹太人）与西班牙裔犹太人（Sephardim）（东方犹太人）分裂开来、使教徒与俗人分裂开来、使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分裂开来。结果，以色列社会已经变得严重两极分化，大大增加了和平进程向前推进的难度。

不满的人不仅对那些境况较好的人生气，而且还对全球化本身感到愤怒。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Mahathir Mohammed）因为全球市场的不公正和过于严厉而谴责国际金融家，那时，他在为很多人讲话。很多俄罗斯人现在把资本主义等同于腐败。当他们看着这个国家的新寡头坐在闪闪发光的高级轿车内，在武装卫队的保护下，在莫斯科疾驶而过时，他们有很好的理由相信，富人当然在以穷人为代价赚钱。成千上万的俄罗斯人并未参与全球化，或者他们只是在走过不敢进去的商店时才瞥到了全球化的好处。结果，被排斥的人很生气，因为他们把全球化与美国联系在一起，因此这种愤怒大多指向了美国。

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事件清楚地说明了，对全球化的反冲能够具有何等程度的报复性。奥沙马·本·拉登及其同伙对很多问题感到愤怒——美国在沙特阿拉伯的军事存在、西方的文化影响、阿以冲突、伊斯兰人民的贫穷。中东国家内部以及中东国家与西方之间的不平等已经为这种愤愤不平提供了肥沃的滋生土壤。在21世纪开启之际，世界发达国家的平均收入是27450美元，而在从摩洛哥到孟加拉的伊斯兰国家地带之内却只有3700美元。[37]综合起来，本·拉登的怨恨来自于一种普遍的感觉，认为伊斯兰社会已经被历史抛弃，伊斯兰人民和价值观被削弱了。其使命就是打击据传的使之权力丧失的根源——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于是，就有了袭击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的象征性共鸣。袭击事件尽管遭到了几乎全世界的谴责，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却的的确确利用了盛行于发展中世界大部分地

区的反美仇恨的强大潮流。

奥沙马·本·拉登并不仅仅在挑战全球化，他也在利用全球化。2001年9月实施袭击的恐怖分子很多在欧洲接受了教育。好几个驾驶劫持飞机的人在美国飞行学校接受了训练。当罪犯们在策划袭击时，他们经常通过在公共图书馆的电脑终端彼此发送电子邮件来沟通。恐怖分子令人钦佩地利用了美国松懈的边境、宽松的移民政策、现代通讯基础设施和牺牲安全、保障效率的航空运输系统。

弗里德曼很难对全球化比较暗淡的一面视而不见。实际上，他认识到，拥有超强能力的愤怒的人既是全球化时代的产物，也是全球化时代的主要威胁。但是，当他在宣布反恐战"相当于第三次世界大战"，其长期地缘政治后果将产生"新的秩序和分工"[38]时，他却走得太远了。恐怖袭击当然能够造成严重的破坏。它们产生恐惧、震惊和厌恶。预防恐怖袭击需要强烈的反制措施。但是，反恐战的同类物是反毒战或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而不是反对纳粹德国或苏联的战争。恐怖主义对于地缘政治的意义如同强风对于地理的影响——它是一个有力的、壮观的、破坏性的因素，但这个因素只影响表面特征，而不影响潜在的构造力量和分裂带的位置。

恐怖主义的实施者是犯罪团伙，不是有组织的国家，这一点与其有限的地缘政治意义存在很大关系。然而，如果全球化造就了具有超强能力的国家而不是个人，那么它将开始具有更大的地缘政治重要性。不幸的是，这种前景并不能完全排除。

国家及其国民当遭到全球市场无形力量的损害时，他们并不高兴。然而，那却是国际经济合乎逻辑的后果，平均每天大约有1万5千亿美元在全球货币市场上易手——这个总和是每天世界贸易值的48倍，差不多等于法国每年的经济产值。[39]国家及

其国民当他们的福利受惠于生活在几千英里之外的国家的陌生人时,他们并不高兴。然而,那却是国际经济合乎逻辑的后果,普通美国人能够坐在家中,通过单击鼠标将资金从投资海外的共同基金中撤回。当美国人对马来西亚经济比该国纳税选民更有发言权时,全球化就具有反民主效应(antidemocratic effects),这样的判断是很难反驳的。

这里的危险是,国家及其人民在最终开始回推之前,只能严重被全球经济到处推挤。即使国民经济总体而言受益于与全球市场相联,但是如果国家权威人士感到他们在失去控制、他们的国内名声在渐渐丧失,那么他们很可能会中断这种联系。更糟的是,他们可能寻求用高压手段集中控制公共制度和规则,使新一代独裁国家有再现的危险。卡尔·波拉尼(Karl Polanyi)在《大转变》中,对20世纪法西斯主义的崛起进行了经典的阐释,他把极权主义政府的根源追溯到金本位制,它在一定程度上使国家经受无法预测的、持续不断的全球经济力量的全面冲击。[40]波拉尼令人信服地指出,随之而来的社会混乱最终造就了以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法西斯主义政权为形式的报复性政治反冲。

今日的全球经济,通过施加金色紧身衣,同20世纪初期的市场至少一样是侵入性的。恰恰是它的穿透性特点使全球化具有了诱导自由改革和鼓励所有国家采纳简洁灵活的自由放任经济的潜力。但是,金色紧身衣也具有发挥相反作用和产生靠经济民族主义和战略对抗经营的民粹主义和中央集权政权的潜力。全球化的成功很可能为自己的毁灭播下了种子。

## 没有美国化的全球化

最后,还有全球化与美国化的关系问题。很多全球化的批评者坚持认为,进一步反击全球化的潜能来自于对全球化与美

国化不可分割的误解。当法国农民抗议全球经济将破坏传统法国文化时，他们向麦当劳扔砖头，他们就是这样理解的。当全球化的反对者涌入瑞士达沃斯骚扰到此聚会参加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的经济精英时，他们也在追逐金色拱门(Golden Arches)。当马哈蒂尔责骂全球金融家时，他指认的对象是以纽约为基地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而不是在伦敦之外工作的很多套期保值基金管理人。当本·拉登实施袭击时，他瞄准的主要目标是美国。随着全球经济嘎嘎嚓嚓地前进，这个论断继续发挥作用，美国的经济和文化影响力将继续使那些有兴趣从轨道上阻止全球化前进的人重振旗鼓。

在这方面的确存在着一个棘手问题，但它却是由传统思维界定的棘手问题的对立面。美国化并未妨害全球化。相反，国际经济之所以以如此的活力得到扩展，恰恰就是因为它与美国化是不可分割的。全球市场的实力和稳定已经是美国愿意设计并管理全球市场的直接副产品。世界很多国家趋向于接受一套共同的商业习惯和经济意识形态，不是因为这些习惯和意识形态本身的内在吸引力，而是因为它们已经得到了世界上惟一超级大国的传播。美国一直在制定规则，并毫不掩饰地利用全球化根据自己的意象重建世界。大多数国家一直左右追随，因为他们别无选择。弗里德曼正确地指出，当前国家要么穿上金色紧身衣(它恰巧是在美国裁制的)，要么成为信息高速公路上的劫路杀手。

从这个角度来看，长期的、最危险的威胁不是来自于全球化与美国化的联系，而是来自于二者很快分道扬镳的前景。恐怖主义威胁为关注源自反击全球化的反美仇恨提供了新的和紧迫的理由。但是对国际秩序更大的威胁却来自于，随着全球化助长了欧洲和亚洲的崛起，美国模式开始丧失光芒的可能性。毕

竟,欧洲和亚洲这两个地区实行的是与美国不同类型的资本主义。在欧洲和亚洲,金融、工业和国家之间的联系比在美国要紧密得多,亚洲聚焦于投资和储蓄与美国聚焦于消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欧洲和亚洲有能力去做时,他们将与美国方式的逻辑以及主导地位进行竞争。正如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在《金融时报》上的敏锐评论所指出的:“不管多么成功,美国都不可能提供建设发达经济的惟一可行道路。”[41]

当权力在全球更平等地分配时,对于管理国际货币体系、金融交易、商品和资本流动的基本原则问题将会有更多的不同意见。甚至当能够就实质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时,就领导和地位问题的竞争则将会更多。没有主导国家控制国际经济的两次大战间时期再一次富有启发意义。这个时期的一位历史学家对美国联邦储备局和英格兰银行之间的政策分歧进行了评论,他注意到:“在政策事务方面的这种不同意见的背后,也存在着政治对抗。英国和美国之间的特殊关系并不总是那么非常特殊,因为就全球金融网络的主导地位而言他们是对手。”[42]金德尔博格关于“美国和欧洲经济共同体为世界经济领导地位而竞争”的担忧可能再真实不过了。

全球经济就像地缘政治格局一样,将很快因为太少美国化,而非因为太多美国化而遭受苦难。随着欧洲和亚洲的崛起,他们对美国的怨恨可能会减少,但是国际市场的稳定性也会减少。美国优势地位使全球经济进入最佳状态。随着单极的衰落,全球化更为良性的效应也将衰落。

因此,当前的经济秩序只具有虚幻的持久性。美国经济已经证明,20世纪90年代认为美国经济不可战胜的看法是不正确的。即使美国能够避开已经被历史证明无法避免的拖长了的循环衰退,国际经济也将向他国传递财富和影响,这将立即加大国家之

间和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削弱美国的优势地位及其维持全球化发展的能力。无论如何，弗里德曼的世界地图都将很快过时。

## 民主和民族主义

由于全球化并不是美好未来的保障，我们转向关于和平原因的最后一套论断——福山关于民主的安定效应的主张。福山断言，自由民主的来临代表了使世界消除国家间战争的历史终结点，为此他引证了很多杰出的学术研究。伊曼努尔·康德第一个建立了系统论证，讨论为什么共和政府的兴起具有推动“永久和平”的潜能。[43]很多当代学者注意到了康德的洞见，并形成了一个现在所谓的“民主和平论”学派。[44]该学派实际上对美国外交政策发挥了实质性的影响，比尔·克林顿总统曾经反复把美国输出民主方面的利益奠基于这样的主张之上，“民主的习性就是和平的习性”。[45]

民主和平论学派的支持者认为，历史记录证实了民主政府的和平诱发效应。民主在18世纪开始受到欢迎。虽然现在世界上存在120多个民主国家，频繁出现暴力冲突的插曲(在过去的十年过程中，每年平均发生28次严重的武装冲突)，但是民主国家却没有彼此开战。学者还用几个逻辑推论支持他们的历史诠释。民主国家相互开战的倾向性因为民众反对蒙受冲突的代价(与独裁国家的情况不同，进行战争的人就是进行投票的人)和民主讨论倾向于产生中庸而温和的政策而大大减少。此外，在国内遵守法治的国家在推行外交政策过程中会遵守已经确立的行为规范，从而使民主国家能够彼此尊重，发展特殊的亲近感。

批评者非常有道理地对民主和平论学派提出的历史诠释的

正确性进行了质疑。[46]民主简直尚未存在足够长久的时间以得出确定性的结论。直到20世纪下半叶晚些时候，民主国家还很稀缺，这使他们之间发生战争的随机概率接近于零。因此，到目前为止民主国家内部缺乏战争说明不了什么。

此外，还有一些麻烦的历史案例。美国和英国的民主制度与习惯虽然坦诚地说在当时还处于早期阶段，但是这两个国家的确在1812年战争中发生了冲突。美国内战虽然是发生在一个现存国家内部的冲突，但也对民主单位不彼此开战的命题提出了挑战。尽管这些例证以及其他令人质疑的案例都未能构成清晰明确的驳斥，但是历史记录的模糊性的确为抑制这个判断——或者至少限制人们对这个主张的过分信任——提供了理由。由于过去只提供了非决定性的教训，因此对于民主之安定效应的最佳例证就取决于它的逻辑论断了，即民主国家倾向于实行中庸政策，并彼此培养超常水平的相互尊重和亲近。

恰恰是在相互尊重这个问题上，福山的著作与民主和平论学派存在交叉。有必要重温一下福山的逻辑，他说："自由民主使要求承认比别人更伟大的非理性欲望被要求承认平等的理想欲望所取代。于是，一个由自由民主国家组成的世界应该具有极少的战争动机，因为所有国家都相互承认彼此的合法性。"[47]随着民主变成普世存在，获得满足的国家应该全都彼此赋予承认和尊严，从而最终消灭战争。

通过将民主社会中个人彼此赋予的相互尊重与国际体系中民主国家彼此赋予的相互尊重联系起来，福山得以断定，民主安定国内政治的能力也适用于国家间政治。这是一个巧妙的分析步骤，使他得以宣称，自由民主将导致传统地缘政治竞争的消失，并从而使历史走向终结。但是，这里却也存在着福山论著中的首要误解。

国际体系即使完全由自由民主国家构成，它本身也不是民主的和平等的。强大而富裕的国家比弱小而贫穷的国家拥有更多的对国际事务的支配力。美国和挪威都是民主国家，但是它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分量是很难平等的。中国不是民主国家，但是它比世界上很多民主国家拥有更大的发言权。与国家内部的情况不同，国际体系没有宪法或权利法案确保一国一票、将所有国家拥有平等权利法制化、或者制定公正治理的原则。相反，国际体系是难控制的和不平等的，更像是民主规则抑制和平衡效应(the taming and leveling effects of democratic rule)之前的国内生活。

正如在封建国家内部，国际体系中的秩序是以实力，而不是以权利为基础的。生活是危险的、竞争性的和不平等的。甚至联合国，作为最接近于为全球治理提供论坛的一种制度，也决不是平等主义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实质上是一个大国俱乐部，它的永久成员具有比其他所有国家都要大得多的影响力。联合国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认识到，他们必须赋予强国想要的特权。否则的话，联合国就会变得无关紧要。甚至尽管美国在联合国拥有至上的地位，美国还是很少在联合国开展重要事务，因为它不想受限于联合国的程序和影响美国行动自由的制度约束。

自由民主很可能能够满足人类对承认和地位的渴望，但是国际体系却不能满足民族国家对尊重和平等的相似渴望，这恰恰是因为国际体系不是根据自由民主的原则运作的。国家展示了很多与居住并治理国家的人类相同的动力。他们所想所要的远远多于简单的物质安乐，他们还渴望和需要精神安乐，这种心理驱动力在民族主义形式中得到了自我展现。由于没有一个民主的国际体系赋予所有国家他们所追求的权利和地位，因此民族主义驱使他们继续为承认而斗争，从而成为竞争的传染源。

福山好像认识到了民族主义的存在对他的洞察构成了挑战。然而,他却通过争辩说民族主义在现时代将丧失穿透力和政治显著性而回避了这个问题。福山接受“后历史世界仍然区分为民族国家”,但是他认为,世界上“互不相干的民族主义将与自由主义和平共处”[48]。这里,福山过于依赖黑格尔——以至于排除了同时代的其他德国哲学家。如果他还求教于约翰·戈特夫里德·冯·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以及其他一些现代民族主义的奠基人,那么他可能已经发现了自由民主的来临与民族主义的崛起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49]福山认为的将使历史走向终结的同一政治力量——自由民主——也是驱动民族主义情绪的政治力量,从而还是否定自由民主具有和平诱发效应的政治力量。

由于一个简单的原因,民族性(nationhood)的观念是符合逻辑地随着共识政治(consensual politics)的推广而出现的。如果普通人民开始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那么他们必须与国家具有某种感情联系。指向对核心家庭或封建帝王的认同和忠诚必须提升到一个更广泛的层次——具体体现了人民集体意志的民族国家的层次。民族主义是通过创建一个以种族、文化、语言和历史等纽带为基础的想象的政治共同体,作为实现这种认同和忠诚提升的中介而出现的。随着民族的观念扎根,它创造了对于自由民主国家的凝聚至关重要的共享认同和共享命运。它也注入了强烈的归属感和忠诚感——由于民族的国家将很快要求自己的国民为防御献身,因此归属感和忠诚感非常重要。大规模征兵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大众开始认同民族。民族接着通过引导国民去完成唤起激情和自我牺牲的集体使命,来帮助在民族层面上巩固政治共同体的建构。

民族主义由法国革命和美国作为一个联邦共和国的建立推动着向前发展，民族主义虽然时而过头，但基本与民主同步传播；它们是 19 世纪的孪生姊妹。民族主义一直是现代民主的聚合性粘合剂，提供社会凝聚力和共同意向，没有它们，共识政治将注定失败。民族的理想也存在于发展中世界，与其一道的是对自治的信仰，自治理念很快使殖民帝国的时代走向了终结。

然而，民族主义还具有负面效应。以民族及其优越性为合法性意识形态基础的国家很容易发现他们与其他具有自己的合法性民族认同的国家处于竞争之中。毕竟，一个民族只有因为它与其他民族不同，它才成为一个意义深远的政治共同体。因此，民族主义不仅界定一个人属于哪个共同体，而且还界定一个人不属于哪个共同体。民族主义就这样划分了界线，并自然而然地使各不相同的、利己主义的民族组合彼此对立。民族主义因此成了世界首要政治单位的基础，而且也是他们之间相互竞争的根源。民族主义可能有助于安定国家内部的政治，但是它对于国家之间的政治却起完全相反的作用。

在民族国家出现之前，历史上很多大战主要是为争夺财富和权力而进行的掠夺性冲突。自从民族主义诞生以来，世界的主要战争还变成了关于意识形态和竞争性民族理想的战争。拿破仑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这些大战都是民族主义的产物，都因关于在国内和国际社会建立秩序的竞争性理念而彼此对抗。南斯拉夫的暴力瓦解只是世界上民族观念已经如此充斥政治生活的必然后果的最近一个例子。

自由民主不能在没有民族主义的情况下发挥功能。民族主义是国家产生的关键因素，缺乏鲜明个性的国家通过与虚构的民族相结合而获得生命，作为结果的民族国家于是能够通过感情诱惑笼络国民。但是，民族主义也是恰恰那些由它产生的民

族国家之间对抗的持久根源。福山想要我们相信民族主义的这两个功能是可以分离的；民族主义能够在内部提供社会凝聚力而不会在外部成为竞争的源泉。他安抚性地告诉我们："互不相干的民族主义""将越来越仅仅表现在私人生活领域"[50]。

但不可能是这样的。民族主义就本质而言，它是一种公共事务，它是使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联系起来的所在。如果民族主义仅仅成为私人生活的一部分，那么它将否定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功能，并破坏使共识政治得以存在的共同体感和归属感。一个集体的、公共的民族主义是自由民主的核心所在。福山未能认识到二者是不可分割的，这是其世界地图的中心缺陷。自由民主与民族主义之间不可磨灭的联系也是历史不会很快走向终结的主要原因之一。

民主很可能在未来岁月扩展自己的范围，这意味着世界大国会很快发现他们没有了可以反对的非民主国家，通过反对非民主国家，这些大国可以集中民族志向。但是，民族主义的逻辑说明，这些民主国家于是会将竞争能量集中用在彼此身上，这将使那些极为热心地为民主和平论学派辩护的很多学者和政客大失所望。从这个角度来看，欧洲的崛起可能会提出一个特殊的问题。恰恰因为欧洲正处于建立新的涵盖一个地区而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共同体的过程之中，因此，欧盟很可能发现传播新的雄心勃勃的泛欧洲民族主义是便利的，如果不是必要的话。倘若如此，我们就不能想当然地认为美国和欧洲将继续是可靠的朋友。为承认和地位而进行的竞争，福山正确地将其置于人类经验的核心，可能使大西洋纽带变成新的竞争轴心。

表面上，民主的确具有至少某种安定效应。自由民主国家之间缺乏大战，虽然不是界定性的，但也为认为随着代议政府变得更普遍，战争可能变得更不普遍的乐观主义看法提供了理由。

民主和平的观念也具有逻辑上的吸引力。民主国家应该比那些由单一个人或一个其病态可能得不到抑制的独裁统治集团控制的国家更中庸、温和、稳健。公开、透明政体比封闭、不透明政体应该能够彼此之间建立更紧密的联系，这是有道理的。

但问题是，民主的和平诱发效应可能战胜不了推动国际体系向另外一个方向发展的趋势。民族主义如果不是压垮民主和平，也能够抵消民主和平，就像变化的国际体系结构及其产生的构造性地缘政治力量能够抵消民主和平一样。多极的回归注定要激起竞争本性，这种竞争本性很可能使民主良性效应进行死刑前的短暂忏悔。在最低限度上，我们不足以自信地认为，民主治理的传播将成为一剂良药足以解救美国单极时刻结束带来的地缘政治紧张。

## 注 释

1. President Calvin Coolidge,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December 4, 1928, 引自 John Kenneth Galbraith, *The Great Crash*, 1929 (New York: Time Inc., 1961), p. 7。

2. 同上书，第 26—27、70 页。

3. 引自同上书，第 38 页。

4. 引自同上书，第 73 页。

5. 引自同上书，第 74 页。

6. 同上书，第 80 页。

7. Piers Brendon, *The Dark Valley: A Panorama of the* 1930*s* (New York: Knopf, 2000), p. 86.

8. Charles P. 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pp. 171—172.

9. Dietmar Rothermund, *The Global Impact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1929—1939 (London: Routledge, 1996), p. 55.

10. 引自 Brendon, *The Dark Valley*, p. 31。

11. 引自 Tatsuji Takeuchi, *War and Diplomacy in the Japanese Empire*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35), p. 353。

12. 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p. 308.

13. Galbraith, *The Great Crash*, pp. 173—174.

14. Thomas L. Friedman, *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1999), p. 7.

15. 同上书,第7—8页。

16. Thomas Paine, "Rights of Man," in *Collected Writings* (New York: Literary Class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5), pp. 598—599.

17. John Stuart Mill,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With Some of Their Applications to Social Philosophy* (Fairfield, N.J.: Augustus M. Kelly Publishers, 1976), p. 582.

18. Norman Angell, *The Great Illusion: A Study of the Relation of Military Power in Nations to Their Economic and Social Advantage* (New York: Putnam, 1910), pp. 31, 54—55. 本书题目指的是国家能够通过战争改善康宁的幻觉。

19. Congressman Paul Ryan, statement to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Committee on Banking and Financial Services, Subcommittee o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licy, "Margin Lending," March 21, 2000. Available at: http://commdocs. house. gov/committees/bank/hba63474. 000/hba63474-o. HTM.

20. Robert J. Shiller, *Irrational Exubera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35.

21. 同上书,第 xii—xiii 页。

22. 同上书,第5—9页。注意希勒尔使用自己的方法计算平均本益比,因此他的值可能与其他来源提供的值存在出入。

23.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Member Firms Customers' Margin Debt, January 1992 through February 2002." Available at: http://www.nyse.com/pdfs/margin0202.pdf. 也请参见 Gretchen Morgenson, "Buying on Margin Becomes a Habit", *New York Times*, March 24, 2000。

24.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Committee on Banking and Financial Services, Subcommittee o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licy, "Margin

Lending", March 21, 2000. Available at: http://commdocs.house.gov/committees/bank/hba63474.000/hba63474-o. htm.

25.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s: Developments, Prospects, and Key Policy Issues* (Washington, D.C.: IMF, 2000), pp. 10—11.

26. Stephen Haggar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0), pp. 4, 6.

27. Garard Baker and Stephen Fidler, "O'Neill Signals Hands-Off Stance on World Economy", *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15, 2001.

28. 规则规定,投资者借贷不能超过他们将购买的证券价值的50%。2001年8月,治理每日交易的新规则开始实施,为了阻碍投机、限制冒险,这些新规则强化了证券和保证金(margin)方面的要求。

29. Remarks by Chairman Alan Greenspan, December 5, 1996, Francis Boyer Lecture of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Available at: http://federalreserve. gov/boarddocs/speeches/1996/19961205. htm.

30. Charlie Rose Transcript no. 2713, program of June 27, 2000.

31. 参见 Haggar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pp. 1—13.

32. Remarks by Chairman Alan Greenspan, "Global Challenges," July 12, 2000, at the Financial Crisis Conferenc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New York. Available at: http://federalreserve. gov/boarddocs/speeches/2000/20000712. htm.

33. 转引自 Steven Pearlstein, "Debating How to Repair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24, 2000。

34. Robert Gilpin, *The Challenge of Global Capitalism: The World Economy in the 21st Centu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61.

35. 参见 Paul A. Papayoanou, *Power Ties: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Balancing, and War*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9), p. 63。

36. 关于媒体及其在民族主义狂热传播中的作用,参见 Jack L. Snyder, *From Voting to Violence: Democratization and Nationalist Conflict* (New York: Norton, 2000)。

37. Martin Wolf, "The Economic Failure of Islam", *Financial Times*, September 26, 2001.

38. Thomas Friedman, "Smoking or Non-Smoking?"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4, 2001.

39. 参见 Joseph Yam,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s and Free Markets", remarks made at the Credit Suisse First Boston Asian Investment Conference, March 26, 1999。Available at: http:// www.info.gov.hk/hkma/eng/speeches/speechs/joseph/speech-260399.htm.

40.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Beacon Press, 1957).

41. Martin Wolf, "The Lure of the American Way", *Financial Times*, November 1, 2000.

42. Rothermund, *The Global Impact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p. 29.

43. Immanuel Kant, *Perpetual Peace: A Philosophical Essay* (New York: Macmillan, 1917). 该书最初发表于 1795 年。

44. 参见第二章注 15。

45. William Jefferson Clinton, "Confronting the Challenges of a Broader World," address to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New York City, September 27, 1993. Available at: http://dosfan.lib.uic.edu/ERC/briefing/dispatch/1993/html/Dispatchv4no39.html.

46. 关于对民主和平论学派的批评,参见 David Spiro, "The Insignificance of the Liberal Peace"; Christopher Layne, "Kant or Cant: Myths of the Democratic Peace"; Henry S. Farber and Joanne Gowa, "Politics and Peace", in *Debating the Democratic Peace*, ed. Michael E. Brown, Sean M. Lynn-Jones, and Steven E. Miller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6)。

47.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p. xx.

48. 同上书,第 276 页。

49. 关于德国知识分子在民族主义发展中的作用,参见 Elie Kedourie, *Nationalism* (London: Hutchinson, 1966). 作者提供了赫尔德(Herder)和费希特(Fichte)观点的概要。

50.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p. 276.

# 第四章　欧洲的崛起

欧洲是一个新兴的极，欧洲的崛起将加速美国单极时代的终结，这个判断建立在两个违反传统思维逻辑的主要命题之上。第一个命题关系到全球权力分配发生转移的路径。大多数学者把经济增长率的不平衡看作是国际变革背后的主要动力源泉。创新和生产力中心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外一个地方，最终使灵活的新生力量能够战胜并取代疲惫不堪的霸权。[1]

然而，这种说法却未能抓住今日环境下变革的主要源泉。欧洲将很快赶上美国，并不是因为欧洲具有更占优势的经济或技术基础，而是因为欧洲正走向联合、正积聚成员国，已经具有的令人瞩目的资源和知识资本。欧洲的政治联盟正处于改变全球格局的过程之中。

挑战传统思维逻辑的第二个命题关系到欧洲崛起对欧美关系的意义。对于大多数决策者和学者来说都一样，大西洋民主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是生活的事实，是他们共同历史和价值观的无法改变的产物。欧盟和美国可能分道扬镳几乎是不可思议的。[2]

本书采用的是一种不同的思维方针。在整个冷战过程中，美国和欧洲有效地构成了单一一极——西方。共享的价值观毫无疑问帮助增强了这个政治共同体的力量。但是，欧洲和美国

在过去50年成为可靠朋友却部分因为欧洲人别无选择。他们需要美国的帮助以排拒苏联。而且美国主导优势的范围确保他们只能跟随华盛顿的领导。既然美国和欧洲之间的不对称正在走向结束,那么这种和睦就不能看作是想当然的。单一一极正在逐渐一分为二。北美和欧洲可能从事于为争夺地位、财富和权力而进行的竞争,这种竞争一直是——并仍将是——人类经验中的重要一部分。

在考察欧洲作为美国抗衡力量出现之前,我们再次向历史寻求指南。为了说明统合和合并进程对权力均势可能造成的深远影响,我们转向19世纪德国的统一。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伯爵将中欧地区大部分讲德语的土地统一为一个单一国家,之后,新德国获得了几十年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并很快带来了军事实力和野心的稳步提升。德国的统一不可挽回地改变了欧洲的地缘政治,为新一轮最终贯穿世界的对抗创造了条件。欧洲作为一个整体现在正处于可能具有相似的深远影响的统合和合并进程之中。

为了说明当单一一极分成两个相互竞争的部分之后可能会带来什么后果,我们转向罗马帝国。在3世纪,罗马皇帝戴克里先(Emperor Diocletian)决定将帝国分成东西两个王国,以便简化行政和防御任务。罗马仍旧是西半部分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原称拜占庭)则成为东半部分的首都。虽然这种行政革新最初巩固了帝国的统治,但是罗马和君士坦丁堡很快便就安全、地位和宗教等事务发生了冲突。不管他们的共同文化和传统如何,西部帝国和东部帝国变成了直接的竞争者。两极取代一极自然而然地使日益上升的地缘政治对抗取代了等级和秩序。罗马的命运对于正处于分成北美和欧洲两个不同权力中心过程中的整体西方而言并不是一个好的先兆。

# 过　去

1871年德国的统一使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彼此独立的封地(fiefdom)、侯国(principality)和公国(dukedom)等社区联合了起来。奥地利是惟一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讲德语的政体没有进入这个新的联合体。而那决不是意外。普鲁士和奥地利长期以来一直是竞争对手。另外,普鲁士宰相奥托·冯·俾斯麦就是依靠反奥地利政策击败议会中反对派的。他以典型的坦率风格指出:"维也纳政策既然是这样,那么德国对于我们两者就太小了。"在俾斯麦的领导下,德国的统一必将意味着把奥地利排除在外。[3]

统一德国的建立,即使没有奥地利作为其中一部分,也要改变欧洲的地缘政治地图。普鲁士在俾斯麦精明能干、雄心勃勃的领导下,在追求统一德国的过程中赢得了三次战争——1864年对丹麦的战争、1866年对奥地利的战争和1870—1871年对法国的战争。普法战争的胜利以及此后任凭新生国家随意支配的人口和资源,证实德国作为欧洲大陆的主导国家,已经使包括法国在内的所有挑战者黯然失色。1870年普鲁士投放在战场上的兵力差不多是法国所有能够集结的军队规模的两倍;法国的防御很快就崩溃了。在建国之时,德国的人口已经超过了法国,其人口增长率更是大大高出法国。到了1915年,德国人口达到了7000万,法国则只有4000万。加上德国人的训练有素、以及鲁尔地区丰富的工业资源,巨兽的降临已经一目了然。

德国统一给法国带来了最直接的打击——战败以及受普鲁士控制的耻辱——而且它对于英国的意义也是不祥的。统一的德国及其随后的提升预示着英国霸权的终结,并将最终使英国

实现全球海军主宰地位与在欧洲大陆避免重大军事责任相结合的大战略变得过时无用。英国从来没有像罗马那样主宰过欧洲。但不这样做恰恰是其大战略的精髓所在。英国只有在需要维持稳定均势时才会对欧洲大陆进行干涉。这样,由于潜在对手相互牵制,英国能够自由地、聚精会神地发展和保卫其海外帝国。

但德国统一之后情况不再如此。结成联邦的德意志帝国在1871年1月18日正式宣布成立,凯撒威廉一世(Kaiser Wilhelm I)在凡尔赛宫镜殿(Galerie des Glaces)主持了一个盛大的建国仪式。英国领导人马上认识到了它的寓意。仅仅在三周之后,即将成为首相的保守党领袖本杰明·迪斯累里(Benjamin Disraeli)就对下议院指出,德国统一"代表着德国革命,这是比上个世纪法国革命还要重大的政治事件。没有一个外交传统未遭到扫荡。我们过去常常在下议院讨论权力均势问题……但是欧洲真正发生了什么?权力均势已经被彻底打破了"[4]。迪斯累里担心,德国人联合成一个单一国家会无法挽回地打乱欧洲的平衡,永久性地破坏英国大战略的基础,并使其全球主导地位的衰亡成为不可避免。

迪斯累里的预见再精确不过了。在统一之后的三十年中,德国经济得到稳步增长。技术革新极大地推动了重工业的发展。在关键工业生产领域,如钢铁和生铁,德国很快赶上并超过了英国。一批新的工业和金融精英脱颖而出,他们与传统的土地贵族结成联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这种"铁与麦"(iron and rye)之间的联盟成为俾斯麦的主要政治基础,并帮助他对付工人阶级力量的崛起。

很大程度上由于俾斯麦的精明外交,德国的经济成就并未立即打破欧洲的地缘政治平衡。俾斯麦避免了海军和陆军任何

迅速或实质性的建设。虽然德国商人最终迫使他除了攫取海外领土别无选择，但是他最初还是反对获得殖民地，担心那样做会疏远了英国和法国。他建立了一个精密的协议和联盟体系，使德国成为欧洲的外交中枢。俾斯麦非常精明地将德国影响最大化。然而，他经常在德国新野心可能激发战略对抗之前迅速悬崖勒马。俾斯麦操纵着欧洲均势，不过，他险些将其颠覆。

1890年之后，不太能干的一些人统治了德国。并且，他们在国内面临着更大的政治挑战。社会民主党正处于上升阶段，同时铁与麦联盟走向了分裂。德国工业繁荣兴旺，不再需要保护性关税。但与此同时，德国农民却施加压力要求获得对俄国和美国谷物进口的保护。

专横鲁莽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在外交国务秘书伯恩哈德·冯·比洛(Bernhard von Bulow)(他很快成为总理)和海军统领阿尔弗雷德·提尔皮茨(Alfred Tirpitz)的支持下，转向以民族主义统一德国。德国领导人宣称，德国有资格获得与其经济实力相当的国际影响。只有当该国拥有了必要的工具，包括公海舰队，它才能够满足自己的新要求。在民族主义热情和1898年《第一海军法》的武装之下，德国开始了新的追求。企业家获得了使其钢铁厂和造船厂有利可图的定单。土地豪绅赢得了支持海军建设的谷物关税。社会民主党的崛起声音被民族统一伟业所压制，至少暂时性地。

然而，把外交政策灵活地用作国内政治的工具，却使欧洲和平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随着德国决定将经济能力转化为军事实力，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倒计时就开始了。正如迪斯累里曾经预见的，稳定的均势很快让位于对抗和重新武装。德国的军事建设在民族主义强大洪流的推动下证明是不可阻挡的。甚至俄国、法国和英国的联盟也未能制止柏林一心想要主宰欧洲的野

心。尽管情报显示德国没有必要的资金战胜这三驾马车，但是凯撒及其心腹却在向战争稳步挺进。1913 年，由于所有各方都开始了全面重新武装，因此德国总理西奥博尔德·冯·贝特曼-霍尔韦格(Theobald von Bethmann-Hollweg)对充满战争热情的国会警告说："悲痛属于没有对撤退做好充分准备的人。"[5] 当明确显示德国已经走上了不归路的时候，贝特曼在辞呈中表示，该国正"在黑暗中跃进"。[6]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只是暂时地恢复了欧洲的平衡。《凡尔赛和约》施加了痛苦的战争赔偿、将莱茵兰地区非军事化、对德国陆军规模进行了上限规定。但是，1933 年希特勒上台后，德国却对自己的国际义务恣意妄为，并开始再一次要求获得欧洲大陆的霸权地位。在更为扭曲和有力的民族主义推动下，统一的德国在进行主宰欧洲的第二次尝试中危险地接近于蹂躏了它的西部和东部邻国。如果不是因为希特勒的过度野心——1941 年他决定开辟针对苏联的第二条战线，使德国资源扩张得过于稀薄——以及美国最终愿意出手帮助阻止纳粹战争机器，那么德国很可能已经获得了对西欧和中欧的持久控制。

德国的邻国由于受到两次世界大战的伤害，因此准备不再让历史重演。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精疲力竭但却取得了胜利的盟军占领德国并将其划分为几个行政区域，以便确保该国的联合力量不能再一次使欧洲陷入战争。冷战一开始，德国就被正式分割为两个国家，西半部分加入北约，东半部分加入华约。盟国很快允许西德重新武装和重建经济，以便帮助对付苏联威胁。但是，德国权力的回归只是容忍在北约和欧洲共同体的约束背景之内。在任何情况下，美国及其盟友都不会再次允许德国走自己的路。

当柏林墙倒塌提高了德国重新统一的前景时，欧洲大部分

人在思想上退却了。在回顾与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的讨论时，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抓住了当时的主导情绪。她说："我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张地图，上面显示了过去德国的各种格局，它们全都不能为未来提供可靠的保障。我们讨论了我们究竟能够做什么……(密特朗)说，在过去极其危险的时刻，法国总是与英国建立特别的关系，他感到这样的时刻已经再次降临。我们必须团结起来、保持联系。对于我来说好像是，虽然我们尚未发现手段，但是至少我们双方都有决心遏制德国的可怕力量。那是一个开端。"[7]

尽管德国的邻国普遍存在着保留意见，但是，德国支持统一的政治动力使重新统一最终证明是不可避免的。对于欧洲和余下世界来说幸运的是，单一德意志民族国家的第二次联合并未暴露出上次联合曾经暴露出的可怕的地缘政治分裂带。相反，德国的资源和雄心已经融入欧洲和欧洲统合事业的资源和雄心。

欧洲个体民族国家统合成一个集体整体，已经为几个世纪以来欧洲的破坏性对抗提供了解药，这种破坏性对抗是欧洲多极格局不可避免的副产品。法国和德国不是为争取优势地位展开竞争，而是形成了一个紧密的伙伴关系，并且现在一起成为欧洲的依托。布鲁塞尔已经成为集体首都，既在象征意义上，也在实际意义上减少了个体国家政府的权威。欧洲较小国家主动排列在这个良性内核的周围，相互重叠交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网络将内核与周边紧密结合在了一起。欧洲大陆的新民主国家在急切地等待着加入这个俱乐部。通过欧洲联盟，欧洲最终发现了一条安全容纳统一德国的道路。

然而，有利于欧洲的却未必有利于所有他者。尽管集体意志和中央权威促进了内部稳定，但是它们却同时鼓励了对外野

心。一个统合和繁荣的欧洲可能已经解决了德国问题，但是它却很可能在新的地缘政治世界地图上成长为一个可怕的实体。

在19世纪，欧洲的地缘政治经历了深刻的革命。变革的施动者是各个实体统合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这种统合创造了颠覆欧洲大陆稳定均势的德国。今日欧洲正在统一，就像德国一个多世纪以前走向统一一样。欧盟不太可能成为一个单一国家——至少不会很快成为。但是，欧盟各个国家的经济、军事和地缘政治力量必须以总和来进行评估，即便随后要打些折扣，因为它的统合还在进行之中。虽然欧洲统一还是一项进展中的工作，但是，它已经开始使国际体系发生转变。

为了考察欧盟的崛起如何可能影响它与美国的关系，历史再次提供了有用的启示。在4世纪，欧洲经历了一场与19世纪一样重要的革命。不同的是，变革的施动者截然相反——是单极罗马帝国分裂成两个实体，而不是个体德意志政体融合成一个统一整体。单一帝国疆域分裂为两个独立的部分给罗马统治带来了不祥的后果。单极维持的和平很快让位于两个决斗的权力中心之间为争夺优势地位而进行的对抗。

到公元1世纪时，罗马帝国的疆界向西扩展到西班牙和英伦诸岛，向北扩展到比利时和莱茵兰，向南扩展到北非和埃及，向东扩展到阿拉伯半岛。罗马要在接下来的三百多年中控制这片领土的大部分地区。核心—轮辐(hub-spoke)的统治方式为如此规模和长寿的帝国提供了基础。罗马通过控制交叉资源对边缘地区施展影响力。罗马人在道路建设、作战和造船等方面进行了极大的改进，大大方便了政治影响和资源在帝国中心与远处枝干之间的流动。他们采用了一种先进的促使新臣民“罗马化”的统治体制。罗马人小组被派去生活在帝国的领土上，帮助

同化被征服的人民，并鼓励他们接纳罗马身份与生活方式。目的是扶植对罗马统治的忠诚，而不是对罗马统治的怨恨；同化是一个比胁迫更廉价、更有效的施展控制的方式。

罗马在军事战略方面同样事半功倍。训练有素的军团一直作为预备力量使用，只有当需要镇压起义或驱逐入侵者时，才会部署。这个体制提供了有效的威慑；仅仅可能面临军团打击的前景就足以阻止很多潜在的挑战者实施攻击。[8] 像今天的美国一样，罗马拥有无与伦比的优势地位以及与此相伴的威慑力。

到了3世纪，罗马开始感到使这样大的帝国维持统一有些吃力。帝国前线不再保证能够抵御数量和力量都日益增加的竞争者。西部有日耳曼部落的威胁。东部有波斯人和黑海地区游牧部落的压力。研究罗马晚期的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清楚地指出，野蛮部落不管武器和组织多么原始，却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他说："由于装备轻便、行动非常突然，他们能够故意分散开来，随意急速飞奔，造成了可怕的大量杀戮；他们的极端敏捷使之能够在人们发现他们之前夺取堡垒或抢劫敌人的营地。……你无法与他们达成休战，因为他们非常不可靠，很容易受任何保证获取优势的谣言讯息所左右；就像是不讲道理的野兽，他们完全受支配于最疯狂的冲动。他们彻底不管正确与错误之间的区别，他们的谈话多变而且晦涩，他们不受宗教或迷信的束缚。"[9]

野蛮部落袭击的频率和强度迫使罗马改变了军事战略。由于威胁同时出现在边缘地区，因此军团不得不被派往前线。然而，他们的部署却使军队水平和帝国金库极度吃紧。甚至更糟的是，由于军团不再作为预备力量使用，而是扩展得令人不安地稀薄，因此，他们再也不能通过恫吓来威慑对手。一部分前线的袭击会招致其他地区的连锁袭击。帝国还开始面临着来自内部

的威胁。一些大省已经积聚了相当可观的财富，并寻求脱离罗马。

戴克里先于284年成为皇帝，他对帝国过度扩张的问题提出了一个大胆而创新的解决方案。戴克里先认为，管理帝国的任务对于单一统治者来说已经变得过于繁重了。较好的办法是将帝国分割开来，把几个部分的管理职责分别委托给值得信赖的同僚。他于是把自己的一位将军马克西米安(Maximian)提升为同朝皇帝(coemperor)。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每人任命一位副帝(junior emperor)，即知名的恺撒(Caesar)，他们将辅佐治理帝国，并排队继承奥古斯都(Augustus)(最高皇帝)(supreme emperor)。帝国于是被有效地划分为两个部分，每个部分再在恺撒和奥古斯都之间进行划分。戴克里先在其副帝的辅佐下统治东部帝国，马克西米安和他的恺撒统治西部帝国。戴克里先还把较大、较富裕的省份划分成较小的单位，以化解他们对奥古斯都权威构成的威胁。这些改革在加强帝国安全、使帝国东西部分能够回击野蛮人威胁方面证明是有效的。

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于305年退位，顺利地将控制权力移交给他们的恺撒——君士坦提乌斯(Constantius)在西部，加莱里乌斯(Galerius)在东部。但是，一当戴克里先及其权威不复存在，将要成为奥古斯都和恺撒的人之间的激烈争斗就接踵而至了，他们各自的支持者拿起武器彼此对峙。君士坦提乌斯之子君士坦丁(Constantine)313年在西部获胜并得到了奥古斯都尊号。加莱里乌斯的盟友之一李锡尼(Licinius)同一时间在东部取胜。

君士坦丁并不满足于仅仅控制西部帝国，并很快承担起恢复帝国疆域完整的大业。他最终在324年通过克里索普利斯战役击败李锡尼而完成了这个使命。君士坦丁于是作出了两项改

变历史进程的决定。第一，他在拜占庭为整体帝国建立了一个新首都，并将其更名为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战略性地坐落在作为欧洲终点和亚洲起点的博斯普鲁斯海峡，这使君士坦丁能够巩固对帝国东部疆域的控制，更有效地对付东部边疆的入侵者。第二，君士坦丁转信基督教，为使基督教成为帝国官方宗教作好了准备。他还是一位基督教教义的严厉执行者，甚至命令处决了通奸的儿子克里斯普斯(Crispus)。

帝国完整的恢复是短命的。当337年君士坦丁去世的时候，帝国在他的几个儿子之间被再度分割了。东半部分与西半部分之间的竞争再度开始，尤其是因为罗马[10]和君士坦丁堡成为各自独立的首都，每方都寻求扩展影响，提高威望。两个政治中心正式取代了一个政治中心。罗马教皇和君士坦丁堡主教很快加入了摩擦，他们在教义问题上展开斗争，在君士坦丁堡宗教权威是否与罗马宗教权威具有同等地位问题上出现分歧。语言和文化上的争论也随之而来；西部“罗马”帝国以拉丁文化和语言为基础，东部“拜占庭”帝国以希腊文化和语言为基础。“新罗马”和“老罗马”还在建筑风格和壮丽方面展开竞争。西部和东部帝国正在变成不同的政治和文化实体。

虽然戴克里先的改革从短期来看方便了帝国的管理和防御，但是它却因此具有相当负面的影响。帝国疆域的分割，而不是促动联合，几乎马上导致了东西两部分之间的对抗。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指出：“这种危险的革新削弱了双重统治的力量，却激发了双重统治的缺陷。”[11]帝国的分裂还加速了而不是缓解了军事资源的消耗，因为每个奥古斯都和恺撒都想要拥有忠诚的军队。正如当时一位宗教学者拉克坦提乌斯(Lactantius)所指出的：戴克里先“任命三个人与其分享统治权力，结果将帝国分成四个部分并大规模地增加了军队，因为四个人每个

都努力争取拥有比以前皇帝单独统治国家时还要大得多的军队"[12]。

单极提供的秩序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罗马帝国在戴克里先时代之前就已经开始经历了快速衰落;越来越糟糕的事态激发了他的改革。但是,由于权威和资源现在在东部和西部之间进行了分割,因此,衰落的步伐变得更快了。西部帝国的完整只是一直维持到395年狄奥多西大帝(Theodosius the Great)去世。自那以后,其领土的大部分地区遭到了日耳曼部落和其他挑战者的蹂躏。罗马本身于410年被哥特人洗劫,接着于455年被汪达尔人入侵并掠夺。二十几年之后,罗马帝国的末代皇帝罗幕路斯·奥古斯图卢斯(Romulus Augustulus)结束了自己的统治,被部落首领带离了意大利。

在西部帝国衰落的过程中,君士坦丁堡大体上利用了它的虚弱。东部皇帝时常受诱惑的驱使,谋求将帝国疆域统一在他们的单独控制之下,这个任务曾经被查士丁尼(Justinian)及其能干的贝利萨留(Belisarius)将军部分地完成过。但是,东部帝国既没有资源也没有偏好为此让士兵们献身,相反只是带着某种满足感看着罗马的衰亡。根据吉本的看法:"拜占庭朝臣以漠不关心,可能还有些愉悦的心态,注视着罗马的耻辱、意大利的不幸和西部的沦丧。"[13]君士坦丁堡还蔑视地看着早已发生的罗马文化的削弱。然而,其统治者却最终因为过于虚弱被自身内部和外部威胁弄得内外交困,而无法出手相助。后继的东部皇帝面临着东部和南部两个侧面的军事威胁,无法腾出必要的军队驱逐已经将西部罗马瓜分的入侵者。而如果东部军队不能为西部居民提供保护,那么西部居民就很难转而对君士坦丁堡效忠。

本应该帮助维护帝国统一的教会在做法上却截然相反。从一开始,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教会权威就是相互敌对的;罗马的

教皇和君士坦丁堡的主教一直为争夺宗教和政治影响而斗争。484年双方紧张关系如此尖锐，以至于教皇与主教相互将对方逐出教会。严重的教义分歧进一步强化了对抗。圣灵来自于圣父自身还是也来自于圣子？基督是神性的一个存在，还是不可分割的两个存在，一个是神一个是人？应该让半身胸像和宗教画像在礼拜中发挥核心作用，还是应该像犹太教和伊斯兰教那样，让礼拜图形构成崇拜偶像？这些教义分歧夹杂着个人恩怨使两个教会陷入长达几个世纪之久的竞争和阴谋活动——包括谋杀、绑架，以及较低形式的虐待。然而，教会却在名义上维持着统一，直到1054年正式分裂为罗马天主教会和希腊正教会两个分支。

随着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以及它们各自的教会进一步分道扬镳，帝国的拜占庭部分比西半部分发展得更好。西部帝国在帝国分裂的几十年之内就开始走向了崩溃，而拜占庭王国却设法维持完整并一直延续到7世纪初期。611年，波斯军队征服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接着在616年继续前进征服埃及。拜占庭重新获得了大部分领土，但是，随后不久又很快将领土输给了阿拉伯军队。这些土地的被掠对于拜占庭具有毁灭性的影响，因为它们一直是帝国的主要谷物来源。君士坦丁堡的挫折如此之大以至于拜占庭皇帝君士坦斯二世（Constans II）一度考虑将首都迁回罗马。至少意大利人口中的一部分，尤其是罗马、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的人口，当时仍然效忠于拜占庭皇帝。君士坦斯二世的确将首都迁往了西西里的锡拉库萨港（Syracuse）。但是他很快就被谋杀了，于是将首都重新迁回罗马的想法也就不了了之了。

经历了7世纪的挫折之后，拜占庭帝国稳固了自己的地位一直延续到12世纪，12世纪之后，它被来自东西两方面的入侵

者慢慢分解了。君士坦丁堡自身一直设法坚持到1453年,最终屈服于奥托曼(Ottoman)的围攻。但是,那时拜占庭帝国已经只能疲于应战几十年了。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只是正式证实了伊斯兰世界的崛起和基督教欧洲的衰落。

罗马帝国终于瓦解了;所有的伟大帝国都会如此。衰落的好几个根源在起作用,特别是在西部帝国。野蛮人的攻击使军事建设必不可少,军事建设由于从贸易、手工业和农业部门中抽调部队和资源而削弱了经济。臃肿的官僚机构和源自富裕的物质主义助长了腐败和公众精神的消蚀,并最终剥夺了罗马理想的意识形态魅力。基督教的传播通过促使国民忠诚指向教会而不是国家好像也助长了帝国的衰落。[14]

虽然戴克里先分割帝国的决定最初帮助抵消了某些衰落的根源,但是,他出于善意的政策却最终因为将权威中心一分为二而使事情变得更糟。戴克里先的尝试具有所有有利条件——共同的宗教、历史、传统和对罗马帝国康宁的使命感。但是,由单极到两极的转换使共性变成了竞争。一度流向罗马的资源去了君士坦丁堡。双帝不是相互合作,而是彼此争斗。教义纷争将共同的宗教变成了分裂的教会。拉丁和希腊人之间的文化差距被政治化了。用吉本的话说就是:“希腊人和拉丁人的民族分立被语言和风格、利益、甚至宗教的永久性差异扩大了。”[15]罗马领导下的几个世纪的稳定秩序变成了政治动荡、欧洲被其东部崛起的文明弄得黯然失色。

这些历史反思构成了对美国单极时刻终结及其可能后果的警告。欧盟是一个新兴的极,它的崛起正在将西方分裂成美国和欧洲两个部分。美国和欧洲确实已经成了五十多年的亲密伙伴,因此得出结论认为他们将永远是朋友是非常自然的。但是,

考虑一下罗马帝国及其在君士坦丁堡建立第二个首都之后的快速衰亡,结论却未必如此。西部帝国和东部帝国几个世纪一直是一个政体。他们分享共同的宗教,拥有深厚的文化纽带。他们面临着共同的敌人。帝国的分割是由戴克里先细心筹划和实施的。然而,一旦两个权力之极取代了一个权力之极,地缘政治的竞争就随之而来了。

美国和欧洲分享共同的传统,具有牢固的文化纽带,几十年里一直面临着共同的敌人。这些条件帮助他们自冷战开始就形成了一个团结一致的西方世界。但是,既然现在西方正处于被分裂的过程之中,那么它很可能走上罗马帝国之路。然而,华盛顿和布鲁塞尔之间发生的一切与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之间发生的一切存在着一个重要不同。今天的分割是在缺省的条件下自然发生的,不是设计的结果,因此它大大提升了危险性和产生敌意的潜能。

## 欧洲的统合

根据大多数观察家的看法,美国的优势地位会青春常驻。正如达特茅斯学院政治学家威廉·沃尔福斯(William Wohlforth)对流行思维进行概括时指出的,“当前的单极不仅是和平的,而且是稳定的……未来几十年,从权力的任何潜在要素来看,没有一个国家可能有能力同美国进行较量。”[16]沃尔福斯在学术上讲是正确的。从经济、军事以及知识和文化资本来看,美国远远处在所有其他国家的前面,而且他们之间的差距并未缩小。

但是,美国最好和最聪明的人却在过于传统地进行着思维,他们被过去所误导,只把个体国家看作是可能的挑战者。结果,他们未能认识到集体的欧洲是排列队伍中的下一个——尽管它

正在我们眼前崛起。战略家们继续对统一的欧洲熟视无睹,因为它是一个新动物,是一个藐视标准范畴的政治实体。欧洲联盟缺乏美国那样的中央联邦。但是,它却确确实实比松散的主权国家组合更集中。如果美国要想正确制定新的世界地图,那么美国就必须弄清楚这个新实体究竟是什么——并开始严肃认真地对待它。

欧洲统合是20世纪最重要的地缘政治事件之一。它代表了一个转折点,在每一点上都跟美国作为一个联邦建国具有一样重大的意义,甚至可能更为重要。欧洲已经把历史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并正在造型自己的地缘环境。经过几个世纪各个竞争极之间的对抗和流血,欧洲人已经受够了。他们正处于建设旨在将各个竞争政体融合为一个集体整体、一劳永逸地消灭欧洲民族国家间战争的地缘政治工程的革命性进程之中。

到目前为止的成果都是引人注目的。从罗马帝国的衰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欧洲人民一直处于相互战争状态,只是偶尔夹杂着短暂的中断。仅仅在欧洲实行统合的五十年之后,英国、法国、德国及其较小邻国之间的武装冲突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不可思议的事情。在从欧洲煤钢共同体,到欧洲经济共同体,再到欧洲联盟的发展过程中,欧洲终于摆脱了自己的过去。

大多数美国人极大地低估了——或者完全漠视了——欧盟的地缘政治重要性。[17]这种误读是可以理解的。欧盟的重大创意和活动在性质上主要以经济为主。1951年成立的欧洲煤钢共同体,目的是将法国、德国、比利时、意大利、卢森堡和荷兰的煤炭与钢铁生产置于集体控制之下。向前发展的下一步是于1957年建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这个步骤的目的是为了取消内部关税、建立共同的外部关税。成员国在20世纪60年代一起努力巩固了这个共同市场。

1979年，以管理成员国之间兑换率为宗旨的欧洲货币体系得以创立。接着，1987年单一欧洲法案出台，消除了残留的诸如国家规定和国家标准之类的非关税壁垒。其目的是建立"一个没有内部边界的区域，保证商品、人员、服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18]。欧盟的完成发生在1993年。这个步骤的标志是货币联盟——欧元的实行和各个国家不同货币的终止。12个国家已经加入了货币联盟，还有更多的国家将要加入。欧元的钞票和硬币于2002年1月开始流通。法国法郎(franc)和德国马克(mark)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欧洲在防御事务方面并没有取得与其在经济统合领域相匹配的成就——这加强了人们对欧盟的理解，认为欧盟是经济的巨人、地缘政治的矮子。欧洲人的确在安全方面进行了尝试。布鲁塞尔条约(1948年)、欧洲防御共同体(1952年)，以及西欧联盟(1954年)全都是欧洲人为了给集体欧洲安上防御手臂而进行的尝试。但是它们从来都没有取得进展。相反，欧洲人还是求助于美国和联合国。他们需要美国的资源以帮助重建西欧的经济和抵挡苏联的军事实力。而且，西欧的主要国家彼此之间尚未足够安心地开始合并他们的武装力量和防御政策。虽然他们准备好了融合经济、汇集贸易政策权威，但是他们认为，将防御设施统合起来对国家主权造成的侵犯太大了。从这一点来看，统一的欧洲很早以来就一直在经济的世界地图上显得特别突出，但在地缘政治上却仍然仅仅是一个光点。

这种对欧洲计划的看法非常悲哀地偏离了正题。它对于欧洲来说有着更多的寓意，只要把欧洲统合放在适当的历史背景中，其寓意就会变得很清楚。看一下美国十三个殖民地向联邦合众国的转变，就可以说明问题。虽然在名义上1781年后美国进入了邦联，1789年以来美国有了统一的联邦，但是，美国最初

的几十年几乎毫无例外地投身于经济统合事务。降低州际关税、管理商务、协调外贸政策、发行在所有各州使用的单一货币——这些问题主导了政治辩论。军事统合远远落在经济统合的后面。各个州都确保邦联条例保留每个州维持军事力量的权利。国会得到允许组建并装备一支小规模的海军,国会还有权从各个州招募人员组建一支中等的国民陆军。然而,是各个州,而不是联邦政府,占据着优势地位。

虽然美国宪法加强了联邦政府的权力,但是,各个州继续保有相当大的自主权。美国人至少像担忧由外敌构成的威胁一样,担忧由盛气凌人的中央权威构成的威胁。相应地,美国的对外志向及其军事在联盟的最初几十年里一直维持在有限的水平。对于当时的观察家来说,美国可能已经是一个潜在的经济巨人,但却不是一个主要的战略存在。然而,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美国的合并将改变北美的地缘政治,并很快改变世界的地缘政治。

德国的统一没有任何不同。它静悄悄地、缓慢地开始于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贸易联系再一次首当其冲,将各自独立的日耳曼土地上的经济编织到了一起。正式的关税同盟(Zollverein)于1834年建立。政治监管是由成立于1820年的一个联邦结构德意志政治联盟(Bund)提供的。政治联盟的主要意图是抵制成员国内的自由政治变迁。虽然各个成员国为集体议会派遣代表,但是每一个成员国都维持着组建联盟和宣战的权利。因此,政治联盟并不象征着一个能够打破欧洲均势的集中统一的国家的建立。然而,合并的历史进程已经准备就绪。当这个进程达到1871年德国统一的顶点时,人们——至少迪斯累里——清楚地知道,"(欧洲)权力均势已经被彻底打破了"。

欧洲统合的进程,不像美国和德国的合并,很可能缺少统一

的国家。但是,即便没有统一的国家,其地缘政治影响也将是深远的。从一开始,欧洲统合就是完全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经济活动成就了大部分工作,但却是在为地缘政治意图服务。欧洲奠基人非常清楚地知道一个多极的欧洲将继续因引发竞争和冲突而遭到谴责。因此,必须做些什么以中断欧洲大国的循环兴衰以及与之相伴的对抗和杀戮。

欧洲人所要做的就是实行欧洲统合。如果相互独立的极注定要彼此竞争并给大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那么惟一的出路就是找到能够使这些极结合起来的某种手段,使他们成为一个更大整体的组成部分。统合过程通过混合、合并并最终超越欧洲民族国家相互独立的利益和认同,将产生一个新的政治实体——集体欧洲政体。

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于 1948 年至 1952 年任法国外交部长,是欧洲统合的奠基人之一,他开诚布公地指出了欧洲统合的地缘政治目标,以及经济活动与其地缘政治后果之间的联系。首要的任务是克服德国和法国之间难以驾驭的分裂带。用舒曼的话说,"欧洲国家即将来临的联合,要求消除法国和德国之间由来已久的敌对。所采取的任何行动必须将这两个国家放在首位考虑。"欧洲煤钢共同体将充当完成这一任务的媒介,他说:"(由欧洲煤钢共同体)建立的生产上的团结一致,将非常清楚地使法国与德国之间的任何战争都变得不仅是不可思议的,而且实质上是不可能的。这种强有力的生产单位的建立,由于向所有愿意参加的国家开放,并最终注定会以相同的条件为所有成员国提供基本的工业生产要素,因此,它将为他们的经济统一奠定一个可靠的基础。"

培养共同的经济利益只是经济统合的最初目标。利益和认同方面更深层的融合将随之而来。舒曼断定,"这种利益的结合

对于建立共同经济体系是不可或缺的”,它将成为“一种发挥潜移默化影响的酵母,由此,长期以来因血腥分裂而彼此敌对的国家之间可能会形成更广泛、更深刻的共同体。”[19]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思想建筑师、该共同体高级公署(High Authority)的首任主席让·莫内(Jean Monnet),甚至更为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可以永远都不会足够地强调,这六个共同体国家是大欧洲(broader Europe)的先驱,大欧洲的边界只能由那些还没有加入共同体的国家来设定。我们的共同体不是一个煤炭和钢铁生产者协会,它是欧洲的雏形。”[20]德国、法国以及他们周围的其他国家最终将形成一个新的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共同体。正如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前言部分所明确陈述的,成员国正在准备“为指明从今以后共同命运之方向的制度奠定基础”。[21]多极难以驾御的不稳定将让位于以法—德核心为依托的集体欧洲的一致与和谐。

这样,欧洲从谦逊的起点开始,已经具有了雄心勃勃的目标。欧洲的建筑师完全意识到了,单独经济统合将不足以实现这些目标,因此,他们还转而求助于更直接的社会工程的工具。他们创建了一个欧洲议会,使之象征着,不仅它的各个个体成员国,而且集体的欧洲也是一个合法的、代议的政治王国。他们组织了教育和文化交流活动,以便帮助长期以来彼此敌视的社会打破他们之间的心理障碍。他们还创造了很多象征符号——共同的旗帜、共同的护照和共同的货币——这些是使欧洲对于普通市民来说显得更真实所必需的,也是营造一个值得产生忠诚感和归属感的集体的欧洲空间所必需的。恰如欧洲中央银行(European Central Bank)首任行长威姆·杜伊森博格(Wim Duisenberg)所谈论的,“欧元并不仅仅是一种货币。它是欧洲统合名副其实的象征。”[22]

欧洲计划已经取得了全面成功。不仅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

变成了不可想象的事情，而且欧洲国家之间的边界不再设防，这些边界已经可以在没有护照或海关控制的情况下跨越。从法国驾车到德国就像是从弗吉尼亚州驾车到马里兰州。民意调查显示，欧洲大众明显倾向于加快统合的速度。几乎一半被调查的人强烈地把自己认同为欧洲人，而不仅仅一个民族国家的国民。超过70%的人支持欧盟具有共同防御和安全政策。[23]欧洲在地缘政治工程方面的尝试正在收效。

欧洲的经济也如影随形。对地区贸易的强烈关注已经取得了明显收益。大约欧盟全部贸易中的75%发生在欧洲内部。随着欧盟的几个主要经济体解除控制，随着他们的社会民主党转向中间道路，并与其传统劳动力基础拉开距离，这些经济体正在变得越来越有竞争力。德国政府2000年通过了重要的旨在刺激增长的税收改革。法国政府也随之通过了一项相似的、但目标略逊一筹的税收改革。遵守货币联盟施加的严厉标准和中—右政党日益高涨的政治运气，也加速了更为简洁的欧洲经济的兴起。

欧洲的集体国内生产总值现在将近达到8万亿美元，相比而言，美国大约为10万亿美元。欧盟的预期增长率与美国的预期增长率接近。美国技术部门急剧衰退之后，一度助长美国网络革命的风险资本开始主要流向欧洲，开启了欧盟受益于生产力提高的可能性，就像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曾经经历的那样。[24]随着新的成员国即将加入(下一波扩大将安排在2004年进行，可能接收的新成员有：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斯洛文尼亚、塞浦路斯、马耳他，可能还有斯洛伐克、立陶宛和拉脱维亚)，欧盟的财富可能不久就会与美国持平。

空中客车公司(Airbus，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联合企业)已经超过波音公司(Boeing)成为世界第一位民用飞机

供应商。世界上移动电话的最大制造者芬兰的诺基亚公司(Nokia)也走在了美国摩托罗拉公司(Motorola)的前面。经过美国公司兼并外国公司的几年之后,情况开始倒转过来。2000年,从国际兼并的总价值来看,英国和法国公司排在了美国公司的前面。[25]德国也在强力赶上。贝塔斯曼公司(Bertelsmann)是世界上最大的图书出版商,已经购买了兰德姆书屋(Random House)以及其他优秀的美国出版社。戴姆勒-奔驰公司(Daimler-Benz)1998年兼并了克莱斯勒公司(Chrysler),德意志电讯公司(Deutsche Telekom)2001年5月购买了声流公司(Voice Stream)。

坦诚地说,欧元在1999年1月初次登台之后兑换美元的价值损失了20%以上。欧洲资本流向繁荣中的美国经济是其跌值的重要根源之一。由于美国经济的放缓、资本重返欧盟金融市场,以及欧盟内部的增长前景,欧元必然会东山再起,它可能成为世界上主要储备货币中的一种。[26]

欧盟的治理机构——欧洲执行委员会、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已经逐步成熟。欧洲执行委员会由欧洲煤钢共同体的高级公署发展而来,是欧盟的主要官僚机构,组成人员是多国公务员和由成员国借调而来的个人。虽然欧洲执行委员会只有有限的决策权力,但是,它控制议事日程、制订具体的政策规划并负责决策的实施。由于欧盟已经扩大了欧洲执行委员会拥有权威的政策问题的范围,因此欧洲执行委员会的规模和管辖权已经随着时间的发展极大地扩展了。

政策的议事日程划分为三个所谓的支柱——共同体事务(主要与单一市场运作相关的事情)、外交和安全政策、司法和本土事务。[27]欧洲执行委员会的权力在第一个支柱中是最大的,因为经济事务方面的权威是在欧洲执行委员会和欧洲中央银行之

间进行分割的，前者负责处理贸易和竞争政策，后者负责为联盟制定货币政策，由各成员国国家银行行长进行管理。各个成员国在欧盟总体指导路线的约束下仍然控制着他们自己的宏观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欧洲法院在执行决策、解决成员国与欧盟制度之间的争端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出现矛盾时，欧盟法律高于国家法律。

欧洲议会由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共同体大会（Common Assembly）发展而来。所有成员国派遣代表参加，1979 年以来代表由直接投票选举产生。欧洲议会最初只具有协商权力，但是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其权威得到稳步增长。现在，欧洲议会有权修改由欧洲执行委员会起草的计划，有权与欧洲理事会合作寻找相互能够接受的政策。欧洲议会还负责批准欧洲执行委员会的组成，可以要求它辞职，并与欧洲理事会一道具有对联盟年度预算的最终决定权。欧洲议会日益扩展的权威对于强化超国家欧洲的民主特性至关重要。

欧洲理事会由欧洲煤钢共同体的部长理事会发展而来，是欧盟的主要决策机构。它由成员国的部长组成，这些部长将在讨论由他们负责的问题时参加。欧洲理事会也定期召开国家或政府首脑级的会议。欧洲理事会接纳的大部分问题要赢得批准需要获得特定多数（qualified majority）。[28]只有外交和防御事务、司法和本土事务，以及某些诸如征税之类的内部立法，仍然需要全体一致通过。欧洲理事会主席在成员国之间轮值，每六个月更换一次。各种峰会通常在轮值主席国首都举行，但是全部这些会议将很快改在布鲁塞尔召开，这将有利于进一步确立布鲁塞尔作为集体欧洲之首都的地位。

任何事情都没有比正在进行中的争先恐后地吵着要加入这个俱乐部的情形更能说明欧洲及其发展中制度的成功。英国、

丹麦和爱尔兰于1973年加入，接着1981年希腊加入，1986年西班牙和葡萄牙加入，1995年奥地利、芬兰和瑞典加入。英国一直与欧洲大陆保持距离，试图充当北美和欧洲之间的桥梁。但是，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已经改变了路线，有意使英国成为欧盟的领袖成员。伦敦人用欧元而不是英镑购买鱼和薯条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布莱尔完全认识到，如果英国不成为欧洲主流的一部分，那么英国就会被边缘化——在经济和地缘政治意义上。正如他在2001年11月所解释的，"我们在欧洲必须是全心全意的伙伴，而不是三心二意的伙伴……英国政治的悲剧——对于英国而言——在于两党政治家不仅在20世纪50年代，而且从那时一直到现在，都未能领悟欧洲统合的新兴现实。由此，他们未能捍卫英国的利益。"布莱尔还接着强调："英国在欧洲之外决无任何经济前途可言。"[29]

与此同时，欧洲的新民主国家正在相互拥挤着争取使自己排在加入队伍的前面。对加入的渴望使欧盟得以对一打左右的国家执行悄悄的严格要求，使他们在为欧盟成员资格做准备的过程中巩固由共产主义向资本主义民主的转变。预期的成员国正在将他们的经济进行私有化和自由化，稳定货币，保护少数民族，解决突出的边境争端——简言之，使各自国内变得井然有序，以便能够成为大欧洲家庭中的一员。欧盟已经使欧洲西部实现了民主化和安定化。现在，它正做好准备对欧洲东部也进行同样的民主化和安定化。

尽管欧洲的成就显著，但是对欧盟未来的评估必须因统合最近遭受的挫折以及即将面临的巨大挑战而有所折中。在过去十年中，欧洲的确已经经历了相当程度的失意。1990年代初，当欧盟试图阻止波斯尼亚屠杀时，欧盟非常不幸地失败了。

1994年，挪威作出决定反对成为欧盟的成员。丹麦、瑞典和英国已经决定现在不加入欧元区。2000年12月的尼斯峰会试图在制度改革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以便为扩展铺平道路，但是它却辜负了人们的期待。尽管尼斯条约包含着有限的改革志向，但是它却未能在2001年6月爱尔兰的全民公决中获得通过，从而揭示出公众对欧盟向中欧扩展缺乏热情。

这些都是严重的失策。但是，由于很多原因，它们都不能成为怀疑欧盟有能力战胜前面挑战的理由。甚至在最好的情况下，统合和合并的进程也是缓慢的和困难的，毕竟国家走到一起组成一个新的政体，要求他们放弃自己最珍视的东西——主权和自治。仅举几个例子，美国、德国和意大利，他们全都是由组成单位以时断时续的方式走到一起的。欧洲进行中的统合已经是，而且将继续是别无二致。欧盟将面临好时光和坏时光。它偶尔会表现为，丧失了前进动力和成员国及其国民的支持。但是，正如它在过去五十年所做的那样，欧洲可能接着就会集中意志，向前迈出下一步。

统合进程倾向于在经过一定的曲折点之后加速前进，记住这一点也十分重要。美国的政治集中直到19世纪初才开始缓慢起步，接着就是起飞了。到了19世纪90年代，行政部门的权威、美国海军的规模、以及美国外交志向的范围等都已经获得了显著增长。与此相似，德国统合起初也是缓慢开始的，但是到了世纪转折时期，却已经进入了一个以实现快速集中和扩展海军力量为特点的新阶段。虽然几乎不可能预测欧盟是否或什么时候可能进入这样一个加速统合阶段，但是，正如下面将要讨论的，即将发生的扩大的前景很可能就是促使它快速进入该阶段的因素。

对于欧盟未来的乐观主义还来自于由欧盟怀疑论者提出的

论据的不足。很多观察家，尤其是美国的观察家，继续漠视欧盟的地缘政治重要性，声称欧洲将永远不会联合为一个重要的国际行为体。他们指出了四点主要障碍。第一，欧洲的超国家制度缺乏民主合法性。随着欧盟试图进一步深化，它将因此而与这种"民主赤字"发生碰撞。[30]第二，欧盟人口正在老龄化，使德国以及其他成员国面临着劳动力减少和养老金体系崩溃的前景。第三，期望在本十年中期开始的欧盟东扩将冲淡联盟，并妨碍欧盟集体特性的进一步发展。第四，欧盟已经是，并可能继续是军事低能儿，使之难以承担更重要的地缘政治角色。

欧盟不可否认地存在着民主赤字。尽管欧盟最近采取措施加强欧洲议会的作用，鼓励形成欧盟范围的政党，但是，民族国家仍对政治生活保持着极强的控制。语言差异和各不相同的国家文化使国家的政治领域尤其牢固，这使普通公民对欧盟制度的合法性和代议制特点产生了质疑。正如 1998 年当选的德国中—左翼政府外交部长约瑟卡·菲舍尔(Joschka Fischer)所坦诚指出的，欧盟经常被"看作是由布鲁塞尔没有脸面、没有灵魂、最好时无聊、最坏时危险的统治阶级管理的一种官僚事务"。[31]怀疑论者认为，欧盟成员国的公民将不会把自己的命运委托给欧盟执行委员会及其不负责任的职员。

这是一种有道理和可信的批评，但是，当把它放在历史的背景中时，它就变得缺少说服力了。超国家政治疆域的合法性通常严重滞后于超国家制度的发展，超国家制度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艰苦的、渐进的过程。对不负责任行政当局的担忧引导美国国父建立了一个宪法制衡体系，并保护个人服兵役的权利。直到内战结束后，美国作为一个统一联邦已经存在几十年了，国家疆域才决定性地胜过各个州，成为政治认同的首要源泉和政治忠诚的首要目标。

看一下罗伯特·李(Robert E. Lee)的尖锐言辞就能说明问题。作为一位美国陆军军官和分离运动的热心反对者,他在内战前夕选择立场时指出:“出于我对联盟的全部热爱,我不能下决心举手反对我的亲戚、我的孩子和我的家……如果联盟解散、政府瓦解,我将返回我的出生州,与人民一起忍受不幸。”[32]欧洲可能存在一定的民主赤字,但它却是所有实行统合的政体都必须在发展进程中必然要经历的一种民主赤字。

欧洲的精英知道他们必须使欧盟更民主,并已经开始采取步骤解决这个问题。欧洲宪法的采纳现正在考虑之中,很多欧洲人把起草法案、辩论和批准的过程看作是培养更深入的公众参与的手段。欧洲人口中差不多有三分之二支持宪法的采用。2002年3月,欧盟召开了一次大会,它实际上是一次宪法大会,由法国前总统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Valery Giscard d'Estaing)担任大会的主席。该小组的使命是准备计划,以便在定于2004年召开的关于欧盟改革的重要会议上讨论。一部宪法可能为成员国和欧盟制度的各自权力提出更明晰的划界。它也可能扩大各国议会和欧洲议会的权威,以便增强民主责任感。[33]

德国最近愿意在制度变革方面牵头改善了改革的前景。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努力安抚邻国并与邻国实现和解的一部分,波恩几十年来一直听从于其他欧洲首都。作为德国重新乐于承担领导角色的写照,1999年德国政府所在地重返柏林,而且德国一直走在前面指导欧盟的发展、矫正欧盟的民主赤字。正如2000年5月菲舍尔在一次备受赞赏的演讲中所解释的,“紧张关系已经出现了,一方面经济和货币实现了共同体化(communitarization),但另一方面,却缺乏政治和民主结构。如果我们不能采取有效步骤弥补政治统合和民主的不足,从而完成统合进程,那么这种紧张关系可能导致欧盟内部的危机。”

菲舍尔直言不讳地指出了究竟什么样的有效步骤是必需的。他说:“有一个很简单的答案,即从国家联盟转变为全面议会化的欧洲联邦……而这恰恰意味着在联邦内部真正行使立法和行政权力的欧洲议会和欧洲政府。”他接着指出,这个联邦将“是一个公民能够理解的联盟,因为它将弥补民主方面的欠缺”。菲舍尔保证说:“所有这些都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的废除。因为即使对于定局的联邦而言,民族国家由于文化和民主传统的原因,在确保完全由人民接受的公民和国家联盟的合法性方面也是不可替代的……甚至当欧洲定局实现的时候,我们将仍旧是英国人或德国人、法国人或波兰人。”[34]

几个月之后,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oder)提议建立一个两院制的治理结构,一个是由各国部长组成的上议院,一个是由民选代表组成的议会。就像菲舍尔计划那样,欧洲的民族国家将继续保留重要的政治权力,但是,集体治理的制度将得到显著加强。菲舍尔和施罗德的精确模式能否取得成效在重要性上要小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欧盟人口最多、最富有的成员国已经在积极推动联邦欧洲的建立并明确阐述了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

英国在欧盟制度发展问题上也已经显示了更大的灵活性。托尼·布莱尔已经协调安排了英国政策的大转变。经过几十年对欧洲的怀疑态度,伦敦最近在寻求使自己成为欧盟核心的一部分。用首相的话说就是,英国必须在联盟内部是一个“主力队员、战略伙伴”。布莱尔支持对防御阵线的新推动。他已经表示有意在自己的第二任期安排英国加入欧元区。2001年大选的保守党候选人威廉·哈格(William Hague)把反对欧元当作选战的核心——结果他的政党惨败。

虽然布莱尔已经指出,他反对欧洲发展成为联邦制的“超国

家”，但是他已经清楚地表示，他支持“强大欧洲中的强大英国”——本质上是一种个体成员国与欧盟制度和谐共存的欧洲超民族主义。[35]与此相似，虽然布莱尔对欧盟宪法的观念犹豫不决，但是，他已经提议出台一个“原则声明”，该“原则声明”将是“一个政治文件，而不是一个法律文件”，“因此更简单、更容易得到欧洲公民的接受”。布莱尔也呼吁创建欧洲议会的第二个议院，以便加强民主监督。[36]他的观点与菲舍尔和施罗德的提议并不完全一致，但是，他们都已经认识到了对欧盟制度的未来举行辩论、致力于形成一个更民主、更有效的治理形式的必要性。

法国对于欧盟的发展更没有把握，部分因为左右共治(cohabitation)政府从1997年到2002年一直当政。总统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和总理列奥内尔·若斯潘(Lionel Jospin)得到不同政党的支持，具有不同的观点。希拉克支持更深层的统合，尤其是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事务方面。他也是开诚布公的欧盟宪法的支持者，认为“这样的文本将把欧洲人聚集到一起，让他们通过庄严的背书行动参与到计划中来”。2001年夏天，希拉克说，他希望一部宪法能够准备好等待2004年的批准。[37]

若斯潘较为保守警惕。2001年5月，他反对德国的联邦主义倾向，在关于欧洲未来的一次演讲中宣称：“我想要一个欧洲，但我仍然属于我的国家。创造欧洲而不毁灭法国，或任何其他欧洲国家——那是我的政治选择。”[38]鉴于法国几十年来在奠定欧洲统合并指导其发展方面的作用，这个立场对于法国而言是矛盾性的。毕竟，莫内和舒曼甚至在仅仅开始制定欧洲的最初步骤时就是联邦主义的强烈拥护者。

但是，戴高乐主义残余仍然对法国政治具有顽强的恶劣支配力，产生一种既对欧洲事业充满伟大志向又阻碍该志向实现的民族主义。法国的最近立场是要求欧洲在世界作用方面强

大，但在治理制度方面弱小——一种逻辑上和实际上的不可能。欧洲不能一方面被分散和肢解，但另一方面又同时追求地缘政治志向。然而，独特的法国式的脆弱和伟大的组合已经产生了这样的矛盾立场。法国不再强大得足以在全球舞台上发表意见，并因此指望欧洲能够作为替代使之这样做。但是同样的虚弱感使法国没有信心在统合问题上向前迈进，并进一步使民族国家升华为欧洲计划。法国在制度改革方面的拖后腿行为还来自于对德国承担领导角色的新意愿感到有些不舒服。

法国对于深化欧盟制度的矛盾心态不大可能持久，因为长期而言它是站不住脚的。对外强大的欧洲不可能对内虚弱。另外，若斯潘2002年总统选举中的失败应该有助于支持希拉克及其更亲欧洲的立场。法国也将面临来自德国和其他欧盟成员国的压力，因为制度改革事务在准备东扩过程中变得日益紧迫。当面对使联盟完整性陷入危险还是与制度深化和谐相处的选择时，甚至对于国家主义的法国而言都将是一个容易的抉择。欧洲计划太重要了，尤其对法国而言，风险太高了。

最后，即使欧洲的民主赤字确实最终为进一步统合设置了限制，那也不意味着欧盟永远不会成为美国的重要制衡力量。欧盟已经对美国的影响构成了挑战，在成为全球权力中心之前，欧盟不必发展成为一个紧密的联邦。覆盖西欧和中欧、在财富方面与美国分庭抗礼的欧盟本身自然而然地就是美国的平衡体。当然，欧洲在特性上越是具有统一性和集体性，就越能够发表单一意见、坚持立场。但是，即便存在于今天的较为松散的欧洲，特别是加上美国变换不定的战略优先选择，已经在变革的国际体系中浮现为一极。

欧盟的人口问题毫无疑问是一个严重问题。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代下降的出生率意味着，例如德国，到2020年将只需一

个工人供养每位养老金领用者。[39]欧盟经济的发动机面临着被劳动力不足、养老金义务超过职员贡献所窒息的危险。2000年完成的一项研究估计，德国养老金体系如果不进行变革将在2019年出现赤字，到2032年养老金欠债将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50%。法国和意大利的养老金体系则处于更糟的状态。[40]

虽然并不存在简单的修补以抵消老龄人口的经济影响，但是欧盟成员国完全意识到了前面隐约可见的危机，并开始采取步骤避免危机的发生。2001年德国议会通过一项立法，为鼓励工人投资私营养老金计划而提供税务减免和其他激励动机，私营养老金计划是缓解国家养老金体系负担的一种方式。欧盟成员国也在辩论如何放宽有关外国劳动力流入的法规。例如，德国已经开始依赖外籍工人(guest worker)弥补信息技术部门的劳动力短缺。2000年8月，柏林实施一种特殊的移民计划以吸引2万名主要来自印度的电脑工程师。

欧盟东扩可能极大地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中欧国家具有肯定能够减轻某些欧盟国家劳动力短缺问题的巨大劳动力储备。土耳其较为年轻的一代也使之成为提供工人的主要候选国。为了加强欧盟内部现在水平仍然相对很低的劳动力流动，欧盟执行委员会正在试验各种各样的措施，包括改善语言教育，简化失业、养老和健康福利跨成员国转移，以及使学业和专业资格证书实行标准化等。[41]

这些发展将保证改善，但决不会解决，源自欧盟老龄人口的问题。更雄心勃勃的改革仍是必不可少的，包括欧盟成员国之间财政政策的更好协调——由于国家政府不愿放弃对税收政策的控制，贸易工会抵制那些可能减少退休收益的措施，因此，任务并不轻松。改善移民的社会融合也值得迫切关注。

至于扩大问题，欧盟的批评者声称，预期中的吸收一打以上

的新成员国将有可能冲淡联盟,并使其决策结构陷于瘫痪。担心并不仅仅在于成员国数目的增加将使治理更为复杂,而且还在于新成员在民主方面相对缺乏经验,并将在发展的不同阶段给欧盟带来存在分歧的政治文化和经济。扩大也将保证使欧盟承担越来越高的农业补贴和发展援助形式的支出负担。

这些担忧全部合情合理,扩大的确使欧盟遭遇到一系列巨大障碍。但是,事实上真正的挑战可能证明是欧盟的保全颜面。不论欧盟是否已经做好了必要的准备,扩大都将开始,承诺已经许给了中欧的新民主国家,食言毁约是不可能的。深化联盟的制度改革可能是选择性的,但是,扩大联盟的制度却不是选择性的。

然而,恰恰因为没有深化的扩大将危害欧盟发挥功能的能力,因此扩大可能成为关键的催化剂,这个激发事件最终将驱使欧盟实行它否则可能无限期拖延的内部改革。扩大的准备形成了紧迫感,为欧盟领导人提供了他们需要的国内杠杆以解决制度深化的政治难题。菲舍尔以及其他政客已经陈述够多了,他们知道扩大的确有可能使欧盟瘫痪。他指出:"但是这种危险不是不去尽快推动扩大的理由,相反,它显示了决定性的、恰当的制度改革是必需的,以便使联盟的行动能力甚至在扩大之后还能继续维持。"[42]

美国经验再一次提供了重要的对比。最终是西扩迫使美国去解决可能是它最薄弱的纽带——北方与南方之间的文化和经济分裂。在19世纪上半叶,自由州和奴隶州达成了各种各样的交易,如密苏里妥协方案(Missouri Compromise),以防止它们的政治分歧继续扩大并浮上台面。[43]在这个意义上,制度改革被拖延了,但却为此付出了联盟凝聚力的高昂代价。然而,西扩的继续进行最终将那些潜在的政治分歧推到了最前端,迫使北方与南方之间进行了一场直接的冲突。内战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但

是它也为社会和政治改革、为更有效和更集中的治理准备了条件。因此，扩大及其引发的危机为联邦主义扫清了道路，联邦主义仍然是当代美国意识形态和制度的基础。

幸运的是，欧盟的扩大不大可能引发战争，但是它确实能够保证迫使那些不情愿的成员国接受根本性的制度改革。如果一个25个或更多国家的联盟要有效地发挥功能，那么加强欧盟制度的权威就是一种必须。它意味着将特定多数表决方式的适用范围扩展到现在需要全体一致通过的那些问题；它意味着使欧洲执行委员会承担经济政策的监管、以及最终外交和防御政策的监管；它意味着扩大欧洲议会的作用；最后它可能还意味着产生直接选举的欧盟首席执行官。

扩大还将给欧盟施加压力，使之对内核部分的成员国与正在较慢、逐步实现统合的成员国作出区分。对区分——欧盟官员委婉地称之为"加强的合作"——的更多依赖，将使内核成员国能够实行更深层次的统合，而其他成员国可以或者选择退出，或者进入长期的转型阶段。欧元的引入本质上已经采取了这种模式，核心组国家前面领路，其他国家则在既聚集了足够的政治决心，又符合了具体经济标准时再加入欧元区。这种多层次的办法将有助于确保欧盟不会经常去寻求最小公分母，它在中欧国家开始加入时也是至关重要的。用菲舍尔的话说，"恰恰在扩大了的，因而必然更异质的联盟中，进一步区分将是不可避免的。"[44]这种灵活性将不仅限制缓慢移动者妨碍他人的能力，而且还将解放欧洲的核心国家，使之推进更深层的统合，并最终成为整个联盟的政治先驱。

最后，扩大可能需要对欧盟财政预算进行长期未能兑现的改革。共同农业政策——实际上是农业补贴和价格保障项目——占欧盟总体财政预算的将近50%。改革共同农业政策

的反复尝试进展很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法国农民的政治影响所致。然而，如果扩大开始实施的话，那么中欧国家农业部门的规模将使共同农业政策的改革成为一种必须。德国政府已经规划了很多设想，包括让每个成员国以各自国家为基础处理农业补贴问题。扩大还将迫使欧盟改革地区援助项目。占欧盟财政预算将近35%的发展援助是另外一个受惯性和政治僵局影响的项目。寻求经济援助的国家即将加入欧盟使该项目的重新审定成为必不可少。简言之，扩大可能正好是欧盟为克服即将出现的制度障碍所必需的冲击。

防御是最后一个被欧盟怀疑论者反复提起的问题，这不无道理。虽然欧盟成员国的确在安全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大多通过非军事手段——为存在冲突倾向的地区提供实实在在的大量经济援助，在冲突解决、民主化和国家建设方面出钱出人。欧洲军事力量主要在维和使命方面表现积极，因为大多数成员国缺乏参加要求更高的作战行动的能力。问题并不是缺少士兵，而是缺少火力。虽然欧盟的集体防御预算远远低于美国，但是欧洲比美国有更多的现役士兵。防御预算用于支付工资和维持大规模的本土陆军，而不是用于获得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武装力量和需要将他们运送到所需地点的运载工具。欧洲不能独立实施够规模的军事行动，仍然依赖于美国军事力量及其令人瞩目的后勤基础机构。欧盟是军事低能儿的批评是正确的。

然而，时代正在变化。欧洲已经到了转折点。由于几个方面的原因，其军事存在将在未来几年明显提高。

首先，欧洲正处于创建集体治理的集中结构和权威结构的过程之中，这是共同防御政策的必要先导。协调贸易政策和将电力输出规格标准化是一回事。放弃国家货币和辩论欧盟宪法——是指能够在象征和实际意义上构成一个真正的主权汇

集，将政治、利益和认同从国家层次提升到超国家层次的法案——的可取性是另外一回事。在准备增加新成员国的过程中，欧盟可能采取步骤进一步集中权威。就像19世纪末美国政治制度集中所表现的那样，欧洲的制度改革肯定会使更大的地缘政治志向成为可能。

欧盟成熟的另外一个明显标志是，它加倍努力构筑共同防御政策并获得支持该政策所需的军事能力。1999年欧盟设立了负责外交和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职位——实际上，它是集体欧洲的第一位外交政策领导。北约前秘书长雅维尔·索拉纳(Javier Solana)被选为该职位的首任拥有者。索拉纳负责监管新的能够形成共同防御政策的政治和军事理事会的发展情况。欧盟自己承诺要在2003年准备好一支大约6万人的快速反应部队，能够在短时间内部署并在战场上至少维持一年时间。因此，成员国开始将他们的防御计划和预算实行统合，以便能够成功实现这个承诺。

欧盟怀疑论者正确地指出了，欧盟防御预算已经减少了，如果欧洲要获得它已经设想的能力水平，那么它最终将需要新的开支。但是，通过更聪明地使用已经投入防御的资源，欧盟可以成就一番大事业。国家采购项目之间的更多协调、关于哪个成员国履行哪种军事任务的明智分工、把训练无素的征募军队转换成精良的职业部队等，将极大地改善欧盟的军事能力。

某些重大改革已经完成。法国已经逐步淘汰了全球军事服役制度。德国已经对防御设施进行了一次彻底检查，并正处于实施重要变革的过程之中。新的集体采购项目已经成型。2001年6月，九个欧洲国家(德国、法国、西班牙、英国、意大利、土耳其、比利时、葡萄牙和卢森堡)承诺要购买总共212架A400M运输机。[45]该批飞机将由空中客车公司建造，空中客车公司的80%

由欧洲防御承包商的新财团欧洲航空防御和太空公司(European Aeronautic Defence and Space Company)拥有。欧盟成员国还已经达成一致意见,要建造自己的卫星网络,称之为伽利略卫星网,这个举措将减少欧洲对美国资产和技术的依赖。

欧盟还已经开始以史无前例的方式显示它的外交力量。2001年3月,布什政府表示它将从克林顿追求朝鲜与韩国之间和解的积极立场上回撤。考虑到对于该地区的消极影响,欧盟宣布,它将充当美国正准备抛弃的调解角色。当时任欧盟轮值国主席的瑞典的外交部长指出:"这意味着欧洲必须介入。"[46]那个月晚些时候,阿尔巴尼亚族叛乱者将马其顿带到了战争边缘,他们在接近科索沃的边界山区与马其顿军队交火。布什政府保持距离。欧盟自那以后从北约手中接过了马其顿维和部队的指挥权。索拉纳和其他欧洲官员在解决该危机的过程中发挥了比他们美国同事更为重要的作用。2001年9月,德国外交部长协调安排了马其顿维和使命的延长。正是在欧盟的努力下促成了2002年3月的协议,南斯拉夫领导人同意为他们的国家取个新名字——塞尔维亚和黑山(门的内哥罗)——这个步骤旨在预先阻止黑山滑向独立。2002年,欧盟深深地卷入了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的谈判——几十年来一直是美国外交官的专署禁区——而且还在5月结束伯利恒圣诞教堂的围困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德国主要报纸之一《法兰克福日报》宣称,这个趋势反映出"轮到欧洲的机会了"。《纽约时报》评论说,它反映出"一个更为自信的欧洲"。《纽约时报》也注意到,欧盟已经"获得了新的在世界舞台上的自信感,这种自信感建立在不断改善的经济和日益提高的政治和商业统合的基础之上。"[47]

理所当然,欧盟在外交和防御事务上正缓慢和适度地向前

推进。但是,美国、德国,以及其他所有通过将一度相互独立的实体结合到一起而形成的政体都是如此。国家,就本性而言,只会不情愿地放弃他们的主权,并将他们的康宁委托给一个集体的联盟。现在轮到欧洲国家进行这种跳越了。

欧盟为发展新阶段做准备并不仅仅受时间和成熟程度的影响。欧洲也在获得更大的地缘政治志向,因为统合在欧洲政治中发挥着变动的意识形态作用。在过去五十年中,当选领导人以两个理由证明欧洲计划及其所需牺牲的正确性。第一,欧洲必须统合以避开过去。联盟是超越对抗和战争的惟一道路。第二,欧洲必须联合起来反对共产主义威胁。北约处于前线,但是欧盟却始终在建设欧洲的经济力量和政治信心。

这些证明统合正确的理由现在都不再重要了。苏联不在了,俄罗斯过于虚弱,即使它想,也不会对西欧构成威胁。既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那么避开过去对于很多欧洲人来说也不再是一个迫切的理由。除了历史知识,年轻一代既没有经历过战争也没有经历过欧洲重建,因此,他们没有寻求避开的个人的过去。几十年来已经赋予欧盟以意义和动力的主导性政治话语正在迅速淡出。

取而代之的是强调欧洲未来而不是过去的新兴话语。这种新话语不证明统合是制止民族国家地缘政治野心的方式,而是把统合描述为欧洲作为一个整体获取权力和实现地缘政治志向的方式。法国总统希拉克于 1999 年 11 月在巴黎发表了一个演讲。他说得再清楚不过了:“欧洲联盟本身(必须)成为国际平衡中的一个重要角色,赋予自己一个真正强国的手段。”[48]甚至几十年来强烈反对欧盟在安全事务上担当角色的英国也已经改变了主意。用首相布莱尔的话说:“欧洲公民需要欧洲强大和统一。他们需要欧洲成为世界上的一个强国。不论起源如何,今

日的欧洲不再仅仅关注和平问题。而是关注投放集体权力的问题。”[49]

因此,统合正在欧洲选区中间得到合法化,但这种合法化却是矛盾地通过新的泛欧洲民族主义进行的。欧洲的各个国家可能已经永久性地自行消除了外交野心,但是各种志向却正在集体欧洲的层次上重新回归。随着这些新的政治趋势获得动力,欧洲的地缘政治志向也将重新回归。

非常不可思议的是,美国也为支持欧洲重返地缘政治领域提供了动力。欧洲现在发现自己虚弱,在防御事务方面组织不力,因为几十年来它一直有依赖美国为其提供安全的奢华。美国将战略保护伞扩展到欧洲不仅维持了冷战期间的和平,而且使欧洲人得以将主要能量花在政治和经济统合上。美国为欧洲赢得了极为需要的时间,使欧洲的统一进程能够运作起来。然而,随着岁月流逝,战略需要变成了不健康的依赖。欧洲结束了搭乘美国主动愿意做其卫士的免费便车。不管 1949 年以来,尤其是 1989 年以来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欧洲仍旧依赖美国维持它的安全。

因此,欧洲已经在很长时间里作了一件非常好的交易。但是,正如大多数好的交易都要结束一样,这个交易也在走向终结。复兴欧洲与霸权美国之间达成的冷战交易正在迅速淡化。而且它应该淡化。冷战结束了,欧洲国家处于和平之中,欧盟正在茁壮成长。美国国会在坚持让欧洲最终承担更多防御负担问题上提出了过多的辩护理由。科索沃的战斗和美国在巴尔干地区维和人员的存在清楚地说明,美国仍旧愿意为欧洲走向成熟赢得更多一点的时间。但是,美国已经很难情愿地参与科索沃战争了。布什政府明显昭示了它对于在巴尔干地区无限期维持美国军队的矛盾心态,这种考虑只是被源自于本土防御和打击

恐怖主义新焦点的新增使命进一步加强了。

让欧洲人感受到美国正在失去充当欧洲安全卫道士的兴趣,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让欧洲人承担更多的防御职责了。欧洲恰巧在北约结束科索沃战争之后开始加倍努力构筑共同防御政策决不是偶然的。欧洲人感到恐惧——这非常有道理——当下一次战争在欧洲周边某地爆发时,美国可能不再出面了。他们意识到,要么现在就为那种可能性做好准备,要么就等着被打得惨败。他们正确地选择了建设自己的军事能力。但是,他们也同时作出了不可避免地赋予欧洲更多地缘政治影响的选择——以美国优势地位为代价。

北美和欧洲之间战略关系的根本变化正处于早期阶段。它将在未来几年中获得更多动力。其推动力将不仅来自缓慢积聚的欧洲新志向,而且还来自美国的国内政治及其对欧洲崛起的精神分裂式反应——这个主题将在随后几章讨论。

## 罗马的再现

今日世界与罗马帝国末代世界之间存在惊人的可比之处。今天的华盛顿像当时的罗马,拥有优势地位,但是当它目睹权力和影响在逐渐由帝国核心向外扩散时,它却开始厌倦了霸权的负担。今天的欧洲像当时的拜占庭,正在崛起为独立的权力中心,将统一的王国一分为二。

虽然现在太早,还无法判断华盛顿和布鲁塞尔是否将走与罗马和拜占庭相同的道路——走向地缘政治对抗——但是这方面的警示已经明确出现了。美国已经感受到了来自欧元、欧洲经济及其顶尖公司实力日增的压力。尽管欧盟的地缘政治志向仍然有限,但是就像风吹船帆,明显的迹象已经有了。虽然美国

要求欧洲在防御方面多有作为，但是华盛顿决不会高兴地为更自信、更独立的欧洲腾出空间。或许美国和欧洲正在经历成长的烦恼，或许政治的哗众取宠很快消亡，然而，如果历史是某种暗示的话，那么这种暂时的竞争很有可能发展成为更严重的对抗。

怀疑论者可能反对将当代西方世界与4世纪的罗马帝国进行类比，认为时代已经改变了，政治已经缓和了，因此北美和欧洲的新兴关系将与罗马和拜占庭之间的暴躁对抗没有任何相似之处。确实，社会价值观已经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发展，政治和宗教暴力，尤其是民主国家之间的政治和宗教暴力，今天比罗马时代更不普遍。美国和欧洲已经构筑了一个政治共同体，在这个政治共同体中，他们之间的战争接近于不可想象。欧洲在2001年9月恐怖袭击事件之后与美国站在一起，北约历史上第一次援引条约中有关对一个成员的袭击就是对全体成员的袭击的条款。即使欧洲的确在防御前线问题上向前推进了，情况也是如此，它的战斗能力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仍会是谦卑的，欧盟并不会对美国构成军事威胁。

坦诚而言，这些考虑使美国和欧洲之间的武装冲突成为一种极其不可能的前景。但是，把横跨大西洋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作为一个标准，用来评判欧洲崛起及其导致的欧洲同美国的竞争是否将具有地缘政治重要性，这个标准却太高了。下面仅仅是一些可能的结果。

随着欧洲的财富、军事能力和集体特性不断增加，它对于获得更大国际影响的胃口也会逐渐增加。正如美国扩展优势地位的决心不仅来自于自私自利，而且还来自于由领导地位而来的情感满足——称之为民族主义，欧洲的崛起也会激发对更伟大地位的相似渴望。由于美国当前处于国际等级秩序的顶端，因

此，欧洲对更大自主权和地位的追求，至少在开始的时候，将采取抵制美国影响、结束长达几十年对华盛顿顺从的方式进行。

某些欧洲领导人已经对美国实力及其盛气凌人的方式表达了强烈不满。法国外交部长于贝尔·韦德里纳(Hubert Vedrine) 1999年抱怨说："我们不能接受政治上单极或文化上千篇一律的世界，或者惟一一个美国巨头国家(megapower)的单边主义。"总统雅克·希拉克完全赞同，他说："我们需要一种手段同美国霸权进行斗争。"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在1999年12月刚刚与中国主席江泽民会见之后就宣称："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单极计划不好。我们需要一个多极结构。"[50]

这种怨恨在乔治·布什当选总统之后因为其外交政策的单边主义立场和基调而进一步加强了。在布什呼吁把反恐战争扩大到伊拉克、伊朗和朝鲜之后，韦德里纳号召欧洲发表意见反对美国在行动方面"单边主义、不与他人协商、只是基于自己的世界观和自己的利益进行决策"。当被问及如何对待美国主导地位时，施罗德回答说："答案或药方很简单：一个更统合和更扩大的欧洲"，具有"更大影响"的欧洲。吉斯卡尔·德斯坦在2002年3月欧盟宪法大会开幕时指出，联盟制度的成功改革将确保"欧洲改变在世界上的角色"。他接着还说："它将不仅作为已经是的经济力量，而且作为将同这个星球上最大的现存和未来力量进行平等对话的政治力量，得到尊敬和听从。"欧洲执行委员会主席罗马诺·普罗迪(Romano Prodi)同意，欧盟的首要目标之一就是创建"欧洲大陆上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51]。

这些声明以及其他一些相似的评论旨在赢得国内选民的支持和指导欧洲政策。但是，即便作为政治言辞，这些口号也过于露骨了。欧洲领导人激发民族主义本性、推动欧洲成为美国反制力量的举动，加强了美国—欧洲对抗的可能性。将现实主义

逻辑与泛欧洲民族主义逻辑结合起来,就会非常清楚,即使欧洲和美国之间缺少利益冲突,他们也会为地位和身份而在大西洋之间展开竞争性的明争暗斗。

然而,利益冲突还是会有的。值得庆幸的是,美国和欧洲没有突出的领土争端,这些纠纷早在19世纪就已经通过外交与战争相结合解决了。但是,双方有可能在其他问题上发生冲突。

美国和欧洲在中东,尤其是在伊朗和伊拉克问题上,长期以来一直各走各的路。华盛顿赞成严厉遏制与制裁相结合,而欧洲支持建设性的参与和接触。大多数欧洲国家反对美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的战争。在战争之前,维持针对伊拉克的制裁机制已经证明简直是不可能的。欧洲公司对华盛顿阻止它们在像伊朗和叙利亚这样的地方进行投资和开业提出挑战,这也使制裁简直不可能。美国国会在一定程度上坚持对欧洲某些公司违反1996年伊朗—利比亚制裁法案(Iran-Libya Sanction Act, ILSA)进行制裁,是完全有说服力的。国会在2001年7月将伊朗—叙利亚制裁法案再延长五年。欧盟则与此同时颁布了一项法律,规定欧洲公司遵守伊朗—叙利亚制裁法案为非法。2001年9月的恐怖袭击事件以及由其引发的反恐战争使中东的政治环境进一步复杂化,从而使大西洋两岸的利益冲突变得更为可能。美国和欧洲对阿以和平进程也采取了不同的方法,随着欧洲作为调解人更多地卷入,这个地区的国家更有可能使美欧双方彼此捉弄。由于2001年底和2002年初暴力冲突的不断升级,欧洲领导人对布什政府支持以色列镇压亚瑟·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政权提出了公开而严厉的批评。[52]

考虑一下关于导弹防御的辩论将在未来几年如何收场,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布什政府已经明确表示,它决意要发展和部署导弹防御体系,而且很可能选择包括陆基、海基、空基和太空

基导弹拦截器的宏大体系。这样范围的体系不可能赢得欧洲的支持，从而将开启严重战略分裂的可能性，特别是如果俄罗斯与欧洲站在一边。欧洲对于可能的威胁以及如何处理这种威胁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在没有苏联威胁维持联盟完整性的情况下，此类不和很可能危害到美国同欧洲的紧密战略伙伴关系。这种关系将很快与两次大战间的关系相似，当时，虽然美国和欧洲民主国家不是对手，但他们却也绝对不是可信的盟友。

美国和欧洲还可能在贸易和金融问题上卷入更激烈的竞争。今天美国和欧洲拥有极其健康的经济关系，双方都受益于贸易和投资的强流。然而，更为自信的欧洲和更为缺乏竞争力的美国经济的确使贸易纠纷越来越政治化成为可能。当2002年3月布什政府宣布对进口钢铁实行新关税时，欧盟扬言要在世界贸易组织争论此事。欧盟最高贸易官员帕斯尔·拉米(Pascal Lamy)评论说："美国决定走保护主义路线是对世界贸易体系的一次严重阻碍。"[53]欧洲对进口基因改造食品进行了严格限制，由于这个禁令可能让美国公司每年损失4万亿美元，因此它尤其具有产生重大争端、妨碍新一轮全球贸易对话的潜能。欧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出现也有可能在国际金融体系的管理问题上制造意见分歧。两次大战间彼此竞相贬值和缺少货币协调的情况已经充分说明了，主导经济体的缺乏可能导致严重的金融动乱和自行其是的外交政策——甚至在志同道合的盟友之间。

出现分歧的并不仅仅是相互竞争的利益，而且还有相互竞争的价值观。大西洋两岸被相当不同的社会模式所分割。尽管欧洲在不断地解除控制，但是，美国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与欧洲更以国家为中心的经济之间还是形成了鲜明对比。美国人诋毁欧洲模式对经济增长的限制，欧洲人则蔑视美国的收入不平等、消费主义、心甘情愿为物质收益牺牲社会资本。两者在治国方

略方面也存在分歧。美国人认为欧盟对多边主义制度和国际法治的坚定承诺太过天真、自以为是、是军事软弱的结果，欧洲人则认为美国对使用武力的依赖太过简单主义、自私自利、是实力过剩的产物。欧洲人仍然对美国具有历史亲近感，但是他们对热爱枪支所有权、死刑和大耗油量汽车的社会也有疏远感。归根结底，美国和欧洲信奉的是极其不同的政治文化。两者的文化分歧似乎在不断扩大，而不是在逐渐靠近，这使大西洋两岸分别走上了岔开的社会道路。

这种价值观方面的分歧跟利益方面的分歧一样，可能对国际组织的有效性带来严重打击。当前大多数多边主义制度达成共识和采取联合行动，主要依赖于美国的领导地位与欧洲的支持相结合。美国和欧洲经常作为一个集团投票，使之成为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很多其他机构中获胜的联盟。这种协调悄悄地和稳定地维持着这些国际制度的正常运转。

当欧洲抵制而不是支持美国的领导地位时，多边主义组织如果不瘫痪的话，也更可能被迫面对僵局。这种抵制的初期征兆已经显而易见。2001 年 5 月，欧盟成员国带头将美国选出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这是华盛顿自该委员会 1947 年成立以来第一次缺席该机构。显然的理由是报复美国单边主义，表达对美国死刑的反对。同一天，在互不相干的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选举中，美国丢掉了在国际毒品控制委员会上的席位。

欧洲人不管美国的反对，积极推动国际刑事法庭的建立。当 2002 年 7 月 1 日国际刑事法庭成立的时候，布什政府为了表示不满，威胁说除非美国军事力量得到该法庭免于起诉的保护，否则它将撤回在波斯尼亚执行联合国使命的美国工作人员。在

华盛顿背叛京都议定书之后，欧盟成员国与日本和其他150个国家一起于2001年7月最终敲定了关于阻止“全球变暖”的协议，当布什政府特使保拉·杜布里安斯基(Paula Dobriansky)试图解释美国选择退出的决定时，欧盟成员国代表显示了他们的不以为然。简言之，美国和欧洲不再紧密合作的世界将是一个国际机构日常职能陷入危险的世界。

所有这些情形都不大可能导致美国和欧洲之间的武装冲突。但是它们中的任何一种都可能致使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变得截然不同——并且变得更不亲切友善。

罗马的过去可能还对现在具有最后一点启示。虽然拜占庭证明是罗马近期的首要对手，但乃是非欧洲权力的兴起才最终导致了罗马帝国及其继任拜占庭帝国的衰亡。财富和军事实力向伊斯兰世界的扩散开始使拜占庭帝国丧失了其中东地区的主要谷物来源。最后，奥托曼军队得以推倒君士坦丁堡的城墙，正式终结了拜占庭时代。奥托曼人很快就在维也纳兵临城下了。

与此相似，从长期来看，亚洲的崛起可能比北美和欧洲之间对抗的回归给西方带来的麻烦还要多。本书主要集中讨论欧洲的崛起问题，既是因为欧盟的地缘政治重要性已经被如此严重地忽略和低估了，也是因为对美国优势地位的近期挑战是欧洲而不是亚洲。正是在当前这个十年，欧洲兴起的地缘政治意义将初见成效，而亚洲的崛起则要更为遥远一些。

但是，亚洲的发展也不是太过遥远。到当前新世纪第三个十年的时候，中国可能作为世界领导国家之一出现在舞台上。如果到时候它的国内政治还没有发生急剧变化，那么美国将面临的就不只是另外一极，而且还是一个潜在的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的主要对手。与欧洲的情况不同，美国面临的与中国的争端——例如在台湾问题或朝鲜半岛问题上——可能导致武装冲突。

日本也将最终走出经济衰退，重新崛起为全球行为体。尤其是因为日本同中国之间的疏远关系，因此日本可能会固守与美国的联盟，在防御事务上听从华盛顿的领导。但是甚至在日本国内，已经有了无休止的煽动传闻和初期征兆，说明路线的改变可能随时开始。2001 年 4 月上台的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Junichiro Koizumi)从一开始就透露出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气息。他提议修改宪法，取消限制日本军事作用的条款。他选择田中真纪子(Makiko Tanaka)作为他的首任外交部长，此人也同样是一位民粹主义者，她避而不见很多来访的高官要人，包括第一位访问日本新政府的美国高级官员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Richard Armitage)。2001 年 8 月，小泉纯一郎参拜了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英雄的靖国神社。他还支持文部省批准新的历史教科书的决定，该教科书掩盖了该国的战时暴行——此事在中国和韩国激起了极大愤慨。

日本近期内不会很快急剧改变路线和蓄意作为美国的抗衡力量行事。但是，上升的亚洲已经在远处的地平线上隐约可见。加上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因素，包括朝鲜的发展轨道和印度尼西亚的未来命运，该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将对美国和欧洲构成新的战略挑战。到 2025 年，美国和欧洲可能双双要为对亚洲崛起的担忧比对彼此的担忧花费更多的时间。

然而，就现在而言，恰恰是欧洲正在成长为美国的惟一主要竞争者。它对于全球体系和对于美国大战略的寓意，只有在考察了国际体系其他主要变革源泉——美国变化的国际主义——之后才能进行精确的测定。

## 注 释

1. 参见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am-

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and Paul M.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2. 关于这种传统思维的简明概述,参见 Antony J. Blinken, "The False Crisis over the Atlantic", *Foreign Affairs*, vol. 80, no. 3 (May-June 2001), 第35—48页。

3. 引自 Otto Pflanze, *Bismarck and the Development of Germany*, vol. 1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第97页。

4. Benjamin Disraeli, February 9, 1871, 引自 J. C. G. Rohl, *From Bismarck to Hitler: The Problem of Continuity in German History* (New York: Barnes & Noble, 1970), p. 23.

5. 引自 V. R. Berghahn, *Germany and the Approach of War in* 1914 (New York: St. Martin's, 1973), p. 174。

6. 引自 Fritz Fisher, *World Power of Decline: The Controversy over Germany's Aims in the First World War*, trans. Lancelot Farrar, Robert Kimber, and Rita Kimber (New York: Norton, 1974), 第26页。

7. Margaret Thatcher, *The Downing Street Years*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93), pp. 796—797. 也请参见 Robert J. Art, "Why Europe Needs the United States and NATO",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11, no. 1 (Spring 1996), 第1—39页。

8. 关于罗马军事战略,参见 Edward N. Luttwak, *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an Empire from the First Century A. D. to the Third*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6)。

9. Ammianus Marcellinus, *The Later Rome Empire* (*A. D.* 354—378)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Penguin Book, 1986), p. 412.

10. 西罗马帝国的首都在14世纪末迁往米兰(Milan),接着又在15世纪初迁往拉韦纳(Ravenna)。

11. 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e Empire*, with an introduction, notes, and appendices by J. B. Bury, vol. 4 (New York: AMS Press, 1974), pp. 174—175.

12. Lactantius, *On the Death of the Persecutors*, 引自 Chris Scarre, *Chronicle of the Roman Emperors: The Reign-by-Reign Record of the Rulers of Imperial*

*Rome* (London: Thames & Hudson, 1995), p. 196.

13.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e Empire*, vol. 4, pp. 174—175.

14. 关于衰落的原因,参见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e Empire*, vols. 1—7; J. B. Bury,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From the Death of Theodosius I to the Death of Justinian* (A.D. 395 to A.D. 565) (London: Macmillan, 1923); and A. H. M. Jones, *The Later Rome Empire, 284—602: A Social, Economic and Administrative Survey* (Oxford: Blackwell, 1964). 关于拜占庭,参见 A. A. 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324—1453*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52).

15.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e Empire*, vol. 4, pp. 174—175.

16. William C. Wohlforth, "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1 (Summer 1999), p. 8.

17. 关于欧洲发展强调经济动机重要性的陈述,参见 Andrew Moravcsik, *The Choices for Europe: Social Purpose and State Power from Messina to Maastrich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18. European Parliament, "Principles and General Completion of the Internal Market," Fact Sheet 3.1.0. Available at: http://www.europarl.eu.int/factsheets/3-1-0-en.htm.

19. Robert Schuman, "Declaration of 10 May 1950", Available at: http://europa.eu.int/comm/dg10/publications/brochures/docu/50ans/decl-en.htm#DECLARATION.

20. Jean Monnet, *Memoirs*, trans. Richard Mayne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78), p. 392.

21. 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 Available at: http://www.europe.eu.int/abc/obj/treaties/en/entoc29.htm.

22. Toby Barber, "The Euro Takes Its Place in the Flow of history", *Financial Times*, August 30, 2001.

23. European Commission, *Eurobarometer: Public Opin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 Report no. 56, pp. 14, 38—39, 55—56. Available at: http://europa.eu.int/public-opinion/Standard-en.htm.

24. 参见 Suzanne Kapner, "U. S. Venture Capital Sees Treasure in Europe", *New York Times*, May 30, 2001.

25. 英国公司进行了价值3370亿美元的国外兼并；法国公司进行了价值1370亿美元的国外兼并；美国公司进行了价值1360亿美元的国外兼并。"Europe's Corporate Invasion of North America at All-Time High", KPMG Corporate Finance, January 15, 2001.

26. 参见 Norbert Walter, "The Euro: Second to (N)one", *German Issues*, no. 23 (Washington D.C.: American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German Studies, 2000).

27. 第一个支柱包括导致经济和货币联盟的几个连续条约中所阐述的政策领域。它包含了主要与个人、商品、服务和资本跨界自由流动直接相关的规则和立法。司法和本土事务涵盖了避难和移民、民事和刑事司法，以及警察合作。

28. 立法的通过需要获得87票中的62票。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英国每个都在理事会中拥有10张选票。小一些的国家具有与其人口成比例的票数。选票的分配将随着欧盟扩展的进行而有所改变。

29. "Britain's Role in Europe", November 23, 2001. Available at: http://www.number10.gov.uk/news.asp? NewsID = 3101&SectionID = 32.

30. 参见 Ezra Suleiman, "Is Democratic Supranationalism a Danger?" in *Nationalism and Nationalities in the New Europe*, ed. Charles A. Kupcha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5).

31. Joschka Fischer, "From Confederacy to Federation-Thoughts on the Finalit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speech at Humboldt University, Berlin, May 12, 2000. Available at: http://wwww.auswaertiges-amt.de/www/de/infoservice/download/pdf/reden/redene/r000512b - r1008e.pdf.

32. 引自 Michael J. Sandel, *Democracy's Discontent: America in Search for a Public Philosoph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5.

33. 关于欧盟需要宪法的评估，参见 Andrew Moravcsik, "Despotism in Brussels?" *Foreign Affairs*, vol. 80, no. 3 (May-June 2001), 第114—122页。关于公众对宪法的支持问题，参见 *Eurobarometer*, Report no. 56, 第46—47页。

34. Fischer, "From Confederacy to Federation."

35. 参见 Philip Stephens and Brian Groom, "Blair's Broad Horizons," *Financial Times*, May 25, 2001.

36. "Prime Minister's Speech to the Polish Stock Exchange", October 6, 2000. Available at: http://www.number10.gov.uk/news.asp? NewsID = 1341&SectionID = 32.

37. Robert Graham, "Chirac Seeks EU 'Pioneer Group' on Security", *Financial Times*, August 27, 2001.

38. Suzanne Daley, "French Premier Opposes German Plan for Europe", *New York Times*, May 29, 2001.

39. 参见 Martin Walker, "Overstretching Teutonia: Making the Best of the Fourth Reich", *World Policy Journal*, vol. 12, no. 1 (Spring 1995), p. 13.

40. Pricewaterhouse Coopers, "European Pension Reform", *European Economic Outlook* (September 2000), p. 28. Available at: http://www.pwcglobal.com/gx/eng/ins-sol/spec-int/eeo/pwc-euro-pension-reform-9—00.pdf.

41. 参见 Thomas Fuller, "Europe Wants Workers to Mov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February 12, 2002.

42. Fischer, "From Confederacy to Federation."

43. 1820年的密苏里妥协方案(The Missouri Compromise),通过同时承认密苏里为奴隶州、缅因为自由州,维持了自由州与奴隶州之间的政治平衡。该妥协还对奴隶制向西部领土的扩展进行了规定,禁止路易斯安那购地(Louisiana Purchase)具体规定的纬度线以北地区实行奴隶制。参见 David M. Potter, *The Impending Crisis*, 1848—1861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6), 第53—58页。

44. Fischer, "From Confederacy to Federation."

45. 西尔维奥·贝鲁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政府后来退出了协定,但表示意大利可能会在晚些时候重新加入。

46. Roger Cohen, "Storm Clouds over U.S.-Europe Relations", *New York Times*, March 26, 2001.

47. 同上; Roger Cohen, "A More Assertive Europe", *New York Times*, March 30, 2001.

48. Speech on the occasion of the Twen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Institute Fran-

cais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Elysee Palace, November 4, 1999. 文本由法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分发。

49. "Prime Minister's Speech to the Polish Stock Exchange", October 6, 2000. Available at: http://www. number10. gov. uk/news. asp? NewsID = 1341&SectionID = 32.

50. "Vedrine Criticizes U.S. over International Ties", Agence France-Press, November 3, 1999. Available at: http://wnc. fedworld. gov as document FBIS-WEU-1999—1103; Craig R. Whitney, "On the Ropes, Chirac Fights Back in French TV Interview",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3, 1996; and "Yeltsin's 'Very Satisfied' with Talks with Jiang Zemin", ITAR-TASS, December 10, 1999. Available at: http://wnc. fedworld. gov as document FBIS-CHI-1999-2110.

51. Suzanne Daley, "French Minister Calls U.S. Policy 'Simplistic'",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7, 2002; Alan Friedman, "Schroeder Assails EU Deficit Critics",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February 2, 2002; Stephen Erlanger, "Europe Opens Convention to Set Future of Its Union", *New York Times*, March 1, 2002; and T. R. Reid, "EU Summit Ends with a Bang and a Whimper", *Washington Post*, March 17, 2002.

52. Daley, "French Minister Calls U.S. Policy 'Simplistic'."

53. Edmund Andrews, "Angry Europeans to Challenge U.S. Steel Tariffs at WTO", *New York Times*, March 6, 2002.

# 第五章　美国国际主义的局限——回顾

欧洲的崛起只是美国单极时代所要面对的两股主要力量之一。另外一股力量则是美国自身的政治，以及该国对于承担全球霸权负担的变动不居的兴趣。有观点认为，未来几年，美国的国际主义将迅速式微，并变得越来越单边主义，如同声称欧洲正日益成长为美国的挑战者的观点一样，这种判断也与流行思维相左。大多数分析家不认为美国有从全球舞台上后撤的可能，他们争辩说，精英和大众对多边参与(multilateral engagement)的支持依旧强劲。尤其在"9·11"事件后，许多人预期，美国管理世界事务的兴趣会持续勃兴，他们坚信，华盛顿将乐于担当起领导者的职责。[1]

相比而言，本书把美国国际主义更难兴起看作是缺乏主要对手的必然结果。欧洲将会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但欧洲不会成为能够激发美国全球参与的那类敌人。恐怖主义将继续对国内外的美国人构成威胁。但是，即便当美国对恐怖分子及其支持者实施孤立性打击时，美国还是加强了本土防御，减少了海外承诺，试图使自己远离这类威胁。国民经济的降温、国内人口的变化也使美国对过去50年来一直身体力行的广泛和多边的国际主义丧失了热情。即使今后几年美国能够继续保持物质力量

上的优势地位,新的孤立主义和日益崛起的单边主义也将给全球政治格局带来极大的改变。

美国的过去为这个判断提供了令人信服的支持。从建国伊始直至 1941 年决定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一直极力避免卷入西半球以外的事务,只有偶尔几次短暂的例外。过去 50 年美国的全球参与是一种巨大的背离。而且这种背离可以非常容易地解释为美国安全遭遇到了严重威胁,先是德国和日本,后是苏联。由于存在明确、紧迫的外部威胁,很多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制约因素难以发挥作用,这些制约因素过去几十年来一直压抑着美国的对外野心,并滋长着美国人对参与国际制度的反感。共同目标感不但为积极的国际主义,而且也为其自由主义变种,即与多边主义和合作机制紧密结合的国际主义,提供了便利的基础。随着苏联的垮台以及因冷战达成的国内共识的解体,人们再也无法确信,对自由国际主义的支持是否会继续持之以恒。因此,要追踪美国参与世界的可能轨迹,就要回顾历史,并揭示即将再度对美国大战略产生巨大影响的国内力量。

自合众国(Union)创立时代以来,三方面重要辩论塑造了美国的国际主义以及由此而来的大战略。这些辩论分别是:是现实主义还是理想主义应当指导国策的制定;在形成大战略时,如何协调美国国内不同地区间相互竞争的文化与利益;如何管理政党政治(partisan politics),并限制其对外交政策行为的影响。国父们围绕这些问题的辩论造就了一个持久模式——该模式至今仍然塑造着独特的美国式国际主义。

美国大战略形成过程中的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争,反映了为适应建国而出现的两种彼此竞争的意识形态律动。野性力量对于美国脱离英国实现独立,对于确保新生合众国的安全,以及对于使美国有能力向西部拓展,都是至关重要的。与此同时,

对于很多离开旧世界(the Old World)到美国落户定居的人来说，他们也因理想主义原因而这样作为。他们的社会和道义目的感同样带到了这个年轻国家的对外政策中，理想主义者敦促，应该用原则弱化对权力的使用，应该用对民主理想的追求指导治国方略的实施。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仍旧居于时下美国大战略辩论的核心。

自建国初期以来，美国不同地区千差万别的经济利益和文化也对国家大战略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北方各州，由于在那里落户的宗教社区的原因，对法律和理性的支持主导着对外政策，而不是实力主导外交政策。北方的理想主义产生了孤立主义的自由分支(liberal strain)，该分支在原则性基础上反对美国进行西部扩张和参与大国角逐。相比而言，更以农业为主和更具重商主义色彩的南部诸州，则倾向于支持现实主义实力政治，南方人对于把使用武力作为治国方略的工具，特别是以此保护贸易自由时，更为坦然。同时，南方民粹主义的个人主义传统根深蒂固，它产生了孤立主义的自由意志分支(libertarian strain)，该分支反对雄心勃勃的对外政策，以及这种政策所要求的强大的中央政府。

虽然由于合众国自我强加的孤立状态，这些态度尚不直接相干，但是在这些态度当中还是蕴涵着美国对外政策行为中单边主义律动的意识形态基础。如果美国人对自己的国内制度都心存疑虑的话，那么对于该国将在日后考虑托付意愿的国际制度，美国人所能集结的热情和支持就会更少。民粹主义还同美国理想主义的某些元素相混合，形成了美国例外主义观念。该观念认为，美国是一个有着独特使命的独特国家。这种例外主义进一步助长了单边主义，怂恿美国在最终参与重塑国际体系的努力中开辟自己的路线。这样就导致美国具有同时被孤立主义和单边主义两个极端所吸引的特质，这种吸引尽管矛盾，但却互补。[2]

随着西进运动的推行，各不相同的地区利益和文化特质在中西部、山区西部、以及远西地区扎根，从而进一步增加了整个国家政治地理的复杂性。美国不同地区的利益和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巨变。但地区差异仍然在塑造美国对外政策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孤立主义的自由分支和自由意志分支，以及顽固的单边主义，尽管在美国不同地区与政治经济利益的流变进行了同步的起伏跌宕，但它们在美国广泛的政治文化中仍然占据着相当大的部分。

政党政治自建国伊始就以相似的方式极大地左右着美国大战略的制定。国父们坚持主张制度性的权力制衡，在民众、各州和联邦政府之间建立了行之有效的权力分割。然而，这种权威非集权化却阻碍了对外政策的稳定推行，致使外交政策容易受到政党政治善变的影响。因此，使外交摆脱党派冲突的羁绊，建立跨党派和跨地区的国际主义联盟，以及通过创新和妥协寻找政治中间路线，已经证明对于指导美国早期的对外政策是至关重要的——今天仍是如此。

三个历史时期为我们了解美国国内政治与美国大战略演变之间的相互关系提供了极好的观察视窗，它们分别是：建国及其后续发展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及1919—1920年美国对是否参加国际联盟的审议；第二次世界大战和20世纪40年代美国全球角色的开始。三个历史时期发生的意识形态、地区和党派纷争，极其有助于我们了解美国国际主义的缘起及其今后数年的可能走向。

## 建国时期及其传统

那些带领美国走向独立并在最初几年治理这个国家的人

们，全神贯注于如何界定美国与欧洲的关系，这是可以理解的。相互冲突的目标和冲动使这项任务复杂化。英国显然是美国的敌人，但它也是新大陆众多移民欢呼致敬的故乡，他们与故土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家庭和语言纽带。与欧洲的贸易对于美国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然而，美国却必须避免与欧洲形成过度相互依赖，以防止陷入旧世界的地缘政治对抗。美国独立运动的旗手和评论家潘恩声称："任何从属于，或依附于英国的行为都会直接使这个大陆卷入欧洲的战争和争吵之中。"在建设新社会的进程中，美国人将因学习欧洲，汲取其知识财富而获益良多。但国父们还同时义无反顾地致力于永远摒弃欧洲的社会痼疾、宗教纷争以及政治嫉妒。

为指导美国对外政策而锻造一套准则所做的最初努力未能弥合人们的思想分歧。美国领导人沿着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路线分成两大阵营。在理想主义阵营中，有像潘恩和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这样的人，他们感到，新生美国能够而且应当与过去决裂，实施以法律和理性为指导而不是以权力政治为指导的对外政策。潘恩指出，美国的使命是商业而非战争，"如果对此尽心尽力，则能确保我们拥有全欧洲的和平和友谊"。[3] 杰弗逊坚信人类的稳定进步，坚持认为社会和政治进步将使战争过时。美国必须领导人们争取实现"诸如彻底解放商业以及使所有国家都能走到一起相互自由交流幸福生活这样对人类颇有价值的目标"。他认为，战争和胁迫"是黑暗时期的合法性原则"，但是在民主和法律的新时代，国家间关系应以"惟一的道德律令"为指南。[4]

在现实主义阵营中，有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约翰·杰伊(John Jay)这样的代表，他们采取了截然不同的路径。在《联邦党人文集》第六篇中，汉密尔顿承认，"仍然有些空想家或阴谋

家，一直准备鼓吹自相矛盾的永久和平论……（他们说）共和国的真意就是爱好和平；商业精神有一种趋势，它能使人们举止温和，而且能消灭常常引起战争的易燃激情。”但是，他对民主和平论与商业和平论不屑一顾。汉密尔顿问道：“人民议会不是常常受到愤怒、怨恨、嫉妒、贪婪和其他不正当的以及强暴的倾向的驱使吗？”他对所谓的贸易与和平之间的纽带也提出了同样尖锐的疑问。“到现在为止，商业除了改变战争的目的以外，还做了些什么呢？爱好财富同爱好权力或荣誉不都是一种凌驾一切和冒险的激情吗？”杰伊赞同汉密尔顿更为悲观的现实主义，他在《联邦党人文集》第四篇中指出：“事实如此，不管这是人性的多大耻辱，一般国家每当预料到战争有利可图时，总是要制造战争的。”[5] 依照汉密尔顿和杰伊的看法，美国应该像任何其他国家一样以清醒的自我利益为指导。

尽管存在如此深刻的哲学思想分歧，国父们在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上却是意见一致，这个问题就是，通过远离欧洲的地缘政治角逐，美国可以最有效地捍卫自己的安全。由于很多原因，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才找到了这个共同基础。首要的和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坚持认为，美国因远离欧洲而得到了自然安全的恩惠。乔治·华盛顿总统在 1796 年对国民作告别演说时直截了当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说：“我国独处一方，远离他国，这种地理位置允许并促使我们奉行一条不同的路线。……我们为什么要摒弃这种特殊环境带来的优越条件呢？我们为什么要放弃自己的立场而站到外国的立场上去呢？为什么要把我们的命运同欧洲任何一部分的命运交织在一起，致使我们的和平与繁荣陷入欧洲野心……的罗网之中呢？”

华盛顿最初的意图是，暗示美国需要远离欧洲几十年，直到美国获得经济和军事实力为止。但是，汉密尔顿说服总统，避免

卷入联盟关系是基于不变地缘政治现实而提出的声明，是"政策的一般原则"，而不是暂时性警告。于是，华盛顿最终决定，在他的告别演说中，把孤立的大战略称作"处理外国事务的伟大法规(great rule)"。[6]

国父们关注的并不仅仅是防止美国卷入"欧洲政治和战争的一切有害纠纷"，而且还有限制欧洲操纵和控制美国政策的能力。[7]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担心，倘若美国与欧洲国家形成联盟，这些国家"将找到手段腐蚀我们的人民，影响我们的委员会，最后，我们所能做的比木偶好不了多少，只能在欧洲内阁的遥控下手舞足蹈。我们将成为欧洲阴谋和政治的消遣"。[8]美国因此应该限制卷入地区以外的事务，相反，美国应该寻求，用汉密尔顿的话说，"成为欧洲各国在美洲的仲裁者，并且能够依据我们的利益来左右欧洲各国在美洲竞争的胜负"。到时候，欧洲会发现自己对大西洋美洲一侧施加影响的能力在递减。华盛顿总统宣称："好战国家不能从我们这里获得好处时，也不敢轻易冒险向我们挑战。"[9]结果，美国将不受约束地崛起，在新世界中获得优势地位。正如汉密尔顿所指出的："我们的地位要求我们，我们的利益也促使我们要在美洲事务体系上力争上游。"[10]

对于大战略，理想主义者跟现实主义者一样感到心宽，因为他们相信，在不对其他国家作出持久的政治或军事承诺的情况下，美国也能够得到它想要得到的——商业增长。通过选择中立立场，共和国可以同所有各方进行自由贸易。用杰弗逊的格言来讲就是："同所有国家维持和平、商业和诚实的友谊，不同任何国家卷入联盟关系。"[11]潘恩完全赞同，他说："由于欧洲是我们的贸易市场，因此我们应该同欧洲的任何一部分建立不偏不倚的联系。避开欧洲的纷争符合美国的真正利益。"[12]将扩展经济联系和避免战略牵连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原则还同杰弗逊的兴

趣相契合，他感兴趣的是限制联邦政府的权威，保护各个州及其公民的权利。因为一场大的战争会要求大规模的联邦陆军和海军，以及更集权的管理，因此战争的威胁不仅在于破坏美国的对外关系，而且还在于破坏美国的国内制度和自由。

国父们在履行创建新国家的使命中，给美国带来了引人瞩目的多种多样的意识形态、经验和个性。他们在根本国家事务方面的分歧既繁多又深刻。但是，在新国家大战略这个问题上，他们却是思路一致。正如华盛顿在告别演说中所警告的，合众国必须以这样的目标为指导，即“(与其他国家)扩展我们的商务关系，尽量避免与他们发生政治联系。”[13]

为了给新生的国家打造外交政策，需要协调和妥协的并不仅仅是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主义之间的分野，还有整个国家不同地区之间相互竞争的利益。从早期开始，北方和南方殖民地就在文化和商业问题上存在分歧。更多的有宗教信仰的移民倾向于落户北方。他们当然希望走向繁荣，但是他们经常把社会和社区目标排在经济目标之前。于是，经过一个自我选择的过程之后，北方文化深受加尔文教(Calvinist)、清教(Puritan)和贵格会(Quaker)教派的影响。有序自由、互助互惠、道德正直、人类进步——这些是北方社会的价值观。北方人还对发展制造业经济感兴趣，并因此追求为他们的新兴工业提供保护性关税。与这些价值观和利益相伴随的是更加和平主义的外交政策路径，该路径总体上是一种不干涉主义方法，倾向于反对使用军事力量。[14]

南方吸引的是不同类型的移民——那些寻求远离宗教权威和道义责任制约的移民。南方种植园是严格的商业企业，决非充满社会目的的社区计划。移民规避那些可能干扰其日常生活的制度；看重个人自由和特权优于看重秩序和道德进步。南方

人还严重依赖于棉花和其他农作物的出口。他们因此倾向于反对某些北方人所追求的商业保护。[15]独特的南方文化围绕自由意志价值观而形成——历史学家把沿海地区的这种文化称作“骑士(cavalier)”,把内陆地区的这种文化称作“苏格兰—爱尔兰高地(Scotch-Irish Highland)”。[16]与这种文化相伴随的是更加激进主义的外交政策路径。南方人一般比北方同胞更为支持干涉主义方法,更能接受武力的使用。与此同时,他们戒心十足地捍卫各州及其公民的权利,并从而反对一定程度的对外野心,因为这种野心存在导致集权的危险,还会加强联邦政府的控制力。随着时间的发展,随着美国对国际参与的兴趣不断上升,这种自由意志的传统也演变成了单边主义的一个有力分支,这个分支坚持认为,即使美国影响力扩大以后,美国也应义无反顾地捍卫自己的自主。

在美国早期,北方与南方的文化和政治分歧对于大战略辩论的核心问题——合众国与欧洲的关系——影响甚微。美国应该在地缘政治事务方面远离欧洲,集中精力关注北美事务,这是北方和南方广泛存在的共识。然而在与国内事务更接近的政策问题上,严重的意见分歧却的确产生了。南方人一般支持合众国向西部拓展,而北方人尽管并不反对但却态度暧昧。在很大程度上因为依赖海上贸易,因此南方支持对加拿大的英国军事要地以及沿北美海岸线部署的英国海军力量提出更大的挑战,这个立场对于1812年战争的爆发起到了重要作用。

北方与南方之间的文化和政治分歧及其对外交政策的影响,还因为这种分歧与政党政治相互交织的程度而得到突显和放大。正如研究早期美国的外交史学家亚历山大·德孔代(Alexander DeConde)已经注意到的,关于对外政策的辩论“空前绝后地主导了美国的国内政治和美国人的生活”[17]。外交事务

在日常政治中地位如此显著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对政策的争吵变得个人化了，并因而陷入了主要政治家及其各自政党彼此角逐的泥潭之中。

起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托马斯·杰弗逊之间的对抗充分暴露了这种政党明争暗斗的复杂性和激烈性。汉密尔顿出生于西印度群岛，父母是一对未婚伴侣，他们既没有愿望，也没有资源扶养他们的儿子。一位教师及其雇主之一挺身而出帮助扶养和教育了这个年轻人。此后，汉密尔顿入学国王学院（现哥伦比亚大学），与富有的纽约男爵菲利普·斯凯勒(Philip Schuyler)之女结婚，从而摆脱了他的卑微出身，进入了北方上层社会。

或许是对自己背景的补偿，汉密尔顿很快便成了北方价值观和利益的卫士之一。他主要辗转于专业人士、银行家和商人之间，支持强大的中央政府和银行系统，相信美国应该由受过教育和拥有特权的精英来治理。汉密尔顿赞同使用补贴和关税来保护北方的新兴工业基础。[18]他还认为，美国在着手城市化，尝试建立现代工业和社会制度时，应该把英国经济看作样板。围绕汉密尔顿议程形成的党派自称为联邦党人。

托马斯·杰弗逊尽管出身于弗吉尼亚土地贵族之家，但却对汉密尔顿为之奋斗的强大联邦机构和精英领导并不信任。出于对集权专制的担忧，他认为联邦政府应该只有有限的权力，日常事务的治理应该留给普通百姓去做，而不是委托给一些富有且拥有特权的少数人。杰弗逊及其政党——共和党，代表的是与银行家和工业家相对立的弱小农场主和手工艺人的利益。杰弗逊在捍卫各州及其普通公民权利，主张小规模、有限政府的过程中，对汉密尔顿的观点提出了直接挑战。他们二人在外交事务方面也看法相左。杰弗逊更喜欢外交上向法国而不是向英国倾斜，这既是因为他曾经作为公使(minister)在巴黎任职，也是因

为,相对于英国的城市化和精英主义,他更喜欢法国的农业文化。

杰弗逊和汉密尔顿之间的斗争在1789年愈演愈烈,那年,华盛顿总统将杰弗逊从巴黎召回,任命其为国务卿。由于汉密尔顿已经任职财政部长,因此二人发生个性和原则上的冲突已经万事俱备。他们的争论还转变为两个政党之间的激战,因为外交政策方面的分歧引起了党派之间的争斗。

华盛顿本已决意四年后离职。然而,鉴于"内部纠纷……破坏和撕扯着我们的致命因素",他深感震惊和苦恼,于是为了国家的政治稳定,他同意竞选第二任期。[19]华盛顿一向被认为超然于政党政治,因此他非常容易地赢得了1792年大选。联邦党人和共和党人为副总统职位展开了激烈竞争,结果联邦党人候选人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鹤立鸡群,但是共和党人却赢得了国会的多数。[20]杰弗逊和汉密尔顿都在内阁中留任,他们的恩怨在继续。

外交政策依旧是主战场之一。在汉密尔顿的要求下,约翰·杰伊于1794年同英国达成了旨在保护双边贸易、确保美国向英格兰外交倾斜的商务条约。共和党人声称,美国的"资金贵族们"将是这个同"老旧、腐败、几乎断气的英国政府"达成的协定的惟一受益者。[21]虽然杰弗逊当时已经离开了内阁,他还是将这个协定斥责为"十足一个英格兰同这个国家的盎格鲁人达成的反对……美国人民的联盟条约"。汉密尔顿以同样的方式进行了回应,称他的政治对手是"阿谀奉承或狂乱的煽动家",他们很多都"深深感染了雅各宾主义的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原则。"[22]汉密尔顿指责说,杰弗逊如此"深受与法国联结的影响",以至于不惜冒险挑起美国和英国之间的战争。[23]第一次,但很难说是最后一次,外交政策已经陷入了政党政治的敌

意陷阱之中。

美国早期出现的关于外交政策的辩论为国家参与全球事务——或更精确地说缺乏参与——的第一个世纪确立了坚定的路线。随后几十年,美国继续避免欧洲的阴谋诡计。虽然在革命战争期间法国提供了帮助,但是当1793年英国和法国出现敌意时,美国还是决定袖手旁观。美国在革命时期已经和法国进入了一种联盟关系,但是到了18世纪90年代,如果不是更早的话,很多美国人已经认为这种联盟关系名存实亡了。[24]美国的独立及其与英国的和平关系使美国没有必要与法国结成正式的军事纽带。尽管战争在持续折磨欧洲大陆,直到拿破仑于1815年被最终击败,但是美国始终与欧洲的战争保持距离。

美国的确在1812年与英国发生了战争,但那仅仅是因为,美国领导人和公众认为英国不正当地破坏了美国的对外商务,侵犯了美国的新兴势力范围。皇家海军常常干扰美国的航运,并把这看作是加强对拿破仑实行海上封锁的一部分。由于英国为加拿大边境沿线的美国土著部落提供武装及其随后对美国移民的袭击,美国对英国的怨恨进一步加剧了。

19世纪美国士兵偶尔参与西半球以外的军事行动,情况也是一样。美国军队在很多地点采取了行动,包括的黎波里(1801—1805年、1815年)、阿尔及尔(1815年)、希腊(1827年)、苏门答腊(1832年、1838—1839年)、利比里亚(1843年)、中国(1843年、1854年、1856年)、安哥拉(1860年)、日本(1863—1864年、1868年)和朝鲜(1871年)。但是,只有很小规模的突击队参加了这些战争,其目标也仅仅限于保护美国的商人和公民。主要出于支持这些军事行动、保护商业航运的需要,美国在地中海、太平洋和东印度群岛建立了巡航站。但是,这些所谓的分舰

队只由少数舰只组成，通常分别巡航。突击队和海外巡航站的建立都不意味着要形成永久性的美国存在。美国的兴趣是在于保护商业，而不是在遥远地区塑造均势。[25]

然而，在西半球，美国却采取了更为明确自信的立场，警告欧洲国家限制他们的介入。在1823年对国会的年度演说中，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总统忠告欧洲人不要干涉南美国家向共和政府的转变。虽然他知晓美国应该尊重现存的殖民地归属，但是门罗还是坚称，打压共和政体的努力将被视为"针对美国不友好姿态的证明"。门罗总统还关注于防止均势机制向美洲的传播，他向欧洲政府发出警告说，美国将认为"向本半球任何部分扩展其政治体制（的努力），对于美国的和平与安全而言都是危险的。"[26]他还重申了美国对欧洲的放手立场（hands-off stance）。他说："在欧洲各国因自身事务而发生战争时，我们从不参与，那样做也不符合我们的政策。"[27]

詹姆斯·波尔克（James Polk）总统大约在20年后发展了这些思想，为广为人知的门罗主义赋予了更伟大的形式和内容。波尔克的主要目的是要警告欧洲国家不要妨碍美国向西部拓展。英国和法国试图劝说德克萨斯不要加入合众国，加上波尔克担心西班牙会图谋把加利福尼亚割让给英国，致使它难以落入美国之手。波尔克断言："我们必须永远坚持，这个大陆的人民自己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假使他们中的任何部分，包括独立州，提出与我们的邦联（Confederacy）结合，这将是一个由他们和我们来决定的问题，不需任何外国介入其间。"波尔克总统还告诫欧洲把他们的角逐留给他们自己，他强调说，均势"决不允许应用于北美大陆，尤其是美国。"[28]这样，波尔克就接受了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混合指导。他支持自治原则，同时又强烈排挤欧洲的主要国家，最终寻求结束欧洲国家在北美的战略存在。

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的律动也在期间发挥着作用。美国要以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管理邻国,同时避开欧洲的阴谋诡计。

美国的西部扩展不仅激起了美国同欧洲的紧张关系,而且还激起了合众国南北各州之间的紧张关系。北方与南方之间的经济和文化分歧自建国以来进一步加剧了。杰弗逊不信任以强大的中央政府来捍卫各州的权利,在此基础上,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总统(1829—1837年)又加上了傲慢、棘手的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政治在以农业为主的南方和扩展中的西部具有深厚的基础,但却与北方精英倾向发生了正面冲突。南方支持1812年战争,支持美国西部边境的稳定扩展,支持同墨西哥的战争,墨西哥战争导源于1845年美国对德克萨斯的兼并,以及随后关于新州南部边境的争端。在此后三年中,美国还获得了今日新墨西哥州、犹他州、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科罗拉多州和俄勒冈州的全部或部分领土,将国家规模扩大了50%以上。

商业动机助长了这种扩张主义热情。种植园主在寻找新的农场土地;尤其是德克萨斯提供了生产棉花的主要农田。为了确保其产品能够找到买主,农场主和商人一并需要获得对西海岸港口的控制权,以便拓展对东亚市场的进入。安全考虑也起到了显著作用,因为美国一直在寻求与美国原住民和欧洲殖民国家达成中立条约。国内政治也增加了推动扩张的势能。南方人指望增加奴隶州的数量,保护美国的农业传统,反对工业化和城市化。这样,扩大国家疆域就可以为日益上升的人口提供城市就业的替代选择,新的出口市场则将吸收美国不断上涨的农业赢余。[29]

像在19世纪40年代以前一样,这种扩张主义冲动只是局限在北美地区,因为尽管美国疆域不断扩大,但是美国陆军和海

军的规模仍然非常有限。在内战爆发之前，正规军主要当作国内警察力量来使用，以对付印第安人的威胁。1861 年，正规军只有 1 万 6 千人，其中大部分人又服务于对付印第安人的前线哨卡。尽管存在大型商业舰队，但美国却没有显著有效的战列舰队。海军中大约有 7600 人服役，差不多相当于英国海军人力的十分之一。[30]

虽然扩张的成本相对较低，但是北方人对美国的西征、奴隶制的扩大、以及他们自认为的美国不断高涨的军国主义基本上没有热情。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发展他们的工业基础，而不是通过暴力手段获取新的农田。马萨诸塞英雄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因拒付联邦税而于 1846 年被捕，原因是，这可能结束在财政上支持同墨西哥人战斗的美国军队。他于是写下了自己的名著《论市民的不服从》。

北方和南方迥然不同的优先取舍来源于造成两个地区分野的社会、文化和经济方面的根本分歧。西部拓展最终将这些根本分歧推向极至，使北方与执意要保留奴隶制以及传统社会秩序的邦联陷入了激烈的斗争之中。相互竞争的地区利益和文化最终导致内战的发生，使超过 60 万的合众国和邦联士兵丧生。这说明了分歧和竞争的后果，说明了分歧和竞争助长强有力政治激情并反过来被其助长的程度。

虽然内战是美国国内政治的转折点，但它却没有对美国与欧洲的关系造成很大影响。英国和法国都向邦联倾斜，他们的纺织工业严重依赖于南方的棉花，因而深受北方海军封锁南方港口之苦。英国有些人支持南方独立，认为分裂的美国以及独立的、反对保护主义的邦联将进一步扩大英国的利益。最终，英国和法国都未冒险直接卷入战争，合众国的反复警告以及与其发生武装冲突的前景阻止了他们的冒险。因此，英国和法国的

行为只是强化了获胜的合众国政治家的信念,即美国必须抵制欧洲在北美的战略存在。[31]

历史证明,在美国外交政策的演变过程中,19 世纪 90 年代是比 19 世纪 60 年代更为重要的转折点。在一个多世纪中,美国把战略视野几乎排他性地持续聚焦在自己的半球,此后,美国开始在 19 世纪 90 年代作为一个具有全球野心的国家出现,它的影响范围远远延伸到了直接邻国以外。美国令人注目地扩大了海军规模。当 1889 年本杰明·哈里森(Benjamin Harrison)总统就职时,美国海军名列世界第十七位。当他 1893 年离任时,美国海军名列世界第七。海军还采纳了更具雄心的战略,建设了能够与世界主要舰队作战,而不是与意在保护商业和海岸线的小型巡洋舰作战的大型战列舰队。美国还同时加倍努力将英国和西班牙挤出自己的势力范围,通过强硬外交排挤前者,通过在古巴冲突中战胜西班牙舰队排挤后者,古巴冲突是美国有意挑起的。西班牙-美国战争的胜利刺激了美国对扩张的兴趣;美国于 1898 年着手在波多黎各、海地、关岛和菲律宾建立殖民统治。

于 1901 年上任的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总统延续了这种扩张热情,他实质性地扩展了门罗主义的范围,阐明并推行了被称作"罗斯福推论"(Roosevelt Corollary)的政策。罗斯福实际上保留了美国在需要阻止外来干涉时对西半球其他国家进行干预的权利。其触发事件是 1904 年多米尼加共和国的金融危机,危机致使欧洲人威胁要对其进行干涉以重获债务(他们已经于 1902—1903 年在委内瑞拉强制性地索得了资产)。罗斯福派遣美国政府代表接管了该国的海关服务,并确保了现有债务的偿还。罗斯福断言:"在西半球,不管美国多么不情愿,美国对门罗主义的坚持可能迫使美国在明显的有人作恶或受害者

无力的情况下，行使国际警察的权力。"在1905年对国会的年度演说中，总统还附加指出，扩大版的门罗主义"为确保我们避免与某些外国势力发生冲突提供了惟一可行方案。因此，这个立场符合和平的利益，也符合正义的利益"[32]。

或许美国新使命最显著的迹象，是罗斯福在1907年决定派遣大白舰队(the Great White Fleet)环游世界。航行长达一年多时间。舰队访问了无数国家的港口，包括巴西、智利、秘鲁、墨西哥、新西兰、澳大利亚、中国、日本、锡兰、埃及、阿尔及利亚、土耳其、希腊、意大利和法国。罗斯福明确向余下世界展示，美国已经登陆世界舞台。他还承担了建设巴拿马运河的任务，在哥伦比亚政府拒绝了购买土地的出价之后，他最终怂恿了巴拿马起义。罗斯福接下来用美国战列舰赶走了那些对叛乱和美国单边干涉感到愤怒的人。

这种新式的、更为冒险的、以激进主义为依靠的国际主义具有复杂的根源。美国经济在19世纪下半叶快速增长。在1860—1900年间美国人口增加了一倍以上。美国的铁路网从3万1千英里增加到25万英里，小麦产量上涨3倍，煤炭产量增加8倍，石油产品提高了2000%以上。日益增长的铸铁和钢材产量使美国成为世界主要工业经济之一。[33]受寻找新市场的驱使，受令人瞩目的资源基础的推动，美国到19世纪90年代末已经既有需要，也有手段在全球政治中承担更具扩张性的角色。

某些历史学家认为，经济灾难跟新发现的财富一样是致使美国产生帝国冲动的根源。美国在1893年和1895年间经受了急剧的经济滑坡。腓特烈·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曾经声称，西部前线的结束正在侵蚀美国的活力。[34]当时的经济不幸与其断言的流行完全一致。特纳的分析表示，随着美国大陆扩张的完成，美国将不得不面向海外，以便恢复经济的生存

能力。正如沃尔特·拉费伯(Walter LaFeber)所写的:“美国商业群体相信,海外商务的扩展将重振美国经济。”海地和菲律宾的殖民化可能已经加强了美国在太平洋的战略地位,但其商业动机却是最重要的。用拉费伯的话说,“美国得到那些地区不是为了实行殖民政策,而是为了把对它们的控制用作获得市场的手段,正在从高度机械化的工厂和农场中源源不断生产出来的大量商品需要市场。”[35]

毫无疑问,对新市场的寻找推动了于19世纪90年代开始形成的更为雄心勃勃的外交政策。但是,商业动机提供的并不是对战略调整的完整解释。美国从一开始就极力寻求外国市场,并用海军力量支持经济利益。但是现在,这个国家正在建造战列舰,不是建造轻型武器装备起来的用于保护商业舰队的巡洋舰。美国正在建立海外殖民地,而不仅仅是捍卫美国商人的权利。正如于19世纪90年代末担任过助理国务卿的约翰·巴塞特·穆尔(John Bassett Moore)所指出的,美国已经远离了“避免卷入通常称作世界势力的处境的那种相对自由的立场……原先我们只有商业利益的地方,我们现在还有了领土和政治利益。”[36]就像穆尔敏锐认识到的,美国正在实施新的大战略——在这个大战略中,美国所要寻求的并不仅仅是捍卫它的全球商业利益,而且还要插手塑造邻国以外地区的均势。

解释这个路线变迁,还需要两个传统因素:转变中的地区立场和政党政治对美国统治制度的影响。美国不同地区千差万别的经济利益在19世纪90年代再次走上前台。[37]然而这一次,南方和北方却自相矛盾地转换了角色。南方一开始是干涉主义和扩张主义的强烈支持者,这次却反对美国重新界定全球使命。北方长期以来持克制和不干涉的态度,这次却变成了美国新国际野心的主要支持者。

北方的连续工业化是其转变大战略立场的背后根源。由于美国的政治权力由种植园主转向了工业家和金融家,因此经济利益证明比地区意识形态更能让人改变态度。北方的制造商和银行家欢迎因决定建造主力战舰而来的新定单,欢迎伴随美国向太平洋扩展和开通巴拿马跨峡运河而来的新市场。此外,北方的主要政党即共和党借用外交政策与西部建立了政治联盟(19世纪初,北方的联邦党先是被叫做辉格党,后又被称为共和党,南方的共和党则被称作民主党)[38]。虽然西部地区大部分从事农业,但它却欢迎扩张主义的外交政策,因为那将打开拉丁美洲和太平洋的新市场。西部农场主还支持北方对保护性关税的呼吁,他们把这些关税看作是强迫打开外国市场的工具。

与此同时,南方民主党担心帝国扩张与关税相结合会导致欧洲的报复,欧洲是南方棉花和其他产品的主要出口市场。民粹主义者担心的是,过度的军国主义将以牺牲各州和公民权利为代价强化中央权威,这种担心也加强了南方对美国野心膨胀的反对。然而,北方和西部共和党联盟却胜过了孤立无援的南方民主党,这个获胜联盟是催生更为雄心勃勃的美国国际主义所必不可少的。

政党操纵强化了这个新的国内排阵(alignment)及其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作为19世纪90年代初期经济衰退的结果,民主党受欢迎的程度急剧下降。在1896年大选中,共和党掌管了立法和行政两个部分。之后,威廉·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总统利用反对派的软弱加强了他对外交政策的控制,提高了行政部门在同国会进行不间断的制衡博弈中的影响力。这个举措还提高了华盛顿的地位,削弱了各个州的作用,这种变化反映了内战以来一直不断深化的大趋势。两方面的发展使美国领导人可以更容易地实施和监控要求更高的外交政策——它要求更大的集

权和更多的资源。因此，美国的帝国冲动与帝国总统同时出现，并不是偶然的。

麦金利决定与西班牙开战也受到了政党政治的影响，因为民主党指责他缺乏指导国家作战的勇气，因此他想要以此回击民主党的责难。国会中高涨的战争狂热和媒体的军国主义立场进一步增加了国内压力，这些压力最终使总统采取行动，不仅把西班牙赶出了古巴，还在太平洋获得了一个重要战略据点。[39]

言辞和行动合在一起，向很多美国人灌输了一个新式国际主义，这个新式国际主义基于这样一种观念，即现在是美国拥有头等地位的时候了。美国已经建设了一流的经济，因此美国应该具有与之相匹配的国际发言权。马萨诸塞州的卓越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宣称，美国人应该意识到他们"作为世界伟大国家之一"的地位。[40]由美国外交家变为历史学家的乔治·凯南认为，当时很多有影响的美国人喜欢"帝国的气派，渴望使自己跻身于当时的殖民者行列，渴望看到我们的国旗飘扬在遥远的热带岛屿上，渴望去体验在国外冒险和建功立业的强烈刺激，渴望享受被公认为世界伟大帝国之一的荣耀"。[41]

这样，美国就在新式国际主义以及与之相称的大战略的武装下进入了20世纪。然而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它检验了美国的雄心，揭示了美国对责任感到欣喜的有限性，这些责任是伴随美国更广泛的影响力而来的。

##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际联盟的失败

美国对1914年战争在欧洲爆发的最初反应是重归合众国早期的律令，宣布严格坚持中立立场，表示愿与所有交战各方继

续贸易往来。美国公众强烈反对介入战争。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及其顾问也都一样决心避免直接卷入。但是,1917 年初,当德国潜艇开始攻击横跨大西洋的美国商船时,美国的态度很快改变了。在威尔逊的指令下,国会于 4 月 6 日对德宣战,美国因此参与了欧洲的冲突,而这类冲突恰恰是国父们曾经情绪激昂、异口同声地警告要美国避免参与的。

美国克服了不愿卷入旧世界事务的深刻障碍,这并不出人意料。在德国海军开始击沉美国船只之后,威尔逊除了放弃中立,进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外,几乎别无选择。政治上的强烈抗议实际上使任何其他行动路线都变得不可能了。此外,这场战争的危险在于,它会通过中断跨大西洋贸易而对美国经济造成严重破坏。

因此,美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最有意思也最能说明问题的方面,并不在于参与是如何开始的,而在于参与是如何结束的。当协约国方胜利在握时,威尔逊便开始倾总统全力协商凡尔赛条约的签订,设计将为持久和平奠定基础的战后秩序。在战后安排的准备工作刚开始时,威尔逊于 1918 年提出了他著名的“十四点计划”(Fourteen Points),这是一个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替代方案。公开谈判应该取代过去的秘密外交。贸易壁垒应该废除,所有贸易路线应对每个国家开放。大国应该裁军,达到与领土防御相一致的最低水平,大国应该以集体安全观念和联合反对侵略的意愿为指导。威尔逊还竭力主张,自治原则应该取代殖民主义和强国对弱国的征服。为了把这些想法付诸实践,威尔逊倡议建立国际联盟,即一个全球大会,不管哪里发生了侵略,它都将马上协调反对侵略的集体行动,并且该大会还将成为世界各国从事外交和协商活动的论坛。

威尔逊维护和平的方法可以追溯到他的孩提时代。作为一

个长老会牧师的儿子,威尔逊具有强烈的道义原则。内战爆发时,他只有4岁,他所亲眼目睹的破坏和苦难加强了他后来帮助世界消除武装冲突的坚定意志。他相信,要使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必须重铸国际体系的基础,因为原有基础具有不可修复的缺陷。由于威尔逊主张支持美国永久性地参与全球事务的管理,因此他的观念意味着美国要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关于参议院是否应该批准美国参加国际联盟的辩论,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参议院的审议使整个国家陷入了几个月时间的迷茫,而且因为它正好与1920年的总统大选同时进行,因此审议过程扩大为关于美国参与世界的范围和性质的全国性公民表决。辩论完全回到了国父们曾经仔细研讨过的那些主题——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美国不同地区相互竞争的利益和文化,政党政治对外交政策的扭曲影响。这样的辩论曾经考验了19世纪90年代就已经出现的更为雄心勃勃的国际主义。它同样也考验了美国对特别自由的国际主义的容忍程度,因为威尔逊要求美国人承诺支持法治化和制度化形式的多边参与。参议院最终拒绝美国参加国际联盟,这不仅对威尔逊的计划是一个致命打击,而且还揭示了美国新志向的脆弱性,清楚地表明了美国对于使自己的意志受制于约束性多边主义的深刻矛盾心态。

早在1919年7月威尔逊正式将条约送参议院审议之前,政治的战线就已经厘清。在1916年连任的竞选中,威尔逊总统竞选的平台就是,呼吁美国参加致力于维持持久和平的战后努力。威尔逊在印第安纳波利斯10月集会的演讲中说:"在当前的大战结束之时,与其他国家一起参加某种维持和平的联盟,将是美国的职责。"[42]共和党候选人查尔斯·伊文思·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一直与让美国参加新国际制度的提议保持距离，他的政党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不一，而且他想使自己有别于威尔逊总统。尽管威尔逊的取胜很微弱，但是其阵营内的很多人却把选举结果解释为，公众越来越支持美国更深参与世界事务的象征。正如威尔逊的一位支持者所评论的："我们再选的总统已经举起了一面新的旗帜，或者说，无论怎样，一面没有任何一位其他总统曾经想过要举或者敢举的旗帜。这面旗帜就是国际主义的旗帜。"[43]

在选举委托的庇护之下，威尔逊决定更详细地阐述他的思想。1917 年 1 月 22 日，他对参议院作了一次正式演讲，他说："在有关必须结束这场战争，实现和平的所有讨论中，一个理所当然的看法是，和平是某种明确的权力协调的必然结果，权力协调实际上使任何此类灾难不可能再度降临在我们头上。"威尔逊接着还大胆地指出，"如果美国人民不在这项伟大的事业中发挥作用，那将是不可思议的。"[44]在构想阐述完之后，威尔逊总统受到了来自民主党和共和党催人奋进的鼓掌致敬。

然而，随后几天，共和党却开始了着手反击。爱德华州参议员威廉·博拉(William Borah)告诫说，美国应该继续忠于华盛顿告别演说中的孤立主义原则。参议员洛奇支持更单边主义的国际主义，呼吁美国在忧虑国际社会集体福利之前保护自己的安全利益。[45]博拉和洛奇成为威尔逊最难对付的两个对手。

德国开始在 2 月初攻击美国舰只，这暂时休止了关于战后秩序的辩论，美国总统和国会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在准备战争上。美国参加冲突之后，威尔逊令人奇怪地对自己建立国际联盟的计划保持了沉默，在 1917 年的余下时间和 1918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没有就这个问题进行过一次公开演讲。不仅如此，威尔逊把起草国际联盟计划的事情严格局限在了自己封闭的内圈之

中，没有与执行和平联盟(the League to Enforce Peace)和其他国内组织进行接触，而这些组织成立的目的就是为寻求支持新的战后机构提供帮助。

1919年初，威尔逊完成欧洲之行，帮助筹划完国际联盟盟约(the League of Nations Covenant)之后，公众和国会的辩论重新开始。虽然这份文件仍以草稿的形式存在，尚未准备好交给参议院考虑，但是洛奇已经抢先一步获得了37个签名支持一项决议案，该决议案旨在说明，条约中的各种条款在当时情况下是不可接受的。这个举动向总统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他将不可能获得批准条约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威尔逊于是重新返回欧洲继续进行协商，并从他的欧洲同事那里得到了对一些新条款的默许，这些新条款把国内事务排除在联盟的权限范围之外，并认知美国会像门罗主义所阐明的那样对其邻国具有不可挑战的影响力。这两点变化具体解决的是参议院决议中提到的顾虑。

威尔逊于是在大肆吹捧之中重返美国。总统专乘的坐船乔治·华盛顿号于7月8日晨停进纽约港。威尔逊受到了一支搭乘着内阁和国会成员的海军舰队的致敬。威尔逊一上岸就乘车前往卡内基音乐厅(Carnegie Hall)，他的车队穿过大街小巷，到处都拥挤着兴高采烈的支持者。他在卡内基音乐厅发表了演讲，讲述了他在欧洲努力"把世界从不必要的杀戮中拯救出来"的故事。疲倦的总统当晚就乘坐火车赶往华盛顿，到了华盛顿的联合车站之后，尽管已经很晚了，他还是遇到了另外一场大约有1万名祝福者参加的热闹集会。[46]

两天以后，威尔逊从白宫到国会，正式向参议院提交了包含国际联盟盟约在内的条约。总统一提交，摆在前面你死我活的争斗就变得明朗了。民主党人报以振奋人心的欢呼喝彩，但共和党多数却几乎连轻微的掌声都没有。从一开始，获得批准条

约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的前景就十分忐忑。

威尔逊的问题并不是所谓的拒不妥协的人（irreconcilables）——那些不想与国际联盟发生任何关系，并无论以何种形式都将投反对票的铁杆孤立主义者。这样的个人的确存在——爱德华州参议员威廉·博拉就是其直言不讳的领袖，但是其数量并不足以葬送条约。真正的障碍是共和党的主流，以及共和党坚持要通过一系列"保留条款"来改变条约。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作为致力于变更国际联盟盟约的共和党领袖，总共提出了十四点保留意见。辩论的关键集中在盟约第十条款上，该条款规定盟约的缔约方有义务"在反对外来侵略时尊重和保护所有联盟成员国的领土完整和现有政治独立"。

对于威尔逊来说，第十条款是条约的心脏，在原则和实践上它都是有效的集体安全体系的基石，集体安全体系就是通过让成员国承担对侵略者采取联合行动的义务来维持和平的。威尔逊争论说，为了在参议院获得通过而淡化这个条款，就等于"不是提出以便批准条约，而是提出以便废除条约"[47]。共和党人恕不同意。防卫所有国家反对侵略的无法推诿的承诺只会将美国拖入不想参与的和不明智的战争中。另外，只有国会，而不是任何超国家机构，能够选择何时和向何处派遣美国军队投入战斗。美国不应该通过赋予国际机构代表美国决策的权力来削弱美国的自治。因此，洛奇在他的第二条保留条款中进行了仔细的约定，即美国"不承担任何义务"帮助其他国家进行防卫，除非国会具体决定这样做。

威尔逊拒绝作出任何让步，他坚持指出，"宁愿一千次战死沙场，也不愿为无耻的妥协而滴血。"[48]威尔逊转而决定把问题交给美国人民讨论，他开始乘坐火车向中心内陆和远西地区巡游，那里恰恰是反对国际联盟最强烈的地区。威尔逊短暂停留

式地向美国求助是史无前例的。总统通常在白天发表演说,晚上睡在前进的火车上。旅行几乎持续了9月份的整整一个月时间,其间总统在下列城市作了主要演讲:哥伦布、印第安纳波利斯、圣路易斯、堪萨斯城、德梅因、奥马哈、苏福尔斯、圣保罗和明尼阿波利斯、俾斯麦、毕林斯、斯普肯、西雅图、波特兰、旧金山、洛杉矶、圣迭戈、雷诺、盐湖城和丹佛。

威尔逊本想继续到威奇塔、俄克拉荷马城、小石城、孟菲斯和路易斯维尔旅行,但是在科罗拉多州佩波罗演讲之后他却因过于劳累而虚脱了。医生坚持取消了余下的各站旅行。总统的火车于是出发,两天后返回华盛顿。回到白宫后四天,威尔逊得了中风。他不得不在随后几个月时间里躺在床上,几乎无法集中力量继续为国际联盟战斗,也不能处理任何其他紧要事务。

威尔逊为国际联盟所作的个人牺牲证明是白白付出了。尽管他作了旅行,进行了数月之久充满敌意的辩论,吸引了国民的主要注意力,但批准条约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却依旧无法得到。共和党拒绝支持没有洛奇保留条款的条约。民主党人,在威尔逊的指令下,则拒绝支持有洛奇保留条款的条约。参议院终于在11月9日进行了投票表决。不论原来的条约还是经洛奇修正的条约,甚至连简单多数都没有达到。第二年3月,参议院对洛奇的修正条约进行了再次表决。49名参议员投票支持,35名参议员投票反对,虽然达到了简单多数,但却没有达到批准所需的票数。

威尔逊的最后选择是再一次恳求美国公众。在他的坚持下,1920年大选被描绘为关于美国国际主义的"庄严公决",因为国际联盟的命运乃是造成两党分裂的主要问题之一。民主党选择俄亥俄州州长詹姆斯·考克斯(James Cox)继续高举威尔逊的大旗,他在大选中被共和党挑战者沃伦·哈定(Warren Harding)

轻松击败了,从而打破了美国参加国际联盟的任何希望。哈定在就职演说中清除了所有有关美国国际主义路线的模糊认识,他说:“我们共和国有记录的进步本身,不论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都证明了我们不卷入旧世界事务的传统政策的远见卓识。”哈定总结说:“这不是超然冷漠,而是安全。”[49]

美国关于在战后世界中所充当角色的集体审议,与美国建国之后随即开始的辩论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尽管美国已经由虚弱的新生儿变成了大国,但是美国早期指导大战略制定的主题却显示了极大的弹性。

关于国际联盟的辩论复活了现实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的传统分野。在杰弗逊的传统中,威尔逊相信理性、法律和社会进步有能力造就一个正义与和平的世界。这种信念是威尔逊对国际联盟充满信心,对全球集体安全体系有能力避免战争充满信心的基础。第十条款对威尔逊而言是国际联盟盟约的支柱,这并不是因为它的法律寓意,而是因为它使道德义务成为必不可少。总统接受在法律基础上对第十条款作任意解释,美国政府,而不是国际联盟,才是美国武装力量何时和何地进入战斗的最终裁决者。但是,作为国际联盟盟约的签字国,美国应该承担采取行动反对侵略的道义责任,这个责任归根结底比任何法律上的技术性解释都要重要。沃伦·哈定在参议院就批准国际联盟盟约问题进行辩论时质问威尔逊为什么美国应该承担道义责任,威尔逊反击说:“为什么?参议员,你问这样的问题真是让人吃惊。”[50]

威尔逊的理想主义与汉密尔顿现实主义的遗产迎头相撞。当美国舰只遭到德国潜艇袭击时,美国卷入欧洲战争,这是一回事。然而,让美国作出持久承诺,参与不论何时和何地发生的冲

突，却是另外一回事。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费兰德尔·诺克斯(Philander Knox)担心，国际联盟会把美国拖入不想参与的冲突，它带来的将只是几个“流血的世纪”。拒不妥协的人和更温和的共和党人都经常在反对威尔逊构想，提出自己的看法时求证于美国国父。洛奇指责说，美国正在被要求“离开乔治·华盛顿，转向……险恶人物托洛茨基这个国际主义的卫士”。[51]根据一位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学者，国际联盟的反对者达成了一致立场，“如果华盛顿知道了，我们将要签署国际联盟，维持一支美国男孩部队，时刻准备在异乡为陌生人战斗——所有行动都在某个超级机构的命令之下进行，那么，华盛顿在他弗农山庄的墓穴中将不得安眠。”[52]

正如上面引述所明确说明的，共和党人在攻击国际联盟时还设置了民粹主义和单边主义的主题。一个骄傲自满的联邦政府正在侵犯各个州及其公民的权利，这是极其恶劣的。威尔逊现在更进一步，破坏美国真正的国家主权，使之屈服于一个超国家的机构。就像哈定上任不久所指出的，“在现存的国际联盟中，世界治理由它的超级权力进行，美国这个共和国将没有任何角色可当。”[53]

共和党人试图把国际联盟描绘成一种威胁，一种不仅对美国主权构成的危胁，而且对美国民族主义精神构成的威胁。参议员洛奇告诉他的同事说：“我们被要求……用国际主义替代民族主义，用国际国(international state)替代纯粹的美国主义(Americanism)。”[54]这条攻击路线甚至时常带有种族的和宗教的弦外之音。密苏里州参议员詹姆斯·里德(James Reed)抱怨说，国际联盟中白人的数量将被黑人超过，而伊利诺斯州参议员劳伦斯·谢尔曼(Lawrence Sherman)则担心天主教徒的优势地位，以及教皇因此对国际事务产生的影响力。威尔逊尝试着反击这种

责难，他说，国际联盟盟约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美国文件”和一个“人民的条约”。但是，他却一点也比不上像博拉这样的雄辩家，博拉在国会中把条约的失败称作“美国赢得了第二次独立”和“自阿波马托克斯（Appomattox）*以来最伟大的胜利”。[55]

虽然在有关国际联盟的辩论中，对立双方所持的立场，与国父们详述的主题非常接近，但是地区文化的对阵却不再遵循共和国早期的模式。南方是民粹主义及其自由意志传统的孳生地，而北方人则是道义和社会进步以及精英政府重要性的信徒。到了1920年，意识形态方面的排阵完全颠倒了过来。南方坚定地支持威尔逊，来自梅森-迪克逊线（Mason-Dixon line）以南的每一位参议员都投票支持批准条约。同时，北方和西部则是反对派的大本营，北方人严重脱离了他们先前对通过法律和理性改善国内和国际秩序的承诺。

这次意识形态和地区的重新排阵在一定程度上是政党政治的产物。南方是属于民主党的稳固阵地，因此出于党派忠诚支持威尔逊。与此同时，19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的北方和西部的共和党联盟则紧密团结，把运气全赌在了击败威尔逊及其自由国际主义之上。但是，经济利益也推动了这种新的地区排阵。南方依旧支持自由贸易，反对军事开支——这些目标将因美国参加国际联盟而得到促进。相比而言，工业化的北方和寻找新市场的西部则支持更高的军事支出、保护性关税和海外殖民地——这些目标与国际联盟的意图相左。此外，中心内陆和西部地区已经成了前线精神的新家，并继承了反对政府干涉的民粹主义。这样，很多拒不妥协的人得到这些地区的欢呼致敬也就不足为奇了。

---

* 内战中，南方向北方投降的所在地。——译者注

因此，意识形态和地区之间这种排阵决不是静态的。相反，自由国际主义，以及孤立主义和单边主义的强有力分支，全都变成了不断流变的政治话语的基本元素。在任何给定时间，哪种观点在哪个地区扎根都因经济利益、政党归属和文化的复杂混合体而定。

美国审议参加国际联盟所体现的政党声音，源自个人角逐的跟源自地区对阵的一样多。最重要的方面是威尔逊和洛奇之间发展起来的深刻敌意。他们之间的敌对主导了关于国际联盟的辩论。1915 年 2 月，在美国应如何处理欧洲战争问题上，洛奇与总统意见不一，之后洛奇向西奥多·罗斯福坦白说："我从来没想到在政治中会用我对威尔逊怀有的仇恨去恨某人。"[56]

有关国际联盟的辩论开始进行后，事情只是变得更糟了。威尔逊犯了一个错误，他任命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参议员，而且只是一个二流共和党人参加了和平委员会，在条约谈判期间，他带着他到欧洲进行协商。威廉·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一个在 1912 年大选期间被威尔逊击败的坚定共和党人，是执行和平联盟的领导，因而明显是参加代表团的候选人。但是，威尔逊却对他不予考虑。愤怒的洛奇施加报复，把很多共和党人，包括拒不妥协的人，塞进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政党敌意与日俱增，南卡来罗纳州格林维尔的《皮埃蒙特》（*Piedmont*）日报总结说："参议院对国际联盟想法的主要反对在于威尔逊是个民主党。"[57]

威尔逊固执的自食其力加剧了他同共和党人的裂隙。他之所以未能接触塔夫脱和其他潜在盟友，至少部分因为他想要保持对设计和实现国际联盟的控制权。为此，他浪费了争取一个重要的政治支持来源的机遇。与此相似，公共外交的缺乏也源自于威尔逊对反对派的不信任以及他想把关于国际联盟的辩论

局限在自己的心腹范围之内。正如《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杂志所评论的,总统"喜欢用单手在美国塑造有见识、有活力的民意来支持他"。虽然这个战略确保了威尔逊的主管地位,但却同时使他丧失了最终为拯救国际联盟所需的民众支持。到1918年末他开始求助于公众时,一切都已经太晚了。托马斯·诺克(Thomas Knock)是这样评论的,"任何预备性基础工作都没有系统去做——因为他从不允许。"[58]

在美国开始就参加国际联盟进行审议之前,威尔逊疏远的并不仅仅是国际主义的共和党人,还有相当数量的左翼支持者。虽然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帮助总统在1916年赢得了连任,但在战争期间,左派的投票人却脱离了威尔逊阵营。有些是固执的和平主义者,反对美国直接卷入战争。其他很多人则对威尔逊失去了信任,因为他给市民自由施加了很多战时制约——包括逮捕左翼活动家和出版审查。还有一些人则离开了进步联盟,因为他们发现国际联盟和和平条约与理想主义议程相互矛盾——前者因为太保守;后者因为太惩罚。

威尔逊左翼联盟的瓦解并未使他在参议院中丢掉很多选票,大多数民主党人依旧忠于总统。但是,在更广泛的公众辩论中,他却付出了很大代价。颇有影响的出版物,如《新共和》和《民族》(*The Nation*),双双在开始时支持国际联盟,但却恰恰在威尔逊寻求获得更多公众动力时撤回了他们的支持。1919年3月,《新共和》出面反对第十条款,声称该条款保证维持现有领土边界是不公正的和反动的。次月,J. A. 霍布森(J. A. Hobson)在《民族》上发表文章,把国际联盟称作五大国的"新神圣同盟";该杂志的另外一位作者则把在凡尔赛决定的安排描述为一种"阴谋、自私侵略和露骨帝国主义"的和平。[59]

如果参议院辩论不是如此深刻地充斥着政党政治,如果威

尔逊在接触左翼和右翼的潜在盟友方面做得更好,那么国际联盟是否会有截然不同的命运,这个问题当然是无法确定的。但是,很清楚,恶毒的政治氛围推动了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不妥协立场。洛奇想要得到的只是羞辱威尔逊,迫使他接受他的保留条款。而威尔逊宁愿看着国际联盟盟约燃成灰烬,也不愿向洛奇屈服。甚至当威尔逊最亲密的心腹向他施压,让他妥协时,总统还是原地一动不动。

在试图挽救国际联盟,避免失败的努力中,一些民主党人最终挑战了威尔逊的固执己见,转而支持洛奇的修正。但是,这些背叛者在数量上极少。政党政治与美国对国际主义的有限兴趣一道否决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参加国际联盟。国际联盟从此再也没能从挫折中恢复过来。

美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之际拒绝了威尔逊为其提供的自由主义国际主义,但是,他们并没有马上从全球舞台上后撤。华盛顿在裁军协定的谈判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帮助设计和管理了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然而,美国却绕开了联盟关系和对集体安全的承诺,美国只对止痛协议集结了热情,如 1928 年的凯洛格-白里安公约(Kellogg-Briand Pact),该公约谴责战争,要求签署国承诺和平解决争端。

全球萧条爆发和德日军国主义崛起之后,孤立主义势力获得了更大力量。1935 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决定支持美国参加国际法庭(the World Court),但是,当同意书送往参议院审批时,孤立主义和单边主义的本能却已占了上风。一个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国会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美国的卷入没有根据,并谴责军火工业和银行家迫使美国介入了冲突。于是,国会着手通过一系列中立法案,禁止同好战国家进行贸易,以便确保美国不再被拖入大国对抗。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后半段,当世

界再一次开始缓慢但却稳定地滑向战争时,美国已经找到了一个舒适的高位,从这里,它可以在梦幻般的寂静中观察一切。[60]

##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美国全球使命的开始

1945 年 6 月 26 日下午 4 点 30 分,亨利·杜鲁门总统向疲惫不堪的刚刚修完《联合国宪章》的代表团发表了结束演讲。杜鲁门告诉集结在旧金山战争纪念剧院内的人群:"通过这个宪章,你们已经将前一代伟大政治家伍德罗·威尔逊的理想变成了现实。如果我们几年以前就有了这个宪章——尤其是有了使用这个宪章的意志,那么现在死去的几百万人就可能活着。"7 月 28 日上午 10 点,参议院集会审议旧金山会议形成的文件。参议院以 89 票对 2 票同意美国加入联合国。

在 20 世纪 20 年代,参议院拒绝集体安全原则,抵制美国参加为管理国际秩序设计的全球机构。1945 年,参议院反其道而行之,几乎在没有任何反对意见的情况下批准了一个让美国承诺集体安全观念和多边参与管理全球事务的条约。美国政策上的这种惊人转折决不是偶然的。

美国的新路线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多年精心计划和老练政治操纵的结果。威尔逊在国际联盟上的失败给罗斯福和他的顾问提供了一个有关美国国际主义的顽固制约因素的重要教训。结果,甚至当第二次世界大战还在肆虐之时,行政当局就已经把为美国参加战后安全体系寻求国内支持的任务看作头等大事。此外,罗斯福认识到,如果他想要精心制作可持续存在的国际主义,确保美国不会再次退出全球参与,那么他就必须使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维持谨慎的平衡。1941 年,罗斯福写道:"现在重建国际联盟并不明智,因为规模的原因,国际联盟倾向于意见

不一和无所作为。”[61]因此，罗斯福放低了眼光，把目标定在建立一个有效的维护和平的体系，尽管这个体系可能不够雄心勃勃，而不是把目标定得很高，结果像威尔逊那样空手而归。

虽然美国直到珍珠港遭袭才正式参战，但是罗斯福早在1941年底之前就已经采取步骤帮助同盟国的事业了。1939年11月，罗斯福取消了对交战国的武器禁运，使得英国和法国能够在美国购买武器，只需他们用自己的船只将武器运过大西洋。第二年8月，罗斯福签发了一个行政命令，使英国购买旧的美国驱逐舰成为可能。作为回报，美国得到允许可以进入英国在西大西洋拥有的基地。1941年初，租借法案(Lend-Lease)获得通过，该法案旨在为身无分文的同盟国提供海军舰只和其他开战能力。几乎与此同时，美国和英国官员开始讨论联合作战计划，罗斯福命令美国海军通过追踪德国舰只并向英国报告其方位来帮助保护大西洋上的护航舰队。[62]

美国还在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开始筹划新的战后秩序了。不论美国人最终是否参战，华盛顿的很多人一致认为，大西洋民主国家已经在20世纪30年代酿下了代价高昂的大错。正如杜鲁门在旧金山结束演讲中所清楚说明的，美国政治家坚定地相信，如果世界上的民主国家从一开始就联合在一起，并采取果断措施阻止德国和日本的侵略，那么战争就很可能已经避免了。这次美国并没有跟随威尔逊的足迹，冒险重蹈30年代的覆辙，而是早早开始了战后计划和筹建充满活力的集体行动机制的工作。

1941年8月，罗斯福前往纽芬兰会见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在议程中占重要位置的并不仅仅是欧洲战争的实施问题，而且还有可取的战后秩序的塑造问题。当他们在准备此次会晤形成的《大西洋宪章》(*Atlantic Charter*)条

文时，丘吉尔交给罗斯福一个草稿，承诺两国“寻求一种和平，这种和平……通过有效的国际组织，为所有国家和所有人民提供生活在安全中的手段。”罗斯福马上删除了“有效的国际组织”的说法，他更喜欢呼吁解除侵略者的武装，只是含糊地提到“一个更广泛的和永久性的全面安全体系”[63]。在美国政治雷区中一直谨慎行事的罗斯福，想要避免会引起国内“疑虑”的言语。[64]

随后数月，讨论范围扩大到其他各方，导致美国、英国、苏联、中国，以及其他 22 个已经参战反对轴心国的国家，于 1942 年 1 月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宣言要求签署国承诺联合起来，直到确保他们的敌人失败，宣言还陈述了这些国家对“生活、自由和独立”的共同承诺。罗斯福和丘吉尔选择把协定称作《联合国家宣言》而不是一种联盟，是为了阻止国会内孤立主义者的反对。[65]

然而，他们的手法却适得其反。自由主义的《新共和》——其编辑反对国际联盟，因为国际联盟在建立以理想主义原则为基础的战后秩序方面走得还不够远——欢迎这个走向“充满活力的有利于所有人的国际联合”的举措。于是，罗斯福不得不矫正这种误解，坚持指出，宣言的目的仅限于巩固反对德国和日本的联盟。他明显规避了关于战后国际组织的任何讨论。[66]

作为对罗斯福谨慎措辞的回应，很多美国人以为，美国政府一心一意地在考虑战争的进行。这种理解诱使焦急的国际主义者要求罗斯福开始为美国参与管理战后秩序建立公众支持。但是，总统故意拖延了公共外交，对于美国官员事实上正在非常努力地进行的战后计划工作三缄其口。

1941 年 12 月底，罗斯福批准建立了战后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Advisory Committee on Postwar Foreign Policy），该委员会由政府官员和外部专家组成，从而使之能够利用对外关系委员会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以及其他有兴趣为制定外交政策做贡献的机构正在从事的研究。顾问委员会于 1942 年 2 月开始工作。国务卿科戴尔·赫尔(Cordell Hull)明确要求委员会负责与孤立主义的"恶劣影响"进行斗争,使"世界和平的准备工作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所做的(原文如此)做得更好"。[67]委员会的存在及其工作避开了公众耳目。形成并谨慎实施建立国内支持的战略,远比仓促地把行政当局计划公之于众,冒险激起最终葬送国际联盟的政治战要好得多。

在罗斯福的核心内圈中存在一个坚定的共识,即,维持战后世界的和平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组织,需要美国作为主要成员之一参与其中。然而,除此以外,各种意见却分歧极大。主要的分歧在于,成员国应对集体行动承担何种性质的义务,打击侵略的决定应如何作出,以及谁的军队应该从事战斗任务。在分歧光谱的一端是顽固死硬的威尔逊分子,他们设想的是对集体安全的约束性承诺和时刻准备的多国部队。副总统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是这种版本联合国的坦率支持者,他称之为"使世界对民主国家变得安全的第二次机遇"[68]。华莱士争论说,如果经济制裁在阻止侵略国方面失败了,那么联合国控制下的多国航空分遣队就"必须马上毫不留情地轰炸侵略国"[69]。

在分歧光谱的另外一端是包括罗斯福在内的一些人,他们对华莱士方案是否有效或政治上是否可行深表怀疑。虽然罗斯福曾经为美国进入国际联盟竭力抗争,但是他发现洛奇的保留条款非常敏感,1919 年他承认,"我已经阅读了三遍国际联盟草案,总是发现其中存在某些要反对的东西。"[70]因此,罗斯福倾向于更淡化的集体安全观念,使之主要依赖于领导国家之间的合作——并因而更易于适合权力政治的要求和美国强有力的国内

制约。虽然理想主义和多边主义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已有一席之地，但是它们必须由强大的现实主义和对国家自治的尊重来调和。

罗斯福在集体安全的理想形式与实力政治不加修饰的实践之间寻找妥协方案，这使他形成了“四国警察”(four policemen)的想法。罗斯福推论说，不管为维持和平最终建成的机构的性质如何，最强大的国家将依旧左右局势，发挥比其余国家更大的影响。应该成为设计战后秩序指导原则的，不是抵制这种无法改变的现实，而是让世界主要国家——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对国际体系进行合作管理。罗斯福的现实主义学识使他得出结论，大国不仅必须负责，而且他们的不同利益会限制合作的范围，尤其在军事领域。每个国家都比关心远处的变化更关心自己的势力范围，对一个国家的严重威胁对于另外一个国家而言可能只是一件无关紧要的分心事。

因此，罗斯福对于华莱士成立联合国联合军之类的计划丝毫没有兴趣。他在同外国领导人讨论新的战后机构的性质时直截了当地指出了这一点。1943 年 11 月，罗斯福告诉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苏联和英国应该为西半球以外的和平军事行动提供地面部队，美国的参与可能仅限于提供空中和海上支持。罗斯福开始再次寻求中间路线——一个足够雄心勃勃维持和平的安全体系，但这个安全体系又不过分要求付出，以至于侵犯美国国家利益的界线或破坏美国对自由国际主义的有限兴趣。1943 年 3 月，《星期六晚报》(*Saturday Evening Post*)的一位记者在采访完总统之后，这样描述罗斯福的战后秩序计划：“他在追寻能够实现的最小值，而非无法得到的最大值。”[71]

罗斯福的构想引起了很多反对意见。副国务卿和总统心腹萨姆内·韦尔斯(Sumner Welles)害怕，“四国警察”概念会疏远世

界上的较小国家并引起他们的反对。科戴尔·赫尔担心，到头来四国中的每一个都对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不是集体管理整个世界发挥影响。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也有这种顾虑，声称他“不太喜欢让中国主导太平洋这样的想法”[72]。

韦尔斯于1943年3月起草了一份妥协备忘录，概述了一个试图公正对待罗斯福观念而不违背集体安全精神的组织。他的描述要点呼吁，建立一个限于四个大国的执行机构，一个由这四个国家加上经过筛选代表其他地区的七个国家组成的十一成员国委员会，以及一个对所有国家开放的全体大会。1945年最终变为现实的联合国与韦尔斯的早期草案具有极大的相似之处。[73]罗斯福已经找到了他的中间路线。

罗斯福的谨慎和务实不仅表现在设计新的战后秩序上，而且还表现在管理确保美国参加的国内政治上。鉴于威尔逊把持了对国际联盟辩论的严厉控制，未能争取到确保条约批准所需的支持者，罗斯福采取了一种截然不同的路线——他从很早开始就为建设支持联合国的两党共识拟订了政治战略。像威尔逊一样，罗斯福在自己的观念成型时不愿参与公众辩论。但不同的是，威尔逊的行为出自固执己见和对创始地位的顾虑，而罗斯福是在实施他的战略，只用模糊和一般术语解释联合国的设计与功能，并明确避免争论性的话题，如美国是否将对联合军事行动作出约束性承诺。

行政当局在对付国会时尤其谨慎。直到1943年，罗斯福一直避免有关战后计划的问题成为国会议程。当时，众议院和参议院辩论的决议案已经经过了一丝不苟的检查，并清除了所有可能激起党派争斗的语言。于9月以360票对29票通过的众议院版本决议案，要求“创建适当的国际机构，具有足以在世界

各国之间建立并维持联合和持久和平的权力，美国应通过宪法程序顺利参与其中。”在保证美国“宪法程序”重要性方面，决议案的倡议者们深思熟虑地预先排除了来自孤立主义者和其他担忧美国主权和自治人士的反对。

接着参议院接过了这个问题，《纽约时报》指出，这是“参议院自将近24年前拒绝凡尔赛条约和国际联盟盟约以来，进行的最重要的关于国际事务的辩论”。决议案全然没有提及国际军事力量以及更总体的美国对联合军事行动的承诺问题。决议案以85票对5票获得通过。参议员亚瑟·范登堡(Arthur Vandenberg)，原本一个潜在的怀疑论者，最终却在确保共和党支持联合国问题上发挥了领导作用。他作了一个应该属于罗斯福的声明，他说：“我在两个极端主义者之间寻找中间路线，在线的一端是乐于出让美国的极端主义者，另外一端是尝试已经变得不可能的彻底孤立的极端主义者。”[74]

从1943年底到大战结束，行政当局一直实施双轨政策，一方面为联合国制定详细计划，另一方面为支持美国参加联合国致力于加强两党共识。罗斯福继续在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两种冲动之间的细线上行走，并为联合国准备政治基础，从而寻求避免威尔逊的意识形态和战术错误。罗斯福不是设计一个理想的制度，然后开始贩卖给美国人民，他深知对美国参与国外事务之兴趣的固有制约，因此相应地设计了自己的目标和政治战略。罗斯福不是坚持让美国作出对集体安全的约束性承诺，而是喜欢模糊性和不确定性(contingent)承诺——恰恰因为他了解，这样的承诺能够与美国的单边主义冲动以及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的国际主义达成共鸣。1944年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罗斯福总统对潜在的怀疑论者安抚说，联合国将要创建的机制是为了“与其他国家一道讨论问题，不会以任何形式、样式、或方式拿走美国

的独立”[75]。

罗斯福成功诱使美国摆脱孤立主义姿态并不仅仅在于他个人传奇式的政治技巧。持续进行中的工业化因导致地区利益的重新排阵而帮助了他的事业，这种重新排阵证明对更加雄心勃勃的国际主义是有利的。1920 年，北方和西部反对南方的联盟使国际联盟走向了失败。1945 年，北方和南方反对西部的联盟则确保了完全相反的结果——美国参加联合国获得批准。

这次重要的重新排阵是以下述方式完成的。南方支持罗斯福，因为南方依旧是民主党的大本营，继续是开放国际经济的热心支持者。在 20 世纪 20 年代，南方每年出口棉花产量的 60% 以上。到了 40 年代初期，这个数字因为 30 年代的全球保护主义和战争本身引起的中断而跌至不足 20%。[76]因此，恢复南方地区的经济活力不仅依赖于赢得战争，而且还依赖于重建一个联合国许诺过的那种类型的开放、稳定的国际秩序。

南方也已经准备好了接受加强军事建设以及与此相伴随的更为强大的联邦制的观念。新的基地和国防工业已经在南方各州开始建设，这给他们带来了更大份额的国防军费。如果说 19 世纪 90 年代末和 20 世纪最初十年的军国主义是帝国野心的一种产物，这种帝国野心是南方反对的，那么 20 世纪 40 年代的军国主义和政府扩大就是为实现一种更合法的目的——打败德国和日本——所必需的。尽管南方并不乐于接受广泛开放的(open-ended)国际主义，但是南方确实已经为抗击威胁世界和平和全球经济的法西斯主义政权做好了准备。此外，罗斯福有意识地使公民权利避免成为全国议程中的问题，以此确保获得来自南方的持续政治支持。

地区排阵中最重要的变化发生在东北地区，那里已经成为世界主要贸易和金融中心之一。由于东北地区的商业现在已经

具有全球竞争力，因此它不再坚持保护主义，而是想要全面进入全球市场，需要有利于资本自由流动的国际稳定。如火如荼的城市化也已经改变了北方选区的政治局面，外国移民和南方劳工的流入使民主党在北方拥有了比以前更强大的根据地。趋同的经济利益和民主党势力的加强使罗斯福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在北方和南方之间建立联盟的机遇。不管北方和南方之间可以追溯到殖民时代的政治和文化如何对抗，也不管已经在两个地区存在的孤立主义分支如何强大，它们最终走到了一起，共同支持新式的美国国际主义。

西部和部分中心内陆地区是主要抵制力量的来源。西部农场主继续集中关注国内市场，相比南方的同业人士，他们不大依赖出口。有限的城市化也意味着要保护更传统的农业价值观，包括孤立主义和单边主义的自由意志分支。北达科他州参议员杰拉德·奈（Gerald Nye）回顾了杰弗逊和杰克逊对中央专制的顾虑。奈坚持认为，美国的真正危险不是来自德国和日本，而是来自“政府本身内部力量对我们宪法地位的侵犯，对我们政府正规程序的破坏”[77]。伊利诺斯州众议员史蒂芬·戴伊（Stephen Day）更为担忧对美国主权的潜在侵害，他指责那些支持美国参加联合国的人是在寻求“实现放弃我们美国独立，使美国重归英帝国统治的目的”[78]。然而，这种尖锐呼声赢来的追随者比在国际联盟辩论期间赢来的还要少。如果没有北方作为政治盟友，那么西部就没有足够的人口和政治影响来逆转自由国际主义的崛起浪潮。

罗斯福计划中确保美国全面参与战后秩序的塑造和经营工作的最后一个因素，是他对政党政治的精明管理。威尔逊从一开始就冷落共和党人和参议院，而罗斯福的做法却完全相反。他通过接触将他们吸纳进来。1940年，罗斯福在自己的内阁中

任命了两位国际主义共和党人——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任陆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Frank Knox)任海军部长。1942 年,罗斯福政府邀请两位参议员参加关于战后计划的秘密顾问团。其中一位,佛蒙特州参议员沃伦·奥斯汀(Warren Austin),就是共和党人。

罗斯福还将文德尔·威尔基(Wendell Willkie)争取过来,帮助在共和党内部建立了国际主义中心。威尔基是罗斯福在1940 年大选中击败的共和党候选人。特别是在珍珠港事件后,威尔基将自己的公共生活全都投入到了国际主义事业,他说服共和党全国委员会(Republican National Committee)于 1942 年采纳了一项决议案,该决议案提出,战后"美国的责任将不受限于美国的疆界"。《纽约时报》随后赞誉他"为共和党摘掉了孤立主义的牌子"。[79]当共和党人,包括某些突出的孤立主义者,在 1942 年中期选举中表现不俗时,罗斯福再一次转向威尔基,请他作一次环球旅行以吸引公众对外交事务的注意。回来后,威尔基发表了《一个世界》一书,部分是旅行记录,部分是对美国国际主义的鼓动,这本书很快便成了颇有影响的畅销书。

罗斯福用相似的手法确保政党政治不会干扰美国参加联合国提案的批准程序。当联合国计划开始最后敲定时,在国务卿赫尔的要求下,参议院于 1944 年 4 月成立了八人委员会(Committee of Eight),专门同行政当局就此事进行协商。八人委员会由四名民主党人、三名共和党人和一名进步党人(Progressive)组成。8 月,当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外交家在乔治城优雅的敦巴顿橡胶园(Dumbarton Oaks)开会以确定细节问题时,赫尔经常与八人委员会展开协商。第二年,当要挑选一个派往旧金山的代表团时,罗斯福坚持,代表团中要包括同样多的国会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在一份由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往伦敦的电报

中，比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照会说，美国代表团“实际上几乎是经过仔细权衡后选出的，尽管可能不像八名划艇人组合得那样完美”[80]。

这种对建立两党支持的审慎关注，不会让死心塌地的孤立主义者和单边主义者消除戒备，他们依旧担心美国将要把自己的意志交给一个“不信上帝、没有灵魂的国际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81]但是，它的确成功地将有关美国在世界中的角色的辩论与最糟糕的政党政治隔绝了开来。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作为一位很快将要成为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总统国务卿的国际主义共和党人，悲叹1944年本党候选人输给了罗斯福。但是，他告诉他的兄弟艾伦（Allen Dulles）说，令他欣慰的是，“我们成功地让世界组织远离了政治。我想这至少确立了一个重要的先例。”[82]

美国公众中已经兴起了很多支持自由国际主义的私人组织，它们使罗斯福的任务变得更容易完成了。与规避执行和平联盟的威尔逊相比，罗斯福充分利用了这些政治支持的现成资源。这些早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就已经活跃起来的协会，不仅数量大增，而且活动项目的范围也扩大了，它们对战争和战争提供的指导美国进入某种类型的集体安全体系的第二次机会作出了回应。对外关系委员会、外交政策研究协会（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保卫美国委员会（Committee, of Defend America）、联合国研究协会（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等，只举几个例子，它们都为改变公众态度而同行政当局紧密合作。1941年3月，国际主义运动的一位领袖说：“现在必须动员公众意见，以便

* 一种由各部分肢体组合而成的人工怪物，怪物的制造者最终将被怪物杀死。——译者注

使美国能够在维持持久和平的组织中发挥有效作用,能够把这一工作做到底。”[83]

这些团体的工作补充了官员的努力。在敦巴顿橡胶园会议后的6个月中,国务院官员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三百多次宣讲。国务院还利用阿尔弗雷德·希契科克(Alfred Hitchcock)执导了一部关于战后外交政策和联合国作用的电影。这部电影取名“明天的瞭望塔”(*Watchtower over Tomorrow*),由希契科克和剧作家本·赫克特(Ben Hecht)编写,爱德华·斯退丁纽斯(Edward Stettinius)解说,斯退丁纽斯后来于1944年12月接替赫尔成为国务卿。用斯退丁纽斯的话来说,这部电影“通过投射未来,讲述一个国际组织大约在1960年采取行动阻止一个匿名潜在侵略者的故事,以戏剧性的形式涉及到了提议中的国际组织”。[84]

私有团体和公共官员之间的这种伙伴关系对美国民意产生了显著影响。1941年5月,只有37%的公众支持战争结束后参加维持和平的国际制度。这个数字在随后四年中稳步提升,分别达到1942年的55%,1944年的72%和1945年3月的81%。[85]

到1945年7月参议院对联合国条约进行投票表决时,不管罗斯福4月的去世多么不合时宜,他已经成功地为批准条约奠定了基础。他建构了一个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成分平分秋色的联合国,致力于他认为可以持续存在下去的中间路线国际主义。他在北方和南方之间建设了一个政治联盟,边缘化了仍然在西部地区左右局面的孤立主义和单边主义倾向。他为建立对联合国的两党支持而不知疲倦地工作,回避了从早期以来一直折磨美国外交政策的政治恩怨。他还帮助协调了公众教育运动,说服美国人民,他们接受国际领袖职责的时间已经到了。在美国建国150多年和美国成为大国50多年后,罗斯福建起了一种国

际主义,这种强健的国际主义足以支持美国稳定地和多边地参与全球事务的塑造与管理。

罗斯福精心设计了将在随后半个世纪很好服务于美国的两党共识。他锻造的国际主义不仅为美国进行反法西斯斗争和进入联合国,而且还为美国经历漫长而艰难的冷战岁月准备了政治基础。此外,罗斯福成功地让美国人接受了不仅全球参与的好处,还有自由和多边品牌的优点。美国在热情高昂地加入了联合国之后,开始着手组建一套帮助管理国际体系的政治和经济机构。美国已经克服了孤立主义根基,以及对制度卷入的反感。然而,如果得出结论认为罗斯福实际上已经带来了路线的永久改变,使美国得以把孤立主义和单边主义永远抛在了身后,那还为时尚早。因为,主要外部威胁在确保美国过去60年坚持自由国际主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记住这一点非常重要。

在30年代,美国是一个战略旁观者,当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政权重新武装起来并从事一而再再而三的侵略行为时,美国只能一旁呆望。甚至战争在欧洲的爆发都不足以确保美国的直接卷入,美国直到日本奇袭珍珠港之后才参加了战争。于是,战争成为罗斯福努力打造新国际主义的理想背景,战争提供了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即美国不得不为击败轴心国和准备维持和平的战后机制而采取紧急行动。要不是因为德国和日本控制大部分工业化世界的前景对美国福祉构成了威胁,那么美国很可能依旧留在它那舒适的壳中。

不管美国对战争成就的贡献多大,对参加联合国的热情多高,要不是因为来自苏联的新威胁快速出现,那么战争过程中高涨起来的国际主义热情能够维持多久就一点也不清楚了。确凿无误的开始退却的迹象在战争结束后很快就出现了。在敌对结

束后的两年中，美国国防开支从 810 亿美元下降到 130 亿美元，军队水平从 1210 万下降到 160 万。杜鲁门总统想要援助那些为重建经济而苦苦挣扎的同盟国，但是在他试图争取批准其对外援助计划时，却遭到了国会的反对。当苏联崛起为美国新对手的情形变得明朗之后，行政当局不得不求助于匮乏的手法动员美国公众支持遏制共产主义的使命。

1947 年 3 月，在对杜鲁门主义的阐发中，总统为了唤醒公众，故意夸大了苏联构成的威胁。杜鲁门对顾问们说，要赢得对抵抗苏联所需的更加雄心勃勃的外交政策的支持，将需要进行“一位总统曾经面临的最伟大的销售工作”。冷战历史学家约翰·加迪斯(John Gaddis)把杜鲁门主义称作是“一种惊吓治疗法(shock therapy)：它是行政当局为刺激国会和美国公众接受……世界领袖职责而进行的无它计可施的最后努力”。[86]

杜鲁门的努力有效地起到了惊吓作用，得到了公众对经济援助、重新武装、结成遏制苏联所需的联盟网络的支持。事实上，他的销售技巧太过有效了，结果助长了狂热的反共产主义热情，帮助为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提供了活动平台，使之得以致力于在国内清洗那些从事“反美非美”(un-American)活动的人。但是，在这些过分行为之间，杜鲁门政府对公众的广泛接触——加上苏联日益发展的不妥协、1949 年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以及同年莫斯科原子武器的试验——帮助他建立了一个稳固的、持久的、支持美国全球参与的国内共识。

越南战争粉碎了这种共识，它鼓舞美国公众质疑全球参与的好处，削弱了已经随冷战开始而巩固起来的国际主义。1964 年，只有 18％的公众赞同这样的陈述：“美国应该在国际上只操心自己的事情，让其他国家尽可能自力更生地发展和相处。”到

了1974年，41%的受访者同意这个陈述。[87]正是在这种极不稳定的政治环境中，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总统决定与苏联实现和解，与中国建立联系。尼克松还提出了自己的主义，尼克松主义的意图是减少因美国海外承诺而带来的负担，如果爆发了地区冲突，美国寄希望于地区盟国能够更大程度地依赖他们自己的人力。[88]然而，即使当国内反对越南战争的冲击为这种更灵活的外交创造了空间时，它也没有侵蚀美国的国际主义基础。不断发展中的东西分裂、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及遏制共产主义扩散的持续需求，使美国一直维持着警惕和参与。

既然冷战已经结束了，苏联不在了，共产主义只在少数几个国家施行，那么美国就必须设计一种适合新世界的新国际主义。在2001年9月11日事件的余波中，很多观察家很快宣称，针对纽约和华盛顿的袭击将成为21世纪的珍珠港事件，反恐战争将为美国国际主义提供一个新的基础。但是，逻辑推论却告诉了我们不同的情形。

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将是长期的、艰苦的，很多反恐措施发生在公众视野之外。虽然在阿富汗打击塔利班政权和基地组织时，反恐战争中的军事方面——最可见的因素——进展顺利，但是，直接使用超强武力却并不总是可行的。成功将因此而很难度量，其危险性在于，爱国主义会逐渐退回到漠不关心。此外，当美国的确采取行动时，美国很可能只觉得自己一个人有这种非这样做不可的内驱力，抛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如此艰苦努力才设置起来的国际制度。在国内，美国现在更警觉地巡逻自己的边境、海岸和公共空间，提高了对外来威胁的警戒。倘若针对美国目标的袭击继续在海外和美国国内发生，那么支持退缩的声音就很可能变得越来越强。正如国父们有力并反复质问的那样，为什么美国应该使自己卷入遥远的国度及其麻烦，如

果这样做最终会对美国海岸有害的话?

因此,美国的当前困境为忧虑提供了充足理由。通常,美国不对外交往。只有当美国安全面临严重威胁时,它才违背国父们的警告,直接介入以塑造其近邻以外地区的均势。只有两次例外:一次是19世纪90年代末,美国非常短暂地钟情于正式帝国主义;一次是20世纪90年代,冷战遗留下来的国际主义动力和美国优势地位维持了美国事实上缺省状态的全球参与。随着美国进入新世纪,它遇到了来自国际恐怖主义的严重威胁。但是,这种威胁既捉摸不定,又零星分散,它意味着从长期角度来看,可能对自由国际主义的侵蚀多于对自由国际主义的重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过去为未来提供了令人警醒的大背景。

## 注 释

1. I.M. Destler and Steven Kull, *Misreading the Public: The Myth of a New Isolationism*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9); Max Boot, "The Case for American Empire", *The Weekly Standard*, vol. 7, no. 5 (October 15, 2001), pp. 27—30; and Paul Johnson, "The Answer to Terrorism? Colonialism", *Wall Street Journal*, October 9, 2001.

2. 参见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6)。

3. Felix Gilbert, *To the Farewell Address: Ideas of Earl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1), pp. 42-43.

4. *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 ed. Julian P. Boyd, vol. 8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3), p. 28; Jefferson to James Madison, August 28, 1789, ibid., vol. 15, p. 367.

5. Hamilton, *Federalist* 6, in James Madison, Alexander Hamilton, and John Jay, *The Federalist Papers* (London: Penguin Books, 1987), p. 106; Jay, *Federalist* 4, ibid., p. 97.

6. 原文引自 Gilbert, *To the Farewell Address*, p. 145。汉密尔顿的思想在第 130—131 页进行了讨论。

7. Hamilton, *Federalist* 7, in Madison et al., *The Federalist Papers*, p. 113.

8 "Autobiography", 1775, in *The Works of John Adams*, *Second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ed. Charles F. Adams, vol. 2 (Boston: Little Brown, 1850—1856), p. 505.

9. 引自 Gilbert, *To the Farewell Address*, 第 145 页。

10. Hamilton, *Federalist* 11, in Madison et al., *The Federalist Papers*, p. 133.

11. Jefferson, Inaugural Address of 1801, 引自 Jeffrey M. Legro, "Whence American Internat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4, no. 2 (Spring 2000), p. 259。

12. 引自 Gilbert, *To the Farewell Address*, 第 43 页。

13. 原文可见上书,第 145 页。

14. 关于美国各个地区的不同文化,参见 Michael Lind, "Civil War by Other Means." *Foreign Affairs*, vol. 78, no. 5 (September-October 1999), 第 123—142 页。

15. 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是一位主要共和党人和弗吉尼亚州种植园主,他实际上倾向于支持商业歧视,特别是针对英国的商业歧视。与支持保护以促进工业增长的联邦党人相比,麦迪逊号召把关税用作暂时性工具以便打开外国市场并扩大美国农产品的出口。参见 Drew R. McCoy, *The Elusive Republic*: *Political Economy in Jeffersonian America*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0), 第 137—145 页。

16. 参见 David Hackett Fischer, *Albion's Seed*: *Four British Folkways in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尤其是第五章。

17. Alexander DeConde, *Entangling Alliance*: *Politics and Diplomacy Under George Washingt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58), p. 57.

18. 对汉密尔顿关于商业政策和需要复兴制造业等思想的概括,参见 McCoy, *The Elusive Republic*, 第 146—152 页。

19. DeConde, *Entangling Alliance*, p. 59.

20. 在当时,总统职位属于得票最多的候选人,副总统职位属于得票

次多的候选人。

21. Caius(笔名),引自 McCoy, *The Elusive Republic*, 第 164 页。

22. Jefferson and Hamilton, 引自 Michael H. Hunt, *Ideology and U. S. Foreign Poli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25—26。

23. Hamilton to Colonel Edward Harrington, in *The Works of Alexander Hamilton*, ed. Henry Cabot Lodge, vol. 8, (New York: Putnam, 1885—1886), pp. 259—260.

24. 尽管美国在 1778 年与法国建立了联盟关系,但华盛顿还是在 1793 年欧洲爆发战争时宣布,美国将保持中立。这个决定并没有得到普遍支持,詹姆斯·麦迪逊就认为,美国不应疏忽它"对法国的义务"。从技术上讲,这个联盟关系一直有效,直到 1800 年它被一个商业协定所取代。参见 Walter LaFeber, *The American Age: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t Home and Abroad Since* 1750 (New York: Norton, 1989), 第 23—26、44、50 页。

25. 关于美国在西半球以外使用武力的情况,参见 Harry Allanson Ellsworth, *One Hundred Eighty Landings of the United States Marines*, 1800—1934 (Washington D. C.: History and Museums Division Headquarters, U. S. Marine Corps, 1974); and Ellen C. Collier, "Instances of Use of United States Forces Abroad, 1798—1993" (Washington D. 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Library of Congress, 1993). 关于海外分舰队(squadron)的建立和军事行动,参见 Harold Sprout and Margaret Sprout, *The Rise of American Naval Power*, 1776—1918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0)。

26. 引自 Dexter Perkins, *Hand Off: A History of the Monroe Doctrine* (Boston: Little, Brown, 1941), 第 28 页。

27. 引自 LaFeber, *The American Age*, 第 84 页。

28. 引自 Perkins, *Hand Off*, 第 79 页。

29. 参见 Thomas R. Hietala, *Manifest Design: Anxious Aggrandizement in Late Jacksonian Americ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 1985); and McCoy, *The Elusive Republic*。

30. C. Vann Woodward, "The Age of Reinterpretatio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66, no. 1 (October 1960), pp. 4, 2.

31. 关于内战期间英国和法国立场的概括,参见 LaFeber, *The American Age*, 第 140—145 页。

32. 引自 Perkins, *Hand Off*, 第 240、229 页。

33. LaFeber, *The American Age*, pp. 149—151.

34. 杰克逊(Jackson)于 1893 年宣读并发表了"前线在美国历史中的重要性"一文。参见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The Early Writings of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compiled by Everett E. Edward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38); and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Holt, Rhinehart & Winston, 1962)。

35. Walter LaFeber, *The New Empire: An 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Expansion, 1860—1898*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3), pp. 282, 408.

36. 引自 LaFeber, *The American Age*, 第 182 页。

37. 关于 19 世纪末至今地区利益塑造美国外交政策之作用的全面研究,参见 Peter Trubowitz, *Defin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Conflict and Change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38. 关于两个主要政党名称的这次变化,以及对辉格党和民主党主要分歧的概括,参见 Hietala, *Manifest Design*, 第 3—9 页。

39. 关于这些制度变迁及其对政策的影响,参见 Fareed Zakaria, *From Wealth to Power: 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Ernest R. May, *Imperial Democracy: The Emergence of America as a Great Power*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61); and LaFeber, *The American Age*, 第 185—204 页。

40. 引自 Hunt, *Ideology and U. S. Foreign Policy*, 第 37 页。

41. George Frost Kennan, *American Diploma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p. 17.

42. 引自 Thomas J. Knock, *To End All Wars: Woodrow Wilson and the Quest for a New World Ord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96.

43. Amos Pinchot, 引自同上书,第 104 页。

44. 引自同上书,第 112 页。

45. 同上书,第 124 页。

46. Thomas A. Bailey, *Woodrow Wilson and the Great Betrayal* (New York: Macmillan, 1947), pp. 1—2.

47. 引自同上书,第 185 页。

48. 引自同上书,第 184 页。

49. 引自 Legro, “Whence American Internationalism”, 第 260 页。

50. 引自 Bailey, *Woodrow Wilson and the Great Betrayal*, 第 86 页。

51. 引自 Knock, *To End All Wars*, 第 241 页。

52. Bailey, *Woodrow Wilson and the Great Betrayal*, p. 32.

53. Robert A. Divine, *Second Chance: The Triumph of Internationalism in America During Word War II* (New York: Atheneum, 1967), p. 10.

54. John A. Garraty, *Henry Cabot Lodge: A Biography* (New York: Knopf, 1968), p. 352.

55. 参见 Bailey, *Woodrow Wilson and the Great Betrayal*, 第 61、115、193 页。

56. 引自 Garraty, *Henry Cabot Lodge*, 第 312 页。

57. 引自 Bailey, *Woodrow Wilson and the Great Betrayal*, 第 42 页。

58. *The New Republic*, 引自 Knock, *To End All Wars*, 第 262 页; Knock 的引语,引自第 165 页。

59. Hobson and Oswald Garrison Villard, 引自同上书,第 253 页。

60. 关于 20 世纪 30 年代孤立主义的概述,参见 Thomas N. Guinsburg, “The Triumph of Isolationism”, i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Reconsidered*, 1890—1993, ed. Gordon Martel (London: Routledge, 1994), 第 90—105 页。

61. 引自 John Lewis Gadd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1941—194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2), 第 24 页。

62. 关于 1938 年到 1943 年美国的外交和战争准备,参见 David Reynolds, *From Munich to Pearl Harbor: Roosevelt's Americ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Chicago: Ivan R. Dee, 2001)。

63. Kenneth Davis, *FDR: The War President*, 1940—1943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0), p. 270.

64. Robert Dallek,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32—194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283.

65. 同上书,第 319 页。

66. Divine, *Second Chance*, pp. 48—49.

67. 同上书,第 51 页。

68. John Culver and John Hyde, *American Dreamer: The Life and Times of Henry A. Wallace* (New York: Norton, 2000), p. 263.

69. Divine, *Second Chance*, p. 80.

70. Robert A. Divine, *Roosevelt and World War II*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1969), pp. 51—52.

71. Forrest Davis, "What Really Happened at Teheran", *Saturday Evening Post*, May 20, 1944, p. 44.

72. Daniel Yergin, *Shattered Peace: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7), p. 45.

73. 韦尔斯(Welles)设想的机构与最终成为现实的联合国之间的主要区别之一在于,法国和其他四个大国构成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拥有否决权。

74. Divine, *Second Chance*, pp. 142, 144, 147, 153, 130.

75. 引自 Gadd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第 29 页。

76. Trubowitz, *Defin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p. 148.

77. 引自同上书,第 98 页。

78. 引自 Divine, *Second Chance*, 第 143 页。

79. Divine, *Second Chance*, p. 63.

80. *Washington Dispatches* 1941—1945: *Weekly Political Reports from the British Embassy*, ed. H. G. Nichola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 p. 158.

81. 北卡来罗纳州参议员罗伯特·雷诺兹(Robert Reynolds)语,引自 Divine, *Second Chance*, 第 152 页。

82. 引自同上书,第 242 页。

83. Clark Eichelberger, 引自同上书,第 35 页。

84. Michael Leigh, *Mobilizing Consent: Public Opinion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37—1947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76), p. 124.

85. Legro, "Whence American Internationalism," p. 274.

86. Truman, 引自 Howard Jones, "*A New Kind of War*": *America's Global Strategy and the Truman Doctrine in Gree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43; Gaddis, 引自 Gadd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第 351 页。

87. 盖洛普民意测验公司和波托马克协会(the Gallup Poll and Potomac

Associates)进行的调查。William G. Mayer, *The Changing American Mind: How and Why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Changed between* 1960 *and* 1988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2), p. 65.

88. 尼克松主义重申了美国对条约的承诺,并保证给受到威胁的盟友提供核保护伞。然而,尼克松还同时声称:"在涉及其他形式侵略的情况下,我们将根据条约义务在需要时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但是我们将视受到直接威胁的国家的情况,承担为其防御提供人力的主要职责。"关于尼克松主义,参见 Charles A. Kupchan, *The Persian Gulf and the West: The Dilemmas of Security* (Boston: Allen & Unwin, 1987), 第 31—40 页。

# 第六章　美国国际主义的局限——前瞻

在当前的美国人口中，大约只有5%正好在20世纪40年代初成年，他们亲身经历了美国国际主义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过程中所发生的寂静革命。经过四十余年的冷战之后，美国先是获得了不可挑战的优势地位，接着又被针对美国本土的恐怖袭击所震惊，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美国人表示支持美国继续进行国际参与，他们依旧毫不担心缺少全球卫士的世界会如何发展，这些都并不出人意料。

但是，在这种自鸣得意之间，却悄悄出现了美国历史影响现在的迹象。毕竟，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对华盛顿总统的劝说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汉密尔顿说服华盛顿总统，美国避免卷入旧世界事务的倾向是基于地缘政治现实的"政策的一般原则"，而不应随临时条件的改变而改变。汉密尔顿当然是正确的，尽管存在着恐怖袭击的风险，但美国还是在南北两面拥有友好邻邦，在东西两侧拥有保护性大洋。汉密尔顿还谏言，美国的目标应该是主要在本半球占据"优势地位"。乔治·布什从作为总统候选人开始，早就清楚地表示，他的意图是要把美国的对外政策聚焦于美洲国家，这个宣示当然是有史实作为印证的。布什总统最先两次会晤的外国领导人分别是加拿大总理让·克雷蒂安

(Jean Chretien)和墨西哥总统维森特·福克斯。他参加的第一次主要国际会议是在魁北克举行的美洲峰会。

此外,民粹主义主题至少在美国的某些地区已经回潮。[1] 民粹主义主题在沿海城市并没有多少吸引力,那里的大多数决策者和外交事务分析人士很少有闲暇时间关心它们。但是,在以农业为主的南方和山区西部,民粹主义主题却有很强的吸引力,那里的决策和分析精英较为缺乏冒险精神。很明显,布什利用这种政治潮流的能力在他 2000 年大选获胜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个性和政策立场迎合了民粹主义传统的核心要素:捍卫各州的权利、限制联邦政府的权威、减少税收、不信任盘踞在华盛顿的精英、克制美国的国外承诺、远离自由国际主义和多边制度。一个人只要瞥一眼选举地图,就能发现传统的地区分割同布什主张的吸引力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关联关系。阿·戈尔(Al Gore)获得的支持来自沿海和部分中西地区更为城市化的各州,而布什赢得的支持则来自余下各州。

然而,更不情愿、更单边主义的国际主义的出现却并不是一种暂时现象,不是因为一位总统正巧得到得克萨斯州的欢呼致敬,他的瞬时偏爱所带来的。相反,由此引出的美国国际主义和大战略正处于适应地缘政治根本改变的过程之中。冷战的结束和主要对手的缺席已经逐渐进入国内政治的循环系统,尽管缓慢但却确定无疑地削弱着美国人对过去不久全球激进主义的支持。美国人已经开始有理由地质问,他们继续担负管理国际秩序的过重负担是否公平。由于缺少共产主义威胁的警戒效应(disciplining effects),美国对卷入制度的传统反感也正在回潮,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形成的对多边主义的热情正被排拒一旁。

美国的政治格局也以一种将影响美国国外参与的方式发生着变革。较年轻的、没有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或冷战期间决

定性事件的美国人，现在正进入显要职位。经济相互依赖、信息革命和国际恐怖主义可能使他们对孤立主义具有免疫力，但是，他们不会自动成为像年长美国人那样的国际主义者。南方和山区西部的人口与政治影响正在上升，这使支持更单边主义外交政策的选民得到了加强，并潜移默化地导致了同沿海地区文化和政治差距的加大。建立跨地区和跨党派的国际主义联盟很可能变得更加困难。美国西班牙裔人口也在大幅度增加。特别是由于西班牙裔美国人倾向于集中居住在像得克萨斯、佛罗里达和加利福尼亚这样的重要选举州，因此美国中部和南方有可能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发挥更为举足轻重的影响。概言之，国际和国内变化正在促使曾经指导美国过去大部分时间的更不确定(contingent)和更富争议(contentious)的国际主义重新回归。

## 不情愿的美国

美国日益上升的关于其全球作用限度的矛盾心态的确有其可取之处。当前大国竞争的缺乏并不仅仅源自于美国的实力，而且还源自于美国的政治特性。美国的确具有足够的力量进行随心所欲的胁迫和利用，但是反之，它也成倍积聚了推行相对友善意图的超凡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其他国家没有急于携手对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国进行抗衡的原因。而且美国的这种克制行为，可以解释为什么甚至墨西哥这样一个长期以来一直对来自北方的欺凌深怀疑虑、精于反美政治的国家，已经改变了路线，专心致力于在经济和认同方面建立同美国的联系。正如福克斯总统已经明确说明的，他希望自己的国家和美国“成为真正的朋友、真正的伙伴和真正的邻邦。”[2]

根据历史标准，身边的惟一超级大国是一个克制的大国，那

自然是一件对所有各方都有益的事，但是，这也有令人担忧的不可取之处。文化和政治对美国国际主义兴趣的限制，使美国形成了一种中庸、温和的对外政策。然而，如果美国的兴趣过分减少，那么温和政策就有可能变成疏忽(neglect)政策。相比饥饿的霸权，今天的美国更像是一个不情愿的治安官(reluctant sheriff)。[3] 倘若美国丧失了成为治安官的兴趣，那么将不会有人组建治安队。

看一下过去十年的记录，就可以明白这个道理。1990年夏，萨达姆·侯赛因的军队入侵科威特。作为回应，华盛顿集结了70万大军，包括54万美国人，着手把伊拉克军队赶出了科威特，并在十年中的余下时间封锁了伊拉克政权。同样的情况出现在巴尔干地区。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欧洲最近期的种族清洗者，把自己扭曲的野心指向了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美国领导的联盟最终介入，阻止了波斯尼亚的流血杀戮，并随后把塞尔维亚军队赶出了科索沃。华盛顿开始支持塞尔维亚的民主反对派，这个反对派最终将米洛舍维奇推翻、逮捕，并送上了海牙战争罪行法庭(war crimes tribunal)。美国军队继续留在这个地区以监控让人放心不下的和平(uneasy peace)。对于2001年9月的恐怖袭击，华盛顿也同样作出了快速、有力的反击。在灾难发生的几天之内，数千人的美国军队、上百架飞机和几十艘战舰就向中东地区开赴了。

但是，美国的所作所为也有明显的局限。萨达姆·侯赛因及其专制政权之所以幸存于军事失败，是因为老布什不愿承担风险入侵并占领巴格达。尽管石油供给利益攸关，但是参议院授权对伊拉克开战的决议案只以微弱多数勉强通过(52票对47票)。时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科林·鲍威尔反对发动伊拉克战争。[4] 比尔·克林顿不愿派遣地面部队进入南斯拉夫以保护科

索沃和推翻米洛舍维奇，他也出于同样的顾虑，即为了攸关利益，是否值得冒美国高伤亡的风险。甚至在克林顿承诺避免使用地面部队的情况下，美国众议院还是明确表明对战争缺乏热情。

坦诚地说，对于针对美国本土的恐怖袭击，美国的反应并没有遇到这类不情愿。国会和美国人民坚定支持军事报复。然而，这样的情境毕竟是独一无二的。受到袭击和伤害的是美国自身，不是美国在波斯湾地区的产油盟国，或巴尔干地区苦苦挣扎的少数团体。还有，反恐战争的新需要可能会削弱美国担负更传统使命的意愿。

如果美国国内政治很快控制了美国的外交政策，那么美国很可能在其他国家准备就绪填补空缺之前就已经鞠躬退出了。在没人照看店铺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像最近出现在中东和巴尔干地区的这类威胁就会放任自流。没有其他国家具有必要的军事能力和政治影响力组织够规模的作战行动，把伊拉克军队赶出科威特，迫使南斯拉夫军队离开科索沃，或者推翻萨达姆·侯赛因政权。如果美国没有遏制侯赛因，那么他可能今天还在台上，或许还控制着该地区石油资源的大部分。如果美国没有干涉巴尔干地区，那么巴尔干半岛可能陷入了动荡不安，它不仅会破坏东南欧的稳定，而且会无法挽回地损害欧洲联盟的声誉。

这种对未来的描述并不是幻想。它很可能就是我们正在走向的世界。足够恰当的说法是，甚至美国单极时刻的终结可能是在美国国内造成的。关于大战略决定性因素的基本倾向证实了这样的论断，即美国承担全球参与重负的意愿将在未来几年逐渐减少，这与美国不愿参与世界事务的历史是相一致的。

为了厘清美国国内政治将如何影响美国国际行为，需要阐

明哪些因素促动了对外志向的开始。这里，重要的是对满足国和崛起国进行区分。满足国(satisfied powers)是指那些已经达到强弱等级次序顶层，对自身命运感到高兴，和主要兴趣在于维持现状的国家。相比而言，崛起国(rising powers)是指那些正在发展的国家。他们不满足于自身命运，通常为获得承认和影响力而斗争，并因此寻求以某种方式推翻现状。用一般的术语来说，满足国在必须(must)时，而不是在能够(can)时，扩展海外承诺。他们被必要(necessity)而不是机会(opportunity)所驱动。崛起国则在能够时，而不是在必须时，扩展海外承诺。他们被机会而不是被必要所驱动。

美国是一个满足国。它努力奋斗建构了当前的国际体系，这个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捍卫并扩展了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美国因此应该做好投资准备以保护现状，抗击针对美国本土的威胁。但是，它不应该寻求承担一系列新的承诺。相反，美国应该寻求推掉一些在冷战艰难岁月积攒的过重责任。

从这个观点来看，20世纪90年代的经历存在某些不当之处。当苏联对东欧卫星国放手时，冷战结束了。于是苏联崩溃，俄罗斯自身陷入绝望境地。美国维持广泛的海外承诺的核心理由不存在了。然而，美国不仅维持了不计其数的、范围广泛的冷战承诺，而且实际上还扩大了这些承诺。

北约条约规定所有国家有义务相互防卫，这个组织最近吸纳了三个新成员，并已经准备好迎接下一批新成员。在科索沃战争的余波中，前南斯拉夫的大部分地区已经实质性地成了北约的保护地。因此，美国在欧洲的战略承诺自90年代以来已经显著增加了——而且还在继续增加。在东亚，美国已经扩大了同日本的防御联盟范围，美国海军增加了对东南亚基地的使用。在拉丁美洲，美国已经被拖入了哥伦比亚政府与该国毒品叛乱

分子之间的冲突。所有这些都发生在 2001 年“9·11”事件使美国注意力重新聚焦于国外事务之前。这些行为对于一个满足国而言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根据地缘政治逻辑,满足国应该限制,而不是增加自己的承诺。

对于这种奇异行为的最好解释是,过去十年是有关美国未来政策走向的反常预示,而不是正常预示。冷战结束了,但是美国官员和当选代表仍旧根据老的信念行事。毕竟 90 年代以来执掌美国外交政策的大多数人是在冷战的漫长岁月中成长起来的。如,国会山的李·汉密尔顿(Lee Hamilton)、约瑟夫·拜登(Joseph Biden)、杰西·霍尔姆斯(Jesse Helms)。第一届布什政府中的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理查德·切尼(Richard Cheney)。克林顿政府中的沃伦·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莱斯·亚斯平(Les Aspin)、安东尼·莱克(Anthony Lake)。乔治·布什政府中的切尼、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保罗·沃尔福维茨(Paul Wolfowitz)。这些人在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从事对苏联的斗争,因此他们带来的是有关美国在世界上应承担广泛角色的成见。

另外一个重要方面也说明过去十年是对未来的偏离,而不是对未来的预示。美国在 90 年代享受到了史无前例的经济繁荣。在预算赢余的掩盖下,不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没能推动国防预算的削减。在富足时代,资源节俭并不是一种优先选择。美国钞票多多,而且对此感觉良好——这种状态有助于形成激进的、扩张的、奢华的外交政策。

20 世纪 90 年代在最后一个方面也是十分显著的。美国军队经常部署参加战斗,但是伤亡很小。50 多万美国人参加了海湾战争(the Gulf War)。值得庆幸的是,只有 147 人在军事行动

中丧生。在克林顿年代，美国人投入了中东、非洲、巴尔干地区和海地的战斗。在索马里，18名军人在一次交火中阵亡，克林顿便迅速撤回了美国部队。在所有其他地方，美国投入战斗却没有在对抗中损失一个士兵。这当然证明了美国军队的素质和优势，但也虚幻地考验了美国的士气。

使美国在90年代变得如此宽宏和扩张的三个条件决不是持久的。人员周转正在改变国会山的局面。超过50%的现任参议员和超过60%的现任众议员最早是在1992年后上任的。柏林墙倒塌之后进入校园的美国人已经占据了有影响的职位。他们不会带着强烈的历史记忆——慕尼黑、珍珠港、欧洲重建、铁幕(the iron curtain)，这些强烈历史记忆在过去50年时间里一直是美国国际主义的知识和政治基础。正如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在其有关世代变迁之政治影响的经典文章中所指明的，“早期印象倾向于并入有关世界的自然观点”，这种自然世界观使各种态度多姿多彩，并塑造个体如何在他们的一生中解释不断输入的信息。[5]

民意调查显示，年龄段对于他们对社会和文化问题所持的态度具有重要影响，但对于他们对外交政策的态度却没那么有影响。[6] 然而，这些调查中使用的大多数数据是在冷战期间收集的，当时人们可以预期东西方冲突可以在不同世代之间重复塑造相似的立场。经过一段体面的时差之后，冷战的结束应该意味着年轻一代美国人中看法的变化。民意调查已经开始显示，18—29岁的美国人比他们的长辈更少关心国际事务。[7]

对于国际主义热情的日益减少，原因并不仅仅在于缺乏主要的外来挑战者。年轻的美国人比老一代美国人更少花时间研究历史。1999年对美国前55所大学和学院的调查显示，没有一所高校要求学生选修美国历史课程，其中78%的高校根本没有

要求学生选修任何历史课程。在这些机构参加调查的毕业班学生中，只有35%的人能够叫出朝鲜战争爆发时在任美国总统的名字，只有40%的人知道突围战役（the Battle of the Bulge）*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国考试还暴露出，高中毕业生的历史成绩非常糟糕。[8]

年轻美国人不可能是孤立主义者；他们比其长辈具有更多的旅行机会，他们大多数津津有味地享用着全球化的经济。但是，成为国际性和世界性人士与成为国际主义者并不是一回事。毕竟，是对德国和日本的战争，以及对苏联共产主义的斗争，向世纪中叶的美国精英灌注了国际主义热情。还有，那一代的职业阶层通常都在武装部队中服役。今日正在崛起的经济和政治精英，并没有这种经历。被劫飞机撞向世界贸易中心的深刻烙印也不会像二战和冷战那样为重建国际主义提供稳定的背景。不论好坏，20世纪90年代后成长的一代美国人已经品尝到了恐怖主义的恐惧，但是，他们不会通过直接经验知道地缘政治的紧迫性。他们中的大多数甚至不会通过学习历史知道地缘政治的紧迫性。随着这些人成为民意和政策的主要塑造者，90年代回光反照（reflexive）的国际主义可能就要消失了。

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繁荣也结束了。对自由贸易的支持，原本在90年代就很难得到，因此现在可能更要出现短缺。的确，乔治·布什在2002年7月赢得国会批准，获取了快速通道（fast-track）谈判权，但是，国会授权只以微弱多数通过，而且是在布什默许对纺织工业实行新的保护措施之后才通过的。这种吝啬将会慢慢传到安全领域，激化国内关于负担分享的辩论，以及

* 又称阿登战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在西线的最后一次攻势，企图使盟军从德国本土撤出，但未成功。因主要战事发生在比利时南部阿登森林高地而得名。——译者注

国会内部关于要求美国地区伙伴承担更多防御职责的争吵。2001年9月恐怖袭击之后，只用几天时间，国会就批准了——两院都全票通过——400亿美元的应急资金，其中大部分流向了军事部门。但这些都发生在非常时代。随着预算赤字取代预算赢余，慷慨宽宏就会让位于相对的朴素节俭，激进主义就会让位于更温和、谦逊的参与。值得注意的是，2001年“9·11”事件之前，不管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布什政府中如何保守和亲军事导向，他却在同白宫和国会进行争斗，要求获得对其国防改革计划的财政支持。

这些趋势现实成分远远多于假想成分。无计其数的警示说明，美国国际主义已经处于退却状态。对纽约和华盛顿的恐怖袭击的确激发了全国统一和对军事行动的高涨热情。但是，这只暂时增强了两党对国际主义的支持，不应该让这种暂时现象掩盖了更广泛的发展趋势。下面是2001年“9·11”事件之前出现的情景——这些情景可能随着恐怖袭击事件慢慢成为过去而再度出现。

美国外交机构曾经像磁场一样吸引全国最优秀的毕业生，但是现在这些机构已经丧失了大部分职业魅力。国务院在90年代吸纳的很多非常出色的外交官仅仅几年之后就在挫折中离开了。根据《纽约时报》的分析，“国务院，负责美国全球外交的机构，很难适应这样一个时代，金融市场比华盛顿-莫斯科峰会更有冲击力。国务院雇员正在向投资银行、网络公司、财政部和商务部流失，这些部门已经扩大了他们的外交政策职能。”[9]

民意调查描绘了一个相似的画面。芝加哥对外关系委员会(Chicago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和其他机构所做的定期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总体上在整个90年代依然是国际主义的。[10]然而，公众对外交事务的兴趣的确严重下降了。冷战期间，紧迫

的地缘政治问题通常是公众关心的首要问题。到了90年代末，只有2—3%的美国人把外交政策看作是首要问题。当调查要求美国人指出“两个或三个当前美国面临的最大外交政策问题”时，大多数人的回答是“不知道”。一个稳定的多数群体表示，世界其他地区发生的事情对美国影响“很小”。布鲁金斯学会(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的詹姆斯·林赛(James Lindsay)在《外交》杂志中对这种情况进行了概括，他说："美国人在理论上支持国际主义，但在实际上却很少采取国际主义行动。"[11]因此，在21世纪开启之际，美国人并不反对他们的国家参与世界。他们只是对此变得根深蒂固地缺乏兴趣、无动于衷。

恰恰是因为缺乏这种关注，报纸、杂志和广播网络急剧削减了对外国事务的报道范围。媒体是个由市场份额和每秒广告费用驱使的竞争性行业，美国需要什么，它就提供什么。这种情况向政治领域的扩溢再明显不过了。外交政策在公众中的吸引力如此之小，以至于外交政策几乎在政治雷达的屏幕上消失了。所有提交国会的外交事务，包括战争与和平问题，实际上都变成了党派辩论赛。德克萨斯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彼得·特鲁博维奇(Peter Trubowitz)已经证明，关于外交政策的党派冲突在最近的过去急剧增加了。[12]毫无疑问，克林顿的丑闻以及他与共和党领袖之间的反复对峙，在推动两党关系走向斗争沸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甚至外交政策也被当作人质的事实却清楚地说明，美国的政治和政策优先排序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由于某些烦人的规定，政党政治让国际领导地位的需要甘拜下风。在整个克林顿时代，很多重要的大使职位一直空缺，因为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共和党人拒绝批准总统的人事任命。2000年8月，彼得·伯利(Peter Burleigh)在等待参议院批准其菲律宾大使任命长达9个月之后，从国务院辞职。[13]伯利作为

美国最富成就的外交官之一已经得到广泛承认。为了让共和党反堕胎一派人士高兴，美国拖欠联合国的费用在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没有支付，他们认为联合国的计划生育方法过于侵犯性。1999 年参议院拒绝了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尽管行政当局更愿意将其束之高阁。对于参议院来说，让克林顿难堪要优于对战争与和平问题负责。

在这些逸闻插曲之后，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楚克·哈格尔(Chuck Hagel)试图对本党行为提出一个可信的解释。为了反省对国际主义的明显攻击，哈格尔评论说："这些对于共和党一方来说，完全是出于对克林顿总统的深度不喜欢和不信任。"[14]但是，这些根本不是令人舒服的安抚辞令。慎重、诚实的孤立主义因为党派原因倾向于对具有全球重要影响的事务采取冷嘲热讽的漠视态度。

科索沃战争很大程度上因为它要求美国派遣军事人员进入战斗，从而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有利观察点，由此可以审视新的更为模棱两可的美国国际主义。在辩论北约扩张、美国在东亚的条约承诺或国防开支等问题时，确定姿态、明确立场实在太容易了——这些问题在近期主要要求作出文本承诺、善意保证和预算授权。把这些付诸实施才是对国际主义限度的更好的简单而又决定性的考验。

表面上，北约的科索沃战争看起来证实了美国国际主义的持久性。美国领导北约投入争斗，华盛顿有效地进行了空中战役，克林顿路线坚定，直到米洛舍维奇投降并撤出科索沃。然而，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一个截然不同的画面。

美国花费十年时间的前半部分，试图避免卷入因南斯拉夫崩溃而酿成的流血杀戮。联合国和欧盟干涉的无效，以及美国公众对持续屠杀日益增加的不安，——1995 年 7 月斯里布瑞尼

卡(Srebrenica)的大屠杀和次月萨拉热窝露天市场的爆炸是转折点——最终致使克林顿批准使用武力进行干涉。美国对波斯尼亚塞尔维亚阵地的数天空中打击，加上克罗地亚和穆斯林军队的地面进攻，终于使各方在1995年走上谈判桌。接着，克林顿政府促成了代顿协议(the Dayton Accords)，尽管代顿协议中止了暴力，但只是通过巩固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作为地区权力经纪人的地位才实现了暴力中止，而他却是波斯尼亚分裂的背后主谋。

当1998年米洛舍维奇接下来把视线转向科索沃时，美国再一次寻求避免军事卷入。但是，日益深重的危机迫使克林顿第二次诉诸压制性的空中打击，空中战役始于1999年3月24日。华盛顿指望米洛舍维奇能够在几天之内投降，就像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军事力量那样。而当米洛舍维奇没有按照美国预期投降时，克林顿团队则处于一种事实上的休克状态。[15]尽管数周的空中打击只是加速扩大了科索沃的人道主义危机，但是，克林顿还是让美国飞机继续维持在15000英尺的高空——那里，这些飞机相对不受地面炮火的影响，但对于打击意中目标也更没有成效。他还拒绝讨论让北约地面部队进入战斗的议题，尽管这种拒绝会削弱北约的强制杠杆，并鼓励米洛舍维奇度过空袭难关。

国会也是没有任何帮助。战争进行一个月之后，众议院以压倒多数投票拒绝拨款以资助在没有国会授权的情况下向南斯拉夫派遣美国士兵。众议院甚至没能鼓起足够的勇气通过支持轰炸战役的决议案(表决结果是213票对213票)。尽管空中作战最终取胜，北约没有一个战斗伤亡，但是，参议院对战争的主要反映是，通过一个决议案，严厉谴责欧洲的军事软弱。

科索沃冲突结束以来，在监控令人放心不下的和平方面，美国试图限制介入的程度。欧盟别无选择，只得为科索沃的维和

使命(科索沃多国维和部队-KFOR)提供大部分军力,并领导经济重建。甚至在战斗结束之前,克林顿在1999年纪念日(Memorial Day)演讲中向美国人民许诺,“在维和部队进入那里(科索沃)时,占压倒多数的主体将是欧洲人;在重建开始时,占压倒多数的投资也将是欧洲的。”[16]当此后不久科索沃多国维和部队开始部署时,美国军队(占总人数不足15%)就被派到了科索沃东部地区,那里暴力冲突的可能性据推测是较低的。2000年2月,美国士兵的一支小规模分遣队被派往北部城市米特罗维察(Mitrovica)以帮助镇压种族暴力。当美国士兵被愤怒的塞尔维亚人投掷石块袭击时,五角大楼的回应是,命令他们返回各自的部门,这清楚地说明,华盛顿准备抵制科索沃多国维和部队的地面指挥官,把美国军队置于特别的限制之内。[17]

不管给美国军队提供了多少与众不同的保护,美国的立法者还是继续抱怨说,欧洲需要做得更多。共和党参议员、军事委员会(Armed Services Committee)主席约翰·华纳(John Warner)于2000年3月信誓旦旦地指出,除非欧洲国家增加他们对联合国维和努力的财政资助,否则他要撤回拨款给驻科索沃美军的20亿美元的一半。[18]民主党参议员罗伯特·伯德(Robert Byrd)提议,美国应该把在科索沃的维和和重建工作交给欧盟,并及时从该地区撤回美国军队。[19]国会明确显示,对确保欧洲安全已经丧失了兴趣。

乔治·布什的当选只是强化了这些基本怨恨。副总统切尼在选战期间已经清楚表示,“地面部队,在欧洲,尤其是在巴尔干地区……使我觉得那是欧洲朋友和盟国的恰当角色。”[20]经过几个月在这个论题上的含糊其辞——以及来自美国欧洲盟国的抗议——之后,布什总统终于宣布,美国军队将继续留在巴尔干地区。但是,当2001年3月战斗在马其顿爆发时,不管马其顿斯

拉夫人和该国相当大的阿尔巴尼亚少数种族之间发生大屠杀的可能性有多大,布什政府实际上否决了美国的直接卷入。北约秘书长洛德·罗伯逊(Lord Robertson)要求成员国扩大在科索沃的军事存在,以便帮助阻止武器和人员流入马其顿。美国也拒绝了。当8月在和平协定之后,北约向马其顿派遣部队解除阿尔巴尼亚族叛乱分子武装时,美国发挥了最低限度的作用。只有已经在该国驻扎为科索沃维和任务提供支持的美国军队参加了行动,他们的使命也局限于为欧洲军队提供后勤支持和情报。此后不久,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建议,北约应着手准备减少三分之一在波斯尼亚的军事存在。

科索沃战争及其后果明确显示,支持美国在欧洲发挥主导性战略作用的国内共识已经破裂了。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一样都认识到,欧洲对美国的战略依赖既不公平,也不具有政治上的可持续性。欧洲如果把来自华盛顿的连续警告解释为空洞的威胁,这些威胁源自于另外一种会很快消失的对负担分享的先天之忧,那么欧洲就是不明智的。苏联已经崩溃了,欧盟正在茁壮成长,欧洲最好认识到,它很可能需要自食其力了。布什政府减少美国在朝鲜半岛、中东、以及其他热点地区作用的最初努力说明,美国对继续发挥全球卫士作用越来越丧失兴趣,欧洲可能不是惟一能够感受到其影响的地区。

坦诚地说,美国的内向转变因“9·11”事件而发生了逆转。但是,正如下面将要讨论的,可能恰恰是伊拉克战争重新唤醒了这种孤立主义本性。

## 单边的美国

美国国际主义的衰微对于已经适应了美国主导地位的世界

来说具有重要影响。然而，它的影响还在扩大，因为日益减少的对国际参与的兴趣还伴随着第二种强烈趋势——渐增的单边主义。在美国厌倦了全球角色的同时，它还进一步倾向于自行其是。

吝啬的国际主义与刚愎的单边主义一起构成了一个致命组合，两个领域的最糟组合。美国已经从世界舞台上后撤，使自己远离国外的麻烦事，但是又拒绝与其他国家合作以填补这个缺口，担心顺从他国将意味着自身影响的下降。然而，华盛顿不可能两者兼得。它必须要么广泛参与，主导局面，从而使自己有更好的理由要求他国加入或让开。要么向后退，推掉某些国际负担，但是之后要同他国合作以拾遗补缺——并接受丧失影响的结果。此外，其他国家毫不犹豫地表达了他们对美国单边主义的不满，他们明确表示，单边主义将使一个更分裂、更艰苦的国际环境加速回归。倘若与单边的美国形成对抗，上升的欧洲和崛起的亚洲肯定会把他们正在获得的力量用于反对美国。

美国的单边冲动具有深刻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国父们，以及他们对于年轻共和国卷入大国对抗危险的担忧。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人十分必要地丢掉了一些他们对多边参与的反感；建立团结的自由民主国家共同体和管理西方世界，需要有一个精心设计的制度网络。但是，甚至在冷战期间，单边的迫切要求经常得势。在很多问题上，从对苏联的外交思路，到阿以冲突，到军备控制，到国际贸易，西方盟国经常抱怨，刚愎任性的美国太过频繁地自行其是了。

没有了冷战的制约，这种单边律动更是日渐强烈。尽管已经意识到了深刻的全球相互依赖，但是，来自左翼和右翼的政治家们还是怂恿美国放弃成为共识和联盟的创建者。甚至克林顿

政府，虽然在原则上承诺坚持多边的国际治理，但实际上却经常被迫特立独行。

1997年，克林顿拒绝签署禁止地雷的国际公约，该公约已经赢得了123个国家的支持。其他抵制的国家是像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中国、俄罗斯和朝鲜那样的示范性国家。1998年，克林顿政府签署了京都议定书，但是接着在实施方面却提出异议。2000年11月，175个国家在海牙参加后续会议，以便在抑制全球变暖的措施问题上达成最终协议。美国发现与对话者基本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会议以僵局结束。克林顿还在总统任期行将结束之际撤回了美国对国际刑事法庭的支持。在离任前的三周，他又改变主意签署了国际刑事法庭条约，但他同时建议布什，在作出必要修改以便改善批准前景之前，不要把条约送交参议院审批。

乔治·布什的当选强化了他的单边倾向。他的很多高层外交政策顾问——理查德·切尼、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保罗·沃尔福维茨、理查德·阿米蒂奇和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副国务卿 undersecretary)——都因鹰派立场、单边取向而名声远扬。拉姆斯菲尔德是国家导弹防御(NMD)体系的主要支持者，他对于自己决心挑战国际条约，不顾盟国反对来建立这个体系一点也不感到不安。在批准任命的听证会上，他宣称反导条约将要成为“古代历史”[21]。布什本人在共和党全国大会上发表基调演讲时断言指出：“现在是时候了，不要去捍卫过时的条约，要去捍卫美国人民。”[22]在博尔顿的批准任命听证会上，共和党参议员杰西·霍尔姆斯说道：“约翰(博尔顿)，我想要你拿着反导条约，把它扔到我们已经扔掉反导条约合作签署国苏联的同一个地方——历史的垃圾堆。”[23]

布什团队还从很早开始就明确宣称，他们反对国际刑事法

庭。拉姆斯菲尔德在2000年12月签署了一封联名信，警告说："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将是"国际刑事法庭的"第一个受害者"[24]。博尔顿长期以来也一直是国际刑事法庭最坚定的反对者之一。他发挥了主导作用，说服布什政府在2002年5月宣布，克林顿在该条约上的签字不再是约束性的，国际刑事法庭不要指望美国的合作。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和旨在核实生物武器公约的新兴机构都没有获得通过。相似的态度也在环境问题上得势，布什政府退出了京都议定书，宣布了在阿拉斯加荒野开钻新油井的计划。而且在2003年初，美国袭击了伊拉克——尽管它未能赢得联合国安理会的支持。

这些举动使美国的盟国惊讶不已。布什在京都议定书问题上的行动激起了严厉批评。欧洲执行委员会主席罗马诺·普罗迪评论说："如果一个国家想要成为世界领袖，那么它必须知道如何照料整个地球，而不只是美国的工业。"法国最有影响的日报《世界报》把这种举动称作"野蛮形式的单边主义"[25]。当布什政府开始进入执政的第三个月时，英国的一位主要记者这样概括来自伦敦的观点："从这里来看，华盛顿的主流声音似乎在以他们的方式作出一系列新奇的评估：削损旧敌，怀疑国际妥协，当达成全球条约时坚持美国第一，训诫盟友，在烦乱复杂的世界面前蔑视而不是建设。烦乱复杂已经取代了简洁陈旧的两极世界，他们大多数都是在两极世界中成长起来的。"[26]

对国际参与热情的日减与单边主义的日增形成了一种精神分裂式的组合，它向世界传递了混乱的信号。一会儿，美国抱怨负担过重，要求伙伴承担应有的份额，并从广泛的全球角色向后撤退。一会儿，美国又漠视伙伴，自作主张，并在他国寻求填补厌倦霸权走后留下的真空时以对抗回应。

这些矛盾集中体现在有关欧洲防务问题上的困境，该困境

在科索沃战争之后一直损害着大西洋关系。在科索沃冲突的余波中,美国和欧盟共同认为,欧洲应该及时改善军事能力。对于欧洲人来说,战争揭示了他们的严重军事弱点和对美国的战略依赖程度。华盛顿对欧盟不能承担更大份额的负担表达了不快。欧洲人的回应是,着手致力于组建一支能够独立于美国采取军事行动的快速反应部队。

克林顿政府的反应很能说明问题。欧洲各国已经顺从了美国的要求,美国在表面上欢迎欧洲的这种努力。副国务卿斯特罗博·塔尔博特(Strobe Talbot)坚持认为:“美国需要一个更强大的欧洲,对于这个立场,不应该有任何混淆。对此,我们不是反对,我们不是含糊,我们不是焦虑,我们是支持。”[27]然而在背后,华盛顿却发出了不同的信号。国务卿马德莱娜·奥尔布赖特警告欧盟不要复制现有的北约资产,而这是欧洲人如果要发展有意义的自治就不得不做的。助理国防部长富兰克林·克拉默(Franklin Kramer)断言:“在北约内部存在一个‘欧盟核心小组’(EU Caucus)是不可能的”,而那是欧洲国家如果要形成连贯一致的政策就必须要做的。[28]国防部长威廉·科恩(William Cohen)进一步指出,欧洲正在冒险把北约变成“历史遗迹。”[29]

实际上,美国在告诉欧洲应获取更多的防御能力,但不要指望拥有更多的发言权或自主权。美国想要欧洲在分享负担方面做得更好,但对于作为回报让欧洲分享更多的影响力,美国没有兴趣。然而,欧洲的防御努力恰恰是要获得这些东西——更大的影响力和自主权。这种不匹配解释了为什么,用《卫报》(*Guardian*)的话来说,“温和地讲,这个计划(欧洲防务)正在让美国人感到不安。”[30]当此事开始推动时,克林顿团队根本没有准备退让,为更加自信的欧洲留出一席之地。

美国的精神分裂症在布什政府下继续发展。拉姆斯菲尔德

最初轻视欧洲的努力,甚至在 2001 年 2 月第一次正式出访欧洲,到慕尼黑参加安全会议期间,他根本没有提及欧盟。至于新的防御力量,对其优点的考验在于,它是否加强了北约而不是欧洲的实力。在这个问题上,拉姆斯菲尔德宣称:“我并不十分清楚它如何能加强(北约)实力。”[31]博尔顿 1999 年在一次作证时告诉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mittee),“我们应该公开指明,把欧盟成员国外交和防务政策结合成一个共享的统一政策,其目的通常是受两种因素中的一种驱使的,或者想要使他们自己远离美国的影响,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有意公开反对美国。”[32]国务卿鲍威尔对于欧盟的防御力量更能够接受,布什总统本人也表示出对这种想法的某种同情,他在会见布莱尔之后指出,英国首相已经“向我保证,欧洲防务决不会损害北约”,“因此,我支持首相的安排”[33]。尽管布什作出了积极声明,但是,像其前任政府一样,他的政府对于发展更强大、更独立的欧洲已经公然表示了不快。

美国要求欧洲人变得更自立自强,而当欧洲人遵命行事时美国又气愤不平,对于美国来说,没有更好的办法比这更能毒害美国同崛起欧洲之间的关系了。华盛顿让世人知道它在提出一种更强调差别对待(discriminating)的国际主义,这是对的。但是,把这个信息同刚愎的单边主义混在一起,就有一道疏远朋友和敌人的危险。如果美国单极时刻出现后的世界有赖于伙伴关系以及危险和责任的平等分享,那么喜欢自行其是的美国就会为未来制造麻烦。当美国还在享有优势地位时,它可能有刚愎任性的奢华;小国别无选择,只得与之共处。但是,当美国的主导地位不再那么显著,其他权力中心拥有必要的资本自立自强时,美国的单边主义冲动就只会确保全球地缘政治对抗的回归了。

## 恐怖主义和美国的国际主义

至少在短期内,2001 年 9 月的恐怖袭击改变了这些令人担忧的趋势。向新式孤立主义的漂移变成了警惕的参与。美国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追剿恐怖分子,广泛使用军事、外交、法律和经济手段。外交政策变成了国家的头等大事。被突然受挫所激励的美国改变了公众的冷漠无情。政党角力一夜之间消失了,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国家统一的名义下将他们的分歧弃置一旁。

美国日益增加的单边主义也因恐怖事件而缓和下来。华盛顿寻求尽可能广泛地组建一个反击联盟。布什总统和科林·鲍威尔通过热线电话,拉姆斯菲尔德通过访问中东,谋取支持。美国甚至与俄罗斯、中国和伊朗取得了联系,此前布什政府对这些国家一直保持一定距离。大多数国家都积极回应,随时准备参加战斗,至少在原则上如此。北约和美洲国家组织(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都援引了各自宪章中的集体防御条款。一个接着一个的外国领袖来华盛顿表达支持,伸出援助之手。布什政府似乎已经重新发现了多边主义的优点。

然而,在长期内,恐怖主义可能会对美国国际主义产生截然相反的影响,它肯定会加强在 2001 年 9 月之前就已经成为潮流的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倾向。恐怖主义不会成为让美国回归中线的集体威胁,相反,恐怖主义可能会像一张通配符(wild card)一样发挥作用,它时而激发美国一阵痛打,时而又会诱使美国退回到保护壁垒之后。恐怖威胁不会激励美国成为更稳定的伙伴,而会使之成为一个更顽固、更不可预测和更倔犟的行为体。

不管美国的言辞多么具有包容性,美国决不像它表面上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是一个公然的多边主义者。美国确实想要有一

个尽可能广泛的联盟，让美国军队能够使用中东的基地，为美国对阿富汗进行报复袭击提供国际合法性。但是，华盛顿并不欢迎与联盟作战相伴随的对其行动自由的制约。布什政府喜欢的是“菜单式的多边主义”(à la carte multilateralism)，这个术语早些时候是由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杜撰的。美国要求不同国家提供特殊形式的援助，但不与之进行更广泛的协商，而后者才是对多边主义的真正考验。下面看一下，当美国组建联盟时，一位美国记者是如何概括来自欧洲的看法的。

“美国已经为反恐组建了一个极其广泛的、界定松散的联盟，并得到了联合国安理会、欧盟和北约非常具体的援助的支持……但是，如果这是美国的多边主义时代，或者是美国谦卑的新地缘政治学，那么它是以美国方式管理的，这种方式如此细心控制以至于它似乎正在引起欧洲的真正苦恼。很明显，当乔治·布什总统提出以要么支持我们要么反对我们的方法对待恐怖主义，并赢得广泛支持时，他在静悄悄地强化着这样的潜台词，对于他构建的团队，只有一个队长，只有一个剧本。新式美国国际主义——美国士兵和外交官下达具体任务，如确保过境飞行权或为联盟伙伴提供后勤支持——对于平等发言权的讨论论坛根本不理不睬。相反，它更像是一个美国下达精确任务的集会大厅，美国小心谨慎，不向大多数盟国要求太多，但甚至什么也不要求也会伤害某些盟友。”[34]

2001年10月7日，开始对阿富汗进行军事打击的那一天，华盛顿并没有通告比利时首相盖·维霍夫斯塔(Guy Verhofstadt)，轰炸将要开始了，当时比利时是欧盟轮值主席国。当战斗进行时，布什政府谋取了托尼·布莱尔的帮助以便维持联盟的存在，但是它却严格控制着战争的进行和与之相伴的外交活动。

战争开始一个月之后进行的一次国际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以外三分之二的民意领袖感到，美国的所作所为根本没有考虑盟国的利益。[35]

与此相似，纽约和华盛顿遭袭之后随即形成的国际团结是令人宽慰的、颇有助益的，但却没有进一步深化。美国的伙伴愿意分享信息，在加强执法方面进行合作。但是，当涉及军事报复问题时，联盟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是摇摆不定的。“9·11”之后的几天之内，美国的欧洲盟友就已经反复无常了，警告美国要克制，并减少了对战争的讨论。沙特阿拉伯，作为华盛顿在波斯湾最亲近的盟友，宣布欢迎美国飞机使用其领空，但是不允许它们由沙特基地起飞进行进攻性打击。沙特人最初甚至拒绝冻结嫌疑恐怖集团的银行账户。

当空袭真正开始时，只有英国与美国相伴。而且，英国对空战的参与也是有限的；它的主要贡献在于，在战役的第一天晚上发射了一些巡航导弹，并在阿富汗部署了少许特种部队。其他欧洲国家声称支持军事行动，但是，他们的军队不冒任何风险。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与战争保持距离，或者没有反应，或者暗中指责。俄罗斯的确前所未有地出面，强烈支持美国领导的联盟，并提供情报和军事帮助。但是，俄罗斯这样做却带着明显的动机——它把伊斯兰极端主义看作是对自身安全的威胁。俄罗斯为平定车臣的分裂主义穆斯林进行了流血斗争，从而使之陷于困境，它同好几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接壤。莫斯科是受自我利益、而不是新发现的利他主义所驱使。

相似的情况还出现在反恐斗争的第二阶段。塔利班在阿富汗北部崩溃之后，美国部署了2000名地面部队，在南方建立了一个主战基地以帮助击败残余的塔利班据点并协助追剿本·拉登。来自其他国家的数量有限的特种部队参加了行动，但是像

空战一样，地面战也几乎完全成了美国人的军事行动。好几个欧洲国家提出在北方部署正规军，以便帮助维持秩序，帮助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但是华盛顿拒绝了，担心他们的存在会使军事行动复杂化。直到主要战事结束之后，来自欧洲、土耳其、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军事力量才大量到达，维持和平，并帮助消灭藏匿在山区的残余抵抗。

对于美国在针对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战争中主要单独行事，人们不应感到奇怪。尽管恐怖主义构成了集体威胁，但是恐怖分子在进行打击时总是挑选具体的国家。可以理解的是，遭袭国家比其他国家具有更强烈的反击动机。外国对美国本土袭击的相对缺乏，可以解释为什么华盛顿在2001年9月之前很少从事反恐战争。以色列面临对其领土的恐怖袭击已经长达几十年之久，但是它在反击时也是单独行事的。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英国及其反对爱尔兰共和军(Irish Republic Army)的斗争，适用于法国及其反击来自北非和中东的恐怖分子的斗争。不论是好是坏，恐怖主义构成的这类威胁更可能加剧单边行动，而不是使之更温和。

单边行动的动机还源自于中东的政治环境。在这个地区打击恐怖主义，相当于走进了一个政治、种族、宗教和国家分裂的迷宫，它们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有可能让外来者落入陷阱。所有阿拉伯国家，除伊拉克外，开始时都谴责“9·11”袭击，这是真的。但是，巴勒斯坦人上街游行庆祝，随后几天反美抗议分别在阿富汗、巴基斯坦、索马里、阿曼、尼日利亚和印度尼西亚爆发，这也是真的。

在这种极其不稳定的环境中，加上各国在中东的经济利益风险，各个国家都有充分的理由谨慎行事。他们担心招惹恐怖主义报复，担心挑起反对西方的敌对行动，担心破坏阿拉伯世界

内部温和政权的稳定性，这些担心都不利于维持广泛反恐联盟的持久性。驱使俄罗斯很早就开始合作的自私自利，也同样驱使很多其他国家与美国的军事行动保持距离，尽管他们声称支持报复行动。

在布什把伊朗、伊拉克和朝鲜描绘成“邪恶轴心”(axis of evil)，并暗示他们将是美国反恐战争的下一个目标之后，美国与其公认伙伴之间的距离只是进一步加大了。这个声明在国外引起了广泛的反对。甚至美国最稳定的两个盟国英国和德国都表达了他们的不满。布莱尔警告华盛顿不要打击伊拉克。尽管英国最终决定参加针对伊拉克的战争，但是冲突已经使大西洋关系紧张到了破裂点。德国外长警告华盛顿，“联盟伙伴不是卫星国”。在德国总理即将开始访问美国之时，《南德意志报》(*Suddeutsche Zeitung*)悲叹说：“可怜的格哈德·施罗德”，将不得不“出现在刚刚加冕的美国恺撒的宝座面前”。在2002年5月布什出访欧洲的当天晚上，《柏林人报》(*Berliner Zeitung*)哀叹说，在“9·11”的余波中，美国远远没有放弃单边主义，反而“利用这个机会加强了它自私的超级大国地位”。该报认为，“从来没有一位美国总统让我们如此陌生，德国公民也从来没有对他们最强大盟国的政策如此怀疑。”[36]反恐战争不但没有巩固美国与欧洲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反而可能使之陷于新的紧张状态。

至于有人宣称，恐怖主义将成为受欢迎的医治美国孤立主义本性的解毒剂，其反面才是最可能的结果。核心的问题是，美国如何解决它新的脆弱感和处理这样的认识，即美国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使其本土安全处于危险之中。这里，坦诚地说，美国人正在进入一个未知领域。毕竟，珍珠港事件是对远在美国大陆几千英里之外的一个海军基地进行的袭击，相比而言，“9·11”袭击以及随后的生物恐怖主义活动打击的是美国的商业和政治

心脏。

"9·11"袭击5天之后，安德鲁·沙利文(Andrew Sullivan)宣称，"孤立主义已经死亡"，他坚持认为，美国的脆弱性将使美国消除所有关于地理免疫的幻想。另外一位评论人指出，"我们现在所有人都是以色列人"，意指以色列坚决的反恐斗争。[37]以色列不仅没有在恐怖面前退却，反而立场坚定，对一而再再而三的袭击进行回击，对恐怖主义的实施者和支持者施加同样报复。

然而，对于长期而言美国将如何应对自己新发现的脆弱性，以色列对待恐怖主义的经验并不是特别好的指南。以色列的恐怖分子来自内部，暴力实施者与以色列犹太人一起生活，居住在以色列有效控制的领土上。结果，这个国家别无选择，只得立场坚定，蔑视恐怖分子，该国的生存本身处于危险之中。

更好的美国困境的历史类比是其他全球大国的经验，这些全球大国因为自身的卓越和在远土上的战略存在而遭受过恐怖袭击。这种历史记录给出的是一个比较模糊的画面，它说明，非对称威胁有时能够有效地使主要国家的压倒性军事优势变得毫无用武之地。这种威胁还证明是很难对付和压制的，它会让人产生挫折感，并付出高昂的政治代价。虽然很难确定导致一个国家决定扩大或收缩战略承诺的复杂动机，但是证据的确说明，恐怖袭击可以成功地磨损国家的决心和意志，诱使国家减小其国际雄心的范围。

下面看一下英国在巴勒斯坦的经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联盟使巴勒斯坦成为英国的托管地。在托管初期，英国在巴勒斯坦维持了可观的军事存在，以便预防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发生冲突。随着30年代下半段欧洲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高，英国尝试着减少帝国对资源的消耗，因此试图通过作出一定让步安抚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但这个让步最终影响到了犹

太人对家园的渴求。虽然很多犹太领导人继续同英国紧密合作,但是一些极端分子却对英国目标组织了恐怖袭击,1946 年 7 月 22 日,耶路撒冷大卫王饭店(King David Hotel)的爆炸使恐怖活动达到了高潮,这个饭店里居住着很多高级别的英国官员。90 多人在爆炸中丧生。

这些袭击加速了英国从该地区的撤退。1947 年,距离 1923 年的托管规定时间还有一年,英国就把巴勒斯坦问题转交给了联合国。当联合国要求英国延长托管,超过 1948 年有效期时,伦敦拒绝了,伦敦表示,它计划从巴勒斯坦完全撤出。代价太高了,和平解决的前景又太遥远了。甚至在大卫王饭店袭击案发生之前,英国财政大臣休·道尔顿(Hugh Dalton)就致信首相克雷芒·艾德礼(Clement Atlee):"当前的状况不仅让我们在人力和金钱上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而且,正如你我共同认为的,从战略的角度来看,维持这种状况没有任何实际价值——在任何情况下你都不可能在蜂巢顶部有一个安全基地——而且这让我们的年轻人,为了并不美好的目的,忍受着令人讨厌的经历。"英国殖民大臣也与此相似地把巴勒斯坦看作是"套在我们脖子上的碾石"[38]。

英国在亚丁(也门城市)经历了相似的过程。19 世纪中叶,英国在亚丁建立了一个海军基地。后来还加上了一个炼油厂和一个机场。亚丁港成为正式殖民地,英国与地方酋长们合作在周围地区建成了一个保护领地。反对英国在阿拉伯半岛存在的声浪于 20 世纪 50 年代日益高涨,60 年代初开始出现了针对英国平民和军事目标的恐怖袭击。1964 年,英国人宣布支持于 1968 年成立独立的南阿拉伯联盟(South Arabian Federation),他们还表示将继续控制亚丁港,在该地区维持驻军以便帮助保卫新国家。恐怖袭击只是进一步强化了——包括一次针对在英国

空军基地举办的儿童聚会的手榴弹袭击。1966 年,伦敦宣布,它将从该地区完全退出。最后一批英国部队于 1967 年完成撤退。

恐怖主义并不总是能够有效磨损英国的意志。例如,在马来亚,英国坚守阵地,清除了恐怖袭击,英国根据自己的时间表进行撤退,并把控制权交给了自己选择的党派。爱尔兰共和军对英国本土目标的恐怖袭击在迫使英国退却方面也证明是无效的。尽管在伦敦的零星爆炸已有好几年了,但英国一直在北爱尔兰维持着强有力的军事存在,并向着协商解决方向不断努力。然而,这个情况更接近于以色列的情况,因为北爱尔兰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the United Kingdom)的一部分,不是帝国的遥远附属物。此外,其人口的主体是新教徒,他们宁愿让北爱尔兰继续留在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之内。伦敦认为自己是在支撑着这个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民主传统,而不是在防卫遥远的殖民地,因此伦敦已经准备接受针对本土的恐怖袭击的代价。

阿尔及利亚人针对法国本土目标的袭击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案例,可以检验大国如何回击因为海外承诺带来的针对本土的恐怖主义袭击。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初阿尔及利亚为从法国手中独立出来所进行的斗争中,恐怖主义活动不仅发生在阿尔及利亚,而且还发生在法国大都市。虽然相当部分的暴力事件发生在相互竞争的阿尔及利亚各派内部,但是,阿尔及利亚反叛集团也在阿尔及利亚和法国本土实施针对法国目标的袭击。1954 年 11 月 1 日,民族解放阵线(Front de Liberation Nationale, FLN)对阿尔及利亚全境的法国军事设施和守军进行了袭击,从而标志着持续的恐怖战的开始。或许最引人注目的对法国大都市的袭击发生在 1958 年 8 月 24 日,当时,阿尔及利亚

反叛分子在一次协调行动中炸毁了马赛附近的石油仓库，该石油仓库正被用作为驻阿尔及利亚法军提供补给，他们还造成一辆火车出轨，并袭击了巴黎和里昂的警察局。

很难追溯这些事件对法国政策起到了什么样的明确作用。它们激发了阿尔及利亚境内法国群体的斗志，法国群体本身对阿尔及利亚人也发动恐怖主义袭击，并向巴黎施压，要求法国使用一切可能手段镇压叛乱。但是，在法国大都市本身形成的后果却变得更为复杂。随着阿尔及利亚的流血杀戮越来越多，并蔓延到法国本土，反战情绪开始上升。由于认识到法国人自己也在使用恐怖战术打击嫌疑叛乱分子，因此对战争的反对情绪进一步得到了加强。

虽然到了 1960 年，法国军队几乎赢得了打击叛乱分子的战争，但是，暴力事件和零星恐怖活动的持续爆发还是消磨了法国的意志。卫斯理安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教授马莎·克兰肖（Martha Crenshaw）总结说："恐怖主义作为使民族主义斗争成为国家和国际议题的一种方式，作为抵抗程度的一种标志，作为持久暴动之组成部分的摩擦战的一种战术，它在开始时对于民族解放阵线来说是成功的。在整个冲突过程中，恐怖主义成为对法国政府和法国公众的恒定提示，提醒他们在阿尔及利亚的安全是脆弱的，即使法国有把握获得军事胜利，两个群体也永远都不会联合。"[39]法国人在如何才能最佳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上存在着深刻的分歧，这加重了法国的政治代价。

1959 年 1 月，查尔斯·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重新回到总统宝座之后，确信法国撤出和阿尔及利亚独立是惟一的出路。戴高乐解释说："非殖民化符合我们的利益，因而是我们的政策。既然殖民化代价高昂、充满血腥、永无宁日，我们为什么还要继续深陷殖民化呢？"[40]第二年，法国结束了导致法军撤出和阿尔

及利亚独立的谈判。克兰肖写道:“民族解放阵线的顽强坚持及其不断发动低度摩擦战的能力终于有了回报。法国接受的不仅是民族解放阵线的全面独立和对它的承认,而且还作出让步答应了民族解放阵线的两个要求,这两个要求拖延了谈判进程,延长了与谈判相伴的恐怖主义,它们是,阿尔及利亚境内欧洲人少数群体未来的权利和对撒哈拉石油的控制。”[41]

美国对于袭击其海外目标的恐怖主义的反应,进一步证明了这样的命题,此类袭击有可能导致收缩退守,而不会导致海外参与和国际主义热情的高涨。1983 年 10 月,恐怖分子炸毁了在贝鲁特执行维和任务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军营,炸死了 241 名军人。美国迅速将部队撤出了黎巴嫩。国防部长卡斯帕·维因伯格(Caspar Weinberger)很快宣布,从此以后,美国只有当“致命利益”(vital interests)处于危险之中和“有明确取胜意图”时,才会进行军事干涉。这个原则的公布,通过限制对维和使命和边远地区冲突的参与,有效约束了美国的海外承诺。

1993 年,美军在索马里遭受到了死亡的厄运。尽管士兵是在战斗中,而不是在恐怖袭击中倒下,但是敌军战士与奥沙马·本·拉登的网络有联系。此外,几名军人的尸体在电视镜头面前被拖着走过摩加迪沙的街道,从而强化了它在美国的政治影响。再一次,华盛顿从该国撤回部队,克林顿政府起初对维和的热情迅速减小。

2000 年 10 月,停泊在也门亚丁港的美国海军“科尔号”(Cole)驱逐舰遭到炸弹袭击,对此,美国以相似的行动路线进行了回应。美国海军实际上停止了对该港的使用。一组 FBI 调查人员被派往也门对事件进行调查。然而,在他们能够完成任务之前,华盛顿从该国撤回了这些政府代表,因为有情报警告说有可能再次发生恐怖袭击。与此同时,美国海军陆战队正在与约

旦部队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他们也突然中止演习,离开了约旦。停泊在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司令部的舰只,也撤出港口,停在海上。正如托马斯·弗里德曼在《纽约时报》中所评论的,“对于所有这些举动,有一个军事术语,叫做‘撤退’。”[42]

这些行动总体上都与军事行动的标准程序相一致。当外国的安全形势变坏时,美国通常敦促其国民离开,撤出所有不重要的外交人员,并在大使馆周围设立路障。当对阿富汗的轰炸袭击开始时,美国关闭了在沙特阿拉伯的大使馆,减少了在其他穆斯林国家的外交雇员。这些步骤是可以理解的和有道理的。美国不应冒不必要的风险,而应寻求免于危险的自我保护。

但是,恰恰是这个逻辑说明了,恐怖主义从长期来看有可能侵蚀而不是促进美国的国际主义。当地人民愿意为本土自治付出的代价,通常要高于外来者愿意为维持在该土地上的存在而付出的代价。这是殖民帝国最终崩溃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是为什么美国离开军事前哨的原因,在那里——如菲律宾,美国不受欢迎。它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士兵在伊拉克每天遭袭的情况迫使布什政府缩减了占领的范围和时间。而且,这个逻辑还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可能判定至少某些海外承诺的成本要超过收益。

在世界大多数地区,包括中东,美国受欢迎的程度当然要远远多于受憎恨的程度。主要原因在于,美国不是一个怀有掠夺意图的帝国;相比以牺牲他国为代价扩大自己的权力,美国更关注于加强地区稳定和安全、保护国际贸易。美国当然有强烈的理由继续全面参与中东事务,维持对该地区石油的使用,确保以色列在中东各国中的安全。恐怖袭击和其他反美情绪的示威运动,不可能在很快的时间内迫使华盛顿质疑对这些优先安排的职责承诺。20世纪的历史清楚说明,当被挑衅时,美国将是一

个坚定顽固的敌人。

但是另一方面，美国历史也同样清楚地说明，来自内部的敦促美国远离其他国家事务以便其他国家远离美国事务的声音具有很强的政治和情感魅力。倘若全球参与的代价上升，并不断导致对美国本土的袭击，那么要求美国与中东麻烦保持距离的呼声就会加强。有一种观念认为，避免恐怖主义的最佳方式就是避免可能致使它开始的行为，即便这种观念具有某种程度的失败主义特色，但是它还是具有很强的逻辑吸引力。

鉴于纽约和华盛顿遭受恐怖袭击之后出现的爱国热情，几乎没人讨论美国应如何改变——或限制——对中东的参与，以便减弱该地区的反美情绪。国民情绪最初使美国报纸的编辑们不愿发表有关这个主题的文章。[43]但是，对这个问题展开广泛对话、努力减少美国在中东的暴露，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9·11"事件及其后续发展的结果。这是以色列总理阿里埃勒·沙龙(Ariel Sharon)警告美国不要"以我们为代价姑息阿拉伯人"的主要原因之一，他还援引20世纪30年代西欧对希特勒的绥靖进一步指出："以色列不会是捷克斯洛伐克"[44]。这也是为什么，特别是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战役已经成功推翻塔利班和萨达姆·侯赛因政权之后，美国人开始辩论是否应该减少美国在沙特阿拉伯的军事存在的原因。[45]

尽管可能没有意识到，但本土防御的新焦点却可能有助于促使美国变得更加内向。改善国土安全的措施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在两个重要方面，它们有效地使美国远离了余下世界。第一，美国已经把自己围在高大堡垒和严密边境之内。飞机和舰只在海岸巡逻。更严格的移民政策和更多的监视意味着更不易渗透的边境。从意图和结果来看，这些步骤隔离了美国，为其提供了反对外来威胁的保护性缓冲区。第二，用于防御本土的新

资源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以牺牲用于海外使命的资源为代价的。美国士兵和飞机在美国国内和附近花的时间越多,他们在遥远战场上为维持和平花的时间就越少。

最后一个问题有关针对美国本土的恐怖袭击会如何影响美国更广泛的公众心理以及选民对国际主义的兴趣。短期影响是一目了然的。美国公众十分支持军事报复。整个国家非常凝聚，展现了决心和团结。民意调查显示，公众恢复了对政府的信任。[46]自愿活动和慈善捐助的激增标志着市民精神的极大提升。

然而,较长期的前景却指向了反方向。大多数涉及长期反恐斗争的活动并不适合于激励整个国家。最有效的措施包括执法、情报和秘密行动;反恐中没有也不会有反攻日(D-Day)。美国的军事实力将会时常承担重担——就像在阿富汗。但是,它的优势力量会偶尔被隐蔽的敌人所抵消,从而使胜利难以度量,使斗争前景变得漫长且倍感挫折。以任何标准来看,美国都敏捷巧妙地赢得了对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战争,但是,他们同类中的很多却已经逃之夭夭或正在逍遥法外。还有,最大的成功在于那些虽经大肆宣扬但结果并未发生的事情,并因而得不到报道——如被成功阻止的恐怖袭击,或者甚至从来都没有计划过的恐怖袭击。

美国也不会集体地卷入反恐斗争。在恐怖袭击发生后的几个月,虽然家家户户窗户上挂起了国旗,但是在征兵站里却没有人排队。航空公司数百架次的飞机只能空飞,因为没有乘客,人们宁愿呆在家里。很多美国人不是被要求进工厂为战争作贡献,而是被解雇回家,因为恐怖袭击加剧了经济衰退。不论是好是坏,反恐斗争都可能只是强化了,而不是削弱了美国的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倾向。

## 开创一个新的美国国际主义

虽然过去和现在都表明孤立主义与单边主义倾向会在未来几年有所抬头，但是他们还显示，对自由国际主义的抛弃也绝非命中注定。挑战在于寻找到新的平衡，即美国国外参与程度与国内新政治必须不断维持的一种平衡。为此，需要找到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适当结合，平衡相互竞争的地区利益和文化，让外交政策远离从美国早期开始就一直使之扭曲的政党斗争。

因此，今天的领导人必须以富兰克林·罗斯福为榜样，在做得太多和做得太少之间寻找中间道路。犯两个极端中任何一个极端的错误都是同样危险的。一方面，没有制约的单边主义会把盟国变成反对者。追求没有足够政治支持的国外参与也将是一种过度扩张(overextend)，并有招致反对和向孤立主义迅速回归的危险——这恰恰是伍德罗·威尔逊所经历的情况。另一方面，从一开始就退却，急剧减少美国的全球作用，则只会助长自鸣得意和慢慢滑向幻觉中的与世隔绝，在大部分历史中美国整个国家都觉得这些东西实在太有吸引力了。两者之间就是中间地带，就是新的更强调差别对待的自由国际主义，在此基础上可以长期建立并维持一个新的更强调选择性的大战略。就像罗斯福那样，宁要能够实现的最小值，也不要无法得到的最大值。

为实现这个目标，第一个要做的就是明确认识手头任务的艰巨性和重要性。缺乏深思熟虑的努力，就不可能找得到新的平衡点。新国际主义和与之相配的大战略不会自动出现。然而，克林顿政府好像心不在焉，它被美国经济的实力和单极时刻会青春常驻的感觉所误导了。布什团队可能集中精力于反击恐怖主义——这是一个有价值的事业，但却可能继续使之无法关

注其他同样重要的问题。即使当布什真的重新回到更广泛的议题时，他也可能就像执政之初那样，摇摆于做得太多和做得太少之间。布什的顾问以及更一般意义上的共和党，分裂为两个对立阵营，分别代表这两个极端。

一个极端是新保守派，如沃尔福维茨，以及外界分析人士威廉·克里斯托弗(William Kristol)、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国防政策委员会(Defense Policy Board，为国防部长提供独立建议的官方机构)主席理查德·帕尔(Richard Perle)。像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这样的鹰派保守主义者倾向于与新保守派站在一起。他们支持的外交政策倾向于单边使用美国武力，旨在通过积极抵制替代权力中心的崛起来尽可能长久地维持美国霸权。另一个极端是更传统的保守派，如康多莉扎·赖斯和科林·鲍威尔。他们对美国权力的投放更谨慎，认为美国应该避免干涉边远地区的小战争，节俭使用资源，集中力量于本土防御，关注主要行为体——欧盟、俄罗斯和中国。

布什总统本人向保守的"少做"阵营倾斜。他在整个职业生涯中对外交事务鲜有兴趣。作为总统候选人，布什传递的主要信息是，他在承担国外责任方面会比前任更有选择性。在波士顿总统竞选辩论期间，布什指出："我会在方法上非常谨慎。我不认为我们能够为世界上所有人民做所有事情。我认为我们在指派军队作战时必须极其小心。"[47]"9·11"事件后，布什似乎接受了新保守派更为强硬的立场。但是，恰恰是因为布什在外交事务方面相对没有经验，没有提出自己的强烈倾向，因此，他才可能被人在新保守派的单边主义和内陆中心地区保守派的内向追求本性之间拖来拖去。事实证明，布什不能仿效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技巧，让对抗阵营彼此争斗，从而确立稳定的中间基础。

布什需要在共和党对立两翼之间进行仲裁，他不仅被这种

事情弄得很狼狈，而且就像在他之前的所有总统一样，他还要调解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的冲突。克林顿实际上在调和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问题上做得非常出色。经过艰难的起步之后，他巧妙地控制了传统安全议程，一再把美国士兵派往巴尔干地区和波斯湾作战。克林顿把有限战争的选择重新带回到美国军事部门，他逐渐习惯了以一种与处于危险中的有限利益相称的方式使用有限力量。通过这样做，他有效地推翻了五角大楼先前的，科林·鲍威尔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时留下的，“不全则无”(all-or-nothing)的方法。

同时，克林顿提出了一种具有明显理想主义色彩的新议程——管理全球化、保护环境、解决发展中世界的健康危机、扩大国际制度的作用。他还认为，其他权力中心的崛起将最终有助于美国的利益——尽管在欧洲防务力量问题上，他难以按照自己的这种理解行事。正如塞缪尔·伯杰对克林顿观点所做的描述，“他理解，老的主导冷战的胜-败范式已经不再充分。如果欧洲变得更强，那对我们是好事，不是坏事。如果拉丁美洲走向统合，那对我们也是好事，不是坏事。”[48]一位评论家把伯杰本人看作是这种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均衡的源泉，“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威尔逊式的理想主义者或亨利·基辛格式的现实主义者。他已经拒绝在自行其是的保守主义和自由国际主义之间进行选择。”[49]

虽然克林顿团队成员在实践中有效地综合了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但是，他们从来都不是在自我意识的指导下这样做的——亦即，他们从来没有清晰界定出一套能够为行动提供理念基础的指导原则。而没有这种理念逻辑性的结果是，克林顿外交政策的整体远远小于各个部分之和。克林顿政府可能在很多具体政策方面都是正确的，但是，这些政策并不能叠加为一个

协调一致的大战略。此外，正是因为克林顿未能用一套清晰的、能够传授给选民的指导性战略原则武装自己，他才没能，甚至没有着手为新的美国国际主义奠定基础。

布什的问题与克林顿不同。他一直遵循着没有受到理想主义志向影响的现实主义议程，因此，他从容地实施着一个与当前并不适合的完整的外交政策。他的团队最初几乎排他性地集中精力于传统的均势议程：重建美国的军事实力、部署导弹防御体系、进一步加强同欧洲、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的长期联盟关系、准备同中国展开竞争。随后，恐怖袭击事件迫使美国重新调整议程，反恐战争成了头等大事。但现实主义倾向在继续发展。沃尔福维茨声称要"终结"所有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布什团队警告世界各国，他们必须作出黑白分明的选择——要么支持美国，要么反对美国。美国在寻找可以实施报复的国家，对此，讽刺性报纸《洋葱》（*The Onion*）嘲弄道："布什总统直接恳求奥沙马·本·拉登建立一个国家，这样美国就可以对其进行攻击了。"[50]

布什的确与其团队的好战本性拉开了一定距离，他坚持忍耐，选择慎重的军事回应。但是他的赤裸裸的现实主义依然有悖于时代潮流。虽然它可能证明很适用于当今世界传统安全议程仍占主导地位的某些地区，如东北亚，但是它却不能给余下世界提供多少东西。欧洲的地缘政治分裂带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拉丁美洲和东南亚正在集中精力进行地区整合，而不是实现均势。多边主义在所有三个地区都非常盛行，这解释了为什么美国的单边主义倾向不受欢迎。

布什版本的现实主义在处理中东问题方面也是不适用的，中东地区已经证明对美国安全构成了最紧迫的威胁。恐怖主义的根源在于社会和宗教分裂，而不是地缘政治分裂。虽然中东

地区的大多数人并不支持恐怖主义,但是他们的反美情绪非常强烈,很多政权在国内面临着来自自身的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威胁。中东地区的政治生活并不是黑白分明那么简单;各个国家除了均衡行事别无选择,他们时而与美国站在一起,时而又与美国保持距离。美国也是一样,不时发现容忍与恐怖活动有牵连的政权——如巴勒斯坦当局——是个不错的权宜之计。与中东相似,非洲也面临着艰难时刻,但是,非洲的问题源自于宗教和种族冲突、贫困和疾病,而不是地缘政治对抗。战争的确在世界的发展中地区不断爆发,但是,它们可能恰恰是布什团队已经表示他们不愿参与的较小规模的种族和国内冲突。如果尝试让整个世界符合刻板的现实主义模式,那么布什团队将会发现其处理全球事务的方法早已过时。

布什政府的现实主义倾向还妨碍了它开创一个新的美国国际主义的能力。现实主义为教育公众提供了一个有吸引力的模式。它易于理解和掌握,因为它用清晰的非友即敌的术语来描述世界。而且,它能够有效地动员政治支持,因为它对全球问题采取一种黑白分明的方法。次要威胁和新的安全议题——环境、维和、健康、经济发展——都不是美国的事情,因此,美国公众非常高兴地避而不听。对福祉构成的主要威胁才是美国的使命所在,当这些威胁出现时,它们能够马上引起美国公众全心全意的关注和牺牲。

但是再一次,世界并不配合这种简单性。在一个以极其复杂为特征的世界中,美国对参与问题采取一种非此即彼(either/or)的方法是十分可笑的。现实主义可能为新的美国国际主义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基础,但是,这种现实主义却根本不适合于迎接美国正在面临的挑战。核心的问题不是是否参与,而是如何和在何种程度上参与。在这个意义上,美国领导人别无选择,只

能与选民一起进行指导外交政策所需的谨慎评估与判断。美国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分裂带暂时模糊、盟友和敌人的身份不确定、对美国施暴的主要罪犯甚至能够在实施破坏之前躲进山区隐匿处。对于寻找时髦用语的政治家来说,这是一个不同的世界。惟一的负责任的替代方案,是用理念的清晰对抗政治的模糊。

重新思考美国外交承诺的性质在这一点上具有重要意义。这里,历史再一次提供了有益教训。威尔逊未能确保美国参加国际联盟,并不是因为他希望美国扩大对其他国家的承诺,而是因为他希望扩大的是约束性(binding)和自动性(automatic)承诺。参议院最终证明不愿支持这种制约。相比而言,罗斯福成功赢得对联合国的支持,恰恰是因为他非常清楚地知道,要想赢得美国公众对联合国机构的认可,联合国宪章下美国的承诺就必须留有余地,允许作出不同解释。在缺乏主要对手的情况下,美国人并不喜欢受到约束。

布什和他之前的克林顿都未能吸取这个重要教训。他们继续依仗包含约束性和自动性防御承诺的联盟关系作为政策的主要工具。这种联盟关系在东北亚是可靠的,那里,地缘政治分裂带继续威胁着美国的长期伙伴,如韩国和日本。但是,在欧洲并不存在这样的分裂带,欧洲进行中的北约扩展面临着搁浅的危险,它可能恰恰遇到同样的已经让国际联盟沉没的国内政治暗礁。如果布什对于在巴尔干地区维持美国驻军持怀疑态度,那么他肯定很难解释,为什么他想要为十几个现在急于成为北约成员的国家赐予法制化的防御保证。相比而言,一方面,如果美国能够对战斗挑挑拣拣,另一方面,如果美国人很快发现他们自己把严格承诺扩展到了在地图上根本找不到的国家,那么,肯定前一种情况比后一种情况更能够让美国继续保持对欧洲的接

触。在考验新的国际主义的局限时，布什的明智做法是记住罗斯福的格言：少就是多。确保能够实现的最小值，要好于过度扩张、空手而归。

美国的傲慢进一步使寻找新的更强调区别对待的国际主义的任务变得复杂。美国面临的挑战是很少有大国能够有效管理的挑战——即接受替代权力中心的崛起，心甘情愿地向他们割让影响力。这种影响力转让的主要障碍之一是美国的国内政治。政治家担心，特别是当反对者随时准备以国耻来指责他们时，如果他们表现软弱，或者过于通融，那么他们就会付出代价。美国的政策，恰恰因为其对国际责任的长期暧昧态度，可能比其他国家更易于适应不太崇高的地位。但是，美国精英和公众一样，已经早就习惯了发号施令，这样，当其他国家挑战其优势地位时，美国可能会继续怒发冲冠。因此，布什及其继任者面临的尴尬任务是，开创一个更强调区别对待的国际主义，同时不能激发顽固的单边主义。把美国战略包装成随心所欲减轻负担，而不是在他国压力之下走向撤退，将有助于这方面的公共外交。

要开创一个新的自由国际主义，不仅要正确理解其意识形态内涵，而且还要平衡美国不同地区彼此竞争的文化和利益。美国历史已经清楚说明，孤立主义和单边主义两股潮流时常在美国的所有地区表现强劲。某些地区既不属于不可挽回的孤立主义，也不属于顽固不化的单边主义。相反，包括自由和自由意志两种分支在内的孤立主义和单边主义都深深地置根于美国的信仰。他们在特定地区的显著程度随政治和经济力量的转换而有所不同。因此，孤立主义和单边主义声音将会继续出现在政治话语中。各种各样的政治家和团体既因为意识形态原因，也因为工具性原因，被二者所吸引。挑战将在于，通过谨慎管理地

区联盟,通过打造温和的国际主义,消除孤立主义者和单边主义者的政治吸引力,来使这些极端主义走向中和。

国际主义联盟赖以形成的地区排阵继续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罗斯福协调形成的北方和南方的国际主义联盟已经在20世纪70年代解体了。解体的原因是在越南战争和市民权利方面南北存在分歧。南方是坚定的反共产主义者(并因而支持战争)和社会保守派。北方倾向于反战,持社会进步立场。越南战争结束后的国际关系缓和期暂时抑制了北南联盟解体的政治后果。但是当缓和让位于80年代初期再度复兴的冷战对抗时,地区排阵便再一次变得具有决定性意义。

罗纳德·里根总统将南方和西部组合成了一个新的联盟,这个联盟成为里根军事建设和强硬政策的政治基础。这个新的地区联盟本身的基础在于,共同的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军事开支给两个地区带来的利益、以及对自由贸易的共同支持。与此同时,更为自由主义的北方对里根强硬政策的必要性缺乏信心,从军事开支中获取的收益少于南方和西部,并经历了一个工业衰退期,从而减弱了对自由贸易的支持。随着经济活力和人口不断由萧条地带(rust belt)移向阳光地带(sun belt),对经济开放的支持也发生了相应的位移。[51]

在冷战结束以及与之相伴的经济好转的十年中,地区利益总体上相互比较协调。保护主义压力因全国经济的繁荣而减轻。由于国防部门在苏联瓦解之后因削减而处于蹒跚状态,加上美国政府拥有很多预算赢余,因此增加额外的军事开支并没有遭到多少反对。虽然把伊拉克赶出科威特的战争和给巴尔干带来和平的战争在国会内引起了激烈争论,但是伤亡极小的胜利制约了它们对支持国际主义的直接影响。恐怖分子袭击纽约和华盛顿之后,美国更是一心一意地支持军事报复行动。

在这些条件下，里根促成的南方与西部的联盟，尽管形成于反对“邪恶帝国”(evil empire)，但并没有因为“邪恶帝国”的消失而瓦解。他确保乔治·布什在2000年11月赢得大选，从而非常精明能干为共和党作出了贡献。南北差异可以一直追溯到共和国早期，南方和内陆西部相对而言更为保守、更为现实主义、更被布什的民粹主义所吸引，而北方和沿海西部则更为自由、更为理想主义、更被阿·戈尔的政策才干所吸引。

地区文化和利益冲突肯定会在未来几年进一步加剧，这部分是因为，美国各个地区在政治上正日益走向分裂。新英格兰地区曾经拥有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的健康组合。例如，1985年，该地区的几个州(缅因州、佛蒙特州、新罕布什尔州、马萨诸塞州、罗德岛州和康涅狄格州)向国会众议院输送了14位民主党人和10位共和党人。但是到了2001年，同样这些州选送的代表分别是17位民主党人、5位共和党人和1位独立人士。山区西部的情况正好相反。2001年，蒙大拿州、内华达州、爱德华州、犹他州、怀俄明州、科罗拉多州、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输送了7位民主党人和17位共和党人到众议院——1985年的组合完全一样。尽管该地区的人口在增加，但仍然很难在内陆西部找到民主党选民。这些趋势肯定会妨碍建立跨地区和跨党派联盟的努力。这对于美国的参与而言，不是好消息，因为罗斯福已经清楚地说明了，此类联盟对于建立和维持自由国际主义是何等的重要。美国领导人不是依赖中间主义共识，确保路线稳定，而是被地区分裂所阻碍，被选择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两个极端的国内压力所左右。

与此相似，美国各个地区的经济利益将会继续存在分歧。东北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是欧洲，中西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是加拿大，西部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是亚洲，南方地区的贸易则几

乎在欧洲、亚洲、墨西哥和加拿大之间平分。结果导致了关于美国贸易议题的地区分歧。地区经济基础的构成，以及工业、农业和服务部门的相对政治分量，进一步加重了地区分裂。正像合众国创建以来一直表现的那样，分裂的经济利益造成的冲突，不仅事关贸易政策，而且还事关美国海外战略承诺的性质和范围。

缓慢的经济和较高的失业肯定会进一步加剧这些地区的分裂。发展地区和滞后地区可能在自由贸易问题上意见不一。东北和西部沿海地区的金融群体和互联网部门会积极推动自由化。同时，纺织、服装、以及像汽车、飞机和钢铁这样的工业部门将要求获得保护。美国汽车制造商已经因进口而丢失了很多市场份额，这些部门的工作也倾向于减少。波音公司因恐怖袭击之后对商业飞机需求的下降而处境艰难。布什总统曾经在2000年大选中赢得了西弗吉尼亚州，并几乎在宾夕法尼亚州取胜，因此，他在2002年3月为了保护美国制造商而选择对进口钢铁征收高额关税，就一点也不足为奇了。农业部门本身就是分裂的，中西部地区的谷物生产州一般支持自由贸易，而佛罗里达州的柑橘和蔗糖生产商则反对自由贸易。这些都很可能造成复杂而脆弱的地区排阵。

在有关武力使用问题上的地区分歧也有可能扩大，既是因为文化原因，也是因为经济原因。在好多方面南方在军事领域代表过多。南方向武装服务部门派送的人与其人口不成比例地多。例如，1998年，南方各州占美国人口35%，但却提供了全国新兵的43%。[52]从军事基础的角度来看，南方超重了。南方各州大约占美国土地面积的25%，但却拥有国内军事设施的36%。[53]南方从军事开支中的受益也远远多于其他地区；在2000财政年度，全部军事合同中的45%是同南方签订的。[54]

这带来了重要的政治影响。在克林顿时代，军事部门被民

主党疏远了。克林顿在越战期间逃避兵役是一个不幸的开始。接着,克林顿有关军中同性恋的立场、因长期海外部署而导致的资源短缺、士气低落,使他同武装部队的关系进一步紧张了。调查还显示,在军中占主导地位的保守价值观与民主党更为自由的立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55]

共和党人可能会继续利用民主党同武装部队之间的疏远关系。布什总统上任后的首要举措之一就是承诺为军事人员长工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最初因寻求推行一系列改革而疏远了武装部队,但是,随后不久,他向后退让,为现役军人提供了更多的灵活余地。共和党人还试图对五角大楼倾向于反对执行维和与人道主义使命作出回应。在整个克林顿年代,军队一直抱怨这些任务让武装力量分心,还同核心使命争夺匮乏的资源。加强本土防御和打击恐怖主义的新焦点肯定会确保军队既有较高水平的资助(布什在2002年初宣布,国防开支增加480亿美元),又有新理由抵制执行"非根本"使命,如维和。

在以农业为主的南方和内陆西部,民粹主义传统一直很强,布什积极回应军队的要求,与这种传统形成了极佳的契合。这些地区的居民支持高水平的国防支出,当美国与威胁美国安全的强敌——纳粹德国、日本帝国和苏联——进行战斗时,他们是强烈的国际主义者。[56]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他们热情高涨地支持对袭击美国本土的恐怖主义罪犯实行报复。

但是,当美国在只有有限利益的地区发动有限战争时,这部分选民却极其缺乏热情。部分原因可能是,他们的儿女会参加战斗中的大部分工作;相比东北较富裕的家庭,南方较低收入家庭更多地把孩子送到了武装部队。[57]尽管最初时对于使用军事力量打击恐怖主义决心很大,但是,这些投票人可能会厌倦在中东的山区和陋巷追剿极端主义者。至于恐怖主义对国内自由的

潜在影响，南方和山区西部的很多人感到不快。一位科罗拉多州居民大叫说："来了——我们的政府正试图在国家危急的名义下再次拿走自由。他们可以在机场增加一些检查，但是超过这个——没门。"[58]鉴于恐怖主义威胁的性质和它对国内自由的影响，从长期来看，美国人世代继承的杰弗逊和杰克逊传统会认为，解决恐怖主义的最佳办法是提高保护屏障，减少美国海外承诺的范围。

南方和山区西部是代表布什总统的主要选区；因此民粹主义倾向肯定会诱使共和党对在边远地区使用武力采取更克制的态度。这些地区的居民还倾向于怀疑国际制度，更喜欢单边倡议。与之相比，北方可能会固守更现实主义的根基，更喜欢多边主义，并继续支持人道主义使命——甚至当这些倾向需要高水平的国防开支时也是如此。当国会对科索沃战争投票表决时，这些地区差别便明确显现出来；南方和山区西部一般投票反对空袭，而东北地区则支持空袭。[59]

南方和西部人口增长比北方更快的事实，也会使这些地区及其民粹主义倾向对外交政策发挥更大的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北方地区的人口以7%的速度增长，而南方地区和西部地区的人口增长速度分别是17%和20%。2000年，北方占美国人口的42%，南方和西部分别占36%和22%。据估计，到了2025年，北方将只占全国人口的38%，而南方和西部将分别占37%和25%。[60]

美国社会种族构成的变化也有可能加大地区分化。美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移民国家，并显示了令人瞩目的将一波又一波新来者融入美国主流的潜能。即使移民与母国保留着很强的个人和文化纽带，他们的政治忠诚也会变得明显美国化。坦诚地说，几乎每个种族群体都在华盛顿设立了一个游说部门（如果不

是好几个的话)。但是,所有背景的美国人,尤其是当他们进入外交政策领域时,很大程度上都致力于形成共同的国家利益观念,而不是排他性地迎合各种独特种族来源的国家利益观念。

然而,国家利益的大熔炉(melting pot)理论可能快到末日了。少数群体当他们达到足够规模可以成为主流时,便不再完全融入多种族的主流了。非西班牙裔白人在美国人口中的比例持续减小。他们可能到2060年时不足全国人口的50%,到21世纪末则只占40%。分类表中上升的一方是西班牙裔美国人,他们到2060年将占人口的1/4,到21世纪末则占1/3。非西班牙裔黑人和亚洲人的增长率明显较慢。亚洲人,现在占人口的4%,到2025年将上升到7%,到2060年为10%。非西班牙裔黑人可能稳定维持在大约人口的13%。[61]

西班牙裔和亚裔美国人倾向于集中居住在美国的某些个别地区——西班牙裔在西南地区,亚裔在西海岸地区,这可能会使新兴世代的种族认同和利益比前面几代分量更重。到了2025年的时候,白人将只占加利福尼亚人口的33%,西班牙裔占42%,亚裔占18%,黑人占7%。相似的变化也发生在其他一些州。到2025年时,得克萨斯州将有46%白人和38%西班牙裔,新墨西哥州将有40%白人和48%西班牙裔。[62]

西班牙裔和亚裔在某些特选州的聚居,增加了这些群体的政治影响力,尤其是因为像加利福尼亚和德克萨斯这样的州在选举方面是极其重要的。在选举团(electoral college)中,加利福尼亚州和得克萨斯州共有86张选举人票,几乎占候选人为赢得总统职位所需的270票中的三分之一。有关北约扩大的辩论已经清楚地揭示,种族聚居在拥有大量选举团选票的各州,为这些种族的利益赋予了显著的影响力。如果波兰、捷克和匈牙利血统的美国人在很多州内平均分布,那么当20世纪90年代下半

段美国政府考虑他们的母国是否应该被邀请加入北约时，他们就几乎没有什么发言权了。但是，因为他们聚居在中西地区人口稠密的摇摆州(swing states)内，并组织了有效的游说，因此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发挥了显著影响。[63]接下来的结果可能是，美国越来越多的西班牙裔人口将对美国外交政策发挥主要影响。如果总统候选人想要赢得加利福尼亚州和得克萨斯州——关键的选举争夺目标，那么他们就必须争取得到西班牙裔的选票。

不同种族群体寻求以增加各自特殊利益的方式影响美国外交政策，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他们经常发挥影响，而且还会继续发挥影响。这是多种族社会中多元民主的特性。但是，美国变化中的人口可能会给种族政治赋予新的意义，给美国国际主义带来重要影响。

美国拉丁美洲裔的人口规模可能会对美国国际主义的主旨和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产生直接影响。西班牙裔社区内进行的民意调查决不是决定性的。但是，它们的确说明了他们的优先取向与美国领导人作为一个整体的优先取向存在着巨大分歧。例如，西班牙裔领袖“对传统国防政策和军事联盟关系表达的承诺更无力”。只有8%的拉丁美洲裔领袖，相比美国全部精英中的60%，把对盟国的防御看作是“非常重要”的目标。85%的西班牙裔精英认为，美国应该更关心它同拉丁美洲的关系。美国的对外关系并不是一种零和(zero-sum)。但是，有限的资源却意味着，更多关注拉丁美洲可能会以减少对其他地区的关注为代价。[64]

美国的潜在割据也可能使为整个国家开创一个可持续的、共同的国际主义的任务变得更复杂。如果西南地区主要关心拉丁美洲，西海岸地区主要关心太平洋，东海岸地区主要关心欧洲，那么在美国国家利益由哪些因素构成的问题上就很难达成

共识。如果在一直割裂美国各个地区的文化和经济分裂线之上，再加上种族、甚至语言分裂线，那么，地区分歧就会侵蚀对于形成国家目的感至关重要的社会构造和统一认同。可能的结果是，出现政治僵局、国际主义联盟变得更难建立和维护、并滑向孤立主义和单边主义政策。

劳动力移动的确有可能消除不断加强的种族地区分裂。各个地区对劳动力需求的转换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促使美国大熔炉起效。在1800年代向西输送移民和定居者、在1900年代前半段工业化和城市化期间使劳动力由南方向北方移动、在20世纪下半叶又把他们送回到南方和西部的阳光地带，劳动力移动导致的相互混杂在美国发展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它促使美国成为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政体，拥有共同的身份和伦理，而不仅仅是成为一个松散的各州联邦，每个州各有自己独特的认同和观念。

但问题是，数字时代并没有跟工业时代一样带来相同的劳动力移动。信息革命不会像工业化那样发挥相同的综合功能，这恰恰是因为，它使个人和公司在决定定居何处时能够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在工业时代，公司选址靠近对于其经营至关重要的原材料或交通枢纽所在地。劳动力储备进行相应的移动，它从根本上迫使人们为了寻找工作离开他们喜欢的居住地。正如厄恩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在《民族与民族主义》一书中详细阐述的，工业化以及工业化带来的迁移和同质催生了现代民族国家。工业化是点燃大熔炉的燃料。[65]

在数字时代，公司和工人会更频繁地决定他们想要去哪里定居，而不是必须去哪里定居。在选择到哪里生活方面，美国人比过去会更多地看重诸如生活风格、靠近家庭、文化氛围或气候等因素。这些考虑因素甚至在数字技术广泛使用之前就已经很

重要了。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移居到南方的北方人在政治观点上比北方人口作为一个整体更为保守。[66]数字经济肯定会加强这种趋势，还有可能加强地区间的文化或种族分裂。新美国基金会（New American Foundation）的麦克·林德（Michael Lind）解释说："随着自由的南方人向北迁移，保守的北方人离开波士顿或纽约迁移到环境更宜人的亚特兰大或达拉斯，美国人的地理移动可能实际上通过鼓励自愿划分而加强了地区次文化。"[67]因此，地区文化和利益肯定会随着数字时代的发展而分道扬镳。在最低限度上，这个情景使开创一种共同的国际主义、抵制孤立主义和多边主义两个极端的任务变得更难了。它还突出了为达到此目的而慎重构建政治战略的必要性。

为了防止日益增加的地区分裂妨碍新的、稳定的国际主义，美国需要刻意作出努力，确保外交政策及其国内根源远离政党政治的干扰。2000年总统大选的选举地图已经显示，这会很难做到，因为政党归属与地区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关于外交政策问题的政党角力在过去十年中有增无减，也是一个不祥的迹象，"9·11"事件之后出现的极其短暂的两党合作精神，更是一样。如果外交政策方面的地区分歧的确随着时间的发展而强化，那么总统候选人只会有更强烈的动机在构筑竞选平台时突出这些分歧。

避免政党关系对美国国际主义的扭曲影响，需要的恰恰是意识明确的政治停火。罗斯福时代的确使我们有理由希望，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一同坚持自我克制，把国家置于政党之上。不过，罗斯福背后有战争支撑，因此，战略紧迫性有助于他引导政治纪律性。今天的领导人不可能等待新对抗的出现来帮他们的忙。那样美国将错失当前的机遇，通过形成新的大战略和支

持这种大战略的新的国际主义来避免这种威胁。动机必须来自于对风险中的致命问题的远见和直觉。

除了政党合作，美国领导人还必须集中精力于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公众教育，尤其是对年轻一代的公众教育。在有关美国世界角色的问题上，调查数据尚未发现不同年龄段之间存在惊人差别。但是，最初的调查数据和常识说明，冷战结束后成长起来的美国人比他们的长辈更少关心地缘政治，更不认同全球事务中多边参与的重要性。大多数美国人对当前发生的事件知之甚少，更不用提那些凸显美国国际主义重要性的历史轶事了。美国大学中历史课要求的降低，只是使事情变得更糟。因此，一个雄心勃勃的教育战是必不可少的，它要求做到方方面面，从黄金时段的总统演说，到高中和大学的针对性科目，到各种组织如外交政策研究协会和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加倍努力。

第二个任务是重建有关大战略研究的智力资本。美国在过去曾经远见卓识地、明智地投资于教育，尤其是在硬科学(hard sciences)方面。结果，美国的实验室、工业、技术公司和军队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美国现在需要在培训外交官和战略家方面作出相似的投资，应该立刻寻求阻止智囊精英向其他职业流失，培养新一代研究大战略事务的公民。这样的培训当然应该包括接触一系列广泛的新问题——全球化、互联网、国际金融、本土防御和打击恐怖主义——这些都是当前变化中的战略环境的核心因素。此外，确保非洲裔美国人、西班牙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阿拉伯裔美国人、以及其他少数群体在这类项目中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也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要形成一个包容性和代表性的美国国际主义，那么这些群体就必须全面参与。

耶鲁大学在正确的方向上已经迈出了重要一步，2000 年它

开设了一个新的关于大战略的项目。本科生和研究生都参加。他们使用一系列分析工具思考大战略、大国的历史、以及大国管理秩序时的成功与失败。项目主任仍在向前摸索，试图弄清如何才能最佳地弥补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割裂、经济学家与战略学家之间的分野、思考与行动之间的距离。不过，耶鲁大学已经开始了尝试，这种尝试将有助于弥补关键的空白。

假定美国领导人决定积极应变，着手开创和维持新的国际主义，那么，他们在这样做时应该提出什么样的洞见呢？他们应该实施什么样的政策，以便为单极世界向多极世界的转变未雨绸缪呢？即使当权力和影响在北美、欧洲和亚洲之间更平均地分配时，美国应如何为稳定与和平奠定基础呢？21世纪，美国新的大战略应该是什么呢？

## 注 释

1. 作为本书中使用的一个术语，"民粹主义"外交政策基于三个原则。第一，外交政策的制定应该根据普通美国人的利益和判断，而不应仅仅根据华盛顿和纽约精英的利益和判断。第二，外交政策的实施应该致力于维护美国非集权形式的民主制度和公民的自由。对外志向应该得到相应的控制，因为它有可能会加强联邦政府的支配力而破坏国内自由。与此相似，国际制度也是令人怀疑的，因为它们有损美国的主权和自治。第三，美国应该只有在狭义意义上界定的国家利益受到直接威胁时才使用武装力量。在《天佑：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改变世界》(*Special Providenc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How It Changed the World* (New York: Knopf, 2001))一书中，沃尔特·拉塞尔·麦德(Walter Russell Mead)对民粹主义的杰弗逊学派和杰克逊学派作了区分。虽然现时代民粹主义思想与杰弗逊和杰克逊传统具有很多共同基础，但我还是喜欢用更宽泛的类属术语来指称，因为当代美国政治与早期美国政治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差别。例如，杰弗逊预想的是一个农业社会的美国，军事力量和国际雄心都维持在相当有限的水平上。在那个意义上，他对美国的构想变得过时了，因为美国实

现了工业化并发展成为一个主要大国。同样,杰克逊式的民粹主义与当代民粹主义相似,但决非相同。

2. 引自 Tim Weiner, "Mexican President Warmly Greeted in Washington", *New York Times*, August 25, 2000。

3. 该术语来自 Richard N. Haass, *The Reluctant Sheriff: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the Cold War*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1997)。

4. 参见 Michael R. Gordon and Bernard E. Trainor, *The Generals' War: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Conflict in the Gulf* (Boston: Little, Brown, 1995), 第32—34页。

5. Karl Mannheim, "The Problem of Generations", in *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ed. Paul Kecskemeti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52), p. 298.

6. William G. Mayer, *The Changing American Mind: How and Why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Changed between* 1960 *and* 1988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2), chap. 7.

7. 在18—29岁的美国人中,85%赞同这样的声明:"我们应该少关心海外问题,集中关注国内问题。"这个比例比略高年龄组的调查结果高出5—10个百分点。"America's Global Role: A Nation Divided?" Princeton Survey Research/Pew, survey conducted in October 1999. Available at: http://www.publicagenda.org/issues/nation-divided-detail.cfm? issue-type = americas-global-role&list = 6.

8.《精英学院历史调查》,1999年12月由康涅狄格大学调查研究与分析中心为美国董事和校友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of Trustees and Alumni)所作。存在于网站 http://www.goacta.org; Diane Jean Schemo, "Students, Especially 12th Graders, Do Poorly on History Tests", *New York Times*, May 10, 2002。

9. Jane Perlez, "As Diplomacy Loses Luster, Young Stars Flee State Dept".,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5, 2000. 2001年,国务院为改变招募雇员的窘境启动了一个宣传战。宣传战明显获得了成功,申请参加2001年外交服务资格考试的人数大大超出2000年。参见 David Stout, "Sign-Ups for Foreign Service Test Nearly Double After 10-Year Ebb," *New York Times*, August 31, 2001. 对在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谋职的兴趣于2001年9月恐怖袭击之后

也大大上升。

10. 芝加哥对外关系委员会每四年进行一次民意调查。1994年的调查显示,98%的美国领导人和65%的美国公众"支持美国在世界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该项比例在1998年分别是96%和61%,这显示只有些许下滑。总体而言,民意调查说明,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国际主义的支持只有较小的减弱。参见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and U. S. Foreign Policy 1999*, ed. John E. Reilly (Chicago: Chicago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1999). Available at: http://www.ccfr.org/publications/opinion/AmPuOp99.pdf。

11. James M. Lindsay, "The New Apathy", *Foreign Affairs*, vol. 79, no. 5 (September-October 2000), pp. 2—8. 本段中的民意数据也都来自该文。

12. Peter Trubowitz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draf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utonomou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Mexico, Mexico City, August 20, 2000.

13. Associated Press, "Stymied by Senate, Would-Be Envoy Quits",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 2000.

14. Alison Mitchell, "Bush and the G. O. P. Congress: Do the Candidate's Internationalist Leanings Mean Trouble?" *New York Times*, May 19, 2000.

15. 布鲁金斯学会的学者艾沃·达尔德(Ivo Daalder)和麦克·欧汉龙(Michael O'Hanlon)对联盟战略提出了恶劣的批评。他们指出:"盟国只是把军事力量简单地看作外交工具,意在以一种方式或另一种方式推动协商。他们对于需要直接达到某种战场结果的可能性没有准备……北约对塞尔维亚的战争就是一个鲜活的提示,在使用军事力量时,使用者必须对事情恶化和升级做到未雨绸缪。"Ivo H. Daalder and Michael E. O'Hanlon, *Winning Ugly: NATO's War to Save Kosovo*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0), p. 105.

16.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at Memorial Day service, May 31, 1999,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17. Carlotta Gall, "Serbs Stone U.S. Troops in Divided Kosovo Town",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1, 2000.

18. Jane Perlez, "Kosovo's Unquenched Violence Dividing U.S. and NATO Allies", *New York Times*, March 12, 2000.

19. Robert Byrd, "Europe's Turn to Keep the Peace", *New York Times*, March 20, 2000.

20. Michael Cooper, "Cheney Urges Rethinking Use of U.S. Ground Forces in Bosnia and Kosovo",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 2000.

21. Steven Lee Myers, "Bush Candidate for Defense Job Sees Overhaul",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2, 2001.

22. George W. Bush, Republican Presidential Nomination Acceptance Speech, Philadelphia, August 3, 2000. Available at: http://www.vote-smart.org/vote-smart/speeches.phtml? func = speech&speech = B000001559.

23. "The Armageddon Nominee", *Boston Global*, April 2, 2001.

24. Steven Lee Myers, "U.S. Signs Treaty for World Court to Try Atrocities",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 2001.

25. "The Armageddon Nominee", *Boston Global*.

26. Hugo Young, "We've Lost That Allied Feeling," *Washington Post*, April 1, 2001.

27. Statement to NATO foreign ministers in Brussels, December 15, 1999, p. 4. Available at: http://www.state.gov/www/policy-remarks/1999/991215-talbott-nac.html.

28. Assistant Secretary of Defense Franklin Kramer, testimony before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Match 9, 2000, p. 5. Available at: http://frwebgate.access.gpo.gov/cgi-bin/getdoc.cgi? dbname = 106-senate-hearings&docid = f:65627.pdf.

29. Associate Press, "U.S. Defense Secretary Says NATO Could Become a Relic of History", December 5, 2000. Available at: http://www.cnn.com/2000/WORLD/europe/12/05/nato.ap/index.html.

30. "The Alliance at Risk", *Guardian*, November 24, 1999.

31. 引自 Stephen Fidler, "Between Two Camps," *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14, 2001.

32. John R. Bolton, testimony before the Hou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mittee, November 10, 1999, p. 1. Available at: http://www.house.gov/international-relations/106/full/106first/testimony/bolton.htm.

33. 布什和鲍威尔都表示了有条件的支持,他们要求,欧盟建立武装力量的计划必须在北约的框架下进行,必须加强北约的力量。参见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and Prime Minis-

ter Blair in Joint Press Conference", Camp David, February 23, 2001. Available at: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1/02/20010226-1.html。关于鲍威尔的观点,参见 U.S. Department of State,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Press Availability with NATO Secretary General Lord Robertson", Brussels, Belgium, February 27, 2001. Available at: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01/index.cfm? docid=1000。

34. John Vinocur, "America's 'We'll Call If We Need You' War",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te*, October 3, 2001.

35. The 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 survey released on December 14, 2001. Available at: http://www.people-press.org.

36. Steven Erlanger, "German Joins Europe's Cry that the U.S. Won't Consult",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3, 2002; Suzanne Daley, "Many in Europe Voice Worry U.S. Will Not Consult Them", *New York Times*, January 31, 2002; and Steven Erlanger, "Protest, and Friends Too, Await Bush in Europe", *New York Times*, May 22, 2002.

37. Andrew Sullivan, "America at War: America Wakes Up to a World of Fear", *Sunday Times* (London), September 16, 2001; and Marshall Wittman, panel discussion at the New America Foundation, "21st Century Infamy: The Terrorism of September 11th and Implications fo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eptember 13, 2001.

38. Tom Segev, *One Palestine, Complete: Jews and Arabs Under the British Mandate*, trans. Haim Watzman (New York: Knopf, 1999), pp. 495, 460.

39. Martha Crenshaw, "The Effectiveness of Terrorism in the Algerian War", in *Terrorism in Context*, ed. Martha Crenshaw (University Park, Pa.: Pen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512—513.

40. Alistair Horne, *A Savage War of Peace: Algeria*, 1954—1962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77), p. 444.

41. Crenshaw, "The Effectiveness of Terrorism in the Algerian War", p. 480.

42. Thomas Friedman, "A Memo from Osama", *New York Times*, June 26, 2001.

43. Discussion on "International Correspondents", CNN, October 6, 2001.

44. Alan Sipress and Lee Hockstader, "Sharon Speech Riles U.S.",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6, 2001.

45. 参见 Elaine Siolino and Eric Schmitt, "U.S. Rethinks Its Role in Saudi Arabia", *New York Times*, March 10, 2002; and Shibley Telhami, "Shrinking Our Presence in Saudi Arabia",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9, 2002。

46. Richard Morin and Claudia Deane, "Poll: Americans' Trust in Government Grows",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28, 2001.

47. "Presidential Debate 1", October 3, 2000. Boston, Massachusetts. Available at: http://www.foreignpolicy2000.org/debate/candidate/candidate.html.

48. 引自 Steven Mufson and John Harris, "Novice Became Confident Diplomat on World Stage",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15, 2001。

49. Sebastian Mallaby, "The Man Without a Bumper Sticker",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15, 2001.

50. "U.S. Urges Bin Laden to Form Nation It Can Attack", *The Onion*, October 3, 2001.

51. 参见 Peter Trubowitz, *Defin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Conflict and Change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第 173—234 页。

52. 根据人口普查局的界定,"南部地区"包括:阿拉巴马州、阿肯色州、德拉华州、佛罗里达州、乔治亚州、肯塔基州、路易斯安那州、马里兰州、密西西比州、北卡罗来纳州、俄克拉荷马州、南卡罗来纳州、田纳西州、得克萨斯州、佛吉尼亚州、西佛吉尼亚州、华盛顿特区。Population data from U.S. Census Bureau, "Resident Populations of the 50 States,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and Puerto Rico", *Census* 2000. Available at: http://blue.census.gov/population/cen2000/phc-t2/tabo1.pdf. Recruitment data from Office of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Force Management Policy, "AC Enlisted Accessions by Geography", *Population Representation in the Military Services*. Available at: http://dticaw.dtic.mil/prhome/poprep98/html/2-geography.html.

53. 该计算中使用的数字包括现役、预备役和警卫设备,排除了规模在 10 英亩以下或价值在 1000 万美元以下的场所。Date from Department of Defense, Office of the Deputy Undersecretary for Defense (Installations & Environ-

ment), "Base Structure Report (A Summary of DoD's Real Property Inventory), Fiscal Year 2001 Baseline." Available at: http://www.acq.osd.mil/installation/irm/irm-library/bsr2001.pdf; and U.S. Census Bureau, "Land Area, Population, and Density for States and Counties", Census 1990. Available at: http://www.census.gov/population/censusdata/90den-stco.text.

54. Department of Defense, Washington Headquarters Services, Directorate for Information Operations and Reports, "Prime Contract Awards by Region and State, Fiscal Year 2000, 1999, and 1998", Table I-1. Available at: http://web1.whs.osd.mil/peidhome/geostats/p06/fy2000/p06tab1.htm.

55. Peter D. Feaver and Richard H. Kohn, "The Gap: Soldiers, Civilians, and Their Mutual Misunderstanding", *National Interest*, no. 61 (Fall 2000), pp. 29—37. 也请参见 the Triangle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Project on the Gap Between the Military and Civilian Society", Digest of Findings and Studies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the Military and Civilian Society, October 28—29, 1999. Available at: http://www.unc.edu/depts/tiss/RESEARCH/CIVMIL.htm。

56. Walter Russell Mead, "The Jacksonian Traditio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ational Interest*, no. 58 (Winter 1999—2000), pp. 5—29.

57. 国防部报告说,军事成员倾向于来自这样的背景,"社会经济地位比一般美国人略低,……(因而)人口中的上层四分之一部分代表性欠缺。"新兵双亲拥有"高地位职业"的代表性也不足。参见 Office of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Defense (Force Management Policy), "Population Representation in the Military Services," November 2000. Available at: http://dticaw.dtic.mil/prhome/poprep99/index.html.

58. Timothy Egan, "Plan to Expand U.S. Powers Alarming Some in Colorado", *New York Times*, October 3, 2001.

59. 参议院授权空中打击的决议案以 58 票对 41 票通过。投票的地区分配情况是:东北地区 14 票赞成,4 票反对;南方地区 17 票赞成,14 票反对;山区西部 5 票赞成,11 票反对。众议院阻止行政当局在没有国会批准的情况下向南斯拉夫派遣地面部队的决议案以 249 票对 180 票通过。投票的地区分配情况是:东北地区 35 票赞成,51 票反对;南方地区 84 票赞成,59 票反对;山区西部 20 票赞成,3 票反对。众议院支持空中打击的决议案以 213 票对 213 票形成平局。投票的地区分配情况是:东北地区 64

票赞成,21 票反对;南方地区 67 票赞成,75 票反对;山区西部 5 票赞成,19 票反对。中西部地区和太平洋西部地区大体上在参议院投票中支持战争,在众议院投票中反对战争,只是中西部地区展现了更强烈的反对意见,而太平洋西部地区则更接近于赞成与反对意见平分秋色。

60. 北部地区包括东北地区和人口普查局所指称的中北地区——更通常的叫法是西中地区。南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含盖所有其他各州,包括山区和太平洋西部地区。U.S. Census Bureau, Census 2000, "Ranking Tables for States: 1990 and 2000." Available at: http://www.census.gov/population/www/cen2000/phc-t2.html. Populations estimates from U.S. Census Bureau, Census 1990, "Projections of the Total Populations of States: 1995—2025." Available at: http://www.census.gov/population/projections/state/stpjpop.txt.

61. U.S. Census Bureau, Census 1990, "Projections of the Resident Population by Race, Hispanic Origin, and Nativity: Middle Series, 2050—2070." Available at: http://www.census.gov/population/projections/nation/summary/np-t5-g.pdf. U.S. Census Bureau, Census 1990, "Projections of the Resident Population by Race, Hispanic Origin, and Nativity: Middle Series, 2075—2100." Available at: http://www.census.gov/population/projections/nation/summary/np-t5-h.pdf.

62. U.S. Census Bureau, Census 1990, "Projected State Population, by Race, Sex, and Hispanic Origin: 1995—2025." Available at: http://www.census.gov/population/projections/state/stpjrace.txt.

63. 关于中欧裔美国人对北约扩大之辩论的政治影响,参见 Dick Kirschten, "Ethnics Resurging", *National Journal*, vol. 27, no. 8 (February 25, 1995), 第 478—484 页。关于散居犹太人和种族群体对美国外交政策的一般影响,参见 Tony Smith, *Foreign Attachments: The Power of Ethnic Groups in the Making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64. 参见 Rodolfo O. de la Garza and Harry P. Pachon, *Latinos and U.S. Foreign Policy: Representing the "Homeland"?*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0), 第 13, 24—25 页。

65. 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66. Mayer, *The Changing American Mind*, p. 211.

67. Michael Lind, "Civil War by Other Means", *Foreign Affairs*, vol. 78, no. 5 (September-October 1999), p. 139. 也请参见 Joel Kotkin, *The New Geography: How the Digital Revolution Is Reshaping the American Landscape*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0)。

# 第七章　美国治下的和平之后

美国不能也不该抵制美国时代的终结。抵制的尝试只会冒险与崛起的欧洲和上升的亚洲疏远关系并发生冲突。但是,要求美国做好准备并处理好从全球优势地位撤退却是过于苛刻的。大国接受他们必死的命运是相当困难的,历史上很少有大国心甘情愿地为崛起的挑战者让位,并相应地调整他们的大战略。

如果用正确的政治和正确的政策来武装,那么,美国就能够和平地处理好由单极体系向多极体系的转换,并因此得以确保在其主管下获得的稳定与繁荣能够延续到其优势地位不在之后。一眼就可以看出,过去只提供了清醒的警示,而不是有用的教训。多极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为对抗和战争提供了滋生土壤,这对于美国领导人及其外国同行来说并不是好消息,他们很快将不得不面对长期被美国主导地位压制的地缘政治分裂带。但是,在几个世纪漫长的流血杀戮中存在着一些有趣的历史插曲,它们为乐观主义提供了理由,为再度从过去寻找如何准备未来的指南提供了根据。

相关的历史时期全都涉及统合过程,在这些统合过程中,彼此分隔的国家有意识地将他们自己相互捆绑在一起,以避免否则将会发生的破坏性竞争。这些历史插曲形成一个连续光谱,一端是紧密的结合,另外一端是松散的组合。连续光谱的紧密

一端是美国的联邦经历。十三个北美殖民地团结起来,从英国统治下获得独立,接着形成一个政体,这个政体不仅防止各州之间的对抗,而且最终合并成一个统一国家。连续光谱的松散一端是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从1815年到19世纪中叶,欧洲协调有效地维持了多极体系下的和平。参加欧洲协调的五个国家令人羡慕地捍卫了他们的主权,创建的仅仅是一个非正式的俱乐部,他们甚至从来没有考虑过进行要求更高的、已经在北美发生的统合过程。但是,他们的确成功地克服了通常在多极体系下盛行的地缘政治对抗。位于美国和欧洲协调两种经历之间的是欧洲联盟。欧盟远不是统一的国家,却也不只是主权国家的松散组合。虽然不伦不类,但是欧盟代表了一种地缘政治工程的历史尝试,这个尝试在消除欧洲国界的战略相关性方面证明是相当有效的。

对这些历史插曲更仔细的考察显示,和平管理临近权力中心之间的关系需要三个重要元素:实行战略克制(strategic restraint);建立聚合性(binding)和限制性(bounding)制度;追求社会统合以促进熟悉、信任、共同身份和目的的发展。[1] 战略克制包括有保留地使用权力、为新来者让位、展示良性意图。制度对于国际政治的功能相当于宪法对于国内政治的功能——通过将行为体彼此结合在一起,通过用一套共同的规则和规范限制行为体的行为,制度可以驯服体系、减弱竞争。政治和经济统合可以成为社会粘合剂,将竞争性要求导向合作性方向,并为将先前彼此分立的国家组成一个政治王国奠定基础。

## 过　去

今天,旅行者不需要携带护照或任何身份证件就可以横跨

从弗吉尼亚州到马里兰州的边界。很多美国人每天跨界通勤，甚至不用意识到他们正在横跨政治边界。与此相似，今天，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也是不可想象的。弗吉尼亚大学骑士队和马里兰大学水龟队可能在篮球场上高度对抗，但是在两州之间并不存在战略竞争。相反，它们同合众国其他 48 个州一道，必定会捍卫彼此的安全。如果马里兰遭到外国袭击，那么弗吉尼亚人和来自该国余下地区的美国人会毫不犹豫地拿起武器进行反击。尽管加利福尼亚人远在恐怖袭击遭袭地几千英里之外，但是，西海岸对于对奥沙马·本·拉登恐怖主义网络进行军事报复的支持，和东部一样强烈。

美国人认为理所当然的是，合众国各州和平相处，并会毫不迟疑地踊跃参加彼此的防御。但是，这种和睦和集体精神并非一直如此。相反，它们是几十年政治和经济统合的产物。根据研究早期美国的优秀历史学家费利克斯·吉尔伯特（Felix Gilbert），在殖民时期，“每个殖民地都觉得自己是自治的和独立的，有自己的天地。”各个殖民地还各有不同的政治制度。有些殖民地由伦敦任命总督，有些由私有土地租赁人管理，其他则主要由宗教权威统治。开始时发生直接冲突的原因不多，殖民地人口稀少，可利用土地丰富，因此它们很少彼此发生意外对抗。但是，由于人口增加了，因此关于边界和领土要求的争端也随之增加了。定居者并不经常诉诸武力解决这类争端，很多人害怕各个殖民地（后来成为州）民兵之间直接交战。正如吉尔伯特评论的，“如果它们不想彼此开战，它们的政策就必须相互协调。”[2] 在美国发展进程中的这个阶段，殖民地更多的是竞争者，而不是伙伴。

彼此分立的殖民地还不得不解决在面临外来威胁时它们是否应该结合起来的问题。它们开始时抵制集体尝试，喜欢维持

独立的政治单位。1754 年，为应付美洲土著人的威胁，奥尔巴尼计划(Albany Plan)提出成立一个统一的政策和监管委员会。各个殖民地因该计划有损它们的自治而拒绝了。甚至法国入侵的前景都不足以促使它们采取集体回应。当考虑马里兰是否应该做好准备协助弗吉尼亚时，马里兰大会(Assembly)得出的结论是，“我们邻居弗吉尼亚……的情况，考虑到暴力或暴行、法国人的威胁或作恶，并不需要我们通过在这里集结一支武装力量立即提供援助或帮助。”[3]

用集体精神取代殖民地的个人主义和竞争本性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关键的政治和理念创新是实行战略克制——这个制约各个殖民地实力和自治的观念最终令它们全都大大改善了处境。战略克制的实行是要成就三个独特目的：驯服殖民地对彼此的野心，限制外国对付崛起的美利坚合众国，在组成合众国的三个政治单位即人民、各州和联邦政府之间形成自我制约的权力均势。相互限制、制约与制衡、适度的权力——这些核心观念使美国政治的转型成为可能，使各个分立殖民地之间的竞争变成了走向统合的各州之间的合作。[4]

对于各个分立殖民地抛弃嫉妒心理、制约各自野心的必要性，国父们几乎再坚定不过了。《联邦党人文集》提出了不计其数的警告，要求各州必须不计前嫌，否则就有危险陷入没完没了的竞争和冲突。约翰·杰伊引用英国的经验说明了这一点。杰伊指出：“对常识来说似乎显而易见的是，这样一个岛国的人民应该是一个国家。”但是，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依然处于分裂状态，因此，“彼此几乎经常发生争吵和战争”。杰伊警告说，除非美国人民避免这类错误，否则，“他们不是经常卷入争端和战争，就是经常生活在对争端和战争的长期恐惧之中”。杰伊还说：“当人民或家庭如此分裂时，对他们自己必然是不利的。”[5]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特别担心在美国向西扩展背景下会出现领土纠纷。他写道："从过去推论未来，我们有充分理由担忧，有时会诉诸武力来仲裁他们的争执。"汉密尔顿接着写道，康涅狄格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关于怀俄明河谷(Wyoming Valley)(位于今天的宾夕法尼亚州东北部)的争执"告诫我们对这种争执切勿抱有容易和解的乐观期望。"汉密尔顿注意到，像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州这样的大州实行自我克制尤其重要，它可以确保周围较小的邻州不至于"用不友好的眼光看待我们日益强大的前景"。只有大州的力量永久性地得到制约，小州才会坦然地进入合众国。汉密尔顿认为，分立各州还必须妥协它们的经济自治权，取消各州之间的关税。要不然，关税会使贸易交流中断，使商业对抗加剧。汉密尔顿警告说，"某些州借助于通商条例，有机会使其他州从属于自己"，这样的结果将使怨恨很快形成。[6]

联邦不仅可以有效制约合众国内的各个州，而且可以有效制约外国对美国的野心。杰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五篇中精练地阐述了这一点，他认为："本国的衰弱和分裂，会招致外国的威胁；没有任何东西比我们内部的团结、强大和有效的政府更能保护我们免遭威胁了。"杰伊解释说，如果其他国家"看到：我们的全国政府能力高强，管理良好；我们的商业管理深谋远虑；我们的民兵组织适当，训练有素；……那么他们就更加愿意培养同我们的友谊，而不想激起我们的憎恨。"反之，根据汉密尔顿的看法，分立各州将"变成敌对国家阴谋诡计的牺牲品"，这些敌对国家全都以"分而治之"为行动箴言。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商业领域。如果美国继续是分裂的，那么外国就会让各个分立州彼此对峙并剥削它们。另一方面，联邦则"能使我们为取得最有价值和最广泛的商业优惠而进行最有成功希望的谈判。"[7]

为从自身内部保护美国，确保联邦的建立不至于损害人民

和各个州的自由与特权，战略克制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联邦政府必须在被赋予权力的同时接受限制。在《联邦党人文集》第五十一篇中，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指出："必须首先使政府能管理被统治者，然后再使政府管理自身。"[8]联邦政府被赋予的职责是，监管各州联合体的集体康宁，并确保它的安全。但是，为防范中央的专制，州民兵，而不是大的联邦军队将提供人力。战略克制既能够使合众国成立，也能够防止它变成一个危险的巨人歌利亚。

如果战略克制是使美利坚合众国成为可能的主要观念，那么制度就是将这个观念变成现实的主要机制。制度确立博弈规则和执行这些规则的手段，用秩序和相互自我克制取代对抗和怀疑。支持美国政治国内化的首要制度是美国宪法。清楚界定不同权威领域的权利与义务，并使之法律化，对于创立一个好的结构是至关重要的，这个结构既要足够集权和凝聚以便提供有效治理，但又要足够分散和牵制以便符合中央权威的谨慎要求。1781年各州采用的邦联条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只是证明过于软弱无力了。当时的邦联政府只由一个立法机构组成，这个立法机构由各州立法机关派遣代表参加。没有司法部门，没有行政部门，国会没有权利收税、没有权利执行极少的决策、甚至没有权利管理州际商务。

1789年生效的宪法通过发挥聚合和限制两个重要职能矫正了这些软弱性。宪法使人民、各州和联邦政府彼此聚合、相互依赖，从而指导了使合众国结合成一个单一政体的统合和集权过程。宪法第一句话就开宗明义地指出，其目的是"组成一个更完美的合众国"。正是为了这个目的，宪法赋予联邦政府必要的权威以彼此聚合各州，并通过各部分相加创建一个整体。联邦政府的核心功能包括，"管理同外国的和几个州内部的商业"，

“铸造钱币，管理钱币的价值，并管理外国钱币的价值，确定度量衡”，以及“提供共同防御”。这些全部都是相当世俗的工作，但对于把几个州合成一个统一的国家，它们又全部都是非常重要的。

宪法既通过聚合功能集结集体意志，也通过限制每个权威领域的权力，使它们相互制约，来抵消集体意志。这样，宪法固定了制约机制，使美国人民在参与联邦政府的行动时能够得到保护。宪法通过建立选举制度，使当选官员对公众负责，明确界定不可剥夺的个人权利，如自由演讲、结社和信仰宗教，把国家主权赋予了人民。但是，它接着又通过赋予各州组建国民军和镇压大众叛乱的权威，限制了公民的权力。

宪法授予各州权力，不论人口多少各个州都有两名参议员（最初时由州立法机关推选，不是民选），并用无数职责赋予各州权威，这些职责包括执法和维持秩序。但是，它接着又通过组建联邦政府，限制了分立各州的权威，联邦政府居于各州之上，有权收税，能够管理州际商务。

宪法也授予联邦政府权力，使总统成为最高统帅，建立司法和行政制度使美国具有统一性。但是，它接着又通过赋予国会宣战、批准条约和控制预算等权利，限制了这些制度的权威。通过将人民、各州和联邦政府聚合在一起，同时限制他们各自的权力，宪法为驯服分立各州的野心以及联邦政府的野心提供了一个制度框架，从而为合众国铺平了道路。

加入美国在北美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这一点确实证明了合众国权力制衡的合理设计，这些设计给考虑获得州身份的领土带来了宽慰。美国决没有受制于应付美洲土著人、墨西哥人和其他挡在向西扩展路上的人。但是，一旦定居者控制了土地，美国政府的自我克制本性就使他们更易于赞成获得州身份。虽

然宣布中立或宣布与英国结盟对某些地区来说开始时具有吸引力，但是，认识到加入合众国之后他们可以维持重要方面的自治，则促使天平向着有利于加入合众国的方面倾斜。密西西比州参议员罗伯特·沃克(Robert Walker)在支持德克萨斯州加入合众国的讲话中指出："每个州在自己的界线之内都控制着所有的地方事务"，联邦政府仅将自己局限于"商业和……外交事务"。[9]美国从事的活动并不是兼并新州，把它们并入先前存在的国家。相反，新州是在保留了很大程度的自治政府的情况下，参与了进行中的国家建设尝试。[10]

使驯服美国政治制度成为可能的第三个因素，是社会的统合和共同国家身份的构建。一开始，美国在克服各个州之间的竞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它们不被种族或语言界线所分裂。而且，恰恰因为很多定居者为寻求宗教和政治自由才移民到了美国，因此，各州在发展公民身份方面具有共同承诺。美国身份的本质不是种族或宗教，而是对国家事业以及自由和民主核心价值观的承诺。就像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在告别演说中告诉美国人民的，"上帝……选择你们成为自由的卫士，为人类的利益保卫自由。"[11]自我克制、公平和温和等规范也是公民身份的组成部分，通过政治活动、大众教育系统、公共仪式和文学著作的宣传，公民身份帮助发展了国家身份，国家身份将分立州的身份和忠诚感涵盖在内，或者至少与之并存。[12]

国家身份的传播仅仅是这些。它受制于中央的虚弱、很多美国人有限的流动、地方和各州忠诚感的根深蒂固。尽管日益增长的贸易意味着更多的跨州联系，但是，扩大的经济统合不足以转变北方和南方之间因社会秩序互不相容而造成的逐渐分裂。奴隶制在南方已经成为一种制度，它不仅是地区经济的一部分，而且成为地区文化的一部分。在导向内战的发展过程中，

南方领导人开始借助独特的旗帜、民俗和文化传统，发展和散播独特的南方身份。当新州持续加入合众国使政治力量对比不利于奴隶州时，南方的生活方式和核心价值观面临着威胁。源自于共同承诺发展合众国公民身份的共同体感，远远抵不上因北方和南方之间关系疏远而造成的强烈情感。

在这些情感导致的内战之后，社会统合开始以史无前例的方式向前发展。内战及其结果加强了联邦政府的力量，尤其是行政部门。工业化和交通网络的扩展带来了更大的人员流动和经济统合，并进一步推动了建立集权的、由强烈国家身份支持的国家政府的进程。内战之前，美国人几乎经常在他们的国名之后使用复数形式的动词(the United States are...)。在战争之后的几年，他们开始使用单数形式的动词(the United States is...)，这意味着社会身份已经发生重要转变。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要求下的努力和国家动员，使现代美国民族国家的建设得以完成，它建立了广泛的公共部门、实质性的国家安全机器，以及对美国积极参与世界事务的政治支持。到了20世纪下半叶，美国不仅将分立州的多极格局变成了团结一致的合众国，而且还建立了具有非常卓越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的、联合的集权政体。

英国的洛德·卡斯尔雷(Lord Castlereagh)和奥地利的克莱门斯·冯·梅特涅(Clemens von Metternich)是欧洲协调的首席建筑师，他们采用了与美国国父不同的方法驯服了多极体系。欧洲协调形成于1815年维也纳和会(Congress of Vienna)，发展于1818年艾克斯拉沙佩勒会议(Aix-la-Chapelle)，在欧洲协调形成的时候，欧洲由彼此独立的主权国家组成，这些国家因各自独特的政治、语言和文化边界而相互分立。欧洲在意识形态上也是

分裂的，英国和法国追求自由改革，而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坚定地维护保守的君主制。稳定和平的条件根本没有成熟。

然而，欧洲协调克服了通常与多极体系相伴随的竞争，并用欧洲主要国家之间的共同体和合作取而代之。不管与美国经历多么截然不同，新欧洲和平的三个主要因素却与美国经历完全一致，即战略克制、聚合性和限制性制度、以及社会统合。

欧洲协调在三个互补的层次上引入了战略克制。第一，最初的四个成员国——英国、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于1818年，仅仅在对手被击败的三年之后，将法国融入欧洲协调。尽管对法国施加惩罚性和排挤性安排很有诱惑力，但是欧洲协调领导人抵制了这种诱惑，他们认识到，没有法国参加，在欧洲很难维持和平。

第二，两个最强大的国家，英国和俄国，刻意抬高普鲁士、奥地利和法国的地位，以便让所有欧洲主要大国处于竞技场的同一层次。他们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扩大了普鲁士的边界，增加其军事实力和政治影响力。英国和俄国通过有保留地使用权力和分散影响力，形成了一个平等论坛，这个论坛满足了二流国家的志向，而不是刺激他们的野心。卡斯尔雷清楚地说明了这种特别的自我克制，他写道："英国的职权所在，不是把自己置于任何法庭组合的领导地位，控制他人，而是通过在大国之间施加安抚性影响，把受鼓舞的信心变成和平的保障。"[13]向后退步，为崛起国让位，使其从事能力以上的活动，是一种创新的战略技巧，它明确展示了英国和俄国的良性意图，促进欧洲五个主要国家形成了排他性的团结俱乐部。

第三，欧洲协调发展了相互自我克制的惯例，一个国家把获得个体收益的机会传递给他国，作为回报，其他国家也会同样行事。例如，如果法国人避免采取单边行动以增加在埃及的利益，

那么,奥地利人在意大利也会这样做。根据一位帮助协商欧洲协调条款的英国外交官,这样做的目的是避免"任何扩张计划和野心,自法国革命的灾难性时代以来,相似的扩张和野心曾经给欧洲带来所有灾难"[14]。欧洲协调成员国一致同意将和谐和共识置于其他一切之上,让集体康宁胜过自私自利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1841 年法国改变了令其他欧洲协调成员国关系疏远的埃及政策,在向其他同行解释法国为什么这样做时,国王路易·菲利普(Louis Philippe)写道:"法国希望维持欧洲的平衡,关心这种平衡是所有大国的责任。平衡的维持必须是他们的光荣和他们的主要志向。"[15]

制度是实行战略克制的工具,它清楚地界定了指导成员国行为的规则和规范。这些制度通过一系列会议得以形成,其中最重要的会议就是维也纳和会和艾克斯拉沙佩勒会议。某些指导欧洲协调的规则包含在官方文件中,其他规则则表现为与会者的共同谅解。

像美国宪法一样,欧洲协调制度发挥的功能是将成员国彼此聚合在一起,同时限制他们的个体野心和影响。普鲁士外交大臣弗里德里希·安齐隆(Friedrich Ancillon)这样解释制度的双重功效:"五个大国相互之间并与他国紧密团结,构成了团结一致的体系,通过这个体系,个体支持全体,全体支持个体;在这个体系中,权力只是表现为对每个成员国财产和权利的保护;在这个体系中,为了世界和平的缘故,把整体与部分维持在法律界线之内,已经成为政治活动的惟一目的。"[16]1818 年签订的联合协议重申:"五个国家……下定决心,不论在相互关系中,还是在他们与他国的关系中,永不背离亲密联合体(intimate union)的原则。"[17]

欧洲领导人定期的面对面会议可能是欧洲协调最重要的制

度。不论什么时候出现危机或争端，高级别密使就会会面。决策只有通过达成共识才能制定。成员国停止活动，维持领土现状，边界只有通过谈判和所有五个国家的同意才能改变。协调克制和不采取行动的机制同提供集体行动的机制一样重要。欧洲协调成员国建立了势力范围、缓冲区、中立区和非军事区以预先阻止动荡地区的竞争。所有五个成员国都更倾向于避免干涉，而不是冒战略对抗的危险。欧洲协调还为避免利益冲突提供了退出途径。英国反对奥地利、俄国和普鲁士联合干涉镇压意大利 1820—1821 年的自由起义。但是，伦敦不是阻止他们采取行动，而是与之保持距离。卡斯尔雷同意，“只要他们各自提供合理的保证，确保他们的意图并不是直接指向扩张，颠覆欧洲领土体系(Territorial System of Europe)”，他就会在一旁观望，而不是妨碍这些同伴。[18]

制度灵活性对于欧洲协调的有效性也是非常重要的。设计并管理欧洲协调的领导人认识到，过于形式化、法制化和制度化的结果是害处大于好处。欧洲协调如果依赖于严格的程序，指望成员国不论何时何地出现危机，都对联合军事行动作出严格承诺，那么，它就会是脆弱的和短命的。与此相反，欧洲协调是通过非正式的协商、建立共识和偶尔的外交施压来发挥功能的。像富兰克林·罗斯福一样，欧洲协调的设计者寻求能够实现的最小值，而不是不可能实现的最大值。英国 1818 年的一份备忘录抓住了这个精神。它写道：“毫无疑问，任何一个国家对(欧洲领土体系)盟约的破坏都是一种伤害，所有其他国家，只要他们认为合适，就会单独或集体地表达憎恶。但是，条约并没有以明确的条文规定这样做是一种积极义务。……这项义务的完成好像刻意没有规定，出于时间和事件的具体情况，受害国可以让冒犯国明白事理，受害国可以在认为合适的时刻使自己承担义务，维

护自身遭到侵犯的权利。”[19]

欧洲协调成功的最后一个因素是通过成员国之间反复联系而发生的社会化进程。英国、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的领导人，由于他们组成了击败法国的联盟，甚至在欧洲协调创建之前就已经发展了亲密的个人关系。正如梅特涅指出的，“奥地利和俄国的皇帝、普鲁士的国王，以及三国的内阁，实际上从未分开过。英国内阁领袖也经常与奥地利、俄国和普鲁士的同行在一起。”[20]这些个人友好关系通过无数的会议进一步深化了，在这些会议上，他们共同协商和平方案，制订欧洲协调发挥功能的方式、管理出现的危机。强烈的友谊感和共同目的感逐渐形成了。

欧洲协调培养起来的不仅有个人之间的联系，而且还有共同体身份(communal identity)。国家忠诚感正在让位于日益上升的泛欧洲共同体感。成员国在指称欧洲协调时，不仅把它看作一个契约或联盟，而且还把它看作“亲密联合体”。根据卡斯尔雷，欧洲已经发展出“统一和坚定的目标，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欧洲协调的首要目的就是深化这个目的的统一性和团结一致感，“减少平时的琐碎争吵，一并支持社会秩序的已有原则”。梅特涅也认为，欧洲“对于我来说，已经具备了自己的国家的特性。”[21]边界的可渗透性、人员与商品跨越国界的流动，推动了这种泛欧洲共同体身份的强化。社会统合和共同体精神反过来又促进了欧洲协调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和信任。

社会统合进一步发展了19世纪欧洲的和平事业，但是，欧洲协调的缺点也导致了它的最终崩溃和国家对抗的回归。正如美国的合众国经历被北方和南方之间互不相容的社会秩序所阻碍一样，欧洲协调被英国和法国更自由的统治与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的独裁君主制之间的分裂所折磨。国内秩序的不同理念并没有阻止欧洲协调的形成和有效发挥功能几十年，成员国对

彼此的内部事务采取放手政策。但是，这种分裂的确意味着，1848年席卷欧洲的自由革命和对革命的保守镇压是对欧洲协调的致命一击，它再也没有由此恢复过来。

1848年的革命蔓延和政治动荡导致各国对国内事务放心不下。尤其是法国和俄国，他们转而求助于民族主义，提高政治统一性和合法性，从而助长了战略竞争的再度形成。此外，很多欧洲协调的最初领导人已经不再任职，他们在欧洲造就的亲密个人纽带、信任和共同目的感遭到了削弱与剥夺。由于欧洲协调主要是在高政治(high politics)层次上运作的，因此，社会统合并没有得到深入渗透。新一代领导人的出现意味着欧洲协调实际上走到了尽头。1854年，欧洲大国再一次陷入战争，这一次是在克里米亚。

欧洲联盟代表了驯服多极体系的第三种方法。拿破仑战争、克里米亚战争、德国统一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些战争充分说明了，临近权力极之间的对抗具有极大的破坏潜能。在这种长期流血杀戮的历史面前，欧洲领导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始着手致力于永久性地改变欧洲大陆的战略地理。他们为此设想的计划，相比美国组成正式联邦的尝试，相当不够雄心勃勃，但是，相比欧洲协调及其对特殊形式合作的依赖，又相当苛求。这条中间道路由经济和政治统合的发展进程构成，随着时间的推移，统合进程将把欧洲民族国家结合在一起，用持久合作取代战略对抗。欧盟的核心要素也是同样的三个——战略克制、制度的聚合和限制、社会统合。

从一开始，三个层次相互交叉的战略克制就是欧洲统合的核心。第一，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已经得到安抚。战胜德国的对手提供了初始克制。同盟国

占领德国，并在冷战开始后将其一分为二。在东德，苏联占领长达几十年之久。在西德，德国人民主动实行了多种形式的自我克制，包括废除总参谋部，遏制军国主义；将首都由庄严壮丽的柏林迁往谦逊宁静的波恩，以示路线的改变；在新宪法中加入条款，规定为领土防御以外任何目的使用军事力量皆为非法。西德人还公开处理历史问题，接受为本国同胞犯下的暴行负责，并与邻国实现和解，这些步骤对于消除德国社会的侵略性民族主义是十分重要的。

第二，法国和西德参加了不断深入的经济和政治统合进程，以确保两国之间的边界不会再一次成为地缘政治分裂带。法德联盟的形成致使两国在行动上步调一致，有关共同利益的决策只能通过共识和妥协才能制定。法德联合因为聚集了欧洲最大两个国家的力量和影响，因此，它成为一种扩大权力的工具。但是，拉锯式的联盟管理作为对两国野心的制约也在发挥作用，致使他们受制于彼此接受的克制。

第三，欧洲联盟本身是一种权力克制的设计，其基础在于法德联盟与其较小邻国之间经过讨价还价达成的协议。最基本的协议是，法国和德国同意限制他们的压倒性权力，放弃与其规模和力量相一致的某些便利，让他们的行为接受集体欧洲的约束。作为回应，较小国家同意配合行事，同意加入主要由法国和德国设计的欧洲结构。通过这次重要的讨价还价，较小的国家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对法国和德国无拘无束的权力进行制约。法国和德国也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按照他们的意向创建欧洲。[22]

欧洲采取渐进式的方法设计旨在将这些协议付诸实践的制度。欧洲血腥的过去、一系列文化和政治分裂线使之没有机会复制美国经验，无法从一开始就对联合体条款进行立法。相反，

欧洲不得不采取一系列长期、稳定的具体步骤，逐渐通过聚合和限制走向统一。为了推动这个进程，欧盟奠基人求助于经济统合。如果欧洲要凝聚为集体的政治实体，那么，它必须由集体的经济实体开始。在二战之后的凄凉和艰苦岁月中，由于没有其他可以合作的，因此，欧洲领导人谋求经济统合，使之服务于地缘政治的转型。

对于这一点，当欧洲开始迈出第一步，创建欧洲煤钢共同体时，罗伯特·舒曼再清楚不过了。他说："由于欧洲不是统一的，我们发生过战争，……因此，这个计划（煤炭和钢铁共同体）将为欧洲联邦创建第一个具体的基础，欧洲联邦对于和平的维护是不可或缺的。"[23]尽管欧洲经济共同体和后来的欧盟经历了几十年的渐进式发展，但是，舒曼认定的进程和最终目标根本没变。德国总理赫尔姆特·科尔（Helmut Kohl）1996年在讨论货币联盟的前景时指出："实际上，欧洲统合的政策归根结底是我们在21世纪要战争还是要和平的问题。"[24]

政治统合从一开始就落后于经济统合。从经济联合体中受益的社会部门成了推动欧洲计划的发动机，推动着那些更不情愿转让特权和主权象征的民族国家。然而，渐进式步骤已经在慢慢加快，并逐渐在牺牲国家政府的权威，加强欧盟机构的权威。现在，欧盟正在选择旨在进一步将政治权力集中化的各种设想，包括改变欧洲理事会的投票规则、理顺决策程序、加强欧洲议会的作用。欧洲宪法的起草和批准也正在考虑之中，它的象征意义和实际意义都是历史性的。

社会统合和集体欧洲身份与忠诚感的突出有助于欧盟制度不断提高对分立民族国家进行聚合和制约的能力。相比美国人的情况，欧洲人仍旧更强烈地依附于他们各自的国家。但是，欧盟培育集体身份的努力已经发挥了显著影响，很多欧洲人现在

更强烈把他们自己认同为欧洲的公民，而不仅仅是各个民族国家的公民。这种态度和忠诚感的转移在一定程度上是经济统合和边界开放的自然结果。但是，社会工程方面的明确努力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欧洲国旗、欧洲议会、欧洲护照、单一货币、文化和教育交流、好几个欧洲大学的建立，这些倡议一并推动了合法政治王国在集体欧洲层次上的创建。

欧盟在新兴欧洲民主国家间的磁吸效应证明了欧盟结构的吸引力。就像美国的情况一样，扩展中的联合体在扩展道路上并不是引起其他国家躲避隐藏或寻求形成反对联盟。相反，尚未成为联合体一部分的国家急不可耐地等待着获得成员身份。新的民主国家根本没有把欧洲看作是威胁他们主权和康宁的掠夺性机构，而是非常有道理地把进入欧盟看作是他们走向繁荣和安全的入场券。欧盟承诺为中欧做它已经为西欧做的一切——用和平联合体的聚合和限制效应取代战争倾向的多极格局。

## 未　　来

没有什么比带着地缘政治已经休止的幻觉进入正在出现的地缘政治过渡期更危险了。然而，那恰恰是美国准备要做的。美国可能在全心全意地关注反恐战争，但这个焦点的代价将是，对多极世界回归构成的挑战关注不够。美国的单极时刻也在以迷惑性的寂静方式走向结束，大多数观察家和决策者未能领悟到欧洲崛起的地缘重要性。美国国际主义的变动特点加快了全球变革的步伐，这一点进一步掩盖了单极体系的瓦解。日渐减弱的政治意志远比日渐减弱的军事实力更难觉察和度量。美国单边主义带来的暗中疏远也一样难以估计。

大多数美国战略家习惯了霸权，忽略了正在改变全球政治的微妙但却巨大的力量，他们仍然对单极体系的持久性信心十足。美国的经济规模和主导性的防御设施帮助维持了这种幻觉。事实上，对美国优势地位长命百岁的信心推动了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的危险组合，这种组合塑造了乔治·布什总统最初的基本外交政策。

管理多极体系的回归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将是困难的、充满危险的。忽略全球的权力分散，集中精力于本土防御和打击恐怖主义，不然则一切继续照旧，这些做法将肯定带来最糟的结果。美国将会引起欧洲和其他有志国的反抗，使多极世界的回归必定导致离间和对抗。如果美国想要寻求把单极体系延长至美国时代之后，那么，它将扩展过度、弄巧成拙，从而导致民众的不满和美国的最终撤退。可能的结果将是，国际体系四分五裂，加上美国孤立主义突然抬头——这些恰恰是 20 世纪 30 年代为战争扫清道路的条件。

与此相反，美国应该棋先一着，寻求影响和控制正在进行中的、并不断加快的全球过渡。核心的问题不是单极时刻还能再持续多久，而是等在前面的多极世界是在缺省状态下自动出现，还是经由国家参与设计形成。如果自动出现，多极体系将会带来新的不稳定和冲突。如果设计形成，美国至少还有适当的机会使之变得正常。

一个具有多个权力中心的世界的回归，必然意味着地缘政治分裂带的回归。因此，对于美国来说，首要的挑战是，寻找方法使地缘政治分裂带的战略影响最小化、建立跨越分裂带的桥梁、限制野心以便消除这些分裂带产生的竞争本性。正如美国自身历史所揭示的，战略克制、制度和社会统合是过去成功驯服多极体系的关键要素。这三个观念应该成为新的自由国际主义

的基础，并构成新的美国大战略的理念核心。

## 战 略 克 制

实行战略克制就是有保留地使用权力、作出让步、为他国留出空间。这决不是一种普遍适用的战略。在应对死敌时展示克制是一种愚蠢的行为，只会招致被人利用。例如，英国在30年代没有必要姑息纳粹德国——它为此遭受了苦难。今天，美国遭到来自恐怖主义的严重威胁——在面对这种威胁时，美国不应显示克制。但是，美国现在并未面临主要敌手。相反，美国面临着一系列潜在的挑战者，他们的意图仍处于形成阶段。因此，美国有一个难得的机遇，帮助塑造这些意图、推动它们向良性方向发展、对崛起的力量进行引导以便减弱新分裂带的竞争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实行战略克制就是为进而退，为得而失，花费较小的权力，实现较大的影响。

战略克制的实行经由几个途径进一步促进了这些目标的实现。美国应该明确显示它的良性意图，向他国表明，美国对维持和平的兴趣高于对维持主导地位的兴趣。于是，潜在的伙伴能够以相同的方式回报美国，从而使互惠的自我克制行为得以运转起来，互惠的自我克制是信任的基础。通过为其他权力中心留出空间，美国还能够影响他们何时和如何承担更多的国际职责。当潜在挑战者最终厌倦搭理华盛顿并寻求规避美国影响时，美国能够与潜在挑战者接触，而不是与他们直面对抗。就像英国和俄国在欧洲协调时期让奥地利、普鲁士和法国心满意足那样，美国也能够提高今日崛起的有志国的地位，赋予他们可以预先消除怨恨的发言权。对盛气凌人的父母起身反抗的孩子通常比抛弃依赖、发展成人责任感和自力更生的孩子更难对付。

## 欧　洲

基于战略克制的大战略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呢？首先，它意味着接受欧洲对更大发言权和自主权的渴求。历史在这里完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在早期美国，美国公民对欧洲人的优越和与之相伴的傲慢怒发冲冠。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第十一篇中写道："欧洲长期保持的优势，诱使它想自诩为全世界的主人，而且认为其余的人类都是为它的利益而创造的。作为渊博的哲学家而受人称赞的人，曾直截了当地把一种天然的优越性归于自己的居民，而且郑重声明：一切动物，包括人类在内，在美洲是会退化的，——就是狗，只要在我们的空气中呼吸一会儿，也就不会叫了。"[25]

但是，此后一切都倒转了过来。当欧洲因美国崛起而黯然失色时，欧洲的傲慢减少了。欧洲明智地退让一旁，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它开始憎恨美国的主导地位以及与之相随的狂妄。德国《明镜》周刊(*Der Spiegel*)认为："美国人的所作所为，没有任何人或任何事物对他们进行限制，好像他们在自己的'麦克世界'(McWorld)拥有无限的权力。共产主义的结束和经济繁荣加强了美国的实力，华盛顿似乎摆脱了源自越南创伤的自我怀疑。美国现在是国际政治的'斯瓦辛格'：炫耀力量、莽撞多事、耀武扬威。"[26]

现在，一切又在重新倒转回来。欧洲正在统合，并迅速赶上美国。欧洲理所当然地应该让美国退让一旁。美国应该从上次权力与影响由大西洋一侧转移到另一侧的过程中学到更多东西。那次转移之所以和平发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英国实行了战略克制，为美国让出了空间。美国人的确在独立战争中与英国开战了，并在1812年战争中再一次与英国开战。但是，美国

取代英国成为西半球霸主——真正的指挥棒交接——却是在一枪没开的情况下发生的。

在19世纪结束的十年中，伦敦接受了美国在一系列导致分裂的问题上的要求。英国极大地减少了在加拿大的军事力量，在有关委内瑞拉边界问题的争端中作出让步，在西班牙-美国战争和美国向太平洋扩展中支持美国，还在整个西太平洋海域减少了海军存在。美国作出了回报，在加拿大边境的美国一侧有效地实行了非军事化，同意通过中立仲裁与伦敦解决所有分歧，把对英国外交的宗旨由敌对和怀疑改变为友好和信任。到了20世纪最初十年，大西洋两侧的决策者和观察家一致认为，两国之间的亲密关系已经如此强劲地发展，以至于他们之间的冲突将具有“内战的不合规律的恐怖性”[27]。

在英国和美国之间没有发生直接冲突的情况下，英国治下的和平让位于美国治下的和平，这是一种历史的反常。大多数大国只有在被崛起挑战国残忍击败之后才会退让一旁。英国和美国具有共同的传统和民主文化。德国的崛起及其对欧洲稳定构成的威胁使伦敦有强烈的动机寻求与美国实现关系缓和，这使英国能够召回大西洋舰队应对更靠近本土的挑战。然而，共性和战略动机根本不足以确保和平交接。罗马和君士坦丁堡具有共同的传统、宗教和统治制度。他们每个都面临着紧迫的外来威胁。3世纪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半是人为设计的结果，不是自动出现的。然而，他们的历史却是一个为争夺优势地位而进行杀戮和斗争的历史，不是通融和和平的历史。

美国治下的和平像由英国到美国的和平交接，还是更像罗马人和拜占庭人之间的流血经历，美国的所作所为将是主要的决定因素。如同英国在19世纪最初十年，美国现在是处于支配地位的霸主，因此美国掌握着主动权。如果美国和欧洲要走互

惠克制之路而不是走彼此对抗之路，那么美国就必须首先做到通融，为新来者让出空间。幸运的是，美国拥有欧洲这样一个意愿伙伴。双方有长期的共同历史，分享某些共同的价值观。欧洲决不是需要严厉遏制的扩张性掠夺者，欧盟决心要得到的是更大的地缘政治发言权，而不是征服和主宰。倘若美国证明能够驯服自己的单边冲动，那么欧洲有限的野心将使我们有理由对互惠和通融的前景抱谨慎乐观主义。

克林顿政府在正确的方向上迈出了重要一步，他比前任更为支持欧洲统合。在冷战时期，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一样都表达了对统合的公开支持，但是，怀疑欧洲力量会牺牲美国影响力的暗流一直制约着华盛顿的热情。克林顿团队对这种传统进行了反击，他们对欧洲单一货币和将要获得更大统一性和更多成员的欧盟集结了强烈而真诚的支持。克林顿明白，更强大和更自信的欧洲最终对美国有利。

然而，克林顿团队容忍更强大欧洲的能力是有限的。当2000年欧盟开始致力于建设独立的防御能力时，克林顿政府出于习惯而不能听之任之。布什的顾问们对欧洲防御志向的态度也一样是犹豫不决的——甚至当他们明确表示有意减少美国对欧洲的战略承诺时，也是这样。毕竟，在确定强弱次序和由谁指挥主导方面，对安全事务的控制是决定性的因素。

华盛顿总体上对欧洲地缘政治野心的怀疑性反应，只是清楚地说明了，美国处理瓦解中的优势地位将是何等的困难。然而，抵制欧盟走向成熟，会使向多极世界的平稳与和平过渡变得更不可能，美国正在丧失机遇对增长中的欧洲力量进行引导，以便使之成为美国的补充，而不是成为美国的挑战。与抵制相反，美国应该欢迎所有方面的欧洲统合，包括防御方面，把战略克制用作一种工具以接触欧洲、影响欧洲地缘政治志向的发展轨迹。

为摆脱当前的困境以及由此产生的恶意，欧洲应该着手建立一支能够自主采取军事行动的军事力量。欧盟必须监管国家防御政策的进一步协调和统合，寻求在集体基础上拟订采购项目和改革，这些是为赋予欧洲更多能力所必需的。欧洲各国政府也需要开始为这些新的防御计划奠定必要的政治基础。由义务兵转为职业军队、提高装备和训练、合并各个国家的军事计划和采购程序、增加防务开支——这些任务都需要公众的理解和新层次的集体意志。

作为回报，美国应该停止对欧洲挙措挑三拣四，为其提供新的交易：以能力换影响。美国同意赋予欧洲更大的发言权，使之与欧洲更大的能力相一致。美国应该清楚说明，美国准备支持交易结果，积极寻求以各种方式向欧盟转交更多的职责。在北约指挥结构中给欧洲人更多的影响力，将是正确方向上的一个步骤。2000 年 1 月，在科索沃使命中，北约决定把军事行动的指挥权赋予欧洲军队，这是一个积极的姿态。

随着欧洲防御能力和集体意志的发展，美国应该寻找办法同欧洲建立更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这意味着，美国要更多地同作为一个单一政体的欧洲进行外交接触，而不是主要通过各个国家的首都做工作。这意味着，美国应在实施重要政策倡议之前与欧盟全面磋商，而不是单边地采取行动，事后再向欧洲做简报。这还意味着，美国应通过公众教育运动确保国会和美国人民把欧洲看作新兴的平等伙伴，而不是看作战略负担或战略对手。

当美国和欧盟寻求建立新的更均衡的大西洋纽带时，他们应该相互合作，携手完成两个遗留的任务：巩固东南欧和平和将俄罗斯融入欧洲计划。欧洲的东南侧仍是它最麻烦的区域。帮助

北欧实现民主化和安定的那些历史发展因素——工业化、跨越种族界线的阶级的形成、教会与国家的分离——在东南欧进展不顺。因此,种族、宗教和竞争性历史诉求仍旧与政治紧密纠缠。

尽管和平的革命几乎横扫南斯拉夫,于2000年将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总统赶下了台,但是塞尔维亚和黑山的联盟仍然脆弱,可能再次走向分裂。代顿协议已经在波斯尼亚维持了六年的和平,但这只是因为北约军队随时做好了干涉准备。如果国际社会转身离去,战斗则可能会重返波斯尼亚。阿尔巴尼亚只在名义上是一个国家,中央政府对国家大部分地区没有有效的控制,而且腐败蔓延。希腊和土耳其仍旧是互不放心的邻居,他们的政治家经常相互指责,他们的飞机经常相互攻击,且仍旧是敌对性的和危险的,爱琴海上的空战时而发生。除非这些恼人的争端得到解决,否则他们将继续让欧盟陷于泥潭难以自拔,并消耗欧盟的外交和军事资源。如果这个十年是美国向欧洲转交管理其自身安全的主要责任的过渡期,那么美国和欧盟就必须首先合作,确保这些历史分裂得到永久性修补。

巴尔干地区的和平现在正被军事压制(北约维和力量提供)、政治托管(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高级代表办公室提供,Office of the High Representative)和经济援助(主要由欧盟提供)合力维持着。希望是,该地区逐渐融入欧盟会带来奇效,最终使至少现在还引起激情与冲突的种族和政治边界变得不再重要。虽然在原则上很敏感,但是这个战略存在一个主要的时间问题。巴尔干地区四分五裂的国家要准备好加入欧盟,需要一代人的时间,如果不是两代的话。同时,种族仇恨会继续恶化,亲眼看见父母被邻居屠杀的孩子并不容易原谅和忘却。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和欧盟在巴尔干地区正陷于一种盘旋状态,在适当的时间段内,他们难以指出一个稳定的降落终点。在融入欧洲的进

程持久性地改变现状之前，美国和欧盟可能会丧失耐心、耗尽资源。

由于将巴尔干地区融入欧盟还是一个最后目标，因此需要在较近的时期内采取措施使该地区实现更高水平的稳定，哪怕是临时性的。这个临时目标应该是一个自我持续的地区秩序，或者至少是一个更少依赖外来军团、管理者和援助工作者的地区秩序。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承认，在整个巴尔干地区维持多种族社会，不管在原则上多么值得赞赏，但在实际上却是行不通的。拥有最大种族同一性的国家——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在政治和经济改革方面是走得最远的。拥有大量少数种族的国家已经彻底解体了，并正在被一条最不牢固的线连在一起。科索沃现在除了名义上，已经完全独立于塞尔维亚。波斯尼亚已经分裂成塞尔维亚族、克罗地亚族和穆斯林三个部分，他们几乎不能相互容忍，只是在国际社会强迫下假装是一个统一国家的组成部分。马其顿在整个 90 年代一直能够避免流血杀戮，但是到了 2001 年，它却成了斯拉夫人多数群体与阿尔巴尼亚人少数群体之间暴力冲突的牺牲品。

因此，回报的日子指日可待，这一天可能涉及疆界的重新划分和新的为实现持久稳定带来希望的领土安排。科索沃最终将不得不从塞尔维亚分离出来，或者被承认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或者被承认为一个自治区。马其顿有机会继续维持一个多种族国家，但是它的统一性需要国际社会的细心监管，以及政府为改善阿尔巴尼亚族少数群体的权利和社会地位作出真诚的努力。

波斯尼亚提出的挑战更大。它是政治上的无人地带。国际社会像粘附力极强的藤壶(barnacle)* 一样与波斯尼亚实质性地

* 一种附在岩石、船底上的甲壳动物。——译者注

联结在一起，居于国家之上，试图通过与监管流血冲突相同的政治党派和看管体系进行统治。代顿协议应该为修复种族分裂、鼓励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再次一起共同生活提供一个框架。但是，几乎没有难民返回到可能使他们成为少数种族的村落。三个极端化的群体宁愿接受来自欧盟的经济援助，也不愿重建跨越种族边界的经济纽带。悲哀的事实是，波斯尼亚已经在种族上割裂开来，根本看不到任何和解的迹象。

如果波斯尼亚不再是国际社会的保护地，那么美国和欧盟必须要么大踏步前进，要么大踏步后退。前进，需要给高级代表办公室赋予更大的权威，使之用高压手段进行统治，打破连续使波斯尼亚政府狼狈不堪的障碍。它意味着改变该国选举制度，解除民族主义政党对政治的扼制，为愿意跨越种族界线的候选人留出空间。它还意味着命令北约部队逮捕所有被指控的战争罪犯，而不是在有些人仍逍遥法外时指望其他途径。前进，还必须作出更严肃的努力将难民返回他们原来的家乡，使在战争中遭到种族清洗的城镇和村落恢复至少某些多种族特征。

如果国际社会不准备冒险采取这些行动，那么它必须大踏步后退，减少损失。这个方法需要放弃对多种族波斯尼亚统一性的维持，撕毁代顿协议，让克罗地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呆在一切。最好面对现实，让务实战胜原则，不要花费稀缺资源和政治资本，假装它们是有回报的。

巩固希腊和土耳其之间的关系缓和是东南欧最后一个未竟事业。1999 年，双方实现了重要进步，他们相互帮助从袭击该地区的地震灾难中恢复过来。土耳其外交部长伊斯梅尔·杰姆(Ismail Cem)和希腊外交部长乔治·帕潘德里欧(George Papandreou)相互访问，建立起了真挚的个人关系。希腊在当年年底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支持土耳其开始同欧盟谈判最终加入的

问题。然而，土耳其未能以同样重要的姿态进行回报。萌芽中的关系缓和于是停滞了，希腊的乐观主义变成了怨恨。

美国和欧盟应该使用一切可能的杠杆鼓励双方实现和解、交换让步而不是交换谴责。将土耳其更全面地带入欧洲市场和制度——并以土耳其在与希腊关系问题上采取更进步的立场为实现这种统合的先决条件——这个方法提供了最佳希望。没有任何东西比关系缓和更有利于结束东南欧分裂和冲突的漫长时代了。安卡拉和雅典之间的和解还有助于为塞浦路斯带来稳定的和平，该岛几十年来一直被国内希腊人和土耳其人两个群体之间的敌对所折磨。

俄国与更大欧洲的联结是完成欧洲计划和使欧洲更自力更生的另外一个关键步骤。自从 17 世纪现代国家体系出现以来，俄国一直是欧洲地缘政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俄国帮助击败了拿破仑法国，接着又成为欧洲协调的主要成员。苏联还在二战中为击败德国发挥了核心作用。

过去不仅说明俄国在塑造欧洲大陆地缘政治的过程中发挥了突出作用，而且还说明了将俄国与现代欧洲联结在一起的重要性。正如欧洲协调经验已经清楚显示的，胜利者在建立新秩序时必须接触被击败的对手。欧洲协调能够维持几十年的和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因为它颇有远见地将战败的法国包括在自己的行列中。法国因此重新崛起为一个合作性国家，而不是一个被羞辱的和充满怨恨的国家。同样，二战后安排的精髓在于将战败德国并入北约和欧洲计划，从而为民主、繁荣和统一的德国成长为欧盟的依托之一铺平了道路。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凡尔赛和约对一战中战败的德国施加了惩罚性的和平，结果导致德国穷困、疏远，并为一系列后来使希特勒和纳粹控制大部分欧洲的事件准备了条件。

我们似乎已经忘记了这些重要教训，进行中的欧洲建设有把俄罗斯排除在外的危险。美国及其盟国不是尽其所能让俄罗斯参加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之后的领土安排，而是反其道而行之——不管莫斯科多么激烈反对，照样扩大北约，并建立更广泛的大西洋安全秩序，这个秩序仍把俄罗斯当作外人对待。

要让欧洲不出现新的分裂带，需要决定性地改变路线。北约的扩大，不是集结美国和欧洲的力量反对俄罗斯，而应成为聚合和限制俄罗斯力量并将其向欧洲方向引导的工具。正如如果要减弱大西洋两岸的竞争，美国就必须实行克制和为欧洲留出空间一样，如果要避免欧洲出现新的分裂，北约就必须在自己的行列中为俄罗斯留出空间。随着北约扩大的继续，这个方法还会使整合波罗的海国家和其他中欧国家变得更容易，如果俄罗斯开始把北约不再视为威胁，而是视为其安全不可缺少的部分，那么这些国家将会同俄罗斯一起加入，而不是反对它。

北约是成就此事的恰当工具，这既是因为美国权力和杠杆是把俄罗斯向西拉动所必需的，也是因为联盟是推动民主化和安定化的历史进程逐渐向东扩展横跨欧洲的主要优势所在。北约阻止战争的爆发，推动和解和统合；欧盟接着在北约止步的地方继续推进，使统合成为不可逆转，使成员国之间的和平成为不可改变。俄罗斯距离准备好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所要求的经济和政体条件还有几十年。但是，俄罗斯达到使之有资格加入北约的标准却可能只有几年，这是在欧洲新秩序中为俄罗斯找到一席之地的重要的第一步。正如俄罗斯在反恐战争中的合作已经十分清楚地显示的，俄罗斯为北约国家的集体安全作出贡献对于它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北约成员国准备进一步扩大联盟，他们必须改变视野，把扩大从旨在稳定中欧的战略，转变为让俄罗斯融入欧洲成为

头等大事和终极目标的战略。扩大俄罗斯在北约审议中的作用，作为在莫斯科帮助打击恐怖主义之后已经采取的步骤，是正确方向上的一个举措。但是缺乏完全成员身份的措施最终将证明是不充分的，如果被当作二等公民对待，那么俄罗斯人就有理由回避。下一轮扩大应该按计划进行，但是，与此同时，北约应该开始与俄罗斯就最后成员身份问题进行严肃的对话，应该起草一个时间表，或许 2010 年可以作为俄罗斯加入北约的最初目标日期。

俄罗斯改革失败，取消加入北约和进入欧洲的选择，也是完全可能的。但是，至少西方已经为争取俄罗斯加入，使其感受军事和政治统合的安定效应，作出了真诚的努力。危险是低的，只有俄罗斯改革取得进展，它才能在北约拥有完全发言权。但是成功的回报将是实质性的——俄罗斯的民主化、安定化和融入欧洲。

坦诚地说，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北约一点也不像存在于冷战期间的联盟。它不是集中关注成员国的领土防御，而是为在整个欧洲协调维和行动、打击恐怖主义、实施其他军事活动提供便利。它将会更松散、更灵活，摒弃防御保证，支持合作和共识的非正式习惯，这些都曾经是欧洲协调的生机根本。这是能够完成将俄罗斯并入欧洲任务的惟一类型的北约，将俄罗斯并入欧洲是美国的一个首要目标，因为美国在寻求减少对欧洲大陆的安全承诺，并试图与和平欧洲建构新的关系。而且，由于美国人认识到，他们不再有兴趣将自动防御保证扩展到全球各个角落的国家，因此，这也是有机会维持美国国会和选民支持的惟一类型的北约。

正确地把职责由美国移交给欧洲应该是美国大战略的一个关键目标。忽略它的危险是很高的，恰恰因为它是一个比，例

如，颠覆塔利班政权或处理对华关系更微妙的挑战。但是它的回报也是相当可观的。大西洋纽带是美国治下和平的中流砥柱，欧洲实际上在每个阵线上都是美国的主要伙伴。任何一方都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这种关系在大西洋两岸实现更平等的权力分配之后还会继续更长久地存在下去。相反，更多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远见卓识和愿意接受新的更均衡的关系，有助于确保，甚至当欧洲和美国成为竞争者时，他们也不会成为对手。

## 东　亚

在东亚，美国面临的是不同的战略挑战，尽管这个挑战美国更熟悉。不像在欧洲，东亚各国没有利用美国的保护伞实现地区统合和修补地缘政治分裂。结果，美国军队和外交仍然在维持稳定均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欧洲现在可以自力更生，部分因为德国愿意公开处理它的过去，一道进行非纳粹化和地区和解。与此同时，亚洲国家保留着世代之久的敌对性，中国和韩国非常有道理地对日本感到不满，日本一直犹犹豫豫不情愿处理历史上的阴暗时刻。德国于2001年在柏林开设了一家犹太人博物馆，它的焦状设计旨在纪念大屠杀（Holocaust）和德国犹太人的命运。相比而言，东京市区靖国神社内的战争纪念博物馆却在美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主展厅里炫耀的是日本臭名昭著的自杀鱼雷和飞机。日本还尚未痛痛快快地承认过去。

对中国长期意图的不确定进一步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美国能够承受为欧洲留出空间，而且事实上必须如此，恰恰因为它有信心欧洲不会变成掠夺者。欧洲可能会炫耀武力，更有规则地坚持立场，但是，它不会发展帝国野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英国对美国崛起的通融是一个恰当的历史类比。英国相信美国

不会伤害它，因此有信心从事战略克制活动，英国的战略克制加上美国的回报，最终使他们形成了持久的伙伴关系。

至于美国对中国的当代接触，英国和威廉德国（Wilhelmine Germany）的关系疏远，而非英国与美国的关系缓和，可能是更恰当的历史类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十年，英国面临的德国不仅是一个崛起的力量，而且是一个下定决心要主宰欧洲的力量。德国凯撒利用民族主义手段阻止民主化、拉拢工人阶级，从而形成了军事力量与地缘政治野心的危险组合。对于英国来说，为德国留出空间等于邀请德国入侵——这恰恰是伦敦20世纪30年代绥靖政策的结果。

在中国发展的现阶段，不可能预测它的意图将会如何变化，以及它同美国的关系是走盎格鲁-美利坚关系缓和的良性道路，还是走盎格鲁-日耳曼对抗和战争的恶性轨迹。因此，美国还没有获取足够的信息来决定它应该为中国雄心留出空间，还是果断地寻求封锁它的发展道路。对于华盛顿来说，以对欧洲让步的方式通融中国，将是天真的，北京的意图很可能需要制约。但是，认为中国已经是对手需要进行严厉遏制的假定，也是一样站不住脚的——而且可能变成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在现在进行的有关中国未来的大辩论中，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都是不精确的。[28]不论宣称中国是一个战略伙伴，还是宣称中国是一个不可调和的对手，都实在太早了。

此外，美国能够承受对中国采取等待和观望态度。尽管悲观主义者发出了最响亮的警告，但是中国并不具有成为美国主要竞争者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中国的GDP在2001年是1.3万亿美元，而美国的GDP是10.2万亿美元——几乎大到8倍。仅仅一个加利福尼亚的经济就比中国的经济还大。[29]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的国防开支大约相当于美国国防开支的5%，而且它

跟不上美国增加军费的步伐。2002年布什总统提议增加480亿美元军费，这个数字本身就超过中国全部军事预算的两倍。[30]美国舰队中有12艘航空母舰，并正在增加第13艘。中国海军没有一艘航空母舰。如果一切顺利，中国能够在十年之内成为可敬的中等力量，但是它决不会很快成为美国的主要挑战者。

与其急着作出不成熟的判断，美国不如在现阶段集中精力塑造中国成长中的雄心的特性，将其日益增加的力量向良性方向引导。华盛顿应该发出信号告诉北京，通过克制其雄心的范围，中国事实上可以扩展其杠杆和操作空间。这个任务意味着接触而不是孤立中国，提升北京的地位和发言权以满足其对更高国际等级的渴望。目标应该是找到恰当的方法，容许中国逐渐崛起为主要大国，同时制止中国可能将意图向侵略性转变。美国必须寻求聚合和限制中国，但是要继续警惕中国拒绝配合的可能性。

将这个战略付诸实践意味着将美国政策划分为三类。第一，美国应该确认对中国特别敏感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美国应该寻求特别谨慎的对待。华盛顿应该解决中国人普遍存在的，认为美国蔑视他们，不重视他们国家的印象。最近在北京大学校园的一次谈话中，一位高级外交官解释说："我们不指望平等，但是我们的确指望尊敬。我们能够接受美国像富人对待穷人那样对待中国。但是我们不能接受美国像骑手对待马匹那样对待中国。"

改正这种印象，不仅需要改变美国外交的一般宗旨，而且需要美国在具体问题上实行战略克制。美国可以支持台湾，但不必用最新一代的武器武装该岛，国会和白宫也不必发表嘲弄性的声明。华盛顿还必须极其谨慎地处理导弹防御问题，在进行研发和部署时与中国保持磋商。如果中国认为其原始落后的核

武库将因美国防御体系而失效,那么它会实质性地增加自己的核能力。忽视中国的忧虑可能不仅毒害中美关系,而且还会导致新的核武器建设。

第二,美国应该确认准备坚定立场的核心问题。目的是确定外围界线,在这个界线之内,中国需要遏制自己的行为,同时还要确定标准,以此判断中国的意图。北京对这些界线的跨越将是其侵略性意图的暗示,从而为美国政策从接触变为遏制提供证据。中国在边界以外使用武力,将明显构成对这个外围界线的突破。

第三,美国应该寻求扩大和深化已经同中国具有共同基础的领域。双方在结束朝鲜半岛的分裂方面具有很大的共同利益。华盛顿和北京应该在这个问题上更紧密地合作,美国通过汉城做工作,中国则利用它在平壤的特殊影响做工作。贸易显然是另外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美国公司渴望获得更大的中国市场准入,中国公司已经从每年超过1000亿美元的对美销售中受益良多。[31]

欧洲在经济方面可以潜在地发挥重要作用。欧盟的军事影响力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可能只限于本地区,但它的经济参与却是全球范围的。1996年,欧盟和十个亚洲国家开创了亚欧会议(Asia-Europe Meeting,ASEM),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问题上实行合作。特别由于欧盟没有带着与美国及其霸权姿势相伴的政治职责,因此,它或许能够在将中国带入全球市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潜在的回报远远超过贸易扩大带来的共享收益。伴随中国融入全球市场的经济自由化有可能造成政治自由化。促进这一进程的是大量的、而且数量还在不断增大的,在美国读书的中国留学生,他们中有些回国后在中国的主要城市中心工作。像上

海这样繁荣兴旺的城市拥有最自由的政治,并不是偶然的。在国际市场上开展竞争和吸引外国资本,需要的并不仅仅是透明的会计程序,而且还有适宜的政治环境。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准备放松它的控制,经济自由化不能保证政治变迁。但是,中国稳定、持续地融入全球经济,肯定会更有助于支持中国推动改革和向民主逐渐转变。

地区统合是中美实现更大合作的另外一个领域。连续几届美国政府都普遍阻挠在东亚建立没把美国包括在内的地区论坛。华盛顿在20世纪90年代初反对建立亚洲独自(Asia-only)的贸易协定,阻止日本建立亚洲基金以管理该地区1997—1998年金融危机的尝试,还一贯抵制创建亚洲独自的安全论坛的努力。反过来,美国建立了一种轴心－轮辐(hub-spoke)式外交结构,有效地使自己成为东亚的核心和该地区大国关系的主要媒介。这个战略将美国影响实现了最大化,促进了美国在该地区维持稳定均势的能力。但是,它也阻碍了地区统合,妨害了和解和关系缓和的进程,而如果东亚要建立更少依赖美国的秩序就必须在关系和解和缓和方面向前推进。

华盛顿不应该阻挠而应该欢迎亚洲独自的地区统合,即使这会牺牲美国的影响力。美国不能永久性地承担维持和平的职责。该地区最终将需要一个自我持续的秩序,修复政治和意识形态分歧是一个只有该地区各国自己才能够完成的任务。除了欢迎和促进所有东亚国家相互更直接的联系,美国还应特别向日本和中国施压,让他们搁置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挥之不去的怨恨,着手缓和关系。正如法德组合已经成为欧洲稳固和平的关键一样,如果东亚地区要拥有持久稳定,东亚两个主要国家也需要紧密团结。

当然,提及中日联盟,如果不是幻想的,也是不成熟的。这

两个国家决不是伙伴，他们深陷敌对的对话和姿态之中，美国的军事存在维持着对双方的遏制。但是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和解在1945年是一样难以置信的。今天，法德联盟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两国领导人有勇气设想这个联盟、实行战略克制、并推动了将其变为现实的统合进程。

加力推动东亚的和解和统合需要的不仅是勇敢的领导才能，而且还有日本更公开地处理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行为的意愿。日本人最近几年在承认日本对邻国的侵略并对此表示懊悔方面有些进步。但是，谨慎的道歉和半心半意的承认还常常伴随着只会重揭旧伤的行动。

2001年初，日本官方发行了新版高中教科书，该教科书为日本在东亚的征服作了辩护，略去了日本的战时暴行，包括日本军队在韩国建立的性奴隶体系。作为回应，中国政府取消了对日本的高级别访问，宣称教科书"否认了日本的侵略历史"。韩国从东京临时召回了大使。韩国外交部长韩升洙(Han Seung Soo)指出："我们一直是来自日本的历史不幸的接受方"。他还抱怨说，"这个教科书"给两国之间正在出现的关系缓和"泼了一盆冷水"。[32]2001年8月，日本首相小泉参拜供奉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军国主义战犯的靖国神社，激起了相似的严厉回应。韩国宣布，除非小泉对日本战时暴行正式道歉，承认新教科书中的不恰当内容，否则金大中总统将取消同小泉的会晤。中国主席江泽民也推掉了同小泉的会晤。[33]

日本和中国之间真正的开放首先需要真正公开和解释日本的过去——包括重写历史教科书，开展广泛的民间对话，重新考虑某些博物馆和神社是否恰当地对日本战时行为进行了纪念。德国最近的历史清楚说明，内部反省是实现外部和解的必要先导。另外，日本应该寻求扩大在中国的投资和同中国的贸易，促

使经济动机和更多的联系能够将两个国家拉得更近。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尤其受中国人的欢迎。

要让中国同日本的关系超越冷和平，中国也有事情要做。如果日本更公开地处理它的过去，北京应该热情回应。对于北京来说，尤其重要的是，应该利用日本的果敢解释和道歉影响本国民意，缓和中国社会对日本的深刻憎恨。根据1997年的民意调查，超过40%的中国人对日本的印象是“坏”，44%对日本的印象是“一般”，只有14%对日本有好印象。超过80%的受访者表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及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行为仍然是他们对日本的主要联想。[34]解脱源自这些公众态度的国内约束，是中国为实现关系缓和扫清道路所必需的。

日本民众对中国的消极态度虽然比中国的反日情绪微弱得多，但是它对东京的操作空间构成了同样的限制。日本民意一直对中国国内政治特别敏感。在这方面，北京进一步改革该国政治制度和改善人权记录的意愿，将有助于东京维持对中国的开放。

中国还应该更能接受同日本政治家进行定期和高层接触，以及日本的军事建设。两国1972年建交，但是直到1998年中国国家首脑才访问日本。江泽民主席访问带来的结果坏处大于好处，因为日本政府拒绝在联合公报中为过去道歉。江泽民于是将这个问题变成了日本之行的中心。尽管高层会晤在继续，但是它们对于推动真正政治开放的发展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日本和中国的军事联系，虽然在频率上有所增加，但还是稀缺，这加强了北京和东京之间的疏远。经过多年的孤立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只是最近才同意进行定期的信息和人员交流。如果要克服几十年的相互疑虑，中国需要显示，它准备参加更广泛和更频繁的双边活动，包括联合军事演习。两国还应该利用由

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主办的定期的地区论坛,推动双边议程的发展。

无数障碍横在关系缓和的道路上。中日疏远是中国和日本生活中的很大一部分,就像东西对抗是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生活中的很大一部分一样。此外,日本和中国的政治体制决不是彼此相容的。日本根深蒂固的保护体制妨碍了急切需要的国内改革。那是日本经济十多年来一直萧条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政府一样厌恶改变。它受到的威胁是,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的共产主义政权已经崩溃,以及全球化具有自由化的要求。它缺乏信心,不敢冒接触日本的风险。北京当局的动机可能是求助于民族主义吸引力以提高日益衰减的合法性。虽然这些障碍并不是不可逾越的,但是它们的确清楚地说明了,美国的鼓励和压力对于促使日本和中国开始修复东亚的主要分裂是何等重要。

中日关系缓和、地区统合和东亚多极格局的最终驯服都是遥远的前景。然而,他们却提供了惟一替代方案,取代仍然严重依赖美国看管的地区秩序。美国不会很快撤出,风险中的利益和对这些利益的威胁仍然很高。因此,美国变革中的国际主义对东亚的直接影响将小于对欧洲的直接影响。

然而,假定东亚的现状可以无限维持下去,却是一种危险的幻觉。如果朝鲜和韩国之间的和解向前推进,那么它可能对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范围和宗旨带来相当大的影响。虽然朝鲜已经表示,甚至在统一之后他们可能欢迎美国军队的存在,但是朝鲜半岛上地缘政治分裂的缺乏,可能会削弱证明美国有必要在东亚采取进取(forward)姿态的主要使命。如果那个使命消失了,就很难提出理由——在美国以及在美国的地区盟国,如日本——证明这个进取战略应该以当前的形式继续存在下去。审慎的做法是,美国同东亚主要国家之间应就如何推动建立更自

我持续、更稳定的地区秩序开始展开严肃认真的对话。

如果东亚最终能够走上和解和统合之路，那么那时全球体系将由三个主要集团构成——北美集团、欧洲集团和东亚集团。表面上，这个构想有可能成为防止三个地区巨兽之间发生冲突的药方，而不会成为走向全球稳定的路径。但是事实上，地区基础上的统合为多极世界的和平回归提供了最佳希望。战争与和平是从地区开始的，而不是从全球开始的。只有邻国之间享有了和平，他们才能与远处的他国建立稳定和亲切的关系。毕竟，在20世纪30年代，直到德国和日本征服了他们的邻国之后，他们才集结了足够的力量和野心，构成了更广泛的威胁。借用哈佛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的术语来说，在全球层面建立和平的现实主义计划必须开始于建构“部分的和平”。[35]

恰恰因为战略克制的实行和权力制约方法的使用才使地区和解和统合的进程成为可能，因此，它们将产生只具有有限地缘政治野心的地区集团。美国对全球领导地位的矛盾心态有其政治文化和宪法制约方面的根源，这些因素是伴随联邦建立而进行的几十年妥协和辩论遗留下来的。欧盟的地缘政治野心将继续受制于欧盟超国家机构与各成员国之间的拉锯。东亚地区集团的对外野心也将与此相似地受制于中日联盟的自我制约特性，以及促进该地区各个国家之间实现统合所必需的聚合性和限制性协议。在亚洲，跟在欧洲一样，语言和文化分裂线会减慢集权化，确保地区集团不会变成具有掠夺野心的统一国家。如果地区统合的进程得到正确把握，那么其前景将不会是冲突中的巨兽，而是更多以管理内部关系，而不是以在全球舞台上投射影响为关注焦点的地区组织。

## 发展中世界

建立部分和平还因最后一个原因而具有意义。地区性稳定区不仅为更发达国家之间的进一步和睦，而且为推动发展中世界的政治现代化和经济增长，提供了最佳希望。面前的挑战是，如何说服北方，使之与南方接触，而不是转过身去，使自己远离贫穷和疾病。答案存在于两个现实之中——利益比利他主义在产生行动方面更有说服力，利益即使在数字时代仍因临近而加强。

美国比欧洲或亚洲更有兴趣为拉丁美洲带来和平与繁荣。当贫穷和不稳定向北传送毒品和难民时，美国将付出沉重的代价。相比而言，当拉丁美洲的新兴市场走向繁荣时，美国将受益于贸易的扩大和向北移民潮的减小。利益还解释了为什么中南美洲国家积极寻求扩大已经在北美出现的自由贸易区。他们知道，没有比参与地区统合计划更好的道路走向繁荣。因此，扩展中的美洲和平和自由贸易区，代表了逐步缩小贫富差距的最佳希望。

同样的逻辑在欧洲和亚洲也是适用的。欧洲人比美国人或亚洲人更对北非事务感兴趣。如果暴力冲突或政治崩溃吞没了这个地区，那么难民潮将要涌向的是欧洲。因此，欧洲对于推进南部周边地区的发展具有直接和紧迫的利益。欧洲的周边国家，不论通过正式的成员身份，还是通过较不正式的政治和经济联系，也都致力于将自己与欧盟挂钩。因此，巨大的向心力从欧盟核心向外扩展，影响力波及到了欧盟正式边界以外的东欧、中东和非洲。

亚洲的地区主义落后于欧洲和北美的地区主义。但是，如果更深入的地区统合的确开始起步，那么它也会对周边地区产生相似的影响。把印度并入亚洲扩展中的繁荣区，肯定会帮助将这个世界上人口第二多的国家融入全球经济，或许把巴基斯坦一并带上。他们之间的麻烦关系将从中受益，就像西班牙和

葡萄牙加入欧洲统合进程之后所表现的那样。中国同印度接壤，这使它在印度的康宁和南亚的整体稳定中具有直接利益。与此相似，在整个90年代，日本前后一致地将至少60%的对外援助预算花在亚洲，或者，1999年在东帝汶部署的维和部队大多数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马来西亚和其他附近国家，这些都不是偶然的。[36]临近的确重要。地区和平的富裕区在北美、欧洲和亚洲的形成，对于发展中世界而言并不是灵丹妙药。但是，较穷国家与临近繁荣区联结在一起，相比被抛在后面的替代方案，为他们提供了更美好的未来。

甚至当地区的和平和繁荣区向临近周边扩展影响时，美国在中东还是有特殊作用要发挥。确保获得该地区的石油、保护以色列的安全、打击恐怖主义及其来源，使美国在继续进行全面参与方面具有直接利益。同时，认真思考华盛顿如何调整中东政策，不是要向恐怖主义鞠躬屈服，或者使其不正当目的合法化，而仅仅是要正确认识该地区的复杂政治形势，并改善美国驾御它的能力。

中东地区反美情绪的主要根源不在于美国的行为，而在于该地区自身的失败——贫穷、收入不平等、政治压制、国家控制的媒体、种族和宗教对抗、糟糕的教育制度。面对这些条件的政权本身应该首先受到谴责。但是，政治家、神职人员和极端主义集团操纵并利用了这种疏远关系。他们将责任推卸给以色列、美国和西方，接着寻求利用责任推卸造成的动员效应进一步达到他们的目的。对西方的愤怒经常与宗教极端主义相互混合，形成一种爆炸性的组合。因此，这个地区的麻烦主要是本地固有的，具有深刻的历史和政治根源。不管华盛顿的行为和阿以冲突的状况如何，伊斯兰国家都将继续把至少某些怨气撒向美国和西方。仅仅因为这些，美国也应该明智地通过控制消费和发展替代能源来减少对该地区石油的依赖。

然而，美国能够而且应该采取步骤转移这种怨恨，使其转向应为贫穷和不平等负主要责任的当地政党，并致力于减少被恐怖主义集团利用的社会不满。特别是，当华盛顿使用高压手段消除恐怖主义以中东为基地的巢穴时——这是必须的，它应该确定同时采取步骤以避免引起对抗性反应和怨恨的加深。

帮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实现和平解决是关键的第一步。美国承担不起远离巴以争端的后果，就像布什政府开始时尝试去做的那样。不论是否得到证明，在整个伊斯兰世界，美国被广泛看作是以色列的坚定支持者，反过来，以色列则被看作是西方在伊斯兰土地上的外国前哨。这种认识不会因为美国政策的逐渐转变而改变。反之，和平解决和巴勒斯坦国的最终建立是惟一出路。

反美情绪和恐怖主义决不是阿以争端的直接副产品，美国因此应该不要抱着这些麻烦将随和平协议的达成而消失的幻想白费力气。相反，恐怖主义集团经常反对协商达成的解决方案，明确寻求通过对以色列实施恐怖袭击，以破坏性努力达成解决方案，因此它使以色列的态度进一步强硬，右翼力量进一步加强，妥协进一步受阻。这个战略背后的动机恰恰是自我利益。极端主义集团扩大队伍，并从不满中获取政治动力。阿以争端越是残酷和棘手，这些派别的处境就越好。

但是，恰恰因为恐怖主义团伙的不满，和平解决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争端才变得如此重要。和平解决将至少消灭怨恨的一个来源，这个怨恨是大部分阿拉伯世界对美国和更一般意义上的西方所怀有的。它将意味着，阿拉伯领导人必须开始为他们的失败负责，他们再也不能谴责外来力量了。它还会使美国在该地区更容易地追求其他目标，美国的存在将不能再等同于巴勒斯坦人的苦难。

美国还应该寻求,通过对该地区人民的苦难表现出更大的敏感性来减少伊斯兰世界的反美情绪。在对塔利班和基地组织进行轰炸期间,向阿富汗人民空投人道主义援助,是一个有用的举措。美国可以减少在阿拉伯半岛军事存在的能见性,而不必损伤保护石油流动和开展反恐战争所需要的能力。美国应该在公共关系方面采取步骤,通过文化和教育交流,以及用当地语言进行广播,来向当地人民解释自己的情况。

在伊拉克,美国明智的做法应该是降低期望、迅速向伊拉克人民归还权力。伊拉克或许可以成为一个多元民主国家,但是,那需要十年或二十年时间,而不是一年或两年。尤其是,如果针对美国目标的袭击持续下去,那么美国人将决不会坚持那么长时间。美国决不会选择立即撤离——这是一种将让中东倒退、让美国在世界上名誉进一步遭到玷污的选择。但是,华盛顿应该认识到长期占领的危险性,并采取相应行动建立一个有效的伊拉克政府、限定美国在该国的逗留期限。

简言之,美国应该更多地意识到,甚至当它实施善意政策时,它在中东也经常被看作是盛气凌人的、帝国式的强国。这种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它与这个地区和美国的全球优势地位相伴。但是,华盛顿确实能够做得更多以减轻怨恨的程度。因此,在反对极端主义团体的斗争中,力量和机警需要与战略克制实现谨慎的平衡。

最后一个建议是,美国应该制定一个长期计划,逐渐消灭整个发展中世界不满情绪的潜在根源。这个计划应该以政治自由化、中产阶级的发展、教育机会的改善和社会制度的现代化为目标。解决贫富紧张关系的长期方案,最终需要缩小超前者和落伍者之间的距离。在这方面,地区繁荣区向较穷周边的扩展是一个必须,但是,北方改革更宽泛的发展援助的方法也是一种必须。

改革意味着认识到各个地区贫穷和发展落后的根源存在很大不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大多数国家拥有必要的资源和基础设施来支持较高水平的繁荣。然而，他们却被糟糕的经济管理、腐败的司法制度和巨大的社会不平等所拖累。尽管人均收入高于其他发展中地区，但是该地区三分之一的人口却生活在贫困中。[37]虽然改进医疗和教育，以及为穷人提供基本必需品，都需要额外援助，但是首先需要的是改善统治制度和司法体系。该地区逐渐融入美洲自由贸易区也有助于减少贫困和鼓励改革，就像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NAFTA）给墨西哥带来的变化那样。

推动非洲和南亚贫困国家的发展是一项更困难的挑战。这些国家中很多只拥有最基本的经济和政治基础结构。沉重的贫困普遍存在，教育和医疗体系还非常原始，或者在某些地区根本没有。在次撒哈拉非洲，生活在贫穷地区的女孩，能够上小学的不足四分之一。世界上大约有5亿染上疟疾的临床病例，其中90%出现在非洲，这种疾病平均每年造成100万人死亡。出生在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孩子极有可能死于艾滋病。[38]

非洲的苦难并不意味着，已经流向这个大陆的几十亿美元援助完全是无效的。相反，它们是有用的——加纳和莫桑比克就是例证——这些国家清楚地说明，外来援助已经帮助减轻了贫困和促进了发展。此外，非洲的社会服务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已经得到显著发展。小学入学人数在1965年和1990年之间从学龄儿童的40%跃升到70%，识字率从大约15%上升到50%。在1960年和1990年之间，护士占总人口的比例翻了一番。出生时的预期寿命从39岁增加到了52岁。[39]

除了这些孤立的成功，非洲的发展努力总体上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前美国国际开发署（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

national Development)高级官员卡罗尔·兰卡斯特(Carol Lancaster),在一本关于非洲援助有效性的书中这样概括了她的结论:“外国对次撒哈拉非洲大多数国家的援助总量,相对于他们的经济规模而言,是世界上最大的。……对于大多数非洲国家来说,相对高水平的援助已经延续了几十年。然而,非洲大部分地区的经济发展却令人失望。该地区90年代的平均人均收入与60年代几乎一样。非洲5亿7千万人口中差不多有一半每天只能靠一美元生活。这个比例在过去十年左右没有改变。结果,人口增长每年又为贫困阶层增加3000万人。另外,非洲的贫困程度远远大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40]

这种令人失望的结果具有多方面原因。一个原因是,由于无力的公共制度、腐败和管理不善,因此,受援国不能充分利用可以利用的援助。如果国家政府以实行错误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开始,那么援助的流入不可能对经济有帮助。它们甚至可能使事情变得更糟,因为援助抵消了误导政策的不良影响,从而减少了迫使领导人改变路线的压力。援助群体也有错误。援助经常是由华盛顿、纽约和日内瓦的官僚机构管理的,它们对受援国的情况知之甚少。具体的援助国家、像世界银行和联合国这样的机构、以及很多涉及提供发展援助的非政府组织,它们之间没有足够的协调。政治、战略和商业动机经常胜过人道主义动机,这意味着,甚至当援助的确刺激了经济增长时,收益可能到不了最需要的人——穷人手里。

实行和进程方面的这些缺陷突出了实质性改革的必要性。尽管根据各个地区具体问题制定具体发展项目十分重要,但是,世界上较富裕的国家如果要帮助解决欠发展的潜在根源,那么他们就必须在新方法的总体框架上取得一致。此外,2001年9月恐怖袭击事件及其后果为寻求消除贫困以及因贫困产生的不

满提供了新的理由。虽然为满足人道主义需要制定的政策比旨在抗击战略威胁的政策具有更好的结果，但是达到发展目标的项目对于帮助缓和南方对北方的敌意则具有更大的益处。

更有效的援助项目意味着对发展的三个基本元素——人力资本、经济基础和政治能力——投入同等的关注。人力资本是基础，受过教育的和身体健康的人口对于社会和经济进步至关重要。没有人力资本，一个政体就没有能力吸收外部援助，援助通过社会的散布就像水通过过滤器一样。教育和健康也相互促动。受过教育的妇女比没有受过教育的妇女具有更小、更健康的家庭。教育好像还会减少死亡率和 HIV 病毒感染率。[41]中国今天之所以拥有比印度高得多的经济增长，至少部分原因在于，中国政府甚至在 1979 年后开始鼓励市场经济发展之前，就已经为国家的学校和医疗体系进行了投资。[42]

国际社会应该投入更多的注意力和金钱，在整个发展中世界改善基础教育。英国慈善机构乐施会(Oxfam)估计，到 2015 年，提供普遍教育大约需要花费 80 亿美元——不到美国每年国防预算的 3%。援助者应该为国家和地方政府提供配套基金，鼓励他们提高对小学的投入，扩大这种支出的效果。此外，也应该采取步骤改善大学，包括同发达国家建立伙伴关系和教师交流项目。美国和其他拥有良好大学体系的国家应该做得更多，鼓励外国学生至少在职业生涯中的一部分时间返回他们的祖国，或许可以采取的手段是，让学生签证或奖学金的获得以作出这样的承诺为条件。

改善教育机会对健康具有积极影响，因为更多的知识与更多的预防和治疗成正比，学校为管理疫苗接种和药品分发提供了集中场所。但是，直接干涉也是急切需要的。鉴于现代医疗体系的建设需要几代人的时间，因此，国际社会可以采取即时的步骤，解决最急性

的疾病——所付出的成本也是适中的。艾滋病疫苗或治疗方法的缺少、很高的感染率、对年轻成人的毁灭性影响,都使抗击 HIV 成为头等重要的大事和独一无二的挑战。最初的步骤包括,提供更好的有关预防的信息,尤其是为最容易感染这种疾病的社会群体提供药品,并说服制药公司以大大降低的成本提供药品。只要为购买和分发药品而可以利用的资源变得更多,那么减少肺结核、痢疾和疟疾的发病率就可以很容易地做到。

国际社会对发展中世界经济基础的主要贡献是以援助和贸易的形式体现的。提高援助在减轻贫困、促进增长方面的有效性,需要重新确定援助国和受援国之间的关系。受援国的官员和公民应该做的不是实行援助群体设计并管理的项目,而是提出他们自己的计划,然后让计划接受援助群体在竞争基础上进行审视。

更多依靠这种"需求驱动"的方法具有多方面优势。它将创意、责任和义务赋予当地公民,而不是远在几千英里之外的官僚机构。项目可以更好地适合现有条件,改革更有可能持久,内生的创新观念和政策比外部强加的观念和政策更易于被接受。具体计划的直接基金可以使援助国和受援国不必雇用庞大而昂贵的职员队伍。[43] 去掉中介人和以草根阶层为目标的计划也使援助更有可能达到最需要的群体。竞争性基金有利于反对腐败和不当管理,因为已经对援助进行滥用的机构或团体再也得不到援助了。[44]

对援助更有效的使用将给援助国提供新的动机,增加他们的发展预算。美国国际援助的花费,在相对意义上一直是很低的,大约只占 GDP 的 0.1% 左右。一般的非洲国家每年从美国接受大约 2000 万美元的援助(单单一架喷气战斗机要花费美国大约 3000 万美元)。在人均基础上,每个美国人为发展和人道主义援助每年贡献大约 29 美元,而其他工业化国家的公民每年要贡献大约 70 美元。2002 年 3 月,布什政府宣布,它计划逐渐

增加每年在国外援助方面的支出，把预算从差不多现在的1000万美元提高到2006年的1500万美元——这是一个显著提高，但是仍让美国远远落在基准之下。[45]

更大的贸易流动必须与援助紧随，以确保为持续发展提供稳定的基础。美国和其他富裕国家应该消除残余的对发展中国家的商业壁垒。这样做对发达经济只会带来极小的影响，但是对较小的发展中经济，却能极大地刺激出口主导的经济增长。开放北方市场，从总体来看，将大大超过通过援助项目提供的收益价值。正如一位经济学家指出的，"发达国家恰恰在穷国最有希望使自己摆脱贫困的那些行业里，如农业和服装，设置了最高的贸易壁垒。"[46]

美国还应该提高企业基金的使用价值，企业基金是指得到民众支持的投资基金，由向国会负责的私人指导委员会监管。这些手段在支持中欧小商业的增长方面证明是有效的。援助组织和私有公司之间的伙伴关系也应该更经常地用来扩展发展中经济的私有部门。这样做对于传授现代管理技术、形成在维持经济稳定和良好治理方面具有既得利益的中产阶级都很重要。如果经济和政治改革要获得发展动力，不仅要有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而且最终还要有颇具影响力的国内选民。

政治能力是帮助南方摆脱普遍贫困所需要的最后一个元素。经济学家已经发现，良好治理与经济援助刺激增长的能力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联系。[47]相比而言，拙劣治理和起反作用的政策，甚至在拥有受过教育的民众和丰富的自然资源的国家，如巴西、阿根廷和俄罗斯，都阻碍了经济发展。在非洲和南亚，不良管理的代价更高，官员实行的政策不仅影响了生活水平，而且影响了国家的活力和公民获取最基本必需品的能力。正如兰卡斯特所指出的："有些国家，经济增长本身被不鼓励投资的政府政

策、无效或腐败的公共制度、或者政治上的压制和无能所阻碍，因此，外国援助很难给这些国家带来有益的和持续的变化。”[48] 例如，很多非洲政府继续依赖高额贸易税，作为财政收入相当大的组成部分，即使这样做严重损害了商业，阻碍了增长，他们还是如此。

通过当地领导阶层的领导、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和受过良好教育的技术干部的创造，政治改革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自上而下地进行。但是，尤其是由于官员经常不情愿偏离固有习惯，不愿冒险失去任职的特殊待遇，因此，改革还必须自下而上地进行。最近几年，某些政治和经济改革最惊人的事件都是从草根阶层开始的。在俄罗斯，地区官员和当地企业家领导实行了民主和市场改革——尽管遭到了来自克里姆林宫的抵制。[49]承诺为市民社会做贡献的独立协会快速增长，它们在支持中欧国家向民主政体转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国际社会在鼓励国家首都进行制度改革的同时，还应该以地方组织为目标提供援助，支持那些鼓励公众参加、提供社会服务和培养公民参与(civic engagement)精神的计划。

虽然这样的努力本身就很重要，但是它们还具有额外的抗击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效应。地方小学的设立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更多的上学机会不仅肯定会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而且还会缓和宗教极端主义。很多巴基斯坦儿童一直在上宗教学校(madrasas)——原教旨主义神职人员经营的学校——因为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因此，投资基础教育就是投资多元主义和宗教宽容。

教育和多元主义之间的关联性使我们得出一个更宽泛的关于伊斯兰教和政治现代化的观点。2001 年“9·11”恐怖袭击之后，很多评论认为，伊斯兰教本身产生了极端主义，并阻碍了整

个中东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发展。[50]然而，这个因果关系的箭头却指向了相反的方向。是无力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产生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宗教绝对主义和经常与之相伴的暴力在基督教和犹太教社会之所以较不普遍，恰恰是因为这些社会经受了历史进步的自由化影响，这些历史进步包括宗教改革运动（Reformation）、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科学和工业革命、民主的兴起———句话，将宗教从国家中分离出来和平息宗教对政治生活影响的历史进步。南亚、中东和非洲的经济和政治发展可以使伊斯兰教经受同样的自由化力量、制约力量和平息力量的影响。

帮助发展中世界建立人力资本、经济基础和政治能力会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和金钱。即使进行了实质性改革，某些援助项目可能会继续达不到预期目的。但是，将这项工作继续下去，却为缩小北方和南方之间的文化以及社会经济差距提供了最佳——或许惟一——手段。

## 国际制度

如果战略克制——选择性和谨慎应用的战略克制——是指导美国制定用于管理向多极世界过渡的大战略的核心逻辑，那么制度就是促使这个逻辑发挥作用的核心工具。正如在国内层面上宪法维护秩序、制止混乱一样，在国际层面上制度是地缘政治竞争的解毒剂。制度通过聚合和制约强有力的行为体、用基于规则的秩序取代无政府状态、以及推动基于权利而不是基于实力的治理，来驯服体系。制度只是原初形式的宪法，主权国家要它是出于别无选择。然而，制度却是国际社会的建筑基石，是使冲突区能够转变为和平区的不可或缺的工具。

制度还可以履行另外一个重要功能——指导美国选择多边

主义路径，这个路径是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之间的重要中间地带。共和党内部新保守派和传统保守派之间的分野，加上沿着党派和地区界线两极化的国家政治，有致使美国摇摆于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两种冲动的危险。国际制度固有的多边主义有希望抵制这两个极端。多边参与通过将美国与其他国家束缚在一起，为共同挑战提供联合解决方案来中和单边主义。多边参与还通过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共同分承全球参与的负担，削弱认为美国参与世界代价太高的反对意见，来抵制孤立主义。因此，投资国际制度建设提供了同时实现一箭双雕的手段，一方面驯服国际体系，另一方面找到政治的中间地带，以便建立新式的、强调区别对待的、持久的自由国际主义。

美国人从很早开始就一直对制度强烈反感，不论国内制度还是国际制度。殖民地最初接受松散的邦联，是因为他们不愿容忍更雄心勃勃的制度结构的束缚。美国人只是在强迫下才默许并接受立宪联邦的，当时非常清楚，1781 年达成的制度太无力了，无法支持合众国。自那以后，尤其是在内战以后，美国发展成为地球上最制度化和法制化的国家之一。除了对强大联邦的民粹主义反感之外，大多数美国人已经开始接受，国家内部充满多层次的地方、州和联邦政府、不计其数的非政府组织和无所不在的法律体系。现在美国大约每 600 个人就拥有一个律师，因为驾驭美国迷宫一样的规则和制度需要他们的专业技术。

早期美国对国际制度的怀疑远远甚于对国内制度的怀疑。归根结底，国父们反对卷入联盟关系的声明是反对美国卷入制度的更一般的警告，他们认为制度可能使美国陷入大国政治的危险之中。由于美国集中精力进行国内建设、向西扩展和提高经济与军事能力，因此美国根本不想与国际组织的聚合和限制作用发生任何关系。参议员拒绝美国参加国际联盟只是这种冲

动之深刻程度的最鲜明的例证。

20世纪30年代的教训、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冲击、罗斯福在公共外交方面的技巧,消解了美国对参与国际制度的反对。在战后的第一个十年,美国积极着手构建新的国际秩序,并主要求助于制度来完成这一任务。在敦巴顿橡树园,随后又在旧金山,美国领导创建了联合国,使之成为一个全球集体安全组织。在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举行的会议为管理国际经济建立了新的制度。随着冷战的开始,美国在苏联周边地区组建了联盟,在西欧、中东、东南亚和东北亚制定了安全协定。美国在40年代和50年代的努力工作提供了一个制度基础结构,这个结构至今仍然是世界很多地区进行多边合作的基石。

尽管美国严重依赖国际制度来塑造和管理国际秩序,但是美国人从来没有以对待国内制度集结起来的热情来接受这些国际制度。促使国父们对卷入联盟关系提出警戒和迫使国际联盟失败的相同忧虑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国际制度的当代批评者经常转向与过去形成强烈共鸣的那些主题——制度损害了美国的主权和自治、压缩了美国的操作空间,并经常通过侵蚀国会权威而与宪法原则发生冲突。

参议员杰西·霍尔姆斯于2001年决定,在参议院连任五届已经足够了。然而,他的很多保守盟友将继续他的反对联合国的战争。正如霍尔姆斯在《外交》上所写的,"随着联合国活动规模和范围的稳定增长,联合国正在由一个主权国家的机构转变为一个准主权实体本身。这个转变对美国国家利益构成了明显的威胁。"[51] 明尼苏达州共和党参议院罗德·格兰姆斯(Rod Grams)1998年对国际刑事法庭表达了相似的敌意,他说:"我希望,现在美国政府积极反对这个法庭,确保它遭遇与国际联盟同样的命运,因没有美国支持而崩溃,因为我真的相信这个法庭是

个怪兽，而且是我们需要屠杀的怪兽。”[52]

不是所有的国际制度都遭遇了这样的非难。像北约这样的联盟在整个政治领域都赢得了强有力的支持，很大程度上因为美国鉴于军事实力的缘故控制着它们。华盛顿与八国集团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没有什么问题，八国集团是另外一个美国处于指挥地位的机构，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有更大的发言权，它通常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

然而，至于那些美国必须为他国负责的制度，甚至自由主义政客一般都要小心谨慎。鲜有民主党人支持把美国军队置于联合国的指挥之下。国际刑事法庭在国会只有数量有限的强力支持者。布什政府完全拒绝了京都环境协定，但是甚至克林顿政府对这个协定的实施也是不情愿的。布什政府在宣称有意通过单方面退出来废除反导条约方面，一点也没有显示出不安——事实上，它把这个决定描述为一种对勇气的考验。

让美国接受仲裁，支持有违其利益的决定，通常是艰难的上坡战。相比涉及安全事务的规则，华盛顿一般更易于遵守贸易规则。例如，在 1984—1985 年，国际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裁决，美国在尼加拉瓜港口采矿违反了国际法，但是美国拒绝服从这个裁决。当尼加拉瓜最初提交此案时，美国对国际法院的管辖权提出质疑。国际法院否定了美国的质疑之后，美国发出通告，它将终止 1946 年的宣言，接受国际法院的一般管辖权。

美国对待国际制度的两面派手法没法再短视了。目前，美国或许能够承担得起对那些不能让它为所欲为的国际制度不理不睬，美国足够强大可以在选择单边行事时就单边行事。但问题是，美国不可能一直具有不论何时只要自己认为合适就自行其是的奢华。随着单极时刻的流逝，美国会更频繁地发现自己将求助于恰恰那些其单边主义行为现在正在破坏的制度。

当国际体系的管理依赖于共识和妥协而不是美国领导地位时，美国会悲叹它以榜样的方式传授了自私自利的规范而不是互惠互利的规范。当美元不再是主导性储备货币时，华盛顿会希望它能够转向国际制度来帮助稳定国际金融体系。当美国军队忙于应付中东或亚洲的挑战，而种族冲突又再一次在欧洲爆发时，美国将需要欧盟具有能够独立于北约单独采取军事行动的力量。当新兴经济体的燃煤燃油工业在从现在开始的一二十年后全速运转时，美国人可能会遗憾他们的政府在有能力掌握杠杆时没有能够采取决定性步骤，建立有效的遏制污染的全球环境机制。

美国不应该依仗优势地位在远处独处，而应该恰恰与此相反——利用它的影响塑造国际制度，很快除了依赖这些制度美国将别无选择。美国应该放弃某些主导地位的特权，以换取制度的约束，当美国不再有能力单边行事时，这些制度会给美国带来好处。该方法需要美国为长期利益牺牲短期所得。它意味着美国要实行战略克制，接受制度，在这些制度中美国必须与伙伴共同分享权利和义务。它意味着在将美国与其他权力中心聚合在一起的同时，利用这些制度限制美国的力量。

这恰恰是大的殖民地，像弗吉尼亚和纽约，为了给联邦合众国铺平道路而彼此达成的协议。德国和法国在建设欧洲联盟的开局中也达成了同样的协议。乔治·华盛顿大学约翰·艾肯伯利(John Ikenberry)将同样的逻辑确认为稳定战后安排的关键所在。他说："如果主导国家预测，其得到增强的战后权力优势只是瞬间即逝的，那么一个制度化的秩序可以将有利的安排固定下来，使之在自身权力达到顶峰之后继续存在下去。实际上，创建基本的秩序性制度是一种对未来的霸权投资。如果正确类型的规则和制度成为根深蒂固，那么它们能够继续以有利于主导

国家的方式发挥作用，甚至当这个国家的相对物质能力衰落之后，也是如此——获得主导国家在非制度化秩序中不可能实现的收益。”[53]

如果要让驯服多极体系所需的制度及时就绪，那么美国就必须提前放弃自主，这样才有希望，保证美国治下和平的最佳时期远远长于单极时刻。当美国沿着这个方向前进时，美国人应该投资建设满足以下三个主要功能的制度。

首先，美国应该寻求建立主要国家的理事会，集中管理世界主要权力中心之间的关系。表面上，联合国安理会提供了这样一个论坛。但是，由于联合国的正规程序和五个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因此，安理会更是一个礼节性演讲——有时是非礼节性演讲——的论坛，而不是冷静务实外交的论坛。

全球理事会应该沿着欧洲协调的路线，而不是联合国或国际联盟的路线发挥功能。其创始成员应该是美国、欧盟、俄罗斯、中国和日本。来自其他地区的主要国家——印度尼西亚、印度、埃及、巴西和尼日利亚将是优先候选国——也应该有一席之地。像欧洲协调那样，这个理事会应该成为一个讨论和协调的非正式论坛。通过共识达成决定，没有任何一方拥有否决权。协调不采取行动和实行战略克制，将是一个与协调采取联合行动一样重要的功能。理事会将定期和在需要处理紧急情况时召开会议。像欧洲协调那样，理事会的指导目标是，推动世界主要权力中心之间的合作，并管理地区危机。

其次，美国还应该寻求扶植第二层次的制度，其功能是将一套已经确立起来的规则和规范嵌入国际体系。大多数国家内部的日常生活是和平的和可以预期的，因为规则和规范已经成为人的第二本性，指导着个人的行为。国家之间的日常生活则欠缺服顺，在很大程度上因为那些规则和规范还严重处于更原始

和更基本的状态。然而，这个需要并不总是这样匮乏。制度使国际体系具有社会特性。它们建立了市场，确定了指导国家行为的规则。在主权国家愿意投资建设制度基础结构的程度上，制度能够使国际生活变得更和平和更可以预期。

这个制度基础结构的某些部分已经存在了，它们是美国在过去五十年中建立起来的。但是很多仍旧依赖美国领导地位的制度应该得到改变，致使它们甚至在不再被华盛顿控制之后能够继续有效地发挥功能。美国还需要支持它现在回避并认为对美国牵制太多的很多其他制度。集结更多的对联合国的热情将是一个重要的象征性步骤。目标将不仅仅是提高联合国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执行维和使命的能力。美国支持全球论坛的表示本身可以传递一个重要的信息，即美国愿意投资制度建设，愿意与其他国家一样遵守相同的规则。

管理国际生活具体成分的有力制度也是需要的。首先，全球化使改善管理贸易、金融和货币关系的机制变得至关重要。世界贸易组织及其争端解决制度是一个好的开始，但是货币和金融事务还远未得到处理。尤其是由于欧元开始与美元竞争成为储备货币，因此货币政策不能留给今日现有的特别协调体系，还需要有另外的金融机制来预防部门冲击和地区冲击的传播。这种机制或者采取紧急基金的形式以稳定自由下落的经济，或者采取“断路开关”(circuit-breakers)的形式遏制恐慌和蔓延，或者对边际债务或资本流动进行国际限制，无论如何，美国及其伙伴都应构建新的金融结构，不要等到下次危机再度席卷全球经济。

建立国际体系的法律基础结构是提高全球稳定性和可预期性的另一个步骤。对执法的求助在国内生活的安定方面起到了主要作用，在国际舞台上它也可以发挥同样的作用。国际法院、常设仲裁法庭(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国际刑事法庭、以

及在联合国庇护下建立起来的战争罪行法庭,每个都帮助将法治扩展到了国际政治领域。接下来的步骤包括扩展在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组织庇护下建立起来的争端解决小组委员会的权威。美国必须抵制使自己远离这些制度,或选择完全退出的诱惑,这种诱惑现在使美国把自己置于法律之上,因为它能够承担得起这样做的后果。但是,如果当主导优势减少的美国需要依赖这些制度时,这些制度根本没有准备好,那么美国人除了谴责他们自己将无人可以谴责。

最后,第三层次的制度应该更少地聚焦于日常管理,而应该更多地聚焦于迎接长期挑战。大多数对美国的当下威胁在性质上都是集体的——亦即它们是很多其他国家面临的相同威胁,它们只有通过各国联合努力才能有效应对。这是的的确确的,甚至在发生地点通常更为重要的传统安全领域也是如此。世界上仍然存在着危险的邻居,南亚和中东名列其中。但是,甚至在这些地区,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仍然低于恐怖主义活动、化学或生物装置的孤立引爆,以及网络战争,这些威胁不受地理边界的限制。

对付这些威胁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国际协调。国际社会需要用制度来制止核材料和导弹技术的扩散,尤其是来自前苏联的扩散。鉴于化学和生物武器能够容易地获得和运送,进行情报的国际分享和对恐怖主义集团进行联合侦察与渗透便成了最佳的解决办法。针对阿富汗的报复性打击是致力于消灭基地组织和其他恐怖主义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据报道,基地组织的小组仍然在50多个国家内运作。长期反恐斗争需要在很多国家的情报、警察和移民机构之间实现制度化的合作。

如果布什政府着手部署导弹防御体系,那么它应该实行一个提供大范围保护的多边项目。发展推进阶段(boost-phase)拦截技术、聚焦联合部署将是恰当的步骤。推进阶段拦截系统可

以在导弹发射后很快进行拦截，而不是当导弹接近目标时再进行拦截，从而可以保护所有潜在的目标国，而不是仅仅保护建立导弹防御体系的国家。在这个意义上，它的好处能够得到更广泛的分享，因此，它的发展更能减少而不是增加新的武器竞赛的机会。推进阶段拦截相比较晚的飞行中拦截还更难躲避。部署联合、多边导弹防御体系将进一步减轻认为美国正在寻求只对自身进行保护或获取单边战略优势的担忧。因此，美国应该同欧盟、俄罗斯，或许还有中国，共同探讨分享早期预警系统和拦截技术的计划。

传统安全威胁还更经常地需要集体回应。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的战争是个遥远的可能性很小的前景。因此大多数暴力冲突，可能与最近折磨波斯尼亚、塞尔维亚、阿塞拜疆、卢旺达和东帝汶的那类种族和国内战争相像。由于美国已经明确表示，它将减少对很多这类战争的直接介入，因此华盛顿应该积极发展预防和干涉的替代资源。

最有指望的资源是来自地区的力量，这些地区的国家对于预防和阻止冲突具有最大的利益。要让非洲、东南亚和其他地区的地方组织做好准备完成这些任务，就必须对建立制度基础结构和训练人员进行实质性的巨大投资。甚至科索沃的维和使命，尽管得到了北约和联合国的坚定支持与介入，仍然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因为找不到受过足够训练的人员进行社会治安和地方管理。联合国既要扩展可以在短时间内进行部署的人员队伍，又要改善它同地方组织的联动关系。

对发展中世界更有效的援助项目也是一种冲突预防的重要投资。非洲很多地方的动乱和战争前景是该地区悲惨的经济条件、匮乏的资源、以及艾滋病与其他疾病的蔓延造成的直接结果。更慷慨和更有效管理的外国援助能够带来很大不同。等着

社会危机发展为安全危机，是治疗麻痹症的药方；只有当剥夺导致暴力时，北方才最有可能使自己与南方的苦难处境隔离开来。

最后，急切需要保护全球环境的集体努力。全球变暖、臭氧层破坏、水短缺、森林滥伐——虽然对于这些不同形式环境退化的影响的精确时间和严重程度，科学家意见不一，但是他们一致认为，当前对付环境退化的努力是不够的，发展趋势的线路说明环境条件正在恶化，而不是正在改善。

这里正好有一个看起来合理的将要发生的事态。现有工业化国家排放的二氧化碳，加上像中国和印度这样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连续进行中的工业化，肯定会加速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 1 米(可能发生于 2100 年)将使孟加拉成百上千万的人背井离乡、流离失所。它还会大幅度减少世界粮食产量。海平面只要上升 50 厘米就将淹没北美 50% 的沿海湿地。更高的气温将让世界上容易感染热带疾病，如疟疾的人口比例增加三分之一(从 45% 上升到 60%)。在疟疾已经普遍的地区，每年的感染人数则将增加 5000 万到 8000 万人。[54]

国际社会需要一个全球协议，以确保全面减少污染物能够得到制度化的执行。主要障碍是推卸责任的诱惑，由于未来时代将主要承受不利后果的冲击，因此政治家太过草率地推迟了为努力控制污染而作出经济牺牲。乔治·布什仅仅在当上总统 7 周之后就抛弃了他竞选时许下的进一步限制二氧化碳排放的承诺，声称此类规定将给能源工业带来过度压力。不同国家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并以不同方式促进着环境退化，这是另外一个障碍，它使得达成共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公平协议变得更为困难。但是拖得越久，造成的破坏就越大。美国现在，在它仍然因优势地位而拥有杠杆的时候，应该发挥领导作用，致力于寻找如何最佳保护环境的共同基础。随着时间的发展，达成这样

的协议只会变得更加困难，因为更平等的竞争场所会产生更分裂和更争论不休的国际体系。

美国不需要也不应该签署参加每一个现有或可能即将创建的国际制度。[55]很多组织都有它们的缺点。甚至京都议定书最坚定的支持者也承认，这个协议并不完美。但是当华盛顿感到迫切需要拒绝参加时，它不应该只走自己的路，宣布美国狭隘的自私自利是它的指路灯塔。反之，美国应该提出替代方案，与他国达成妥协，以便形成一个相互都能够接受的协议。多边主义精神至少跟多边主义事实一样重要。只有美国支持国际制度以及国际制度象征的团结一致，这些制度才有机会克服多边世界的竞争本性。

## 社 会 统 合

在以驯服存在多个权力中心的世界为目标的大战略中，社会统合是最不容易把握的元素。美国几乎在 19 世纪 60 年代分崩离析，恰恰因为北方人和南方人已经创建了互不相容的社会秩序，他们各有自己的身份和文化归属。欧洲协调与此相似地瓦解了，因为 1848 年革命将自由化政权与保守君主政权之间的政治分裂抬出水面，暴露了肤浅的从来没有超越外交官的社会统合的危险性。与此相比，美利坚合众国在 20 世纪的活力，在很大程度上，应归于包容性的公民身份，它使分立地区凝集成一个团结一致的国家。欧洲进行中的统合实验的成功，也与欧盟建构政治身份和忠诚感的能力直接相关，共同的政治身份和忠诚感使民族国家得以包容在一个更广泛的欧洲政体之内。社会统合以及随之而来的共同身份完成了协定，它们使共同体的建立和战略对抗的消除成为不可逆转。

在邻国之间建构社会构造比在被远距离分割开来的国家

之间要更容易。分享的身份需要广泛的社会联系，位置临近可以促进这种联系。邻国经常拥有共同的语言和文化属性，这为强烈的亲近感提供了基础。塞缪尔·亨廷顿认为不同文明注定要彼此冲突是错误的，但是他认为文化很重要却是正确的。假定其他一切条件一样，那么在分享共同文化的国家之间比在没有共同文化的国家之间更容易培养共同体感。社会统合走得最远的地区——北美、北欧地区、西欧——是那些拥有很高程度文化共性的地区，这不是偶然的。从这一点来看，社会统合在地区内部可能比在地区之间走得更远。这是建立部分和平、建立地区稳定使之成为走向更广泛和平的踏脚石的另外一个原因。

然而，对于美国来说，寻求向最临近地区以外扩展社会特性，即便是微薄的社会特性，也是值得的。在过去五十年中，美国和欧洲已经构建成了初期的大西洋政体，在这个政体中，合作已经变成了一种思考习惯。当欧洲变得更自信、美国变得内向孤立、并导致更多竞争时，这种一致会更难维持。但是维护共享的身份对双方都极其有利，它可以减弱必然要出现的对抗。推动文化和教育交流、国会议员和议会议员的定期访问、共同的纪念物和假日，以及高水平的跨大西洋商业，全部都是明智的投资。

美国比在此前时期还有更多的可以使用的手段来鼓励国际社会化。民主的传播或许不会保证和平，但是它的确提供了一套共享的规范和价值观，在此基础上可以建立共同体感。在人权、法律程序和标准、争端仲裁等方面达成更多的协议将促进这种共同体感。世界民主国家的集会，像 2000 年在华沙举行的那样，具有象征和实际意义，它们加强了群体身份，为进一步的社会和政治趋同提供了论坛。美国还应更多地加强同非民主国家

的接触。即使同穆斯林世界更多的互动不会导致社会趋同，也肯定能推动相互理解。

数字时代为公众和私人对社会统合贡献力量提供了新的机遇。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使社会统合减少了对地理临近的依赖。空中旅行方便了远距离人民之间的联系，在 1999 年 6 月到 2000 年 6 月之间，美国和外国航空飞机在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运送旅客达 1 亿 3700 万人次。[56]互联网的创造性使用，如组织国际公决或多国城镇会议，可以为深化跨国界的公众参与提供新的途径。

国际制度为进一步推动社会统合提供了另外一个渠道。参加像北约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样的论坛可以在精英和大众内部提高共享身份感。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仅有可能推动贸易的发展，而且有可能在中国内部和其他地区进一步形成这样的认识，即中国正在加入国家共同体，其中，所有国家都按照相同的规则行事。加强国际制度的民主职责和提高国际制度的透明度，将有助于深化它们的社会化作用。扩大议会监管集团的权威将给官僚机构和协商人员的工作赋予更大的合法性。[57]

正如欧洲协调成员国在 19 世纪所做的那样，今日的主要大国应该寻求培养跨越政治和文化分裂线的共同目的感和共享身份感。通过相信欧洲协调是一个"亲密联合体"，其领导人培养的观念是，用卡斯尔雷的话说，他们"不仅有共同的利益，而且有共同的义务参加欧洲协调。"[58]美国需要开始在新兴权力中心之间培养那样的亲密联合体感、共同利益感和共同义务感。

## 注　释

1. 关于我在这些问题上的思考，我要感谢约翰·艾肯伯利（G. John Ikenberry）和他的著作 *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2. Felix Gilbert, *To the Farewell Address*: *Ideas of Earl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1), pp. 7, 14.

3. 同上书,第 14—15 页。

4. 参见 Daniel H. Deudney, "The Philadelphian System: Sovereignty, Arms Control, and Balance of Power in the American States-Union, Circa 1787—1861",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9, no. 2 (Spring 1995), 第 191—228 页。

5. Jay, *Federalist* 5, in James Madison, Alexander Hamilton, and John Jay, *The Federalist Papers* (London: Penguin Books, 1987), pp. 101, 102, 103; Jay, *Federalist* 4, ibid., p. 100.

6. Hamilton, *Federalist* 7, ibid., p. 111.

7. Jay, *Federalist* 5, ibid., p. 101; Jay, *Federalist* 4, ibid., p. 100; Hamilton, *Federalist* 7, ibid., p. 113; Hamilton, *Federalist* 11, ibid., p. 129.

8. Hamilton, *Federalist* 51, ibid., p. 320.

9. 引自 Thomas R. Hietala, *Manifest Design*: *Anxious Aggrandizement in Late Jacksonian Americ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 1985), 第 184 页。

10. Deudney, "The Philadelphian System", pp. 217—218.

11. 引自 Michael H. Hunt, *Ideology and U. S. Foreign Poli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第 30 页。

12. Deudney, "The Philadelphian System", pp. 214—216.

13. Robert Stewart Castlereagh, *Correspondence*, *Dispatches*, *and Other Papers of Viscount Castlereagh*, 3d series, vol. 11 (London: H. Colburn, 1850), p. 105.

14. Official communication to the Russian ambassador in London, January 19, 1805, 引自 Rene Albrecht-Carrie, *The Concert of Europe* (New York: Walker, 1968), p. 28.

15. 引自同上书,第 142 页。

16. 引自 Bruce Cronin, *Community Under Anarchy*: *Trans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第 56 页。

17. 引自同上书,第 60 页。

18. 引自 Albecht-Carrie, *The Concert of Europe*, 第 50 页。

19. 引自同上书,第 37 页。

20. 引自 Cronin, *Community Under Anarchy*, 第 58 页。

21. Concert protocol of November 15, 1818, 引自同上书,第 60 页; Castlereagh, 引自 Charles K. Webster, *The Foreign Policy of Castlereagh*, 1812—1815: *Britai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Europe* (London: G. Bell, 1931), p. 480; Castlereagh, *Correspondence, Dispatches, and Other Papers of Viscount Castlereagh*, 第 105 页; and Metternich, 引自 Jacques Droz, *Europe Between the Revolutions*, 1815—1848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7), 第 17 页。

22. 参见 Charles A. Kupchan, "After Pax Americana: Benign Power,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the Sources of a Stable Multipola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2 (Fall 1998), 第 42—79 页。

23. 引自 Gregory F. Treverton, *America, Germany, and the Future of Europ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104。

24. Speech at the University of Louvain, Belgium, February 1, 1996, 引自 "Kohl Issues New Warning to Britain over EU Reform", Agence France-Presse, February 2, 1996。

25. Hamilton, *Federalist* 11, in Madison et al., *The Federalist Papers*, p. 133; 这里汉密尔顿暗指 l'Abbe Guillaume Thomas Francois Raynal 的著述,特别是他的 *Recherches Philosophiques sur les Americains*。

26. 引自 William Drozdiak, "Even Allies Resent U.S. Dominance: America Accused of Bullying World,"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4, 1997。

27. Lionel M. Gelber, *The Rise of Anglo-American Friendship: A Study in World Politics*, 1898—1906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8), p. 411.

28. 关于中国未来的乐观看法,参见 Robert S. Ross, "Beijing as a Conservative 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 76, no. 2 (March—April 1997), 第 33—44 页; Nicholas Berry, "China Is Not an Imperialist Power," *Strategic Review*, vol. 24, no. 1 (Winter 2001), 第 4—10 页。关于中国未来的悲观看法,参见 Richard Bernstein and Rose H. Munro,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Foreign Affairs*, vol. 76, no. 2 (March—April 1997), 第 18—32 页; 和 Constantine Menges, "China: Myths and Reality," *Washington Post*, April 12, 2001。

29. Data for Chinese and U.S. GDP from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The

World Economic Outlook (WEO) Database, December 2001." Available at: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01/03/data/index.htm. Data on California's economy from California Technology, Trade & Commerce Agency, "California Gross State Product." Available at: http://134.186.44.154/ersi/oer/GSP.html # GSP.

30.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2001—2002*, (Lond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2001), pp. 25, 194. 关于中国军事开支的估算存在很大不同,主要看哪些支出包括在了国防预算之内和考虑到购买力平价时作了哪些调整。参见 Bates Gill and Michael O'Hanlon, "China's Hollow Military," *National Interest*, no. 56 (Summer 1999), 第 56—57 页。

31. 2000 年,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和服务的价值为 1000 亿美元,向中国出口的价值为 160 亿美元。U.S. Census Bureau, Foreign Trade Division, "Trade with China: 2000." Available at http://www.census.gov/foreign-trade/balance/c5700.html.

32. Doug Struck, "Korean's Anger About Textbook Surprises Japan",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te*, May 19—20, 2001.

33. Doug Struck, "Japan's Neighbors Cool to Koizumi", *Washington Post*, August 25, 2001.

34. *Zhongguo Qingnian Bao* (China Youth Daily), February 15, 1997, 引自 Kokobun Ryosei, "Japan—China Relations After the Cold War: Switching from the '1972 Framework,'" *Japan Echo*, vol. 28, no. 2 (April 2001), p. 9.

35. Joseph S. Nye, *Peace in Parts: Integration and Conflict in Regional Organiza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1971).

36. Economic Cooperation Bureau, Jap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DA Hakusho 1999 Joukan (ODA White Paper Volume I), pp. 150—151.

37. 该地区平均每年人均收入为 4000 美元。低收入国家一般是指人均收入低于 785 美元的国家。参见 The World Bank Group,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Available at: http://lnweb18.worldbank.org/External/lac/lac.nsf/694dc25670boe319852567d6006a9c9e/eoc627bbe9bc8361852567ed0051fbf5?OpenDocument。

38. The World Bank Group, "Regional Brief: Sub-Saharan Africa." Avail-

able at: http://www.WorldBank.org/afr/overview.pdf.

39. Carol Lancaster, *Aid to Africa: So Much to Do, So Little Don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p. 20.

40. 同上书,第2页。

41. Gene B. Sperling, "Toward Universal Education", *Foreign Affairs*, vol. 80, no. 5 (September—October 2001), pp. 7—13.

42. Amartya Sen, *Development as Freedom* (New York: Knopf, 1999), p. 42.

43. 某些最具创意的项目正在使用因特网在社区计划和潜在的公众与私人部门援助人之间建立起直接联系,使管理费用维持在最低水平。

44. Lancaster, *Aid to Africa*, pp. 233—238.

45. 参见 Richard N. Gardner, "The One Percent Solution," *Foreign Affairs*, vol. 79, no. 4 (July—August 2000), p. 8; and Joseph Kahn, "White House Adds Billions to an Increase in Foreign Aid," *New York Times*, March 20, 2002。

46. Lael Brainard, "Terrorism and Textiles",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7, 2001.

47. 参见 John Cassidy, "Helping Hands: How Foreign Aid Could Benefit Everybody", *New Yorker*, March 18, 2002, 第60—66页; 也请参见"Does Aid Help?"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9, 2002。

48. Lancaster, *Aid to Africa*, p. 3.

49. 参见 Clifford A. Kupchan, "Devolution Drives Russian Reform",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3, no. 2 (Spring 2000), 第67—77页。

50. 关于伊斯兰教和政治发展的讨论,参见 John L. Esposito and John O. Voll, *Isla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and Bernard Lewis, "Islam and Democracy: A Historical Overview"; Robin B. Wright, "Islam and Liberal Democracy: Two Visions of Reformation"; Abdou Filali-Ansary, "Islam and Democracy: The Challenge of Secularization"; Mohamed Elhachmi Hamdi, "The Limits of the Western Model"; and Laith Kubba, "Recognizing Pluralism", i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7, no. 2 (April 1996)。

51 Jesse Helms, "Saving the U.N.: A Challenge to the Next Secretary-General", *Foreign Affairs*, vol. 75, no. 5 (September—October 1996), p. 2.

52. Senate Hearing 105—724, "Is a U.N. Criminal Court in the U.S. National Interest?" July 23, 1998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al Printing Office, 1998), p. 4.

53. Ikenberry, *After Victory*, p. 54.

54.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The Regional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An Assessment of Vulnerability." Available at: http://www.grida.no/climate/ipcc/regional/index.htm.

55. 关于多边主义优点以及应该实施多边主义的条件的讨论,参见 Joseph S. Nye, Jr.,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Do It Alo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56. U.S.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Office of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Aviation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U.S. International Air Passenger and Fright Statistics, June 2000", released February 2001, p. 5. Available at: http://ostpxweb.ost.dot.gov/aviation/international-series.

57. 关于如何推动国际制度的社会化作用的其他建议,参见 Joseph S. Nye, Jr., "Globalization's Democratic Deficit: How to Mak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More Accountable," *Foreign Affairs*, vol. 80, no. 4 (July—August 2001), 第 2—6 页。

58. 引自 Cronin, *Community Under Anarchy*, 第 61、56 页。

# 第八章　历史的再生

现代社会的优点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进步和发展的历史观。知识和技术方面的进步使生活质量的稳步改善成为可能，生活中充满着甚至仅仅在一个世纪前人们连做梦都想象不到的舒适和机遇。历史的进步观念还深深地植入了我们的知识和文化制度。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人类进化论推动了各个学科的发展，从医学到地质学到经济学。犹太－基督教(Judeo-Christian)文化尽管起源悠久，但也对人类处境提出了相似的进化观点，《圣经》提出的创世记既是连续性的又是渐进性的。

这种进化的历史理念是很多人对世界事务发展状态持更乐观看法的基础。弗朗西斯·福山断定历史正在走向欢乐的终结，其他人宣称民主和全球化有能力引进一个持久的和平时代，他们都是从这种进化的历史观出发的。经过几个世纪的斗争和渐进发展，人类终于到达了终极目的地。市场将满足人类的物质需求，民主将满足人类的精神需求。历史一直在按照自己的规律向前发展。

本书依赖于一种截然不同的基础，这个基础认为历史既有进化性，也有循环性。由于创新和发现推动着人类前进，这种进步有利于某些类型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因此只有随着生产和通讯方式的改变继续向前推进，这种进步才会让这些政治和社会

结构变得过时。结果是，甚至当历史作为一个整体继续向前运动时，独特的历史时期形成了一个循环兴衰的过程。

游牧社会让位于农业社会，因为犁和灌溉沟渠证明比长矛在提供食品方面更为有效。居无定所被定居村落取代，又最终被农业帝国取代，万物有灵论被有组织的宗教取代。接着，农业社会让位于工业时代，因为工厂证明比农场在提供财富方面更为有效。村落与城市中心相比黯然失色，帝国让位于民主共和国，有组织的宗教，尽管仍然是私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作为共同体身份主导来源的角色却让位给了民族主义。潜在的生产方式的改变具有深刻的政治和社会影响，造成了从游牧时代(nomadic era)到农业时代(agricultural era)再到工业时代(industrial era)的变迁。

一个新的时代现在正在开启——数字时代(the digital era)。推动这次历史变迁的技术是，能够处理和存储大量信息的微型芯片，以及在全球范围内提供廉价、即时通讯的电缆、交换塔和卫星等基础设施。数字技术的引进标志着通讯工具而不是生产工具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但是，数字时代带来的通讯工具和信息处理的转变在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都足以改变潜在的生产方式。

因此，随着数字技术和以信息为基础的企业取代了工厂生产线，工业社会便开始瓦解了。数字时代的开启和工业社会的衰退将对工业化形成的主要政治和社会结构——共和国民主和民族主义——带来重大冲击。实际上，工业时代的逝去和进行中的向数字经济的转变，肯定会动摇民主制民族国家的基础。历史的一个周期正在结束，但另一个周期才刚刚开始。

从这个方面来看，美国时代的终结不仅仅是美国优势地位的终结和向多个权力中心的世界的回归，它还是一个时代的终

结，美国在塑造这个时代过程中起到了巨大作用——这个时代就是工业资本主义、共和国民主和民族国家的时代。福山错误地把只是一个特定历史循环的终结当作了历史本身的终结。他因此认为自由民主的开始标志着稳定的和和平的终点，而不是一个像以前一样将很快让位于生产方式进一步发展的历史阶段。时代的转折点通常带来动荡的时代，它说明当前历史循环的终结将导致政治和地缘政治生活发生深刻的变革，而不是产生民主和平和全球宁静。

在更详细地阐述这个论断和考察工业时代向数字时代变迁的潜在后果之前，我们简短地转向历史，说明一下生产工具与政治和社会制度紧密相联的程度。回顾的历史背景是早期美国，相关的辩论发生在美国领导人之间，辩论的问题涉及何种类型的国内经济能够最好地服务于共和国理想利益。

## 过　去

托马斯·杰弗逊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之间的激烈对抗，尽管已经扩展到了外交政策领域，但是其根源却在于他们对美国经济如何影响政治制度观点不同。关于经济生活对美国民主之影响的争论构成了年轻共和国最激烈和最分裂的一些辩论。正如麦克·桑德尔(Michael Sandel)在《民主的不满》一书中所说的，有关“国民身份的政治经济”的争论占据着美国政治的核心，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

杰弗逊和詹姆斯·麦迪逊是首要建立农业经济基础的主要支持者。两人都认为，耕种土地可以培养美国人优秀的品质——个人责任感、正直、公民美德——这些都是共和国政府有效发挥功能所需要的。杰弗逊写道：“那些在土地上劳动的人是上

帝的选民,如果上帝曾经有过选民的话,上帝在他们的心中进行了特殊储备,使之具有重要的和真正的美德。"[1] 麦迪逊与此相似地坚称:"那些同时为自己提供食物和衣服的公民阶级,可以被看作是最真正独立和幸福的。他们数量更多,他们是公共自由的最佳基础和公共安全的最有力保障。因此,这个阶级在整个社会中所占的比例越高,这个社会本身就必然越自由、越独立、越幸福。"[2]

杰弗逊、麦迪逊和接受他们观点的共和党并不是反对所有的制造业。相反,他们认为,美国人应该聚焦于家庭商品和手工艺品的小规模生产。像农民的生活方式一样,工匠和技工的生活方式可以促进自力更生和注重尊严的价值观,它们对于国民身份的共和国观念至关重要。与此相比,工厂、生产线和城市化会破坏公民的美德、否定工人的自尊、并导致腐败和不道德。乔治·梅森(George Mason)一针见血地质问道:"如果美德是一个共和国的生死攸关的原则,没有节俭、诚实和严谨的品性,它就不能长久存在下去,那么人口稠密的城市的生活方式对于我们自由政府的原则将是有利的吗? 或者,邪恶、堕落的品性、奢侈、贪污和腐败,这些不可避免地在大商业城市盛行的东西,难道不是绝对败坏的吗?"[3] 由于共和党人对城市生活的政治和社会影响感到害怕,确信农业社会和公民美德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因此,共和党人呼吁的经济政策集中关注于合众国向西扩展以合并更多的农场土地和进一步打开美国农业商品的国际市场。

虽然汉密尔顿同意杰弗逊,也认为美国经济的特点将影响美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但是他对哪种类型的经济基础最有利于国家利益却持不同的观点。汉密尔顿承认,农业生活提供了"最有利于人类自由和独立的状态"。[4] 但是他认为,民主制度的功能发挥需要有受过教育的和有专业知识的精英,而不仅仅是

农民和工匠，不论他们品德多么高尚。汉密尔顿还展望，美国将会崛起为一个大国。他因此支持工业化、城市化和逐渐减少国内市场对外国进口的依赖。虽然乔治·华盛顿担心与商业生活相伴的“奢侈、娇柔和腐败”，但是他同意汉密尔顿，“在这些州盛行的贸易精神将是不可抑制的。”[5]

在汉密尔顿的指导下，联邦党人呼吁，设立关税并提供公共补贴，他们认为这些是加速工业化所必须的。汉密尔顿寻求建立联邦银行体系，希望它能够创造一个富有的投资者阶级，这个阶级在公共财政方面具有直接风险，并可以为资本投资积聚必要的基金。虽然共和党人抱怨，联邦银行只会滋生腐败并加强精英的力量，但汉密尔顿争辩说，联邦银行，通过控制分立各州和私有债权人的自私自利的行为，将有助于形成国家统一性。联邦党人还反对快速向西扩展，他们担心这会损害工业化、淡化强大的联邦制度和统一感，而这些是汉密尔顿一直寻求鼓励的。

汉密尔顿与杰弗逊之间的辩论更多地是通过时间的流逝而不是通过审议和决策得到解决的。持续进行中的商业化和工业化很快就使杰弗逊关于农业美国的理念变成了一个时代错误。然而，美国经济的成熟并没有结束关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基础如何影响政治生活的辩论。

信奉杰克逊的民主党人在 19 世纪 30 年代和 19 世纪 40 年代拾起了杰弗逊的主题，他们担忧，财富和影响正越来越集中在商人、工业家和银行家的手里。工业和金融精英的崛起，由于削减了体力劳动者、工匠和农民的政治权力，因此给美国民主的活力带来了危险。当时自称为辉格党人的联邦党人反驳说，对公路、铁路和公共学校体系的大规模投资既有助于推动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又有助于提高更大程度的国家统一。正如一份报纸所指出的，“真的，铁路是工会、社会和国家统一的粘合剂。”[6]

到了19世纪中叶,奴隶制问题开始主导美国的政治经济讨论。辩论涉及到了有关经济生产与共和国政府之间联系的两种竞争观念的核心。南方人维护奴隶制以维持富裕的农业生活方式,但是他们还声称,它比北方新兴的工资劳动体系更缺少邪恶。南卡来罗纳州参议员詹姆斯·亨利·哈蒙德(James Henry Hammond)认为,北方工人已经变成了工业资本的奴隶。他说:"我们之间的区别是,我们的奴隶是终身雇用的,并得到了很好的报酬,没有饥饿,没有乞讨。……而你们的奴隶是按天数雇用的,没人照顾,报酬匮乏。"[7]

北方主张废除奴隶制的人回应说,奴隶制是不道德的,与美国建国原则相抵触。然而,很多其他北方人在更务实的基础上反对奴隶制,他们担心奴隶制的扩展会使工资工人丧失向西迁移并最终自食其力的机遇。虽然很多北方人接受工资劳动,但是他们只把这看作是最终实现自我经营和经济独立的中途站。正如共和党一位发言人所解释的,"一个年轻人为获得报酬出去服务——即劳动,如果你愿意这样叫的话——直到他赚取了足够的钱可以购买一个农场……并且很快,他就可以成为劳动力的雇主了。"[8]使用新的农场土地既可以为体力劳动者提供农业生活方式的选择,也可以为那些决定继续留在工业化东部工作的人改善工资和工作条件。[9]因此,阻止奴隶制的扩展,对于维持有利于独立劳动、公民美德和共和国理想的经济基础,便是十分关键的。

内战之后的几十年,工业化获得了快速发展,之后,关于如何保护独立的体力劳动者及其公民特性的审议,被关于如何保护工厂工人和抵制工业化对共和国政府不良影响的辩论所取代。工人领袖提议立法,把每个工作日的时间限制为八小时。主要的理由是,保护劳动者的尊严和道德品性,确保他们有时间

承担公民义务。国会和法院开始辩论反托拉斯立法的优点，他们希望以此限制大公司的垄断行为，使之不至于滥用影响，给有效运转的美国带来不利后果。

如何协调工业化的政治和社会影响与共和国政府的要求，在1912年的大选中得到了突出表现。竞选的主导性主题是杰弗逊和汉密尔顿曾经详细阐发过的主题的某种折射。民主党候选人伍德罗·威尔逊支持实行经济分权，保护小企业和独立工人，维护地方群体生活。威尔逊坚持认为，如果未来世代“睁开眼睛发现，在他们所在的国家，他们必须是雇员，否则就什么也不是……，那么他们看到的美国将是国父们最不愿想象的美国”。[10]进步党(Progressive)候选人西奥多·罗斯福反击说，公司的影响已经是一种事实，制约它的惟一出路是建立大政府和联邦法规。政府不该抵制工业化的集权化影响，而应该驾驭它，使之服务于创建更伟大的国家统一和社会凝聚。在罗斯福的思维中，是“广泛深远的民族主义精神”，而不再是自我雇用工人的公民美德，将成为共和国政府的基础。[11]

虽然威尔逊赢得了大选——既击败了罗斯福，也击败了当任总统和共和党候选人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但是罗斯福关于美国政治经济的理念，证明是对美国未来更精确的洞察。两次世界大战不仅加速了工业化的发展，而且加速了美国民族主义的传播，后者鼓动公众牺牲、促进了公民参与、推动了社会凝聚。工业资本主义、共和民主和民族主义的时代——美国时代——开始进入全盛时期。

## 历史变迁理论

并不仅仅在美国，经济活动的性质对政治生活具有深刻的

影响。历史进步背后的动力是主要生产方式的发展及其对治理制度和群体身份的影响。即使经济转变一般以进步的方式发生，但是总体上的历史变迁既有进化性特征，也有循环性特征。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形成一种特殊的治理制度和一种特殊形式的群体身份——这是界定一个时代的三个主要方面。但是，潜在生产方式的进步接着又会破坏同样这些政治和社会制度并使之丧失合法性，从而结束一个时代，开启下一个时代。正如史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在他关于地理进化的书中所指出的，“历史在循环的时候又无情地向前发展。”[12]

图3概括了历史发展的主要时代，并确认了使他们彼此有别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特征。这种历史进化论背后的逻辑是简单明确的。[13]生产方式推动历史发展，因为它构成了人类的基本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人类满足他们的基本物质需求和渴望。接着，人类提供这些需要的方式产生了适合于日常生活的治理制度和群体身份。在游牧时代，猎人组成小队，通过非正式的共识治理他们自己。群体身份是由亲属关系和原始的万物有灵论提

**图3　历史时代**

| 时　代 | 游牧时代<br>公元前<br>8000年前 | 早期农业时代<br>公元前<br>8000年—<br>前3000年 | 农业时代<br>公元前<br>3000年—<br>公元1700年 | 工业时代<br>1700年—<br>2000年 | 数字时代<br>2000年— |
|---|---|---|---|---|---|
| 生产方式 | 狩猎，采集 | 狩猎，园艺 | 耕作 | 工业<br>资本主义 | 数字<br>资本主义 |
| 主要治理制　度 | 小队 | 部落，首领 | 王国，<br>强制国家 | 民主共和国 | ? |
| 主要群体身份制度 | 万物<br>有灵论 | 自然崇拜 | 有组织的<br>宗教 | 民族主义 | ? |

供的。在农业时代，规模不断扩大的定居人口需要出现统治阶级为他们提供治理，需要法典化的宗教推动共同身份和社会凝聚的形成。在工业时代，拥有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大众导致了共和国民主的出现。民族主义是符合逻辑的产物，它为民主国家合法化提供了必要的共同身份和社会团结。

生产方式与由其形成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之间的反馈作用使历史发展具有了循环性和进化性特征。例如，耕作和灌溉的进步推动了定居群体生活以及与之相伴的社会分化的开始。反过来，知识阶层、国家官僚机构和商人阶级的出现，又推动了读写能力的扩展，以及知识和商业精英的起步。然而，这些知识精英带来的科学和技术进步，以及商人阶级政治权力的扩大，最终却瓦解了农业社会，为工业时代做好了准备。这些循环通过自然选择过程促成了累积性的历史进步。由于生产方式发展了，政治和社会制度与之同步前进，因此，社会能够更好地提供生活资料和安全防御，从而使之能够超越以前的政体并最终取而代之。

图 4 说明的是，由生产方式变迁以及作为结果的主要政治与社会制度的兴衰推动的历史进化论。出于清晰和简捷的目的，该图进行了简化，下面以历史变迁理论为基础进行详细阐述。[14]

在游牧时代，人类以流动小队的形式进行生活，每个小队大约由 25 个成员组成。[15]男人杀猎野生动物，女人采集可吃果实。虽然最能干的猎手通常成为事实上的领袖，但是群体是相当平等的，没有正式的政治制度。群体身份来源于联系紧密的群体生活以及以动物和植物灵魂为基础的原始仪式。

向早期农业社会的过渡是由两个因素推动的，对更稳定的食物供给的需求和园艺与动物饲养的发展。考古学家已经发现，大约公元前 8000 年在亚洲西南和中东就有农业定居点。虽

然大多数食物供给仍然来自于野生动物和植物，但是这些早期群体已经开始耕种小麦和大麦，他们主要驯养的动物是羊和山羊。中国的早期居民，大约在公元前6000年前，便开始耕种小米和稻米，饲养狗和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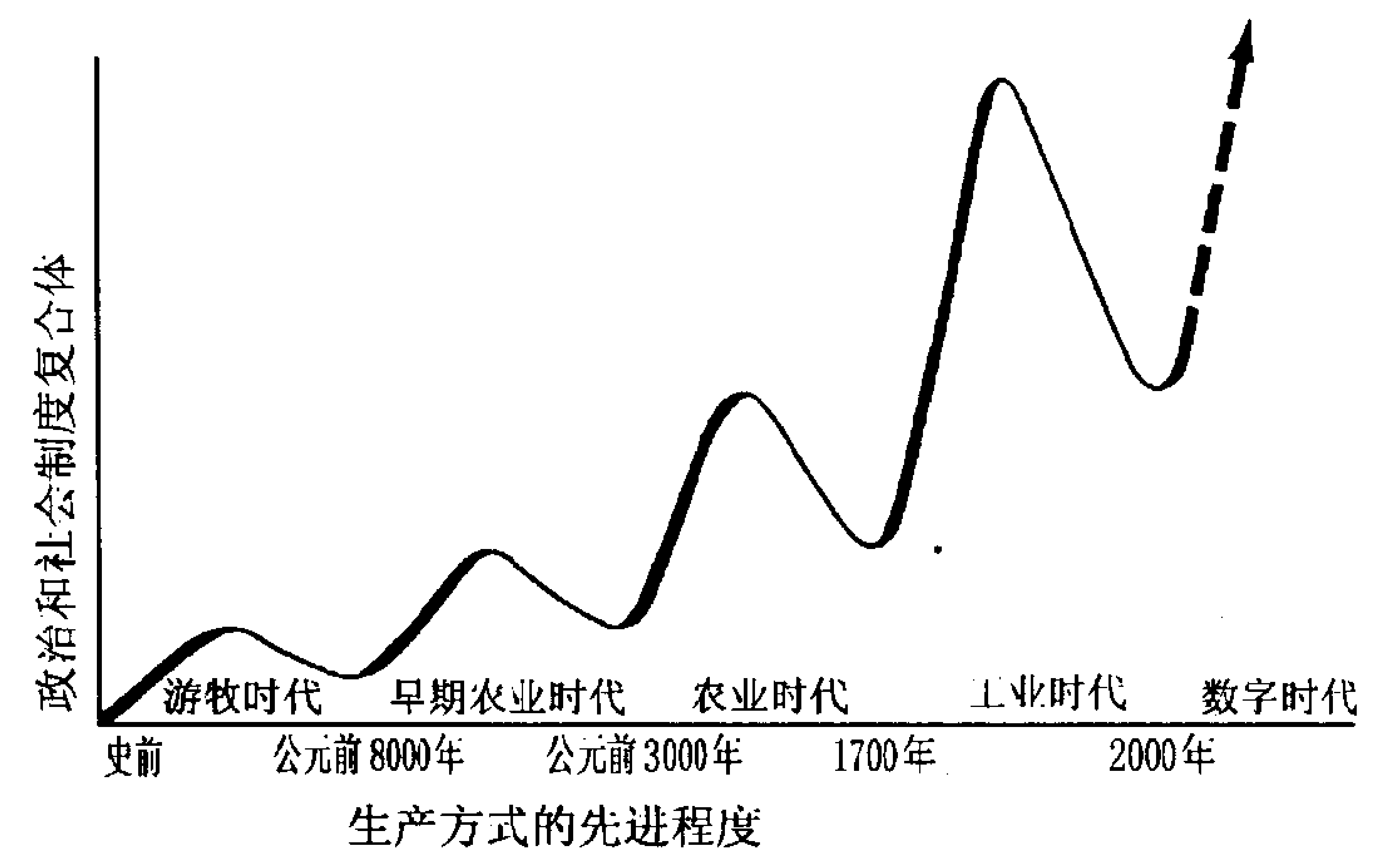



**图4　历史的循环进化**

从狩猎和采集向园艺的转变，使政治和社会生活发生了重要变迁。定居社会比游牧社会需要更多的治理，关于到何处定居，种植何种作物和何时种植，谁应该打猎和谁应该务农等问题，都必须作出决定。于是，原始的政治等级制出现了，它通常涉及到部落头目或首领的指定。首领领地在某种程度上比部落社会要复杂得多，它通常展示出更重要的社会分层和世袭继承。群体在规模上仍旧相对较小，这使直接接触能够成为社会凝聚的主要源泉。然而，精神习俗则开始包括更多的仪式，涉及太阳、月亮、天气和地球——这反映了农业在日常生活中起到了更大的作用。

农业时代的开始再一次是需求和供给相互混合的产物。越来越多的人口和越来越少的野生动物提出了种植粮食的需要。一些创新,如由牛拉动的犁、灌溉和作物轮作,使人类过渡到几乎完全依赖耕种生存的社会成为可能。公元前3000年后,农业社会同时在亚洲、欧洲、美洲和非洲落户生根。

农业作为一种主要生产方式的出现改变了盛行的治理制度和群体身份。灌溉、种植、食物储藏和社区管理等多项工作导致了社会分化。在土地拥有者和耕种者之间还形成了社会分层。对更广泛治理的需求和伴随农业社会而来的社会分层促成了新的国家结构——统治阶级和行政机构。尤其是当农业群体开始为土地和劳动力彼此竞争时,发动战争的负担使更强大的国家制度成为必不可少。主要为从事战争出现的国王和王室朝廷,最终还担负起了和平时期的治理工作。大多数农业政体变成了帝王王国、封建国家,或者二者的某种结合。

农业生产方式的开始为有组织宗教的出现提供了条件,有组织宗教成为群体身份的首要制度。耕作使更多的人可以靠一片宜耕土地生活,从而为大的城镇和早期城市扫清了道路。农民的生产超过了他们的消费,致使集体储藏设备开始出现,市场集镇获得发展,贸易路线不断延伸。政治单位在规模上发展了,将彼此只有很少或根本没有联系的群体涵盖在一起。这些变迁使政治生活变得更没有人情味,并意味着社会凝聚再也不能依赖亲情纽带和地方文化了。农业社会就这样创造了将宗教制度化的需要以及随之而来的共同身份感。

耕种提供的食物供给还使一部分人从土地劳作中解脱出来形成祭司阶级,从而推动了现代宗教的兴起。什一税和其他形式的社区支持使祭司能够集中精力关注知识追求,发展有组织宗教的神学和仪式基础。祭司阶级在通过接受信仰和仪式来提

高其影响方面具有既得利益，因此，他们努力工作，反击早期的民间习俗。此外，祭司还因为其技能和教育的缘故经常参与国家的行政管理。早期犹太人的科亨（Kohanim）和利未人（Levites）、中世纪天主教的神父、伊斯兰教的乌里玛（ulama）、印度教的婆罗门（Brahmins）和中国的儒教祭祀官——所有这些宗教权威都发挥着重要的政治和管理职能。

政治精英出于自身的理由支持有组织宗教的传播。统治者通常求助于宗教使其权威和财富具有合法性，国王和皇帝常常宣称他们与神灵相通，接受神灵的旨意。世俗领袖也经常求助于信仰来灌输忠诚感，维护帝国统一。例如，4世纪的时候，罗马帝国的领袖就把基督教建立为帝国疆域的官方宗教，其原因之一就是促进政治凝聚力。[16]

农业社会提高了计时和区分季节变化的重要性，这方面的发展也推动了有组织宗教的形成。关于何时种植、灌溉和收获的决定对于社区福祉是生死攸关的，它提高了社会对现在和未来的知觉，以及对时间及其计量方法的意识。“抽象、同质的时间”的出现，反过来产生了与祖先沟通的心理需要和有关来世生活的理念——这个需要是由有组织宗教来满足的。[17]宗教权威通常负责区分季节、预告新月观测、完成其他与时间有关的任务，这进一步加强了信仰与农业社会之间的联系。

《希伯来圣经》（*Hebrew Bible*）在很多方面都是从游牧社会向农业社会历史变迁的编年记录。犹太人从沙漠漫游者开始，在“金犊”（Golden Calf）的万物有灵论和摩西（Moses）的一神论教义之间走向分裂。以色列土地上的定居生活产生了祭司，他们得到的支持来自于义务性社区捐助、国王-勇士制度、宗教学问和习俗的发展。世俗和宗教权威一起为国家机构配置人员。犹太教提供了强有力的社会粘合剂，这在外国征服者分散犹太人口

之后尤其重要。犹太教的假日大多与农业周期有关，犹太教的习俗大多将日常生活与过去和未来联系在一起，这些假日和习俗与农业社会的社会和心理需求非常适合。

像此前的游牧社会一样，农业社会也促进了生产方式的变迁，并最终使自己崩溃。两个方面的发展导致了潜在的经济变革以及随后的农业时代主要政治和社会制度的衰退。一个是商人阶级的形成，他们对自由贸易和资本积累的兴趣使之与专制主义和中央集权的国家相对立。这个商业阶级依赖自身的财富和日益提高的自主权，逐渐破坏了王朝统治者和土地贵族垄断政治权力的能力。商人还投资于研究和技术，扩大贸易路线，帮助发展早期的金融手段。因此，商业阶级为政治和经济自由化铺平了道路。

第二个推动农业社会衰亡的发展是学识的扩散。尤其是在16世纪印刷机开始使用后，读写能力和学问不再是牧师的专利。科学和与之相伴的理性主义对有组织宗教的主导性社会作用提出了挑战，推动了教会与国家之间的渐进分离过程。技术进步在19世纪突然加速发展，在它的帮助下，企业家和工匠生产了手纺车、蒸汽机、铁路和其他一些对于现代工业增长至关重要的革新。科学进步确保紧随农业时代之后出现的是工业资本主义，而不仅仅是商业资本主义。

商业资本主义于16世纪和17世纪主要在欧洲和日本获得了发展，在欧洲和日本，权力分散的封建国家尤其有利于相对自治的商人阶级的崛起。[18]于是，工业化在英国于18世纪下半叶开始起飞，并于19世纪扩展到欧洲大陆、北美和日本。1789年，农业占英国国民生产的40%，工业占21%。到了1900年，农业生产只占英国生产的7%，而工业生产占了43%。在19世纪中期，英国四分之三的成年男性劳动力已经受雇于农业生产以外

的部门。[19]工业制造快速取代农业生产，成为主要生产方式。

工业时代带来了一种新的治理形式——共和国民主。[20]由于以下三个主要原因，工业化导致了共识政治(consensual politics)的崛起。第一，它形成了有影响的选民，如工业家、金融家、商人和店主，他们的兴趣在于获得对经济和政治生活的更多控制。中产阶级经济权力的上升既提高了它对政治权力的需求，也增加了它操控资源和杠杆以支持这些需求的能力。正是这个上升的中产阶级成了法国革命的先驱，并最终导致了大部分西欧地区为共和国民主而战。

第二，工业经济需要受过教育和可以迁移的劳动力，这反过来使大众教育体系成为必不可少。然而，对于国家来说，教育大众就是把大众带入政治领域，并威胁到工业和土地精英的统治。此外，把工人从农业环境中解放出来带到城市，推动了以阶级为基础、跨越不同文化、语言、种族和宗教的联盟关系的建立。因此，受过教育的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崛起加速了向共和国政府和普选的转变。

第三，资本主义和工业生产方式是建立在一套观念的基础之上的，这套观念的逻辑推论是实行民主政府。个人至上、经济竞争和永久增长、自由市场的运作、贸易的自由化——这些理念与政治自由的观念携手发展。国家应该服务于公民的利益，将他们的福利最大化，这个看法还与源自科学革命的对理性主义和效率的强调相一致。

工业时代给群体身份的主要制度带来了与此相似的深刻变化——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民族主义是工业社会和共识政治开始后的逻辑结果。宗教的主导性社会作用已经因为科学探索和宗教与国家的分离而丧失了合法性。需要出现一种新的社会粘合剂将公民与世俗国家联系在一起，这个任务是由民族主义

及其产生的共同身份与目的感来完成的。通过民族观念,无个性的行政国家变成了有感情的包容性民族,一个值得人们忠诚、归属和牺牲的政治共同体。工业化和大众教育体系形成的混合效应,创造了厄恩斯特·盖尔纳所指称的“同质呼吸空间”(homogeneous breathing tank)[21],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国家与民族的紧密结合。高中学校、报纸、生产线、铁路、义务兵军队——这些都是工业社会的同质化制度,它既使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新式群体身份成为必要,又使民族主义的快速传播成为可能。

现在工业时代已经准备好让位于数字时代了。作为技术进步的结果,工业制造已经失去了主要生产方式的地位。1950年,工业部门雇用34%的美国非农劳动力,生产29%的美国经济产品。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制造业部门只有雇用15%的非农劳动力,只有生产16%的美国经济产品。[22]处于上升状态的是信息、金融和服务部门。随着生物工程种子的出现、自动化的发展和生产、以及其他因数字技术而成为可能的革新,农业和制造业部门自身正处在转变之中。

向数字生产方式的转移仍然处在初始阶段。但是,随着数字时代的展开,它肯定会引起主要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根本变迁,就像以前时代转换所引起的一样。美国是这个新时代的首要奠基人,并已经快速将数字技术应用到了美国社会、经济和军事。不仅如此,美国为了使自身处在新时代的前列,已经接受了一套思考金融资本主义、信息技术和全球化的下一代原则。然而,悖论的是,数字时代很可能会危害美国的核心政治和社会制度,这些制度在美国获得全球优势地位的过程中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 数字时代的美国

只有借用回顾过去的优势才可能确定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

一个时代的开始。技术进步几乎每天都在发生,但是大多数技术进步对于生产方式只有量上的而不是质上的影响。例如,电话的引入是通讯技术的主要进步。它当然提高了工业效率,因为它方便了管理,使生产者与供应者和消费者处于即时性联系之中。但是,电话并没有改变工业生产的基本原则,因此并没有引起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显著改变。

现在还太早,还无法确定性地声称数字技术的传播代表了生产方式上质的变化,由此标志了新时代的开启。但是,金融和服务部门已经在美国经济生产中占了40%—70%,具体比例取决于界定这些部门的宽泛程度如何。[23]数字技术具有某些特点,可能使之具有充分的转变能力,从而足以构成一个历史性断点。

• 不像手纺车或电话这些具体发明,数字技术代表了一种影响几乎所有各类经济活动的操作系统。它同时使生产线自动化、使农作物和动物的基因改造成为可能、使金融手段和流动发生改变。在这方面,它是一种一般发明,与发动机的创造及其将热量转化为能量的能力相似,这个发现马上转变了农业、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业。

• 数字技术或许能够增加产量,减少成本,其规模可以与蒸汽机和电力引入后带来的结果相媲美。1990—1997年,密集使用信息技术的商品生产者在产量上获得了大幅度提高,几乎两倍于那些依赖更传统技术的公司。在80年代,美国汽车公司需要四到六年时间开发和制造一个新的汽车模型。数字技术将周期时间减少到只有两年多一点。通过旅行社预订机票要花费航空公司8美元,而通过互联网只需要花费1美元。在高技术部门内部,每个工人的生产力增长比其他经济部门高出多达20倍。[24]另外,数字技术比早些时候的革新更快地进入了主要经济体。从最初公共使用到进入30%的美国家庭,电力花费了46年

时间，电话花费了 38 年时间，电视花费了 17 年时间。互联网到达 30% 的美国家庭只用了 7 年时间。[25]

• 数字技术既在增加也在减少规模经济。全球经济的速度、规模和综合性正在推动更大企业的发展，这些大企业的生产地、劳动力和投资都跨越了国家疆界。同时，在以知识为主要增长因素的经济中，小的生物技术公司和互联网创业者很可能是革新的关键所在。工业时代的集权国家可能会遭到来自上下两个方面的破坏。

• 数字技术正在削弱地理位置和生产地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曾经是工业时代的标志。接近原材料和交通网络对于以信息为基础的企业来说，其重要性正在日益减少。数量越来越多的工人出于选择而不是出于必须进行重新安置。结果是，工业城市衰落了，人口的混杂程度比工业时代小了，一种更原子化和个人化的生产方式出现了。

现在还太早，还无法在数字时代和当前美国民主中表现出来的压力迹象之间划一条确定性的因果联系线。然而，潜在生产方式的转换开始对美国政治和社会制度造成不利影响，这一点进一步说明，美国正在接近历史性转捩点。其他力量可能也在起作用——传统家庭的衰退、经济不平等和不安全、美国人花在工作上的额外时间——这些合力给美国政治体制带来了一种无精打采的感觉。但是，公民参与的下降和民族国家的削弱——这些趋势将在下面详细阐述——支持着这样的观念，在伴随从工业经济向数字经济转换而发生的政治和社会变迁面前，美国制度正在变得越来越脆弱和反应迟钝。正如以前的历史循环，好像生产方式的变迁在使社会主要制度丧失合法性和走向衰退。

美国国父们热烈地争论，日常生活的性质会如何影响国家

政治制度的功能发挥。尽管杰弗逊和汉密尔顿在究竟农业经济还是工业经济更有利于美国利益的问题上意见不一，但是他们一致认为，积极的公民参与和政治分享对于合众国政府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阿列克谢·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是研究早期美国最敏锐的分析家之一，他也赞同地表示："城镇会议之于自由相当于初级学校之于科学，它们使自由触手可及，并教会人们如何使用和如何享受自由。一个国家可以建立自由政府，但是如果没有市政制度，那么它就不可能具有自由的精神。"[26]在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历史中，美国民主一直受益于健康水平的公民和政治参与。尽管杰弗逊及其后面的很多人对工业社会的潜在罪恶表示担忧，但是工业时代以及与此相伴的国家建设过程维持了强烈的公民参与精神。

然而，美国民主在最近几十年已经开始陷入蹒跚状态，显示出了丧失前进动力与方向的迹象。对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已经急剧下降。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从很多不同角度对公民参与进行了度量。他的发现如下："美国人中，喜欢通过竞选任职，或写信给国会或地方报纸来公开表达自己观点的人大概减少了10—15%，对政治和公共事务感兴趣的人减少了15—20%，愿意投票的人减少了大约25%，愿意参加公共会议的人，不论党派会议还是非党派会议，减少了大约35%，参与政党政治和实际上参加各类政治和公民组织的人，减少了大约40%。"他得出结论说："事实上，美国公民基础结构中超过三分之一在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完全蒸发了。"[27]普特南认为，信息技术和大众媒体是罪魁祸首，"在观看电视和公民参与减少之间"存在直接联系。[28]在电视机前面花的时间越多，可以用来参与公民活动的时间就越少。

至少表面上看，数字技术以及它产生的信息革命应该有可

能通过加强社会联系和凝聚力来改变日益减少的参与。毕竟，互联网使通讯变得更容易、更迅速、更便宜了。某些团体实际上已经更大程度地利用了互联网的组织能力。国际禁止地雷斗争组织高度依赖电子邮件来宣称和动员它的活动，就像与此相矛盾的反全球化运动所做的那样。各种协会和政治团体正在求助于网站和电子邮件，把它们当作散布信息的主要工具。普特南的某些批评者认为，他夸大了公民活动的跌落程度，因为他只是聚焦于传统形式的协会，而未能度量新型的参与。[29]

然而，信息时代好像不仅打断了公民参与的时间，而且改变了残留的不论何种形式的社会参与的质量和性质。美国人正在使用因特网过滤信息，他们只接收那些感兴趣的电子时事通讯，只上那些感兴趣的网站。人们使用因特网花费的时间越多，他们花在传统媒体上的时间就越少。[30]对范围广泛的观点和事实的接触日益减少，预示着选民会变得更极端化和更缺乏审慎。[31]

以互联网为媒介的政治还减少了面对面的接触，使政治生活的分裂化和原子化变得更严重。给候选人写一张支票或给国会办公室发一封电子邮件，与参加公共会议和同公民大众交换看法是不一样的。一个电子邮件信息可以传递一个想法，但是它却缺乏使政治讨论富有生命力的感情、肢体语言和手势。佩伯丁大学(Pepperdine University)的约尔·科特金(Joel Kotkin)指出："由于消除了实际面对面接触的需要，因特网增加了孤独感和社会孤立，扩大了缺乏关系亲密性的虚拟网络，这种关系亲密性只有身体接近才能产生。"[32]普特南通过他所指称的"被代理的公民身份"也表达了与此相似的担忧，他还附加指出："匿名是对审慎的根本诅咒。"[33]

数字时代好像还助长了个人主义精神和自私自利对公民关怀(civic-mindedness)的取代。日常生活已经变成定制的了。移

动电话可以使人一直保持联系,但是它也挤掉了慎重思考的时间。通过互联网可以定购任何东西,从食品杂货到机器到书籍,这当然是便利的,但是它也助长了物质主义,一种直接满足的需要,以及追求权利的伦理(ethic of entitlement)而不是追求责任的伦理。正如戴维·布鲁克斯(David Brooks)指出的,“令人担忧的是,美国不是因为过度扩张,而是因为软弱无力而衰落,因为美国的主要公民决定,特大型厨房带来的快乐比爱国服务带来的冲突和挑战更能让人满足。”[34]甚至经常用专栏向数字时代欢呼致敬的托马斯·弗里德曼也看到了数字时代比较阴暗的一面。在以“网络奴役”为题的文章中,他警告说,“在我们的生活中正在酝酿一种反对技术传播的力量。……你现在卷入了连续不断的互动流之中,在其中,你只能不公平地集中关注每一个。……现在你经常卷入。当你经常卷入的时候,你就经常在线上。而当你经常在线上的时候,你最像什么呢? 你最像一个电脑服务员。”弗里德曼承认,“那已经变成了精神上的枯竭”。[35]

这种日益增加的追求权利的伦理具有大量的迹象。运动型实用车(sport utility vehicle ,SUV)塞满了美国的高速公路和城市街道。2000 年,在美国购买的汽车中每两辆就有一辆是运动型实用车、迷你箱型车(minivan),或轻型载重车(light truck)。运动型实用车可以为拥有者提供高度舒适和马力。但是,它们的典型特征是每加仑汽油跑 13 英里,与一般紧凑汽车跑 30 多英里形成鲜明对比,从而大大抬高了能源消费,加速了全球变暖。美国只拥有世界人口的 4%,却占全球能源消费的 25%左右,美国的驾车者不应该购买只会使事情变得更糟的汽车。很大程度上因为来自汽车和能源工业的压力,众议院于 2001 年 8 月否决了要求运动型实用车达到更高燃料效率比的议案。[36]

美国军队,或许是美国公共服务的首要机构,2001 年选择

“一人之军”(an army of one)作为它的主要广告口号。对于变化中的社会规范和崛起中的个人主义魅力,很难想象出比这更清楚的声明了。美国全国铁路客运公司(Amtrak)从纽约到华盛顿的快速火车(Metroliner)过去通常为旅客提供远离城市喧嚣的暂时缓解,为人们静静反思或与同行旅客交谈提供时间。现在它是每个旅客都大嗓门拨打手机的嘈杂之所。美国全国铁路客运公司在大众的要求下,开始在火车中设立禁止使用便携电话的安静车厢。

事情正要变坏而不是变好。美国年轻人比任何其他年龄族都花更多的时间看电视和上网。他们还比任何其他年龄族都更少花时间参与公民活动,更看重财富和物质安逸。当这些人成熟起来,老一代人过世时,公民参与的总体水平可能会进一步下跌。正如普特南所观察的,“对公民参与的最大一代丧失还在后面。”[37]

美国政治和社会资本的减少源自于数字时代不仅对公民参与的影响,还有对治理质量的影响。美国人更少卷入公共事务,部分因为他们用其他方法参与,而且还因为他们对公共制度丧失了信任,感到政治制度的正直性正在受到破坏。在20世纪60年代,四分之三的美国人认为,他们信任美国政府大多数时间都做正确的事情。到了90年代,民意颠倒了过来,四分之三的美国人不相信美国政府在做正确的事情。[38]戴维·布鲁克斯对美国政治的艰难处境作了如下概括:“这些日子,我们大多数不想过多参与国家政治,因为它好像太偏袒和太丑陋了。结果,大多数美国公民变得远离公共生活,开始以带有某种蔑视态度的漠不关心看待所有并不与他们直接相关的事物。我们让我们的政治观点受到懒散的虚假犬儒主义(pseudo-cynicism)的侵蚀,虚假犬儒主义认为,所有政客都是坏蛋和所有公共事业都是骗人的。

正如民意调查极其清楚地显示的，我们已经对公共制度以及很多私立制度失去了信任。”[39]虽然这或许有些夸张了，但是布鲁克斯的批评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说是真实可信的。这里，信息革命好像又一次是主要问题所在。

媒体，尤其是电视，已经取代市政厅成为美国政治的主要仲裁者。进入公共职位需要进入媒体，进入媒体需要大量的金钱。数字时代只是加剧了这种趋势，推动了新闻频道的爆炸，大多数新闻频道昼夜不停地以疯狂的方式进行播放。媒体咨询顾问和沟通主管在精心制作和斟酌图像与信息方面是不可或缺的，这进一步增加了竞选任职的成本。讨好公司捐助人和填充选举金库因此成了赢得公共职位选举的关键因素——或许是惟一的关键因素。在 2000 年总统选举中，布什和戈尔分别花费了 1 亿 8700 万美元和 1 亿 2000 万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花在了电视广告上。2001 年麦克·布隆博格(Michael Bloomberg)用自己的 6900 万美元成功当上了纽约市市长。此外，选战开支一直在稳步提高。据估计，在 2000 年选举中，全部选战开支(总统和国会)为 30 亿美元，1996 年为 22 亿美元，1992 年为 18 亿美元。[40]

金钱在政治中的作用实质上将国父们所意指的观念和特性的竞赛变成了一个商业事务。从总体上考虑，选战更多的不是关于如何精心制作一个政策平台并倾听选民的意见，而是关于如何筹集金钱——或者具有个人财富——和雇用好的选举预测人与媒体顾问。公司资本主义和数字技术之间的联系还给主要捐助人赋予了无限的影响力，从而危害着一人一票的观念，并减弱了选民前往投票站参加选举的动机。看一下安然公司(Enron)2001—2002 年的破产，就可以说明问题。当安然公司行政主管——或世界通讯公司(WorldCom)行政主管——如此悍然地误导了它们的员工和持股人时，很难还会有人信任美国公司。

当参加安然事件调查委员会的248名参议员和众议员中有212人曾经从这个能源公司或它的会计公司安达信公司(Arthur Anderson)接受过选举资助时,一样很难还会有人信任美国政府。[41]

公司金钱对政治的渗透,鼓励并实际上奖励了善于操纵这个体系的个人,打击了那些寻求坚持更传统的关于共和国政府和公民责任的观念的个人。美国政客发现他们自己在遭到调查或在规避丑闻并不是偶然的,——这些都是在现有体制中发达起来的那类个人。像李·汉密尔顿、萨姆·努恩(Sam Nunn)、南希·卡塞鲍姆(Nancy Kassebaum)、达尔·邦普斯(Dale Bumpers)之类的人主动离开了政治也并不是偶然的,——他们是最终不愿意通过参加政治游戏使自己名誉受损的那类个人。这些都是令人担忧的趋势,尤其是因为詹姆斯·麦迪逊曾经希望,美国的政府体制将“从社会大众中吸取他们拥有的最纯洁、最高尚的特性”。[42]

政客和评论家一般都知道竞选资金正在对美国政治造成的损害。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作为参议员和总统候选人,长期以来一直积极推动改革。像前参议员邦普斯这样的权威人士坦诚地说:“金钱因素是良政(good government)的最大障碍。”[43]经过多年改变体制的尝试无果而终之后,立法终于在2002年清除了参议院和众议院的障碍。但是,为了确保立法能够获得通过,法案起草人限制了改革的范围。甚至法案的支持者都承认,这个立法只会“最低限度地减少巨额金钱的影响”,“几乎难以削减选举的庞大支出”[44]。

私人资金和数字技术对美国政治的联合渗透,还影响了华盛顿本身的业务运作。游说团体(lobby group)的数量在过去三十年中呈指数增长。它们的雇员在许诺金钱和选票的武装之下每天都对国会山进行攻击。[45]新的协会团体不断在华盛顿而不

是在全国开设办公室，它们曾经在全国动员积极分子，现在却只在华盛顿兜售影响。它们的成员现在不是参加会议而是提供捐助。社会抗议活动已经变成职业化和官僚化了。据政治学家罗纳德·赛科（Ronald Shaiko）称，“公共利益组织正在雇用经济学家、常春藤盟校（the Ivy League）律师、管理顾问、直接邮件专家和沟通主管”，而不是参与对草根阶层的组织。[46]

政策智库（think tank）受到了相似的影响。老一代智库——对外关系委员会、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是在要求报告公众辩论，对重要公共政策问题提供非党派性分析的委托下建立起来的。然而，在最近几十年，党派立场已经得到普遍传播，迫使这些组织变得越来越具有政治性，部分还因为这是公司提供资金的先决条件。华盛顿还发现，很多组织宣布自己是研究机构或智库，但是实际上它们是倡导团体（advocacy group），而且这样的组织在激增。像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这样的机构具有明确的政治议程，并得到了对这些议程有直接利益的捐助人的支持。新大西洋倡议（New Atlantic Initiative ，NAI）作为以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为基础的研究项目，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主办过十几次关于北约扩大的会议。但是，会议的大多数与会者都怀着相似的想法，新大西洋倡议感兴趣的是使北约扩大开始进行，而不是促进有关这个议题的深思熟虑的辩论。

这些倡导团体受到了极好的资助，并充分利用了数字时代。想法，跟国会中的选票一样，是用来出售的。随着作为公正仲裁者的智库的衰落，公共辩论的质量和正直性也下降了。

这些趋势合在一起使美国政治给人一种脱离现实和易受影响的感觉。公共形式越来越远离私有现实。2000 年共和党全国大会发出的关键信息是温和、中庸主义和富于同情心的保守

主义。布什总统一上任，便急剧转向右翼，对利益集团和保守的捐助人感激涕零。布什政府非常得意地对2001年春通过的减税计划进行大势渲染。但是，大多数分析家对它的意义不以为然，揭穿了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烟雾和虚假景象构成的立法妥协。[47]含糊其辞(double-talk)并不是共和党人的独特发明。在很多问题上，从医疗保险到导弹防御系统到人道主义干涉，克林顿政府的言辞通常与现实没有一点相像之处。

国会的行为也没有变好，它决没有因为奠基人设想的审议机构而为之带来声誉。2000年11月1日，总统选举6天前，《纽约时报》编委会在一篇题为"无效国会"的主要社论文章中指出了这一点。"第106届国会，由于在两年任期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展示，因此几乎已经从公众话语中消失了。……几乎在每一件重要事情上——枪支管制、病人的权利法案、能源控制解除、社会保险——国会都做得很少或什么也没做，它未能制造一个或者值得庆祝或者值得谴责的记录。……但是，如果国会对公众普遍做了什么令人作呕的工作，那么它所做的难以置信的工作就是用最后一分钟的立法意外装饰了自己的巢穴，奖赏了商业利益团体和喜欢的选民，对于国会的立法意外，不论公众还是大多数国会议员都未能真正理解。"

美国治理制度的蹒跚表现并不仅仅源自于国内发展，而且还源自于重要的跨国政治动员。通讯革命给激进活动分子提供了建立跨国广泛联盟的新机遇。参与推动实现捍卫人权、禁止地雷、保护环境和抵制全球化等目标的团体，已经组织了有效的国际斗争，它们主要依赖的是因特网。这些新形式的参与和动员在达到预期目的方面是相当有效的，但是它们的确绕开了民族国家，使国家的政治领域陷入难堪境地。美国制度的突出特征开始减弱，因为美国公民发现跨国参与是追求其政治目标的

一个更有效的选择。

公民参与的减少和治理的衰弱好像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由于美国人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他们给特殊利益者留出了更多的空间，使之得势。怠慢的选民还使当选官员对投票人更缺乏责任感。结果，治理质量遭到了侵蚀，并反过来只是进一步加强了公众的玩世不恭和拒绝参与。鉴于公民参与和无数公共产品——积极反应的政府、社会信任和凝聚、低犯罪、经济效率——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这些都是令人深深忧虑的趋势。[48]

信息时代和数字时代决不是这种美国民主总体软弱无力的惟一原因。公司金钱对政治的扭曲影响很难怪罪互联网。在1912年总统大选临近期间，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已经就如何限制过分的公司影响展开了辩论。信息技术以外的力量也可能助长了60年代以来公民参与的急剧减少。

但是，证据充分显示，数字时代和信息革命是美国主要治理制度发生衰退的首要原因。在最低限度上，当美国民主结构因为其他不同原因已经开始遭到削弱时，数字技术的政治和社会后果也同时在破坏着这个结构。民主实践方面表现出来的压力，与这样的观念是一致的，即生产方式正在发生转变，因此美国正在进入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历史过渡期。这个过渡刚刚开始，数字时代仍处于发展初期。但是，早期迹象已经在冲击着对美国当前政治制度持久性的自鸣得意。

如果数字技术的出现和传播标志着新的历史时代的开始，那么这个生产方式的变化应该在影响治理制度的同时也影响群体身份的主要制度。正如美国民主制度接受着历史前进步伐的考验，民族国家自身也一样可能接受着数字时代造成的社会变

迁的挑战。民族主义是工业社会的婢女,工业时代的结束可能因此削弱了民族国家的基础。

这里早期证据也支持这样的主张,一个时代性转换正在进行。再一次,现在还太早,无法对从工业经济向数字经济转换的社会后果作出任何结论性的判断。但是,通过考察数字社会的逻辑和现有的有限数据,得出一些有说服力的探索性命题是可能的。

工业时代将人们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使之接受共同的大众教育体验,让人们在城市和工厂彼此接触,并用铁路和州际高速公路联结成民族国家,通过这些,工业时代促使民族主义被采纳为群体身份的主要形式。用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的话说,"社会生活不是将自身集中在无数小的既独特又相似的焦点上,而是变成普遍的。社会关系……在各个方向上向外扩展它们的边界。"他还接着说,随着工业化的进行,"越来越多的彼此充分接触的个人能够相互地在彼此之间发生作用和反作用。"[49]正是这种人民的迁移和混合导致了工业大熔炉的出现,将新移民融入多种族城市,并促进了共同的国家身份。

数字时代好像正在将这些社会趋势中的很多翻转过来。正如约尔·科特金观察到的,"数字经济的崛起正在废弃当代美国的经济和社会地理。"[50]工业化工作场所推动的团结一致正在让位于个人化工作站造成的社会分裂。在家里工作的美国人数量快速增长。[51]使用因特网同一个可能从来没有见过面的远方同事一起工作,或许会提高效率,但它却是以牺牲社会联系为代价的。贸易工会作为工业时代社会团结一致的象征,已经陷入了稳定的衰落状态。自 50 年代以来,参加工会的雇员在美国劳动力中的比例从 33%下降到了 14%。[52]

数字时代还正在改变劳动力迁移的方式,这种改变如果不

是翻转，也会减缓，工业时代推动的社会和种族混合。非工业公司及其雇员在选择何处定居方面具有更大的灵活性。靠近河流、港口、铁路和原材料的重要性大大减小。科特金写道："技术越是将我们从场所专制中解放出来"，生活质量、天气、价值观和文化亲和等因素在工人决定何处定居方面的影响就越大。[53]

由于劳动力迁移变成更多是一种选择而不是一种必需，美国的城市开始陷入困境。像圣路易斯和底特律这样的工业大都会自50年代以来已经丧失了大约一半人口。在一些地方，如北卡来罗纳州或科罗拉多州，较富裕、大多数为白人的城市居民一直在向郊区或更乡村化的社区迁移。在90年代，定居在非大都会地区的居民超过40%是前城市居民。受益于这种移民的社区可能是富裕的和多产的，但是在社会和种族方面它们也是同质的。继续留在内城的是较穷的低技术少数群体，通常分别处在不同的种族飞地中。几乎三分之二生活在城市中心的儿童是非白人。大多数继续留在内城的白人儿童生活在工人阶级家庭。[54]

芝加哥、纽约和旧金山好像是例外，它们拥有更强劲的经济和更少的都市迁徙。但是，甚至这些商业城市也在丧失某些先前的社会和种族异质性。在旧金山和纽约，住房价格使城市相当大的部分只有高收入的居民才能进入，他们大多数是白人。[55]中产阶级黑人也在他们自己的社区集结。例如，马里兰州的波维(Bowie)已经像磁铁一样吸引着在巴尔的摩-华盛顿大都会地区工作的职业黑人。[56]

因此，数字时代的来临好像是以牺牲工业大熔炉为代价的，工业大熔炉曾经帮助形成了现代美国的民族国家。经过几十年公民权利运动推动的进步之后，美国可能正在向更大的种族和社会隔离倒退。博杜因学院(Bowdoin College)的安东尼·沃尔顿

(Anthony Walton)有道理地对"山巅上闪耀的网络之城"表示担忧,在那里,人们"学习在不用关注或遭遇内部城市悲剧的情况下存在"[57]。罗伯特·卡普兰也是正确的,他怀疑的是,美国的国家性将如何进展,因为这个国家的构成变成了"彼此互不相干的孤立的郊区小区和种族与阶级飞地。"[58]

在推进社会团结一致方面更缺乏有效性的数字经济,可能在将移民融入多种族主流社会方面也是更缺乏有效性的。到美国的移民在 90 年代重新增加,使人口中外国出生居民的比例上升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水平。20 世纪初期,到美国的移民 90%来自欧洲。到了 20 世纪末,大多数移民要么是西班牙裔,要么来自亚洲。亚洲移民像他们的欧洲先驱一样倾向于很快融入美国社会,但是最近的和即将来临的西班牙裔移民则会继续保持与美国社会隔离的状态。

2000 年人口普查报告说,几乎五分之一至少 5 岁的美国人在家里讲一种英语以外的语言。在这个群体中,60%的人讲英语,43%的人表示他们的英语讲得并不"很好"。[59]西班牙裔儿童还倾向于比亚洲移民的小孩更长时间地生活在双语家庭中。[60]另外,比例日益上升的拉丁美洲裔人口在上种族隔离学校。1998 年,大约 37%的拉丁美洲裔学生到 90%或更多入学学生为少数种族的学校上学,这个比例在 1968 年为 23%。[61]西班牙裔群体(超过 3500 万人)的绝对规模,在西南地区的集中居住,缺乏一度因为工业劳动力需求而产生的扩散,临近来源国家使之成为可能的人员交易的进出流动——所有这些因素或许会叠加在一起减缓西班牙裔人口融入多种族美国的进程。

处于风险中的并不仅仅是种族和社会统合,数字经济可能还加强了地区分裂线。自早期以来,美国就不得不面对各个地区的不同文化和经济利益。这些分歧在某种程度上因伴随工业

化而来的人口流动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冷战产生的共同事业感而有所淡化。但是,这些分歧正在回归。

由于家庭在决定到何处定居方面可以更自由地考虑价值观和政治信念等因素,因此人们倾向于与志同道合的人聚集在一起。特别是如果因特网鼓励美国人过滤他们接触的信息,那么文化多极化会沿着地区界线加强。罗伯特·普特南发现,北方和南方之间仍然存在着广泛的文化分歧,尤其是在公民参与方面,这个发现强调了更大的地区多极化的潜在意义。[62]在这一点上,非常值得注意乔治亚州民主党参议员泽尔·米勒(Zell Miller)是如何解释阿·戈尔于2000年大选中在南方的低迷表现的。米勒写道:“南方人认为,全国民主党并不分享他们的价值观。……如果南方选民开始认为你不理解他们——或者更糟,更糟得多,如果他们认为你鄙视他们——那么他们将永远不会投你的票。”[63]

在经济方面,彼此分歧的地区利益可能会采取新的形式。对于美国很多地区来说,尽管2001年9月恐怖袭击之后边境控制加强了,但是跨越国界的商业还是比各个地区之间的贸易更频繁。墨西哥工人涌向美国,美国公司到墨西哥安家。由于美国西南地区的西班牙裔人口继续在增加,它同墨西哥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只是在进一步增强。美国埃尔帕索(El Paso)和墨西哥华雷斯城(Ciudad Juarez),跟美国圣迭戈(San Diego)和墨西哥蒂华纳(Tijuana)一样,尽管边界将它们分隔开来,但是它们实质上已经构成了连成一体的大都会地区。美国新墨西哥州正在同它的邻居和姊妹城市墨西哥的奇瓦瓦(Chihuahua)实施联合发展计划。2002年3月,美国和墨西哥同意建立新的联合边界控制系统,以便在提供足够安全的同时加速人员和贸易的流动。[64]根据图森市亚利桑那大学墨西哥美国研究中心主任阿德拉·托雷

(Adela de la Torre),“对于生活在边境的人们来说,并不存在边境。我们同生活在墨西哥的人共同分享着我们的生活。”[65]

美国的北部边境也在经历着相似的转变。第一次纽约州－安大略省经济峰会(New York-Ontario Economic Summit)于2001年6月召开,由纽约州州长乔治·帕德奇(George Pataki)和安大略省省长麦克·哈里斯(Michael Harris)主持。正如一个评论人指出的,“会议议程接受了尼加拉瓜河和圣劳伦斯河两岸很多人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坚持主张的东西——这个地区的命运存在于建立更紧密的、使美国－加拿大边境变得基本无关紧要的商业联系。”[66]2001年9月恐怖袭击之后,一些人提议美国和加拿大应该有一个共同安全的边界,为移民和游客在进入每个国家时安排综合性受理程序。[67]12月,两国签署了一个协定,承诺在国内安全和边境控制方面进行更多的合作。波特兰、西雅图和温哥华正在形成更紧密的经济和文化联系。罗伯特·卡普兰表示,居民对共享地区——卡斯卡迪亚地区(Cascadia)——日益增加的忠诚可能不久就会大大超过他们对各自州和国家的忠诚。[68]商业战略家肯尼基·欧梅(Kenichi Ohmae)同卡普兰一道质疑,民族国家是否仍然代表着“一个真正的共同分享的商业利益共同体”,并决定着“有意义的经济活动的流动”[69]。

在民族国家全盛时期,文化、经济和政治边界完全重合一致。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群体身份和贸易流动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迁,但是政治疆界却继续照旧。在最低限度上,这种日益突出的不适合可能会导致民族国家的显著特征走向减退。更可能的是,进行中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变迁会提出质疑,民族国家至少按照当前理解的含义是否继续是世界的主要政治单位。

亚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在《美国的分裂》中指出,美国是“一个实验,一段时间相当成功,为不同种族、宗教、

语言、文化的人们创造了共同的身份”。但是,施莱辛格警告说,“只有美国人继续相信这个目标”,“这个实验才能继续成功”,“如果公众现在背离了乔治·华盛顿‘一个民族’的古老目标,那么未来会怎样呢?——会出现国家共同体解体、种族隔离、巴尔干化、部落化吗?”[70]想象像美国这样的富裕、多种族、民主的国家可能朝这个方向迈进似乎是牵强的。但是美国人只需向北看,就可以发现一个这样的例子,一个富裕、多种族、民主的国家正面临着分裂前景。在1995年举行的最近一次全民公决中,讲法语的魁北克省距离脱离加拿大只差毫厘了,49.4%的投票人支持脱离。

很多观察家表示,2001年“9·11”事件会帮助改变这些令人担忧的政治和社会趋势。正如罗伯特·普特南评论的,“我认为,有可能,‘9·11’事件会成为整个美国的转折点。这是一个可怕的悲剧,但是,如果它能引起我们彼此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政府作用更加思路开阔,那么也可以从中得出好的东西来。”美国毫无疑问在恐怖袭击之后团结在了一起,公民精神和对政府的信任都急速提高。所有背景的美国人都分担着集体悲痛和愤怒。国家统一性的这种流露既是真诚的,也是令人难忘的。但是,除了把这解释为对独特条件的暂时反应,很难将它解释为其他任何东西。普特南自己也承认,“这可能在眨眼之间就消逝了。”[71]反恐战争并不很适合于改变这些深深植根于潜在生产方式变迁及其对政治生活影响的社会趋势。

这里强调的不是数字时代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美国的政治分裂。美国是一个具有显著适应性和弹性的国家。[72]这种灵活性使美国可以跟上作为数字时代决定性特征的快速变迁的步伐。

但是,这里强调的是,新性质的严重挑战就在前面。这些挑战有可能破坏共和国民主和民族国家的基础。数字时代远远没

有为繁荣和稳定的宁静未来铺平道路,它肯定会带来政治和社会的深刻转变,其深刻程度会跟工业时代来临时带动的转变一样。

## 为时代变迁做好准备

冒险猜测数字时代的主要政治和社会制度可能是什么样的,将是一件十分投机的事——就好像试图从 1700 年的起点上描绘工业时代一样。然而,美国优势地位的终结与工业时代的终结同时发生,这个观察点的确可以使我们得出一系列关于未来的洞察。

美国将不能有效管理衰落中的优势地位,以及随之而来的不确定的国际环境,除非美国还同时解决国内制度的虚弱无力。要形成一个新的大战略、设计一个与之相适应的新的国际主义,就要有反应灵活的政治制度、关注和参与的公众,以及足够强烈可以支持牺牲和共同目的感的国家身份。

因此,公众和私有部门应该合作重新激发公民参与,防止可能最终威胁美国民族国家完整性的种族、社会和地区分裂。虽然数字时代好像对公民活动具有负面影响,但是互联网富于想象力的使用的确有可能提高政治参与。某些学者指望"信息大众"和"审议区域"的建立来鼓励公共机构、公共利益集团和公民之间的互联网对话。[73]互联网可以推进对公共会议的参加和对公共记录的使用。[74]数字技术还能够用来促进投票和构成虚拟的城镇市政厅。[75]

然而,通过互联网进行的公民参与不能代替直接的人际接触和审议。在各种协会改善各自网站和为华盛顿办公室配置人员时,他们还应该动员草根阶层的努力,以便改进政治制度的完

整性，要求对竞选资金进行更雄心勃勃的改革，并限制公司游说对公共生活的负面影响。甚至当新的大卖场建立起来时，它们应该包括进行公共活动，如社区会议、公共剧院和慈善工作的空间。

反击可能伴随数字时代而来的社会分裂和多极分化，也需要公共和私有部门的努力合作。要恢复很多城市中心的经济活力和社会异质性，就必须对内城进行投资。联邦政府和各州立法机关应该联合工作，改变拉丁美洲裔儿童上种族隔离学校的比例日益增加的趋势。一个全国服务项目可以确保来自不同种族和社会背景的美国人相互混合，并帮助建立社会资本，培养共同分享的对更广泛国家共同体的忠诚感。

数字时代的开始对美国外交政策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随着21世纪的展开，两种不同类型的历史循环将一同改变全球环境。本书大部分篇幅已经集中讨论了发生在一个特定历史时代内的大国的循环兴衰。欧洲上升和美国单极时刻的终结反映的正是这个循环的向前运动。本书最后一章讨论了由生产方式进步推动并导致不同时代兴衰的更宽泛的历史循环。工业时代的衰落和数字时代的开启反映的正是这个循环的向前运动。

这两个循环同时到达了一个临界点。时代变迁正在进行的同时，美国优势地位开始衰微。要承认，变迁的步伐是相当不同的。美国霸权的衰落本身要到这个十年和下一个十年之后才能结束。工业时代的终结和数字时代的兴起将要在这个世纪和下一个世纪得以展开。然而，这两个循环变迁是同时发生的，这的确说明我们有必要特别关注国际社会面临的各种挑战。

时代变迁因为两个原因将增强伴随多极世界回归而来

的动荡。第一个原因是，从工业时代向数字时代的转换将会使世界政治体系担负特别的负担。美国、欧盟和日本占优势的国际地位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们的发达经济。但是，他们的成就也使他们处于历史的前列，他们将首先感受到数字经济对社会的混乱影响。如果他们的主要政治和社会制度在未来几年蹒跚不支，那么这些政体很可能会集中精力处理自身的问题，而不能从容应对易变、复杂的国际环境。国内制度经历转变的国家还倾向于试图通过扩张性外交政策来输出他们的问题。法国革命及其对法国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影响在助长法国地缘政治野心和引起拿破仑战争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可以直接追溯到德国的工业化和德国民族主义，德国民族主义是政治动荡引起的，而政治动荡又是经济变迁造成的。主要国内制度处于转变过程中的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经常是难对付的行为体。

时代变迁还可能因为第二个原因加剧动荡——动乱可能在时代分裂线两侧之间爆发。处于不同历史阶段的国家经常彼此较量，在很大程度上因为他们具体体现了相互竞争的组织原则。在过渡到农业时代之后，农业国家和游牧部落常常发生战争，只有当游牧社会证明无法与农业社会产生的经济和社会进步相匹敌之后，他们的斗争才告结束。工业时代开始后，过渡到共和国民主的那些国家经常发现他们与那些坚持更独裁形式统治的国家处于冲突之中。很可能，那些过渡到数字时代的国家会发现他们与那些仍然停留在较早历史阶段的国家存在矛盾。2001 年 9 月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如果不是别的什么，一定是那些远远落后于历史发展的人对历史发展前沿国家的痛击。

由于现在处于历史发展前沿的国家与落后于历史发展的国

家之间存在着差距，这个问题变得尤其尖锐。差距从来没有这样大过。数字技术正在渗入大多数发达国家，并从而加速了他们的历史进步。美国人一直在忙于辩论如何最好地将宽带互联网扩展到家庭，以及是否支持干细胞(stem cell)的研究。同时，世界上很多欠发达国家仍处于如果有进步也是缓慢进步的历史阶段。他们的公民一直在忙于寻找木柴，想知道下一顿饭来自何处，并担忧他们是否能够使用甚至最原始的医疗设备。这两个世界几乎没有任何共同点，这使他们很难走到一起合力解决集体挑战，不管这种挑战在性质上是人道主义的、环境的，还是地缘政治的。随着数字时代的开始，历史发展前沿与历史发展末端之间的差距只会增加。

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快速赶上的压力是最后一个潜在动荡的根源。匆忙进入数字时代的国家可能会越过重要的发展阶段，从而有可能在过程中大大抬高成本。俄罗斯正在寻求快速融入全球市场。但是，强大中产阶级的缺乏使之没有一个政治压舱石，以便能够经受国际经济变幻莫测的考验。在20世纪90年代，东南亚国家受益于他们与全球金融市场的紧密联系。但是，当这些国家把经济推进到数字时代时，他们发现他们的传统政治和社会制度既难以驾御，又反应迟钝，并最终助长了席卷整个地区的金融危机。移动电话已经进入马其顿以及世界上很多其他发展中国家。但是，由于马其顿缺少专业性和独立性的新闻媒体团队，移动电话散布谣言和点燃政治热情的能力帮助推动了爆发于2001年的种族暴力。匆忙穿越历史的国家很可能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这是对未来发展前景的清醒描述。在最低限度上，这些洞察清楚说明，历史不会很快终结。多极世界的回归和数字时代的展开都是不可避免的，都是不可变更的历史进化和循环的产

物。美国优势地位将随着欧洲以及最终亚洲的崛起而衰退。数字时代将与不可阻挡的技术革新步调一致地向前发展。人类选择很重要，但是历史有其自身的至关重要的发展动力。

存在更多人类选择空间的地方——而且空间很大的地方——在于，准备迎接伴随历史前进而来的挑战。为已经开始展开的地缘政治变迁和时代变迁做好准备，第一步是认识到它们正在发生，并弄清它们的前因和后果。本书中心目的所要做的恰恰就是这些。现在的任务是，那些相信本书提出的各种警告的人担负起困难但却重要的职责，为美国时代的终结未雨绸缪。

## 注 释

1. 引自 Drew R. McCoy, *The Elusive Republic: Political Economy in Jeffersonian America*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0), 第 12 页。

2. 引自 Michael J. Sandel, *Democracy's Discontent: America in Search for a Public Philosoph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第 147 页。

3. 引自同上书，第 126 页。

4. 引自同上书，第 146 页。

5. 引自 McCoy, *The Elusive Republic*, 第 102 页。

6. 引自 Sandel, *Democracy's Discontent*, 第 163 页。

7. 引自同上书，第 176—177 页。

8. 引自同上书，第 179 页。

9. Thomas R. Hietala, *Manifest Design: Anxious Aggrandizement in Late Jacksonian Americ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 1985), pp. 102—104.

10. 引自 Sandel, *Democracy's Discontent*, 第 216 页。

11. 引自同上书，第 218 页。

12. Stephen Jay Gould, *Time's Arrow, Time's Cycle: Myth and Metaphor in the Discovery of Geological Tim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51.

13. 这种历史变迁的理论化代表了几种不同智力传统的结合。在形成过程中最有影响的包括以下著作。关于生产方式在塑造政治和社会制度中的重要性:Talcott Parsons, *The Evolution of Societies*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1977); Emile Durkheim,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 (New York: Free Press, 1984); Karl Marx, *Capital: A Critical Analysis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trans. Samuel Moore and Edward Aveling (London: Allen & Unwin, 1971); and 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关于历史的循环和进化性质:Gould, *Time's Arrow, Time's Cycle*; George Modelski, *Long Cycle in World Politic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7);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关于社会变迁对技术和革新的反馈效应:William H. McNeil, *The Rise of the West: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 and William H. McNeil, *The Pursuit of Power: Technology, Armed Force, and Society Since A. D. 100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有关这些主要文献极富见地的概述,参见 Stephen K. Sanderson, *Social Transformations: A General Theory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Cambridge, Mass.: Blackwell, 1995)。也请参见 Jared Diamond, *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 of Human Societies* (New York: Norton, 1999)。

14. 图 3 和图 4 具有概略性特点,不打算给每个历史时代划定精确的时间。相反,每个时代都渐进式地转入下一个时代,在转变过程中世界上的某些地区比其他地区发展得更迅速。值得注意的还有,这种历史时代及其维度的确定并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共识,它们是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其他领域专家正在讨论的话题。本部分的目的是要展开历史变迁的一般逻辑,而不是要就一直复杂深奥且争论不休的问题给出一个更确定性的解释。

15. 这个概括借鉴了 Sanderson, *Social Transformations* 中关于历史变迁的概述。

16. 参见 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e Empire*, with introduction, notes, and appendices by J. B. Bury, vol. 2 (New York: AMS Press, 1974), 第 311—317 页。

17. 参见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Verso, 1991).

18. 某些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把商业资本主义的兴起看作是农业时代结束的标志。参见,例如,Sanderson, *Social Transformations*, chap. 5. 虽然商业主义的确在16世纪和17世纪之间得到传播,但是却直到工业革命时期农业社会的主导性政治和社会制度才让位于新形式。因此,本书认为18世纪是关键的历史转折点。

19. B. R. Mitchell,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Statistics: Europe*, 1750—1993 (London: Macmillan, 1998), p. 934; and David S. Landes, *The Unbound Prometheus: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Western Europe from* 1750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 187—188.

20. 毋庸置疑的是,工业生产方式最初产生了很多不同类型的国家,包括实行独裁政府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国家。然而,这些国家的大多数在20世纪的发展过程中进展并不顺利,并最终转向了民主和资本主义。关于工业资本主义对政治和社会制度影响的进一步讨论,参见 Ralf Dahrendorf, *Class and Class Conflict in Industrial Society*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Clark Kerr et al., *Industrialism and Industrial Man: The Problems of Labor and Management in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Anthony Giddens, *Sociology: A Brief but Critical Introducti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2); and F. A. Hayek, *The Fatal Conceit: The Errors of Social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21.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p. 52.

22. 1998年,农民大约占美国劳动力的2%,农业产量大约占国内生产的1%。Information on the U.S. workforce from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Employees on Nonfarm Payrolls by Major Industry Division, Annual Averages, 1947—2000." Available at: http://www.bls.gov/opub/rtaw/pdf/table12.pfd. GDP figures from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by Industry in Current Dollars, 1947—1999." Available at: http://www.bea.doc.gov/bea/dn2/gpo.htm. Number of farmworkers in the workforce from 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vailable at: http://states.bls.gov/

oco/cg/cgs001.htm.

23. 根据比较狭义的界定,1999年服务业和金融业的产值大约占GDP的40%(21.5%来自服务业,19.4%来自金融、保险和不动产业)。如果政府、零售贸易和批发贸易也包括在服务业之内,这些部分经常被这样归类,那么服务业和金融业产值几乎占GDP的70%。现在很难估计,总体经济产值中有多少百分比可以被看作是由经济的数字部分生产的。例如,在当前的会计程序中,计算机的制造仍被算作工业生产。美国政府正在修订这些会计程序,以反映经济性质的变化。有关数据,参见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by Industry in Current Dollars, 1994—2000." Available at: http://www.bea.doc.gov/bea/dn2/gpoc.htm # 1994—2000。

24.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The Emerging Internet Economy II", June 1999, pp. 25—35. Available at: http://www.esa.doc.gov/esa/pdf/ED2report.pdf. Department of Commerce, "The Emerging Digital Economy", pp. 17, 28, 3—4. Available at: http://www.esa.doc.gov/508/esa/pdf/EmergingDig.pdf.

25. The UCLA Internet Report, "Surveying the Digital Future", October 2000. Available at: http://www.ccp.ucla.edu.

26. 引自 Sandel, *Democracy's Discontent*, 第27页。

27. Robert D. Putnam,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0), 第46、43页。

28. 同上书,p. 238.

29. 批评者指出,自愿服务和慈善捐助并没有减少,通过因特网的政治参与已经取代了更为传统的参与形式。关于不同争论立场的评判,参见 William A. Galston and Peter Levine, "America's Civic Condition: A Glance at the Evidence", in *Community Works: The Revival of Civil Society in America*, ed., E. J. Dionne, Jr.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8), pp. 30—36; and D. W. Miller, "Perhaps We Bowl Alone, but Does It Really Matter?"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July 16, 1999, pp. A16—17。

30. Norman Nie and Lutz Erbring, "Internet and Society, A Preliminary Report", February 17, 2000. Available at: http://www.stanford.edu/group/siqss/Press-Release/Preliminary-Report.pdf.

31. 参见 Cass Sunstein, *republic. co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32. Joel Kotkin, *The New Geography: How the Digital Revolution Is Reshaping the American Landscape*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0), p. 169.

33. Putnam, *Bowling Alone*, pp. 342—343.

34. David Brooks, *Bobos in Paradise: The New Upper Class and How They Got Ther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0), p. 270.

35. Thomas Friedman, "Cyber-Serfdom", *New York Times*, January 30, 2001.

36. Data from David Leonhardt and Barbara Whitaker, "Higher Fuel Prices Do Little to Alter Motorists' Habits",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0, 2000. 也请参见 Dianne Feinstein and Olympia Snowe, "The Low Cost of Lowering Auto Emissions", *New York Times*, August 1, 2001。

37. Putnam, *Bowling Alone*, p. 357, and chap. 14. 也请参见 Ted Halstead, "A Politics for Generation X", *Atlantic Monthly*, vol. 284, no. 2 (August 1999), 第 33—42 页。

38. Harris Poll Data as analyzed in Putnam, *Bowling Alone*, p. 47.

39. Brooks, *Bobos in Paradise*, p. 271.

40.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Candidate Summary Report for the Bush and Gore campaigns available at: http://herndon1.sdrdc.com/cgi-bin/cancomsrs/?-00+P00003333 and http://herndon1.sdrdc.com/cgi-bin/cancomsrs/?-00+P80000912. Television advertising expense statistics for the two campaigns available from the Bernnan Center for Justice, "Political Television Advertising for 2000 Campaign (June 1—November 7)." Available at: http://www.brennancenter.org/cmagpdf/cmag2000-wrapup-pdg.pdf. Estimates of total expenses for all 2000 federal elections from 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 "Campaign Finance Reform." Available at: http://www.opensecrets.org/news/campaignfinance/index.asp. 关于布隆博格(Bloomberg)的开销,参见 Michael Cooper, "At $ 92.60 a Vote, Bloomberg Shatters an Election Record",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4, 2001。

41. Don Van Natta, Jr., "Enron or Andersen Made Donations to Almost All Their Congressional Investigations",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5, 2002.

42. 引自 Sandel, *Democracy's Discontent*, 第 131 页。

43. Fox News, Fox Special Report with Brit Hume, "Interview with Dale Bumpers," July 20, 2001.

44. Albert R. Hunt, "Don't Stop at McCain-Feingold",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21, 2002.

45. 参见 John B. Judis,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Democracy: Elites, Special Interests, and the Betrayal of the Public Trust* (New York: Pantheon, 2000), chap. 5。

46. 引自 Putnam, *Bowling Alone*, 第 159 页。

47. 参见,例如,Paul Krugman, *Fuzzy Math: The Essential Guide to the Bush Tax Cut* (New York: Norton, 2001)。

48. 关于公民参与在推动社会健康方面的作用,参见 Putnam, *Bowling Alone*, chaps. 16—22。

49. Durkheim,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 p. 201.

50. Kotkin, *The New Geography*, p. 7.

51. 参见 D'Vera Cohn and Sarah Cohen, "Census Sees Vast Change in Language, Employment", *Washington Post*, August 6, 2001。

52. Putnam, *Bowling Alone*, p. 81.

53. Kotkin, *The New Geography*, p. 7.

54. 同上书,第 45、64、70 页。

55. Evelyn Nieves, "Blacks, Hit by Housing Costs, Leaving San Francisco Behind", *New York Times*, August 2, 2001.

56. Nurith C. Aizenmen, "In Bowie, Race Is on Agenda", *Washington Post*, April 9, 2001.

57. Anthony Walton, "Technology Versus African-Americans", *Atlantic Monthly*, vol. 283, no.1 (January 1999), p. 18.

58. Robert D. Kaplan, *An Empire Wilderness: Travels into America's Futur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8), p. 63.

59. Eric Schmitt, "Census Data Show a Sharp Increase in Living Standard", *New York Times*, August 6, 2001. 也请参见 Cohn and Cohen, "Census Sees Vast Change in Language, Employment"。

60. Janny Scott, "Rethinking Segregation Beyond Black and White", *New York Times*, July 29, 2001. 关于与此形成对比的观点,参见 Gregory Ro-

driquez, “Still, E Pluribus Unum”, *San Diego Union-Tribute*, July 18, 1999。

61. Harvard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School Segregation on the Rise Despite Growing Diversity Among School-Aged Children,” July 9, 2001. Available at: http://www.gse.harvard.edu/news/features/orfield07172001.html.

62. 参见 Putnam, *Bowling Alone*, map on 第 293 页。

63. Zell Miller, “The Democratic Party's Southern Problem”, *New York Times*, June 4, 2001.

64. Kevin Sullivan, “U.S., Mexico Set Plan for a 'Smart Border”, *Washington Post*, March 23, 2002.

65. Reed Karaim, “On Both Sides Now, the Costly Consequences of Vigilance”, *Washington Post*, March 10, 2002.

66. Stephen Flynn, “Rethinking the U.S.-Canadian Border”, *Buffalo News*, July 1, 2001.

67. Richard Holbrooke, interview on Fox News, Special Report with Brit Hume, October 19, 2001.

68. Kaplan, *An Empire Wilderness*, pp. 322—328. 也请参见 Joel Garreau, *The Nine Nations of North America*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1)。

69. Kenichi Ohmae, “The Rise of the Region State.” *Foreign Affairs*, vol. 72, no. 2 (Spring 1993), p. 78.

70.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 (New York: Norton, 1992), p. 118.

71. 引自 Richard Morin and Claudia Dane, “Poll: American's Trust in Government Grows”,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28, 2001。

72. 关于这种弹性的根源,参见 John A. Hall and Charles Lindholm, *Is America Breaking Apar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73. 参见 Sunstein, *republic.com*, pp. 170—172; and David Bollier, *Silent Theft: The Private Plunder of Our Common Wealth*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74. James H. Snider, “E-Democracy as Deterrence: Public Policy Implications of a Deterrence Model of 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01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vailable from: Snider@newamerica.net.

75. 关于数字技术加强参与性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的能力的均衡评估,参见 Benjamin R. Barber, "Three Scenarios for the Future of Technology and Strong Democrac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13, no. 4 (Winter 1998—1999), 第 573—589 页。也请参见 Benjamin R. Barber, "Civil Society: Getting Beyond the Rhetoric – A Framework for Political Understanding", in *Civic Engagement in the Atlantic Community*, ed. Josef Janning, Charles Kupchan, and Dirk Rumberg (Gutersloh: Bertelsmann Foundation, 1999)。

# 主要参考文献

Adams, Charles F. *The Works of John Adams, Second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Boston: Little Brown, 1850—1856.

Albrecht-Carrie, Rene. *The Concert of Europe*. New York: Walker, 1968.

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Verso, 1991.

Angell, Norman. *The Great Illusion: A Study of the Relation of Military Power in Nations to Their Economic and Social Advantage*. New York: Putnam, 1910.

Art, Robert J. "Why Europe Needs the United States and NATO."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11, no. 1 (Spring 1996), pp. 1—39.

Bailey, Thomas A. *Woodrow Wilson and the Great Betrayal*. New York: Macmillan, 1947.

Barber, Benjamin R. "Three Scenarios for the Future of Technology and Strong Democrac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13, no. 4 (Winter 1998—1999), pp. 573—589.

Berghahn, V. R. *Germany and the Approach of War in* 1914. New York: St. Martin's, 1973.

Bernstein, Richard, and Rose H. Munro.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Foreign Affairs*, vol. 76, no. 2 (March-April 1997), pp. 18—32.

Berry, Nicholas. "China Is Not an Imperialist Power." *Strategic Review*, vol. 24, no. 1 (Winter 2001), pp. 4—10.

Blinken, Antony J. "The False Crisis over the Atlantic." *Foreign Affairs*, vol. 80, no. 3 (May-June 2001), pp. 35—48.

Bollier, David. *Silent Theft: The Private Plunder of Our Common Wealth*.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Boyd, Julian P., ed. *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3.

Brendon, Piers. *The Dark Valley: A Panorama of the* 1930*s*. New York: Knopf, 2000.

Brooks, David. *Bobos in Paradise: The New Upper Class and How They Got Ther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0.

Brown, Michael E., Sean M. Lynn-Jones, and Steven E. Miller, eds. *Debating the Democratic Peac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6.

Bury, J. B.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From the Death of Theodosius I to the Death of Justinian* (*A.D.* 395 *to A.D.* 565). London: Macmillan, 1923.

Castlereagh, Robert Stewart. *Correspondence, Dispatches, and Other Papers of Viscount Castlereagh*. London: H. Colburn, 1850.

Chace, Robert S., Emily B. Hill, and Paul Kennedy. "Pivotal States and U.S. Strategy." *Foreign Affairs*, vol. 75, no. 1 (January-February 1996), pp. 33—51.

Connelly, Matthew, and Paul Kennedy. "Must It Be the Rest Against the West?" *Atlantic Monthly*, vol. 274, no. 6 (December 1994),

pp. 61—83.

Crenshaw, Martha, ed. *Terrorism in Context*. University Park, Pa.: Pen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5.

Cronin, Bruce. *Community Under Anarchy: Trans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Culver, John, and John Hyde. *American Dreamer: The Life and Times of Henry A. Wallace*. New York: Norton, 2000.

Daalder, Ivo H., and Michael E. O' Hanlon. *Winning Ugly: NATO's War to Save Kosovo*.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0.

Dahrendorf, Ralf. *Class and Class Conflict in Industrial Society*.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Dallek, Robert.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32—194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Davis, Kenneth. *FDR: The War President*, 1940—1943.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0.

DeConde, Alexander. *Entangling Alliance: Politics and Diplomacy Under George Washingt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58.

de la Garza, Rodolfo O., and Harry P. Pachon, eds. *Latinos and U.S. Foreign Policy: Representing the "Homeland"?*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0.

Destler, I. M., and Steven Kull. *Misreading the Public: The Myth of a New Isolationism*.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9.

Deudney, Daniel H. "The Philadelphian System: Sovereignty, Arms

Control, and Balance of Power in the American States-Union, Circa 1787—1861."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9, no. 2 (Spring 1995), pp. 191—228.

Diamond, Jared. *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 of Human Societies*. New York: Norton, 1999.

Dionne, E. J., Jr. *Community Works: The Revival of Civil Society in America*.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8.

Divine, Robert A. *Roosevelt and World War II*.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1969.

——. *Second Chance: The Triumph of Internationalism in America During Word War II*. New York: Atheneum, 1967.

Doyle, Michael W. "Kant, Liberal Legacies, and Foreign Affairs."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vol. 12, nos. 3 and 4 (Summer and Fall 1983), pp. 205—235, pp. 323—353.

Droz, Jacques. *Europe Between the Revolutions*, 1815—1848.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7.

Durkheim, Emile.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 Translated by W. D. Halls. New York: Free Press, 1984.

Ellsworth, Harry Allanson. *One Hundred Eighty Landings of the United States Marines*, 1800—1934. Washington D. C.: History and Museums Division Headquarters, U.S. Marine Corps, 1974.

Elman, Miriam Fendius, ed. *Paths to Peace: Is Democracy the Answer?*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7.

Esposito, John L., and John O. Voll. *Isla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Etzold, Thomas H., and John Lewis Gaddis, eds. *Containment: Documents on American Policy and Strategy*, 1945—195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8.

Feaver, Peter D., and Richard H. Kohn. "The Gap: Soldiers, Civilians, and Their Mutual Misunderstanding." *National Interest*, no. 61 (Fall 2000), pp. 29—37.

Fischer, David Hackett. *Albion's Seed: Four British Folkways in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Fisher, Fritz. *World Power of Decline: The Controversy over Germany's Aims in the First World War*. Translated by Lancelot Farrar, Robert Kimber, and Rita Kimber. New York: Norton, 1974.

Friedberg, Aaron L. "Ripe for Rivalry: Prospects for Peace in a Multipolar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no. 3 (Winter 1993—1994), pp. 5—33.

Friedman, Thomas L. *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1999.

Fukuyama, Francis. "The End of History?" *National Interest*, no. 16 (Summer 1989), pp. 3—18.

——.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 "Second Thoughts: The Last Man in a Bottle." *National Interest*, no. 56 (Summer 1999), pp. 16—33.

Gaddis, John Lew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1941—194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2.

Galbraith, John Kenneth. *The Great Crash*, 1929. New York: Time Inc., 1961.

Gardner, Richard N. "The One Percent Solution." *Foreign Affairs*, vol. 79, no. 4 (July-August 2000), pp. 2—11.

Garraty, John A. *Henry Cabot Lodge: A Biography*. New York: Knopf, 1968.

Garreau, Joel. *The Nine Nations of North America*.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1.

Gelber, Lionel M. *The Rise of Anglo-American Friendship: A Study in World Politics*, 1898—1906.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8.

Gellner, Ernest.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Gholz, Eugene, Daryl G. Press, and Harvey M. Sapolsky, "Come Home, America: The Strategy of Restraint in the Face of Tempta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1, no.4 (Spring 1997), pp. 5—48.

Gibbon, Edward.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e Empire*. 7 vols.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notes, and appendices by J. B. Bury. 1909. Reprint, New York: AMS Press, 1974.

Giddens, Anthony. *Sociology: A Brief but Critical Introducti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2.

Gilbert, Felix. *To the Farewell Address: Ideas of Earl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1.

Gilbert, Martin, *The Roots of Appeasement*.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66.

Gill, Bates, and Michael O'Hanlon. "China's Hollow Military." *National Interest*, no. 56 (Summer 1999), pp. 55—62.

Gilpin, Robert. *The Challenge of Global Capitalism: The World Economy in the 21st Centu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

versity Press, 1981.

Gordon, Michael R., and Bernard E. Trainor. *The Generals' War: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Conflict in the Gulf*. Boston: Little, Brown, 1995.

Gould, Stephen Jay. *Time's Arrow, Time's Cycle: Myth and Metaphor in the Discovery of Geological Tim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Haass, Richard N. *The Reluctant Sheriff: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the Cold War*.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1997.

Haggard, Stephe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0.

Hall, John A., and Charles Lindholm. *Is America Breaking Apar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Halstead, Ted. "A Politics for Generation X." *Atlantic Monthly*, vol. 284, no. 2 (August 1999), pp. 33—42.

Hayek, F. A. *The Fatal Conceit: The Errors of Social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Helms, Jesse. "Saving the U.N.: A Challenge to the Next Secretary-General." *Foreign Affairs*, vol. 75, no. 5 (September-October 1996), pp. 2—7.

Hietala, Thomas R. *Manifest Design: Anxious Aggrandizement in Late Jacksonian Americ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 1985.

Horne, Alistair. *A Savage War of Peace: Algeria, 1954—1962*.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77.

Hunt, Michael H. *Ideology and U.S. Foreign Poli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Huntington, Samuel P.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 72, no. 3, (Summer 1993), pp. 22—49.

——.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6.

Ikenberry, G. John. *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Janning, Josef, Charles Kupchan, and Dirk Rumberg, eds. *Civic Engagement in the Atlantic Community*. Gutersloh: Bertelsmann Foundation, 1999.

Jones, H. M. *The Later Rome Empire, 284—602: A Social, Economic and Administrative Survey*. Oxford: Blackwell, 1964.

Jones, Howard. *"A New Kind of War": America's Global Strategy and the Truman Doctrine in Gree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Judis, John B.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Democracy: Elites, Special Interests, and the Betrayal of the Public Trust*. New York: Pantheon, 2000.

Kant, Immanuel. *Perpetual Peace: A Philosophical Essay*. New York: Macmillan, 1917.

Kaplan, Robert D. *Balkan Ghosts: A Journey Through History*. New York: St. Martin's, 1993.

——. "The Coming Anarchy." *Atlantic Monthly*, vol. 273, no. 2 (February 1994), pp. 44—76.

——. *The Coming Anarchy: Shattering the Dreams of the Post Cold War*.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0.

——. *An Empire Wilderness: Travels into America's Futur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8.

——. *The Ends of the Earth: A Journey at the Dawn of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6.

Kecskemeti, Paul, ed. *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52.

Kedourie, Elie. *Nationalism*. London: Hutchinson, 1966.

Kennan, George Frost. *American Diploma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 "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Foreign Affairs*, vol. 25, no. 4 (July 1947), pp. 566—582.

Kennedy, Paul M. *Preparing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3.

——. *The Rise and Fall of British Naval Mastery*. London: Macmillan, 1983.

——.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Keohane, Robert O.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Kerr, Clark, John T. Dunlop, Frederick H. Harbison, and Charles A. Myers. *Industrialism and Industrial Man: The Problems of Labor and Management in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Kindleberger, Charles P.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Kirschten, Dick. "Ethnics Resurging." *National Journal*, vol. 27, no. 8 (February 25, 1995), pp. 478—484.

Kissinger, Henry. *Diplomac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4.

Knock, Thomas J. *To End All Wars: Woodrow Wilson and the Quest for a New World Ord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Kotkin, Joel. *The New Geography: How the Digital Revolution Is Reshaping the American Landscape*.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0.

Krugman, Paul. *Fuzzy Math: The Essential Guide to the Bush Tax Cut*. New York: Norton, 2001.

Kupchan, Charles A. "After Pax Americana: Benign Power,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the Sources of a Stable Multipola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2 (Fall 1998), pp. 42—79.

——. *The Persian Gulf and the West: The Dilemmas of Security*. Boston: Allen & Unwin, 1987.

——. *The Vulnerability of Empir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 ed. *Nationalism and Nationalities in the New Europ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5.

Kupchan, Clifford A. "Devolution Drives Russian Reform."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3, no. 2 (Spring 2000), pp. 67—77.

LaFeber, Walter. *The American Age: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t Home and Abroad Since* 1750. New York: Norton, 1989.

——. *The New Empire: An 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Expansion*, 1860—1898.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3.

Lancaster, Carol. *Aid to Africa: So Much to Do, So Little Don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Landes, David S. *The Unbound Prometheus: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Western Europe from* 1750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Legro, Jeffrey M. "Whence American Internat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4, no. 2 (Spring 2000), pp. 253—289.

Leigh, Michael. *Mobilizing Consent: Public Opinion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37—1947.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76.

Lind, Michael. "Civil War by Other Means." *Foreign Affairs*, vol. 78, no. 5 (September-October 1999), pp. 123—142.

Lindsay, James M. "The New Apathy." *Foreign Affairs*, vol. 79, no. 5 (September-October 2000), pp. 2—8.

Lodge, Henry Cabot, ed. *The Works of Alexander Hamilton*. New York: Putnam, 1885—1886.

Luttwak, Edward N. *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an Empire from the First Century A. D. to the Third*.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6.

Madison, James, Alexander Hamilton, and John Jay. *The Federalist Papers*. Edited by Isaac Kramnick. London: Penguin Books, 1987.

Mannheim, Karl. "The Problems of Generation." *In 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edited by Paul Kecskemeti.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52.

Marcellinus, Ammianus. *The Later Rome Empire* (*A. D.* 354—378)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Penguin Book, 1986.

Martel, Gordon, ed.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Reconsidered*, 1890—1993. London: Routledge, 1994.

Marx, Karl. *Capital: A Critical Analysis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Translated by Samuel Moore and Edward Aveling. London: Allen & Unwin, 1971.

May, Ernest R. *Imperial Democracy: The Emergence of America as a*

*Great Power*.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61.

Mayer, William G. *The Changing American Mind: How and Why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Changed between* 1960 *and* 1988.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2.

McCoy, Drew R. *The Elusive Republic: Political Economy in Jeffersonian America*.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0.

McNeil, William H. *The Pursuit of Power: Technology, Armed Force, and Society Since A. D.* 100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 *The Rise of the West: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

Mead, Walter Russell. "The Jacksonian Traditio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ational Interest*, no. 58 (Winter 1999—2000), pp. 5—56.

——. *Special Providenc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How It Changed the World*. New York: Knopf, 2001.

Mearsheimer, John J.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5, no. 1 (Summer 1990), pp. 5—56.

——.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Norton, 2001.

——. "Why We Will Soon Miss the Cold War." *Atlantic Monthly*, vol. 266, no. 2 (August 1990), pp. 35—50.

Mill, John Stuart.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With Some of Their Applications to Social Philosophy*. Fairfield, N. J.: Augustus M. Kelly Publishers, 1976.

Mitchell, B. R.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Statistics: Europe, 1750—1993*. London: Macmillan, 1998.

Modelski, George. *Long Cycle in World Politic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7.

Monnet, Jean. *Memoirs*. Translated by Richard Mayne.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78.

Moravcsik, Andrew. *The Choices for Europe: Social Purpose and State Power from Messina to Maastrich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 "Despotism in Brussels?" *Foreign Affairs*, vol. 80, no. 3 (May-June 2001), pp. 114—122.

Murray, Williamson. *The Change in the European Balance of Power, 1938—1939: The Path to Rui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Nicholas, H. G., ed. *Washington Dispatches* 1941—1945: *Weekly Political Reports from the British Embass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

Nordlinger, Eric A. *Isolationism Reconfigure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for a New Centu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Nye, Joseph S., Jr.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0.

——. "Globalization's Democratic Deficit: How to Mak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More Accountable." *Foreign Affairs*, vol. 80, no. 4 (July-August 2001), pp. 2—6.

——.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Do It Alo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 *Peace in Parts: Integration and Conflict in Regional Organiza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1971.*

Ohmae, Kenichi. "The Rise of the Region State." *Foreign Affairs*, vol. 72, no. 2 (Spring 1993), pp. 78—87.

Paine, Thomas. *Collected Writings*. New York: Literary Class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5.

Papayoanou, Paul A. *Power Ties: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Balancing, and War*.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9.

Parsons, Talcott. *The Evolution of Societie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77.

Perkins, Dexter. *Hand Off: A History of the Monroe Doctrine*. Boston: Little, Brown, 1941.

Pflanze, Otto. *Bismarck and the Development of German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olanyi, Karl.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Beacon Press, 1957.

Potter, David M. *The Impending Crisis*, 1848—1861.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6.

Putnam, Robert D.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0.

Reilly, John E., ed.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and U. S. Foreign Policy* 1999. Chicago: Chicago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1999.

Reynolds, David. *From Munich to Pearl Harbor: Roosevelt's Americ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Chicago: Ivan R. Dee, 2001.

Risse-Kappen, Thomas. *Cooperation Among Democracies: The Euro-*

*pean Influence on U. S.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Rock, William R. *British Appeasement in the* 1930*s*.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7.

Rohl, J. C. G. *From Bismarck to Hitler: The Problem of Continuity in German History*. New York: Barnes & Noble, 1970.

Rose, J. H., A. P. Newton, and E. A. Benian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Cambridge: The University Press, 1929.

Ross, Robert S. "Beijing as a Conservative 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 76, no. 2 (March-April 1997), pp. 33—44.

Rothermund, Dietmar. *The Global Impact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1929—1939. London: Routledge, 1996.

Russett, Bruce M. *Grasping the Democratic Peace: Principles for a Post-Cold War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Sandel, Michael J. *Democracy's Discontent: America in Search for a Public Philosoph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Sanderson, Stephen K. *Social Transformations: A General Theory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Cambridge, Mass.: Blackwell, 1995.

Scarre, Chris. *Chronicle of the Roman Emperors: The Reign-by-Reign Record of the Rulers of Imperial Rome*. London: Thames & Hudson, 1995.

Schlesinger, Arthur M., Jr. *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6.

——. *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 New York: Norton, 1992.

Segev, Tom. *One Palestine, Complete: Jews and Arabs Under the*

*British Mandate*. Translated by Haim Watzman. New York: Knopf, 1999.

Sen, Amartya. *Development as Freedom*. New York: Knopf, 1999.

Shiller, Robert J. *Irrational Exubera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Smith, Tony. *Foreign Attachments: The Power of Ethnic Groups in the Making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Snyder, Jack L. *From Voting to Violence: Democratization and Nationalist Conflict*. New York: Norton, 2000.

Sperling, Gene B. "Toward Universal Education." *Foreign Affairs*, vol. 80, no. 5 (September-October 2001), pp. 7—13.

Sprout, Harold, and Margaret Sprout. *The Rise of American Naval Power*, 1776—1918.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0.

Sunstein, Cass. *republic.co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Takeuchi, Tatsuji. *War and Diplomacy in the Japanese Empire*.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35.

Thatcher, Margaret. *The Downing Street Years*.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3.

Treverton, Gregory F. *America, Germany, and the Future of Europ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Trubowitz, Peter. *Defin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Conflict and Change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Turner, Frederick Jackson. *The Early Writings of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Compiled by Everett E. Edward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38.

——.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Holt, Rhinehart & Winston, 1962.

Vasiliev, A. A.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324—1453.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52.

Walker, Martin. "Overstretching Teutonia: Making the Best of the Fourth Reich." *World Policy Journal*, vol. 12, no. 1 (Spring 1995), pp. 1—18.

Walt, Stephen M.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Walton, Anthony. "Technology Versus African-Americans." *Atlantic Monthly*, vol. 283, no.1 (January 1999), pp. 14—18.

Waltz, Kenneth N. "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no. 2 (Fall 1993), pp. 44—79.

Webster, Charles K. *The Foreign Policy of Castlereagh*, 1812—1815: *Britai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Europe*. London: G. Bell, 1931.

Wohlforth, William C. "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1 (Summer 1999), pp. 5—41.

Woodward, C. Vann. "The Age of Reinterpretatio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66, no. 1 (October 1960), pp. 1—19.

Yergin, Daniel. *Shattered Peace: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7.

Zakaria, Fareed. *From Wealth to Power: 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